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

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

Les Mémo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这本书是振奋人心的。

它不是史前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外行之作，而是出自一位一直钟情于地中海研究的历史学家、作家之手。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在蔚蓝色的光线映衬下，通过对巨石建筑、金字塔、希腊神庙或罗马长方形大会堂的精彩描述，过去的一幕幕活剧似历历在目。

费尔南·布罗代尔不仅是法国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写文章的高手。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es Années Croisées France-Chine-Programme d'Aide a la Publication Fu Lei-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ere francais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中法文化年 － 傅雷出版资助计划 － 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190-305-6/K·083 定价：49.00元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著
蒋明炜 吕华 曹青林 刘驯刚/译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

Les Mémo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

地中海考古 史前史和古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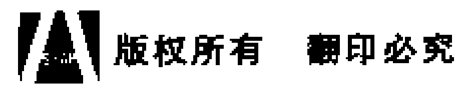
著　　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　　者／蒋明炜　吕　华　曹青林　刘驯刚

出 版 人／谢寿光
出 版 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100005
网　　址／http：//www. ssap. com. cn
责任部门／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责任编辑／文扬舟
责任校对／边　申
责任印制／同　非

总 经 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3.5
插图印张／2
字　　数／369 千字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90－305－6/K·08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4－5628 号
定　　价／49.00 元



地中海画像



扁平陶罐

1. 可能用于祭祀活动，又称“煎锅”，饰有螺旋图案，以及一条公元前3000年在爱琴海上劈波斩浪的多桨船。船头勾勒出冲角的形态。希罗斯，公元前3000年。（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埃及船

2. 客货两用船进港。这是一条帆船，方形风帆卷起（船向北行驶），船的一头向上翘起。塞加拉的伊皮（Ipi）的马斯塔巴石灰石浅浮雕，第五王朝。（开罗，国家博物馆）
3. 逆流而上的尼罗河商船。塞内弗墓葬画，又称“葡萄树墓”。“贵族谷”谢克艾尔古那的大墓地。底比斯以西。



两条亡灵船:根据埃及传统,船的两端微微翘起

4. 这幅画是根据吉萨一座墓葬的壁画而作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2400 – 前 2300 年。

5. 象牙板纸莎草船。描绘的是祭奠亡灵的情景。象牙板来自普雷内斯特的贝尔纳蒂尼(Bernadini)墓葬,公元前 7 世纪。(罗马,VillaGiulia 考古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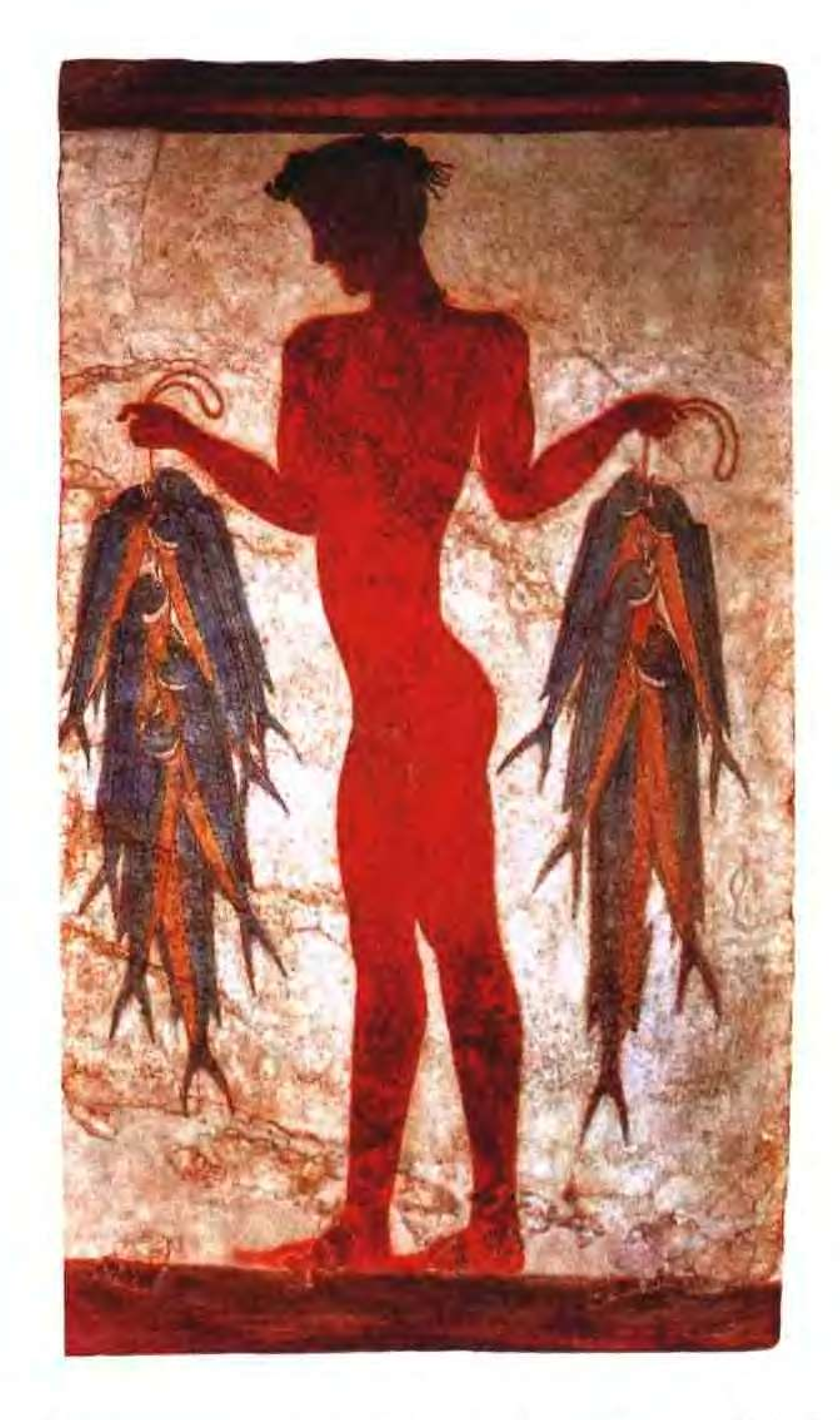


米诺斯文化时期的船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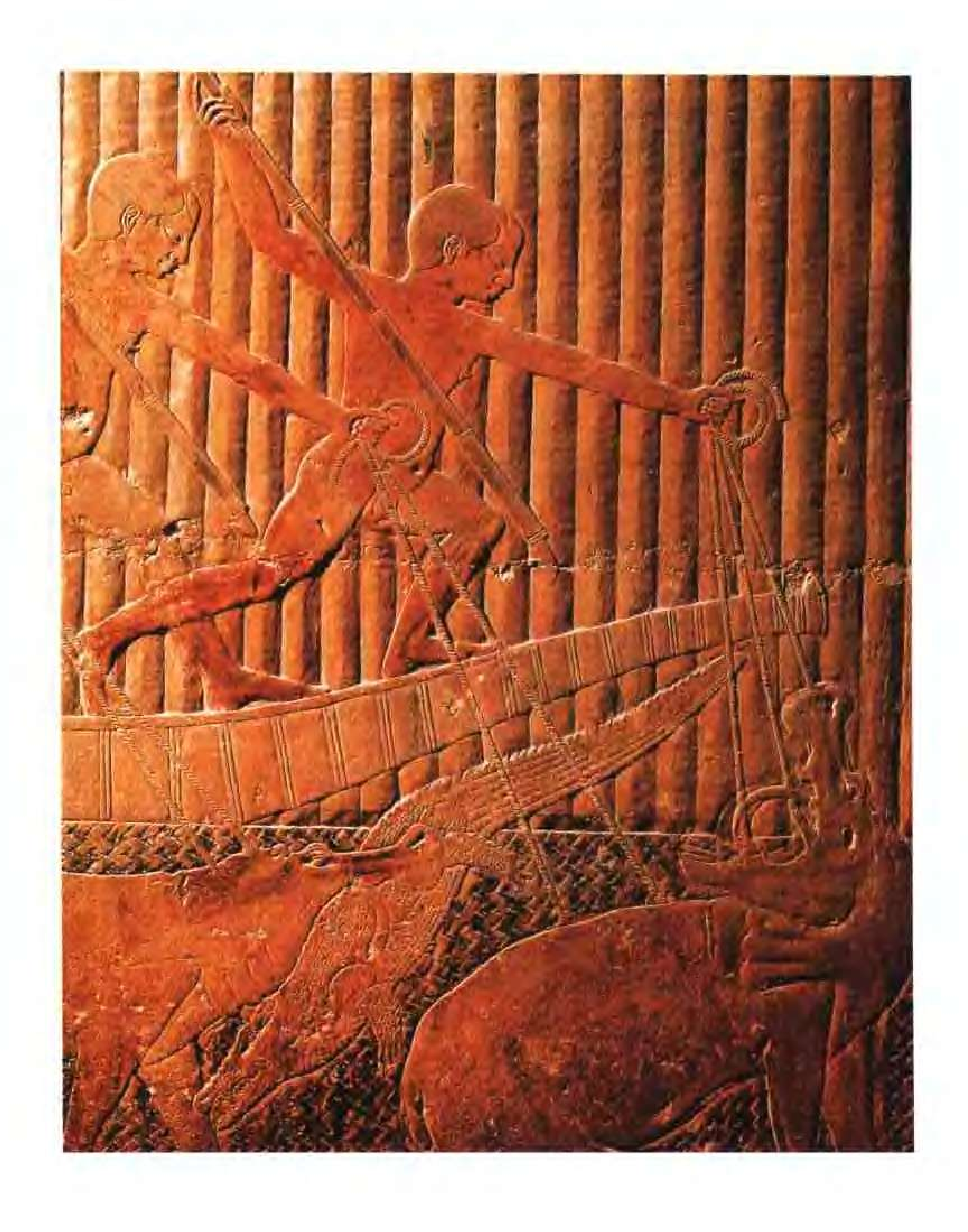
6－7. 该壁画发现于锡拉（桑托林），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作品。壁画描绘了爱琴海上的一支豪华船队，商船和小船。船到港离港，城市由石头房屋组成。几条礼仪船，带遮阳篷，由桨夫操作，负责运送贵族客人。（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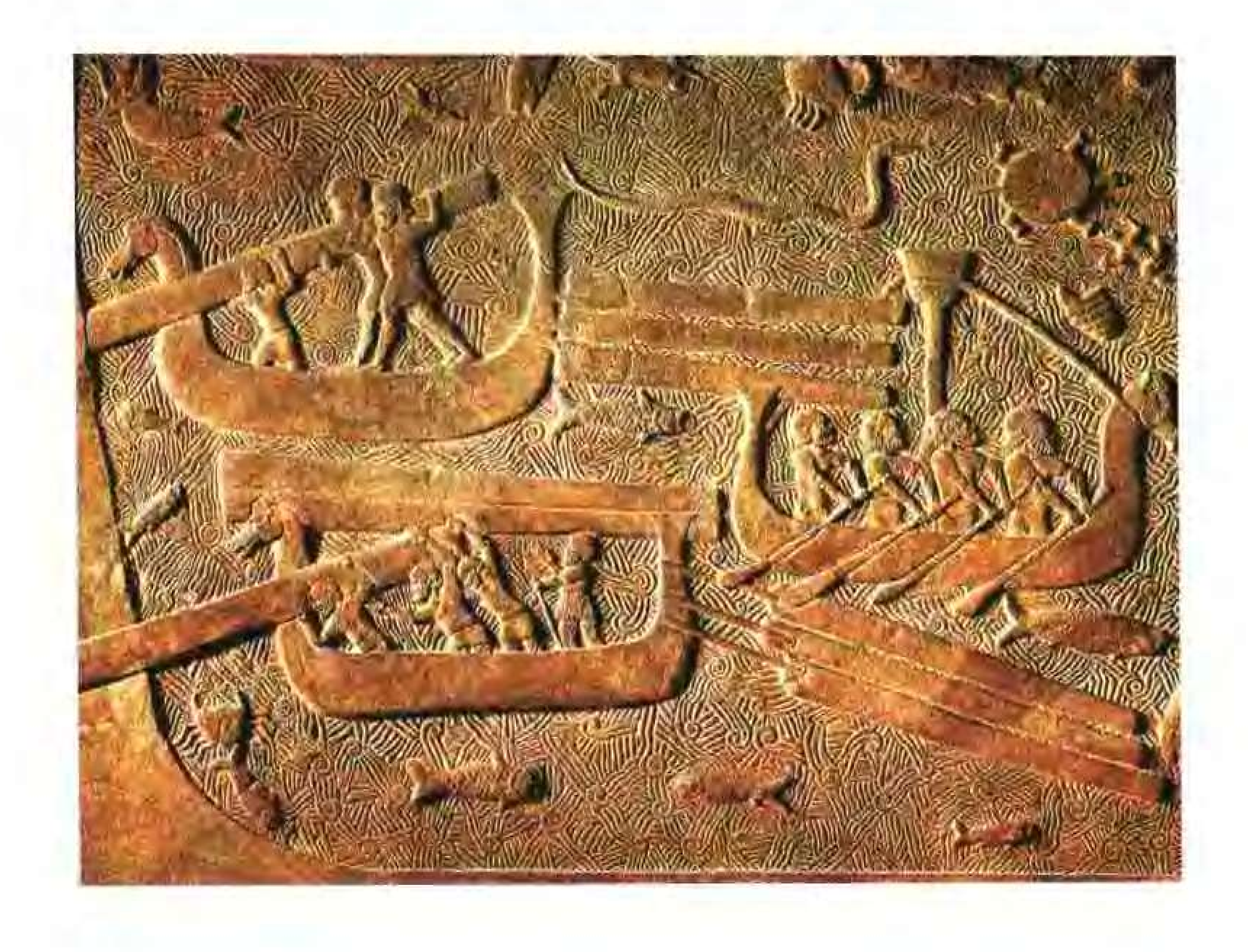




8. 希腊群岛上的渔民满载而归。锡拉（桑托林）壁画局部，大约公元前1500年。（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9. 在尼罗河上捕河马。塞加拉，提（Ti）的马斯塔巴，“古王国”，第五王朝末期。浮雕。



亚述船

10. 黎巴嫩的雪松在黎巴嫩和阿马努斯的群山中砍下来后，扎成木排或装在沿海船舶上运往别处。一些船有马头装饰，希腊人称之为 hippoi。亚述，公元前7世纪，呼罗萨巴德（Khorsabad）萨尔贡王宫主院宫墙上的浅浮雕局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腓尼基战船

11. 一枚腓尼基硬币。描绘的是长条船，船艏带冲角，大约公元前340年。（贝鲁特，考古博物馆）

12. 双排桨战船。刻在尼尼微的浮雕上。描绘的是8世纪提尔和西顿国王卢利在亚述塞那谢里布的军队前溃逃的情景。（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埃特鲁里亚船

13. 乘船捕鱼的场景。船上的渔民正在收网。鱼群搅动海水，一大群海鸟在空中飞翔。塔尔奎尼亚，渔猎墓，大约公元前520年。



14. 双耳爵。上面描绘的是几艘战船(其中有一条埃特鲁里亚船)作战的情景。大约公元前630~前620年。(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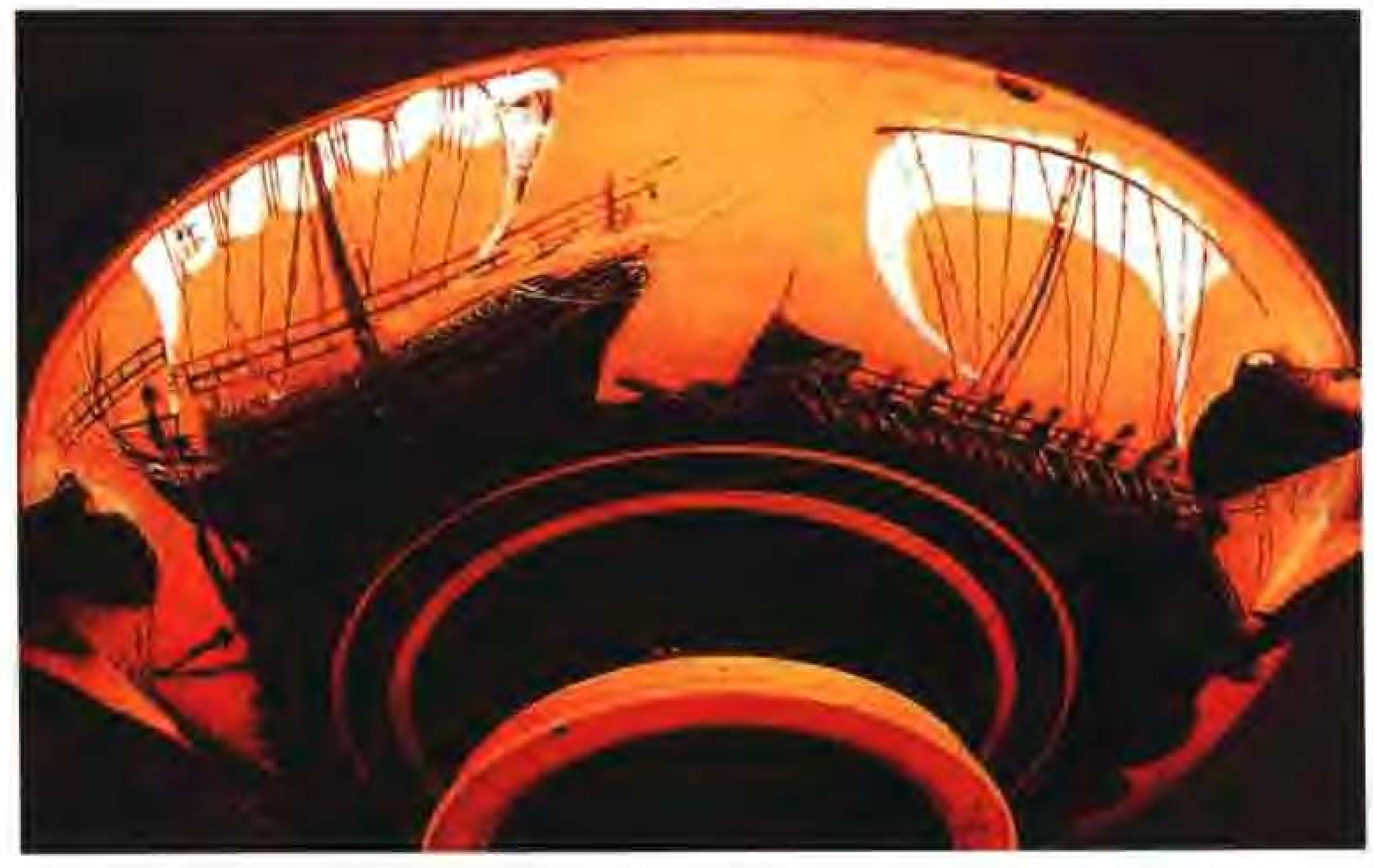


希腊船

15. 这是最古老的希腊双排桨船船画之一。公元前8世纪末。(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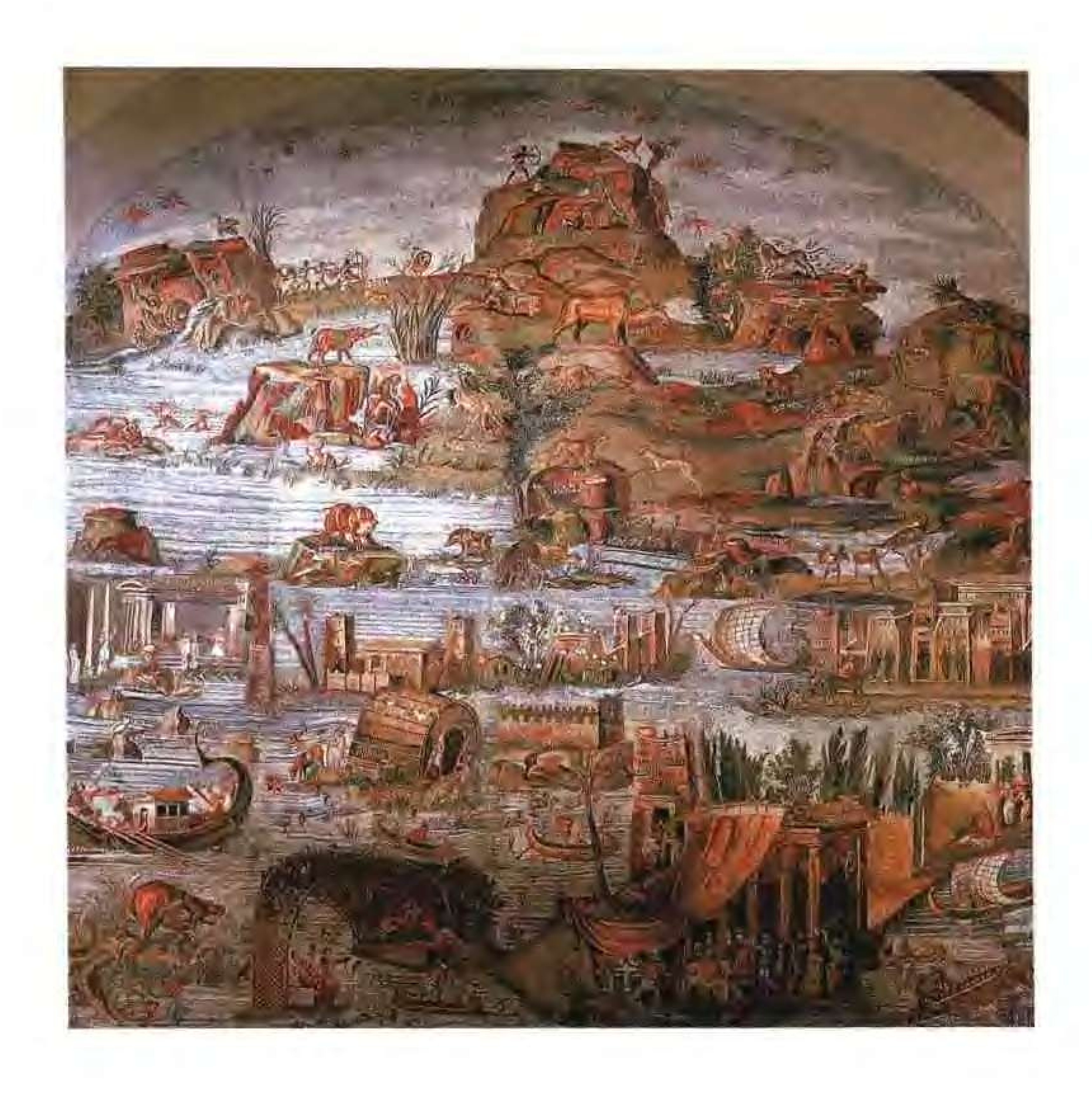
16. 画家埃克塞齐亚(Exéchias)的酒杯画。景物呈黑色。画的是狄奥尼索斯在帆船上的情景,船的一端向上翘起。大约公元前530年。(慕尼黑,Staatliche Antikensammlun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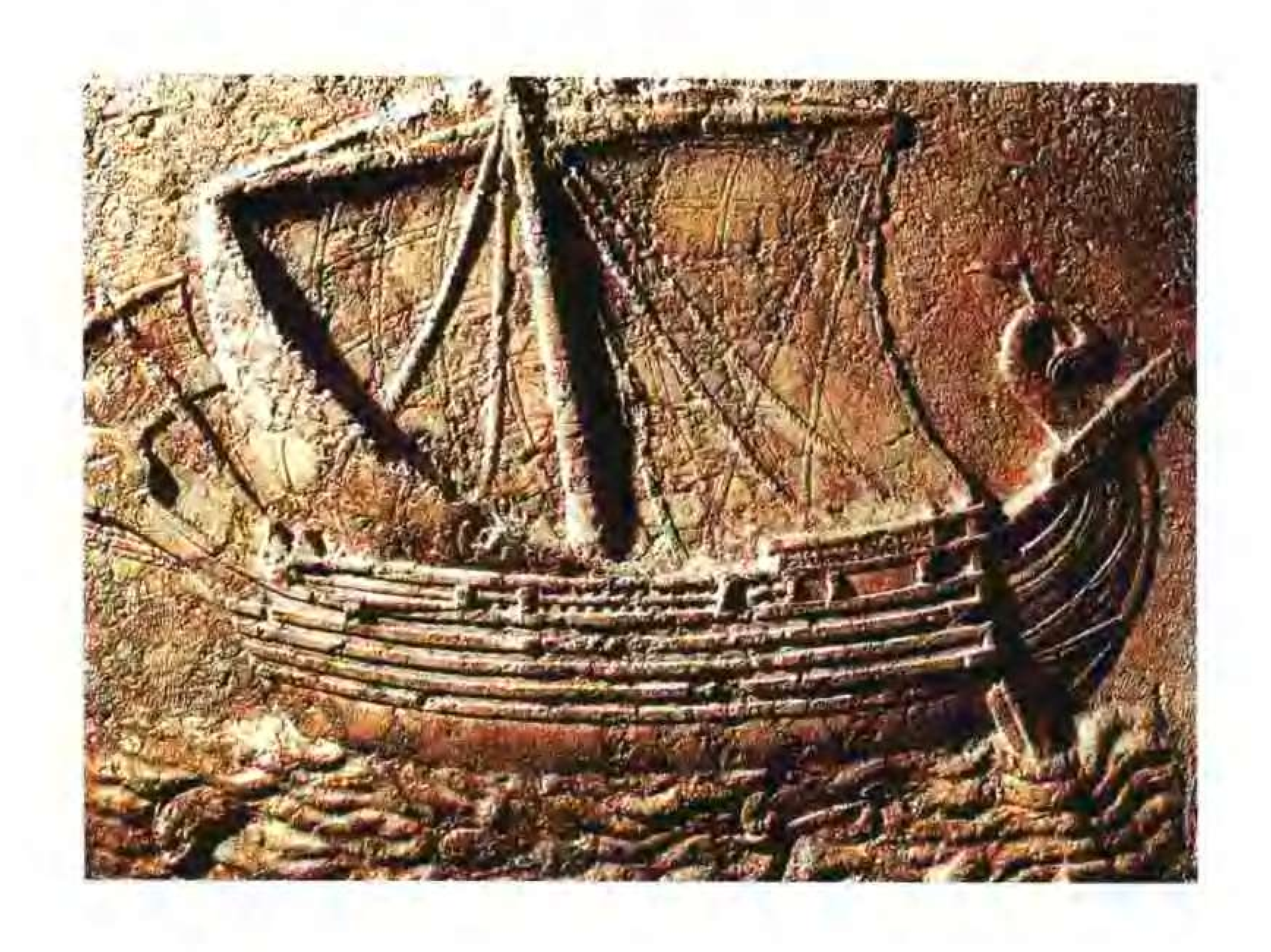
17. 阿提卡葡萄酒壶（Oenochoë）上，一条小型帆桨商船航行的情景。景物呈黑色。大约公元前 510 年。

18. 海盗船袭击商船。可以清楚地看到，缆绳将船帆固定在横桁上，而冲角用于刺穿敌船侧翼。阿提卡酒杯，景物呈黑色。大约公元前 510 年。（伦敦，不列颠博物馆）



东罗马帝国船舶

19. 这幅画由希腊艺术家为拉齐奥的一座神庙而作。它迎合了风靡罗马的东方审美趣味，再现了尼罗河上的活动以及各种船只。古代普雷内斯特“财富”神社的罗马镶嵌画（公元前2世纪末）。（巴勒斯坦，Prenestrino Barberiniano 博物馆）



20. 一艘商船的浅浮雕，来自西顿。公元一世纪。（贝鲁特国家博物馆）



东罗马帝国船

21. 海上和内河商船。艏柱带冲角和海豚眼装饰。该船将桶装葡萄酒运往摩泽尔省。酒桶是高卢人的发明，后来逐渐取代了地中海传统的双耳尖底瓮。高卢的诺马根船，公元3世纪。

宗教信仰雕像



新石器时代宗教信仰

22. 新石器时代崇拜的是生殖女神，无处不在的母神让人想起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女神。这些女神造像着重突出其性特征，常见的雕像既有立姿、有坐姿、也有卧姿的。她们通常以动物为伴，有时身边也有孩子。图中为加泰土丘（中东新石器时代最大的遗址——译者）出土的母神，她裸体端坐在御座上，两只手各扶着一头狮子，一个婴儿正从她的腹中呱呱坠地。（公元前7世纪）





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信仰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主宰天下的神灵均为雄性，他们的生活和举止与人类别无二致。

23. 公元前3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祭司－国王”的圆雕雕像。（藏于卢浮宫博物馆）
24. 图为苏美尔人的祈祷像。作为神的贡品，这个雕像得以永久保存下来。它出自公元前4世纪的乌鲁克古城。（藏于巴格达博物馆）





25. 这是一个用雪花石膏雕塑的、精美绝伦的埃比－伊尔(Ebih－il)官家肖像，曾作为礼物送给司掌战争的女神伊什塔尔；它出自公元前24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城马里。（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26. 这尊笑容满面，非常人性化的金手神像出土于埃兰(伊朗的西南部)；它是公元前2000年苏萨雕塑艺术的一个难得的见证。雕像的材料为黄铜和金子。（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埃及宗教信仰

27. 在古埃及，国王即为神。一直到埃及第四王朝，仍有人把法老视为是鹰面神荷露斯在阳间的化身。图为公元前12世纪的花岗岩鹰面神雕像。（藏于开罗国家博物馆）。



28. 豺面神阿努毕斯（死者之神）出现在地狱入口处的亡魂审判法庭中。他正在司掌计算与学术之神透特的协助下过磅死者的心肝，然后将其良心交与阴间王奥西里斯审判。





基克拉泽斯群岛宗教信仰

29. 早期的希腊文明延续着对母神的崇拜，但此时母神的造型已变成基克拉泽斯群岛特有的怪异女性偶像的形状。"小提琴形"母神俑不仅仅流传于爱琴海地区，因为人们在马耳他的撒丁岛——甚至在西班牙——也发现了同样造型的母神雕塑。图中为源于公元前3世纪的基克拉泽斯群岛母神偶像，用锡罗斯岛的大理石雕刻而成。（藏于雅典考古博物馆）



克里特岛宗教信仰

30. 米诺斯文化时代的克里特岛和迈锡尼文化时代的希腊仍延续着对母神的崇拜。图中的彩陶雕塑为公元前 1700～前 1600 年的克里特岛女神，她伸展的胳膊上缠绕着蛇；因为当时的克里特岛人通常以蛇来寓意生殖和人生的力量。（藏于诺萨斯伊拉克利翁考古博物馆）



迈锡尼宗教信仰

31. 呈希腊语第 23 个字母 ψ 字型的迈锡尼女性偶像。（藏于塔兰托国立考古博物馆）



塞浦路斯宗教信仰

32. 塞浦路斯的古文化同时与希腊、巴尔干半岛、叙利亚—黎巴嫩沿海地区和安纳托利亚的古文化比较近似，因此其先民所崇拜的神灵一般没有明确的名字。这尊公元前6世纪的女性还原陶像出土于拉庇索斯。（藏于尼科西亚塞浦路斯博物馆）



叙利亚和腓尼基崇拜偶像

叙利亚和腓尼基的宗教信仰曾受到与它们交错在一起的近东地区文明的广泛影响。

33. 图中为叙利亚沿海地区的神像，一直被称为“比布鲁斯贵妇”。这尊公元前 8 世纪的青铜和白银雕像明显受到了埃及和东方文化的影响。（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34. 这是一尊青铜腓尼基雕像，它的面部有一层镀金。它出土于加的斯，很可能是埃及神卜塔肖像的仿制品，雕塑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或7世纪。（藏于马德里国立考古博物馆）



希腊宗教信仰

希腊宗教信仰承传于克里特岛与迈锡尼文化，它拥有 2000 年的历史而且曾经历过许多变化。

35. 宙斯取代波塞冬作为希腊万神之首的地位。图中的宙斯铜像出土于乌真托，约雕塑于公元前 500 年。（藏于塔兰托国立考古博物馆）



36. 特洛伊传统中的雅典娜是随着希腊早期移民来到希腊殖民地的。这尊样式古老、神情威严的雅典娜彩陶雕塑供奉在拉维尼乌姆的一座庙宇中(公元前5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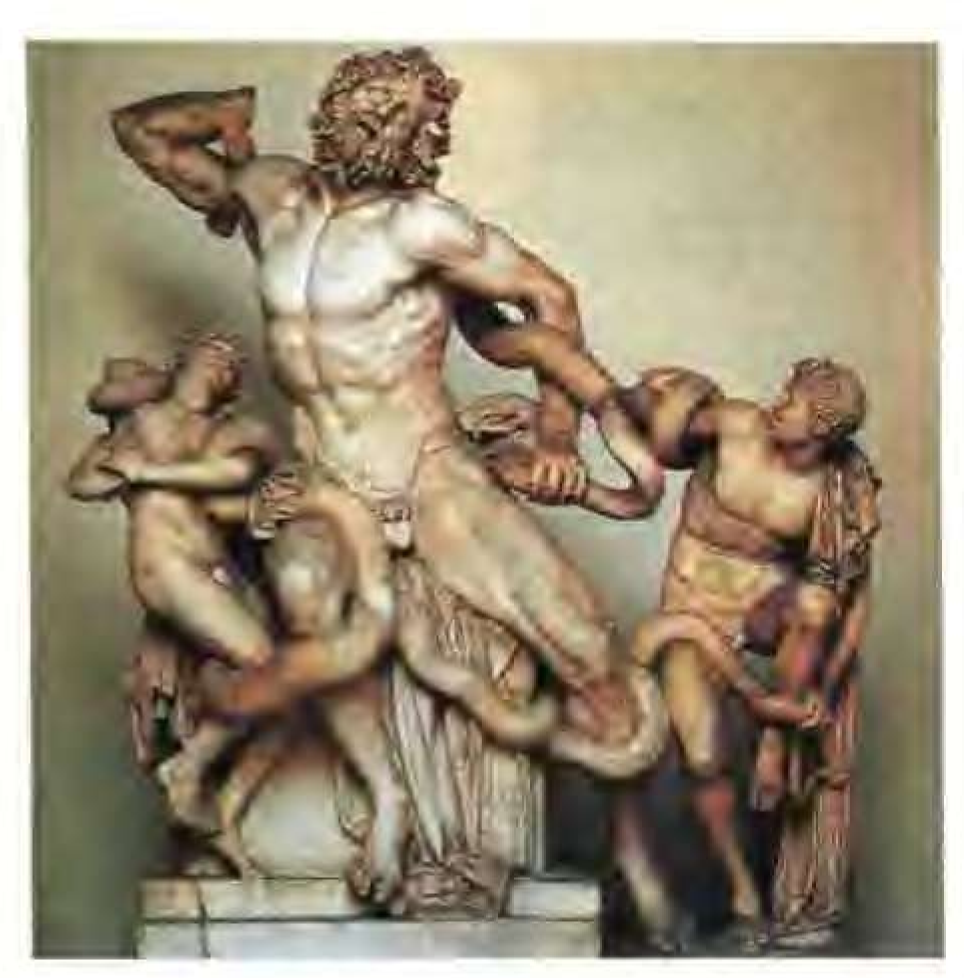


伊特鲁里亚宗教信仰

与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信仰相反，伊特鲁里亚的宗教信仰是由一些预言家们所启示并载入书本中的。它有多种表现形式。

37. 图中是维爱的波尔多纳奇奥（Portonaccio）神殿的雕塑装饰，表现的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女祭司；此神殿约建于公元前500年。（藏于罗马国立朱里奥别墅博物馆）

38. 这头根据传说故事塑造的阿雷佐狮头、羊身和龙尾喷火怪物是公元前4世纪的还原物。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切利尼曾于公元15世纪对它进行修复，它算得上是伊特鲁里亚最著名的艺术品之一。（藏于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





罗马宗教信仰

39. 罗马的宗教信仰大多源自对希腊、伊特鲁里亚及东方文明的效仿，所以其雕像也沿用了这些地区的传奇形象。梵蒂冈的拉奥孔群像是由罗得岛艺术家于公元前 200 年的罗马时代以巴罗克风格的青铜色大理石为原料雕塑而成。（藏于梵蒂冈城皮奥·克雷蒙托 Pio Clemento 博物馆）
40. 自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对他的崇拜逐渐遍及所有的地中海国家。奥古斯都执政后，此崇拜在罗马演变成为了炫耀某种神权君主制和与爱国主义相关的特别表现形式。图中表现的是安东尼皇帝和福斯蒂纳女皇的神化。（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其他文化

41. 像希腊的海尔梅斯双面头像一样，图中是两个黏连在一起的、以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人头面具，其原形可能是英雄化了的将士。这组有可能受到希腊艺术影响的克尔特雕塑曾供奉在法国罗讷河口省的罗克佩尔图兹（Roquepertuse）神殿中。
42. 这是西班牙拉塞罗塔山的一组奇特的神像雕塑，它源于古伊比利亚文明。雕塑中央表现的是一位坐姿的、正在给两个孩子哺乳的女人，她的左边有一只鸟。（藏于西班牙阿尔克伊市博物馆）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1842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300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

以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精品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做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定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精品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精品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编者前言

关于这本书，有一段故事。1968 年初，阿尔贝·斯基拉从日内瓦指派的一位密使摁响了费尔南·布罗代尔家的门铃。他受命说服费尔南·布罗代尔为地中海史系列大画丛撰写 16～17 世纪的文字部分——这正是布罗代尔熟悉的研究领域——以及系列丛书的第一卷：介绍地中海的起源、地中海史前史以及地中海古代文化。费尔南·布罗代尔开始显得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变得跃跃欲试了。当时，史前史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他来说却仍然是新生事物。顷刻间，费尔南·布罗代尔被深深吸引住了。就这样，他欣然提笔写成本书，几乎是一气呵成。

然而，1970 年，阿尔贝·斯基拉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原因，1971 和 1972 年，在选择插图时，他显得有些观望和踌躇。总之，1973 年，编者去世以后，耗资巨大、刚刚有了些眉目的大画丛被彻底放弃了。而当时，费尔南·布罗代尔正埋头写作《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因而无暇全面顾及计划中的著作，更不用说必不可少的地图和插图了——那更是一项额外的工作。所以，他忽略进而几乎遗忘了他的书稿。

然而，在作者去世后十余年的今天，本书却成了问题。知道本书手稿存在的人们为其命运忧心忡忡。但是，决意原原本本出版书稿谈何容易。因为，自 1920 年以来，卓有成效的考古发现接连不断。碳十四测年法不断改写着编年史，而对于一本面向大众、信笔写成的书来说，求助于某位科学工作者对其重新整理同样是难以想象的。怎么办呢？决定权交给了能根据其知名工作、在深知底细的情况下做出判断的人。此人就是让·吉莱那（Jean Guilaine）。他欣然接受：由于作品的某种基调吸引了他，他表示同意，出版时不对原作进行任何修改——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不破坏作品的连贯性和生动性。解决方案是：通过详尽的注释提示读者，自本书成书以来，哪些年代有所变更，哪些事件有了新的诠释；或者向读者推荐若干著

作，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还需要一位资深专业人士接受这项工作。于是，让·吉莱那自告奋勇负责史前史时期部分：这也是他的研究领域。皮埃尔·茹亚尔（Pierre Rouillard）及两位同事[①]表示愿意负责其余部分，即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部分。在此，对他们两位谨表万分感谢。

因此，我们出版的作品是未经任何改动的原稿，即1969年斯基拉出版社拿到的手稿，也是若干年后作者收回的书稿。让·吉莱那和皮埃尔·茹亚尔（用他们名字的开头字母表示，即J. G. 和P. R.）的注释放在页码下方较显眼的位置，以方便读者和正文同时阅读。序言理所当然的由让·吉莱那和皮埃尔·茹亚尔撰写。在本书的结尾部分，附有地图集（第287～306页）。图中标明所有书中提及的名称，以便读者对它们的地理位置有所了解。这些地图对理解书中内容不可或缺。由于它们同时涉及若干章节，我们没有将地图穿插在正文中。本书结尾附历史和地理名词索引（即“译名对照表”——译者）。

① 弗朗索瓦斯·高提耶（F. G.）：卢浮宫希腊、埃特鲁里亚和罗马文物部首席馆员，他负责审阅了有关埃特鲁里亚人的内容。让-路易·于奥（J-L. Huot）：巴黎第一大学教授，审阅了有关“东方”的内容。

序　言

在史前史和古代世界领域，我们并未对费尔南·布罗代尔期待什么，即使是他最钟爱的领域——即作为本书背景的地中海。然而，当人们赞美地理永恒性和地理决定性时，又怎能摆脱起源的诱惑，怎能对历史脉络的呈现视而不见——而这一历史轨迹的深层结构和细枝末节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才捕捉到的啊！

在《法兰西特性》一书中，费尔南·布罗代尔告知："不要认为史前史不是历史。"这位新石器时代或原始史时期的考古学家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还可以补充说："不要认为文字创造了历史。"只有在发掘、分析、探询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农业文明、冶炼文明以及城市文明——这些文明大多没有文字——之后才得知，人们完全可以勾勒出这些时期的历史，揭示特性的铸就过程、社会组织形式、精英们如何展开竞争、经济变迁以及日常生活。公元前 2500 年前后，埋葬在迦勒底(Chaldée)的乌尔（Ur）和安纳托利亚的阿拉萨·霍郁克（AlaÇa Höyük）两地的皇室成员有什么区别？前者属于"有文字的历史时期"，后者属于"史前史时期"吗？这样的划分是徒劳的。因此，人们进行不懈的探索，极力要追溯到创世时代以及生命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在这个意义上，史学家实在不能忽略最古老的定居文明。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一切开始运转，等级社会建立，为数不多的早期城市确立了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地缘文化区出现，宗教传统形成。总之，一句话，松散的人群逐渐过渡到部落。

面对布罗代尔的新挑战，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惊愕。让我们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这一挑战吧。1969 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将读者带到地中海，带到它厚重的历史中——从史前时期到古罗马完成征服。但他并未仅仅满足于游历的兴趣——尽管兴致很浓，而是让我们一同分享他的观点，即"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这涉及漫长的时间

和地域空间：因为在尽可能真实再现各大文化和政治成就、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生命的最初阶段、直至埃特鲁里亚文明——其所在地托斯卡纳无疑是费尔南·布罗代尔最钟爱的地区——的过程中，地域空间立刻出现了。写作本书时正值《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在撰写过程中——两年前（即 1967 年）《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出版。本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史前地中海和古代地中海。为了描绘接连不断的变迁以及地中海周边铸就地中海的各大文明的转接情况，费尔南·布罗代尔突破了经济研究的范畴。从此，他的研究不再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千年计量。这是对漫长时间段的天才处理。这一点在《法兰西特性》一书中也能见到。

因此，我们认为，这部随笔乃是一份"心灵鸡汤"。在书中，我们甚至可以见到出色的反证，因为这位擅长处理大空间和长时间段的史学家给经常囿于本位主义及特定问题的原始史学家带来了他的见解与技巧。所以，本书将提供秘钥，独辟蹊径，提供答案。有人不无担心：截然不同的古代世界会不会带上 16 世纪唯利是图的印记？如果说布罗代尔经常冒险这样做的话——例如：将二千年（以前！）"东方"港口的国际性或古希腊城邦的开放与文艺复兴时期城市的动荡做对比，将雅典、斯巴达或特拜的纷争和"现代"意大利城邦之间的竞争相比较，把殖民时代的"西方"盆地视为爱琴海移民们梦想中的"远西"（Far West），展现"美国化"的迦太基等等，那么他就不会找不到北。他太了解岛屿、平原、山脉、人类和时间了，因而不会仅仅提出可以接受的假设，将不太有把握的思辨表现为简单的质询。因此，人们感激他所做的对比，感激他揭示的相似性，感激他提出专家都逃避的有关问题——由于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专家情愿保持沉默。对大整体的分析，对深层裂变的分析，抑或对重大变迁（向东直至亚历山大的南征北战乃至罗马的征服——即使罗马从此转向"西方"）的剖析，都是方位标。在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布罗代尔用一种极其强烈的观念对其中之一加以描述，即"经济一世界"。他使我们相信这一观念在 16 世纪的有效性，但对于古代的某些时刻却并未采用这一观念。我们敢说，对能"运用好"由我们一位研究全欧铁器时代的同行创造的这一概念，布罗代尔不无感到欣慰和惊讶。

这部著作并非近作。它写于 1969 年，而后被搁置。60 年代末，碳放射测年法对某些年代尚未带来多大改变；当时，有关近东新石器时代和铜

器时代的资料较为散乱，并非像今天这样唾手可得。许多人认为，“西方”巨石建筑艺术的传播途径和冶炼技术的传播相仿；地中海民族、埃特鲁里亚人、辛布里人（Cimbres）和条顿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有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费尔南·布罗代尔始终是他那个时代的学者，无论是在他将远东的先民视为万物起源的时候，还是在单独介绍腓尼基人、埃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三大民族——以便和地中海的其他民族（利古里亚人、凯尔特人、古伊比利亚人）区分开来——生活的最后一个千年的时候。这位60年代末的学者将他所接受的教育进行了回顾：一丁点有关腓尼基人的情况［即：他们发明了文字以及迦太基布匿人中托菲（tophet）神社[1]的习俗］、几堂关于埃特鲁里亚人的课程（以及“埃特鲁里亚之迷”，这个“谜”同样困扰着布罗代尔）、古希腊及其两大特征——殖民主义和古代雅典。费尔南·布罗代尔的视野介于（或超越）大学的日常生活和可能（假如不是历来如此）涵盖地中海诸文明方方面面的教育之间。但是，如果要超越日新月异的考古资料，并深入到深层问题，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关键问题始终存在——即使最精彩的发掘也往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作者想要提出的正是这些问题——远远不只是精确的时间或最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有时还根据亲身经验提供答案。

人们在这里看到的布罗代尔，是一个痴迷于新石器时代农民攻城略地的布罗代尔，一个迷恋在科学艺术领域丰富多产的近东的布罗代尔，一个着迷于不知疲倦的腓尼基航海家和商人的布罗代尔，一个沉浸在由文字、伊奥尼亚哲学或罗马法制组成的知识海洋中的布罗代尔。这位现代史学家透视各个历史阶段，再现期间发生的变革：永久性的贸易革命、交易引发的腓尼基文字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交易便利；还有一项革命性变革是移风易俗后新雅典的运行情况，还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兴起。同时，透过字里行间，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历史，多少消除了笼罩在希腊和罗马这两个巨人身上的神秘感——二者被公认为前人渊博学识天才的集大成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人们怀疑布罗代尔偏爱被“罗马推土机”倾轧过的部族：即埃特鲁里亚人和布匿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鉴于人们只关注富人和强者，为

[1] 腓尼基人有用孩童（后来用羊羔代替）祭祀布匿神巴勒·哈蒙（Baal Hammon）的风俗。托菲神社即为举行此类祭祀活动的场所，并保存人牲的骨灰。人牲习俗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被彻底禁止。——译者注

了重新平衡战败者的贡献，为了细加区分——如果不是质疑——某些自命不凡的成就，新文字有时是必不可少的。难道人们不是太注重希腊了吗，特别是在艺术或技术领域？而在这方面，“东方”早已率先实现了重大突破。

对于历史事件，我们不无欣喜地发现，布罗代尔对它们的历史意义，它们在大型地缘政治实体演变过程中的影响，以及应当赋予被历史学家们高估的某些失败——战败者的视角——以何种意义进行了考察。人们将不会对他关于“稳定实体”——它们经受住了阶段性纠葛的浪花不断拍打的考验——的观点无动于衷：布罗代尔的历史哲学观认为主体的影响和时间的轨迹是相互吻合的；同时，也和自史前史时期起“人类就已经杂交、混合”这一坚定信念完全一致。

当布罗代尔教授抨击亚历山大过于关注东方（对于一个扎根于西方的人来说，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犹如一位中学教师资格考试者在最初的工作中摸不着头脑，抑或当他谴责罗马跨越地中海边界后误入歧途的时候，布罗代尔依然是一位满怀信念的学者：他永远不会走太远。

最后，这部著作还有一大长处，一个毫不逊色的优点，那就是：我们面对的布罗代尔，也是作家布罗代尔。他有着超凡的叙述能力，擅长驾驭各种资料，提出问题切中要害，从崭新的视角再现局部情况，将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事情拉近，将凌乱的部分重新整合，甚至善于推翻爆炸性的年代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是振奋人心的。它不是史前世界和古代世界的外行之作，而是出自一位一直钟情于地中海的人士之手。他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在蔚蓝色的光线映衬下，通过对巨石建筑、金字塔、希腊神庙或罗马长方形大会堂连篇累牍的描绘，过去的一幕历历在目。

让·吉莱那（J. G.）
皮埃尔·茹亚尔（P. R.）

敬告读者

正如读者或许了解的那样，我是专门研究16世纪地中海的。出于好奇乃至需要，我考察了地中海的全部历史。所有我遇到的有关古代或现代地中海有价值的资料，我几乎都加以阅读。但是，说到底，我的个人研究实际上只涵盖1450～1650年这一阶段。

那么，为什么我轻率地接受了阿尔贝·斯基拉的请求，撰写地中海史丛书的第一卷——这显然不是我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呢？

离开本土而又不真正离开家是一种诱惑，这是一种产生于旅行癖好的乐趣。我之所以投降，或许还是出于好奇的毛病，同时也因为我一直认为只有贯穿整个人类时期的历史才是真正可理解的历史？将个人的想法与解释和非同寻常的历史场景相对照是否正确？本书面向知识大众，它给我本人提供了穿越历史长河作一次奇妙旅行的机会。我抓住了这次机会。

不过，我怀着极大的快乐关注着半个世纪以来脱胎换骨的考古学和古代史的发现、假设、激烈的论争——而且不无感到，经常自然而然地回到历史中，回到我熟知的问题中，以便为此奉献毕生精力。因为，通过地中海漫长而辉煌的历史，一切得以连贯，当然毫不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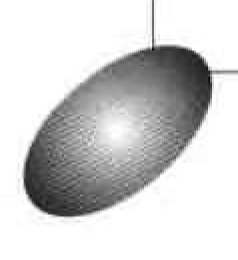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69年7月28日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第一部

第一章 观　　海

地中海悠久历史的最佳见证人就是地中海本身。我们这样说，而且要一再地说。我们要去见她，而且不仅仅见一次。当然，仅凭地中海，她无法全面阐释错综复杂的历史——由多少有点合乎逻辑，反复无常或脱离常规的人类创造的历史。然而，她总是耐心修复往昔的岁月，使之焕发生机，并将它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充满幻想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复活了。

地球古老的一笔

在我们眼里，地中海永远年轻，活力四射，“随时听候调遣”。既然如此，那么是否有必要测定其令人尊敬的年轮呢？旅行者不禁想：那又何妨，倘若渺小的地中海——地壳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飞机轻易就可一掠而过（从马赛到阿尔及尔只需一小时，从巴勒莫到突尼斯只需一刻钟，其余的也一样）——不过是地球地质构造中古老的一笔！那又怎样，假如地中海异乎寻常地比她所承载的最古老的人类历史还要古老！然而，只有将地中海置于其地质史的漫漫长河中，才能充分理解她——她的形状、构造及其（过去、现在或将来）生命的基础现实均归功于历史。让我们打开卷宗！

自几百上千万年前的古生代起——那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时代，一片巨大的环状海域[1]绵延于安得列斯群岛和太平洋之间。它分割成互相平行的两部分，后来演变成古老世界的模样。如今的地中海由几乎可追溯到地球起源的“泰地斯”水流沉积而成。

古老的地中海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三纪剧烈而频繁的褶皱运动使地中

① 地质学家称之为“泰地斯”（Téthys）。——译者注

海的面积大幅萎缩。佩尼贝蒂科山[1]、里夫山[2]、阿特拉斯山[3]、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巴尔干山、托罗斯山[4]、高加索等，所有这些山脉都是从地中海里冒出来的。它们侵蚀海洋，夺走堆积在大海巨大空洞里的沉积物——有泥沙、砾石、石灰石（它们往往厚度惊人），乃至最原始的深层岩石。众山脉对绵延的海水围追堵截，然后各个击破，成为古老的“泰地斯”的血与肉。海水缓慢工作的痕迹随处可见：在开罗附近，有“纤细，乳白色”的沉积石灰岩（“雕刻家只须用凿子凿几毫米深，即可获得绝妙的立体效果”）；在马耳他，巨大的珊瑚灰岩板支撑起一座座巨石神殿；还有塞哥维亚[5]为便于加工而浸润的石块，拉托米（Latomies）的石灰岩，锡拉库萨巨大的采石场，威尼斯伊斯特拉半岛的石头，以及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许许多多其他种类的岩石，它们均源自地中海。

火山与地震

最后，地中海未填满之处便出现异常凹陷的鸿沟，常常像一次切割而成。最深处海拔与四周最雄伟的山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马塔潘角附近，有一条鸿沟深达 4600 米，可以轻而易举地淹没希腊最高的山峰——海拔 2985 米的奥林匹斯山。无论在海底还是在陆地，这些地形并非铁板一块。细长的裂缝随处可见。有的一直延伸到红海。双向伸展的断裂带起码在海格立斯擎天柱之间开辟了一条通往大西洋的狭长通道。

一切都预示着：地质构造将动荡不宁。时至今日，造山运动仍未停歇。地震频繁，而且往往极具杀伤力，温泉众多（主要位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埃特鲁里亚人时期就已闻名），火山带四处蔓延，无论死活山抑或活火山，随时都可能再度喷发。传说中，远在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纵身跃入火山口之前（据说，火山喷发时，只见一只鞋飞向天空），（通过摆弄巨型牛皮风箱）制造雷电的库克罗普斯（Cyclopes）曾经是埃特纳火山的铁匠。维吉尔写道：“多少次，我们亲眼目睹沸腾的埃特纳岩浆四溢，火球滚动！”而在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则千真万确地屠杀了庞贝和赫库

① 位于西班牙南部。——译者注
② 位于摩洛哥北部。——译者注
③ 位于北非。——译者注
④ 位于土耳其南部。——译者注
⑤ 位于西班牙中部城市。——译者注

兰尼姆。1943年以前，我们还见过它冒出一缕缕青烟嘲弄那不勒斯。在利帕里群岛中心位置、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之间，斯特龙博利火山通宵达旦地忙个不停：炽热的喷出物照亮了附近海域。地震与火山无休止地记录着地中海各国的过去，并时刻威胁着它们的现在。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萨塔勒·霍郁克城（大约公元前6200年）的神庙里，一幅非常古老的墙壁画（不是岩洞壁画）记录了一次火山喷发的情景：可能就是附近的哈桑·达格（Hasan Dag）火山。

我们将有机会探讨古老的米诺斯文化时期，克里特岛底下“冥王普路托”的痉挛，尤其是大约公元前1470年和公元前1450年间，附近锡拉岛（今桑托林）的神奇爆炸。当时，半个岛被炸飞，并引发巨大的海啸，火山灰铺天盖地，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今天，奇特的桑托林岛实际上是火山口露在海面上的那一半。考古学家克洛德·A.舍费尔（Claude A. Schaeffer）称，公元前12世纪初，小亚细亚赫梯人的城堡突然间被破坏殆尽，也是地震干的好事。在历史学家看来，大自然而非人类才是制造地球神秘灾难的罪魁。

大山无所不在

地中海地区重峦叠嶂。群山一直延伸到岸边，层层叠叠，绵延不绝，风景秀丽。它们导致交通不便，道路弯曲，田园空间有限，城市拥挤，麦田、葡萄园乃至橄榄园面积狭小。在大山面前，人类的活动总是望而却步。正如人们被赶向“救星”地中海那样——尽管一直都险象环生，而且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他们同样被赶往大山的怀抱。在那里，通常（当然不免也有例外）只有原始生命才得以栖息繁衍——天知道他们是怎样存活下来的。在平原地区，由于缺少大片空地，农田往往呈带状或块状。不远处，小路虽然崎岖不平，但是畅通无阻。

更糟的是，平原地区——特别是面积稍大一点的平原——往往水流淤积。要想恢复原貌，必须征服沼泽地。埃特鲁里亚人的财富之一就是治理水洼地的技术。显然，整治面积越大，工程的施工难度越大，见效越慢，工期越长。辽阔的波河平原汇集了众多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脉的湍流。几乎整个史前时期，那里都是“无人区”。直到大约公元前15世纪，地垛桩城邦出现以后，那里才有人居住。

大体上，从地中海当时的情况看，高地比低地更适宜生命的成长。改

良平原只接纳老实本分的人；它们是在肩并肩卓有成效的劳动中诞生的。它们和贫穷、放任自流的高地成为冤家对头。平原和高地之间不可避免的交锋总是让人提心吊胆。平原自觉优越——并希望如此——不必为温饱发愁，而且食物精美。然而，平原，还有平原上的城市、财富、肥沃的土地、四通八达的道路，都成为令人垂涎的目标。忒勒玛科斯[①]只屈尊于伯罗奔尼撒喜食橡栗的山民。于是，坎帕尼亚或阿普利陷人阿布鲁齐高原农夫制造的白色恐怖之中。每逢人冬前夕，阿布鲁齐牧羊人赶着羊群涌向气候宜人的平原地区。总之，与高山蛮族相比，坎帕尼亚人更喜欢罗马蛮族。公元3世纪，罗马帮助南意大利铲平了野蛮恐怖的阿布鲁齐高原。

高山蛮族的人侵司空见惯，贯穿整部地中海史，殃及地中海所有地区。生活千篇一律地在山里人和平原人之间制造对立。前者喜食栗子，以狩猎，出售动物皮毛、皮革及幼畜为生，时刻准备迁徙；后者则扎根于土地，有的人卑微，有的人高贵，拥有土地，大权在握，掌握军队、城邦以及出海船只。这种交锋——至今仍未消失——是在高寒雪域和橘树及文明之花绽放的低地之间展开的。

的确，在高地和低地，一切都存在天壤之别。这边欣欣向荣，那边却疲于奔命。即使相差几小时的路程，庄稼收获的季节也不尽相同。小麦不停地生长，在高地比在海平面要晚熟两个月。因此，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气候变化对庄稼收成的影响截然不同。4月份或5月份，迟到的雨季对山里人来说犹如上天的恩赐，而对平原来说则不啻是一场灾难：即将成熟的小麦因此面临锈蚀和腐烂的危险。无论是米诺斯文化时期的克里特，还是公元17世纪的叙利亚，抑或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概莫能外。

撒哈拉和大西洋

例外的是，地中海南部沿海地区没有一座山脉。漫长的海岸线异常平坦，几乎一望无际，与撒哈拉沙漠相连，绵延成千上万公里：从突尼斯的海滨丘陵地带和杰尔巴岛（呈圆形，食莲族心目中的奥德修斯岛）一直到尼罗河三角洲，尼罗河温暖的泥浆水一直流人地中海遥远的深处——一直伸人到黎巴嫩的群山之中：这些山脉赋予腓尼基城邦、小岛或海上平台以典型而奇妙的地中海风格。从飞机上朝下看，风景如画的地中海尽收眼

① 奥德修斯之子。——译者注

底：辽阔的海面与撒哈拉紧紧相连，空旷无比，一片呈蓝色，一片呈白色，而后逐渐转变成黄色、赭色或橙色。

的确，撒哈拉沙漠粗暴地闯入了地中海的生活，无论在人文方面还是在地理方面。每年夏天，它将大批从事劫掠的游牧民族推向地中海沿岸国家。歇脚处，黑色的羊毛帐篷（后来用驼毛编织）里挤满了男人、妇女、小孩和牲口。这些讨厌的邻居一有机会就抢夺财物。如同悬在脆弱文明头顶的山民那样，游牧民族构成另一个永恒的威胁。地中海周围任何成功的文明注定懂得如何利用和遏制山民或流民，周旋于两者之间，甚至御之于千里之外。

撒哈拉沙漠虽然一望无际，却从未容纳所有土生土长的居民。每隔一段时间，它将他们推向沿海地区，滨海丘陵地带。而被它吸引过来的人却寥寥无几。沙漠驼队缓缓穿越非洲和亚洲沙石遍地的寂寞——比地中海更加漫无边际的寂寞之海。然而，久而久之，沙漠驼队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他们的足迹遍及黑非洲：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和两国的原始淘金者建立联系）；红海、波斯湾、印度洋的文明古国；陶瓷艺术的发祥地，金属、珠宝和香水产地，各种灵丹妙药、香料及美食之都。

撒哈拉沙漠深深影响着地中海的地理环境。每逢夏季，撒哈拉干燥、灼热的空气笼罩了整个地中海，并堂而皇之地侵入其北部地区。在地中海上空创造出“天堂穹苍”：异常清澈透明，满天星斗，完美无瑕，无与伦比。在 4 月和 9 月间，强劲的东北季风丝毫不能减轻撒哈拉的酷暑，增加不了空气的湿度。只有当坎辛风、西罗科风——在贺拉斯笔下重如铅锤（plumbeus Auster）——肆虐的时候，天空才会云层密布。这两股南风裹挟着细沙，经常将令智者思索、让凡人颤栗的“血雨”带向远方。

为了等到一滴水，要遭受 6 个月的干旱：无论植物、动物抑或人类都难以忍受。森林是地中海山区自然天成的植被。只有人类不去碰它，不去修路，不去放火烧林、开垦土地，不去放牧，不去为获取薪材或造船材料而乱砍滥伐，森林才能存活。森林一旦遭受虐待，品质就会迅速下降。丛林、咖里哥群落就是由“植物帝国”——森林退化而来的。那里到处都是奇珍异石、芳香植物，一直被尊为地中海的稀世珍宝。迦太基因地处非洲而深受其害：为寻找造船木料，迦太基人不得不前往撒丁岛。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则处境更糟。

随着大西洋的影响与日俱增，撒哈拉的势力逐渐退却了。10 月——极少提前，却经常推迟，大西洋饱含水汽的低气压开始自西向东缓缓推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或从比斯开湾跳到利翁湾以后，低气压旋转着加速向东推进。沿途狂风大作，退一进三，从四面八方不断向东深入。地中海上空，天色阴沉，海水呈深灰色，宛如波罗的海；或者，在龙卷风的袭击下，地中海湮没在茫茫水雾中。于是，暴风雨来了，有时是暴风雪：干涸达数月之久的河床里，水位急剧上涨；连续数日，城市笼罩在烟雨蒙蒙之中，仿佛格列柯[①]画中所描绘的托莱多[②]悲壮的天空。这是“黑雨”季节(imbribus atris)，遮天蔽日。鲁西永[③]平原、米提贾平原[④]、托斯卡纳[⑤]、西班牙以及萨洛尼卡[⑥]的田间地头洪水频繁，来势汹汹。不可思议的洪水甚至穿过沙漠，淹没麦加的街道，以至于北撒哈拉驼队行走的路线都变成了湍急的泥石流。在奥兰以南的艾因塞弗拉[⑦]，俄国流放者伊莎贝尔·埃伯哈德（Isabelle Eberhard）经不住沙漠的诱惑，于 1904 年在干涸的河谷中因遭遇洪水袭击意外身亡。

然而，地中海的冬季却温暖如春。地势低洼的平原极少下雪。明媚的阳光有时持续数日，而密史脱拉风或布拉风还没有到来。大海出人意料的平静，有时甚至可以划船去公海探险。最后，暴风季节也是好雨时分。阿里斯托芬笔下的农民为之欣喜若狂，高谈阔论，开怀畅饮，任由宙斯普降大雨“让土地受孕”而悠闲自得。天冷了，就生一堆火，然后举杯共饮——古希腊米提利尼诗人阿尔塞如是说。要做完冬天有限的几件活儿，有的是时间：诸如捣碎麦子、焙炒以便存放，把甜酒烧煮、浓缩，打造长矛，到林子里砍一段橡木制作犁辕，设陷阱抓鸟，编织箩筐，把小毛驴赶到城里农贸市场……

真正的农忙始于最后几场春雨下完之后。就在那时，燕子飞回来了。罗得岛一首古老的民谣这样唱到：

---

① 希腊裔西班牙画家。——译者注
② 西班牙城市。——译者注
③ 法国旧省，首府佩皮尼扬。——译者注
④ 位于阿尔及利亚。——译者注
⑤ 意大利中部一地区。——译者注
⑥ 希腊北部港市。——译者注
⑦ 位于阿尔及利亚。——译者注

小燕子，小燕子
你是春天的使者
…………
小燕子，白肚皮
小燕子，黑脊梁

然而，春天是短暂的。当沙漠里风信子和百合花长出来的时候，当橄榄树开出肉眼看不见的小花时，春天也差不多到头了。于是，“漫漫夏月”开始了，还有无休止的劳作。农忙一直持续到秋天——正如赫西奥德[1]笔下所描绘的：直到“鹤从云端发出叫声”，通知人们该播种了和“多雨的冬季就要来了”的那一刻。

听任故障摆布

当然，我只是简单地描述地中海一带的气候机制。虽然“乡村双季发动机”并非完美无缺，其他因素一直在起作用，但是情况大体如此。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台发动机也有运转失常的时候：雨季可能提前来临，也可能推迟；雨量有时过于充沛，有时则明显不足；“冬天貌似春天”，肆虐的狂风不合时宜地带来干旱、水患或料峭春寒，冻坏小麦和葡萄的花蕾；抑或在西罗科风的袭击下，奶状麦粒尚未成熟便干枯而死。地中海的农民历来惧怕这类意外情况发生：顷刻间，一切都摧毁了，犹如同样频繁的“鼠疫般的”蝗灾。在卡比利亚，每当“新年的大门敞开（即春分、秋分、夏至和冬至）”，人们都说，这预示着新的季节开始了：“带着它的财富：面包或饥荒”。

发祥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的古老文明曾经求助于人工灌溉。这是否就是灵丹妙药呢？基本上是这样。不过，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灌溉只用于万不得已之时。因为这套作法比较奢侈，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且空间有限，只有几个国家能够受惠。

不要忘记河流

克劳迪奥·维塔芬芝（Claudio Vita-Finzi）在他的著作《地中海的峡

① 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作品有《工作与时日》。——译者注

谷》(1969 年出版)一书中曾不失时机地提到:在回顾性地理中,首要事件——诸如火山爆发、地震以及气候的变化——并非毫不相干。地中海沿岸的河流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甚至常年干涸的河道也不例外。

它们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运送水、浑浊或泥沙,构造冲积平原,为人类提供辛勤劳作的场所;另一方面,侵蚀河谷,在冲积层中开辟新河道,再把冲积层搬到更遥远的地方。柏拉图想象水将“肥沃、松软的土壤”带到阿提卡的情景:“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

克劳迪奥·维塔芬芝的功劳不在于对这两种百年天工加以区分,而在于对其各个阶段进行“历史的划分”。他认为,地中海的河流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人类史,一部充满激情和艰辛的历史。潺潺的流水裹挟着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和人类多舛的命运。

在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一次漫长的沉积过程。一些古老的冲积层和红壤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尼罗河中大部分淤泥正是在这一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公元前 3 万 ~ 前 1 万年间——堆积而成。当时,尼罗河的水量要比法老时代充沛得多。在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原始农业时期,耕地不幸遭到严重侵蚀。直到罗马帝国时代,人们在北非昔兰尼加到摩洛哥一带修建了大量堤坝和土台,土地好歹才得到修复。过了一段时间,侵蚀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灭亡。堤坝被大水冲垮,植被被水流冲走。在中世纪,地中海一带风调雨顺,河流水位大涨,泥沙再次淤积。一些阿拉伯地理学家认为,在 11、12 和 13 世纪,不论是洪水经常泛滥的谢利夫河还是苏斯河,都堪与尼罗河媲美。对于这一夸大其词的说法,人们一笑置之,然而江河已经今非昔比。大约在 16 世纪,时间的沙漏开始倒流,侵蚀重新开始。河水一直深入到古老的冲积层(有时厚度可达 40 米),将泥沙冲人大海。三角洲面积不断扩大,但要保持肥沃的土壤并非易事。想要有效遏制延续至今的大规模侵蚀运动,希望似乎非常渺茫。

沉积和侵蚀之所以交替进行,原因在于海平面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水量增加意味着侵蚀力量增强),植被形成以及河流改道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旧石器时代人为造成的森林火灾(在阿尔及利亚卡普西 Capsienne 时期的一处遗址中,发现 5000 立方米灰烬)、新石器时代的火耕农业和畜群。

我们因此豁然开朗,并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的观点。如果说,公元 4 世纪前后,罗马乡村地区人口减少、环境恶化的话,那么除了归咎于人类的疏忽大意外,原因还在于河流水量增加后将沙砾和腐质水带到低洼地

区。同样，在16世纪，天花盛行是因为水流人低地，淹没所到地区并长期滞留，迫使人们步步后退或逃亡。

这一切还可以说明地中海坡地文化的稳定性及其巨大价值：在河谷两岸，丘陵山坡上早就生长着小麦、橄榄、葡萄以及无花果……

有限的便利

简而言之，我们往往只看到地中海地区生活温馨和天然便利的一面，被它绮丽的风光所迷惑。耕地稀少，到处都是荒山秃岭（一位地理学家曾说："全是骨头，没什么肉"）；降雨分布不均：当冬天植物休眠时，雨量充沛，而植物生长需要水分时，降雨却消失了。和其他植物一样，小麦必须加紧成熟。气候并未减轻人类的痛苦：全部劳动都在酷暑中完成，却往往收成不佳。赫西奥德告诫人们，"光着膀子播种，光着膀子犁地，光着膀子收割"。意思是说，当时天太热，根本穿不了衣服。维吉尔也说："Nudus ara, sere nudus"（光着膀子耕地，光着膀子播种），并补充道，假如年终缺粮，"就到林子里去摇晃橡树充饥……"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地中海虽然海水一年到头都很温热——保持在大约13℃左右（这正是冬季气候温和的原因）——但是在生态方面却很贫瘠。一位深谙大西洋的自然学家"在地中海曾经目睹一次渔民收网的过程"。当他没有见到任何"在大西洋司空见惯的活蹦乱跳的海底生命"时，他深感惊讶：只有很少的一些贝壳和鱼，而且大多数都个头很小。毫无疑问，这里的一些渔场闻名遐迩：科马基奥环礁湖、比塞大湖、博斯普鲁斯海河等，面在赫勒舟桥，"阿比多斯航道盛产牡蛎"；在西西里岛、北非、普罗旺斯和安达卢西亚沿海，每年都可以捕捞金枪鱼……尽管如此，总的来说收获微乎其微：生猛海鲜（frutti di mare）固然美味可口，但是产量有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峭壁嶙峋的海岸，浅水区稀少，而浅水区最适宜鱼苗生长；浮游生物贫乏，其灾难性不亚于马尾藻海——事实上，地中海和马尾藻海一样，表面海水湛蓝；而地中海漫长复杂的历史也是造成地中海海水的盐度和温度频繁产生剧烈变化的原因之一：当地的动物因此接连不断地成批死亡。

面向大西洋的狭小豁口挽救了地中海。假如在直布罗陀海峡修筑一道堤坝：地中海很可能变成咸水湖，一切生命都将销声匿迹。相反，如果豁口过大，潮涨潮落将带来大批海洋动物，地中海将动荡不安，冬季温暖的

天气将烟消云散。那该怎么办呢？还是安心享用来自大西洋的冻鱼吧，它们定期运往地中海。而在威尼斯，要享用一条在亚得里亚海宽阔的水域——而非在环礁湖里——用基奥吉亚漂亮的拖网渔船（带彩色船帆）捕捞的铁板烤鲷鱼（orata ai ferri），那简直是需要申请的优厚待遇。

但是，人们不禁会问，地中海的财富何在？于是，地中海的各种景象立刻浮现在眼前：岛屿星罗棋布，海岸线蜿蜒曲折，锚地随处可见——这是湿海风的策源地，适宜开展旅游和贸易……然而，地中海并非像人们经常描绘的那样，一直都是土地和人类的“天然纽带”。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正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对天空无可奈何一样，我们对地中海也同样如此。公元前 12000 ~ 前 11000 年前（这是一个假设）抑或公元前 6000 ~ 前 5000 年前（这一点是确定的）——总之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记录，原始人类没有到地中海的波涛中去探险。但是，开始学习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够掌握。只是到了公元前 3000 年——甚至更晚一些，航海技术才真正为人类所用；公元前 2000 年，贸易才真正出现；公元前 1000 年，航海活动才到达直布罗陀海峡以外，在通往地中海的漫漫旅途上。

因此，如果说“野蛮航行”很早就有所尝试，那么文明航行、定期航行、甚至安全航行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还有，相对频繁的海上交往只对某些海岸、某些城市提出了挑战。狭窄的海面备受欢迎，要是和将地中海分割成块状的诸海中的某一个相通，而且当地也是半封闭型经济，那就再好不过了。希腊格言道：“绕过马累亚角的人必须忘记祖国。”

西西里分界线

就这样，地中海一带长期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如今的地中海比起伯里克利［古代雅典政治家，执政时期为公元前 443 ~ 前 429 年。——译注］时代的地中海来说要统一多了。即使在表面上祥和统一的古罗马统治时代，也不应当对这一事实熟视无睹。多元性总是胜过单一性：地中海有 10 个、20 个、上百个，而每一个大地中海又可分成若干个小地中海。因此，体验一下渔民昔日和今日的真实生活就会知道，地中海的一切都变了：从海岸这头到那头，从海面到海底，从沙滩到岩层。但在陆地上还是老一套；当然我们一直在地中海驻足；加的斯的气候使人想起贝鲁特，普罗旺斯河与克里米亚南部海岸相仿，耶路撒冷附近橄榄山的植物适宜在西西里种植——事实的确如此，然而，耕地方式却截然不同，使用的工具不尽相

同，葡萄架的支撑和绑缚方法也不一样；葡萄酒、橄榄树、无花果树、月桂树、房屋以及装束都不一样。没见过沉浸在2月圣—布莱斯（Saint-Blaise）节中的拉古扎城的人无法想象达尔马提亚所固有的二元特征。这些差异在地理上往往只是粗略地显露出来；特殊性的疯狂制造者——历史——将一切都强化了，到处留下赏心悦目的色彩。

此外，强烈的对比打破了地中海呆板单一的形象：北部就是北部，决不可能是南部；西部更不可能是东部。地中海过于横向延伸，西西里分界线与其说将地中海的各个部分连成一体，倒不如说将它一分为二。

地中海从西西里南岸到北非沿海一带，水域比较浅，地势似乎抬高了。稍加努力和修筑一道堤坝即可将北部和南部一分为二。在浅海地带，岛屿首尾相连，从西西里一直到突尼斯珊瑚礁和海绵密布的海岸：马耳他、高德什、班泰雷利亚、兰佩杜萨、曾卜拉、克尔肯纳群岛，以及杰尔巴……我依然记得乘飞机经过突尼斯和西西里、希腊和意大利的情景。当时，水上飞机飞得很低：西面特腊帕尼的盐田、海边小船在海底的投影、海面水流下面湛蓝的海水都看得一清二楚。哦，还能同时看到科孚和塔兰托海湾，真是奇迹！在这张由星星点点回忆组成的“航拍图”上，我总能见到两个地中海的接合部。人类历史总是偏爱在此处留下印记。但它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呢？北方和南方势不两立，指的是古罗马和迦太基；东方和西方分庭抗礼，说的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伊斯兰民族向基督教国家宣战。假如把昔日的战争一起表示出来，一条漫长的战线立即呈现在眼前：从科孚到亚克兴、勒班陀、马耳他、扎马、杰尔巴……

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地中海的两大阵营——东方和西方，利凡得（法语发音“勒旺”）和波南得（法语发音“波囊”）——尽管有时也交换船只、商品、人员，甚至信仰，但是它们总有自给自足的倾向。地中海最终总是迫使双方和平共处，然而，它们既是兄弟，又是仇敌，在一切方面都势不两立。在西西里分界线东西两侧，天空还是那个天空，而色彩却各不相同：东面比较明朗；荷马写道，在犹如葡萄酒一般黑的紫罗兰海面上，基克拉迪群岛是一串耀眼的橘黄色块，罗得岛是一个大黑块，塞浦路斯则是靛蓝色块。这是一天下午，在从雅典飞往贝鲁特途中，我所见到的情景。让我们抨击文明进步吧，不过，要看地中海，我们建议不妨挑选一个晴朗的日子作一次空中旅行，飞机贴近地面和海面，飞行时速度不要太快……

"旧大陆"中心地带的地中海

尽管就过去的速度而言，地中海如此浩瀚无垠，它却从未在自身的历史中故步自封。它迅速突破各种界限：向西进入大西洋，向东穿越近东（近东吸引地中海达几个世纪），中部深人沙漠地带，穿过茂密的棕榈林，到达很远的地方；向北延伸至欧亚大陆一望无际的草原，直达里海；向北继续穿越欧洲依然沉睡的森林地带，大大超越传统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橄榄树林界线。越过最后一棵橄榄树后，地中海的生命和历史并未停下脚步，以取悦地理学家、植物学家或历史学家。

地中海（Mare Internum）命运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嵌入世界上最广大的陆地：雄伟的、"特大型单一大陆"——欧一非一亚大陆——本身就堪称星球；在这里，一切都显得早熟。通过这三块相互粘连的大陆，人类找到了上演世界史的大舞台，并在那里完成了重大交流。

由于人类这一铁球无休止地一直滚到地中海，并经常在地中海边缘停顿下来，地中海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宇宙的生命中心之一，并反过来在其周围的各个大陆发扬光大（它们是地中海的共振区），也就不足为奇了。地中海史服从于世界历史，而它自己的乐声也传得很远。这些潮涨潮落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历史的基本内容：地中海有时施与，有时接受；在后一种情况下，所交换的"礼物"可以是天灾也可以是恩泽。一切都混杂在一起，而地中海早期文明的闪亮登场就是一次大融合的结果。一会儿我们将看到。

第二章　万里长征走向文明

穿越耳熟能详的地中海而不迷失方向，不费吹灰之力。只要我们闭上双眼，回忆便汹涌而至：一会儿在威尼斯，一会儿在普罗旺斯，一会儿在西西里，一会儿在马耳他，一会儿在伊斯坦布尔。穿越地中海的时光隧道而不迷失方向，却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追忆似水年华，仿佛将长长的线团从里向外展开，而且年代越久远，就越发难以把握。

我们的旅行是否应当在公元前3000年止步呢？当时，枝叶繁茂的早期文明在近东刚刚诞生：田园、家畜、村落群、城市、神明、君主、牧师、律法家、船舶、商贸……在那里，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至今仍列于历史教科书之首的那些古典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家园。然而，赋予它们人类发祥地的称号是否是个错觉呢？

无疑，这是180度的大转弯。正如昔日赫赫有名的史学家们弗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亨利·皮雷那（Henri Pirenne）所认为的那样，大的顿挫不是发生在古罗马衰败前后，而是在农业和文字产生前后。世界分水岭即位于此：一边是“史前史”，另一边是传统意义上极其狭义的“历史”。不错，然而，和以往观点相反的是，农业和文字远非产生于同一时代。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早期农业，野生动物的早期驯化，人类对命运的早期意识，最早的陶器、铜器手工制造业，早期城市，最早的海上交流既不是起始于苏美尔，也不是起源于传说中第一位埃及法老美尼斯-纳尔迈，而是发样于还要早二、三或四千年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倘若果真如此，谁还敢说《历史起源于苏美尔》（1958年出版的一本好书的书名）的苏美尔并非凭空捏造？既然我们对苏美尔以前的若干世纪、若干千纪发生的一切已开始有所了解，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去探个究竟。

一 早期工具、早期人类：旧石器时代早期

我们将听从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忠告。为了探寻历史，这位社会学家曾经备受磨难。自1935年起，他就断言，要确切了解人类的本质及其起源，必须毫不犹豫地从研究史前史开始。不过，应该承认旅途是艰辛的。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漫长岁月中，没有希罗多德为我们讲述他那个时代的埃及，没有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供博学者为我们解读。只有当人类会说话并将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以后，才有可能理解他们。在没有任何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了解他们的生活、传说、宗教呢？

众所周知，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考古。一旦涉及史前时期，这门与众不同的学科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意味着一门学科包含着另一门学科，而且总是迷雾重重。天才科普作家车朗（C. W. Ceram）将考古学家比作侦探——不是追踪尸体和罪犯，而是寻找尸骨、陶器碎片、工具残片——永远无法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侦探。但是，他们耐心修复各种碎片，建立总体分析框架，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而做这项工作总要冒风险：无论这套理论显得多么自圆其说，新发现可以一下子将它推翻。

任何挖掘现场都向人们展示一系列不同时代的考古层，每一层都有人类遗址。最理想的莫过于将发掘工作推进到从未挖掘过的处女地——遗址中人类居住的最早遗迹。在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人们挖掘了15米，到达公元前7000年的地层——这似乎是新石器时期开始的年代和岛上开始有人类居住的时间。所以，任何发掘工作都可提供一部编年史：什么事件先发生，什么事件后发生，如此等等。显然，难点在于如何将这一部特殊的编年史和其他发掘现场衔接起来，将这部难以把握的编年史完全吃透——这正是考古学家们所梦寐以求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法多种多样。最为轰动的莫过于碳十四测年法。这是1946年由美国化学家威廉·F. 利比（William F. Libby）发明的。通过这一方法，可以追溯到距今6万多年前。事实上，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动植物和人类都吸收了一定数量的放射性碳，而尸体逐渐失去了放射性。这种可以度量的损耗恰似一个“回顾性时钟”：错误和偏差是难免的——往往自动引起人们的注意；答案是令人惊讶的——和其他答案吻合时得到验证。麻烦的是，这一测年法并未在考古现场得到普及，而且发掘成果迟

迟不予公布。于是，考古新闻总是风云变幻。不过，福尔摩斯有时不也不得不推翻全部假设、从头再来吗？

人类和地球生命之源

人类从一开始便分散在整个“旧大陆”上。所以，从最遥远的源头开始，地中海的最初命运基本上和人类历史紧密相连。历史缓缓前行——极其缓慢，每一阶段不再以“千年”为计算单位——这太微不足道了，而是以“万年”乃至“十万年”计算。乍一想，这非人的、充满神话色彩的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实在无从知晓。

“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从人亚科祖先算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南方古猿阶段、直立猿人阶段和人亚科阶段”。分散在“旧大陆”各地的直立猿人通常叫做 homo erectus：人类的出现已经追溯到他。但是，标准是什么？人类起源于何处？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在掌握工具的时候。不过，大约 300 万年前，南方古猿（遍布非洲）已经懂得制造和使用鹅卵石工具。那是在第四纪初期。从这一点看，中新世和上新世的人科动物——南方古猿的祖先——在灵长类动物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灵长类也依附于其他动物，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不再只是一个偶然事件——现在回头看确实弥足珍贵——但是却姗姗来迟，在地球生命中微不足道。一位史前史学家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假如将地球生物的整个进化过程浓缩为一年，那么就是：1 月 1 日，生命诞生；12 月 31 日下午 5 点半左右，猿人诞生；晚上 11 点 40 分左右，尼安德特人降生；而剩下的 20 分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一生——即从石器时代直至今日。

迷雾重重的历史：纪年划分众说纷纭

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直立猿人（homo erectus）双足行走以后，双手获得解放，凭借智慧和工具与大自然各种敌对力量抗争。用普通石块、切削石块或碎石片——很久以后才加以打磨——制造的工具几乎是我们探寻缓慢技术进步的历程，及其相隔甚远的各个明显阶段的唯一手段。

让我们置身于跨度 100 多万年的茫茫历史中吧。[①] 如何划分这段丰富

---

①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是 100 万－200 万年，甚至 300 万年。最古老的切削工具（发现于非洲）距今 250 万年。（J. G.）

多彩的历史呢？传统历史一般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史前史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不过，这三个时代跨度极为悬殊。旧石器时代大致在公元前100多万年[①]到公元前1万或公元前8000年这一阶段，紧接着的公元前5000～前4000年——各地的编年史差异悬殊——是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阶段，一直到青铜器时代——大致和文字时代相吻合。时间跨度的不成比例正是要点所在。人类生命中99%的时间是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死寂——起码是沉睡——中度过的。

习惯上，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划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在这里，时间跨度上的悬殊依然令人难以置信：若取以零结尾的整数，则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跨度为100万年，旧石器时代中期为4万年[②]，而旧石器时代晚期则不到3万年。没有比这更能说明技术进步的滞后出现了。起初，只有异常缓慢的物种进化过程支配着单调乏味的虚空；接着，气氛开始变得活跃起来，技术进步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重大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在大约公元前10万年尼安德特人出现以后；然后，智人出现了——或许和尼安德特人处于同时代，但主要分布在大约公元前3万年。

不过，通常情况下，纪年划分的依据是工具以及工具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一方面，非专业人士最好能习惯一些古怪的、毫无逻辑的词汇：由于最初的重大发现来自不同的发掘地点，以至工具名称叫法不一。在创立史前历史学过程中，法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地下埋藏丰富，而且史前史学家犹如群星闪烁。许多考古遗址均在法国境内：诸如阿布维利、圣·阿舍利、勒瓦娄哇、拉·格拉维特（La Gravette）、梭鲁特雷、拉马德莱纳等——此外，英国也不少（如海上克拉克彤 Clacton on the Sea），北非、巴勒斯坦等地也有一些，地域色彩浓厚。这里，我并不想罗列一份长长的清单——一个“附表”即可表示得清清楚楚——而是为了便于理解其象征意义。诚然，人们更喜欢事后复原的系统拓扑学。然而，这可能吗？这意味着，将不得不放弃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沿用至今的一整套科学语言。

① 完全有理由将旧石器时代追溯到200多万年以前。（J. G.）

② 今天的观点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大致始于公元前20万年，止于公元前3.5万年。布罗代尔写下这几行字时，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估计为4万年。（J. G.）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许多专家学者不赞成这样划分——的无数个世纪中，主要工具是单刃或双刃鹅卵石片（英国作家著有 Peeble Culture）。因此，我们将谈到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海上克拉克彤文化、勒瓦娄哇文化或莫斯特文化。每个文化都意味着一项石器新技术：通过打凿燧石两侧使其变薄并具备锋利的三角尖，制成尖状器或刮削器；如法炮制还可打造石斧，刃缘平直锋利；然后是用碎石片（éclats）制作的各种工具。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重要阶段。这期间，精制技术不仅可以打制稍大一些的碎石片，还可以制作小鳞片。"万能工具"——尖状器——形状更趋规则，功能更加齐全。通过打凿碎石片使其日臻完善，巧妙地稍加修改即可使刃缘变得锋利，制成专业化很强的工具。这门手艺使尼安德特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得以借助木头作支撑给石器装上手柄，在长矛顶端安上矛头，从而更有效地抵御各种野兽的袭击。

然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修道院院长布洛耶（Breuil）之后，有时也称"轻石器时代"——重大技术进步很久以后才实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工具粗糙，人类捕食的效率极低，猎人武器装备落后，只能攻击行动迟缓或幼小的动物，有时甚至成为力大无比、行动敏捷的各种野兽的口中食。人类依靠渔猎和采集过着游牧生活，三五成群地在狩猎地之间频繁迁徙。由于没有任何粮食储备，随时都可能忍饥挨饿，只是偶尔遇到其他人群，与其争夺或者交换零星物品。

在气候的帮助下，稀稀落落的人群走得很远很远。同样，在大致路线都难以辨认的情况下，一切都运到极其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工具，以及易于识别的技术。一种相同的"文明"——抑或相同的石器打凿技术——在地中海一带会合了，几乎在同一时期——起码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原始阶段：在北非和西班牙、叙利亚和巴尔干发现的石器都是阿布维利或阿舍利文化时期的工具。接着，特别是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有些地方开始表现出独创性，"点火提前"；有的地方则落后十万八千里。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西马格里布似乎已经落伍，尽管并非所有专家都赞成这一观点。

不管怎样，旧石器时代末期和中石器时代，小石片的加工技术，在欧

洲发展起来的细晶石，大批功能各异的细石器的应用随处可见：从苏格兰到好望角沿岸，从大西洋到印度的温迪亚山（Vindhya），一直到蒙古的沙漠；但应用的范围无法与地中海相提并论。对装饰品——彩色的项链、贝壳手镯、赭石等——如痴如狂，这无疑和巫术信仰有关。不可否认，某些装饰用品行程万里——北方的琥珀在比利牛斯山都能见到。

最后，在地中海周边地区，随时都能见到小股原始猎人经过。几乎到处都留下他们逗留或途经的痕迹。大约公元前3000年[①]，姗姗来迟的航海家登陆以后，科西嘉和撒丁岛——很久以前即已消失在地中海中的独特大陆——才有人居住。不过，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也不过是个例外而已。二、三十年前有人认为，在希腊大陆发动“新石器革命”的移民的定居地在他们之前从未有人居住过。布洛耶院长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肯定地说：“找找看，就会找到。”自从系统发掘工作在希腊开展以来，接连不断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来说，哪儿有猎物，哪儿就有他们的身影。惟有地中海才能阻挡他们的去路。

归根到底，这类普及性传播活动是几十万年的漫长历史造成的必然结果。第一个石器文明完全有时间绕“旧大陆”一周，并均匀地传播到各地。旧石器时代末期，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当技术进步（**相对**）加速时，差距才真正显现出来。一些“特权地区”出现了，发展水平开始参差不齐。不过，参差不齐的现象一如既往地引发了更为频繁的交流——出于互补性——从而再次推动社会进步。

气候：乐队指挥？

在这段无精打采的历史中，惟一狂暴的——起码是占支配地位的——有力量摧毁一切的角色，就是气候。它变幻莫测，原因不详（以后还会谈到这一点）。自维拉弗朗先（Villafranchien）时代——第四纪的初始阶段——起，它将一切都搅乱了。这是过去遥远的数千年中所发生的最重大的灾难之一。地质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灾变，甚至可以描绘出其威力。但是，我们始终不要忘记，这些骤变是经过经年累月地积累之后才爆

---

① 这不太准确。今天，众所周知，公元前1.3万年撒丁岛就有人居住，而科西嘉在公元前9000年已经有人居住。甚至很可能在两岛居住的原始人类还要比这古老得多（撒丁岛的旧石器、科西嘉山洞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J. C.）

发出来的。

在这些普遍的反常现象中，最为壮观的莫过于在“旧大陆”北部和美洲北部发生的四次巨型冰川堆积，就像今天覆盖格陵兰岛和北冰洋的巨型冰川那样，厚度可达2~3公里。这些冰川巨兽（inlandsis）前后挪动，令人心惊胆战。前进时，它们将冷空气和极地空气的“前锋”向南推进到地中海一带。刹那间，地中海的气温变得异常严酷。与此同时，北方的冷空气将来自大西洋的气旋几乎全部压在地中海一线。因此，在地中海，持续的降温总是伴随着持续的大雨。这样一来，地中海总是要遭受若干个寒冷的“雨季”轮番交替。而当冰川向北撤退时，则是相对干热的季节。河流水量充沛，霜冻足以使高地的石头开裂——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旧石器时代古老巨大的沉积层中。

这一笼统的说明显然不足以描绘气候的所有变化。因为，撒哈拉也有干旱期和湿润期交替的现象，在历史上和地中海的情况并不完全吻合。于是，专家们求助于另一个风—温度—雨系统——主要位于赤道非洲和北部热带非洲的季风系统，该系统同样向南北两个方向移动。在第三纪冰期，其湿润性一直影响到北方，创造出“乍得猿人与河马”的撒哈拉。接着，冰期末期的另一次湿润作用正是撒哈拉神奇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原因所在——这一时代的标志是牧羊人（无疑是黑皮肤的）、令人赞叹的岩洞壁画（长颈鹿、狮子、大象、羚羊等）、出人意料的农业创造、沙漠河边昙花一现的小埃及（巴鲁 L. Balout）等。

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类与动植物动荡不定的命运、生物物种的消亡或进化和气候紊乱联系起来。但是，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气候危机在欧洲异常剧烈，无疑加速了人类的进化过程，但是在其他地区却几乎从未发生过此类危机。诚然，气候反复无常——持续时间总是很长——曾给动植物和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人类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各种生物都拒绝坐以待毙：它们藐视各种制约因素以适应新的环境，必要时就进行迁徙；于是，一切都搞定了。因此，动物界的变化并非总能明确无误地提供气候反常的征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最后一次猛烈的维尔姆冰期到来前夕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西欧发现了驯鹿（想像它们在巴黎盆地或卡斯蒂利亚高原终归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还有，在佩里戈尔的鲁菲尼亚克（Rouffignac）山洞遇见“眼神调皮”的猛犸象。还有一些意外发现是：在

意大利莱切附近的罗曼里（Romanelli）发现北极鸟类的遗骸和一只大企鹅的颌骨；或者相反，在意大利的蓬蒂内（Pontins）沼泽中发现河马。不错，“长毛河马”今天已经绝迹，能适应寒冷气候。（大西洋、非洲、亚洲的）大象史——种类千差万别，能适应各种气候——是生物适应性的典范。在提洛岛[①]发现古代大象这一事实说明，该岛曾一度和大陆相连。在西西里、撒丁岛、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侏儒象遗骸讲述着古老物种退化的故事：岛屿形成时，它们被困在了岛上。1960年，在色萨利的拉里萨采沙场发现“猛犸和河马骨骸，以及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时期的燧石器和骨器”。面对此类发现，我们惟有选择的困惑：1940年，在加尔河发现伯姆—拉特罗纳（Baume-Latrone）岩洞壁画（无疑是奥瑞纳文化时期的作品）；在那里，人们几乎是以一种滑稽可笑的方式大致复原了一幅大象壁画和一头犀牛。

不过，有时候，动物的命运几乎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提供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明证。在巴勒斯坦的卡尔迈勒（Carmel）山，发掘工作者得以追踪驯鹿和黄鹿不分伯仲的厮杀；前者喜欢干燥气候和阳光，后者“适宜森林生活”以及雨季时节潮湿温和的气候。根据岩层中两动物遗骸叠置的情况，人们将这次搏斗画成一条妙趣横生的曲线。随着气候的变化，忠实于自然的各类动物或逃往北方，或前往南方避难，迁到炎热、干燥或凉爽多雨的地方。而对于被迫迁徙的各种动物来说，地中海恰似“如来佛的手掌”。当冰川前进时，“寒带动物”在南面遇到这道屏障；当冰川后退时，“热带动物”无法轻而易举地穿越地中海，到达北方地区。惟有穿越广袤的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连成一体的坚实地面进行大范围的迁徙，才会导致动物种群之间自由厮杀和意外融合。这正是近东大陆众多优点之一。

接下来，我们将重新考察植物及其庞大家族：尽管同样错综复杂，但是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加可靠、更加明了。这是旧石器时代植物学研究的开端。让我们耐心等待吧：在这一领域，将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

河流与海岸

在地球表面，无论是液态、固态还是气态，姿态万千的水始终是一个

---

① 希腊基克拉迪群岛中的岛屿，一度为雅典海岸同盟的中心（公元前5世纪）。——译者注

永恒的整体。因此，在冰川和海平面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当冰川推进时，海水水位下降；当冰川消融时，海水水位上升。高差可达十几米，乃至上百米。然而，海水水位的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海岸的重大变迁。在历史上，亚得里亚海曾经是陆地，一度使得波河平原向南一直延伸到安科纳；利翁湾曾经和附近的大陆相连；历史上，科西嘉和撒丁岛一度组成一个大陆岛，甚至可以说是半岛；苏伊士地峡海拔极低（15米），曾经数度被海水淹没，以至非洲大陆被沦为孤岛；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爱琴海都是陆地（小亚细亚和希腊曾经是铁板一块），而黑海则是湖泊，有一条狭窄的水道与里海相通。倒是直布罗陀海峡，由于海水相对较深，似乎从未干涸过；同样，现在的突尼斯也不曾与西西里相连。不过，西西里岛曾经和意大利连在一起。这一切都能说明某些岛屿在古代的真实情况以及动植物界某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现在，地中海古老的海滩仍然记录着以往海水的高水位和海岸线。热那亚河岸半中间的钟楼仿佛面向大海的圆形竞技场，远远地记录着古老海滩所处的位置：一些村庄曾经坐落在那里，就像人坐在阳台上。

历次海平面的变迁都引发了河流的侵蚀作用，以至于河流深深陷入自身形成的冲积层中。因此，古老的河成阶地记录着河谷当年所处的位置。在史前人类选择住址的过程中，频繁的变迁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这也是地质学家成功测定年代的断层，从而为创立可信的编年史提供了更多机会。

地质革命？

关于史前时期地壳的剧烈运动，阿尔弗雷德·韦伯提出了“地质革命”的概念。这一提法有待商榷：假如史前时期地壳发生过剧烈变化，奥瑞纳人或梭鲁特人难道从未感觉到他们经年累月生活着的自然环境动荡不安吗？事实上，气候的变化周期相当漫长，若干个世纪才循环一次。原因是在于区域性紊乱还是整体性紊乱呢？是因为太阳辐射的强度发生了变化（许多专家学者都这么认为），还是因为地轴发生了偏移（昔日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如今已不敢再提：这一解释实在太美妙了）？北极原先位于现在的格陵兰岛，后来才缓缓地、断断续续地移到现在的位置。这对北美和欧洲有利，却有损于西伯利亚。北极接近西伯利亚是好还是坏，这一点显然是有争议的。西伯利亚猛犸象的绝迹就是明证。奇怪的是，它们被保存在了冰川中；公元17世纪，猛犸象牙贸易依然很猖獗。

这一切并非证据确凿。然而，人类梦寐以求的就是给这些宇宙革命以完美的解释。的确，这些重大事件一度改变了整个世界。

二 火、艺术和巫术

成千上万年间，一切生灵都被大自然的盲目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类逐渐获得了特殊地位：凭着与生俱来的顽强毅力，人类战胜了敌对势力；将战利品保存起来，使其成为“资本”，牢记在心，同时使工具日臻完善。在生理方面，人类也得到了进化。测试结果表明，人类的脑容量稳步增加。“文明进步”开始了，从四面八方同时进行，尽管缓慢如龟步，但将永不停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明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尼安德特人，而后是智人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大约在公元前10万年[①]，欧洲各地和地中海一带居住着尼安德特人。今天，生物学家不再视其为反应迟钝的野人。尽管尼安德特人颌骨低垂，前额低且向后倾，行走时躯体略为弯曲，非常接近战胜他们的智人，甚至可能是智人的一个亚种：如今，人们都说——但这将可能改写许多史料——尼安德特人是直立猿人和智人的混血儿![②] 不管怎么说，在勒瓦娄哇文化时期，尼安德特人改进了燧石打凿技术：他们采用了通过计算打制角度来预制石核的技术。只要稍加修改，工具即可制作完成。木头和石头开始结合并用，而且人类首次实行了土葬，这势必需要某些仪式、某种思考来生的能力以及人类诞生的真正标志（许多史前史学家都这么认为）——意识。诚然，尼安德特人仍未跨越对狩猎民族来说极为关键的一步：即制作投掷武器；也未能找到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天知道实际情况如何呢？不管怎样，种种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发明了人工取火。那时，偶然从自然火灾中采集到的火种必须精心保存。火随心所欲地“制造”着何等先进的武器，何等先进的“生产资料”！何等安全的环境啊！这大概是农业革命之前发生的最重大的革命。

① 现在一般认为是20万年。(J. G.)

② 今天，尼安德特人被视为智人。因此，为了和智人（现代智人）加以区别，人们常说尼安德特智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过程中，前者淘汰了后者。(J. G.)

然而，大约4万年前，在最后一次严寒——维尔姆冰期——和强烈地震的双重打击下，尼安德特人销声匿迹了。他们如此不堪一击，是大自然的过错——“进化死胡同”——还是因为人口稀少？一位专家认为，在当今法国这么大的版图上，才生活着两万人[①]。在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另一群人定居下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淘汰他们——可能以某种激烈的方式，但不肯定——在世界舞台上接过接力棒。这就是智人——也可以说就是我们自己——其种族差异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这是经过杂交、混血的人类，是“路边的狗”——马塞林·布勒（Marcelin Boule）如是说。混血儿万岁！私生子万岁！假如他们更聪明的话——事实上似乎正是如此。专家们认为，仅在法国就生活着白人——克罗马农人（多尔多涅），准爱斯基摩人——洛热里人（香瑟拉得），还是在多尔多涅；准黑人——在芒通附近的格里马尔迪。努吉尔（R. L. Nougier）写道：“这些人全都和我们相差无几。加纳利群岛的关切人（Guanches）是真正的克罗马农人：高个子、长头型。在多尔多涅，很多农民保留了这些特征。准爱斯基摩人是香瑟拉得马格德林人的后裔，而南非残存的波希曼人（Bochimans）和霍屯督人与格里马山洞人有亲缘关系。”这简直太好了，再清楚不过了。但是，库恩（S. Coon）在其精彩著作《种族的起源》一书中断言：在最后一次进化产生智人之前，当今世界的种族现象就已经存在了。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智人是否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年代——公元前10万年（正如1969年9月世界教科文组织研讨会上人们认为的那样），而且已经和我们相差无几！史前学家们开起了玩笑。有一位名叫波尔德（F. Bordes）的史前学家断言：10万年前的智人“和我们衣着相仿，走在大街上决不会有人回头看他”。让我们相信他的话吧！

总之，不论是否是很久以前，智人同时出现在欧洲各地和地中海一带；同时，文明进步明显加快——这一次，地区差异拉大了——从奥瑞纳文化到格拉维特文化，而后是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随着薄石片的制作和专业工具（刀、凿子、赘骨、钩状刮削器等）的快速增多，日常器具变得异常丰富多彩。革新之处在于：在撞针和下料石核之间插人一把“凿子”，其材质较石头软，通常是木制的。预制石核可以是重量很轻的细长薄片。同时，经过尼安德特人薄型化处理以后，古老的尖状器呈月牙状

① 这一数字是根据发掘遗址的数量计算的，显然不太可靠，但是很能说明问题。

或“月桂树叶”状，变得轻巧而锋利。凭借这一技术，他们制造出令人惊叹的尖状武器。这在发明推进装置后显得尤为宝贵。原始推进器由一根长杆组成，顶端有槽口，可安装标枪。这样，原始标枪成了名副其实的发射物——一种远距离武器。这一装置可追溯到马格德林文化时期。旧石器时代结束后，它被弓取代。弓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在以后的数千年中，它一直陪伴在猎手和战士的身旁。

最后，动物的角、骨头、象牙这些易于劈开、下料、成型、打磨的材料首次用石凿进行加工，从而制成尖状武器、鱼叉、穿孔器、带孔棍棒、(缝皮革用的）锥子、鱼钩、缝衣针等——在梭鲁特文化时期的沉积物中发现大量此类物品。

艺术诞生于地中海以外的地方

这些物品开始用线条、雕刻图案作装饰。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艺术，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太奇妙了！

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涵盖欧洲、辐射乌拉尔，囊括地中海西部地区，但地中海东部却影响甚微。惟一例外的情况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贝尔巴希(Belbasi）岩洞群里发现了一些雕刻作品和工艺品。因此，近东地区并未完全分享旧石器时代的首批艺术成就。在那里，数千年以后才出现早期农业，然后是早期城市和聚居地，以及大批艺术和技术创造力旺盛、富有独创性的文明和文化。在地中海的近东沿岸以及北非沿岸（叙利亚、巴勒斯坦或昔兰尼加 Cyrénaique)，人们发现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新工具，甚至在法国也有类似发现（根据碳十四测定法)，而在贝尔巴希以外的地方，却没有发现任何首个艺术语言的明显迹象。撒哈拉和利比亚的岩洞壁画很晚以后才出现，因此不在本次讨论的范围之内。

由于发端于地中海，早期旧石器时代艺术甚至显得有些古怪。种种迹象表明，格拉维特文化诞生于中欧和俄罗斯，并从那里传播到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当时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连接部比现在要大得多，亚得里亚海的一些地方一度可以徒步穿行)。在俄罗斯南部或西伯利亚、摩德纳[1]或文蒂米利亚[2]、奥地利、摩拉维亚[3]、多尔多涅发现的女性雕

① Modène，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
② Vintimille，意大利城镇，靠近法意边界。——译者注
③ 历史上捷克东部地区。——译者注

像——有石刻的、有黏土制成的、也有猛犸象牙做的——令人叹为观止，即出自这一时代。这60多件人像作品大都有明显的雷同之处：乳房沉甸甸的、大腿粗壮、腹部宽大；无疑，这些“维纳斯”（一个不太贴切的名称）是生殖力和繁荣兴旺的象征。从近东到葡萄牙，从西伯利亚到大西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她们是整个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母亲神的雏形。

或许我们正在触及一个重要例证。人类的基本宗教原型是否可以追溯到已经定型的奥瑞纳人？根据这一思路，我完全赞同让·普芝鲁斯基（Jean Przyluski，1950年）的观点，即：在生存本能决定一切的漫长岁月结束之后，宗教生活的第一阶段——巫术——很久以后才过渡到下一阶段；艺术本身即产生于巫术。在旧石器时代，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即人类艺术自发产生，而非出于某种祭祀活动中的象征意味。不过，还是有几个例外情况：在摩拉维亚地区，5厘米长的石片（似乎用碎片技术加工而成）神奇地组成一幅体格强健的人体半身像——这让人想起马约尔[①]的作品；还有，在法国发现一件微型人面象牙雕像，仿佛一幅未完成的肖像画，动人心弦（布拉桑普伊）。它们所展示的都是俊美的人体模型，而非司空见惯的臀部肥硕的女神。但是，归根结蒂，为什么原始艺术不仅仅具备巫术意义？或许有一天，纯美观念也曾困扰石器时代的某一位雕刻家，为什么不呢？

需要立即补充说明的是：只是面对某些令人费解的情况时人们才会这样想。事实肯定不是这样，不论造就旧石器时代晚期辉煌的石窟壁画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审美享受。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旧石器时代艺术仅仅局限于法国和西班牙。然而，在意大利大陆和莱万佐岛（厄加特群岛中的岛屿之一）以及乌拉尔南部卡波什堡岩洞的最新发现表明，这些地区和格拉维特“维纳斯”的诞生地大致吻合。

法国和西班牙仍然是无可争辩的某种艺术的中心（但原因何在？）——这一艺术大致（年代仍有争议）发端于奥瑞纳文化时期，结束于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0～前8000年）。所表现的内容几乎只有动物，既虚幻又写实、技法娴熟、栩栩如生，以至于当100年前，在阿尔塔米拉首次发现、并经一位西班牙考古学家考证是石器时代的猎人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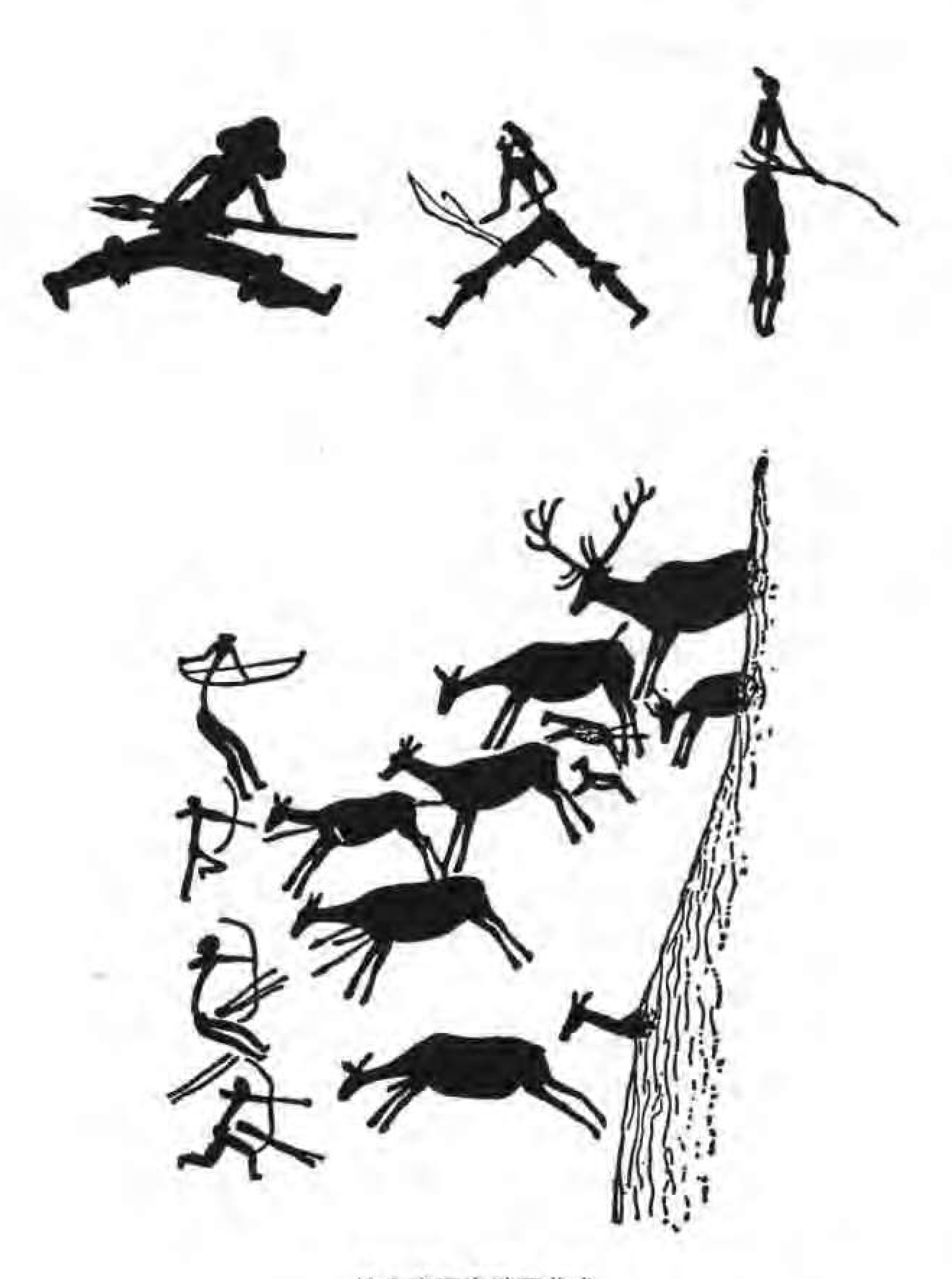
① 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刻家、画家。——译者注

人们大呼上当。从那以后，在法国境内的坎塔布连山区——从阿尔塔米拉到拉思科或到多尔多涅的封·德·高姆——的一批岩洞里，人们发现了大量石刻画、圆雕、巨幅壁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似性。今天，人们对它们进行了准确的测年、盘点，对它们单调的主题、技法了如指掌。不过，它们的语言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为何是在山洞的最深处，——而这些山洞外部靠近人口处一年中只有一段时间有人居住，因此十有八九是断断续续举行仪式的专用场所？为何“几乎在黑暗中，只有一盏石座油灯（用地衣作灯芯）提供照明”，在原本由鬣狗或狗熊占据的山洞？——为何会有种类如此繁多的动物，诸如犀牛、野牛、驯鹿、马、羱羊、高鼻羚羊、公牛、鹿、大象、猛犸象等，画在隐蔽处，或跑动，或受伤，栩栩如生？这些形象几乎从未用写实手法表现过，有时是各个不同时代的作品叠加在同一岩壁上的。它们在祭祀活动中占有一定地位，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画作本身扣人心弦。一切原始生命都是咒语、巫术、与超自然力充满焦虑的对话。墙壁上还点缀着各种各样对称的符号，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味，与今天幸存的原始部落的做法有些相似之处。这一事实令人联想起其他系统而天才的艺术表现形式。事实上，我们仍在探寻这些画作真正的社会背景、两性背景和宗教背景。它们所创造的美的神话肯定不是我们遥远祖先们的（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追求。与其说是追求美，还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某种巫术咒语的需要。

日常用品中的艺术

然而，大约自格拉维特文化时期起，艺术就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日常石器、角器或骨器都饰有雕刻图像、影线或虚线图案、更加精巧的交织花纹饰、动物写实图案，诸如马、鬣狗、野牛、鸟、鱼、熊、犀牛、驯鹿等……面对“带孔的棍棒”或带高度镂空精致涡形饰的“小木棒”，面对一跃而起的鬣狗或充当推进装置挂钩的马头，人们不禁想起中世纪农民艺术中精心制作、打磨、绘制、雕刻成的众多日常木器。是否应当认为，除了出于制造美物的乐趣之外，手艺匠们在工作中还有其他追求呢？犹豫是允许的。“贪玩的人”（homoludens）哪个时代都有。

为了解释这一切，证据缺乏而且可能永远如此，无从了解装饰美观的山洞里射猎高手们的文化背景、信仰、宗教仪式、舞蹈、颂歌，以及着色皮革和文身的情况。后两种情况是在尼安德特时期地层的一些残片和赭石或其他颜料的化石中发现的。



地中海石窟壁画艺术

上图：三幅西班牙利凡得壁画艺术中的猎人画像（自左至右：M. 阿尔马格罗绘，瓦莱斯皮绘，波尔卡尔绘）

下图：射鹿（西班牙阿拉那），赫尔南德斯·帕切科绘

西班牙利凡得艺术

总之，在第二大史前艺术区发现了另一种艺术、另一种语言，即“西班牙利凡得艺术”，实际上由三大块组成：加泰罗尼亚海岸、巴伦西亚—阿尔瓦塞特沿海地区以及古昂卡—特鲁埃勒地区。那里发现的壁画通常是在露天的岩石下，而不是在岩洞内。有人说，这是一种解放。无疑，这些画像也有巫术意味或目的。但是，其神韵、风格却迥然不同。在这些小小的画作里，人们丝毫见不到拉思科威猛、凝重、气势磅礴的野兽，而是人和动物休戚与共的场景，猎人奔跑着追赶猎物，肩上扛着打伤的野兽，士兵张弓混战，一大群飞鸟神态安详，一群人在舞蹈；悬崖上，一群妇女在采集植物或在蜂群中采蜜……如果说这一风格缺乏气势，那么它却生机勃勃，生意盎然。其魅力蕴涵于敏捷的动作中，而这是用简洁的单色身影（接近示意图）来准确表达的——最晚的作品甚至只用简单的一笔一划来表示。写实的动作与场景和近乎抽象的图案风格形成鲜明对照。

西班牙利凡得艺术完全属于地中海，但比拉思科或阿尔塔米拉艺术要晚些，或许甚至开始于中石器时代。总之，它不过是广大地中海地区极其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本身存在问题。人类早期艺术诞生之时，为什么地中海几乎陷于沉寂？它正忙于其他事情？它遵循着其他生活方式？在东方，奇迹是否在于口语的大发展？有人（布尔蒂耶，F. Bourdier）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对于语言的起源，我们不得不凭借想象或通过对比来加以了解。在亚马逊发现的最后一个部落不仅不从事其他印第安部落（他们是石器时代的猎人）的原始农业，而且不操任何人所共知的方言土语。据一位和他们一起生活过的调查人员说（1969 年），他们的象声词、嗫嚅根本不是发音清晰的语言。但似乎用于表达某种感觉、某种情感，当然不是用于表达某种概念。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去考证这些假设为好。

中石器时代：“西方”的衰落？

驯鹿群和其他草食动物（如高鼻羚羊、马、野牛等）生活在位于大型冰川前的广大不毛之地上，那里狂风肆虐。西方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的繁荣是否来自于它们长期提供的便利？人类寄生在随处可见的动物身

上。只要依附于某个畜群，在季节性迁徙中紧紧跟随，不但能够获取食物，还能得到动物皮毛用来遮体、蔽户，动物的角、腱、骨头等则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和武器——动物已经在为人类服务了。在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之后，人类有了一些闲暇时光，产生了一些新的需要：绘画、雕刻；由于针的发明，衣着也讲究多了。正如人们在阿尔西（Arcy-sur-Cure）发现的古人类遗址所展示的那样，在苦心经营的山洞旁边，他们甚至建起了茅草棚，地上铺设石板，并涂上赭色。

第一次冰期结束以后，严寒退去。这种相对便利因此受到了影响，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旧平衡被打破；洪水泛滥，新湖泊形成，新河流、新海洋出现——例如：英吉利海峡、亚得里亚海北部海域——茂密的森林大踏步向前推进，抑制了草地的扩张；驯鹿以及其他草食动物向北撤退。人类又回到朝不保夕、守株待兔式的狩猎活动，捕捉鹿、野猪等森林猎物。总之，桦树、橡树、柳树和松树的胜利使北欧的草场变得可怜兮兮。这显然不利于神奇的壁画艺术家们的创作。高峰期已过，或许气候也可以说明“陷人双重谜团（产生之谜和消亡之谜）”的壁画艺术。

人们常常谈及“驯鹿文明”，以便强调这一份大自然先馈赠而后又收回的礼物。然而，一些史前史学家强烈反对中石器时代西方“衰落”的说法。[①] 他们不无道理地指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驯鹿并非无处不在。在讷穆尔（塞纳—马恩省）附近，博勒加尔（Beauregard）砂岩高原上的马格德林人食马肉，在马孔[②]附近的梭鲁特雷也发现一个巨大的马墓。在一个阿列日省的（ariégeoise）山洞里，最钟爱的野味则是比利牛斯飍狗。在施泰尔马克[③]人们吃熊肉——仅在一处遗址，就发现五万具熊的遗骸。森林并不仅仅带来坏处。森林蜗牛（名称 Helix Nemordis）到处都是。从发掘出的大批食用蜗牛养殖场判断，这一天然美食产量可观。人类重新转向淡水和咸水资源。猎人变成了渔夫。

另外，中石器时代的技术不能说是衰落了。弓得到了发展；细石器、鱼钩、箭头经过了巧妙的改进，显示出手工艺人的巧夺天工。最后，在欧洲北部、英国东部以及俄罗斯的平原上，发现许多经过装饰的物品，迷人

---

① 近来，这一论点得到进一步加强：人们不再提中石器时代的灾荒或悲惨主义。相反，森林的推进和开采使“进步”文化得以形成。布罗代尔在后面还将谈到这一点。（J. G.）

② 索恩—卢瓦尔省省会。——译者注

③ Styrie，奥地利一州，首府格拉茨。——译者注

的琥珀小雕像，丰富的木器、角器或骨器、茅草屋、渔网、藤柳制品、独木舟遗迹，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马格尔莫斯（maglemosienne）文化（这是根据一处丹麦遗址推断的）。

辩护者们有充分理由为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渔民平反昭雪。但是，也许问题并不出在这里。中石器时代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倒退（对有些地区，仍存在争议）的话，那么这一时代或许已经步人了最重要的进化轨道：即畜牧业和农业。正如在近东（新石器时代）或亚洲的沙漠和草原地区牧羊民族中所发生的那样，动物的首度驯化总是缓慢进行的：这一工作继承了狩猎民族和某些特定畜群长期保持的关系。在西欧，这种人类与动物休戚与共的现象似乎和冰期庞大的驯鹿群以及其他草食动物同时销声匿迹了。尽管晚些时候——公元前7000年——在地中海沿岸的普罗旺斯，人们又发现一些山羊群和绵羊群，但仍然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无疑有些滞后。相反，在近东，动植物更适宜驯化，气候的骤变从未造成任何青黄不接的现象。就这样，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伟大探险开始了。

三　地中海的复仇：开创农业文明的先河

大约公元前8000年，在法国境内坎塔布雷克地区，当马格德林文化走到尽头时，在东方，在地中海的另一头，真正的村落业已存在。在那里，人类正成为“了解小麦发芽和动物驯化秘密的人”，畜牧业和农业逐渐取代了狩猎和采集野果的活动；同时，人类开始扎下根来，村庄不再搬迁，毁坏了就地重建。这就是当今考古界所熟知的人造丘陵，诸如亚洲的 tells、色萨利的 magoulas、马其顿的 toumbas 以及土耳其的 höyük。这是不是公元18世纪的近代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以及我们至今仍然航行的水上——之前惟一称得上革命的革命呢？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率先提出“新石器革命”的概念。没有这次革命，智人再聪明也只能成为其前辈那样赤手空拳的“稀有动物”。

这一说法引起了诸多抗议。或许，这只不过是曲解了字面意义？革命是决裂，革命就是要给陈旧的生活注入新鲜血液。然而，新石器时代，在若干个狭小区域出现了新人类、新气象、崭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经济。从这个角度讲，这的确是一场革命。但是，是否需要补充说明一下：“革命”一词有一股扑鼻的历史味，它指的是快速事件、突发事件，还是悲剧事件

呢？而正如任何一部正宗的史前史那样，“新石器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场无精打采的革命——从发起到巩固，再到扩散。它所经历的阶段还没有用世纪划分，而是以千年计算。最后，不应将它想象成一种在前亚洲偶然发现，继而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世界各地的神奇秘方。不论这一秘方是否完整，在地球上不同地方独立地将它发明出来是完全可能的。正如爱弥尔·韦尔斯（Emile Werth）根据各种动物和野生禾本植物推断的那样，或许存在好几个自主发明中心和传播中心。

假如在这次非同寻常的“革命”中，我们目睹了文明的诞生，那么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出现了：文明也是一个年代无法精确考证的现象。事实上，它产生于第一群人类——不管他们有多么贫穷，仅仅因为这是一个群体，而且有东西要传播。信仰、对死亡以及外界力量的基本观点一旦形成，文明就产生了。文明要发扬光大，就要发展农业——它能使社会、村落，特别是城市和文字，扎下根来；而文字是任何人口密集社会的联结纽带。总之，文明并非产生于某个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至于欧洲和地中海，农业文明的最初脚步是在近东发现的——在死气沉沉或麻木不仁的广袤土地上有几处幸运的“孤岛”。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些“孤岛”。

革命性发掘：“富饶的克瓦桑”和小亚细亚

源头问题是革命性发掘的最终目标。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的认知程度均取决于钻探的深度；为了找到原始地层，经常必须挖到20多米的深处。事实上，如果不把所有地层连贯起来，不将整个缓慢的演进过程浏览一遍，并最终将它纳入精确的编年史中，就无法考证重大变迁的年代：例如，木夯、砂浆、骨制长刀（以燧石片镶嵌作刀刃）、镰刀、地窖、储粮坑、动物遗骸（是野生动物还是家畜？）出现的年代。所有这一切决定性因素都需要反复推敲。镰刀不能单独说明粮食作物是否野生，是否系统地收割，是否已经种植；谷物化石——一旦辨认出谷物的种类——更能说明问题。显然，疑问和错误随时可能产生：在杰里科，经过化验分析之后，原先草草鉴定的狗却变成了狼；而在驯化动物的初期阶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细节。

然而，在碳十四法的系统帮助下，某研究系统或机构考证了一系列年代（其跨度有的相一致，有的逻辑上互相矛盾）。大致说来，中石器时代

始于公元前一万年前后，无陶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9000年前后，陶器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7000年前后——当然地点不同，年代也各异。最重大的发现莫过于发现了无陶新石器时代；长期以来，陶器和打磨石器一直被视为新石器时代不可或缺的结构性象征。应当对此感到惊讶吗？在当今为数不多的原始部落中，难道还没有发现陶器和早期农业互相分离的现象吗？在巴西中部，某些部落对陶器一无所知，而“所有部落都从事刀耕火种农业，仅有几个部落成为行家里手”（列维·斯特劳斯）。

另一项更重大的发现是，早期文明——即作物、家畜、房屋、最早的村庄和城市、艺术和神社崇拜等——发端于近东，而不是一直公认的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河谷。现在［1970年］，地图上已标明最近二三十年来的20多个重要发掘现场。创新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勘探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已经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主要地区有三个：即扎格罗斯山西面，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地带的山谷，安纳托利亚南部宽阔的边缘地带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地区。总体上看，这些地区地势较高，气候湿润（今天，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大多位于叙利亚大沙漠以北一线，人们通常称之为“富饶的克瓦桑”。这里的土地之所以肥沃，是因为地形较高，使冬季低气压带来的降雨得以保留，对地势低洼的周边地区来说恰似一座座水塔。在和叙利亚大沙漠近在咫尺的情况下，从山上下来的泉水、河流和湍流正是森林和自然植被得以存活的关键，从而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提供作物。然而，要想涵盖整个早期农作物地区，还必须对这张示意图加以补充。

假设从死海（或红海）到波斯湾画半圆表示“富饶的克瓦桑”，那么可以在半圆顶端向西画一条切线，而且要画得粗一些，以免将整个安纳托利亚南部地区遗漏：这里指的是位于北部萨塔勒·霍郁克（Catal Höyük）、哈吉拉尔和南部克孜勒卡亚（Kizilkaya）、贝尔迪比（Beldibi）之间的地带。在安纳托利亚，新石器的发育异常早熟而辉煌，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认为安纳托利亚是“富饶的克瓦桑”蛮荒的边界。到公元前5000年，在外族人侵的铁蹄下，安纳托利亚早期文明销声匿迹了，在近东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记。相反，在公元前6000年，希腊的新石器文化和哈吉拉尔的工具与陶器如出一辙。安纳托利亚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尽管其传播方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所有这些地点都意味深长。村落诞生的地方实际上是野生猪群、牛群

和羊群的最初聚居地；在海拔600～800米高处，也是若干野生草本植物的生长地：如从巴尔干到伊朗的单粒小麦，从安纳托利亚到波斯、从外高加索山脉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的大麦以及这些地区所共有的似双粒小麦，还有豌豆、小扁豆和野生豌豆等。经过一段时间在山坡上收集到种子以后，妇女们便开始播种了。渐渐地，猎人们开始从事动物的驯化和畜牧活动。

若干实例考察

要想了解这些重要而迟疑的开端（它们并未在当地造就伟大的文明），没有比发掘现场的具体细节更好的了。每一处遗址都隐含着一种"文化"，或更确切地说，一连串不尽相同的人生经历。下面简单介绍三个例子：扎格罗斯山（杰尔莫）、卡尔迈勒山麓（杰里科）以及安纳托利亚（萨塔勒·霍郁克）。难度在何处呢？就在于将它们不同而又相仿的历史联系起来，纳入同一部编年史。

在杰尔莫，在一条较深的沙漠河流——阿德哈因（Adhaïm）河（底格里斯河的支流，位于发源于东部中游两岸大山的几条河流之间）——岸边，发掘人员的铲子发现了无陶新石器（公元前7000年）。在地下深处，有不下11层陶器时代以前的地层。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20～25座房屋，居住着大约150人）。最早的茅草屋用经太阳晒干的黏土建成，用芦苇做屋顶；后来，出现了家居、火炉和烟囱。动物皮、经过沥青密封处理的藤柳筐和石罐用来充当容器。野生单粒小麦、似双粒小麦、大麦、豌豆和兵豆的遗迹充分证明，当时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手动石磨、镰刀、破碎器、大量燧石和黑曜岩细石器（从安纳托利亚引进）陪伴在用黏土粗制成的母亲神身旁。死者都埋葬在村外。当公元前6000年前后陶器时代开始时，石基房屋已经出现。但是，只有山羊得到了驯化，或许还有狗。射猎野猪、野牛和野生绵羊仍然是肉类食物的主要来源。

第二个例子是1954年，在杰里科展开的重大发掘工作。曾几何时，这一处与众不同的古迹改变了多少古老的观念。然而，其历史并非一目了然。事实上，人们无法想象在史前时代初期，会有2000多人的城市。[①] 不过，聚居地很早就已经存在了。碳十四测定法表明，最古老的地层大致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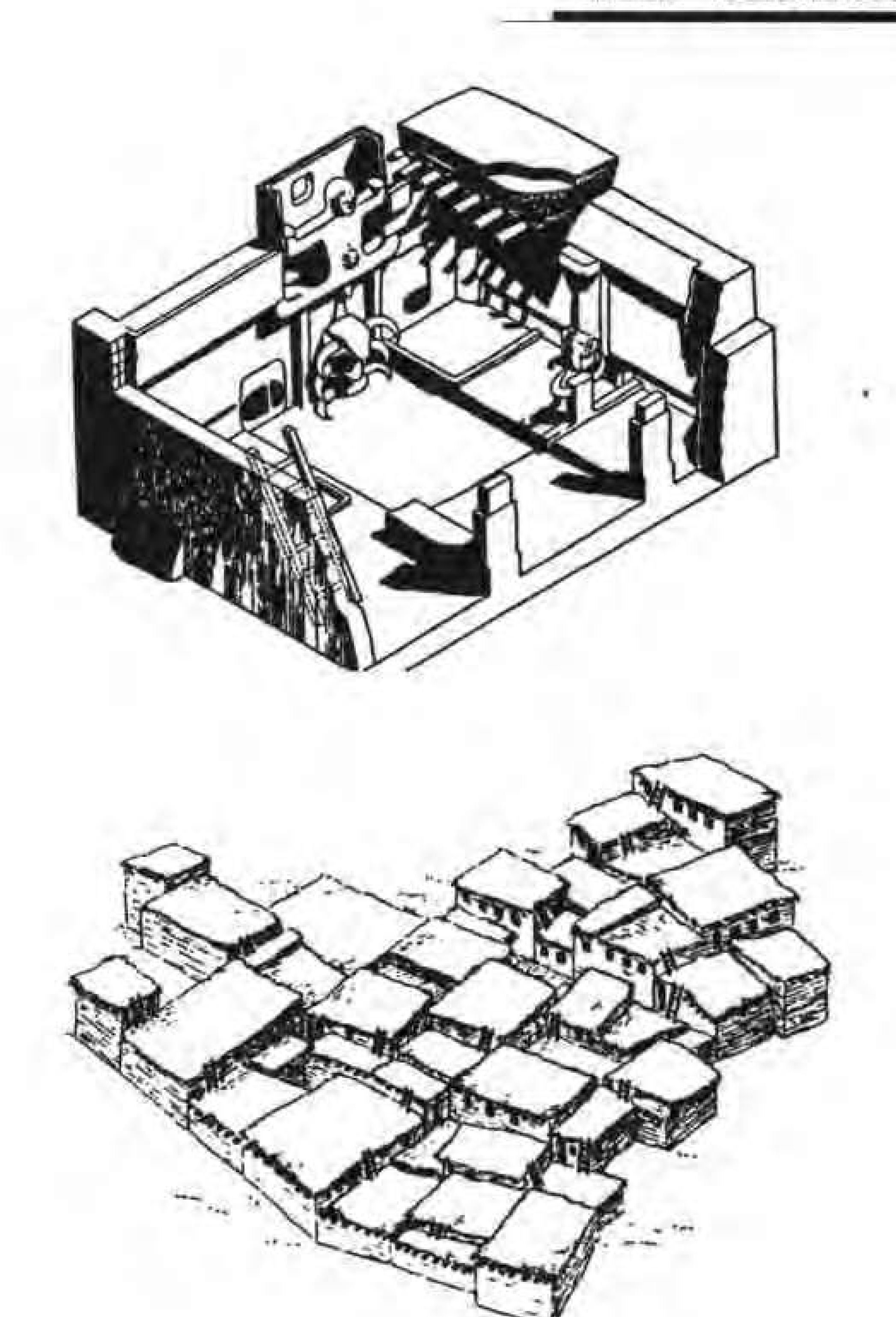
① "城市"一词要慎用：新石器时代的大村庄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管理和集中在某些居民区的专业工匠、著名建筑和标志性建筑等等。"2000"这一数字无从考证。（J. C.）

追溯到公元前9500年；在那里，人们发现了一座神庙。当时，杰里科村以及公元前9000年后期建立的所有其他村庄和巴勒斯坦的其他纳图菲(natoufienne)文化建筑毫无二致，如于勒（Huleh）湖旁边埃伊南的建筑。奇特的纳图菲文化，其源头不得而知，主要是在岩洞中、经过整治的平台上或由圆形茅屋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村庄里发现的。纳图菲文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细石器和妙趣横生的雕刻作品，是近东最古老的文物。纳图菲文化似乎持续到新石器时代，带来大量食用谷物（而动物并未驯化）、砂浆和储藏坑使用技术等。但是，它停滞不前了或从大部分原始遗址彻底消失了。约旦河河谷、特别是杰里科幸免于难，并将遗产保存下来。

在公元前8000年，粮食文化多半已经确立。难道这是由于杰里科突发性、爆炸性发展的缘故吗？该地区位于海平面以下200多米，与死海毗邻，农业繁荣的条件（具备灌溉条件）并不比巴勒斯坦其他地方更加理想。不过，聚居地变成了城市，圆形的砖砌、石基房屋非常漂亮；有的房子甚至有好几间。城市四周是壕沟和城墙（带瞭望塔），城内有蓄水池、存放谷物的地窖，城市的严密性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可能是开发利用了死海的盐、硫和沥青，简单地说，就是商业活动得到了初步发展。因为，在公元前9000年，在古老的杰里科村，安纳托利亚黑曜石已经出现；还有软玉和其他火山岩，以及西奈半岛的绿松石和红海的小贝壳[①]。

这一切表明，在“文明”诞生初期，伴随着农业革命的是一场流通革命。其发端期比人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或许，远古时期的交流带来的并非都是好处，因为经过长期（22层）建设和1000年的繁荣兴旺（但是假如从扩建的城墙看，这一点并不确定）、在公元前7000年初，城市被遗弃了。几乎同时，城市重新被占据，但被另外一些人；他们同时占领了整个约旦河河谷；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来自北叙利亚或安纳托利亚。于是，纳图菲传统消失殆尽了；新城市的房屋呈长方形，地面是叙利亚式的石膏地面。无陶新石器型经济持续了10～15个世纪，惟一真正的革新是驯化了山羊和狗。在杰里科，陶器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6000年，可能是由一支半游牧民族带来的。地层中的一大空白表明，这是在又一次抛弃城市以后。奇怪的是，就杰里科、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而言，陶器的到来和文化的贫瘠

① 曾用作货币。——译者注



萨塔勒·霍郁克

上图：某座神庙的内部情况：女神（产下一头公牛）、几条长凳、若干牛角，还有一把梯子，用来爬到屋顶上（J.梅拉特画）。

下图：萨塔勒·霍郁克某城区：为数不多的一些房屋（墙体共用）集中在若干个神庙四周。面向野外的连续墙体构成一道严密的防线，以抵御强盗的袭击。墙上几乎一扇门都没有，看来人们都在房顶（而不是地上）活动（洛尔·诺莱特画）。

在时间上互相吻合，文化贫瘠现象一直持续了4000年。

由于有人在1962～1964年间发掘细石器地层时，发现了一些陶瓷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可能是前亚洲最早的同类遗迹），安纳托利亚的萨塔勒·霍郁克之行将使我们逗留更长的时间。萨塔勒·霍郁克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①] 可惜，只有一个“祭祀区”被挖掘出来，占地半公顷，而整个发掘点被划定为15公顷。经考证，12个地层的年代是公元前6500～前5650年。首先是一些长方形砖房，只有第一层，屋顶有一个孔洞用作散烟，墙上有一些小“窗户”，位置较高，用于采光。屋顶的开口是出入口，通过梯子上下（在今天的安纳托利亚乃至亚美尼亚仍然有这一类房屋）。没有大门，没有名副其实的马路。有时，里面的小院子由几座开有小窗户的房屋共用；有时，院子呈梯级建造在人造丘陵（tell）的斜坡上，以便紧挨着的房屋可以在邻居屋顶水平面的上方开窗。进屋一般从短梯上下，从一家屋顶爬到另一家屋顶。前面的插图比文字更能说明这种奇特的交通模式。就这样，城市面对着首尾相连的盲墙以外的世界，易守难攻：因为对弓箭手来说，墙上的小窗户颇具杀伤力。

城区的居民来自附近的山区（那里有原始植物）。他们走出大山的目的，是为了在科尼亚高原平地定居。这里肯定有一段故事，可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更令人遗憾的是，本可以从那里真正了解到新石器“革命”前那个过渡期——即中石器时代——的情况。

事实上，农业在萨塔勒·霍郁克达到了很高的组织水平。在城市周围，（可能）集体经营农田，主要种植三种小麦、无芒大麦、兵豆、豌豆、野豌豆、黄连木、扁桃树和多种樱桃树。人们制作实用油，酿造啤酒。绵羊——可能还有牛亚科动物[②]——得到了驯化；狩猎活动频繁，猎物有野牛、普通鹿、野驴、黄鹿、野猪，还有猎豹等。但我们不要忘记，城市的主要收入很可能来源于商业。

由于紧邻两座活火山，萨塔勒·霍郁克几乎垄断了与西方、安纳托利亚、塞浦路斯以及利凡得的黑曜石贸易，由此获得叙利亚漂亮的燧石、大量地中海的贝壳、各种各样的石材：方解石、大理石、黑质石灰岩等，以及附近山中的赭石、朱砂、天然铜乃至铜矿。所有这一切都为当时已经相

① 和杰里科的情况一样（见 *supra*），“城市”一词存在争议。（J. G.）

② 如今的观点是，当时，牛亚科动物在萨塔勒·霍郁克仍在驯化过程中。牛亚科动物何时在近东出现是个有争议的话题。（J. G.）

当发达的手工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正如这把祭祀仪式上使用的匕首，刀刃用燧石片做成，刀柄是骨制的，上面有雕刻图案，其螺线为一条盘绕的蛇。这是公元前6000年初的作品；但是，远在此日期之前，所有陪葬的小物品都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手工艺已经相当专业化，诸如数量众多的标枪、长矛和箭头，经过打磨处理的黑曜石镜子，穿孔精致的“珍珠”（从棕色石头上打凿而成）项链，蓝色磷灰岩或贝壳，黑曜岩或铜制垂饰，金属（铜和铅）珠子，骨制、木制和角制容器，做工精细的羊毛织物等。在公元前7000年仍显粗糙的陶器逐渐变得精致起来：红色或深暗色，而后是磨光的，淡黄色的，颜色以色斑为主。在哈吉拉尔（萨塔勒·霍郁克的发掘工作尚未结束），发现了彩陶：或红色、以乳白色衬底，或白色、以红色衬底（公元前6000年中叶）。

然而，在萨塔勒·霍郁克，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教艺术。在各神庙的不同地层中，人们发现了异常丰富的作品：大量雕刻——有石雕、方解石雕、大理石雕和陶俑——，浮雕，细石膏砌面上还有绘画——这是人们发现的首批画在人造墙上的绘画作品。另外，还有千姿百态的生育神——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崇拜对象：或年轻女子、或体形壮硕的孕妇（类似旧石器时代的“维纳斯”）、或分娩公牛的产妇。公牛是男神的象征，一般用一只牛头或一排牛角表示，类人形的极少。

旧石器时代的宗教展现出其全部古老的画卷：表现动物的壁画和浮雕，有公牛、牡羊、奶牛、黄鹿、野猪、猎豹（女神的神兽）；有人手图案，或描或画，宛如西班牙—法国的石窟艺术，在某神庙内布满整块壁板的还有女性乳房和公牛头；有狩猎场面，身穿豹皮的舞者，有牧师（装扮成秃鹫）参加的丧葬仪式……事实上，死者被交给猛禽去食肉。然后，用他们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起来，和他们的财产一道埋在他们生前居住过的房子里，在加高的“平台”（每所房屋都有）下面——这些宽大的石凳可坐、可工作、甚至可以睡觉，像中国的老房子里设计的那样……妇女总是埋在主凳（此为尊位）下面，表明当时的社会由母亲、女祭司和女神统治。

我认为，萨塔勒·霍郁克的宗教艺术虽然不如马格德林文化中的猎人画雄浑、富有美感，但一直都在不断发展，方向明确。凭借对近东新石器时代的宗教的精细了解，有朝一日，它或许最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以便揭开西方旧石器时代崇拜先前留下的种种谜团。

四 结 论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新石器革新已经在小范围内发生，各个地方相距甚远，但多少有些辐射作用。是否就此认为已经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呢？显然，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的传播是极其缓慢的。发端于东方的“新石器革命”并非大踏步前进，并没有为各地所接受：地中海和欧洲的许多地方一直都很落伍。即使在近东，也要再过二三十个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的伟大文明才出现。

然而，令我备感欣慰的是，早期的小社会——特别是萨塔勒·霍郁克——已经明显朝着城市化方向发展。不论先前的观点如何，这些大村庄都不仅仅是从农业、畜牧业和定居生活中诞生的。内部劳动分工已经初露端倪。我以为，关键所在是，远程贸易已经蓬勃开展，更不用说仪轨严格的宗教生活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形态了。萨塔勒·霍郁克的每一座神庙都是某一居民区的中心。当然，这些城市的寿命都不长：在某些地方，尝试的努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是，第一步已经迈出，这是未来的昭示。从这一刻起，大局已定。萨塔勒·霍郁克和哈吉拉尔销声匿迹了，杰里科变得平庸不堪；杰尔莫只存在了几个世纪，而且一直不过是一个小村庄而已。但是，未来数千年中大海、陆地以及利凡得人类的主导地位，在此时就已经确立了，这是最持久的地理和空间的胜利。尽管地区性灾难频仍，但就是在那里，文明之火即将点燃，并将初步确立其优势地位。从此，地中海日益面向人类文明的启蒙之光。对地中海来说，其影响是深远的。

就这样，自原始史初期起，这些不平衡和动力就一直贯穿着地中海的整个生命。南北差异——我们已经谈过——和东西方差异很快演化成差距，而后演变成活生生的文化冲突。

第三章　地中海的双生

在公元前5000年和3000年间，我们所定义的新石器革命——农田、作物、动物、陶器、织物、村庄、还有城市（下面将谈到）——已经波及地中海一带的大部分地区。首次大发展孕育了整个公元前4000年和前3000年的伟大文明；而对地中海来说，这一大发展在它周围或附近发生不啻是一次机遇。与这些变革相伴的是陆路交通和水陆交通的革命。早在公元前十千年（不确定）和两千年间，地中海沿岸和各大河流就已经陆续通航。

就这样，日趋密集而复杂的社会发展着它们的事业，而地中海的船只则日益增多。这部双重历史——归根结蒂只是一部历史——首次使历史的地中海面貌初步显露出来。

一　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崛起

与江河的淡水神话相比，咸水落后了。征服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造就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只经济、文化巨兽，而且它们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成为政治怪兽。然而，波及范围是狭小的：上埃及1.2万平方公里，下埃及1.1万平方公里；美索不达米亚也只有2万~2.5万平方公里的可浇地，仅限于富饶地区。但是，人力和物力在这里空前聚集。连续几个世纪，近东及其活跃海域都将围绕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这一轴心运转，构成一个脆弱但日益富有凝聚力的世界。

比较有助于理解

就这样，在公元前4000年，文明——以其笨拙的形式——同时或几乎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起步了。大约1000年（在这个发展缓慢的时代，这并不算长）以后，在遥远的印度河两岸和中国，文明也出现了。这一现象并非同时出现在世界历史中，仿佛文明“漂浮在空中”，由大家共

以及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只同时代的日尔孜（gerzéen）罐上所描绘的尼罗河船只和美索不达米亚圆柱印章上的船只同样古老，造型相同，风帆或许更加先进。一位专家不无道理地指出，公元前4000年和前3000年，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直接来往的埃及居然未曾向苏美尔人学习轮子和马车技术，而直到公元前2000年当喜克索斯人的战车和战马入侵尼罗河三角洲时才采用，这一现象非同寻常。这位专家在研究了近东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发展情况后总结道，可能两大文明只不过建立了一些重要的间接联系，一般是通过叙利亚—黎巴嫩的海滨城市实现的。

然而，在公元前3000年，尼罗河文明的发展呈现出“突变”的症候。由于“亚洲人并未大量涌人埃及”，有人把这一现象归功于“小股移民和……工匠的渗透”，一种“对尚未建立的尼罗河王朝的催化性影响”，而当时的早期法老一下子就实现了政治一统。也许是吧。另一种设想则将此类渗透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大约公元前3200年，他们“走海路将阿拉伯半岛绕了一圈”——这并非不可能。不过，假如亚洲的影响果真曾经如此强烈和意义重大的话，那么埃及文化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独特的风格，而且可以说从未放弃过这种风格，这难道不令人难以置信吗？埃及文化立刻进人了“巨石、奇特……拒绝对话的时代”。纳尔迈调色板就是汲取美索不达米亚风格（两只长颈相互缠绕的想象中的动物）的典型例证；不过，只有题材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在表现形式上，则运用了统治埃及艺术达3000年之久的线条和手法。胜利者美尼斯—纳尔迈挥舞着手臂抓住被击垮的敌人，这也是15个世纪以后图特摩斯三世的动作；那是在卡纳克的阿蒙神庙……

因此，埃及文明的血统是令人怀疑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领先地位却是可信的。不过，为什么两大文明的发展会有先后呢？为什么是在那儿？

并从侧面进入上－美索不达米亚。上－美索不达米亚不必舍近求远地去寻找文明的基础知识。实验也在自己的家中进行。

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先在北部地区得到发展，以漂亮的彩陶著称：哈苏那（大约公元前 6000 年），萨迈拉（公元前 5500 年前后）和哈拉夫（公元前 5000 年前后）。仔细看，示意图相当复杂，源头纷繁：哈拉夫文化并非由前两大文化派生而来；在某些地区，甚至和经久不衰的萨迈拉文化相互重叠。人们每一次都能清楚地看到，存在着一个贸易区，主要体现在特色陶瓷的流通上。哈苏那和萨迈拉的陶瓷仅限于伊拉克北部地区。而哈拉夫的影响范围则要大得多，在幼发拉底河和大扎卜河（底格里斯河的支流）之间。在和伊朗的交界处，特别是在阿尔巴契亚，哈拉夫陶瓷艺术的发展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而哈拉夫的铜使用技术则在叙利亚边境得到了发展。在那里，在靠近阿木克和梅尔辛的中心地带，哈拉夫文化遭遇了萨迈拉文化遗风和当地强大冶炼传统的冲击。

这些连续的碎片极易解释，实质上，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南美索不达米亚殖民化——在公元前 5000 年前夕的埃里杜南部遗址发现了首批遗迹，后来在奥泊德和乌鲁克也发现了一些——以后，事情完全朝着另一方向发展。空前的殖民运动调动了大量人力，显然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各个中心区的剩余人口，以及走出人口过剩的城市和村庄的拓荒者。还有苏美尔人自身的大规模移民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给曾被洪水淹没的洼地冠以“苏美尔”的名称。这个循规蹈矩而又聪明绝顶的民族奠定了两河文明的坚实基础，遗憾的是，人们对它不甚了了。就连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已经破译）都无法揭开他们的起源之谜。过去，人们以为，他们来自突厥斯坦[1]，乃至印度河。现在人们认为，他们或许就是来自伊朗东部——即未来的波斯波利斯[2]地区——的农夫。早期陶瓷似乎经受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萨迈拉文化和哈拉夫文化的影响。但是没过多久，南部文明又乘势获得了新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一种新型农业，使生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事实上，苏美尔人定居在蛮荒之地。显然，以河泥地为主的土地土质肥沃，易于翻动和播种，收成奇高（圣经里说，种植一粒谷，收获 80 多次）。然而，这些土地必须从死水和巨大的灯心草和芦苇丛中获得，而那是鱼类富集之地和野兽经常出没的场所。气候酷热难当，降水稀少，洪水

---

① Turkestan，中亚历史地区。——译者注

② Persépolis，波斯帝国古都之一，被亚历山大大帝焚毁。——译者注

和于旱具有同等危害性。由于河泥淤积，河床不断抬高，河流在平原上“悬空”流动。当亚美尼亚的积雪融化时，洪水往往不定期泛滥，天然河堤无法阻挡。河水在平原上肆意泛滥，所有低洼地都变成了沼泽。为了避免农作物被洪水冲走，早期殖民者不得不加固天然堤坝，开凿沟渠将剩余的水引到池塘里，然后用蓄水浇灌夏季干旱的作物。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总是在炎炎烈日下进行，同时还需要掌握多项技术，而这只不过是为了开挖悬空引水渠，并使离河岸越来越远的灌溉渠网得到延伸。众神也参与其中：人类控制水患的秘诀不就是埃里杜鱼神“恩基”（Enki）的神谕吗?

制服水患以后，下－美索不达米亚变成了“伊甸园”。在那里，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一起，盛产粮食、水果、芝麻（在近东，长期以来都是油料的主要来源)，还有奇迹中的奇迹——椰枣棕。

于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重心向南方转移。文明来自北方，从此它不再只来自南方，昔日一切脆弱而早熟的文化中心都将消失，被来势汹汹、所向披靡，自然也就被咄咄逼人的低地文明扫荡尽净。

埃及面临类似问题

尼罗河也没有成为埃及的理想同盟。埃及不得不征服尼罗河，至少是对其加以整治，问题在于如何拓展饱尝天然水患之苦的耕地。因此，尼罗河的情况和幼发拉底河不尽相同。埃及不是美索不达米亚，永远不是。反之亦然。

首先是因为，从一开始，埃及就受制于干燥的沙漠，被其包裹，与世隔绝。正是渐趋干旱的气候促使撒哈拉沙漠的风沙向前推进，从公元前7000年和前6000年开始创造了埃及。混杂的人群（短头型的、长头型的、类黑人、还有克罗马农人）从南面、东面和西面蜂拥而至，无不趁机相互拥挤。他们在生命不可或缺的水边安顿下来，形成早期埃及的乡村，也就是未来的“诺姆”。

在那里，水同样没有被立即征服。如果说随着干旱的加剧，尼罗河变得水量贫瘠，一些支流甚至都消失了，那么它仍不失为一头自然怪兽，强大的洪灾制造者。正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流一样，尼罗河的河床也不断抬高，在两岸制造松软的土墩，每年在上面肆意泛滥，洪水退去后，到处留下池塘和沼泽。到了低洼地带，水流进去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改良”

以前，法尤姆湖是一片水草丛生的沼泽地。更有甚者，在不断形成过程中、异常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更是一个泻湖、水陆两用岛、浅水湾充斥的迷宫，野兽们的天堂，埃及历史上追求自由人士的避难所。在塞加拉[①]（大约公元前2500年）陵墓优美的浅浮雕上，人们看到，猎人们乘着草筏在一大群动物（鱼、鳄鱼、河马，还有各种各样的水鸟：白鹮、野鸭、翠鸟等）中间穿梭。人畜在高墙般耸立的纸莎草丛中穿行。一望无际的带凹槽的纸莎草经常成为描绘尼罗河三角洲狩猎场景的背景。鸟类经常把巢筑在纸莎草宽大的伞形花上。1000年以后，第18王朝着色浓重的壁画也采用了同样的背景：相同的狩猎场面，同样茂密的草丛，同样轻盈的用纸莎草捆扎而成的水筏，同样展翅飞翔的鸟，同样令人生畏、将身体埋藏在沼泽地泥潭里的河马。透过这些景象，我们看到原始埃及未开化的自然环境，及其对人类杀气腾腾的状况。

然而，和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不同的是，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大致在夏至和秋分之间——使人们得以创立农历以预测未来。凌汛带来了一切——水和黑泥。凌汛天然地局限于尼罗河河谷，两岸是沙漠地形——东边是阿拉伯沙漠，西边是利比亚沙漠。因此，在埃及，问题不在于如何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抑制并控制洪水，而只在于如何疏导它。

但是，人类要完成的工程是浩大的：填埋两大沙漠里的低洼沼泽地，加固陡峭的河堤，构筑截流堤坝。于是，两岸的绿化带和若干个堤坝将尼罗河分割成一串首尾相连的“水池”。时间一到，堤坝就被打开，等“水池”里灌满泥沙（厚度可达1～2米）后重新关闭。水池里的水至少要滞留一个月；然后，在重力作用下，水从一个水池排到另一个水池，直至排干。因此，除堤坝浩大的建造工程外，一切都自动完成。水被用于浇灌、提高土壤的肥力并为收获作准备。在埃及，最早发明的人工灌溉“机器”很久以后才出现：“沙多夫”（le *chadouf*），年代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可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引进的（公元前3000年，这一机械在那里已经盛行）；“诺里亚”（la *noria*）公元前6世纪被波斯人带到埃及；螺旋输送器，大约公元前200年，是希腊人的礼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埃及不需要这些精巧的机械，改造尼罗河就足够了。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记载了另一项错综复杂的工程。灌溉的人工化程

① 开罗西南郊村落，有阶梯式金字塔。——译者注

度要百倍于尼罗河两岸。水位必须时常监控，一旦水量过大，就得“打开”某某灌溉渠，把水“分流”出去，排到沼泽地或水池里，一会儿朝这个方向灌溉，一会儿朝另一个方向，无休止地抗争长势凶猛的芦苇和杂草、还有随时可能堵塞水渠的淤泥，必要时将土地翻耕一遍，以便让水流进来（“把牛赶出去浇地”）。发布必要的命令或报告所完成的工作，文献描绘了大量生动的画面。让我们引用莫里斯·维耶拉（Maurice Vieyra）（1961 年）的话作为结论吧：“埃及：尼罗河的馈赠；美索不达米亚：人类的杰作。”

其他进步：用陶车制作陶器

伴随着“水仗”的胜利，还有其他胜利、其他进步。让我们从最简单的谈起。

在公元前 4000 年上半叶，下－美索不达米亚发明了陶车。奇怪的是，首批用陶车制作的陶器似乎突然对审美不屑一顾：非常简洁、单色、淡灰褐色或淡黄色（仅仅过了二三个世纪，人们采用了红色或紫色泥釉，仍是单色）——这就是所谓的乌鲁克风格。同类遗址显示，大约公元前 3400 年，这一风格取代了埃里杜和奥泊德老瓷器简洁细腻的装饰，或附近苏吉安那极富创意的优美陶器。后来，这一简陋而又无多大吸引力的制作工艺传遍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以致强大的彩陶传统几乎在美索不达米亚彻底消失。

这是不是不太合乎逻辑呢？在当时，乌鲁克已经是一个特大城市了（可能有 2 万居民）。它和幼发拉底河上的其他重要城市保持着来往，而且随着陶车的出现，刚刚步入陶器的“工业”化阶段，制造规模庞大，劳动力无疑不如以往灵巧。这些无装饰陶器大量散布到南北之间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地区。它们只注重于造型的多样化，于是，“功能”陶器出现了。公元前 4000 年下半叶，创造性、想象力和审美趣味在毗邻的伊朗陶器工匠中——有时甚至在相对而言极为贫困的村庄，而非处于进步前沿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城市——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每当人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陶匠结合绘画艺术的地方产品，似乎总是意外地在和伊朗保持直接往来关系的地区：迪杰姆德纳斯时代（公元前 3200 年前后）的红色及黑色陶器与迪亚拉河谷的“猩红陶”一脉相承——在伊朗遗址和大约公元前 2800 年迪亚拉河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如米西亚），均发现此类陶器；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尼尼维特－5 风格风靡于通往阿塞拜疆的山口地区——

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亚述。

在埃及，人们目睹了石头和黏土之间的有趣竞争。在整个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手工制陶逐渐改进了烧制技术、着色以及装饰。与此同时，需要耗费大量工时的打磨石制容器成为稀有的奢侈品，尽管燧石工具非常精确而可靠（依照“震动”技术打制的吉贝尔·埃尔·阿拉克刀刃异常匀称）。但是，在前王朝时代后期，大约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始频繁使用陶车的时候，埃及发明了由手柄启动的石钻。运用石钻可以节省很多力气，并快速雕凿石块。于是，埃及进入石杯、石罐最辉煌的时期，石材多种多样，美不胜收。相反，自公元前3200年起，陶瓷风格每况愈下，装饰不见了，造型更趋实用化。虽然陶车出现得很早，但在公元前2600年以前仍未普及使用；它将引发陶器制作的新一轮流行风潮，尽管并未还它应有的尊崇地位。按照容器的用途，人们确定了一些特殊、固定的造型，一般不加任何修饰。即使偶尔一间豪华房间用若干种颜色加以装饰，也不过是轻描淡写而已，是在焙烧以后加上去的，用水就能冲刷掉。人们通常所说的“埃及彩陶”在中国无人不知，而且漂洋过海——这是一种玻璃珐琅，在石座炉中焙烧而成，通常模塑成形。陶器的贫乏正是自公元前15世纪始，克里特和迈锡尼的进口陶器得以在埃及风靡一时的原因。

农业和畜牧业的进步

其他更重要的进步与农业和畜牧业有关。对于早期山丘耕作者或大面积平原种植发明者的情况已无从知晓。可以肯定的是，谷物品种、果树、橄榄树、葡萄、棕榈不断得到改进。动物驯化活动日益增多。在美索不达米亚，从新石器时代或更晚些时候沿袭下来的驯养动物中，有狗、绵羊、山羊、猪、牛、野驴、外地驴，还有从北方草原和阿拉伯引进的马和骆驼。所以，有“北驴”和“南驴”之称谓。

埃及也驯养了这类动物或它们的近邻，再加上非洲特有的一些其他动物。埃及人喜欢反复进行试验，其中一些不太合乎常规，如：鹈鹕、猎豹、鹭、鹤、鬣狗、羚羊等。另外一些试验则被认为是成功的，而且是一举成功，如：猫、尼罗河鹅（在公元前3000年许多浅浮雕上都可见到鹅群）、鸽子、母鸡（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图特摩斯三世年鉴》谈及这种奇特的鸟时说，它可以在一年当中的任何时候下蛋）等。

另外，在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除了成功使用驮驴（来自非

洲埃及）外，还有一项质的飞跃是将牛套在车或犁上。普通犁或摆杆步犁是由套车拖着的锄头，这一点可以从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印章上得到证实。但是，甚至在“富饶的克瓦桑”，带金属乃至燧石尖头的木制摆杆犁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这一点不能排除。在埃及，摆杆犁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种子是撒播的，耕地时埋入土中或由牲口踩进地里。公元前2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一种类似犁壁（Versoir）的东西被固定在犁柄把手上：种子落在犁沟中，然后在耙地时盖上土。

是否应当称之为摆杆步犁革命呢？这太吸引人了。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耕地速度加快，耕地面积扩大；即使在不太好的土地上，通过开辟短期休闲地，耕种同样的土地要容易多了。长期休闲地用于生产树和灌木，可以用火烧。火不会烧毁覆盖在短期休闲地上的草，必须用摆杆犁锄草。伴随着这些进步，需要养活的人口不断增加——要么就是人口增加在先，技术进步在后，这又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另一个结果是：当时，妇女在农田和谷园仍占主导地位，锄地并照看作物生长情况。男子仍以狩猎为主，然后充当饲养员。但是现在，他夺过了犁，并驾驭它。于是，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无所不在的母亲神、远古的生殖崇拜（在新石器时代由女祭司主持）让位于男神和男祭司，他们将主宰苏美尔和巴比伦。假如事情果真如此，这是决定论的理想例证！然而，即使在犁出现以后，母亲神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她仍将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爱琴海宗教里，在克里特以及后来的希腊。无疑，在这些方面，发展情况极其复杂而缓慢，因而不管是何种程式，都无法局限于某种特定程式。大型动物（驴、牛以及后来的马和骆驼）的饲养花了几个世纪才实现。金属加工是一项高贵的职业，由男子完成。这一点也促使社会和信仰向着有利于男子的方向发展。正如让·普芝鲁斯基（Jean Przyluski）在书中写到的那样，“‘地母’变成了朱庇特，女王变成了男王”。但仍需要经过若干世纪的社会磨合。在巴比伦神话里，太阳神马尔杜克不得不杀死可怕的女性龙提阿玛，然后用自己的身体创造了天空和大地。然而，在苏美尔，伊娜娜（Inanna）女神仍然是生殖女王，人们献出大地上的全部水果祭拜她（瓦尔卡陶罐）。

纺织业

对纺织业来说，是惯例占上风，还是技术进步占上风？显然，两者都

有。纺织业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技术。我们将在萨塔勒·霍郁克或杰尔莫见到。那是自公元前6000年起，很可能还要早。纺织技术非常接近于篓筐编织技术，后者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从那时起，只要有合适的材料，就可以纺织。

所以，在安纳托利亚和“富饶的克瓦桑”的当代墓葬中，发现驯化绵羊和山羊的羊毛，毫不奇怪；而在埃及，亚麻的纺织技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年，比最早出现的王朝要早得多。棉布是一个例外：印度河流域的古老文明最先使用，只是到了公元前1000年，辛那赫里布时期，棉布才传到美索不达米亚，而它出现在埃及的时候，是以色彩鲜艳的进口印花棉布的形式。山羊毛只用来制作袋囊或套车绳索。一直以来，亚麻和羊毛都是两种主要纺织原料。埃及几乎只局限于使用亚麻，美索不达米亚则两种材料都用，而且还探讨它们各自的优点。

总之，在很久以前，纺织技术就已大行其道。在一小块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埃及亚麻布上，每平方厘米包含经纱64线，纬纱48线：谁能做得比这更好呢？而且，从我们掌握的图文资料看，不管哪个年代，技术都是永恒不变的。毛纺或麻纺要求从置于地上或容器中的粗毛团或粗麻团抽纱，然后由纺锤卷起。大约相隔20个世纪，陶罐上迪亚拉的纺纱女工们操作纺锤的动作和苏萨纺纱女工坐在板凳上所做的动作一模一样。埃及妇女总是站着甚至站在木头垫子上纺纱，以便拉开手指和麻团之间的距离，并增加纺锤的活动空间。

在早期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生产的急剧上升是一个新现象。即使在赤身裸体司空见惯的尼罗河两岸，随着服装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服装消费不断增长。在埃及艺术中，男性缠腰布一直是诸神和法老的传统服装；而自“新王国”始，只有平民百姓才穿这样的服饰。贵族里外身着好几件缠腰布和内长衣，通常带褶；妇女不再满足于过去狭长的紧身衣，她们还在外面穿上宽大、色彩艳丽而透明的亚麻裙（当时，男子和妇女只穿白色亚麻服装）。木乃伊也需要大段布料。总之，埃及的亚麻闻名遐迩，并大量出口。此项贸易由王室垄断。

在美索不达米亚，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布料（特别是毛料）成为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而在乌尔，在当时权力中心的神庙里已经保留了一些作坊。后来，王宫成为这项历来生机勃勃的手工业的组织者。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纺织几乎总是由妇女或悲惨的战俘从事的；事实

上，这项卑微的职业何等需要全社会和整个经济来共同筹划啊。

关键材料：木材

木材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这一点毫不奇怪。一方面，如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如同19世纪（甚至更晚）以前的欧洲那样，木材的用途广泛，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另一方面，虽然河泥改造成的土地优点多多，树木却难以生长。一位亚述学家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有用的树种屈指可数。说实在的，柳树或棕榈的纤维树干能派什么用场呢？在埃及，只有无花果树和刺槐能提供硬质木材。后来，在“新王国”建立后，引进了一些新的树种，如松树、紫杉、柠檬树、山毛榉等，但依然弥补不了先天不足。对于房梁、房门、柱子、家具、船只、工具、器具、棺材、雕塑等所需的木材，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从一开始就不得不依赖进口。

它们都了解并垂涎于阿马努斯（Amanus）和黎巴嫩的雪松及其他产树脂的树种。在美索不达米亚传说中，“雪松山……是众神的寓所”；对传奇英雄吉尔加美什来说，“在那里，树阴美丽而提神”，当拉加什的国王兼祭司居德阿为了在城里修筑神庙而手持大斧伐木的时候，庞大的树干“像一条条大蛇”伸进河水里。这位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旅行家写到，在黎巴嫩森林上空，天空“昏暗，（因为在那里）柏树、橡树和雪松开花了”。对此，他同样惊叹不已。这一切都促使帆船队往返于比布鲁斯和尼罗河三角洲之间，或沿着叙利亚海岸上溯到北部港口，船的后面拖着木材。然后，经过陆路的艰难跋涉，将这些木材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

于是，木材成为埃及和叙利亚早期往来的源泉，萨胡拉法老和埃利芳提纳的“企业家”们远征比布鲁斯的原因。在地中海，萨尔贡指挥了一场木材大战。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对一种司空见惯的材料所做的最奇特的促销活动。然而，人们从不就日常必需品讨价还价。必须将木材运到埃及，在那里，我们见到许多忙碌的工匠，一边挥舞着斧头、榔头或销钉，一边等待着铜钉的到来……木材迫使人们不得不打破经济孤立。然后以此为突破口，许多其他贸易也发展起来了。让我们想想中国华北地区吧：在那片黄土覆盖的不毛之地上，人们被迫前往南方甚至最南端去寻找木材。有时，相同的原因导致相同的结果。

铜和青铜

金属构成一条重要分水岭：原则上讲，人们将在此之前的时代称为石器时代。但事实上，任何变化均非朝夕之功。

很久以前，金属、天然铜和陨石铁就已经像石块一样用凿子和锤子加工了。但是，冶炼技术的诞生，是对窑炉的使用，是对金属成功熔化的结果。那是在公元前5000年，伴随着铜的熔化。最初在伊朗和西西里，可能还有阿木克及其北部平原，素有“铜之国”美称的迪亚巴克尔一带。冶炼的成功与否部分取决于矿石的品位，在上述地区，矿石往往掺杂着砷。然而，纯铜水铸模并非易事。当人们加入锡——凭经验在铜水中撒一些掺杂木炭的锡石（即氧化锡）——以后，铜的冶炼才得以改观。大约公元前2800年和2000年，这一极品合金分别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

人类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以青铜命名。由于既稀有又昂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青铜都是奢侈品。只有一些工具以及达官显贵们的饰物和武器是用青铜做的，平民百姓则仍然处于石器时代。在苏美尔，人们依然拔羊毛，而不是剪羊毛。埃及人长期使用石刀，印度河流域声名显赫的各大城邦亦如此。在那里，人们发现了黑燧石刀片。

为了加工金属（包括金和银），工匠们很早就实现了专业化分工。一部分人加工矿石，另一部分人则负责精制：锻打、研磨，然后反复熔炼。在美索不达米亚，人们发掘出一些带风嘴的熔炉。通过风嘴，吹制工（也可能是风箱）可以促使掺杂在矿石里的木炭加速燃烧。另外，一些铸塑用的模子依然保存完好，有的是用粗陶制成的。

无疑，早期铜匠或青铜匠们从事的是一项奢华而特殊的职业，它有自身的规则、秘方、传统、独立或流动工匠。如同今天的黑非洲那样，流动工匠们根据需求来销售或制造产品。在黑海沿岸的纳哈尔·密什玛尔洞里（大约公元前3000年以前）[①]，人们发掘出一批奇特的金属制品，有武器、权杖、王冠、铜制狼牙棒等，图案复杂，工艺精湛，显然要比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制品先进。因而，人们认为，这是流动工匠们的杰作。在这些制品中，铜含有大量的砷。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认为，冶金是远古世纪“最早的国际性科学”。这正是铜或青铜制品出奇相似的原因，尽管有时相距十万八千里。

① 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公元前4000年前后。（I. G.）

冶金“国际性”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必须到很远的地方获取矿石或粗金属等原材料。于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前往卡帕多西亚，到托罗斯的群山中，或者巴林群岛中继续去寻找铜——那里是来自安曼的金属或矿石的集散地。锡来自伊朗，银则来自托罗斯。因此，和对木材的需求一样，对金属的需求也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城市保持远程贸易。这一点对尚未完全成型的多元化社会——包括工匠、运输商，而且已经有商人和出资人阶层——来说至关重要。埃及不得不到西奈寻找铜，到努比亚淘金。然而，和美索不达米亚相比，由于埃及远离早期冶金技术的发祥地及流动工匠，它接受冶炼技术的过程是缓慢的。无疑，“旧王国”拥有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工艺精湛，堪与线条简洁的乌尔金杯（高脚杯和平底杯）相媲美。然而，在埃及，直到公元前 3000 年末——假如我们测定的年代准确无误的话，青铜加工业才得到发展。

文字，计数

首先，文字是一项技术，一种工具，用于记录、沟通、指挥和向远方发号施令。幅员辽阔的社会和帝国都是文字的产物。无论何处，文字都和它们相伴而生，而且过程相仿。

起初，**象形文字**——一种仍显笨拙的原始文字——是一种帮助记忆的简单图案，实物简化了的轮廓。一种符号可能表达多种含义：“当我们见到……一只牛头，它是指牛本身呢，还是它的某种产品，抑或表示牛角或者可用牛角制作的东西?”个中含义只有当时的使用者清楚。因为，象形文字并非与某个确切的词相对应，而且这个词又明显有别于相邻的词。在当今的某些原始部落中，这类“文字”依然存在。第二步是**表意文字**，用单线条勾勒出某种图案，表示一件物品或同一物品。最后是**表音文字**，用于传达语言的发音，即音素。

不过，这只是简单描述。事实上，表音文字并未彻底淘汰表意文字。它的出现表明文字的精确度有所提高，而不是取代先前的文字。在埃及语中，“锄头”一词用三条线表示，而这三条线也表示“大海”一词的发音，即“沟渠”一词和动词“爱”。“在前一种情况用来表示锄头的时候，是表意文字；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变成了表音文字。”

公元前 3000 年末，当楔形文字在苏美尔出现的时候——当时书吏用削尖的芦苇将它凹刻在柔软的粘土书板上，它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结合在一起，完全能够记录苏美尔语的全部发音。尽管有诸多不便——这一状况

一直持续到公元前 2000 年中叶，字母文字发明（革命性的发明）的时候，楔形文字还是被用来记录许多其他语言（阿卡得语、埃拉米特语 élamite、卡西特语 cassite、赫梯语等）的音素。



纳尔迈调色板

来自希拉孔波利斯，讲述何露斯的战功。页岩，高 64 厘米，收藏于开罗博物馆（绘画：洛尔·诺莱特）。

埃及也经历了极为相似的演变过程，从圣书字过渡到僧书字，然后过渡到民书字——后者更趋草体，更加简化。但是，在年代上，最古老的我们最感兴趣。“圣书字”这一名称源自希腊人。在神庙的墙壁上，他们看到这些象形符号，于是赋予它们宗教涵义。圣书字有的凸刻或凹刻，有的镶嵌在玻璃料中，有的由金银匠刻在贵重物品上，有的画在坟墓的墙壁上或小小的纸莎草上。圣书字虽然易于识别，但要解读其含义却需要一定的灵活性。

纳尔迈调色板——人们视法老为传说中的美尼斯（大约公元前3200年）——是我们所掌握的第一件埃及文献资料。在左上方，读者会有趣地读到象形文字。它描绘的是何露斯（隼神，亦即法老本人）战胜一位捆绑着的男子的情景。被绑着的男子表示北埃及：他长胡子，不像尼罗河上游的埃及人那样下巴光秃；他头顶上方的水生植物表示北方沼泽地。这幅画的含义是：“何露斯神战胜了北方的敌人”，或者“何露斯神打败了北方的敌人5000人”。五朵莲花表示5000！

从最早的各个朝代开始，埃及就已经使用纸莎草髓质制造的软纸：在这种纸上，可以用（红墨水或黑墨水）苇笔飞快地写字。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细节。在我们看来，这一天才发明却有一个缺点：美索不达米亚笨重的粘土书板在档案馆里堆积如山，而极易破损的纸莎草纸却很少保存至今。我们的博物馆里保存了仅仅几米纸莎草纸，而不知有多少公里（相当于几乎全部公共档案）却消失了。

不过，让我们撇开这些细枝末节，关注文字在尚未成型的社会中所占的首要地位，这才是最重要的。文字是统治社会的工具。在苏美尔，大部分古老的书板都不过是一些财产清单和会计凭证，定量分配表和受益人名单。同样的现实，同样的失望：在1953年，迈锡尼—克里特“线形文字B”终于破译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能见到的依然是一些宫廷账目。然而，正是在这一原始层面上，文字——这一国家或勤劳的臣民们的发明——才得以扎根并开花结果；而后，再演绎出其他功能。

在最早的书面文字中，数字占有一席之地。埃及象形计数法设计简单，严格遵循十进制。单个数字相当于一、上十、上百、上千等：“一朵莲花表示1000，一个食指表示1万，一只蝌蚪表示10万，高举双臂的神表示100万”。人们简单地将数字并列摆放在一起，各个数值相加就是想要表达的数量。因此，10000这一数字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9999却要用36个符号：9个“1000”，9个“100”，9个“10”，9个“1”。僧书字的

计数法省略了重复的符号，进而简化了这一做法。但是，和计数高手巴比伦人相比，埃及算术及分数制仍将处于原始状态。

然而，乍一看，和苏美尔人一脉相承的巴比伦计数法似乎过于繁复：它以 60 为基数，用 59 个不同的符号表示前面 59 个数！至于比 60 大的数字，它们在文字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含义也不相同。于是，每个数都包含两层含义：本意及位意——这一点与我们的计数法相同。总之，在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 1792 ~ 前 1750），巴比伦分数制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构思完美，操作简便。

早期的文字和计数方法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学会。因此，书写和计算的技艺是少数特权阶层和天才人物的专利。在叙利亚海岸的乌加里特——以后我们将谈到它的伟大和兴旺，书吏必须懂苏美尔语（相当于我们眼中的拉丁语），阿卡得语——在公元前 2000 年，这是国际报告和法律文件以及公证书采用的语言；在乌加里特自己的语言——即字母楔形文字——诞生以后，书吏还得掌握第三种文字。这堪称一门师徒代代相传的科学。一项古老的练习便是抄写，以及将书吏的祷告翻译成多种文字："对坐在你面前的青年学子，伟大的主啊，请不要无动于衷；告诉他全部书写的秘密，告诉他全部计数、计算的秘密。赶快告诉他神秘的文字。"这是很晚以后某个时代（公元前 13 世纪）的请求书。没有比这再清楚不过了：不经过训练，就无法成为"技术专家"、书吏或文人。这是为获得巨大特权必须付出的代价。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有了自己的知识阶层。

城市扮演何种角色？

在新文明中，城市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这个角色有些模糊不清。城市是数量的产物，同时也创造数量；城市促进贸易的发达，贸易反过来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城市是服务于大型政治组织的工具，同时也为自身服务。在底层，生活条件总是千篇一律：附属乡村、神庙、宫殿、工匠（织匠、铜匠、金银匠等）、书吏、运输商、商人等。城市有围墙：它或许已经扎根几个世纪了，毕竟有别于相邻的乡村，并优越于乡村。所有这些基础条件都和命运相伴，但并不能独自决定命运。

城市的命运取决于社会活动和贸易的双重平衡：一方面是亲手缔造的平衡，以便这个封闭小世界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另一方面是，由经济和政

治力量创造的更大的外部世界试图强加给它的平衡。在埃及，除了在短暂的前王朝时期，城市的命运似乎是独立自主的。对隼神之城希拉孔波利斯或者神秘的赫利奥波利斯——在那里，制造伟大的神话，诠释埃及宗教成为一大行业——人们了解什么呢？很早以前，法力无边的法老牢牢掌控着埃及城邦，而且社会越繁荣，掌控越有效。尼罗河两岸的城市生活并未定型——或许这是我们难以把握的主要特征？仿佛城市很难和设计糟糕但有价值的遗址挂钩，仿佛大都城将国内城市的全部精华都吸引到身边，并吸干其中的养分。

无论如何，当"古王国"由于埃及内部的原因土崩瓦解时，令人震惊的是，整个国家被分解成"诺姆"、乡村县，并推行封建制度（如同历史学家们反复强调的那样）；而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并未扮演主角，而是君主、神庙和祭司。

与此相反，美索不达米亚的现实并不包含这一半沉默状态，即城市作用消失的情形。在苏美尔，在一块不大的地面上，城市密布，生机勃勃，经济联系紧密（这是强制性的，附近或远处的道路必须畅通无阻），但是又互相争权夺利，推出各自的神灵：乌尔、乌鲁克、拉加什、埃里杜、基什、马里、尼普尔（该圣城和埃及的赫利奥波利斯相当）等，概莫能外。每座城市都为了自身的利益重新燃起城市的热情。在吉尔加美什［传说中乌鲁克城的创建者。——译注］史诗的开头，乌鲁克就是以这样的热情介绍给读者的："今天再看看它吧：外墙托起挑檐，闪耀着铜的光辉；而内墙呢，举世无双。触摸门槛，它是那样古老……登上乌鲁克的城墙，稍作闲庭信步……并细加端详：这不是美观而实用的焙烧砖吗？"

在美索不达米亚多灾多难的历史上，它的建设和重建总是围绕着城市进行。在最艰难的时刻——从未封建化——在灰烬下面，总有城市的星光。这种活力的原因何在呢？首先是因为，美索不达米亚更富有多元化色彩，远不如埃及那样铁板一块；政治实体总是摆脱不了短命的厄运（萨尔贡帝国成立于公元前 2335 年，寿命不到 150 年）。由于地处交通枢纽，美索不达米亚必然对外更加开放，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生机勃勃。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我坚信，最初，铜是从巴林群岛采购的。铜促使苏美尔的早期城市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促使它们更快地投入远程贸易这一探险活动。而在任何时代，远程贸易都无异于一场革命。

两个埃及实为一体

在埃及，只有一条河流，一件大事：那就是尼罗河一年一度的凌汛。尼罗河突如其来的事件，抑或和尼罗河有关的任何事件——从阿斯旺最早的瀑布到茫茫大海——都左右着埃及的全部生活。同样，尽管众说纷纭，尽管自然条件有所改善（一位下埃及男子在埃利芳提纳岛迷了路，后来重新找到了回家的路），埃及人依然是埃及人，从上埃及到下埃及，相差无几。起初，诸诺姆各自为政，但很快，整合便开始了。土地、人员、地方神、城市等都集中在了一起。尼罗河三角洲成功地实现了统一，成为下埃及——蜜蜂和眼镜蛇“乌拉厄斯”（Uraeus）的王国：国王头戴红色圆锥形王冠。地处尼罗河狭长河谷的上埃及也建立了政治实体——即百合与秃鹫的王国，国王头戴白色冠冕。最后，在大约公元前3200年，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纳尔迈统一了这两个国家，他本人头戴红白双色王冠。我们可以称他为第一位法老吗？这一称号来自埃及语 peraa，原意指“大房子”、“人心所向的宫殿”，很久以后——从纳尔迈时代又过了14或15个世纪——才用来表示国王本人。不过，我们注意到，“房子”、“宫殿”和“国王”之间是多么含混不清啊。

上面谈到过的纳尔迈调色板基本上表现了具备活神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法老。他的姿态、他的代表性、高大的身躯压倒所有其他人：这一切从此一成不变，至少在形式上不再有变化。事实上，正如莫伦茨（S. Morenz）所说的那样，王权的神圣性乃是埃及的“政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秩序。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的王权和神奇的君主制，来源于埃及前王朝时期和史前时期的深邃历史中，来自巫术横行的蛮荒世界——在那里，诸神都是令人生畏、极端危险的造物。法老本人也通过加冕成为神，他以最现实的方式——即吞食诸神——夺取王权，以同样的方式汲取神圣的给养。在《金字塔经书》中，记录着“著名的肉食法老的颂歌：法老专食神灵，中午吃大的，晚上吃中不溜的，宵夜时吃小的。他折断他们的脊梁骨，掏出他们的心脏，生吞在路上遇到的一切。”言下之意，法老才是最伟大的神，至少和其他神明平起平坐；他是人类和万物的主宰，尼罗河水的主宰，土地乃至尚未成熟的作物的主宰。后来，有人为一位已故法老写了这样的墓志铭：“我曾经是能让大麦生长的人。”

在形式上，这一活神观念将根深蒂固。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仍然喊道："听着……我是天主瑞，就在大地上空。"

然而，我们不应当过度简化一种永恒的制度，尽管在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法老即隼神何露斯本人。后来，他成为尘世的化身，在这一点上，海夫拉（Khéphren）法老塑像最能说明问题。当自第四王朝起，他最终成为众神主宰瑞的儿子以后，他难道不是丧失了部分原先的权威呢？一方面，法老本人不再与诸神平起平坐，而是成为圣父之子；另一方面，法老对圣父负责，如同儿子对父亲负责一样。他来到人间是为了执行圣父的旨意。领导埃及的最后一位伟人拉美西斯三世对阿蒙说："我没有违抗你的命令。"总之，莫伦茨认为，显然"王权的神性呈递减之势……正身、化身、圣子"。

法老对宇宙秩序的责任并未因此减轻。ma'at一词意为正直、真理、正义，取世界的天然秩序之意。活神乃是这一秩序的保护神，他结束尘世生命是为了进人另一种生存状态，以便继续行善。在第四王朝，人民怀着满腔热情建造了大型金字塔，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保存这一有效祝福。埃及学家希里尔·阿尔德雷德（Cyril Aldred）阐述一句格言时得出如下结论："古代埃及乃是法老的馈赠"。在经常以同样的热情工作的文明中，君主贡献了他的力量和凝聚力。

然而，政治统一意味着将埃及沦为奴役地位。但是此后，"尼罗河机器"运转良好，仿佛为"活上帝"进行了一次示范表演。当第一个**中间期**（公元前2185～前2040年间）埃及内部爆发"文化大革命"，"古王国"大厦摧枯拉朽时，这是为了让人们最终意识到，最佳选择乃是重建已被摧毁的一切。

尘世生命，永恒的生命

于是，埃及接受了不可抗拒的制度。这是怎样一个埃及呢？塞加拉墓葬中的浅浮雕以及十八王朝的黏土塑像或绘画作品讲述着一大群小人物永无休止的劳作：在田野上，农民们播种、收割、将收获的粮食一捆捆装到驴背上，将秸秆堆成垛，把麦子运到地窖里，将亚麻茎捆扎在一起，赶着畜群涉水过河，收割纸莎草，编织渔网，卸下船上的货物；工匠们加工金属、木头；奴隶们酿造啤酒、用石磨碾碎粮食或者用脚踩着和面、收获葡萄或榨汁。圣书字评论这些图画时亲热地说："吁，慢腾腾的！"或者：

“快点，孩子们，再快点。”同时，人们通过吹奏笛子来控制劳动节奏。在德雷尔美第内（Deir el-Médineh）村保存的档案中，有一份底比斯（第十九王朝）大墓地工程民工的明细表，以及人们发给他们的工具和旷工的理由：“他被蝎子蜇了”，“和某某一起喝酒”（波瑟内 G. Posener）。酗酒者是否受到了惩罚？阿蒙霍特普的马斯塔巴墓里的一幅画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一些没有交纳佃租的农民遭到棒打。理由可以多种多样，惩罚却可能是相同的。这就是真正的埃及：体质虚弱的人群、短暂的生命，但是他们生来就逆来顺受。古代中国并非更加秩序井然。

在法老身边，有大臣、王公贵族。在全埃及，经他委任的有书吏、特权官员等。在最底层，备受奴役的农民不计其数。说实在的，只是到了“新王国”时期战犯大量增加的时候，他们才摆脱奴隶的地位。然而，在单调乏味的过去，虽然奴隶制尚未得到承认，难道不是一直都存在吗？每年，当尼罗河峡谷淹没在洪水中的时候，农民获得了一段闲暇时光：于是，皇家徭役——建造大型金字塔等——像雨点般袭来。这是农民受到奴役的形式之一。其形式之二是苛捐杂税，每次提起——尽管很少提及——都怨声载道。听着，这些公元前 1500 年的哀号是多么不合时宜啊：颗粒无收，“田鼠猖獗，蝗虫肆虐，牲畜吞食，麻雀劫掠”；然后，“河马吃光剩下的一切”。税务人员却并不因此放弃收税：“他们对农民说：把你的粮食拿出来——尽管一颗粮食都没有。他们对他拳打脚踢，将他绑起来，扔到井里。”这样的描写难免有夸大其词之嫌，不会是真实的，但是真正真实的却也假不了。

无疑，这样的社会太逆来顺受了。不过，难道这不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称之为“萌芽”的早期文明的命运吗？神灵占据了太大的位置。他们通过祭司之口诠释宇宙的起源，在星座中显灵，或通过神兽显灵，他们主宰着人类，一句话，“他们撰写着历史”。由于数量众多，他们相互拥挤，随着改朝换代而相互更替，根据各个城市和神职人员的意愿而相互取代：诸如奥西里斯[①]，伊希斯[②]，何露斯[③]，贝斯[④]，哈托尔，

① 埃及神话中的冥王，太阳神之子。——译者注

② 奥西里斯的妹妹和妻子，精通魔法和咒语。——译者注

③ 奥西里斯和伊希斯之子。他为父报仇杀死了塞特。——译者注

④ 埃及神话中主管妇女梳妆的男神，奇丑无比。妇女们喜欢将他的画像刻在镜柄、化妆盒和香水瓶上。他也是婚姻神和睡眠保护神。——译者注

托特[1]，普塔，塞特[2]，阿蒙·瑞等。每座城市，甚至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保护神。不管怎样，他们大大超越了神话的界线：经历各种奇遇的诸神——其中不乏人间奇遇——毕竟与人相近。

有一天，经济学泰斗洛德·凯恩斯戏谑地谈到古埃及的“古王国”。在那里，一切都是完美无缺的，无论是在人文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农业和城市的生产剩余有条不紊地被成批运到庞大而“无用”的金字塔中烧掉。可以说，这样，埃及就不会产生“经济过热”了！不过，有一个条件，即它本身就是宇宙。在“古王国”时代，埃及几乎足不出户，除非派一些人到利比亚、西奈半岛或努比亚去搜罗宝石、黄金、奴隶、黑人佣工，或者派遣船只前往比布鲁斯采购黎巴嫩的油品和木材。公元前2000年，当埃及凭借武力介入国际社会而不得不保家卫国时，一切都改变了。从此，军队消耗了以往和平时期建造金字塔所消耗的一切。

作为尘世生命的主宰，众神施与永恒的生命。长期以来，只有法老才能享受宝贵的来生。预防措施是多种多样的：涂抹防腐剂、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还有陵墓、塑像、壁画、仆人塑像等等——假如在死后想要获得帮助的话。在“中王国”，下层社会的大人物率先获得灵魂不朽；后来，成功完成万灵国之旅，穿越净礼和终极审判考验的全体埃及人都获得了灵魂不朽。公元前20世纪的埃及人西努希（Sinouhé）无意中成了旅行家，他在叙利亚定居。在那里，他发了财，还娶了当地一位酋长的女儿为妻，并列数葡萄酒之国、水果之都、羊群之乡的种种美事。然而，最终他还是回到了故乡，一是出于思乡病，一是担心有一天埋葬后“只用一张羊皮作裹尸布”，在来生中死去。

社会、宗教、帝国：命运多舛的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从未得到片刻歇息，仙女们自出生起就忘了将它同邻居们分开：东部和北部边缘的群山“保护着它，并威胁着它”；在西部和南部，与纠缠不休的叙利亚沙漠相邻。

在这个位于“两河之间的地方”，奔流不息的历史经常出现悲壮的断裂。《创世记》一书将人间天堂安排在“伊甸园”，就在美索不达米亚。无

---

① 埃及神话中的智慧之神，文字的发明者。——译者注

② 埃及神话中的邪恶之神。奥西里斯的弟弟。为了抢夺奥西里斯漂亮的妻子而杀死了兄长。——译者注

情沙漠中的游牧民族、山民或途经高地的莽夫不断跑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田野、花园和城邦里撒野。这个在劳动中自得其乐的地方恰似一颗人人都梦想着占有或分享的“仙桃”。相比之下，埃及的命运似乎一开始就受到了庇护——这显然是一种极端情况。一位资深专家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宛如一棵大树，不断长出茁壮的枝条或蓬勃的新芽。但是，每次开花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啊——战乱、背井离乡、接二连三的破坏、劫掠和改朝换代？

尽管如此，这一文明并未因为波折与不幸而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改变其本色；它顽强地向四周传播，最后，所有与这个“两河之间的地方”毗邻的周围地区都变成了它的小祖国。在变幻莫测的璀璨群星中，无论出现何种情况，美索不达米亚都是中心所在。每次入侵，外来者都被当地生活同化，以至于来自沙漠的闪米特人能够取代苏美尔人，反之亦然。这一切都是历史的恩泽。而变化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文化差异——当然也有一些是天壤之别。

因此，这是一种不平凡的命运。然而，不能将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外部世界——沙漠或山脉。自家内部也争吵不断：说得夸张一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差不多。和意大利一样，苏美尔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个城市相互竞争。乌鲁克、乌尔、埃里杜、基什、拉尔萨、伊辛、阿达布、拉加什等城市取代了原始的氏族社会。每个城市都拥有各自的神灵和祭司兼国王（这完全不同于“神兼国王”）。它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角逐。霸主地位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基什到乌尔，到乌鲁克，到拉加什，再到阿达布。阿卡得帝国完成了首次意义重大的统一。这个由闪米特人创立的国家在萨尔贡大帝时代达到鼎盛时期，但统治时间不长（公元前 2340 ~ 前 2230 年）。乌尔一度重新夺得霸主地位，后来又被伊辛、拉尔萨和巴比伦轮番取代。

难道美索不达米亚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创造君主、国王或王国吗？显然不是。与其这样，还不如说，在苏美尔早期时代，各大城市就已经依靠农业和频繁的贸易活动富裕起来了；它们生机勃勃，继续过着自得其乐的生活，开放而又封闭。显然，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动荡并未给它们造成深远影响。政治动荡并不一定波及“对外贸易”，后者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从北到南，自东向西。只要能够重新获得安宁，只要每座城市——和乡村及各行各业勤劳的人民一道——能够重新拥有自己的小天地并发展贸易关

系，改朝换代又有何妨。

因此，埃及式的逆来顺受是完全可能的，更何况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听任众神的摆布——他们历来都是统治者，尽管伴随着人类的争斗，众神之间也你争我夺，互不相让：恩利尔［在苏美尔神话中，恩里尔是大气之神。——译注］曾经统治乌尔；当巴比伦取得胜利后，巴比伦神马尔都克也战胜了诸神。后来，“亚述”这一国名也借用了公元前3000年原先苏美尔众神之一“亚速”之名。对一座城市而言，确立自己所信奉神灵的优势地位是树立自身威信的手段。但是，这并不能一下子剥夺其他诸神的职权：伊娜娜（Inanna，巴比伦未来的伊什塔尔）①代表生殖力，恩利尔支配宇宙的命运和秩序，阿努是令人敬畏的天主，而恩基（Enki）则既友善又智慧，是泉水和生命之水的施予者。

神灵众多，无所不在，主宰一切，并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在时光的流逝中将他们遗忘。他们睁着大大的眼睛，颇具催眠功效，恫吓人类，折磨人类；同时，如同埃及那样，不给人留下来生的希望。甚至连英雄吉尔加美什一想到死都感到心灰意冷。诸神拥有城邦、全部土地以及土地上结出的果实，他们让祭司们给人类分配土地，规定上缴给神庙的收成。最初，祭司、城邦国家和早期帝国的国王都是诸神的代言人。难道他们不是负责执行神的旨意，诠释神谕吗？神谕是神庙的秘密，而君主则常常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所困扰。如同他的臣民们那样，他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没有充分领会神的旨意。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观念，众神希望尘世秩序井然、繁荣昌盛。这也是他们自身获得幸福的保障。因此，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和君主的荣耀，修建沟渠、发展贸易、建设大型手工作坊、实行行政改革等——例如，汉谟拉比的改革——总要倚仗某位神灵给以灵感。这再正常不过了。

就这样，整个社会组织与宗教息息相关。假如没有神的要求，没有神的语言的翻译技能，没有时刻准备服从上天旨意的君王，谁又能活下来呢？因此，早期大型人类社会逆来顺受——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式的还是埃及式的——并非仅仅是杞人忧天。这相当于某种社会凝聚力，甚至可以说是对集体生活的义务感。一切都再好不过了。难道真是这样吗？凭着我

① 在苏美尔神话中，乌鲁克城的保护神，集母亲神、爱神、丰收神、战神于一身。在阿卡德神话中叫伊什塔尔。她法力无边，大慈大悲，相当于中国神话中的观世音菩萨。——译者注

们自身的感觉——虽然在这方面不太擅长——让我们对此保持一份疑惑吧。

二 河上小舟，地中海船舶

在整个“关系网”建立之前，地中海和东方的关系就处于失衡状态。事实上，地中海是根据两位巨人的要求和能力而建设起来的：一是埃及，它很难触及但是却直接触及地中海；一是美索不达米亚，在“上地中海”沿岸，它充当着叙利亚港口活跃的中间人。定期的海上航行只服务于达官显贵，要么停靠在幼发拉底河的门户——叙利亚，要么停靠在尼罗河口的众多劣港（但是业务繁忙）。埃及的黄金和巴比伦的白金造就了地中海的贸易，并在公元前2000年达到顶峰。

然而，一种工具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船，还有人员——即海员。这些并不是像变魔术似的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因此，其他一些稍显笨拙的航海活动是公元前2000年航海业发展的前提。这些活动要远远早于法老们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资料匮乏，有关地中海诞生的篇章晦涩难懂。海底考古的确为我们复原了几条沉船。但是，与陆地相比，保守而忠实的地中海却情愿守口如瓶。

诚然，我们对泛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乃至印度河上的早期船舶略知一二，但是，对于地中海、印度洋或红海上的船舶却不甚了了。这是因为地中海年轻，各大河流古老吗？这样下结论未免过于草率。内河船舶徜徉在人类最古老的历史长河中：它们立即在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的图集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航海活动则游离于早期文明之外。虽然这些活动可以追溯到蒙昧时代，但其早期发展阶段却是默默无闻的。然而，对于未来，最重要的是海上航行。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江河上

虽然底格里斯河水流湍急，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内河航运业却很早就得到了发展。一开始，冲气皮囊得到了应用，尽管只是在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遗址中才正式得到证实：一些士兵骑坐在羊皮袋上渡河去进攻某城市；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借助这些奇特的“战马”逃脱了敌人的追捕。或者，将大量羊皮袋绑在一起制成水筏：这就是巴比伦的“卡拉库

斯”（kalakkus，如同今天阿拉伯 keleks 那样，往往要用掉数百只冲气皮囊）——它能够顺流而下运载大量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将木筏和粗绳卖掉；然后，将羊皮袋里的气放掉，放在驴背上驮回出发地。

苏美尔最古老的圆柱印章（公元前4000年末）上描绘了一些用来运送祭祀队伍的船舶。由于没有桅杆，船的两端由绷紧的绳索高高地吊在水面上。船只用芦苇并列制成或编织而成，类似今天幼发拉底河上的小船——简易的藤柳筐，涂上沥青，上面盖一张动物皮。大约公元前3000年，类似独木舟的长条形船被用于猎杀沼泽地里的野牛。在乌尔的一座皇家墓葬中，一只银制长条形船模上配备了七张长椅、六副船桨。

船顺流而下时，用撑杆导航；逆流而上时，则用船桨驱动，或者由纤夫拉动。帆船也很快得到应用：要通过波斯湾和巴林岛乃至印度沿海地区来往，帆船和航海船舶是必不可少的。而自公元前3000年起，这种来往关系就已经存在了。确实，在当时，这样的来往不如内河航运那样发达。事实上，我们无法说清，由于自身的特性，美索不达米亚在何种程度上不得不从事“对内”贸易：下-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城市密布，需要上-美索不达米亚生产或从邻国进口的石块、木材、沥青、铜、酒和牲畜等。所有这些商品都可以沿水路顺流而下。从南到北，则通过船只或役畜运送小麦、椰枣，乃至芦苇（用于建造房屋），以及不久以后的制成品。

公元前2000年的文献对此进行了描述：在河上“兵工厂”制造船只、旅游、通商、由事故引起的诉讼案件等。一位汉谟拉比时代的省长催促下属加紧造船：“将篾匠……和（其他）普通工匠所需的粮食和椰枣通通交给他（制造商）”；“将制造驳船所需的木板和梁柱交给”拉尔萨同一工地的另一制造商。因此，当时，造船既使用芦苇也使用木材。船主自己不开船，而是把船租给船夫。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如果船夫粗心大意把船弄坏了，他必须给以相应的赔偿。假如他坐视船及货物沉没，他将被判处向船主偿还一切。除非他确实无法阻止失事船只沉没，在这种情况下，他只需归还给船主“一半的钱”。在这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就是类似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吗？

在埃及的尼罗河上

为了标明装备不同的各种大小船舶，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或图片资料使用了80多字的篇幅；而宗教本身也充斥着航海词汇和航海图片：这一切

无不显示内河航运业在埃及的重要性。众神以及法老们都有自己的船。亡灵奔向判官之旅被想像成惯常的河上之旅。

自前王朝时代起，各种船舶就已经在尼罗河上劈波斩浪了。在不列颠博物馆的某件陶器上，在芝加哥博物馆几乎同时代（公元前3500年和前3200年间）的某一个石罐上，在吉贝尔·埃尔·阿拉克令人惊叹的象牙刀柄上，均能见到带方型帆的小船行驶的情景，艏艉高高翘起，几乎呈垂直状态：这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芦苇船。而在埃及，常见的则是用纸莎草精心捆扎而成的长条形平底船：船的两端微微翘起，由于吃水浅，船可以在沼泽地的浅水中或沙洲密布的河道里行驶。这就是渔猎场景中使用的小船。在埃及墓葬墙壁上总能见到这样的小船——带着死者踏上终极之旅的小船。

埃及的内河或海洋商船或战船就是在这一船型的基础上设计发展起来的。木材取代纸莎草是一大进步。而在埃及，木材——特别是优质木材——极为匮乏。在使用的木材中，除了从黎巴嫩进口的雪松外，还有今天喀土穆地区的无花果树和刺槐。首先，将它们加工成一段段厚木板；然后，通过榫槽——有时用燕尾榫，有时简单地用皮带——将它们牢牢接合在一起。船底呈扁平状，大型船舶的弯曲造型令人想起流线型的纸草船。整条船没有龙骨，船体用横梁固定，曲度由一根粗缆绳实现，缆绳从前而拉到后面，可以随意伸缩。在原始船上，双足桅杆向前倾，后来被中心桅杆取代。后者用来支撑四角风帆。

自公元前4000年起，帆船业已出现。当时，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必须依靠拉纤或者划桨。然而，在埃及，北风几乎终年不停：于是，为了能够逆水行舟，帆船的使用自然而然地被推广开来。在埃及语中，有两个不同的词表示“旅行”之意：一是扬帆帆船的符号——这表示南方之旅；一是卷帆帆船的符号——这表示北方之旅，完全依靠水流的驱动力量。

蒙昧时代的早期海员

在地中海等地，“野性航行”首次向海上危险发出了挑战。观看“野性航行”一定是非常刺激的事（别指望了！）。我们将不断探讨这个问题，可惜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资料寥寥无几；即使有的话，要解读它们也并非易事。

早期航海活动起步较早，在公元前1万年和公元前7000年间。但是缺

乏确凿的证据。在地中海上的桑坦德附近——在大西洋上，或马拉加附近，在一些山洞里令人迷惑不解的图画中，一切都是模棱两可的。这是旧石器时代的小船吗？布洛耶（Breuil）神甫说，是的。然而，在掌握更多情况之前，这样下判断未免有些轻率。同样，对于某些地理学家提出的有关航海活动诞生的假设——有的说在红海，有的则认为是在小亚细亚沿海和爱琴海附近的大型岛屿之间，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加以证实。对于后一种假设，克里特或塞浦路斯似乎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大致在公元前7000年或公元前6000年——就有人居住了。这些早期居民只能走海路到达那里。因此，自公元前7000年起，原始水筏或小舟——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船舶的话——就已经存在了。很可能更早，而且不排除有一天，在从未与大陆相连的某个岛屿上，特别是在塞浦路斯（在那里，所有洞棚都没有进行过发掘）[①]，或许还会发现中石器时代乃至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到那时，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虽然证据不够充分，我个人仍然对野性航海活动的悠久历史深信不疑。首先，这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原始社会战胜了海水的种种危险。想想美洲印第安人的水筏吧，想想秘鲁沿岸灯心草捆扎而成的小船吧——当地人称之为 caballitos，意为“小驹”；渔民们正是乘坐这种小船到大海中去搏击风浪的！另一方面，早期的沿海航行似乎是地中海文明得以传播的惟一原因。

因此，有人认为，卡第亚（cardiale）制陶技术（用贝壳将图案印刻在尚未晾干的黏土上，当地人称之为卡第奥 cardium）的传播可能是原始沿海航行活动的成果——始发地或许是塞浦路斯后面的亚历山大勒塔湾。一些水筏从那里出发，到达希腊、意大利、普罗旺斯、西班牙、西西里、马耳他，乃至北非海岸。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岸线上，人们发现了一些“印花”陶器碎片——起初以为是公元前3000年的物品，但是近期的发掘表明，其年代要更加久远。确切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在色萨利发现的陶器碎片被认为是6000年末的物品。在西方，讨论一直在继续，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到底是公元前5000年，还是公元前4000年呢？[②]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何处，卡第亚陶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传播的年代相一致。

---

① 今天，在阿克罗第里半岛上，埃托克仑诺斯遗迹的发掘工作已经完成。（J. G.）

② 今天，“口径”测年法表明，是公元前6000年的作品。（J. G.）

两次殖民浪潮大概也是从海路缓慢进行的。殖民者很早就将小亚细亚初级农业（必要时，早期农业可能取道陆路，假如爱琴海大陆当时仍未消失的话）的秘密带到了处于前陶器时代的希腊。

叙利亚、埃及和红海

可以说，只有当人们抛开“世纪”的概念，并在埃及这只大钟上看时间时，才能找到一张令人信服的、可靠的纪年表。

很早以前，埃及船只就已经航行在比布鲁斯海岸和红海上了。确切年代，无从知晓。然而，自前王朝时代起，叙利亚的油品就已经装在非埃及人制造的陶器中运到埃及。人们深知，公元前2600年前后，埃及已经和比布鲁斯建立了重要关系，并通过比布鲁斯和黎巴嫩（雪松）、死海（沥青）、托罗斯（黄金）以及叙利亚（油和酒）建立了联系。在公元前3000年[①]中叶，穿梭于这些地区的船只称“比布鲁斯船”。但是，如果说埃及肯定资助了这些船，如果说船的造型是埃及风格的，那么人们无法确切了解，这些船是在比布鲁斯制造的，还是在埃及制造的，也无从知晓船员是哪个民族的还是两个民族的都有。

工程是浩大的。萨胡拉王声势浩大的远征船队（塞加拉墓葬画）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还有在尼罗河第一瀑布的大断层发现的埃利芳提纳岛周围怪异的大型构造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金字塔时代，即公元前25世纪，埃利芳提纳皇宫大臣们——可以视为企业家甚至资本家（假如从他们奢华的陵墓判断）——控制着尼罗河上直达首都孟菲斯的花岗石运输业。他们也控制着沙漠地区的采石场、直达尼罗河的石材运输、从科普托斯（Coptos）到红海上库赛尔的公路交通、西奈的绿松石矿、经由红海通往庞特（Pount）诸国以及叙利亚的海上交通。因此，在土路、海路和尼罗河的内河航运业之间，在上－埃及的花岗石和比布鲁斯的雪松之间存在着某种奇特的联系。这不禁令人想起公元前25世纪以后尼罗河三角洲繁忙的港口。可惜，一切都在河泥里销声匿迹了。

大约公元前1000年后，在第十八王朝，底比斯的一幅画展示了迦南人（当时叙利亚沿海的民族，腓尼基人的祖先）组装的船只以及将他们的土特产品卸到码头上的情景。尽管这些船比萨胡拉王远征比布鲁斯的船要圆，船的两端同样高高翘起，几乎呈垂直状，这些船无疑都是埃及风格的船。公元前1408年，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十八王朝）派遣船队漂洋过海

① 一译“千纪”。——译者注

远征“庞特国”——可能是索马里。这些船的船型更长，吃水更深，但是帆缆索具完全相同。桅杆矗立在船中央，撑起一面巨大的方型风帆；一对长桨充当船舵。100 年以后，在图坦哈蒙法老墓葬中，装备齐全、造型美观的陪葬帆船，船体及桅杆与当年远征“庞特国”的船只极其相似。只是船舵有所不同。

埃及—叙利亚风格的船几乎只依靠风帆行进。尼罗河小船普遍使用船桨，而这些大型帆船则只有在改变行进方向和进出港的时候才使用船桨。

然而，不要过分夸大埃及人的海上壮举。在尼罗河上倍感惬意的埃及人似乎不太想走海路。依靠尼罗河以及两岸的土地，埃及悠闲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它对远方的世界感兴趣，但并不热衷。或者可以说，有时候外部世界被它的财富所吸引。要不然，为何要到埃及去寻宝呢？对外贸易往往被驻扎在尼罗河口的外国人控制：他们中有迦南人、克里特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毕竟，到公元前 610 ~ 前 595 年的尼科时代，第一条苏伊士运河才开凿。运河将尼罗河的东部支流和廷塞特湖及亚梅尔湖（Amers）连在一起。希罗多德说，运河可以并列通行两条海船。当然，这是一部杰作，但是为时已晚。运河由大留士完工，或者说，大流士重新开凿了运河。同样，亚历山大大帝缔造了亚历山大港，从而给埃及配备了第一套大型港口设施。不过，自公元前 2150 年起，埃及人毫不犹豫地在阿斯旺尼罗河第一瀑布坚硬的花岗岩中开凿了航道。内河航运系统的过早发展和对海洋产生兴趣的滞后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真实人物：利凡得的地中海

除了从尼罗河三角洲到叙利亚公认的便利通道，埃及的船只是否控制着地中海的其他通道，这一点不能肯定。走海路，往返时间均为 4 ~ 8 天。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来自别处，并且只在利凡得海域的复杂环境中才能感受到：包括腓尼基海岸、爱琴海岛屿及沿岸地带、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等。

这里依然迷雾重重。有多少疑问和争论啊！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 2000 年，通过爱琴海以及利凡得各海，地中海曾被有效征服。然而，一旦人们想弄清这一胜利的真实情况、确切年代、技术原因和条件或船舶的类型时，一切都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人们能够收集到的图片是此次讨论的主要素材，对于它们的解释和假设常常大相径庭。

斯皮里东·马里纳托斯（Spyridon Marinatos）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

学家。经过多方考证后，他在1933年编制了一个69幅爱琴海古船图纸的目录。而在1957年，迪亚那·伍尔内（Diana Woolner）则对马尔他哈尔塔克西亚（Hal Tarxien）巨石神庙里一根柱子上38幅信手涂鸦的船舶雕刻进行了统计和复制。因此，我们手上掌握着一百多条船，可是我们还是失望了！这些设计图只不过是一些示意图，往往不够准确，对透视法则一无所知。发掘出来的几个船模大多是粗制的粘土模型。在这里，埃及的精确性荡然无存。除了马耳他刻在石柱上的"涂鸦"外，这些船有的刻在石罐和各种容器的侧面、有的刻在普通印章或圆柱印章上、有的刻在戒指上、有的刻在圣书字书板上。它们的年代往往无法确定，前后相隔最久的达一千多年。

然而，虽然历经若干个世纪，船的构造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毕竟，新式船一般不排斥老式船）。于是，所有的船都一道航行，仿佛能够同时到达埃及三角洲诸港，或乌加里特锚地卸下小麦——大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国王曾为忍饥挨饿的城市争取小麦而奔走呼号。

应当弄明白什么呢？当然是简单的事情。可能的话，首先区分艏艉，搞清楚船是朝哪个方向行驶的。假如有船桨，那么答案就在船桨的布局中。事实上，正如迈锡尼和克里特的先辈们那样，希腊人背对着行进的方向划桨；而威尼斯船夫则正好相反：他一般站在船尾，面向指定目的地。另一个标志是：假如船的宽度可以测量的话（有一个模型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前面部分，即船艏，是最宽的部分。因为船的后部变得越来越纤细。飞机也得遵循这一法则，以便避开空气涡流："鱼形体"理论就是这个意思。假如船上有舵（通常由一、二只可以随意转动的桨组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舵桨一般位于船的后部。

读者会注意到，爱琴海的船常常艉高于艏，但这并不绝对。要区分艏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船是否铺设了甲板？是全部还是一部分？船上有长椅、船桨、桅杆、风帆吗？爱琴海的船舶配备了大量船桨，所以并非总是配备风帆。每当配备风帆时，一般都是方形的，带横桁，有时侯是将两张方形帆并排绑在同一根横桁上，只有一根桅杆。这种双面帆的情况将逐渐消失，尽管庞贝的一条船还将提供一个较晚的例子。

船桨的数量一般是明确标明的（最多15支），这使马里纳托斯能够大致计算出某些船的长度（按两位桨夫之间的距离为90厘米计算）：拿最大的15桨船来说，最长可达20来米（包括不设桨的空间），而一般情况下

要小得多，因为大部分船至多只有5名桨夫。因此，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小船，船体修长而轻盈，只有一根桅杆，靠船桨行进，必要时也借助风帆。

然而，重要的是，早在米诺斯文化中期（公元前2000年前），人们就发现了一些无桨船，上甲板很完整（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一个粘土模型确定无疑地验证了这一点），比前面提到的船要宽得多。看上去像载货帆船，可能比克里特的其他船还要大。这是地中海船舶划分传统的最初雏形：带船桨的长船、快船、战船或海盗船；带风帆的圆形商船是理想的货船。柯克（Kirk）认为，在艺术作品中，长条船和圆形船发生阶段性变更，这不可能是出于当时的海员对某种船的偏好，而是由于艺术风尚的变迁所致。在爱琴海的船舶中，这两种类型的船都有。长条船一般船艏比较低，带冲角，船艉高高翘起；圆形船则艏艉一样高，顶端弯曲。这一点，我们在塞浦路斯晚些时候的精美陶器上仍然可以见到。

冲角、龙骨：可能的演变

冲角的来源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当在公元前1000年进化完成时，真正的腓尼基战船或希腊战船都将使用这一危险的武器——它位于船头，呈锋利的尖角状，使船的龙骨得到延伸。不过，种种迹象表明，冲角是爱琴海长条船发展的产物。

在众所周知的基克拉迪群岛的早期模型上（依据是锡罗斯岛的“煎锅”），船的前部奇特地伸展成一外部尖脊，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冲角。在一系列的草图和黏土模型中都可以看到这条尖脊。无疑，柯克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一方面，他认为这就是冲角的雏形；另一方面，他认为，当时并未将它设计成作战工具。这一块木板的最初用途（在艏艉均可突出）是为了加固船体构造，特别是在波浪中首当其冲的船头部分，而且每当船被拖到沙滩上时，船艏总是遭到损坏（这就是原始冲角向上弯曲的原因）。早期笔直或弯曲的冲角只是龙骨纵向木板的简单延伸，爱琴海船舶正是在这条脊梁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其独创性是显而易见的。埃及船既没有龙骨，也没有冲角，更没有外壳；公元前2000年，迦南的船舶依然如此。如果说克里特的圆形船两端翘起（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可能是模仿叙—埃船的产物，那么可以肯定，“通过给这种实用性很强的船添加基础部件——水下体和船壳，爱琴海人实现了一项伟大的进步。于是，一种稳定而坚固的船造出来了，并且一直

流传至今”。今天，在希腊沿海仍能见到。事实上，这是最早的真正适宜海上航行的运输船。

“腓尼基人”在做什么?

利凡得的中间人——叙利亚沿海的货运马车夫——长久以来习惯于埃及贸易，他们很快掌握了爱琴海船舶。对此，谁会感到惊讶呢? 他们目睹了爱琴海船舶的诞生：在拜访尼罗河三角洲港口很久以前，克里特船只就已经来往于叙利亚沿海港口。另外，若干世纪过去了，公元前2000年叙利亚的直接继承人腓尼基人没有接纳——也没有改装——地中海的任何一种船舶。

配备桨夫和冲角的爱琴海长条船，此时业已臻于完善。它首次出现在卡拉泰普（Karatepe）的浅浮雕上。大约公元前8世纪，卡拉泰普是古代赫梯诸国中腓尼基的势力范围。经过不断改进，爱琴海长条船成为地中海的经典船型。这应当归功于腓尼基人还是迈锡尼人呢? 在斯巴达的象牙制品上，在众多几何学般精确、带黑色画像的陶罐上均能见到这种船。在公元前5世纪，西顿和希腊的萨摩斯岛还将它作为货币的标志。希腊人还对这种船进行了改进：取消船甲板，从而大大减轻了船的负荷。于是，他们将船的长度延长到30-35米，桨夫增加到50人。修昔底德认为，这就是著名的篷特孔托（pentécontore）船，雅典船队大量采用了这种船，直到萨拉米斯战役爆发（公元前480年）。后来，古罗马的三排桨战船获得了胜利。

相反，依据希腊陶罐上违反透视法则的若干图案就断言，希腊人是“双排桨战船”的发明者，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一件资料明确无误地验证了相反的事实。在尼尼微宫殿四壁上，描绘了在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0年）进攻提尔城之前，腓尼基船队逃离港口的情景：两端对称翘起的圆形船和冲角尖尖的长条船并排行进。由此看来，爱琴海的教训已经完全被吸取了。但是，这是一项创举：此时，所有船只都有两排桨夫。这就是“双排桨战船”。人们可能夸大了这种船的重要性。柯克认为，后来晚些时候，在6世纪，希腊人很可能仿造了腓尼基的“双排桨战船”，但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更喜欢篷特孔托船：在海上，这种船要安全得多。而腓尼基人自己则在风平浪静时才使用“双排桨战船”，而且只在海岸线附近使用。

在同一时代，在沿海的木材运输——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程中，

腓尼基人也使用了这种来历不明的船舶。希腊人称之为“马船”（hippoi），因为这种船的船艏有马头饰。亚速巴尼拔国王正是乘坐这种船在底格里斯河上狩猎；而且，从在西班牙阿利色达发现的一件腓尼基首饰判断，这种船可能载着腓尼基人跑遍了整个地中海。另外，斯特拉博（Strabon）认为，公元一世纪末，地中海仍在使用“双排桨战船”。仅仅在50来年以前，加的斯沿海的渔民依然喜欢在船头雕刻马头。

马耳他之约

到目前为止，马耳他哈尔塔克西亚第三座神庙里的“涂鸦”对我们用处不大。要解读它们并非易事。海员们在小教堂（可能在公元前1500年后废弃）[①] 的石柱上画了一些还愿物。在经历了旅途的颠簸或从海上遇难中死里逃生以后，他们试图向某位母亲神表达感激之情。神庙位于后来成为瓦莱塔城的大型天然港附近。每逢秋天或冬季来临遭遇恶劣天气时，这里便成为海上探险船只的避风港。

可惜，一部分“涂鸦”已经模糊不清，层层叠叠：每一位信徒都将船画在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先到者这样，后来者亦如此。而在石灰石上，线条洁白、明亮的新画瞬间使得先前的旧画变得模糊起来。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画老画全都混杂在一起。

总而言之，这40幅画说明一点：它们证实，自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起，航海活动已经触及马耳他；而这一次，我们不再需要凭借任何想像。无论是否受到了大海的虐待，一些船到达了马耳他附近，并停靠在岸上。在美好季节旅行而又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的船只不一定加入还愿者队伍。然而，它们的存在同样是确凿无疑的。

有关船的型号，我们可以展开一番讨论。必须记住一点，那就是：这些船种类繁多。迪亚那·伍尔内（Diana Woolner）研究并出版（1957年）了这些“涂鸦”。和他一样，我见到一些爱琴海、克里特和迈锡尼的船舶，艏艉上翘。这一首个重大发现是自然而然完成的。和迪亚那·伍尔内一样，我还发现，至少有一条、甚至几条埃及“型号”的船。但不要就此断定，埃及船曾经在马耳他抛锚。爱德华·梅耶（Edouard Meyer）曾经设想，埃及船只曾经在克里特靠岸。今天看来，即使这样的假设都非常值得

① 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500年。（J. G.）

怀疑：在马耳他岛发现的埃及雕刻或陶罐很可能是由克里特船从埃及本土或叙利亚沿海带回去的。埃及人出现在马耳他，这一点尤其难以想像！但是，在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叙利亚沿海的船舶都是埃及型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见到。众所周知，这些船和埃及有来往，而且在利凡得开展的贸易异常活跃。在爱琴海船舶的陪伴下，它们也能够开始探索西方诸海域。这里，和地中海西部关系的难题重新提了出来。[①] 倘若公元前2000年初期或中叶，爱琴海人和叙利亚人曾经在马耳他登陆，那么他们大概不会就此止步。难道马耳他不是位于贸易活动的中心地带吗？它主要接受潘泰雷里亚和利帕里群岛的黑曜石，在意大利南部也有，直到卢切拉。难道在利帕里群岛和意大利没有发现迈锡尼的陶器吗？

马耳他的船舶之约并未削弱这些考古成果，恰恰相反。它也和巨石建筑这一奇特现象催生的一般性假设相一致。

三 巨石建筑的传播是否可以诠释原始地中海？

在这里，我探讨巨石建筑艺术这一难题，不仅仅是出于简单描绘奇特而神秘的世界的乐趣。捉摸不透的原始地中海更让我魂牵梦绕。读者已经看到，追寻早期船舶并不能重新把握地中海的源头；历史的潮水固执地将我们推向更晚、更明确的年代。巨石建筑能让人们重温往事吗？

可惜，一切毫无激情的巨石艺术研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失落的梦，一个可能永远寻不到答案的问题。更遗憾的是，整个地中海与一个普遍现象有关；这一现象的相似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一现象表明，贸易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但是，资料并不确凿。

这只是一个问题吗？起初，建造巨石建筑并非“难于上青天”——这些大石头，乃至巨大无比的石头，使用前未作任何加工，是某种奇特“文化”的象征。而且，象征总是必须和文化的相同成分比肩而立。

至于巨石建筑本身，这一术语来源于法语——更确切地说是布列塔尼语。对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蒙伊”（menhirs）一词意为垂直矗立的石头；“多曼”（dolmens）一词则表示上面覆盖石板的若干立石形成的墙。读者肯定也知道，布列塔尼一排排、一圈圈（cromlechs）的“蒙伊”，或

① 假如哈尔塔克西亚神庙里所画的船舶年代比较近的话，那么大概是公元前3000年。因此，从上述“涂鸦”看来，公元前2000年和爱琴海来往的说法年代有误。（J. G.）

者英国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巨石阵（Stonehenge）令人叹为观止——尽管该建筑群建于公元前 1700～前 1500 年间，如今已经残破不堪：蓝色巨石组成若干个同心圆，上面覆盖着一些石板，从而保持不倒——所有这一切都是从 280 公里以外的山中采石场拉来的。凯尔特人的历史以及德洛伊教的祭司崇拜史总是与这些巨石联系在一起，因为巨石传统是神圣性的保证。只是在最近几年，人们才承认，那是某种广泛得多的文化的象征，而且很可能起源于地中海。

这种文化的其他特征是多室集体墓葬：不论上面是否覆盖着仿穹顶——即一些石板稍稍向前延伸，最后在顶端汇聚；不论是否有长长的墓道进人。但愿通晓古典考古学的读者能回想起迈锡尼墓葬——它被误认为阿特雷的宝藏：这是一座圆形陵墓（tholos），墓前有墓道（dromos）。显然，这些集体墓葬的外形和总体构造五花八门。

还有一些重要特征是：

（1）巨石建筑与母亲神崇拜有关。其形象千变万化：在简化的面孔上，双眼占据特殊位置；在石碑上，面孔若隐若现，双臂弯曲成圆弧状，勾勒出人体模样，等等。

（2）正如利凡得的西班牙个例所展示的那样，巨石建筑通常和铜或青铜的冶炼密切相关。

（3）在西方，巨石建筑也和某种农业活动有关，后者往往先于前者。因此，大体上，在定居、扎根村庄和新崇拜以及金属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金属冶炼技术由移民（可能是流动“工匠”）引进的，或者通过简单的模仿，从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心向四周传播。[①]

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事先就能猜到破解的难度：年代不可靠——而这是史前史领域的游戏规则；文化不完整，需要时缺这缺那，掌握的材料又似是而非。

---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巨石建筑/母亲神/冶金属于源自地中海东部的同一个复合体。这一大杂烩理论现在已不再流行（让·吉莱那著有《共享地中海》、《文字产生之前的地中海，公元前 7000～前 2000 年》，巴黎，1994 年）。它们出现的顺序依次如下：

——早期农业社会及其宗教（在近东是公元前 8000～前 7000 年；在地中海西部是公元前 6000 年）；

——巨石建筑：最古老的巨石建筑位于地中海西部，大约公元前 4500 年前；

——冶金：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早些（大约公元前 5000～前 4500 年），西方晚些（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前 3000 年）。（J. G.）

主角是海水

然而，一个整体特征却是不容置疑的。由于成千上万的巨石建筑已经确定了位置，因此可以在世界地图上标明一大串黑点：从暹罗湾、印度或马达加斯加直到欧洲北部。在这个年代不连续的广阔地域，假如我们只关注地中海和欧洲，我们将得出如下结论：传播是通过航海活动进行的。首先，这些建筑位于沿海地区，特别是岛屿：马耳他岛、撒丁岛、巴利阿里群岛、英国、爱尔兰岛、西兰岛（丹麦岛屿，在那里，人们发现了3500座巨石建筑），或者北非、普罗旺斯、西班牙和布列塔尼沿海地区。在布列塔尼，巨石建筑密布，可能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①]，由爱尔兰的淘金活动和康沃尔半岛的淘锡活动带来的——康沃尔半岛起着不可或缺的中转站的作用。地中海的有关地区令人想起卡第亚陶器地区。后者要小得多，古老得多（早大约2000年）。

显然，巨石文明是通过地中海的漫漫长路传播的，而不是像人们先前认为的那样，是在被马背上的民族征服之后。地中海恢复权利后，我们情不自禁地将发动机的角色赋予地中海。为此，我们有巴黎专家大会（1961年）作担保。一切再次从近东的水域和陆地谈起。斯泰克利斯（M. Stekelis）教授的发掘工作测定，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蒙伊”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前5000年间，从而在掌握更多材料之前，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传播中心。

倘若事情果真如此，从总体上看，巨石文化遗产从东边移到了西边。但是，整个过程肯定不是定期进行的，其源头更不是惟一的。因此，只有当人们确定了每一地区巨石建筑的年代[②]以后，才会将注意力放在整个过程的演变模式上——如果有一个过程的话。

马耳他的神庙和“多曼”

对于马耳他巨石神庙的年代乃至岛上开始有人居住（可能从西西里岛

① 碳十四测定法将“西方”，特别是大西洋的巨石建筑艺术大大往前推到更古老的年代。在这些地区，巨石建筑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与冶炼技术毫无关系。（J. G.）

② 自1969年起，人们对许多巨石建筑的年代进行了测定。西方的巨石建筑和地中海地区的同类建筑似乎毫不相干。看来，这一现象是交往或者融合的结果，具体视情况而定。（J. G.）

开始）——为数不多的卡第亚陶器残片说明了这一点——的年代，专家们各执一词。毕竟，通过发掘，人们发现了非常古老的集体墓葬，死者的骸骨混合在一起，上面依然覆盖着赭色画，犹如人血。哈尔—萨弗里耶尼庞大的地下墓葬要晚一些。它是在 1910 年发现的。那儿长眠着 7000 多具骨骸，骸骨遍地都是，仿佛是乱扔造成的。

在马耳他，真正的神庙也出现得很早。这一独特之处使马耳他在巨石建筑史上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保存下来，各自千差万别，它们将巨石和普通石块结合在了一起。由于没有确切年代，贯穿全岛的后续发掘工作使这些神庙得以分门别类。穆加尔（Mgarr）最古老的两座神庙呈三叶草形状，包含三个椭圆形房间——这一点在后来的神庙里总能见到，尽管神庙结构渐趋复杂，并很快发展成为大型建筑。

冈提贾、哈吉亚克姆、梅耐德拉的神庙，哈尔塔克西亚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群都属于这种情况。实际上，哈尔塔克西亚建筑群包含好几座首尾相连的神庙，位于距离今天瓦莱塔城不远的地方。

埃文斯（J. D. Evans，1959 年）的假设颇有道理：开始的时候，这些神庙是一些原始墓葬；后来虽然用途改变了，但仍然用于祭奠亡灵，通过赎罪仪式和祭品为自己祈求好运。这样一来，扑朔迷离的哈尔塔克西亚神庙檐壁之谜也就迎刃而解了：牡羊、猪、山羊等均为祭品！这里供奉的是母亲神，已经发现许多她的雕像（和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那些简单的“蒙伊”像截然不同）；时代不同，雕像的风格迥异。然而，从雕像风格和一些装饰图案（如螺旋线）看，年代最近的神庙（公元前 2000 年上半叶）显然受到爱琴海的直接影响。

大约公元前 1500 年①，马耳他神庙文明突然被入侵者破坏殆尽。他们可能来自意大利南部。同样，我们刚刚谈到过的船舶“涂鸦”也不会晚于公元前 2000 年中叶。但是，这些新来者毁掉了第一个岛屿文明，以自己的方式重新使用哈尔塔克西亚神庙的废墟。他们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那就是：他们来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是铜制兵器。和早期大型巨石神庙的建设者们相比，这一优势可能弥补了他们在数量上的劣势。这些建设者们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既没有留下陶器——取而代之的制品要粗糙得多——也没有留下技术。然而，后来者本身就是巨石建筑文化的一部分。正是他们使岛

① 据现在考证，哈尔塔克西亚的神庙废弃于公元前 2500 年前后。是否是被人为毁坏的，这一点还不能肯定。

上布满了小型“多曼”墓葬，相当粗糙。在这些墓葬里，人们发现了他们占领时期典型的陶器。

在巨石建筑艺术链上，马耳他也许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有人曾经屡次这样说。不过，难道马耳他巨石的繁盛、奇特和雄伟不曾引起过我们的震撼吗？毕竟，毫无迹象表明，意大利南部（巴里、奥特朗托、塔兰托）和西西里在这一原始文明中没有发挥同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的作用。在那里，在岩石里开凿的大型集体墓葬留下了大量遗迹（和青铜一起）。迷失在地中海中的小小的马耳他岛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巨石艺术，而对金属却一无所知。这一点太特殊了，因而马耳他无法成为巨石文化的中继站和集散中心。而在过去，人们有时乐于坚持这一观点。

令人惊叹的撒丁岛

撒丁岛同样奇特而怪异，值得人们驻足片刻。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岛屿，和相临的科西嘉岛一样长期无人居住。它比科西嘉更加深入地中海及其自身的陆地，堪称各个时代地中海最保守之地。和马耳他一样，撒丁岛巨石建筑艺术也曾走过弯路，也曾实现超越。

从岛上有人居住开始，集体墓葬就存在了。可能不早于公元前 2250 年。[①] 神秘的利穆里墓葬（以立石和精美石器为标志——无疑要稍晚一些）和岩中墓穴是岛上最早可以考证的文化——奥芝里（Ozieri）文化——时期的遗迹。一切都将这些墓葬和东方文化联系起来：刻在岩壁上的公牛头，基克拉迪式偶像，皮蒙特利的螺旋图案。螺旋图案象征多产，在地中海东部非常流行：从苏美尔到特洛伊，到迈锡尼，再到叙利亚。但是，西部的影响，特别是来自法国南部的影响也参与其中。一些进口物品证实了和西西里以及不列颠群岛（可能是爱尔兰）的来往关系。

稍晚一些，“多曼”墓葬（后来演变成大型集体墓葬，又称“巨人墓”）几乎同时[②]出现，然后是第一批“努拉吉”（nuraghi）村（大约公元

---

① 自 1969 年以来，这一年代已经被推翻。在撒丁岛，自公元前 1.3 万年起，就有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科尔贝都 Corbeddu 岩洞遗迹）；人类出没的遗迹可能更早。公元前 6000 年，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占领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就像地中海西部的其他地区一样。（J. G.）

② 这几行写于过时的后期纪年时代。当时，全部前后连续的数据都相互矛盾。新纪年史要长的多，它测定奥芝里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 4000 年，“多曼”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 3000 年，巨人墓的年代是公元前 2000 年，“努拉吉”村落的最早年代是公元前 1500 年。由于经常使用和不断改造，墓葬一直延用到罗马化时代。（J. G.）

前1500年)。这是撒丁岛典型的塔形堆积物，和科西嘉的“托里(torri)”非常相似。这些塔形建筑物都保存得相当完好，在岛上已经发现了6500座，而且肯定还有。它们的名称可能来源于前印欧方言，意思是“堆”或“空洞”。起初是哨塔和防卫塔，用不含砂浆的石块在平台上堆积而成，呈圆圈形，首尾相连，圆圈之间越来越紧密，从里面看犹如圆形陵墓(tholos)，穹顶突出，坡度陡峭。建设一直持续到被罗马征服的年代(公元前238年)，乃至更晚。就这样，“努拉吉”存在了1000多年。在此期间，和马耳他的神庙一样，由于不断添加新东西，“努拉吉”变得越来越复杂：四周很远处有防护墙，其他塔楼也起到加固作用。公元前6世纪，随着迦太基人的入侵，它们不得不抵御各种战争机器的袭击。在“努拉吉”墙角，人们发现许多抛射物。不断整治和完善的结果是造就了巴鲁米尼的庞然大物。那里的最新发掘表明，这些庞然大物前后至少经历了两代。

在这些厚实的石头建筑里，居住着防御者、家庭、部落和酋长，有时还有商店。而谜一般的宗教生活，则在“巨人墓”四周、然后是神社(带水井)或神庙(带围墙)里进行。这些场景令人联想起马耳他的情景，但是他们并未照搬照抄。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场景出现的年代要晚得多。但无论如何，两者仍属同一类型。

和马耳他的情况相反，撒丁岛对金属早就有所了解。在奥芝里墓葬里发现的一些物品，可能是进口的；因为经过分析表明，铜来自西班牙、法国南部以及爱尔兰。接着，本地工作迅速在这个矿岛上占据了相当的位置。下面我们还将谈到这一点。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与神庙(带围墙)以及“努拉吉”里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金属熔炼厂到底是在哪个年代建立起来的。

从西班牙利凡得到大西洋

巴利阿里群岛、梅诺卡岛、马略卡岛(公元前636年被迦太基人占领之前，伊维萨岛一直无人居住)之旅——即“从塞浦路斯到迈锡尼，途径克里特、爱琴海群岛”、马耳他岛，特别是撒丁岛——发现与地中海类似的遗迹。可惜的是，马耳他和撒丁岛的墓葬和“城堡”尚未经过系统的发掘。这些“城堡”——当地人称之为“塔拉窑”(talayots)——呈圆形或方形，一共有足足上千座。可能是公元前1000年的作品。然而，它们有时间演化、发展成“城堡”和房屋，整个建筑被厚厚的围墙所环绕。例如，卢什梅约(Luchmayor)附近的卡波科维尔(CapocorpVell)村长达200米、

宽40米，围墙厚达3米，有7座“塔拉窑”：三圆四方。谁能弄清这些巨石建筑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内涵呢？

在西班牙，巨石艺术更为奇特。从阿尔梅里亚到埃布罗河乃至略夫雷加特河，地中海沿海地区根本没有丝毫巨石建筑的痕迹。巨石艺术的传播似乎是从南方开始的，突破口是著名的洛斯米拉（Los Millares，公元前3000年中叶）[①] 考古站附近的狭窄地段。跨越这个大门之后，新来者向大西洋推进，直至遥远的葡萄牙：那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初。考古学家证实，我们这里谈到的是入侵者，因为他们的遗骸——在公共墓地里发现大量这样的遗骸——表明他们属于另一人种，而非当时遍布西班牙和北非的种族。

所以，这是一些新人类，而且他们通晓金属冶炼术：墓葬中的家具显示，铜和石头同时得到了使用，金属或燧石匕首、戟、令人惊叹的箭头等。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新来者迫不及待地涌向阿尔梅里亚、哈恩（Jaén）、西拉莫雷纳（SierraMorena）、下－瓜达基维尔矿区。这是他们“在内地”的惟一居住地。这是一些单列地区，他们占据的地方仅限于沿海地区。是采矿活动还是航海活动创造了他们的财富？很可能两者都有。不管怎样，城市的存在——这在当时的西方是绝无仅有的——证实了这一繁荣景象。例如，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米拉今天的无人居住地带（desplobado），我们应当想象得出来，在当时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邦，有城墙和侧翼防御“城堡”，3公里长的水管，大量公共墓地。当时的风俗是，在王公贵族或杰出酋长的周围，埋葬他们的整个家族。这表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家长制社会和贵族社会”。

这些集体墓葬表明，入侵者是庞大的巨石家庭中的一员。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深受东方的影响。[②] 在洛斯米拉的墓葬中，有一条走廊通向圆形或椭圆形的墓室。墓室用巨大的立石板建成，立石板用黏土黏合，上面覆盖有伪装穹顶——如同公元前2000年上半叶爱琴海沿岸的某些托洛伊（tholoi）那样。有时，在墓道入口处前方，有一组涂成红色的圣石，和比布鲁斯的圣石非常相像。其他大型墓葬——例如：安特阔拉或者梅里达附近拉卡腊的墓地——更多地采用了“多曼”风格的笨重立石；有的则在地

① 巨石艺术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传播的观点已经过时。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古老的“多曼”位于大西洋一侧而不是地中海一侧。一部分巨石建筑是地中海以西地区创造的。（J. G.）

② 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巨石建筑来源于入侵者或受到了东方的影响。总之，和爱琴海进行对比是不实之举。（J. G.）

下岩石中（在西西里岛也有，在爱琴海非常普遍），都是模仿带假穹顶和走廊的那种墓室。马丁·阿尔马格罗·巴什（MartinAlmagroBasch）毫不犹豫地将这一类建筑及其殉葬的陶器、武器或用单线条勾勒的偶像与基克拉迪文化（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迈锡尼时代末期）联系起来。我们再一次发现，在巨石文化中夹杂着爱琴海和叙利亚的影响。而在公元前2000年具有国际性的利凡得诸海中，爱琴海和叙利亚本身来往甚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会见到。

讨论是公开的

我们跟踪巨石问题没有超出地中海的范围。这一问题是隐讳的、复杂的、有争议的。正如一位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这是不是在追踪幽灵？一切假设仍然是允许的，而专家们则会不失时机地指出自相矛盾之处——假如这些假设几乎都是提示性的话。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有人白纸黑字地向我们证明，布列塔尼的“多曼”和“蒙伊”的年代是公元前4000年，而且是西方所有巨石建筑中最古老的建筑[①]，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然而，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为了排除“东方来源说”以及巨石文化的统一性（依据是：现存的编年史——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确实没有勾画出明显的自东向西演进的过程），这一理论断言，“构思简单、技术简单”的巨石文化是在欧洲和地中海的“许多地区”孤立地诞生的，彼此之间没有经过任何交流。将巨石从280公里远的采石场运到巨石阵的技术难道真的这么简单吗？这一想法难道真的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吗？建造异常庞大的集体墓葬（G. 巴雨不无道理地指出，这是“多曼、地下墓葬和托洛伊文化”的主要特征）难道是巧夺天工，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的吗？

传播涵盖巨石艺术并超越巨石艺术的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或均一。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传播活动是在一、二千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进行的，波及范围无论在地理方面还是在人文方面都存在天壤之别。不过，种种迹象表明，某种形式和宗教仪式是从海路传播开来的。这排除了当时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可能，并再次提出了传播者的来历问题。他们是宗教的创立者——传教士吗？遍布马耳他的神庙、丧葬崇拜执着地述说着宗教生活。然而，又有哪一个民族起初不是信教的呢？他们是来自东方寻找

① 碳十四测年法正好能做到这一点。“口径法”甚至将若干活动的年代一直倒推到公元前5000年。（I. G.）

新矿（锡矿和铜矿）的探险家吗？我情愿相信这一种说法，尽管马耳他早期文明对金属一无所知这一重大的例外情况。我乐意相信这一点，是因为冶金工人以及流动工匠们乃是近东历史上的知名人士。他们四处旅行——没有比这更肯定的了——自公元前3000年初就开始了。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近东的各大城市里，金属手工业通常掌握在外国行会手里。这些行会并不是在城市里创立的，它们严守秘密，生怕泄露给他人。公元前2000年前夕，从小亚细亚到伊朗的最古老的青铜国家似乎遭遇了严重的危机（社会动荡、自然灾害抑或当地矿藏枯竭？），一下子将大批冶金工人推向南方：他们纷纷向南方移民，随身携带着相同的技术和相同的物品：大头针（形似狼牙棒）、开口的金属项圈、开口的手镯、双圆锥形珍珠或形似中空橄榄的珍珠、三角刃匕首等。这些“戴项圈的人”（克洛德·A. 萨弗这样称呼他们，可能是为了纪念乌加里特的两尊银像，每尊雕像的颈部都戴着金项圈）取道亚得里亚海尾随到达乌加里特、比布鲁斯、巴勒斯坦、埃及、塞浦路斯、克里特和中欧。[①] 难道是由叙利亚或克里特海员和“戴项圈的人”组成的联盟充当开路先锋，前往西方、撒丁岛、西班牙和中欧各个矿山吗？

另外，假如他们就是巨石建筑的传播者，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答案或许过于美妙了。可以肯定的是，一条海路已经开通，而且跟往常一样，在相同情况下，各种影响都在起作用。同样可以肯定，西方矿山和冶炼业的苏醒为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从事航海活动拉开了序幕。腓尼基人的航海活动远非漫无目的地四处乱闯。他们的活动立刻与撒丁岛和西班牙矿山的开采活动联系在一起。早在腓尼基人之前，这些早期移民就充当起殖民主义者来了。或许，殖民传统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流传下来的。

① 今天，这样的人口流动受到了质疑。（J. G.）

第四章　大一统的世纪：公元前2500～前1200年的利凡得海域

要了解公元前2500～前1200年或前1000年间流逝的1500年——大致与中东的青铜时代同步——显然需要统而观之，放过诸多不明之处。数十年来，相关知识惊人地增长，然而，对于如此宽泛的时间跨度，其间难免留下巨大的空白。悬而未决之处不胜枚举，而每每了解一种确凿的事实，便如同连锁反应一般，常常推翻我们认为业已获得的认识。如此这般，我们又该如何描绘出这段历史的整体景象呢？想想1915年捷克博学家贝德里什·赫罗兹尼（Bedrich Hroznyi，1879～1922）译解出博阿兹柯伊赫梯人档案中楔形文字意味着什么——他确信赫梯文字归属印欧语系，并因此取得了成功！另一事件尽管未能对地中海历史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却同样轰动一时，这便是：1969年9月3日，新闻界公布于世的印度河文明语言得以破译——据此，人们发现它实为达罗毗荼人语言，因此属现今的德干方言。[①]

此类事件瞬间将已有的解释全面推翻，得出的结论也今昔有别。总是让人在精神振奋，感到即将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的时候，却又要一切重新开始。克里特岛绝妙的生活风貌画册唾手可得，克诺索斯的《巴黎妇人》和《百合王子》一如往昔，而我们早已不用亚瑟·埃旺（Arthur Evans）或古斯塔夫·格洛茨（Gustave Glotz）的眼光去看待它们了。

一　发展中的统一

近东地区的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3000年中期，并大致于公元前12世

① 此说为时尚早，印度河文字并不包括在内。——译者注

纪伴随着海上民族的动荡而宣告结束。记录这段历史很容易带有悲剧格调：侵略、战争、掠夺、政治灾难、长期经济瘫痪、“第一次民族混杂”……然而，运用武力或智谋对抗文明发达地区的敌对王国以及群山、大漠中野蛮好斗的城市，这一切统统在一场创造性活力超乎其上的整体运动中被一种跨越疆界的文明所征服。在利凡得海域的陆地及海洋上，某种大一统的局面由此形成。记录青铜时代的历史既可带有暴力充斥的悲剧性色彩，又可烙上各种关系的印记——已有的商业关系，外交往来，特别是文化交流。

这个不断扩展的文化世界能否将整个地中海划归版图呢？在海上民族发动侵略的前夕，这似乎正是大势所趋。这是一场灾难性的侵略，不仅在于它将造成巨大的破坏，还因为希腊与爱琴海将脱离中东地区，从此与其一分为二，泾渭分明。这一再也无法修复的裂痕孕育着未来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①]

自公元前2000年起，青铜促进了交流

在各种交流取得建设性进展的过程中，青铜冶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一技术被人口密集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掌握之后。

正如农业产生之初一样，冶炼术的创新（甚至此后的钢铁冶炼）也并非诞生于特权国家内部。铜的融化及其合金自公元前4000年起在兴旺繁荣的北方国家得以发展，如西伊朗、高加索山脉、亚美尼亚、小亚细亚。毫无疑问，那些使得特洛伊 II、阿利夏尔、阿拉萨·霍郁克、灰山（Kültepe）的王宫遗址以及阿思特拉巴得、泰佩希萨尔、迈科普（外高加索）的珍宝重见天日的挖掘就地标识出青铜器使用的大致范围。在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内的整个近东地区，任何一地发现的冶金制品都不及阿拉萨墓群中的丰富。例如，约公元前2300年，那里已有金、银、铜、青铜，甚至铁——此种矿石十分稀有，较之其他更显珍贵——总之，各种金属应有尽有。

在美索不达米亚，青铜器出现于约公元前2800年，而在埃及，则为公元前2000年。然而，就交换的发展而言，重要的是青铜器的使用得以推广，确切地说即公元前2000～前1500年，始于美索不达米亚，终于埃及。

① 今不做解释。关于公元前12世纪危机，后可参见：W. A. 瓦尔德，M. S. 儒科夫斯基著《危机年代：公元前12世纪多瑙河外至底格里斯河》，迪比克，1992。——（P. R.）

在图特安哈门（约公元前1350年）的墓穴中，铜制品的数量还远远超过青铜制品！

这一渐进的传播，如同青铜制品的重生，与我们曾经提及的小亚细亚冶金学家们的大批迁移密不可分。他们来到乌加里特，停留大约两个世纪直至公元前1700年；约公元前2000年来到重要的“冶金”中心比勃洛斯，精湛的金银丝嵌花术（将金丝线镶嵌于铜或银上，乌银镶嵌黄金）也从这里发展起来；此后又来到了塞浦路斯、巴勒斯坦、埃及以及中欧地区。富庶的国家从这一强大的传播中获益匪浅。青铜器可用以制造各种进攻及防卫性的武器装备。若是没有这些工具，国家及尊贵的王子将不复存在。青铜器成为物质文明的根基——正如铜和铸铁依然是当今文明的基础一样。因此，铜矿和锡矿备受各国觊觎。它们散布于世界各地，储量相对稀少，常常要从遥远的地方获取。富国享有绝对的优势通过经济手段获得这些矿产，因为他们能够利用长期以来建立在被称做王宫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流通网络。

事实上，将一切可为利用的资金来源——实物赋税、各种徭役、苛捐杂税以及关税——引入王宫银库的正是当时的君主们，他们控制着仍以物物交换为主的子民们的日常生活。也正是他们在手工作坊中组织生产用于对外交换的手工艺品。此种“王宫”体制还得到进一步发展，交流也愈加活跃。王宫不仅是最为重要的，通常也是惟一的经济单位；君主则是首当其冲的生产者、金融家和客户。一切交流的组织与发展也正是服务于君主及其身边一小股亲信势力。从经济角度讲，拥有不动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寺庙也是“王宫”的一种，甚至有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还领先于王宫。公元前2000年，这种经济集中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存在于赫梯王国和克里特。在这些国家王宫奇妙的腹地，盛满油（据埃旺计算，可存放70000升）或酒的巨大双耳尖底瓮本身就在向克诺索斯的参观者们讲述着……在乌加里特，王宫不断扩大以满足城市和君王们的财富及其“机构”发展的需要。所罗门国王会拥有自己的“王宫”。

因此，任何国家都拥有王宫，任何王宫都离不开国家。伴随着对广大农民及手工业者极为严酷的剥削，这一体制得以产生。随着经济的发展，依存关系也日益加强。不久，各国为了维持其奢华的生活并增强自身实力，纷纷建立戒备森严的补给区。正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出现，私人资本主义也在严格意义上的皇宫活动之外很快发展起来。安纳托利亚、阿拉伯半

岛（经由巴林群岛）和塞浦路斯的铜；伊朗、或许还有托斯卡纳、西班牙或英国的锡，均以毛坯或半成品（甚至成品）的形式流通。我们在西奈半岛发掘出就地挖建的原始冶炼炉。铜矿石在被运往尼罗河之前先在这里经过处理。1960 年，在土耳其海岸的盖利多尼亚，海下考古学家们在一艘约公元前 1200 年航行经过此地的船只上发现了装载的 40 块“牛皮”形铜锭，上面印有塞浦路斯铸造者的标记。

这一交流网络不断扩大，从马耳他到伊朗，再到突厥斯坦和印度河一线生产铜、锡和琥珀的北方国家，并一直蔓延到努比亚。埃及在那里毫不留情地开拓出一块殖民地。沙漠商队和海上船队遥相呼应。在欧洲北部的海域中，穿梭往来的大小船只或许此时业已扬起了威尼托人很久以后被恺撒历尽艰险在海上征服时所悬挂的铜帆。此外，地峡公路自北向南纵穿狭窄的欧洲大陆，并延伸至地中海各地。红海也受到同样的带动作用。公元前 16 世纪底比斯墓穴中的一幅图画为我们描绘出当地沿海航行的情形：当地居民将其商品运至某埃及港口，或许正是地处始于尼罗河科普托斯并通往大海之路尽头的科塞尔。就个人而言，令我大感吃惊的是这些大概由柳条编结而成的圆形小船——此种形状的船只在今天的阿拉伯国家依然可见——船帆呈现三角形，经过画家们的精心修饰焕然一新。三角帆也正是印度洋上的一大特征。大约 2000 年之后，这种异域风格的三角帆经伊斯兰国家传人地中海（它们与此地相得益彰，以至于最终相对于大西洋而言，三角帆常被视为典型的地中海或所谓的“拉丁”风格）。因此，底比斯的这幅绘画也暗示出地中海与从古波斯湾到印度一带季风盛行的海域生活间的关联。

货物在陆地、河流和海洋上的流通得益于有利的环境。但并非既无海盗也无陆匪，而是这些长距离的交流表明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之间配合默契。在美索不达米亚，货物在城市间的流通就如同一场组织缜密的比赛当中的橄榄球。例如，从亚速到卡内什（灰山），浩浩荡荡的黑驴商队运送布匹（购于南美索不达米亚）和锡矿，返回时又从安纳托利亚满载铜矿。在行进途中，他们从未受到拦截或阻碍。这一时期（公元前 2000 年初）巴比伦的一份文献中曾提及或许付钱才可获得的“皇室流通许可”，路上设有驿站和“小旅馆”。路途依然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以至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在出发之前要向太阳神沙玛什祈求庇护：“对于路途艰难的旅行者，请给予他帮助；对于漂泊海中畏惧风浪的人们，请给予他慰藉……”

美索不达米亚的优势：道路与货币

美索不达米亚地处多条道路交汇点，毗邻伊朗，濒临印度洋，深入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带，卡帕多西亚的亚速商人最具代表性。然而它所向披靡的武装力量直指叙利亚，并超越强大的马里、好战的卡尔切米什以及阿勒颇，向奥龙特斯河、大海之上和乌加里特大港一路延伸。乌加里特如果不是类似于尚未成型的威尼斯，也是热那亚，它是“太阳西落的海域（Mer supérieure du Soleil couchant）”上最大的开放门户，正如美索不达米亚人说到地中海，与“低海（Mer inférieure）”相对，便会提及波斯湾。

即使不愿将萨尔贡和汉穆拉比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简单地视为增长“点”，又怎能不承认它很早以前便在某种货币经济的演进中占据着明显的主导地位呢？诚然，此处所言并非我们熟悉意义上的货币符号（monnaie-signe）。整个经济并非均为货币经济，商品——特别是金属——日趋成为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并逐渐在商品交换中取而代之。很久以后，庞大的古波斯王国将吕底亚王国发明的货币传播开来——现代意义的轧制金属片——并通过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一个倔强不羁的国家）在内的近东国家传至更远的地方。

苏美尔最早用于支付的“货币”是大麦的麦粒。因此，货币源自于农业生活，而非畜牧业（例如罗马的 pecunia，希腊的 bous，印度的 rupia）。且此种大麦货币在市场上被长期使用，因为金属货币出现时（铜，然后是重金属），还仅为一种计算货币和参照尺度。大麦继续作为实际货币进行流通，以至于在交易当中，宣布了金银记价价格之后，还需附加说明当天金银与大麦的比率。而在对外交易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为金属货币。

尽管如此，金银一经在某些交易当中出现并开始充当真实货币而非单纯的价值参照时，便有技压群芳之势。因此汉穆拉比法典中有如下的规定：若某小酒店老板拒绝接受谷粒支付饮品，而是收取金银，同时“降低饮品价格使其低于谷粒价格，他将受到提审并被抛入水中”。这一出乎意料的细节表明了半货币经济的模糊特征。据一位专家推测，在可用体积大分量重的物品支付的地方——河流沿岸、大海之上，当王宫这样的富足物品拥有者们参与其中时，物物交换或许仍然存在。相反，货币经济则应在“资本家”当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没有庞大的仓库以提取源源不断的货物，其中的“流动货商”带着“携运资本的伙计们”一路跋涉，正如我们

刚刚提及的沙玛什祈祷中所说的那样。

不管怎样，这正是美索不达米亚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在皇宫官方组织之外，很快出现了真正的商人，一些是流动批发商，另一些是出资人。这些商人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每座城市独辟一区作为商业中心。若以我们借助广泛的书信集所了解到的卡内什（灰山）为例做一判断，可以看出那里有货物仓储和一个起着商会作用的商业联合会提供便利。他们灵活巧妙地掌握着各种付款现金，能够识辨记名期票、汇票，以及票据交换付款，——这证明资本主义的货币工具一旦条件具备便会自动生成。在巴比伦甚至还出现了银行。因此，当我们在乌加里特发现货币经济时便不会大为吃惊了。乌加里特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内地通往海洋的入海口，是座繁忙的港口（商船可达150只），位于托罗斯山银矿附近。城里的商人———部分为外国进出口商——使用古希伯来银币购买毛织品、奴隶，甚至土地。

选择比铜或青铜体积小的银币作为支付手段是否促进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对外贸易？或许如此。但是银子需要购买获得。美索不达米亚进口原料和农产品——银、木材、铜、锡、宝石和半宝石、油、酒，但作为交换，它却只有麦秆、大枣、毛皮、毛织品、雕刻柱体及其他手工制品。同时，它还充当中介者，从中收取服务费。它似乎遵循着如下原则：从南方和东方大肆购买，那里银币会增值（因此长期以来南美索不达米亚对来自巴林群岛的铜的盼望胜过于安纳托利亚），在北方和西方将奢侈品和布匹出售给银子供应商。或许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经济不仅仅建立在这个发达国家简单规则的基础之上：购买原材料，不做加工立即转手或加工成产品再出手，以从中牟利。美索不达米亚或许已经从长期盛行于地中海地区的生活规律中受益并使用白色金属这种在远东地区价格昂贵的产品。这对它十分有利，于交换中是有益的“增值器”，至少能够获利吧？美索不达米亚选择银币，在与印度的交易中，还具有一层附加含义，但对此的解释显然还很单薄。

埃及的黄金

以此解释一切是不合情理的。而只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差别解释亦然。然而两者间的差异十分惊人，经济学家面对埃及的生活面貌倍感吃惊，甚至烦躁不安：如此井然有序，充满智慧，固守古风。如同陶器

缓慢渗透进入日常生活一般，大约公元前 2000 年便引进的青铜器直至公元前 1500 年才真正立足。其间历经 5 个世纪的等待而几乎未曾得以使用。同样，自第四王朝起，埃及仅有一种记数货币，即铜或青铜的沙特（7.6 克）。约公元前 1400 年，沙特被基特（9.1 克）取代。对于这一点，不能说货币地位得到了加强：它在埃及仍是一片空白；物物交换规则一直持续到波斯统治——或不如说希腊统治时期。

然而，同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埃及须进行对外交换以满足其生活与奢华的需求。它出口制成品、以精细著称的亚麻布、彩陶制品、色彩丰富的玻璃器皿、家具、珠宝、护身符……而对于远距离贸易的依赖则次之于美索不达米亚，因为在其本土以及周边可获取几乎所有——木材除外——必需品：西奈半岛的铜（直到公元前 2000 年中期才从叙利亚和塞浦路斯进口铸铁锭），尼罗河沿岸最为丰富多样的石料：花岗岩、砂岩、页岩、石灰岩和玄武岩；东部沙漠中大量的宝石和半宝石；红海的珊瑚；象牙、乌木，特别是努比亚（Nubie 一词含义为“黄金之国”）的黄金。黄金是遭受奴隶待遇的原始淘金者们辛勤劳动的果实，产量极其丰富。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 1502 ~ 前 1450 年）统治时期，努比亚仅一年内送予法老的黄金就达 200 ~ 300 公斤，数量惊人。而西班牙属美洲自公元前 1650 年被发现以来，平均每年交付的黄金最多仅为一吨。因此，阿马纳（阿美诺菲斯三世，公元前 1413 ~ 前 1377 年和阿美诺菲斯四世，公元前 1377 ~ 前 1358 年）的外交信函中反复出现：黄金，在埃及，贱如沙土。而与阿美诺菲斯四世同时代的米坦尼国王图希拉塔则更愿意喻之为“足下尘沙”。然而，银币十分匮乏，以至于金银兑换比率在中王国时期仅为 1 比 2，甚至 1 比 1。

依仗大量的黄金，埃及不知不觉便很快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埃及是否因此而放任自流，而美索不达米亚却被迫竭尽全力，积极主动，挖空心思，加快发展对外经济呢？埃及让我们想起 18 世纪的中国，对自己充满信心，且只关心自己。

持久的局势

我们上文中描述的经济曾遭受一些危机、动荡和起伏，但综观数百年，整体上仍是一片繁荣景象：版图扩大，国力增强，兴建宏大的宫殿。这些不只引起历史学家们对于艺术好奇心的事实就足以明证。而且经济活

动超出王宫范畴或许正是经济生活扩展的证明和结果，而这一点在使用“楔形文字”的国家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样的经济生活同样经历着起伏变迁。我们所了解的那些道路中断、价格起伏、人口增减（至少在埃及、克里特均如此），以及政治事变和灾难，不能不说所有这一切同时也成为经济灾难。

在这种条件下，形势（conjoncture）一词在讨论中常被信手拈来而一带而过之，能否试图完全严肃地使用它呢？当然，这种形势真实存在，而我们只能借助粗略的文献资料和令人信服的假设加以想象。

（1）我猜想如果同时考虑其停滞不前和加速运转，这个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当中其实蕴含着某种整体节奏，当然这一节奏只涉及上层关系。

（2）我们仅仅掌握了一些涉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信息，尽管尚不完备，但能够说明两个地区的情况。一个活跃、具有主导地位，如果可以的话，也可说秩序混乱或被过多的政治更迭所搅乱；另一个则被动、庞大，总出现于各种贸易关系的末梢，通常被外部条件所左右，如同中国的广东深受欧洲资本主义的影响。

埃及的印证最为清楚连贯，虽然未必是最好的。不过，我们还是由它谈起吧，因为它最易读懂。

长时期的政治危机在埃及表现得异常明显，被称作“**中间期**”。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为第一中间期（公元前 2280 ~ 前 2050）。中王国和新王国之间为第二中间期（公元前 1785 ~ 前 1590 年）：著名的“外来者”西克索人入侵就发生在这一漫长的间隔期。这些游牧民族在尼罗河三角洲（Delta）东部地区定居，并就地建立首府阿瓦里斯。其统治者们冒充法老，着实建立了名义上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王朝。漫漫无期的第三**中间期**，也是最后一个**中间期**自公元前 11 世纪持续至公元前 7 世纪，还不止于此呢！塞易斯时期（公元前 663 ~ 前 523 年）只是短暂的火苗。简言之，至公元前 2280 年，埃及处于上升阶段，此后开始滑坡，直至公元前 2050 年；公元前 2050 ~ 前 1785 年攀升，公元前 1785 ~ 前 1590 年再次回落；在新王国战绩赫赫的辉煌时期迅速上升，之后便陷入无边的泥沼，这正是整个近东地区历经公元前 12 世纪的强烈动荡之后的共同遭遇。

在埃及三次漫长的危机当中，第一次——类似于由国家内部生活自深层迸发而出的文化革命，还伴随着亚洲的入侵，以及与比勃洛斯和黄金国度两方面间贸易往来的彻底中断——远比第二次猛烈。事实上，西克索人

的小插曲并未割断历史；外来者不是破坏，而是控制下埃及的活动，不幸的是下埃及依旧黯淡。然而毫无疑问，尼罗河三角洲（Delta）在西克索人统治时期依然保持着与叙利亚、克里特、利凡得海岸，甚至与赫梯人之间的联系。最后一次危机——三次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仿佛世界的末日。

上升阶段与相继出现的三个帝国几百年的成功相对应。仅以中王国（公元前 2040 ~ 前 1786 年）为例：在尼罗河河谷中重建秩序，独立的君主和寺庙体制遭到废止，国家恢复了它自由的呼吸，并重现了一定的繁荣。正是此时出现了法老们花费无度的常备军；逐渐增多的坟墓也不仅限于皇室家族，且墓穴的富丽堂皇已呈登峰造极之势：陪伴着显赫亡者的壁画、雕塑、珍宝，木制小雕塑组成的侍从部队，没有他们，任何人也无法幸福地生活下去。华丽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埃及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服饰、珠宝、香水；以及节日的盛典：年轻的妇女精心装扮一番倾听音乐家的演奏，细心的奴隶为宾客送上一支莲花，一串葡萄或一支昂贵的羽毛，装点在暗淡的头发间如同白色的王冠。

说到这里，如果将埃及的三段历史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起落沉浮做一比较（见表 4 - 1），两者并非完全吻合。事实本应如此，这样才更令人放心，因为我们遵循的依据普遍具有政治性，并不能完全适用于经济；另一方面，上百年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是一种经济环境与另一种经济环境在同一分钟也完全一致，因此，正是因为有了大致的巧合，才使得我们能够合理地使用掌握在手的尚不完善的编年表。

假定埃及的三次危机为 A，B，C；美索不达米亚的三次危机为 A'，B'，C'。对于 A 与 A' 而言，两者完全一致：建于约公元前 2340 年的阿卡得帝国于公元前 2230 年衰亡，而埃及古王国则约为公元前 2280 年；埃及中王国建于公元前 2050 年，乌尔第三王朝则约为公元前 2100 年。因此 A≈A'。对于 B 与 B'，一致性愈加明显：公元前 1785 年，尼罗河再次出现混乱局面，并持续至公元前 1590 年左右；而美索不达米亚对应的则分别为公元前 1750 年（汉穆拉比去世）和公元前 1595 年。乌尔第三王朝仅维持了一个世纪，便先后被拉尔萨王朝和强大的马里国，以及同时征服拉尔萨和马里，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莫里特·汉穆拉比统治的巴比伦王朝所替代。这段复杂的历史再次对应着整个历史阶段中未曾带来任何变化的城市间的争夺与竞争，并通过大量丰富的文字记录而为人所知的活跃的贸易。相反，汉穆拉比去世后的支离破碎映衬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直

以来得到控制的社会危机终于爆发，各种利益和私人财产与国家组织发生冲突。汉穆拉比法典正是通过疏导来满足不同愿望，同时又维护一个强大的国家所进行的一次折衷和解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而法典也只是一纸空文。直到公元前1595年喀西特王朝时期，形势才得以扭转恢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B＝B'。至于C与C'，无需多言，因为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是一次普遍性危机，整个近东地区和正处于迈锡尼控制之中的希腊均无一幸免。

表4－1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年代对照表

埃　　及	美索不达米亚
约公元前2700——	约公元前2700——
古王国(第三～六王朝)；胡夫、赫夫朗和麦凯林努斯(第四王朝)；建立法老权力	南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势力；乌鲁克、乌尔和拉加什王朝(公元前1490年)建立；萨尔贡建立阿卡得帝国(公元前2340年)
公元前2280——	公元前2230——
第一中间期(第七～十一王朝)；多重君主政体；中央集权削弱；郡长霸权	阿卡得帝国衰亡(公元前2230年)，占领巴比伦(公元前2160年)的古蒂人袭击削弱其实力
公元前2050——	公元前2100——
中王国(第十二王朝)；阿美内梅斯一世建立新王朝(约公元前2000年)；国家安顺；辛努塞尔特二世进行行政改革(约公元前1950年)	苏美尔复兴；乌尔第三王朝；建立巴比伦阿莫里特第一王朝的汉穆拉比征服马里与拉尔萨，实现美索不达米亚统一(约公元前1792年)
公元前1785——	公元前1750——
第二中间期(第十三～十七王朝)；西克索人定居三角洲，定都阿瓦里斯(约公元前1750年)；政治与社会动乱频频发生	汉穆拉比逝世；赫梯人占据巴比伦，巴比伦第一王朝消亡；喀西特人袭击美索不达米亚(自公元前1740年起)
公元前1590——	公元前1594——
新王国(第十八～二十王朝)；阿美诺菲斯一世重建王国统一(约公元前1590年)；拉美斯二世统治达67年(约公元前1300年)；实施征服与结盟政策	喀西特王朝在巴比伦建立，持续4个世纪(公元前1594年)；与埃及签订结盟条约；叙利亚各城市及赫梯帝国(自公元前1380年达到鼎盛)发展迅猛。与埃及签定结盟条约。
公元前11世纪起——	公元前11世纪起——
第三中间期(公元前1070年)；埃及帝国削弱直至衰落	近东地区大范围危机；巴比伦遭亚述人破坏(公元前1087年)。赫梯帝国消亡。

这六个鲜明的时期——三个恶化期，三个近乎盛世期——使我们能够确定其中的一些事件。如果将三个欣欣向荣的时期称作a，b，c，我们会注意到，建于公元前 1600 年并持续至公元前 1200 年的赫梯帝国与漫长且突飞猛进的c 时期吻合，其中包括喀西特人事实上并非光芒四射的巴比伦，埃及新王国及其盟国，占领了北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在克里特岛，这一时期被称为第二个王宫时期；最后，公元前 14 世纪，亚述王国发展起来。追溯几百年的历史，在b 时期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埃及的中王国，另一方面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实现统一进行的二、三次杰出的尝试，这些努力在汉穆拉比逝世后毁于一旦，最后则是克里特岛最初的宫殿。a 时期无疑是最为奇特的：这是阿卡得国创建和首次出现矿业繁盛的时期，由此，从伊朗、高加索到爱琴海甚至更远地方的整个小亚细亚实力均大大增强。面对这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埃及则以平静的方式加入其中，沿着由来已久且和谐的繁盛轨道顺势而行。而整体看上去却仿佛一切由此出发又回到此地。

国际性文化

由于两种伟大的文明间的直接联系少之又少（除了或许曾有几支沙漠驴队穿梭于幼发拉底河与西奈半岛之间），使得我们所见到的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间的相似性更为有趣。社会演变通过叙黎地区这个庞大的转盘逐个地区传播开来。每当邻近强国经济形势大好，整体上的繁荣和活跃交流便能使该地区从中受益，并带动整个近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近东地区逐渐形成统一的经济区域，交换无处不在：物品、技术、时尚、品位，当然还有人。艺术在这里成为世界性的有力见证，W. S. 史密斯在一本书（1965 年）中将其追溯至约公元前 2000 年，并区分出文明激烈交融的两大时期：公元前 20～前 19 世纪，及公元前 1500～前 1200 年（大致为经济形势呈现上升之势的第二及第三个时期）。

这种一体化的文明仅仅揽聚地中海的一半地区，但在严格意义上，近东地区已有明显跃进。一方面是超越，另一方面是统一得到加强，这些惟有从克里特岛身上看得最为清晰。作为新成员的克里特岛加入其中短短几个世纪，地位却已赫赫生辉。

二　克里特，世界性文明的新角色

前希腊时期的克里特岛，用其神话国王（米诺斯，如同法老的称呼）

的名字命名也称米诺斯文明时期，是一番令人迷惑、神秘莫测的景象。可以肯定的是，在史前历史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的声名可与克里特岛抗衡；然而，无法知晓的令我们迷惑，而已经知晓的则令我们意欲探寻。

因此，自从米歇尔·文特里斯于1953年解译岛上第三种也是最后一种线形文字B以来，问题的含义有所改变，却未曾明了。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出于好意甚至说它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事实上，我们应该对克里特岛展开另外一种想象。考古学家们提出了两、三种说法，期待着某一天随着线形文字A的破译或许产生新的版本。目前我们所知的仅仅是它不属印欧语系。[①]

爱琴海早期文明

在爱琴海的南部地区，古老的克里特是一座迷失在苍茫咸海中的孤岛。广袤、多山、被平原分割（地处中心的是莫萨拉平原，幅员辽阔：40公里长，6~12公里宽），石灰岩的山体横亘四周，水塔密布。伊得山峰高耸达2500米。因此地中海地区常见的地势高低的反差在这里也能看到。然而，如果说按照规律，其他岛屿上的动荡不安不会从外部影响到克里特深居高地的国家，而事实上就表面而言，地势较低的平原、城市及宫殿也并未遭到来自山区的威胁。绵羊被带人山中放牧；相安无事，因而少被提及。在威尼斯占领时期，该岛（克里特岛）上这个野蛮、危险的高地国家无与伦比。的确，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岛尽管国土之内一片太平，但与其承受能力相比，难道不是长时期处于人口不足的状况吗？

最为强烈而出乎意料的对比出现在岛上南、北两面之间，北部面向爱琴海近旁的岛屿和海岸，而南部凝视遥远的非洲，昔兰尼加地区，甚至埃及——北面濒临地中海，与众多的海岸别无二致，而南面的气候新奇，带有热带气候的某种特征，让人想起西班牙狭长的马拉加地区。和在埃及一样，燕子也来此地过冬。

一座岛屿通常就是一个封闭而备受庇护的世界，在克里特岛，除了羱羊、獾、野猫和鼬（用于家中防鼠），很少有当地土生土长的野生动物。没有狐狸、狼、老鹰或猫头鹰。除了蝎子、蝰蛇和一种毒蜘蛛（陆地上十分少见）外，没有其他害虫。后来希腊人称众神之王或赫拉克勒斯使得

① 关于克里特岛的问题，有关锡拉的“灾难”及其影响，参见今R.特雷耶等著《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的爱琴海文明》中立场的细微差别，巴黎，1989年。(P.R.)

“宙斯之岛”脱离了一切祸患。倒不如说是因为它得到了大海的庇护。难道归根结蒂，最初不是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令克里特岛得到此般优待的吗？许多其他与其大小相当的岛屿，例如罗得岛，或者更为广阔，例如塞浦路斯，都同样稳居海上交通要道，且与之相比，均与临近的陆地联系紧密。而克里特岛从远处占据了首要位置。

然而，克里特岛在早期爱琴海文明及爱琴海周围文明中的地位浅薄卑微，而位于赫勒舟桥海峡南面的基克拉迪群岛甚至还有特洛伊城，才是至亮点。正如爱琴海的其他地区，克里特岛的首批居民和早期的农业均于公元前 7000 年左右来自于小亚细亚；随后，数次移民潮将陶瓷制造术传授至此，最终，该岛于公元前 3000 年时掌握了冶金术。然而，按照考古学家们的说法，这一大岛最初的经验，特别是在陶瓷制造方面，明显落后于与安纳托利亚直接相连的阿尔戈利斯或色萨利等地区，甚至也远在锡罗斯岛这样的岛屿之下。锡罗斯岛的花瓶闻名已久，采用“煎锅”这个缺乏诗意又不恰当的命名——或许用于不同仪式的扁形花瓶，它们镶有白色细饰，形状各异：螺旋行、三角形、星形、太阳形、船形、鱼形……早期青铜时代文明同安纳托利亚文明一样，反映了母神（déesse-mère）无所不在：首先在新石器时代，通过与亚洲大陆的极为相似的自然主义风格小塑像加以表现；此后到了青铜时期初期，则是被称作“基克拉迪群岛式（cyclatique）”的奇怪的偶像，或许不像人们所说的是纯正的爱琴海风格。比如，从一整块大理石或黏土中切割取材铸就的“小提琴形”的小铸像，不仅在特洛伊城（几乎涵盖从 1 ~ 6 个所有等级）和克里特岛被发现，而且在色萨利，亚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特莱拉·加苏勒（死海北部）也得到发掘。此外，在阿拉萨·霍郁克类似的坟墓中找到了从一片金箔上剪出的剪影，正与之对应。从克里特岛，它们又继续向西方传播，例如在撒丁岛利用当地大量的石头或大理石制成小塑像中（公元前 2000 年上半期），又如公元前 16 世纪的马耳他，人们从小提琴形的单线条勾勒的装饰风格或平圆盘中获取灵感。在西班牙的普尔切纳（Purchena）和洛斯的史前巨石建筑的坟墓当中，这些小铸像便是东方地中海影响的众多表现之一。

爱琴海东面、小亚细亚海岸及其自高原而下的山谷入海口处的港口，在绵延数千年从安纳托利亚吹向爱琴海和希腊的文化之风中扮演驿站的角色。距赫勒舟桥海峡不远处的希尔萨里克（Hirssarlik）山丘之上的特洛伊城，自公元前 3000 年起辉煌的发展过程便是这些驿站历史的写照。谢里曼

(1870年）在这片神话般的土地上相继发现了9座城市。其中最古老的是特洛伊I城。这是一座规模极小，却五脏俱全的城市，拥有城墙——更准确地说是围墙——和国王的宫殿。人们在那里制作手工成型的灰色或黑色、切削并镶嵌白色细饰的陶瓷制品，多种石制工具（经久耐用），而铜器的出现则标志着冶金业已具雏形。当然这里也有不可或缺的母神。特洛伊II城的城墙得到扩建，但却仅仅维持了两个世纪（公元前2500～前2300）便同数千年以后长期被希腊军队包围的普里阿摩斯和赫克托耳之城的特洛伊VII城一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然而，在这两个世纪当中，特洛伊II城在冶金术通过爱琴海向外传播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挖掘中我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贵重物品，金、银、铅、琥珀、甚至还有铁的、银的或铜的刀柄，天然水晶球雕刻的手杖柄，对金银丝细工、嵌金属丝花纹或细纹状轧花滚边加以不同运用制成的精美的金银器。所有这些珍贵物品似乎只是在危险到来前的最后时刻才匆忙埋于地下。陶车十分著名，但是手工陶瓷制品也并存于同一时代。

公元前3000年下半期，特洛伊城与美索不达米亚（圆柱及让德·纳斯尔的印章）、安纳托利亚高原、色萨利、马其顿、爱琴海、埃及，甚至经多瑙河与波罗的海（通过化学检测可以辨认出原产于北欧的琥珀）均保持着明显的联系，而所用材料、特别是半宝石的多样性表明这绝非偶然的联系。

这或许只是个特例，仅凭此便推而广之，对爱琴海的早期文明妄下结论是不够谨慎的。但它的确很有价值。我们在希腊大陆或一些岛屿已经找到了真正的城市甚至宫殿的遗址，足以想见由于早期海上贸易的带动而活跃蓬勃的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已扩及整个爱琴海地区。

这一文明于大约公元前24世纪伴随着印欧人的入侵而骤然失色。托阿德（Troade），安纳托利亚、希腊大陆和爱琴海的众多岛屿被文明程度远在其下的民族侵占——或许这正是希腊迈锡尼人、赫梯人以及安纳托利亚的鲁维特人的祖先。特洛伊、哈格斯科斯玛斯（Haghios Kosmas，位于雅典附近）、阿尔戈利得（Argolide）的莱尔内和梯林斯，利姆诺斯岛的普利西尼（Poliochini），所有的城市及其宫殿一同葬身火海。爱琴海地区经济和文化水平整体倒退。色萨利退回野蛮状态。所有的光芒黯然失色。除了在克里特：偏远的地理位置令其难以进入而免遭占领。这无疑是它的第一次好运。

外部的震荡

在爱琴海第一次文明失落前约公元前2500年，克里特岛的繁荣已可见一斑，但总体水平还十分有限，就如同一种发达的经济在大岛上分割出两个岛屿。东部一小块，位于扎克罗斯、米拉贝洛湾——特别是在瓦西利基（Vasiliki）和莫什罗斯沿海的小岛处——和莫萨拉中央平原之间，该平原幅员辽阔，但封闭在自身的自然财富当中，“托洛伊”地下墓葬的集体墓穴极具特色。与公元前3000年几乎一切所需均从安纳托利亚西海岸获得的爱琴海其他地区相反，克里特岛还与叙利亚保持联系，并直接或间接地同埃及往来。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自公元前2000年以前起，过去在爱琴海新石器时代曾遭轻视的克里特岛的某种活跃、开放、独特的文明发展起来，并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影响。

在这种来源于古老的米诺斯文化的文明当中，既没有真正的城市，也没有宫殿。但在东部海岸的墓穴中发掘出丰富的物品：安纳托利亚式（与爱琴海其他地区相同）的立嘴瓦罐、线条简洁的大理石女神像，纯铜的，以后还有青铜的工具和武器，别致的金首饰，独特的陶瓷制品（长嘴“茶壶”，形状看上去如效仿金属造型），特别是大量的石花瓶——显然是从埃及获取灵感（有些甚至直接引进）——在专家当中引起了诸多争议。如今，我们不再认为公元前3000年初（这些花瓶在埃及出现的年代）克里特岛同尼罗河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是相信其通过比勃洛斯保持间接联系。然而，这是一种简单贸易，还是尼罗河边的一些避难者通过叙利亚的中转站来到克里特？又是在何时？是在久远的那尔迈征服三角洲时？还是在公元前23世纪目睹了一幕幕古老的埃及坟墓被盗的第一个过渡时期？做出这些假设已将克里特人很早以前便挂在衣服上的男性生殖器的小盒子（细节：三角洲的或利比亚的），以及在古老的米诺斯文化时期（公元前2200年以前）莫萨拉（哈格亚特里亚达）平原上大量的印鉴考虑在内了。这些印鉴直接效仿埃及第一个过渡时期的印章——而这些印章本身就深受亚洲的影响。另一些专家则简单地认为来到比勃洛斯的克里特人与经营本地特产葡萄酒的商人们一起一直抵达埃及。

不管怎样，公元前3000年末期的克里特已呈现直线上升之势。然而要等到公元前20世纪初期，仿佛偶然间，才骤然出现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攀升：城市繁荣，宫廷兴旺；轮子和车辆出现；约公元前2000年开始采用陶

车，仿佛奇迹一般，它的出现并未破坏手工陶瓷制品不同凡响的质量。发展势头如此之猛，令我们再次试图通过“移民”加以解释：叙利亚或巴勒斯坦海岸的居民，遭到打通“太阳西落的海域”通道的乌尔第三王朝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卢伽尔扎吉西的驱逐而逃往岛上。[①] 宙斯在腓尼基海岸创造且经海上传到克里特岛的欧洲神话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然而，用移民来解释我们所了解的公元前 2000 年初的贸易与“国际”关系的全新活力是否有益呢？自古老的米诺斯文化时期开始（公元前 2000 年以前），克里特岛已采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仅这一点便足以表明它脱离青铜时代文化世界，摆脱其野蛮愚昧的侵略者已达到何等程度。毫无疑问，其海员们对叙利亚沿岸的路线了如指掌。克里特岛脱离了爱琴海地区的窠臼，转向塞浦路斯，乌加里特和比勃洛斯；又从那里，同时抵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若没有这些地方，克里特的财富将不可想象。从此，克里特岛便融入东方文明的环境之中。

王宫和城市：“指示标”

大型城市和王宫分布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马利亚和扎克罗斯，其遗址于 1964 年得到挖掘。除岛屿西部古老的西多尼亚旧址上仍有奇迹尚待发现外，城市与宫殿庞大建筑群已将一切包揽其中。此外还有一些简约的王宫及领主的别墅。事实上，任何一片开垦的平原，任意一座人群居住的城市无不拥有王宫及本地君王：在距离克诺索斯仅几公里的阿尔克汉那，青铜器时代的残垣与现代房屋的墙壁彼此相连；在占据富饶的阿马里山谷的莫纳斯蒂拉基，还有坎勒·卡斯泰利或古尔尼亚，“小王宫及其宫廷周围房屋密集，仿佛中世纪环绕在教堂和城堡的四周的小镇”。

如果在地图上将这些地区一一标识，其分布便一目了然。就目前所知，岛屿的西部地区虽与东部地区同样富饶，且灌溉极为便利，却是一片空白。由此证明克里特北—东—南一线构成的半环受到外界影响而尽显生机。与此相对的现象是：居住在西部的阿尔戈利斯或品都斯山脉和帕尔纳索斯山脉以西的希腊半岛的人们长期处于原始状态（S. 马林纳托斯）。

时间上的分布同样能够说明问题。总体而言，存在着两个时期的王宫：其一为公元前 2000～前 1700 年；其二为公元前 1700～前 1400 年。火

---

① 此种假设今天已不复成立。（P. R.）

灾、地震、外族人侵以及社会革命，为克里特王宫的多重灾难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可以肯定的是，王宫被毁之后又在旧址上顽强地得以重建，而在第二个王宫时期，在形势回转的同时，伟大的克里特艺术也花开似锦。

还有一点同样可以确定，即与大量王宫相对应的是大量的城邦。米诺斯不是法老。截至公元前1400年的迈锡尼征服时，克诺索斯几乎从未对岛上其余地方实施过严密的政治权力——还不止于此！其政治霸权，或者宗教霸权仅仅是宽松的城邦联盟，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君王，仿照最初的苏美尔人城市的模式，或叙利亚城市的小国王。所有这一切都是处于和平关系的环境之中——基本上没有一座克里特城市修筑城墙。

此外，每座王宫周围都建有一座城市，城市若不是更早，也是与王宫同步诞生。克诺索斯外围平坦的空地向外延伸不远的区域内，居住着6万～10万人口。这座艺术家、商人、海员聚集的城市并非唯命是从。像H. 范埃方特雷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所想象的“存在一个从事私人活动且摆脱王宫经济严格管制的商人阶层”也是合乎逻辑的。岛屿之外分散的商业活动，及叙利亚与爱琴海城市中众多的商人“群体”同样促进着此种经济独立。此外，贵族们在城市贵族统治的政府中担当政治角色；人民聚集在公共广场上（已经是古希腊那样的广场agora），拥有言论自由；而相对于国家首脑，国王更多地扮演仲裁者——就像神话中的米诺斯——和宗教领袖的简单角色，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可能。追随H. 范埃方特雷接受这一点，便会从米诺斯时期的克里特看到未来希腊城市的轮廓。这样的假设极具吸引力，尽管进一步的论述——马利亚的王宫附近拥有一间贵族会议厅和一间公共大厅——也轻而易举地适用于某些巴比伦城市，那里的商人们组织有序，自主事务，但并不充任政治角色。

最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些富丽堂皇的宫殿既是神明的特权、也是那些无论在哪里只依据国王—传教士的身份和职位行使权力的人们的特权。克诺索斯由埃旺修缮的所谓的王位殿有着石膏铺就的底座和狮身鹰头鹰翼怪兽的壁画，它是米诺斯豪华的接待厅还是母神的圣殿呢？一切宫殿均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祭祀用品、浇祭桌（如在马利亚）、象征女神的雕像、兽角或兽头状酒杯、双肚瓶（labrys）、祝圣仪式的号角、八字形的骨片，以及陶瓷或象牙制成的奇特的“圣结”，代表镶嵌金边的打结披巾……

因此王宫既是寺庙、领主宅第，同时也是庞大的货物汇集地，集中着岛上经济生活一大部分。

克里特的经济

公元前2000年初，克里特城市化进程的初期也正是其经济整体攀升的阶段。到了更为活跃的第二个王宫时期，埃及新王国的需求日益增加，伴随将西克索人赶出埃及并涉足亚洲地区，埃及伟大而悲剧性的外部政策也逐步开始实施。这股世界主义之风经由近东，几乎仅成就了克里特岛的物质财富。对外依赖性甚至还解释了克里特岛就物质角度而言，经历了一段美好时光，直至约公元前1200年危机全面爆发。事实上，公元前1400年(?) 的迈锡尼征服及其带来的破坏都未能打破这一繁荣景象。看不出任何中断，外来者便已融人克里特原有的活动当中。

公元前2000年上半期，克里特已适应了这种丰富广泛的对外活动，并由此逐步演变为某种庞大体系的核心。此时的克里特发展为一流的海上强国。然而，就其掌握的"制海权"，我们能否称之为"海上克里特帝国"呢？我们已经说过，克里特并非强大的政治机器。其海员们拥有海上驿站和支撑点：锡拉（桑托林）、米洛斯、黑曜岩岛和基西拉岛，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从那里便可眺望到岛屿西岸，这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通道上距离西方不远的一座瞭望塔，这些地方均被海员、甚至一些克里特拓荒者们占领；一些克里特商人在小亚细亚海岸的米利都、罗得岛、塞浦路斯、乌加里特、或许也同叙利亚人一样在三角洲的港口定居。米诺斯的船只同样途经马耳他、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1]，由于得到当地支持，小心谨慎地利用这些扶持而不必支付分文，所以并不能称其为帝国。

然而它们描绘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克里特艺术和风格占据了爱琴海。米洛斯公元前17世纪重建的菲拉科比的宫殿中飞鱼的壁画及柱石再现了克诺索斯的景象，并展现出克里特对海上商业的控制。此外，克里特岛通过基克拉迪群岛直至亚洲的卡里招收大批海员才得以提供划桨船只和帆船的服务。克里特人抓获的一批批卡里海盗相继沦为精良的海上警卫为其效劳，这段历史似乎确有其事。在地中海历史上，当海员的数量微乎其微，只有通过在外部招募才能形成浩大的海军力量的时期，这样的情形多次出现。无论是伯克利的雅典，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还是米诺斯的克里特，都是如此。

[1] 与迈锡尼的船只不同，米诺斯的船只未登上马耳他、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P. R.)

在这场游戏当中，截至此时交流沟通还以岛屿东边的惟一支点作为依托，但很快便在西边，北起克诺索斯南至费斯托斯的两点之间建立了核心轴。这里拥有整个岛上最大的两座宫殿（克诺索斯：房屋面积 20000 ㎡，大致分为三层），用不着大惊小怪：它们位于连接两岸自北至南的道路的两端，为典型的“地峡道路”，两个海域之间的狭长地段。这条主干道自然得以精心保养：铺砌的路面，南端建有高架道路，成群的役畜从那里经过，更多的则是人力轿车和四轮重型车，有样品为证。公元前 2000 年或前 1900 年，轮子在克里特出现，或许是由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传入的。

克诺索斯—费斯托斯间的道路表明在南部海岸的航海活动正日益活跃，或为自东向西或反向前往罗得岛、塞浦路斯和叙利亚进行的沿海航行，或进一步直达非洲海岸，昔兰尼加或埃及进行直线航行。长期以来，历史书中一直记录着远洋航行——航行在漫无边际的茫茫大海上——直到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时期才开始，在罗得岛和埃及之间尤为频繁。必须承认这样的壮举——真可谓一项壮举——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米诺斯文化时期简陋的帆船早已具备如此胆量。更晚一些时候——依然早于古希腊时代好几个世纪——的事实也直接证明了这一点。当乌利西斯来到伊萨基并冒充克里特商人时，曾这样解释道：“到埃及（Egyptos）……去巡航……的愿望攫住了我。我装配好 9 艘船只，海员们汇集而至。这些勇敢的人们和我一起大摆宴席，长达 6 天……第 7 天，我们扬帆启航，从克里特的平原出发，乘着顺畅的北风一路前行，仿佛顺流而下……而我们只需坐下来将航行交给风和舵手。经过 5 天的时间，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埃及（Egyptos）河边。”值得一提的是，好几个世纪以后，例如到了腓特烈（红胡子）和土耳其荣耀的时代，都未有能超越这次的航行。北风是航行成功的主使者。还需具有为之献身的勇气。这样的赌注是值得的：埃及充满奇迹，遍地黄金。

然而岛上众多的海港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克诺索斯和米拉贝洛湾之间，这一点还是令人吃惊的。克里特岛的主要角色难道不是充当欧洲、亚洲和非洲间的驿站吗？在北方，面对希腊半岛和阿尔戈利得这些变得比它更为野蛮的国家，亚该亚人入侵之后，克里特岛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联系从未中断，而在西方，面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尚未开化的地区。海员们向遥远海域的探险究竟到达哪里？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关于自东方来到西方最早的航行，依然是一个模糊而争论不休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同一切海上民族一样，克里特人也常常提供运输服务，将他国制造的产品运送至国外港口。而其自身的进出口贸易也至关重要。在米洛斯、埃伊纳岛、莱尔内、迈锡尼、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埃及都发现了克里特精美的彩陶制品。克里特人同样出口大量的布匹（色彩艳丽的布匹在盛产传统白色亚麻布的埃及风靡一时）、珠宝和青铜武器。我们在塞浦路斯找到了同样的青铜武器。尽管克里特岛也有铜矿资源，却依然从该国购买青铜。克里特的黑曜岩来自米洛斯和亚里岛，埃及也为其提供大量用以雕刻印章的次等宝石和紫水晶。

交换与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古尔尼亚这样的纺织城应运而生。“工业”进步如此迅猛，克里特甚至还向埃及（自公元前19世纪起，很久以后，又是阿乌纳），或许还有迈锡尼出口了一批技术劳动力。然而，即使在商业繁荣至极的时期，克里特依然依赖其伐木工人、农民、牧羊人、渔民的劳动而得以生存。它出口木材（尤其是柏木）、橄榄油和美酒，同时似乎又需进口小麦。这将可作为繁荣发展的经济中一切相互依存的佐证。

事件：神的力量

克里特从不缺少悲剧，而且总是千篇一律：王宫被毁、重建、再遭毁坏、再次重建，循环往复！直到最终消亡。关于这些惨剧的日期及其原因，专家们意见常有分歧，但也不外乎两种情况：神明或自然力量所致；或只是简单的人为及战争暴行。争议主要围绕着两类现象：自然灾难，如锡拉岛的火山爆发；人力所为，如迈锡尼人征服克里特岛。

锡拉（桑托林）岛的火山爆发自1939年由S. 马林纳托斯首次提及后，引起大批考古专家、火山学家和海洋地质勘探者的极大兴趣，以至于我们几乎能够完整地了解这次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然灾难”。桑托林又经历了多次火山喷发（最近的一次是在1925～1926年），属维苏威火山类型，如今岛屿3/4已被海水淹没。“熔岩和灰烬组成的黑、红及暗绿相间的城墙内，矗立着刺眼的白色城镇，这便是群岛之上最为奇特的一道风景。”

一座表面上沉寂了数千年的火山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开始活动。公元前16世纪，那一次或一系列的火山喷发在桑托林当地将克里特乡村及克里特文化掩埋在厚达几米的熔岩之下，而此后则是分外强烈的地震，通过对

克诺索斯和费斯托斯宫殿的挖掘便可见一斑。居民们似乎有时间逃离。但所有这一切只是个序曲：公元前1470或公元前1450年前后，岛上遭遇了真正的火山爆发，可与1883年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岛发生的火山爆发相提并论。

根据近期这场灾难的规模，我们便可想见锡拉火山爆发的猛烈程度，测量破坏形成的火山锥总量可知：后者是前者的四倍之大。而景象似乎如出一辙：数年之久的地震，连续喷发的熔岩，最终爆发，灼热的火山灰遮天蔽日，最后是阵阵海啸。巽他海峡高达20米的海浪，摧毁了300余座城市和乡村，将一艘大船和数辆火车高高地抛过屋顶。在爱琴海上的锡拉岛，由于海水相对较深，在巨大压力的作用下，海啸也更为猛烈，浪头更高，尤其是速度更快。

距离锡拉岛120公里的克里特岛也遭到汹涌海浪的重创和地震的摇撼，四处弥漫着火山灰和有毒气体。岛屿的整个东部地区，甚至中心地带成为一片废墟。克诺索斯只有一座宫殿得以保存，在灾难中受到波及但未被摧毁。费斯托斯、马利亚、哈格亚特里亚达和扎克罗斯的城市与宫殿一同化为灰烬，古尔尼亚，帕莱奥卡斯特龙，普色拉，莫什罗斯也未能逃脱厄运……植物消失殆尽：堆积的火山灰如同一床至少10厘米厚的棉被，使这里多年寸草不生，生命不复。考古学家在挖掘中发现岛上居民曾经大规模地向岛屿西部，或许同时向迈锡尼大陆迁移。

在北风的推动下，瘟疫的阴影蔓延到叙利亚和尼罗河三角洲。《出埃及记》当中讲述了一个长达三天的可怕夜晚，法老的囚徒犹太人利用这个夜晚逃生。我们自然而然将它与桑托林那段小插曲相提并论。是小说吗？也许吧。就年代而言，两个事件没有紧密的关联。然而，在1945年，我目睹了汉堡惨遭轰炸后城市中遮天蔽日的黑云：那是在100公里之外，黑夜在正午时分骤然降临，将我们包裹起来。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使位于200公里以外的地区陷入一片漆黑。哎呀，自然的力量远远超过人的能力。

事态的发展仿佛令长期不为人知的桑托林火山爆发逐渐成为讲解历史的最佳材料。或许这次火山爆发与柏拉图所说的著名的大西岛(Atlantide)——一座巨大的、承载着强大文明的岛屿，“一天一夜”便在海浪之中消失无踪——的消失有关，并表明岛屿的存在具有某种真实性，对于这一点，里斯·卡彭特和J.V.吕斯分别在一本智慧的小书（1966）和考据详实的论文《大西岛的末日》（1969）中都做出了论证。两人又都

把我们带回到《蒂迈欧篇》和《克里蒂亚篇》。根据著名的教士塞易斯的记录和埃及“庙宇档案”中的记载，大西岛位于西部已知世界的尽头。因此，柏拉图自然认为它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外茫茫大海之中。然而，对于第十八王朝时的埃及人来说，西部已知最遥远的国家是克里特。那么，大西岛历史的结束，是否就是米洛斯文化强盛时期的告终和锡拉火山爆发这两个在传统记述中常被混为一谈的事件的简单相加呢？

事件：人的力量

因此，此种论断从时间上拉近直至混淆了我们谈及的两个关键事件：锡拉火山爆发和迈锡尼人征服（换言之，即克里特的真正终结）。在此种条件下，迈锡尼人应该是在灾难之后不久来到克里特的。

事实上，最早一批希腊人亚该亚人，印欧侵略者，迈锡尼人的祖先，自公元前3000年末期开始踏上了希腊土地。他们选择爱琴海周围定居，征服当地居民，混居其中，并摧毁其城市与文明，其程度之深，仅次于城市的那场火灾。例如在莱尔内，一切由此改变：房屋的形状，墓地的造型，陶瓷制品的种类……如果说这些初来乍到的好战者同样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此地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或许，他们破坏的希腊大陆上的整个爱琴文明终归只是一株依旧脆弱的嫁接物，局限于沿海地带、外加在一块尚未占牢的地域上散布的几个点？

爱琴海最早的居民（希腊传统的佩拉斯吉人）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于这一点，语言学家们的分析不容置疑。外来者在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的同时，向被征服者广泛借鉴。因此希腊语最终承袭了大量的外来词。地名研究和人名研究的学者们认为，甚至大声宣扬着这样的观点：一些与科林斯、梯林斯和雅典齐名的城市，以及超越德尔斐神谕，位于色萨利中心“天下第一”的帕尔纳索斯山，其名字并非希腊语。荷马笔下一些英雄人物的名字也不是希腊语，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这是何等的悲哀！还有克里特人地狱判官米诺斯和拉达曼提斯，以及统治地狱的女神珀耳塞福涅，都不是希腊语。更有意思的是，许多与农业相关的词汇也并非来源于希腊语：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木、百合、玫瑰、茉莉、墨角兰。还有航海词汇：航海艺术是希腊以外的色萨利馈赠给对大海一窍不通的印欧侵略者的比葡萄树和油橄榄木都更为珍贵的礼物之一：thalassa 和 Pontos（意思均为“大海”）都不是来源于希腊语！

但是他们学得很快。在阿尔戈利得，外来者融入了旧有关系的体系，特别是在克里特。正在飞速发展的克里特，在基克拉迪群岛及半岛附近的海岸占有突出优势。公元前 18 世纪，大陆及岛屿的陶瓷工匠们或许原本就是克里特移民，开始模仿克里特被称之为卡马雷斯风格的造型；引入并效仿其印章、珠宝，和米诺斯文化的装饰主题。公元前 15 世纪，一种受到米诺斯文化启发，依附于整个近东地区的统一文化覆盖了爱琴海的整个南部地区，以至于对于一件在米诺斯岛菲拉科比、埃伊纳岛、迈锡尼或皮洛斯发现的物品，常常难以确定它是来自克里特还是在本地制造。

在此过程中，迈锡尼是最为出色的实例。这座城市随后成为阿尔戈利得其他城市的样板，迈锡尼文明的名称也演变为尺度。该文明在克里特新王宫时期迅速起步：我们发现的完好无损，大体建于公元前 16 世纪的王族墓葬（其中一些稍早，另一些建于公元前 15 世纪上半叶）便是其富丽堂皇的证明。奇怪的是，在克里特决定性的影响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埃及极其明显的作用。的确，在公元前 1550 和公元前 1470 ~ 前 1450 年，迈锡尼人和克里特人似乎已有友好交流，并开展贸易往来，不论是在伊奥利斯岛，那里两国的制陶工匠一起并肩劳动；还是在罗得岛，那里的迈锡尼人似乎已融入克里特移民当中；甚至在埃及，各种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 Keftiu（即克里特）和“绿色的大海中心的岛屿（Îles du Grand Vert）”，在我们看来，也就是克里特人以外的所有爱琴海，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

公元前 16 ~ 前 15 世纪，克里特和迈锡尼贸易活动的繁荣足以解释迈锡尼坟墓中的大量财富和丰富的黄金物品（产自埃及的黄金），特别是显赫逝者面部覆盖的惊人的面具。覆盖面具的做法并非源自克里特岛，其想法或许和黄金一样也来自于尼罗河沿岸。还有一种假设：应阿莫西斯法老的要求，克里特海员于公元前 1580 年前后将一批迈锡尼雇佣军运至埃及，以帮助其驱逐三角洲的西克索人。这应该就是配备重型武器的士兵（Haunebu），其长枪、头盔、盾牌、长剑在对抗亚洲入侵者的战斗中表现不凡。他们应该是满载着埃及的黄金回到了驻地。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并不一定非要相信这部探险小说。

不管怎样，迈锡尼人都是遵循克里特人的足迹发展进步的：无论是其文明还是经济都根植于古老的模式之上，又几乎极不情愿地将其摧毁。如果我们没有弄错，迈锡尼的扩张伴随着各种交换的不断发展，其成功只是

一时的。由于增速极快，迈锡尼人海上航行及发动征服的气势掩盖并超越了克里特辉煌的氛围。他们来到罗得岛、塞浦路斯，又超过前人，向小亚细亚海岸、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进发，其陶瓷制品被大批运至阿马纳。更有甚者，他们还到达了西方："我们在意大利各地都发现了迈锡尼陶瓷制品的碎片"。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次快速而仓促的扩张。是借战争之机，从特洛伊围墙之下经过（公元前 1250 年的特洛伊战争由迈锡尼人发动），向直达黑海的海峡进军。

迈锡尼、梯林斯、皮洛斯、阿尔戈斯、底比斯和雅典的文明迅速腾飞，这一点毋庸置疑。公元前 14 和 13 世纪，兴建了许多克里特式的大型宫殿，柱子相同，壁画风格一致。而克里特宫殿露天的中央庭院却被马噶隆（Megaron）取代，这是一种宽敞的房间，中心四根柱子中央架有一个火炉，炉烟不经烟囱而径直从一个穿透屋顶的洞中排出。顺便提一句，马噶隆源自小亚细亚。

但我们的意图并非停留在迈锡尼或梯林斯身上，也不在于尽述一个好战社会的特征及其印欧类型的国王和坟墓中装备精良的士卒。我们感兴趣的是被迈锡尼占领的克里特文明此后成为希腊的组成部分。迈锡尼是一个过渡，的确因其结局带有悲剧色彩而并不完美，但却是惟一的过渡，因为公元前 1400 年或稍晚一些，克诺索斯的最终被毁使得克里特及克里特—迈锡尼的所有遗产都流入阿尔戈利得。

说到克诺索斯，不容否认该城曾被迈锡尼人占据。什么时候？通过一些事实可得出公元前 1460 ~ 前 1450 年这个日期。特别是在底比斯赖克米拉坟墓中发现的一幅埃及绘画，描绘的是向赖克米拉进贡祭品的克里特人，其"着装"已有了某种改变：画家擦去了带有贝尼安（peniens）盒的传统服装——但还隐约可见——并将其换成迈锡尼人三角形的缠腰布。在数十年后的另一座坟墓中，克里特（keftiu）和绿色的大海诸岛（Îles du Grand Vert）的男人们依然穿着缠腰布。是风尚的变化？还是奉法老之命在底比斯接待外宾的部长赖克米拉对于克里特岛王朝变迁的某种承认？总之，自公元前 1400 年起，各类埃及铭文中再未提及克里特（keftiu）。另一些论据：修复克诺索斯在锡拉火山爆发中遭到破坏的宫殿标志着线形文字 B 书板的出现，且与皮洛斯、底比斯或迈锡尼的书板十分相似……终于，无论是陶瓷制品还是墓室建筑风格，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 M（inoen）R（écent）IB（近代米诺斯 IB）（能够确定岛上火山造成巨大破坏的日期）

到出现在克诺索斯并只在这里出现的被称为“宫殿风格”的 M. R. II。依据近期对锡拉灾难事实的澄清，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迈锡尼人利用克里特被毁的时机进入克诺索斯惟一尚存的宫殿定居，进入克里特权力的中心。岛屿在损失诸多城市和人员的同时，难道不是也失去了众多和它一样受到重创的港口和在爱琴海诸岛上的部署吗？能够占领的地方均被占领。散布各地的克里特人聚居区为迈锡尼重振雄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当克里特恢复一定的繁荣时，就只是迈锡尼的一个省了。

然而，是谁将迈锡尼人占领的克诺索斯王宫彻底摧毁？包括日期在内，疑点重重。公元前 1400 年前后，克里特人发动革命，洗劫宫殿，以此反抗克诺索斯的外来统治者。这是人们常常提出的解释，但还有所保留，一些事实之间始终无法吻合。例如，克诺索斯石板上的希腊语已有所进化，因此原则应该出现在皮洛斯石板之后，这就产生矛盾。另一些作者则认为应该从根本上更改克诺索斯被毁的日期。将其推至公元前 16 世纪中期，并将原因归结为敌人——或许不过就是周边城市，为抵抗这些城市，迈锡尼各大城市纷纷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或干脆将其归结到公元前 13 世纪下半叶。那样克诺索斯便遭遇了和其他迈锡尼城市和宫殿相同的命运。但这涉及历史的另一章节，我们将在本章结束时再做说明。

核心：克里特文明

无论怎样，对整个地中海命运至关重要的是克里特文明本身。而不幸的是，谈论文明，便需要回答诸多问题——而对于这些，我们掌握的答案却少之可怜。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至多只是一些幻灯片，而小说家只有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才能从中获取信息。关于组织结构，我们曾经说过，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所了解的仅仅就是，也就是说少之又少：国王—教士、宫殿、城市、成群的手工业者或海上民族。而这个社会组织形式远比巴比伦或埃及的神秘得多。文字资料的缺乏（很久才得以破译的线形文字 B 的记录只是一些清单）无法弥补。而宗教，还有艺术也是一样。

对于克里特人的宗教，我们掌握的信息已足以识别克里特人，但还无法确切地加以评论，了解克里特的结构，帮助我们揭开社会组织形式之谜。当奥林匹斯山的神灵们占据克里特时，——线形文字 B 中提到的主要是亚该亚神明——，当宙斯逃脱他那吞食儿童残暴的父亲科罗诺斯，并在

艾达峰神圣的洞穴中找到庇护时，我们的耳边又回响起一个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而在此之前呢？神话学讲述神明的故事时需要一定数量的神明作为陪衬。显而易见，在古老的米诺斯文化时期的克里特，缺少这样的神明。无论是在主要的宗教场所王宫内（克里特的城市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美索不达米亚式或埃及式的庙宇），或是高山顶峰的圣地，洞穴、圣林及许多物品都被赋予明显的宗教含义：树木、支柱、双肚瓮、公牛角、打结的肩带……一些动物也具有神圣的意义：例如，蛇、鸽子是土地和天空的象征。有一个神明，即无所不在的女神之母，又把我们带回原始精神状态的深处，回到最初的宗教信仰。她是直接从克里特新石器时代早期肥胖的女神中演化而来的。双手交叉，托起双乳，这是旺盛生育力的明显标志，即一切财富的象征。惟一的神明自然女神庇护着田野、牲畜、深厚的土地、广阔的海洋、动物，及其创造并治愈肉体伤痛的人类，行使着似乎是帕沃（Pavots）女神神奇的雕塑所具备的职能，然而对于不分宗教、地域，没有对立的克里特民族而言，不存在相互竞争的本地神明，除了这一神明之外还能要求些什么呢？

同时，我们谈到了一神论。毫无疑问，为什么要将蛇之女神与花之女神，或鸽子女神区分开来呢？但是说起一神论，便会想到未来一种新生的宗教现象。诚然，还有什么比自然女王女神之母更加古老的呢？由她开始向女神与上帝（通常是一位平凡的神明）合二为一，或再加入孩子形成三神一体论转变。公元前6000年，在加泰土丘，就出现了“一神教”，并已经有了崇敬“维纳斯女神”的祈福者。我们更情愿说这一切源自于新石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而非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浓厚文明的爱琴海，始终忠实于早期农业生产者们尊崇的生育力旺盛的伟大女神，而没有借鉴在更为先进的文明中首次将男性诸神与女性诸神区别开来的万神殿。

说到这里，便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无论是在宗教还是艺术方面，克里特将从外界获得的一切加以深刻的转变，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画于加泰土丘墙壁上的凶神恶煞的女祭祀们凄惨的舞蹈形象与克里特众多珠宝或壁画上所表现的有着芭蕾舞者的高挑身材，伴随着舞蹈衣裙飘舞展放，不停旋转的年轻女舞者们，两者有何等的天壤之别啊！这是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另一种诠释，如同因胆怯而退缩这种原始人类最为自然的感受。全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克里特人的宗教仪式生活——信徒们前往伊达峰的山洞或亚姆尼索斯附近的埃尔雷特亚山洞；虔诚的信徒则簇拥在宫殿的中央庭院

里观看仪式，公牛狂奔，那不是处死仪式，而是竞技者们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其危险的杂技表演，例如黑色块滑石的美丽花瓶上呈现的盛大的丰收游行场景，人群中一片欢歌笑语，甚至还有哈格亚特里亚达充满神秘色彩的石棺一侧的亡者伫立在他的坟墓前神情专注地接受生者们最后的祭献——丝毫未曾提及任何被其信仰的神明、祭祀或死亡的念头吓得胆战心惊的人。克诺索斯的一幅壁画描绘了一群妇女身着色泽鲜亮的黄、蓝或白色的衣裙，袒露双乳，在围坐在蓝色油橄榄树下的众人面前翩翩起舞的景象。另一幅壁画由于受损，已难以辨认，大致是正在克诺索斯的王宫庭院中进行的公牛狂奔竞赛的场面：庭院中心，稳坐贵宾席的依然是女性，是宫中妃嫔或者女祭祀；在她们身后，几百个脑袋挤作一团。画面色彩明快，有红、蓝、黄、白和棕色。两种仪式的宗教特征显而易见，而气氛却如同在男人和女人自由交往的社会中盛大而欢天喜地的节日一般。只要将这些场景与马里壁画描绘的被称作“授爵式”（公元前18世纪）的场面作一比较——在诸多神明、动物和宗教圣事中狮身鹰头鹰翼怪兽的面前，吉姆里利姆国王庄严地从战争女神伊什塔尔手中接过神圣圣物，便可看出宗教态度和生活观念的不同造就出两个不同的世界。

克里特艺术印证了这一印象。它无疑是整个东方世界最为独特的奇葩，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生活品位和对幸福的体味，及其对造型和色彩富有表现力的自由运用最直接且深深地打动着我们。在克里特艺术的繁盛时期——第二个王宫时期——在一切自由停滞的迈锡尼时期到来之前，自然主义占据上风：墙壁和陶瓷花瓶的侧壁布满了禽兽和植物的图案；赭石色花瓶或庞贝风格的红色拉毛粉饰墙面上的一株草，一丛番红花或鸢尾花，或一支纯白百合；连绵一体的芦苇丛图案，画风近乎抽象，一支花朵盛开的橄榄枝，章鱼卷曲的触角，一群海豚，一只海星，一条长了翅膀的蓝色游鱼，一群巨大的蜻蜓，主题形形色色，但从未运用丢勒对小草和紫罗兰细枝末节的修饰来进行处理。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不真实的刻画：蓝色的猴子采集番红花，蓝色的小鸟栖息在犬蔷薇盛开的红、黄、兰、仿碧玉的白色的岩石上；一只野猫透过空中交错的常春藤的枝杈守候着一只背转身去浑然不觉的小鸟，在一匹绿色的骏马拉着的马车上，端坐着两位笑意盈盈的年轻女神……陶瓷制品和壁画一样，也任由这种非凡创造力尽情发挥。奇怪的是，同一个有关植物或海洋的主题在被陶瓷匠们花样翻新、成百只出口的花瓶上会有上千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仿佛画家每次都在寻找

创造的乐趣。

惟有雕塑，或许正是由于它对想象力的发挥构成较大阻力，使得克里特人似乎无法做到得心应手。陶瓷小雕塑常常落人俗套，有时还很拙劣。不过，有些精美的艺术品同样不容忽视，如象牙制成的舒展身体，纵身跃起的杂技演员，几件公牛的头像，马利亚的一把华丽的小斧上褐色板岩雕制而成的装饰性的豹子，甚至还有刻在石质的花瓶、兽角或兽头状酒杯上，以及不计其数的金、紫水晶、大水晶、玛瑙、光玉髓和象牙制成的印章上美轮美奂的浮雕。最后还有超凡脱俗的珠宝首饰。

克里特艺术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再次看到多方借鉴和世界性的某种特征。这难道不正是岛屿文化的独到之处吗？塞浦路斯及其公元前1000年时期非凡的陶瓷制品，撒丁岛及同时期奇异的小青铜像，都同样显示出这一岛屿独特性的问题。岛屿是极端的世界，既门户大敞，会在转瞬之间被外界的人员、技术、甚至潮流乘虚直人而一改前弦——同时又十分封闭，相对于其他地方，这里的交流沟通不是经常性的，而是时断时续进行的。对于每一个来自外界的收获，都是很快从中吸取其鲜明的特征，与世隔绝地加以发展，有时与最初的形式已相去甚远。而此种现象不仅限于艺术领域。

世界性的上层建筑

公元前2000年时的克里特及受其支配的整个爱琴海是近东的组成部分，而无论是在所谓的东方化时期，还是希腊化的东方好时机，希腊均不在其中。尽管近东地区的各种文明间存在冲突，却是平等存在，相互开放的。不存在丝毫的不平衡：交换平等展开，互通往来。形成一个奇特的共同体，一种广泛的文化上层建筑凌驾于经济活动之上铺展开来。W.S.史密斯先生从中看到青铜时代的主要现实。整个近东地区，而不是如繁盛时期的克里特或十八王朝时期的埃及这样的某一国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如果想在这一文化繁荣当中寻找最具活力的元素，或许应该将目光转向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和比勃洛斯。因为统一使得从克诺索斯到苏萨，从迈锡尼到埃利芳提纳的整个近东地区的文明合为一体，而叙利亚作为中介者一直处于统一体的核心位置。

自由的交流需要诸多条件：首先是有利的环境，富裕且苛求的社会，外加一个紧密的国际交流网。最后，环境产生了新的思想，一种好奇心，

它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对一切新奇事物，一切代表时代潮流、技术、建筑、艺术的事物的迷恋直至迈出外交的第一步。国际化生活起步了，在此前景之下，探寻某个装饰性主题、陶瓷制品的风格、建筑细节、壁画技术、金银细工工艺等的起源及传播地区的细枝末节性的研究在考古学中变得极具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并不太在乎争论实质的人们，在关于"影响"的研究中总是探讨着同一个问题：谁是先驱？就历史的总体而言，就历史上的地中海而言，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微乎其微的吗？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航海依然是一项冒险活动的世界当中，已经生成了一种相对快速不凡的传播能力。

克里特岛北岸的马利亚有岛上最古老的宫殿之一，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得到整修，却未曾像克诺索斯或费斯托斯那样经过彻底翻修。惟有这座宫殿能够帮助人们大致了解公元前2000年初岛上的早期宫殿。当我们在幼发拉底河上的马里进行的挖掘中发现了吉姆里利姆的美索不达米亚宫殿——占地数公顷，宽阔的露天中央庭院四周环绕着迷宫式的建筑群——时，便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我们在遥远的公元前18世纪汉穆拉比时期参观过的著名的建筑群已成为克里特宫殿的模本。它在年代上早于后者，而且通过空中摄影清晰再现的全景图可以看出它与马利亚的宫殿极为相似。总之，同样功用的设施建筑风格也相同。而且，通过马里的书板，我们也了解到活跃的贸易将克里特的商人们，通过乌加里特集中点这个中间站，与这座贸易向南部延伸直至波斯湾的强大的马里城池联系在一起。既然开展商业往来，为什么不同时进行文化交流呢？的确有，但这一次是在安纳托利亚门德雷斯河上的贝斯叙尔唐（Beyce Sultan），英国人于1954～1959年间挖掘出另一座同样建在中央庭院周围的宫殿。与马利亚的宫殿相比，这座宫殿规模更小，也没有那么"错综复杂"，但两者却存在一些共同之处：廊柱，支柱，完全是马里所没有的。正是它使得相互交错的演变关系无限复杂化了。因为对柱子的偏爱是由埃及传入的，我们也了解埃及与安纳托利亚的关系。而在马利亚，一个多柱式奇特的大厅清楚无疑地体现出埃及风格的直接影响。何乐而不为呢？人们在克诺索斯发现了一尊约公元前19世纪埃及式塑像，又在埃及的阿比多斯同一时期的物品当中找到了米诺斯的顶柱盆饰。我们当然不用参与学者式的讨论和研究，而只是得出如下结论便足矣：美索不达米亚、克里特、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在公元前2000年时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建筑风格。甚至我们曾认为是克里特人发明的

陶瓷铺就的洗浴室和污水直通下水道的排水系统，也出现在马里……

再者：马里的最后一个国王吉姆里利姆，在城池于公元前1760年被汉穆拉比征服之前派人在其宫殿中绘制的壁画，难道不是从克里特那些直至公元前16世纪第二个帝国时期才迟迟出现的壁画中获取灵感而如法炮制的吗？相同的退火技术，相近的色彩，或许由于研磨的石头相同，例如用以提取美丽的蓝靛而使用的天青石，数百年之后，这种颜色对于埃特鲁斯坎人依然十分珍稀。主题也十分相似：圣事游行，仪式场面。然而，我们已经说过，宗教赋予的灵感截然不同：在马里，所谓的授爵式场面从地道的美索不达米亚圣事仪式中获得诸多灵感。而在同一块石料上面，闪族人那已将苏美尔肃穆庄严的风格加以淡化的想象力在阿卡得时代得到充分发挥：一棵棕榈树，有两个人正在攀爬（或许是为花朵授粉举行的仪式），一棵不真实的大树，修长的树干尽头盛开的是像埃及纸莎草的花束，两树之间，一只蓝色的小鸟独自凌空飞去，穿过绿色的棕榈叶，划过天际，在马里与克里特之间划出一道弧线。

然而，角色同样可以互换。在马里，国王授封仪式巨幅画面四周，规则分布着螺旋线形边饰。尽管一些朝代之前的陶瓷制品中已出现早期的螺旋形图案，但我们通常认为螺旋线（焦躁的海面上涌起层层波浪的情景）起源于爱琴海。然而，又要对一个普通图案追根溯源，说到底，这是否如此重要呢？有意思的是，在公元前3000年的爱琴海、锡罗斯岛的“火炉”、克里特精美的石头花瓶，或特洛伊 II（H. 谢里曼称之为普里阿摩斯的财富）的珠宝上面频繁运用的螺旋线自公元前2000年起同时出现在马里的壁画中、埃及坟墓的顶板上及宫殿中，当一批亚述商人在卡内什（灰山）居住时被称作“德卡奥阿多斯”（de Caooadoce）的彩色精美陶器上奇怪的动物身上，自埃及十二王朝起还扩展到埃及的印章和珠宝、克里特和爱琴海其他岛屿的陶瓷制品、塞浦路斯的彩釉陶瓷、贝奥第的“托洛伊”地下（a tholoi）坟墓，直至马里一位神明（或王子?）呈螺旋状卷曲的胡子，——胡子当然会卷曲，即使如此，那完美的对称依然令人惊叹不已。公元前16世纪，博阿兹柯伊赫梯宫殿大门上的战神也身着有螺旋形装饰的缠腰布！

克里特给予埃及灵感

细节本身虽然无关紧要，却能恰到好处地帮助我们了解文化交流是缓慢进行的，而有时又是通过何等简洁、多样且出乎意料的途径。因此，借

助彩色绣花的布匹、各式各样的花瓶、滚筒、埃及护身符圣甲虫、旅行者的纪念品，尽管他们有时会忘记交给我们……W.S. 史密斯想象出自公元前20世纪起前往比勒洛斯的克里特人是循着城中迦南商人的足迹一直抵达埃及，并参观了中王国凿岩而建的坟墓；这些坟墓不是一直向公众开放的吗？因此，无论是埃及还是马里的绘画都应该为克里特壁画的诞生发挥了作用。然而与此相反的说法却更加真实：米诺斯自然主义唤醒了尼罗河艺术家们的好奇心和模仿欲，并对叙利亚，特别是其北部地区产生了某种影响。这正是文化传播的有力证明。

可是年代上又出现了问题。克里特的宫殿布满壁画主要是在公元前16世纪以及公元前15世纪。而到了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已被迈锡尼征服，之后所谓的阿马纳风格才在埃及独占鳌头，此种风格与米诺斯艺术何其相似，让人不禁对两者的关系表示怀疑。同样是在公元前14世纪，在叙利亚米坦尼的印章上出现了身形轻巧、身披长发的年轻的克里特人形象或斗牛的场面，我们在埃及的卡汉也有同样的发现。

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且两者互不排斥。首先是人：克里特的能工巧匠们在岛屿被占之后，难道不会选择逃往叙利亚的北部地区——他们对此地了如指掌——或来到更远的埃及吗？处于十八王朝时期的埃及奢华与娇造之风盛行，正需要大批技术工匠。W.S. 史密斯精心完善的另一种解释则着重说明了自公元前16世纪起，克里特风格以何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反复多次对埃及苛求形式的顽固传统形成包围。

无论是在埃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会想到泰勒沃尔卡［Warka］的精美花瓶和乌尔的“旗帜”），都存在使用叠加的手法表现一个场景，甚至用以装饰彩绘花瓶这一十分古老的习惯。套在战车上的乌尔野驴相继排列在中楣上划分的三个层面，——就像电影中被定格的影像——画面中总是同一匹野驴，脚步由平缓渐渐变为飞奔。无独有偶，在埃及也有类似的浮雕，收割麦子，装上驴背，运往粮仓，储藏起来：墙面被横向均匀划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分隔线两侧依次排开，没有一个场景会在各个要素各安其位的同一整体空间内给予完整的表现。意义上而非空间上的联系将归属同一场景的不同人物串联起来。这样的表现形式牺牲了动态效果。也没有背景框架，而是通过象征手法加以表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花瓶上，一支麦穗或公牛背上驮着的一枝花就代表田野或草场；在埃及，莲花、钓鱼的情景和几个用以解释的象形文字便表明正在三角洲一处亡者的土地

上。近东地区惟有爱琴海用我们领会的图像加以描绘：卡马雷斯花瓶上通常不相对称的花朵或螺旋线，金戒指椭圆形的底盘上不规则排列的克里特女舞者或迈锡尼战士，克诺索斯山崖背景之上的蓝色小鸟，自由地占据着艺术家们重新打造的空间。

总而言之，埃及依旧始终如一地使用横向平行隔断的传统空间构架，直至罗马时代，即维持了3000年之久。然而也曾出现过中断。埃及开始对动态效果着迷可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末，图特摩斯一世时期，是从一个迷恋外国潮流的时代开启的。那是它的第一次尝试。动物为躲避猎人的追捕，狂奔而逃——毫无疑问，是从米诺斯人与迈锡尼人偏爱的“飞跑”的画面当中获取的灵感——画面占据了大块空间，但这一次没有被横向划分。抑或分割线变换了形式，呈波状起伏，以表现山丘和土地的变化。克里特的影响同样表现在对色彩凸显的印象主义风格：图画消失在彩色斑点的后面，分割线淡化，变成曲线，运用巴罗克风格出现裙裾摆动，旗帜飘扬的画面。

公元前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阿美诺菲斯三世从叙利亚的乡村中收集植物，并命人将它们临摹雕刻在其位于凯尔奈克的坟墓的墙壁上，绘制于王宫的地面上。此时，爱琴海的另一种雅致的花卉装饰，同样吸引着埃及人。由于阿美诺菲斯的儿子阿凯纳通废止所有的古老神明，而只将太阳神奉为惟一的神明，墓室绘画的传统也毫不例外地遭到彻底动摇。王子在阿尔艾尔阿马纳重建新都城、城市和宫殿。在这种变革的氛围当中，崭新的风格脱颖而出：它将动作——振翅高飞的鸟儿，追赶羚羊的狮子或猎兔狗——与植物、花朵、昆虫以及使用克里特自由风格和自然主义处理的鱼儿两相结合。阿马纳北部宫殿的“绿色大厅”和其中茂密的纸莎草与埃及画家钟爱的绘画主题，即举不胜举的沼泽地的景象大不相同。此种风格不仅征服了绘画作品，同时还渗透到瓷器、彩绘雕花家具和梳妆箱当中，甚至还在遥远的地方形成了流派。如果对一些细节忽略不记，塞浦路斯这种风格的兽角或兽头状瓷制酒杯可能就是在阿马纳制造的。

在数千年博采众长的过程中兼收并蓄的优秀艺术就是比勃洛斯或乌加里特的叙利亚艺术。对此，我们会感到吃惊吗？那些华美的物品——象牙制品、压花的金碗和银碗、珠宝、彩绘瓷器——都出口到遥远的国度。这是一种“国际艺术”的诞生，深知风格各异并加以利用，毫不顾忌地广泛借鉴。它为国外客户而工作：努力取悦于他们并售出产品。

阿马纳的世界性

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一对公元前2000年时的国际文化交流冗长的回顾继续加以延伸，特别是指出它们在植物、葡萄，尤其是橄榄树的传播，技术的传授，如玻璃器皿、瓷器和珐琅工艺品的制造工艺，甚至药剂配方——例如通过一幅底比斯绘画作品所描绘的陪伴在叙利亚王子身边的埃及医生可以看出——等的传播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然而在这些久远的年代，文明的主要语言显而易见在于宗教。美索不达米亚或赫梯的神话和乌加里特的诗歌都受到奇怪的感染，事例不胜枚举。神明与神话，以及最普通的文化财产一同从近东地区的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汇集了三、四种宗教传统的赫梯万神殿，就是再好不过的例证。而与它相比，我们却更喜欢这样一首奇怪的诗歌，它讲述乌加里特诸神的使者一直飞抵克里特，要带回克里特手工业者之神，他们的神圣主宰科塔尔：由他负责建造巴利宫殿……透过诸神的化身和新教名，一个个地探寻时间之神，雷电之神，或天神，这同样异常简单，或许也有些枯燥乏味。

对于公元前2000年的文化开放，就其新颖和不同寻常之处，可以以埃及为例，通过那里在整个东方地区结构最严谨且与外界最为格格不入的宗教能得到最好的了解。作为民族宗教，它排斥一切非埃及的成分，而且这种排斥常常是程式化的。在赫努姆的庙宇当中，长着公羊头的尼罗河分水神："任何亚洲人（Asiate），无论老少，不得进入庙宇"，神谕中如是写到。埃及人是惟一的合法信徒，甚至是世界上惟一的合法居民。或许，在努比亚和叙利亚此类或多或少被牢固执掌的城市中，一些埃及庙宇拔地而起，本地的神明可进入埃及人自己的万神殿，此后万神殿用哈托尔角或长翼圆盘进行装扮。这还是一种控制和稳定臣民的方式。然而，通过这种途径引入埃及神明当中的巴利和阿斯塔特，使其大行其道，甚至超越了政策的狡诈和谨慎。以此为鉴，至少宗教交流的秘密之门就只开启一半了。

在接近十八王朝时期初露端倪，并在阿美诺菲斯四世这位历史上最离奇的法老统治时期爆发的宗教和文化危机当中，这一点得到了更好的证明。太阳神来到法老面前，法老宣布他作为惟一神明的无限权力，并简单地象征性地由一日轮代表，日光被伸出的手掌遮挡。这位惟一的神明就是阿东，法老选取了这个名字，后演变为阿凯纳通——"阿东接受了这个名

字”。一场宗教战争令阿凯纳通开始抵抗凭借法老征服者们的馈赠得以富足的阿蒙教士那令人窒息的监护。战争迫使他放弃了底比斯这座魔鬼统治的都城，并仓促创建了新都，以表对阿东的敬意——这就是现在被称作阿尔艾尔阿马纳的小镇，只快乐而脆弱地存活了20年。

尽管这段小插曲启示颇多，但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此，也不在于并未取得成功的走向惟一神明的过程。此外，这惟一神明先于改革者预言，且不顾之后的反映，继续使人们的心灵忍受痛苦。我们感兴趣的是，埃及的宗教向某种世界主义开放，第一次为直到那时它都不愿了解的外国人而担忧。阿凯纳通的太阳圣歌把种族多样化归于上帝本身：“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他们本性相同，肤色不同。你就是这样使人们多样化。”而外国的灵魂，如果遵循万灵书的指点，将同埃及人一样得到拯救，去往天国，尽管只透过气味，诸神就能知道他们不是来自埃及的神圣土地……

阳光普照芸芸众生：任何人都可以生活在阿东及其同伴们创造的和平之中。然而，这依然是个危机四伏的年代，叙利亚叛乱和军事失败、内部宗教纷争，以至于这样的声明与一些不可告人的政治想法自相矛盾。为众人所接受的太阳神能够安慰并拯救帝国。而这些政治思想由来已久，在世界主义占据古老的埃及数代之后，阿凯纳通的神秘主义刹那间使之深入帝国宗教生活的中心。

三 变故，演变，灾难

居民

我们按照前面图表填充事件内容，却发现所有的光彩都暗淡下来。在无休无止的青铜时代，近东地区经历了种种考验、混乱、危险和灾难。历史错综复杂，但最终归结为清晰的图表，即某种关于人类活动的地理学。

地理学与人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把地理学当作基础性决定因素，它还是一件非同一般的解释工具。它澄清事实，提出问题；但不予解决。人类和历史已足以使一切变得复杂混乱，模糊不清。

让我们把问题简单化：起初，近东各个地区根据其人群聚集、定居或将受到排斥的情况，可分为五、六种区域。而极易转变为灾难的人口迁移便是我们所要描绘的那幅暗淡图表的核心所在。

首先，来看看人群聚集的地区，这些地区狂风纠集，旋风不断。这是一些长期扎根于此的国家，其城市、乡村、农业生产以及畜牧业均相对稳定。人口最为密集的国家——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最具吸引力，但它们阻止外来人口。与条件优越的国家相比，人口最为疏松的国家地域十分广阔，且易于接受移民，甚至向入侵者敞开门户。他们让位于外来者，有时甚至并未觉察：如广义上的小亚细亚，又如古希腊。

在这些备受觊觎的地区对面，是与此相反面临巨大人口压力且居民分散的地区。并非那里的人口密度绝对值偏高，恰恰相反，它远远低于尼罗河与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地区。但是相对于本地资源而言，这些地区的人口已高度集中，从而备受资源与人口不平衡的困扰。都有哪些地区呢？有高山、沙漠、草原，还有诸多的海滨地带。地中海的海员同时充当农民或园艺工也徒劳无益，由于受到近旁山地的制约，海洋领域十分狭窄，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依靠远海才可以生存。

因此，青铜时代的种种悲剧首先源自于分划地中海的不同地域。人类既是将其包围的自然力量的受害者，也是自身、习俗、野心和王子们……的牺牲品。

山区居民与航海者

然而，地中海的传统景象——山区居民走下高地，航海者某一天突然背井离乡，不再重返故里——在整个近东的其他地方，即那些并不邻海，而可以说被外围山地阻隔的内陆国家，远没有如此频繁和简单。事实上，近东地区首先是撒哈拉（沙漠）古老岩石构筑的庞大平台的延续，在红海处断开，自亚洲衔接，并一直延伸至伊朗的边缘。这一平台有些地方塌陷：如红海和死海；另一些地方则被抬升：一边是利比亚山脉和阿拉伯山脉，另一边则是尼罗河、黎巴嫩和安提黎巴嫩……而真正的山脉位于北部地区，在托罗斯山和扎格罗斯山两条山脉之外。这片地域构成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和伊朗的一部分，与亚美尼亚的广大地域以及更靠北的幅员辽阔的高加索地区连为一体。

因此，山区的危险地带在北部地区。但并不像在意大利或希腊那样，

人们只需溜人低势地带，便已经来到了田野和平原城市。近东地区的山区迁徙通常是断断续续的漫长旅途：来自高加索的居民在亚美尼亚安营扎寨，驻留几年甚至几百年，又在抵达目的地——美索不达米亚或叙利亚，甚至高原、高平原和低平原那些依然令人向往想要征服的小亚细亚地区之前在扎格罗斯山或伊朗驻足。我们对这些不断迁移的山区居民的了解往往局限于他们在目的地时的情况，因为对于这些地区我们掌握丰富的史料。而此前呢？

据我们所知，库提人起源于扎格罗斯山，即位于东部俯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道山峦屏障。无法证明他们并非来自更加遥远的地方。他们利用使阿卡得帝国分崩离析的内乱迅速发家；于公元前2160年占领巴比伦，并就地组建政府，只是时日不多便流于平庸无为。大致自公元前2116年起，他们被排挤出局。因此他们夺取了胜利，只是昙花一现。

胡里特人于公元前2000年初左右来自于亚美尼亚，其语言与除乌拉尔蒂（Lourartien）语之外的任何所知语言全无相似之处。他们或许是一群手工业者和冶金、甚至套马车和轻型战车技术的传播者。他们散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卡帕多西亚和西利西亚的城市当中。在卡尔切米什和乌加里特这些城市中也不在少数。公元前16～前14世纪间，他们像“下等人”或小人物那样，如果我们胆敢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在雅利安首领的指挥下，加人到米坦尼国家的建设当中。

至于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喀西特人，我们最初无法确定的情况同样是他们源自伊朗，还是亚美尼亚，或是更加遥远的高加索，或许同时来自于这些国家。从扎格罗斯山开始能够找到他们的足迹，那里是他们最后离开的基地。喀西特人的语言同样不属于印欧语系，但如果这些移民不是很快便将其丢弃的话，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定位点：公元前2000年，他们一经定居美索不达米亚便吸纳了阿卡得语。公元前1740年，正当古老的帝国在汉穆拉比去世之后逐步破败的时候，他们首先试图在此定居，成为主宰，但徒劳无功。公元前1708年新一次的尝试再遭挫败。喀西特人遭遇到很久之后日耳曼人面对罗马时同样的经历：他们开始以一种和平渗透的方式进人美索不达米亚，充当雇佣军甚至苦劳力。而一个外部的意外事件（赫梯人架着战车发动进攻，突然袭击巴比伦）终于在公元前1594年间接地为其敲开了权力之门。喀西特王朝随之建立起来，维持统治直至公元前1160年（统治持续时间最长）。然而作为征服者，早在获胜之前喀西特人已融人当

地的文化和语言。若不是缺少其他功勋，他们定会改变潮流：后来演变为亚述人传统服装的短袖内长衣就是其首创。因此，喀西特人的历史就是遭遇悲惨的民族的历史，但也曾有两、三次得到幸运的垂青：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国门不严时敲开了大门；又借助他人的力量夺取了权力；并当经济环境恢复时执掌大权……

而海上民族中却未能提供如此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满于政治角色吗？贸易需要的仅仅是和平以及相互支持。克里特人和迈锡尼人在基克拉迪群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区，以及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定居下来。叙利亚人在埃及建立了繁盛的小型商人聚居区，甚至开始开发西方世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此类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不容忽视，但无法与公元前 1000 年时地中海西部大范围开发殖民地情景相提并论。

然而，为了避免想当然地看待问题，需要了解在公元前 12 世纪那场决定性的危机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海洋居民——其名称得自于埃及人。那场动荡是为青铜时代[①]的辉煌画上句号的灾难的注脚，甚至是惟一的原因。如果说他们处处引起恐慌，难道首先不是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到来没有准备吗？全体居民集体经海上迁移，多么新奇！多么令人吃惊！公元 7 世纪的阿拉伯人入侵同样彻头彻尾地令人惊叹：人们并不惧怕来自沙漠或持续几个世纪的空白所带来的攻击与危险。

草原与沙漠：游牧

沙漠与大草原并非一码事，然而偌大一片草原，若是本已十分稀少的草木仍继续减少，草原便会变为沙漠；反之亦然。叙利亚沙漠是一片彻头彻尾的沙漠，位于下美索不达米亚边缘，将其隔开，并给予相对保障，但同时也备受常年干旱之苦。然而，它凭借着几片草场向非灌溉种植依然盛行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延伸。如今，这片“荒凉贫瘠”的边境草原，“在几场骤雨过后，会变得绿意盎然，万千花朵遍地绽放：这种不稳定的畜牧环境，是阿拉伯不确定的牧场（bâdiya arabe）。”自然而然，这里成为沙漠游牧民族、和平时期的参观者和牧场租用者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理想之门。

草原与沙漠的对立——就人口迁移这一点——并不是主要因素，甚至

① 关于海洋居民以及公元前 12 世纪的危机，请参见 W. A. 瓦尔德、M. S. 儒科夫斯基著《危机年代：公元前 12 世纪多瑙河外至底格里斯河》，迪比索，1992。（P. R.）

热带沙漠与寒带沙漠间的明显对立亦然。伊朗地处热带沙漠，但随着高原山地海拔升高，气温下降，便形成热、寒带沙漠的过渡。重要的是，古老世界的所有沙漠，如同彼此相连的海水一般，拼接成为彼此相通的一个整体，从大西洋直到中国，从撒哈拉（沙漠）到阿拉伯、叙利亚沙漠和突厥斯坦——艰难但终究通过准噶尔的大门将塔克拉玛干和戈壁的沙漠，以及北部的内蒙古和南部的满洲里的牧场连为一体。准噶尔的门户大体上也是白俄与蒙古人种之间的分界线。但是在古老世界巨大的缺口当中，人们处处面对同样亟待解决的问题：水源短缺，草场匮乏，需要大规模长期迁移。最终，各自都先后创造了同样机智而艰难的应对方式和同样的游牧生活技巧。

然而，不应将游牧生活想象为自人类历史之初起便尽善尽美——这是常犯的错误。拥有动作敏捷的动物、马匹和单峰驼（后来是骆驼，源自土耳其大夏）的大规模游牧生活出现得很晚。经过漫长的时间和逐步适应才达到这种平衡，首先是在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热带沙漠中；此后才是撒哈拉沙漠，在一系列大沙漠中，它总是落在最后。

几乎还要早于农业生产，初期基本的游牧生活是从家养动物之初开始逐步形成的：人们和他们的狗一起引领着小家禽、山羊和绵羊群。而大家畜，牛和后来的马，则是由定居农业生产者驯养的。他们组织了混合经济，而第二次游牧生活只是一种副产品。每每遇到收成不佳、干旱或人多粮少使得乡村生活陷人困境的时候，有大草原便能广泛发展的畜牧业总能为定居者们开启另一扇大门。就这样，一部分人被抛人一种偏离轴心的畸形经济，从此深受束缚与约束。他们不顾季节变迁连续放牧。为了跟随牲畜迁移，家变成草棚、帐篷或装满行李、载着妻儿的货车。而这种生活依然没有保障：干旱、争夺牧场的残酷竞争、人口过剩、在一些定居国家周边市场上遭遇失败的交易——随之而来的是恐慌、混乱和侵占耕地。

北方大草原：印—欧人

公元前20世纪以前，从匈牙利直到黑海、里海和大夏（突厥斯坦）的大草原和沙漠均被印—欧人占据。作为半定居居民，他们谙熟小麦和大麦，然而由于人数剧增和土地枯竭，他们时常被迫漂泊流浪、四处游牧。这些印欧人大致分为多个民族，对于他们，我们所知寥寥，而史前历史学家们的调查——基辅附近被称为特里波利耶的文明（公元前3500～前

1900），敖德萨附近的乌萨托沃文明（约公元前1800），以及阿法那希沃（公元前3000～前1700）和安得罗诺沃文明（公元前1700后）——则确凿无疑：所有这些地区的经济均为农业与牧业的混合型经济，因此依然以一些固定村庄作为依托。但牲畜群的作用已日渐提高，首先是绵羊、山羊、牛（但是没有猪），最后是骆驼和马匹。

马匹显然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并非一朝一夕形成。旧石器时代，直至欧洲西部都有大规模野生马群出没。驯养马匹大概始于俄罗斯南部地区，并从那里向四面八方推广。面当四轮车于公元前4000年出现时，拉车的牲畜是牛。用马匹套车直到公元前2000年才在来自亚美尼亚并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的胡里特人当中出现。正是在那广袤平原的边缘地区，人们发明了由一、两匹马拉车的两轮轻便马车。其结构极为复杂，因此要求制造者具备精湛的手艺：这一发明在未来数百年中大大动播了战争的艺术。这种伊朗—亚美尼亚起源说是可以接受的。在凡湖、塞凡湖和乌尔米耶湖之间，延伸着一个铁匠铺集中、森林密布的国家，前苏联曾在这里挖掘出了大量的两轮车，以及四轮车，它们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车轮属同一时期甚至还要更早（实心车轮在各地广泛使用，辐条式车轮则要晚一些时候）。

很快，轻便马车便在草原上的各个国家推广开来，接着又在近东地区大赚一笔，在那里这种贵族阶级昂贵的器具依然是荣耀的象征。总是落在后边的埃及直到公元前16世纪下半期才逐渐熟悉掌握，克里特略早于埃及，迈锡尼或许还要更早（公元前16世纪最初的25年）。在公元前13世纪的卡迭什战役中，成千上万的赫梯战车与埃及战车针锋相对。

还有最后一个决定性的进步，即始于公元前14世纪的骑马。但直到公元前10世纪前后，这种如此奇怪迟迟未出现的文明的新奇做法——骑上马背——才正式出现在高加索和伊朗周边地区。它动播了草原上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根基：骑马放牧可以看管大批的牲畜。骑兵们也不再像过去的驾车人那样是贵族老爷。人们能够快速地穿梭往来于东、西之间。而接下来，一幕悲剧性的历史即将上演。第一个迹象便是希梅里人引起的混乱。这支黑海北岸半游牧半定居的民族在今天的俄罗斯南部地区安营扎寨。公元前8世纪，他们在西徐亚人（斯基泰人）的猛烈的攻势下被驱逐而出。同许多史学家一样，我们从西徐亚人身上看到了第一支“完美的”游牧民族的身影，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因此在青铜时代早于公元前1200年以前，距离大规模爆发式的游牧生活依然十分遥远。这一时期印欧人的人侵当然不无暴力，但很长时期内骑兵部队的有效装配却很匮乏。侵略者就是凭借其非凡的勇气和作战的统筹安排在西欧、伊朗、印度（公元前15世纪）以及希腊和近东地区方向不断获胜的。他们还经常长途跋涉穿过疏于控制的地域侵人腹地。外来者与当地居民融合，有时甚至在他们的陪伴下，重新踏上征程。对此我们认为应该看看喜克索斯人对埃及三角洲发动袭击并在该地统治长达一个世纪的情况。这或许就是印欧人，但已融人了其他民族，且正是马和马车的出现确保了我们所了解的快速成功。

至于一些史料中将印欧征服者描述为将统治强加于被征服的农民的领主，同所有的史料一样，也不尽其然。在其同伴兼兄弟民族鲁维特人之后定居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很早便来到这里，吸收了古老的象形文字，而就其书写语文字而言，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其中只有近20%的印欧词汇，其余均从当地居民，即非印欧人的语言当中借鉴而来。亚该亚人在希腊的经历再次在赫梯人身上重演：他们淹没在一种追根溯源并不属于自己且超于自身文化之上的文化遗产当中。

赫梯人成为赫梯人

就像希腊人成为希腊人一样，赫梯人在小亚细亚成为了赫梯人。他们或许是从公元前2000年以前步人了自己历史命运的。他们来到（或许是从里海海边，或许是从色雷斯）安纳托利亚的高地，那里冬季冰封，夏季炙热。这些融人当地居民的印欧人矮壮强悍，并以其浅棕或浅栗色的头发及“希腊式”的侧影而一眼可辨，这一特征令擅长观察种族类型的埃及人也为之震惊。毋庸置疑，这是一群农民、陆地居民，他们很长时间从容地背向大海，在内陆的克泽尔厄尔马克河，即希腊人的哈利斯河的河谷当中建立首都哈图沙什（博阿兹柯伊）。财富便从那里孕育而生。

此后，活力充沛的人民、君王们的勃勃雄心、繁荣兴旺的冶金业和马车的广泛使用，这一切使得赫梯人将统治势力广泛扩展，令我们回顾历史难以确定。同时，帝国实施封建体制，册封土地、领地、亲王或公侯封地、采地——这些都证实帝国的脆弱的一面，并将导致严重后果。公元前1595年，他们曾出乎意料地成为巴比伦的主宰者，对于这一不可思议的征服使赫梯人大感困惑，以至于他们当场弃城而逃。然而，通过卡尔切米什、

阿勒颇和乌加里特，借助武力或通过和解，他们将势力扩展到海边和肥沃的克瓦桑。这一较长时期的向外扩张造就了他们的力量，也表明其勃勃野心。在南方，在巴比伦和亚述之间被分割开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无法对其构成制约；同时，他们在幼发拉底河弯道的关键位置制服了米坦尼人，并对抗埃及人的强大势力。公元前1285年那场赫梯人与埃及人之间骇人听闻的卡迭石大战标志着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就此结束。双方均可自称获胜而留驻。

约公元前1280年，采取明智之举的时机来到了，签署了最为古老的和平协定，其文本保存至今。这是长期外交往来和互通书信的结果。在阿马纳、博阿兹柯伊和乌加里特都找到了使用当时通用的国际语言阿卡得语书写的涂蜡书板。从安纳托利亚直到埃及，各大国均保留着信件服务。对于首次出现的外交的发展，医生、建筑师、手工业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公元前14、13世纪极具特色的王室婚姻政策，在或多或少出于诚意而签署的联盟或在和解中充当抵押品的巴比伦、米坦尼或赫梯的公主们，足足可以写上一本书。事实上，埃及的对外开放与向叙利亚扩张这一根深蒂固的愿望密不可分。它于公元前16世纪伴随着十八王朝法老的叙利亚战役以军事行动的形式开了头，并以喜克索斯人被逐出三角洲，后藏匿于巴勒斯坦城市中而宣告终止。大获全胜的埃及人努力保持其战果，并不断加强对米坦尼和叙利亚城邦实行的保护。

因此，正是这种帝国间的争夺使得赫梯人与埃及人在海外的土地上相互对峙，但却是在一种截至那时还未曾出现过的有意识的国际关系氛围当中。在某种平衡，权力的平衡于公元前12世纪的灾难降临前夕最终建立之前，战争和种种外交努力两相交替。

赫梯文明本身就是公元前2000年的世界主义的很好例证。它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借鉴得来。向安纳托利亚的当地人借鉴传统的建筑技术、彩绘上釉的红色陶瓷制品、动物造型的浇祭器皿、尖长的翘头鞋以及神明们的锥形发式，甚至他们的名字哈梯，等等。向美索不达米亚人借鉴其法典中的众多条文、象形文字以及横向表现人物的习惯。向公元前16世纪的世界性风格借鉴爱琴海式的螺旋线、伸展身躯奔跑的动物、螺旋造型的植物。或许还通过乌加里特的渠道向埃及借鉴一些细微之处——例如，在画窟（安纳托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庙宇圣殿中表现与国王的造型结合在一起的是有翼的太阳圆盘。最后，赫梯“千神云集”的万神殿不厌其烦地欢迎周

边的所有神明：位居其首的是天气或风暴之神，可能正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雷电之神阿达，以及叙利亚之神瑞舍夫或巴利。在赫梯人的雕塑中，该神通常骑于公牛背上。在他的旁边，是伟大的太阳女神，其实就是来自石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不可摧毁的母神，赫梯人赋予胡里特的 Hepat 女神的部分职权。

有意思的是在这些久远的世纪当中通过在博阿兹柯伊的发现的资料找到所知的第一个印欧民族，这些资料如此丰富，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查看和翻译。这同样归功于其艺术，尽管借鉴颇多，但依然可辨，尽管落入俗套，但极具表现力。

将他们想象为一个诚实、勇敢、稳重、活泼、热爱舞蹈和音乐、善待动物和儿童的民族是否是个错误呢？可爱的雕塑表现的是小王子站在王后的膝上玩耍，或跑来向她展示自己的练字本。这还是个天真的民族，在近邻伟大文明的阳光沐浴之下不断酝酿，并逐渐造就其帝国的规范。但赫梯国王从不像法老那样就是活生生的神明。身为战士民族的统治者，赫梯国王却常常选择外交途径而非战争手段以达其目的，在赫梯人身上，我们看不到战争的残酷——当时时代的普遍特征，甚至包括埃及在内，并在后来的亚述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最后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征是：妇女的社会地位——对于这个战士民族我们并不敢有奢望——而赫梯妇女却似乎和克里特妇女一样自由。

在南方沙漠中：闪米特人

公元前 2000 年，叙利亚沙漠及其身后更加古老的阿拉伯沙漠还未因贝都因人的侵略而焕发生机。他们很早便熟悉马匹和单峰驼，却几乎尚未开始使用。专家认为驯养单峰驼于公元前 3000 年便已出现，而且或许就在濒临波斯湾的东阿拉伯。而单峰驼充当沙漠商队的巨大搬运工至少要等到公元前 13 世纪（不久前，我们还认定为公元前 10 世纪）。

直到此时，商队的保障力量还是驴和驾驴人，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记载中称之为希伯来人（hapiru）。这个词——如果真的指驾驴人而非我们早先以为的沙漠民族贝都因人，能够提供宝贵的说明：事实上，它出现于公元前 23 世纪，消失于公元前 12 世纪。在约公元前 1890 年的一幅埃及绘画作品中，表现“亚洲”沙漠中的闪米特人的画而当中就出现了驴的形象，身着色彩绚丽长裙的闪米特人正在埃及的贝尼·哈桑向克努姆赫泰普王子进

献礼物：用做眼影的眼圈墨和沙漠羚羊……他们是否取道这样一条路线：我们怀疑它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直接相连，在古老的年代，它能够解释西奈半岛和内盖夫（沙漠）中间站的定居生活何以如此富有？此后，海上贸易的发展为驾驴商队和这条横穿沙漠多石地带的古老路线画上了句号。单峰驼能够在沿海地带的沙地上行走，而钉了掌的驴蹄却常常会陷入沙地。

可是如此宝贵的单峰驼为什么迟迟才得到使用呢？这或许与鞍辔的问题有关：事实上，直至公元前9世纪才开始出现了一种登骑单峰驼的新式方法。"在首批骑士们的近邻阿拉伯沙漠北部某地区，单峰驼饲养者们循序渐进地掌握了这种革命性的技术——骑上驼峰——的要领。"直到那时，他们还是借助鞍垫，骑上单峰驼的臀部。随着使用复杂的皮带系统（公元前8～前7世纪），及此后于公元前3或2世纪推广使用的马鞍架（Xavier de Planhol），新式登骑法不断改进。就是在这个时候，也仅仅是在这个时候，南方沙漠达到了游牧生活的"第二个层次"，即许多个世纪以后（公元7、8世纪），在阿拉伯征战的推动下历史大放异彩的层次。请再次注意，这一过程何其缓慢。

美索不达米亚周边的叙利亚沙漠很长时间一直十分平静。牧民们通常是需求者，他们租用牧场，出售牲口，运送商品，充当苦力。马里的史料中记载的便是这样一段单调的历史。只有当定居者表示认可，或需要劳动力耕种土地，或需要获得援助以对抗敌对城市，甚至鉴于自身动荡而无法继续控制大局时，才出现大规模的渗透，并随后逐渐演变为"征服"。简言之，这两个世界之间仿佛存在许多连通器，当一边漫溢，另一边空荡时，便会相互补偿，而且几乎从不借助暴力方式。

叙利亚沙漠的居民为闪米特人，分为众多小部落。自公元前3000年起，他们便向北靠近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那里最早的定居者——被称为阿卡得人，这种叫法或许有失准确，却已成为习惯——进入两河流域，直抵亚述、启什和马里。成功助长了他们的势力：萨尔贡建立了阿卡得王国（公元前2340～前2200）。第二次浪潮在于迦南人和阿莫里特人，他们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并最终将其闪族化，一部分人在南部比勃洛斯周围，一部分在北部和东部乌加里特和马里等周围。阿莫里特人同时分成小组，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各座城市当中，在摧毁了乌尔第三王朝之后最终篡夺政权：汉穆拉比就是阿莫里特人。而此时的阿莫里特人已同先于他们

的萨尔贡带领的阿卡得人一样，融人美索不达米亚生机盎然的文明之中。但在阿卡得、马里和比勃洛斯，其艺术依然保留着闪族特征。

许多其他的闪族部落在几个世纪中跨越一些稳定国家的边界，其中包括公元前2000年的哈内安人，便雅悯人和苏提人。更加重要的是阿拉米人，其推进自公元前13及12世纪起异常明显，并不顾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公元前1117～前1077）在河流拐弯处构筑高高的防御工事，强行突破中－幼发拉底河边界线。我们了解他们在肥沃的克瓦桑和美索不达米亚国家中起到的作用，其语言在那里取代阿卡得语而成为国际性语言。因为，这便是闪族在渗透中一个奇特的特征：尽管对文化、技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艺术几乎全盘吸收，他们却保留了自己的语言（阿卡得语，阿拉米语），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性语言首先强加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征服的地区，进而或许正是借助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自身的影响，扩及整个近东地区。即使在阿卡得王朝消亡之后很久，赫梯人、法老、乌加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外交信函当中仍然使用阿卡得语。

正是公元前12世纪危机带来的强烈震荡确保了阿拉米人的成功。同时，希伯来人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因迦南人和腓力斯人阻止其进入平原（似乎是公元前1230年以前）而在巴勒斯坦半空的群山之间定居下来。最后一次浪潮即阿拉伯人于公元前9世纪第一次被载人巴比伦人史料。而伟大的历史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才等到了辉煌。

我们承认，所有这些事件都在重复。它们从根本上阐释出几个世纪中未曾改变的人际关系：一方面，游牧民族常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财富而争夺不休，而不幸的美索不达米亚又无力抵抗；同时，这些在其土地上慷慨献身的可怜的人们同时又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生存必需。沙漠，山峦？总而言之，人力储备被利用，又反过来利用他人。

海上民族：一场可与罗马衰亡相提并论的灾难？

公元前12世纪带来如此重重灾难，以至于此前的几百年与之相比都可谓幸福平静了。灾难当然无法逃脱，但总体而言，总会有所补偿：克里特脆弱的王宫遭到毁坏后得以重建；再次破坏，再次重建；埃及受到内外夹击，遭到侵占，但相继随着中王国和新王国的建立而重整旗鼓；美索不达米亚摆脱了更多也更为严峻的苦难，终归脱离苦海。与此同时，前进的脚步没有停歇。在公元前12世纪的动荡之中，惟有政治稳固的一部分国家，

而并非全部，得以幸免，而境况又是何等悲惨！各国遭遇了同样残酷的经历。一个历史时代就此结束。正如一切历史事件那样，其中一些惊天动地，戛然而止，另一些则悄无声息，常常在现代人尚未觉察时便已消失殆尽。

在这些问题开始的时候，是戏剧性的历史首先吸引了我们。这是何等奇怪的历史啊！一下子弄不明白，而一经考虑，一切更变得云山雾罩！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帝国静悄悄地土崩瓦解了，比一座沙堆城堡的坍塌还要安静。我们并未看到责任者。30多年以前，约公元前1230年，迈锡尼宫殿几乎全部被毁，希腊大陆和一些岛屿上满是被遗弃的城市。是谁所为，同样不得而知：昔日人们指控多里安人，但考古学家们已经证实，这是最后一批古希腊的印欧人侵者，直到公元前12世纪末才踏上这片土地，至少要到100年之后。多里安人是否真发动过侵略？一位持重的历史学家面带微笑地自问。[①] 至于海上民族，这些处于仿佛临近世界末日时期的核心人物，我们只在埃及人两次消灭他们的时候真实地看到。他们在遭受惨痛失败后依然存活下来并不令我们过分吃惊。但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历史学家大感困惑：在相继扼杀了几个文明的一场宏大的悲剧的边缘，在青铜时代不久将彻底毁灭的面前，他们寻找着清晰的答案。而历史却避而不答。

事实上，我们掌握着四方面的事实：

(1) 赫梯帝国——哈梯——约公元前1200年崩溃；

(2) 迈锡尼宫殿在约公元前1230年[②]被毁并遭焚烧；

(3) 埃及记载中称为北方民族、岛屿民族或海上民族的各个民族向埃及方向发动进攻，并于公元前1225和前1180年两次遭到镇压。这些日期几乎是确凿无误的；

(4) 公元前2000年末期，一段长时间的干旱扰乱了地中海的平静。最后一个因素是气候，这是不是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

下面我们对以上四点加以说明。

第一，赫梯帝国的衰亡，根据在乌加里特（拉斯沙姆拉）发现的史料，它发生在公元前12世纪初，而并非公元前13世纪末。其间存在细微的时间差。指挥拉斯沙姆拉挖掘的克洛德·A. 舍费尔煞费苦心地想要解开

① 如今，对于这一场侵略的怀疑甚至更为严重。(P. R.)

② 但王宫生活又在小范围内展开，宫殿直至公元前12世纪末期才被真正遗弃。(P. R.)

这个好战帝国径直走向消亡的谜团。首先有几点可以确定，但都是负面的说明：海上民族沿着海岸前进，从西、南面穿越小亚细亚，攻打赫梯人的附庸国、联盟国或朝贡国，最后来到塞浦路斯、西利西亚、卡尔切米什和乌加里特。然而，在安纳托利亚境内，特别是在博阿兹柯伊的挖掘中，却没有发现他们的任何足迹。还需补充一个细节，赫梯王国在谜一般地惨遭挫败之前，曾在乌加里特船只的援助下在塞浦路斯附近的一场海上交锋中战胜过海上民族。但这并不等于说，入侵者们在此之后瓜分海上赫梯帝国及其船只不是对帝国的沉重打击或致命伤害。另一个反面的例证说明：来自色雷斯的弗里吉亚人也不会是摧毁哈梯的直接破坏者。和希腊的多里安人一样，他们是在赫梯各大城邦纷遭破坏之后，几乎是同时，来到了安纳托利亚平原。

也就是说，至少存在两种观点。K. 比特尔认为入侵者存心将哈图沙什（博阿兹柯伊）、卡内什（灰山）和阿拉萨·霍郁克的公共及私人建筑通通烧毁，而克洛德·A. 舍费尔却不以为然。他这样写道：“真的会有一位征服者在占领了赫梯安纳托利亚的都城及其他当代城市中心之后，除了火烧宫殿和防御工事之外，还要在他们即将立足的城市中将私人住宅也统统付之一炬吗?”乌加里特和博阿兹柯伊的史料似乎为他证明了赫梯帝国首先从内部和边境地带开始坍塌，先后遭受近邻亚述人的攻击、附庸国和联盟国的暴乱和叛变（乌加里特首当其冲，在赫梯帝国末期的忠诚也令人怀疑），最后遭遇极其严重的干旱和饥荒。其最后一位国王苏皮卢利乌马斯二世紧急向乌加里特调用一条装备齐全的大船，向西利西亚运送奥龙特斯河谷的小麦（“此事生死攸关”，他明确指出）以及“全国所有的船只”，用以输送国王、王室、朝臣及军队。可见苏皮卢利乌马斯二世此时已将国都舍弃。为何原因？克洛德·A. 舍费尔认为，这或许是由于干旱和强烈的地震造成的国家荒芜引起的连年饥荒。关于这些地震，在整个公元前2000年土耳其境内的考古挖掘中常常找到确凿的证据。安纳托利亚土耳其地区极不稳定，地震频繁，且常常伴有火灾。正当赫梯城市遭受致命打击和火灾破坏时，乌加里特同一时代的考古水平自身难道不是正像克洛德·A. 舍费尔所说的那样，“被异常强烈的地震所摇撼”吗？尽管如此，有一些专家则始终坚持人为所致一说，相信“外来”入侵，以及入侵者最终在南方与海上民族大规模的迁移人群相遇。

第二，迈锡尼的终结同样并不清楚。公元前13世纪时的迈锡尼文明依

靠密集的人口、重要的城市、外部支撑点的宽大网络和遍地开花的贸易往来依然活力充沛。惟一令人担忧的不和谐音符便是希腊大陆的各座城市纷纷加强自身防卫，搭建蛮石围墙。在雅典古卫城——一座迈锡尼城市，佩拉尔吉翁（Pelargicon）围墙便可追溯到这些凭借智慧或出于恐惧而修筑的防卫工事。无论是在雅典，还是在迈锡尼，从堡垒开始，我们甚至都还发现了深不可测的水井，一直挖至地下水源：陷于围困之中的人们甚至可以跑到敌人的脚下饮水。穿过科林斯地峡，同样建有一堵蛮石巨墙，但与中国的城墙相比微不足道（在地峡的东南部还留有一截墙体）。这一事实给人何等的启示啊！迈锡尼城市纷纷感受到威胁，相互敌对，这一点毫无疑问（传统上称之为阿尔戈对峙第比斯的战争），但似乎还有一个共同的危险摆在面前。

我们知道约公元前 1230 年，迈锡尼、皮洛斯和梯林斯的宫殿纷纷遭到彻底毁坏，在城墙脚下大量已烧焦的残片碎石下面还发现了守城将士的遗骸。整片地区遭到遗弃。此时的迈锡尼人遭遇又会如何？佩·阿兰（1962）依据在王宫被毁之后随即落脚的 C3 风格的陶器，穿越希腊大陆，追踪他们的足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海岸的崇山中寻找庇护所的迈锡尼人不在少数（这一海岸保留了阿哈伊亚一名）；他们继续占据了阿提卡，那里的人口和繁荣程度在王宫被毁之后甚至还有所增长和提高；而在优卑亚和贝奥第的人数则依然寥寥；他们几乎彻底抛弃了迈锡尼生活的中心，阿尔戈利斯，南部的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南部爱琴海的诸多岛屿同样遭到彻底遗弃。克里特的当地居民躲进了山区，也就是古老的米诺斯人，因为在古代，其后代在岛屿东部仍然说着一种非希腊语语言，并被当作爱琴海—克里特人，即“真正的克里特人”。此外，其他的岛屿，例如西海岸的剀法利尼亚岛或罗得岛、科斯岛、卡里莫斯岛，最后还有塞浦路斯（似乎被迈锡尼人以武力攻占），所有这些古老的贸易中心都接纳了不断增加的迈锡尼新兵。在西利西亚，他们似乎是以达纳因图人（达纳埃人）的名义安驻下来的。

是谁引起了这些逃遁和迁移？又是谁摧毁了迈锡尼宏伟的宫殿？是啊，不是多里安人，又会是谁呢？

关于这一点同样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猜测早于多里安人曾有过一次印欧人人侵。这里所指的或许就是“希腊”农民，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迈锡尼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带，还有马其顿，迈锡尼人从那里进口陶器，以及

伊壁鲁斯，自公元前 13 世纪起，那里便出现了一种与迈锡尼人不同类型的坟墓（在多里安人时期通过希腊传播开来）。我们还在那里发现了来自迈锡尼的青铜武器。就这样，正如辛克莱·奥德所说的那样，迈锡尼人应该是被自己的武器所挫败的（正如日耳曼人用罗马人的武器战胜了罗马）。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无论是这第一次入侵浪潮——假如确有其事——还是多里安人浪潮，都没有带来铁制武器，这与我们过去的看法一致（“黑色金属”于公元前 13 世纪末出现在爱琴海，但是通过安纳托利亚从东方传入的）。他们同样没有带来尸体焚化术，此种技术也来自小亚细亚。

早于多里安人的这一入侵恰到好处地解决了所有关于迈锡尼中心被毁的问题。既然没有更好的解释，故只能做此假设。而它自身又提出许多疑问，令其支持者们（例如樊尚·德博鲁格在 1964 年的一本书中）[①] 也无法解答。首先战袭未曾留下任何痕迹：通常既看不到丝毫破坏，更找不到任何表明外来者从此经过的可疑物品。同样无法确定侵略者的入侵路线——根据路线可以究其根源。最终也无法在抵达点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到底是在何处安营扎寨的呢？事实上，大部分的迈锡尼地点只是简单而单纯地被长期遗弃，未曾遭受人为破坏。宫殿虽遭彻底毁坏，城市却是完好无损的，只是同样都荒无人烟。人们纷纷前往其他地区，就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议。樊尚·德博鲁格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他们曾在某处落脚。合乎情理和逻辑的答案就是侵略者没有在他们征服的任何地区安顿下来，而是弃之而去。”看到这些，我们是否还应该相信入侵真有其事呢？里斯·卡彭特偏向于这样的结论：“根本没有入侵者。”他的假设是人们遭受了一场大自然的天气灾难。我本人很久以前便也已注意到在农业生活依然占据整个经济主导地位的时期，气候变化在地中海一带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我愿意相信他是对的。

第三，气候或“赫拉克勒斯人的回归”。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转述的一名埃及教士与索隆对话时做出的评论我们应当还记忆犹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阴雨，时而干旱，使得“一向变化有序且间隔较长的时间段”出现某种“病态”，洪水或火灾带来巨大破坏。这一次，“天空中运行的天体……出现了偏差”使得旱灾肆意虐行。这种说法同今天某些专家认定天气系统变化不定，数百年的活动或许与太阳黑子或大气整体运行有关

① 《最后的迈锡尼人及其后代》。（P. R.）

的说法相去不远。

在爱琴海，每年夏天，地中海季风都如期而至。它自北—东北吹向埃及和非洲海岸。从克里特或罗得岛直抵埃及的旅行如此便捷，便是这股数月不止的季风的功劳：明净的天空下刮过一股无比干燥的风，划过海面翻起层层泛着白沫的浪花，强劲的风力足以阻止在岛屿间值勤的希腊小汽船行进。这是太阳在夏季向北做视运动（mouuement apparent）所形成的持久而不可战胜的气流体系。它压制包括克里特及其他岛屿在内的近东地区，在每年 3 ~9 月形成持续干旱。秋天到来，干燥的风便通常会让位给西风带来的海洋降水。

里斯·卡彭特做出的假设是，公元前 13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地中海的持续干旱达到了顶峰阶段。不仅地中海季风的持续时间大大延长，而且所波及的地区也扩大了许多。

尽管里斯·卡彭特的论点不能作为证明，还是让我们接受这一假设吧。那么赫梯人、迈锡尼人和海上民族都不只是人力的牺牲品，而是毁于年复一年日益恶化的干旱，它使得夏季过分延长，农作物无法存活，就如锡拉火山灰曾造成的惨状一样。由于同安纳托利亚高原一样地处高旱地区，迈锡尼各座城市也纷纷在危机中损失惨重。城市被原原本本地遗弃。如果说宫殿被洗劫一空，葬身火海，那是因为那里囤聚着从农民的劳动中搜刮而来的民脂民膏，不堪饥饿的农民们纷纷暴动抢掠。就像是个偶然，首先被捣毁的恰恰是迈锡尼王宫的粮仓。

有一点支持了这种假设，这便是被遗弃的地区以及迈锡尼人选做避难地的地理分布。根据严重干旱的情况判断，来自大西洋的降水只停留在面向偏西风的地区，也就是：希腊西部的山区，这些地区“向风”；比其他地区更能避开地中海季风的北部地区；东部科林斯湾天然出口处的阿提卡，这一海湾（根据航海指导）在“5 ~7 月或 9、10 月间会形成暴雨低压”；甚至一些没有任何屏障阻隔西部雨水的岛屿：罗得岛或塞浦路斯。克里特山脉东西绵延，就不那么幸运了。由于地势起伏而将西风阻隔的平原以及受希腊群岛荫蔽的爱琴海上诸多岛屿都尤其干燥。当然它们均遭遗弃。迈锡尼移民迁往阿哈伊亚和科林斯海湾边缘、北方的美塞尼亚和希腊西部的伊壁鲁斯、备受恩泽的阿提卡、西部凯法利尼亚的岛屿、东部的罗得岛和塞浦路斯以及北部的色萨利和马其顿。移民的分布情况与雨水的地理分布不谋而合。

同时，我们所说的多里安人人侵，在希腊神话中描述为赫拉克勒斯人由多里安人陪同回归，可以被赋予新的含义。赫拉克勒斯人，这些赫拉克勒斯的子孙后代，或许就是阿尔戈斯的迈锡尼人。根据传统，他们在经历了悲惨的斗争之后，奉德尔斐神谕之命，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发，自愿踏上了逃亡之路，抵达伊壁鲁斯，来到了品都斯山脉国家、色萨利和马其顿王国。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和多里安牧师和士兵一起，或许是引领着后者，返回几乎空空荡荡的祖国，并毫不费力地重新安顿下来。未曾离开的阿提卡的迈锡尼居住者也同样毫不费力地抵制多里安人踏人其国土。这一往返是否促进了迈锡尼的辉煌和特洛伊战争功勋的传播？这一点是可能的：后来演变为荷马的口述传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根据一些考古学家们的说法，可以确定的是，这自北向南的回归将所谓的几何图形艺术传播开来，近期的挖掘证明它源自色萨利，而不是阿提卡。一百年的逃亡将从前的迈锡尼人变成为真正的多里安农民，他们装在行囊中带回的正是这种乡村陶瓷制品。在此期间，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忘记了文字书写。然而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斯巴达的国王们深知自己并非多里安人，而是“赫拉克勒斯人”，而且几个世纪以后，马其顿王朝的国王们和大亚历山大自身都是依仗赫拉克勒斯。

第四，海上民族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迈锡尼悲剧的角度看来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这是历史上一场较为持久的运动，自公元前 1225 年起，埃及人便将海上民族视为利比亚人——这些征服三角洲西部令其忧心忡忡的近邻——的同盟；从身份上来说，即吕西亚人，或许相当于（如果从埃及人冠予他们的名字上判断）后来的撒了岛人和伊特鲁立亚人[①]，及最后的亚该亚人和迈锡尼人这些种族团体。在埃及人的作品中描述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棕色汗毛，蓝色眼睛”的是否就是迈锡尼人呢？战役异常艰苦，但具有决定意义。成千上万的战俘落人埃及人手中。鲜血淋淋的战利品是从敌人尸体上割取的成堆的手臂和生殖器官。注意这样一点，在埃及，这个阿尔戈利得的海员谙熟的国家；在利比亚人身边，根据严重干旱的假设，利比亚人应是自动向尼罗河迁移，悲剧在迈锡尼王宫惨遭毁坏之后都只上演了极短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见迈锡尼海员们，在常规贸易突然间被切断之

① 见下文和第 172 注释。（P. R.）

后，转而大肆进行海上劫掠。

数十年之后，在未能平安度过一场漫长的，因此也曾动用武力的领主危机的埃及，危险重现。此时，时间久了都会变成“虫蛀的老朽木”的士兵一行备受指责。新任法老拉美西斯三世招募利比亚雇佣军，用烙铁打上火印，又在叙利亚海岸招募海员。实为明智的预防之举，因为约公元前1200年乌加里特最后的史料显示，定居在塞浦路斯和西利西亚的海上民族参与其中的那场袭击一直推进到卡尔切米什，并向南方挺进，行进中还摧毁了乌加里特。来自“绿色大海中诸岛（îles de la Très Verte）”（这种说法在当时大致涵盖整个爱琴海，包括大陆海岸）的帆船与沿着海岸线前行的路上队伍——男人、女人、儿童，赶着载满家什沉重的牛车——相伴而行。约公元前1180年，埃及蒙受两次惨败，一次海战——或许在三角洲附近，另一次是在叙利亚的陆战，可能是在的黎波里北部的哈尔帕平原。

胜利无可否认，但它并未解决问题。事实上，拉美西斯三世似乎应立即“接纳一部分海上民族作为三角洲的佃农和雇佣军”。而腓力斯人则得到或未得法老的同意便定居在巴勒斯坦，他们曾为这里命名并需要抵御希伯来人的侵袭。因此，根据传统记载，这些可怕的海上民族一下子便消失在历史的陷阱当中了。未遭占领或被埃及解救的叙利亚城市——除乌加里特外，后来纷纷恢复了自身的财富。而战果累累的埃及却最终丧失了它的亚洲帝国。

绝望的是些什么民族？必定是多个民族的混合体，就像入侵三角洲时一样。在他们当中除阿依吉瓦人和普拉萨蒂人——即亚该亚人和腓力斯人，他们可能起源于北方，而《圣经》传统却奇怪地认定他们来自克里特——外，还有西利西亚“达纳尼因人”。因此，迈锡尼人显然在探险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而这一次所说的或许是20多年以来或多或少暂时性定居在西利西亚和塞浦路斯的迈锡尼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想象到其他或同样迫于田地干旱而背井离乡，或被更加强大的入侵者从位于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扫地出门的民族。对于我们而言，赫梯人与博阿兹柯伊和乌加里特的书板同时消失了。然而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新赫梯文明，完全出乎意料，它不再扎根在高原上，而是在托罗斯山脉和安提—托罗斯山脉南部，以及北方叙利亚平原，过去曾是帝国附庸国的地区供给水源的山脉的山脚下。这些附庸国是否仅仅需要紧凑一些以便为高原移民让出空间，还是他们自身也被驱逐出境，沦入流浪者的行列了呢？迫于饥荒而踏上旅途的多

民族混杂人群，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海上民族。一篇埃及铭文最终似乎对混乱的原由做出了最佳的概括：“岛屿振颤摇晃，突然间将各民族倾吐而出。”

最后一幅景象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况。麦地那的浮雕展现出海上民族在拉美西斯三世对其发动的战争中使用的船只。这是一些无桨的帆船，两头抬高成直角，其中一头的顶端是一只动物头部的造型。这些船只会来自于地中海的什么地区呢？根据所知的介绍，惟一与之形似的，就是几个世纪以后我们在叙利亚沿岸看到的后面拖有木头的腓尼基“马船”，或亚述巴尼拔国王出猎时使用的船只，或巴拉瓦特的铜门上运载提尔部落的船只，最后还有西班牙一件腓尼基珠宝上的装饰……所有这些景象再现的是同一个地区：叙利亚。也或许是塞浦路斯，西利西亚……

漫长的中世纪

公元前 12 世纪重大事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漫漫无尽的长夜，即漫长的中世纪。光明直至三、四个世纪之后才得以重现。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公元前 12 世纪的那段悲剧，尽管它来势凶猛，而是它带来的中世纪，阴郁不快而稳固持久，阴影笼罩一切。

希腊的倒退最为明显。不仅仅是文字蒙受了难以修复的损失，所有的奢侈艺术、珠宝工艺、壁画、宝石刻制印章、雕刻象牙等等，统统消失。惟有陶车陶瓷制品得以幸免，这是于公元前 11 世纪消失并让位于早期几何图形陶瓷制品的迈锡尼风格留下的最后回忆。

同时，多里安人入侵之后，与近东一切的联系全部中断。直到很久以后，希腊和爱琴海发展起来，凭借自己的实力重新开展与叙利亚海岸及埃及的贸易往来，并在小亚细亚海岸建立商业点时，这些联系才得以恢复。然而，这个令希腊人初次接触（有力地标明东方化艺术时期）便深深着迷的近东经历了很长时期才恢复其繁荣，或者说安康，且情况并不尽善尽美。

对于这种倒退，或许有些深刻的诠释，而并不只是应从气候变化当中归纳原因。毫无疑问，首先是这种遥远的早期贸易十分脆弱，它是为满足个别社会群体和一小部分社会阶层的需要和要求进行的奢侈的交换。这些绚烂夺目的文明或许不过是一层金箔的厚度。早在悲惨的公元前 12 世纪之前，王宫经济中已经出现缓慢但深刻的倒退。战争代价沉重，远方的联系

亦是如此。不受优待的牢骚满腹，而享受优待的又不尽职责。哈梯深受封建体制的困扰而不断反抗。埃及想要保持其亚洲保护国的政治经济地位更是困难重重，而在成功制服海上民族之后，它终于失去这一切。此时，埃及内部出现了对王权的动摇，像通常情况下那样，表现为擅闯坟墓，农民与小土地所有者暴动，以及行政管理的混乱与无力。在美索不达米亚，除了好斗的亚述，一切都黯淡下来。如果回到经济状况的解释，我们便会看到由于面临缓慢恢复的结构危机，数百年的变迁还会持续。

至于这场危机，不要太快地称之为青铜危机。F. M. 埃舍勒汉很久以前就提出这样的观点：青铜时代的结束对于近东而言——世界上最进步的人类——意味着社会基础以及生活结构的转变。或许由西西里和北方叙利亚的铁匠完成的铁的渗碳技术自公元前12世纪之前开始传播，动摇了社会根基，海上民族的动荡造成民族混杂且阻隔尽除，这无疑助长了该技术的传播。而铁器，就长远来讲，是武器的推广和长达几百年使用青铜的特权消失。任何民族，无论其何等贫穷，无论其曾何等卑微，都能够使用铁器。埃舍勒汉还认为接下来产生了一连串变化。这一革新将昔日中央集权的大国与其贪婪的宫殿，雇佣兵组成的军队，以及奴隶般的臣民分割开来。铁器将是解放者。

也许局限于一种解释是不恰当的，而且还犯了超前的错误。铁器取代青铜器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并不比青铜器本身替代新、旧石器更快，即使是在武器起决定作用的领域，也是如此。高度文明的人们需要花费几个世纪来酝酿新发明。我们又将回到这样的状态。转变结束了，世界重新启动。但这将是个全新的世界，一些裂痕和旧伤将不再愈合。特别是像W. S. 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将爱琴海和东方世界连为一体的“直接了解”“不复存在”。同样是长期的裂痕。

第五章　公元前12～前8世纪，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公元前12世纪大裂痕形成之后，近东历经漫长的过程才得以重生。公元前约10世纪，光明显现，但直至公元前8世纪，或更早些时候，开始出现持久的经济复兴时，光芒才普照大地。

然而，经过海上民族的那场风波，生活依旧不好不坏地延续着。丰富的文化知识得以保存。埃及尽管内部四分五裂，生活平淡无奇，侵袭令其不堪重负，但依旧是埃及；而美索不达米亚虽然历经动荡混乱，也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迦南海岸，现被称为腓尼基海岸，也继续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然而，作为时代的一个特征，中间人已不再是服务者：面对昔日的主人，他们至少敢于出言不逊，傲慢无礼。公元前1100年，阿蒙（Amon）教士派遣的乌埃纳蒙在游历比勃洛斯时曾遭到冷遇，为收集给上帝制造小船所需的木材而费尽周折。

因此，数百年流逝而过，虽没有轰轰烈烈的历史，但地球也并未停止转动，且运转得合乎逻辑。新的形势和新的世界格局逐步生成。公元前8世纪，这一切初露端倪，人们的生活重新变得安逸舒适，而且历史在我们眼中也更加清晰明了，此时的世界与海上民族时期支离破碎的世界相比，已大不相同。

近东：某种“巴尔干化”

近东地区的政治版图异常复杂。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双双隐退，赫梯帝国瓦解，众多好战的小国随之相继建立，并趾高气扬地充斥着整个历史舞台。

在小亚细亚，在以亚美尼亚为中心的乌拉图尔重演了胡里特人这些我们曾提及的天才手工艺者的一段经历。这是一个强健有力且天生好斗的山

区国家。具备冶金技术的明显实力（如在俄罗斯卡尔米尔布于尔的挖掘发现）。其控制范围以凡湖四周为重心，大致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河谷一直延伸至高加索山脉。几乎就是在多里安人入侵的同时，弗里吉亚大致挺进到安纳托利亚高原，赫梯帝国的势力范围曾达到此地后又丧失（其首都戈尔季翁随着美国人自1950年开始的挖掘如今重现于世人面前）。在西边，吕底亚占据着与埃尔莫萨河和门德雷斯河平行的山谷，并试图直抵爱琴海。约公元前1000年，爱琴海边缘很快形成古希腊城邦的环行包围，并在此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南方，新赫梯城邦国家层出不穷。接下来是制造纷乱的荒漠之子阿拉美人建立的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国家长期围着大马士革转圈：不要低估了它们，它们控制着探入亚洲的沙漠旅行队的必经之路，这是对腓尼基人活跃的海上路线的重要补充。再向南，便是犹太人的国家，其短暂的辉煌于公元前约930年随着国家一分为二（南方的犹大王国和北方的以色列王国）而宣告终结。

犹太人应是从迦南的闪族人手中一块块占取了较为贫穷的土地，他们承载着那里的传统、文化和语言。他们大致经历了与赫梯人和希腊人相同的遭遇：即屈从于他人利益。其另一劣势在于：尽管一面临海，但因敌对的非利士及其朋友甚至同谋腓尼基人将他们与便捷的海岸线阻隔而无法通畅入海。正是提尔的腓尼基人在所罗门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70～前930年）建造了耶路撒冷的庙宇和宫殿，以及腓尼基船只，这些船只通过亚喀巴海湾的埃松加贝尔、经漫长的红海一线完成了犹太国王的俄斐（南阿拉伯半岛？印度?）之游；同样是在所罗门时期，一些腓尼基手工业者还在埃松加贝尔这座城市当中建造了重要的冶金设施以加工铜器和铁器，W. E. 阿尔布莱特先生认为那是我们所知的古代设计中最为完善，也最为久远的铜器和铁器。对于犹太国家而言，这大体上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因此，没有人会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不幸和以色列这个在历史的风雨飘摇中慢慢成熟的国家担负着宗教使命会在未来扮演怎样的传奇角色。

尽管腓尼基[1]的领土南受希伯来人与腓力斯人限定，北受新赫梯人阻隔，仅为古老的迦南土地的一部分，但在近东地区，它却最先恢复了某种繁荣。同公元17世纪经济大衰退时期的荷兰一样，腓尼基也置身于“庇护”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分辨不清的变化：比勃洛斯古老的霸

① 应该说腓尼基城市则更为准确。(P. R.)

权不复存在，先是因为西顿，接着又是提尔。自公元前约1000年起，提尔已成为主导性城市。腓尼基海岸就是这样挥霍大海而重获生机。相反，犹太国家则在幼发拉底河、地中海和红海之间陆上道路的交汇处营造繁盛景象，这些地区在和平时期是有利的环境，而当战争爆发时则危机四伏。很快，战争便在近东地区频繁肆虐。

这场持久、很快便显露可怖面目的战争的主角是小小的亚述国。起初，底格里斯河的这片上游河谷只是一片“极小的三角地”，南靠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田与城市，北依起伏的山地，西临沙漠以及沙漠中的阿拉米劫掠者，土地微薄且岌岌可危。亚述国如同一座四面漏风的房子，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只有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令其恐惧时才能换得自身的平静。这里并不是想为其辩护开脱罪名，但它的残暴的确回击了邻国，尤其是阿拉米人的残暴行径。为了生存，它被迫将被征服者斩尽杀绝，加之以沉重的赋税，全民流放以壮大自己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终于有一天形成了持久的威胁。尼尼微宫殿的中楣便真切地讲述着这些悲伤的故事。

然而在这场战争游戏当中，亚述富裕起来：宏伟的宫殿随处可见。战争对它而言是一种产业，一种将过去在大规模的贸易中落入巴比伦城市手中的财富夺取回来的方式。公元前10世纪末至前7世纪末，战利品和从乌拉图尔、大马士革、提尔、西顿、犹太王国以及以色列……强夺的捐税养活了亚述人。他们甚至大胆地亵渎神明：摧毁巴比伦城，废止对巴比伦神马尔杜克的信仰，并洗劫庙宇。厄运随之降临埃及。公元前671年，下埃及被占，数年之后底比斯也惨遭劫掠。当称得上满腹学识的伟大王子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30年在其尼尼微奢华的宫殿中（在和书房一样华丽的花园当中）辞世之时，帝国正处于巅峰之上。然而数年之后，备受奴役的人民和敌人的群起而攻之令亚述国无法招架而败下阵来。公元前612年，巴比伦人和米底人联盟夺取了尼尼微，令东方民族人心大快。这次轮到亚述城市惨遭被毁的厄运，幸存者也沦为囚徒。正是他们为波斯的国王们修建了宫殿，但处处令人想起已逝的亚述国。

不论在国王—祭司和好战的领主们的指挥下随时向邻国发动圣战的亚述军队具有何等的价值；也不论它统帅严密的军队、防御精良的轻型战车、强大的围攻工事和配备长矛、弓箭的骑兵，所有这一切何等高效，如果不是因为埃及和巴比伦逐渐跌入二流强国之列，沦落为此后成为近东的

“巴尔干半岛”拼图上的几块拼版，亚述也不会经历那些充满血腥与荣耀的时光。此时的巴比伦与（公元）15世纪濒于没落终点的拜占庭帝国那惟一生命尚存的肌体君士坦丁堡略为相似。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一切都在恶化、腐烂，甚至令人赞赏的灌溉渠系统也由于使用过度而引起土地盐化的加剧。埃及的情况则更糟。正如我们所知，从公元前10世纪前开始，未来落入“使用铁器的人们”手中。然而，埃及（过去）从赫梯人手中得到铁器，也随之进入“铁器时代”，却并未真正拥有铁器……正如一名亚述将军不乏讽刺地向耶路撒冷人民所说的那样，法老的国度从此不过是“一支靠近它会被戳破手指的折断的芦苇”（以赛亚，36.3）。被洗劫一空的底比斯再也没有从废墟中站立起来。

就这样，近东地区被迫生活在警报和内战的包围之中。此外，还要面临另一场灾难，那便是来自北方草原的骑兵们虎视眈眈的僭越。

骑兵部队走出亚洲大草原

在高加索、乌克兰、波多利亚的黄土高原与中央俄罗斯广袤的森林之间，发生着一些变革，其影响力穿越近东地区向南传播。持续了几百年的游牧生活终于停滞下来：骑马是其中革命性的因素。自此一切都被马儿奔跑所取代。南方的文明国度或正在重新走向文明的国家都前所未有地甘愿投入游牧者的探险生活。

我们说过，公元前9世纪末希梅里人的人侵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迫于自然变故，或不如说是斯基泰骑兵的压力而向南退出南部俄罗斯这片世代生存的土地的，或许正是这样一群半定居半游牧的农民。他们沿袭过去继续保留了一段时间的只有库班半岛和克里米亚半岛的一部分。在驾着货车和战车逃亡的途中，他们从中、西两面穿越高加索山脉。而按照埃罗多特的说法，其追随者由于弄错了路线而从东部翻越高加索山脉，来到米底，并肆意搜刮抢掠。

希梅里侵略者很快便在穿越乌拉图尔、亚述、安纳托利亚、弗里吉亚王国（被摧毁）和西利西亚展开反复袭击的过程中精疲力竭。他们在吕底亚夺取了萨迪斯，却未能攻下城堡；他们破坏爱琴海上的希腊城市，最终却完完全全融入了亚洲民族当中。

他们无意间带进来的斯基泰人十分危险。这些骑兵是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游牧者。他们30多年野蛮的探险生活（28，埃罗多特说）同各

类记载中所描述的公元5世纪匈奴人骑马穿越欧洲的景象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斯基泰人是白种印欧人。与此相反，在追随阿提拉的人群中黄种人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皮肤的颜色又有何妨！情景如出一辙。斯基泰人进行抢劫式袭击，寻求冒险的年轻人成帮结队，行动迅速且范围广。有时招募而来免缴“皇家捐税”的冒险家也夹杂其中。此外，由于新的征战工具马匹得到广泛使用，一种民主化随之确立。而在过去，战车曾是富人与强者的特权。这种社会变革与爆炸的巨大威力两相叠加。洗劫米底可谓斯基泰人穿越高加索和亚美尼亚的一大跳跃，而他们还要走得更远，一直来到安纳托利亚和亚述王国，甚至还挺进直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普罗塔哥拉以重金收买军队首领才使得埃及免于其难！直到久困之后的米底人获得胜利才将斯基泰人持久的威胁逼回北部地区。从此，斯基泰人回归从前的居地——南部俄罗斯广袤的大草原。

难以满足的好奇心驱使埃罗多特就在此实地考察。他带着惊诧悉心观察，就像曾经面对奇特的埃及一样。他用尽长长的篇幅描写这些半文明人群游牧的广阔平原、梦幻般的河流、大雪纷飞的冬季、羽毛般的雪花漫天飞舞，以及人们可步行其上的冰冻的河流甚至海洋。那里的习俗、预言家、马匹祭品、骑兵们从战败的敌人身上割取带发头皮或皮肤作为战利品佩带在身、人葬仪式，甚至各个部落在帐篷下、战车里的生活场景，依赖惟一的牲畜，无休无止地迁移，这一切都令他大为惊叹，兴奋不已。

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在如此冗长的描述当中寻找对我们眼中斯基泰人的荣耀的某种暗示是徒劳无功的。埃罗多特描绘黄金、珠宝、腰带、缰绳和鞍辔饰物的丰富不惜笔墨，却对斯基泰人重返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后展现的艺术之美只字未提——此种蛮野而阔绰，非同一般的动物艺术风格于公元前1000年末期影响着所有的游牧骑兵部落，直至遥远的中国边境。这是一种巧妙而奇特的组合，同时来自北方植被繁茂的大草原，与中国相近的卡哈苏克文化，又在近东游走和停留的过程中接受到来自高加索、安纳托利亚、亚述、伊朗的影响。此外，不久后还掺人来自希腊潜移默化的渗透，当斯基泰人遭到米底人驱逐又回归本都周边国家时，这一影响也愈加明显。例如，斯基泰人的神话主题和希腊的神话形象——帕伽索斯和戈耳工——双双出现在克里米亚半岛墓葬中的黄金饰物上。可见斯基泰人与希腊人间存在直接联系。雅典难道没有招用俊美的斯基泰弓箭手充当警察，在集会的日子里，把落后的公民逼赶到普尼克斯吗？

终于，一切又恢复了井然秩序。然而，以这一切很快便在文明世界中烟消云散为借口而低估草原民族的僭越行为，或是后来在欧洲和亚洲层起叠涌的擅闯行径，却是大错特错的。这些战争绝非只是单纯的附属物。

首先，草原民族深入近东各国，从安纳托利亚直至尼罗河，这些国家由于彼此过于亲密，其中一国受到打击势必殃及他国。近东地区的平衡状态对擅入者十分有利：希梅里人得到埃及的支持，按照埃罗多特的说法，斯基泰人成为无法平息的亚述人相当忠实的联盟者，并在几场抢掠中为其补充财源。总之，游牧民族加速了现有同伴间战争的可能性，近东更加深陷于这场没有出路的游戏当中。

更有甚者，斯基泰人操纵着米底人，使之多年受制于己，听命于己。对于米底的骑兵部队，庞大的波斯骑兵部队的前身，我们有权想象它通过某种方式由游牧民族革命性的骑兵部队中诞生而来。诚然，没有这支非凡的骑兵部队，就不会有波斯帝国，不会有近东地区的统一，也就没有波斯的和平（*Pax persica*）。或许亚历山大大帝也就不会备受诱惑？尽管在“亚述人”造成的漫长而单调的几个世纪的悲剧当中，近东陷入无休无止的争夺，但同时它也以某种方式置身于剩余世界之外，在此期间，伟大的历史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上演着。公元前6世纪末，波斯征服结束，东方力量大量积聚，以至于地中海世界突然间再次对此萌发了兴趣。就是在这摇摆之中，希腊的命运重新向东方转移——令本书的作者深感遗憾。

西方告别完全野蛮状态

西方并非东方殖民者纯粹的（*ex nihilo*）创造。在遭遇战之前的成千上百年，这里已经历了不可思议的转变。西方成为历史上一支强大的力量，甚至是地中海命运的缔造者。

“西方”一词含义模糊。我们由此想到的是阿尔卑斯山至波罗的海及北海的整个中欧和意大利半岛（以及两侧的岛屿），这在后来成为高卢地区，以及伊比利亚半岛和北非，狭义上讲，即加贝斯湾至大西洋。

而其中北非的地位很快就变得模糊不清：地理位置上属于欧洲，而文化上却早已呈现出东方风格。因为公元前1000年期间曾令西方动荡不安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足迹遍踏地中海，从小亚细亚直至伊比利亚，却未曾落足“马格里布”。他们横渡大河——多瑙河或莱茵河；翻越山川——巴尔干半岛，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却在直布罗陀海峡的“海洋”

面前戛然止步。这是否因为腓尼基人很早便已来到从加的斯湾直到现在的突尼斯的整片地区——即使未曾设立海外商点，至少也借贸易往来之机？不管怎样，腓尼基殖民扩张发展迅猛，而他们独自面对眼前这个幅员广阔、人烟稀少、原始蛮野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的非洲国家——把持垄断地位，尽情享用特权。这些居无定所，愚昧落后的人们极易蒙骗。同时，迦太基长期利用周围土著以及同样粗野，但能够穿越撒哈拉沙漠将金粉运至今大西洋上的里奥—德奥罗岛或南部突尼斯海岸的人们。

如此的贸易往来意味着广阔撒哈拉文明的成功。然而，自新石器时代起，我们便已掌握了证据：例如一些特殊的石制工具的传播，这些工具的图样与马车上绘制的图案惊人的相似——马车一定是公元前 16 世纪通过正在埃及新王国军队中服役的利比亚雇佣军（即埃及吸纳喜克索斯人套用马车的时期）四散传播开来的。就这样，一些道路贯通埃及西至摩洛哥，南至尼日尔。在途中的某些地方，文明的人们能够通过便利且悄然进行的贸易获得便宜的黄金。关于这一点，埃罗多特有过详尽的描写。

抛开北非不论，西方首先是中欧和西欧，埃马纽埃尔·德马托纳喜欢将其比做漏斗，宽度自东向西递减：如在同一水平线上进行比较，小小的“亚洲海角”在俄罗斯“地峡”宽广无边，在德国“地峡”渐渐收缩，到了法国“地峡”处则极为狭窄。自东向西，大草原总是助长人口的过剩：寻找土地的农民、躲避敌人的避难者和携带家人、赶着牲口的牧羊人。在南部，“漏斗”在巴尔干半岛完全打开，由一些狭窄曲折的通道通往阿尔卑斯山之外的意大利和比利牛斯山之外的伊比利亚这些半封闭的世界。

因此，对于向西挺进的人们来说还存在一系列障碍：欧洲半岛的狭窄、山脉与河流的重重屏障、茂密的森林，以及已久居于此的农民。然而，随着革命性交通工具的发明（四轮运货车，四轮套用马车，马匹），沿高加索—大西洋的中轴线自东向西运送商品也大大提速。于是出现了在近东与西方之间徘徊了数百年只为最终到达地中海的一系列侵略之举。

这些通常都是断断续续的迁移，每次停顿又成为再次出发的新起点。大夏（突厥斯坦）、黑海（好客海）的平原、高加索山脉的边缘、色雷斯、匈牙利平原和伊利里亚海岸都曾充当驿站。公元前 1000 年，西方世界中尚未开化且不可思议的中欧仿佛巨大的仓储库，森林广袤无边，河流泛滥横行，与今天森林密布的西伯利亚别无二致。自新石器时代起，大批农民便在易于翻动且无林无木的黄土地上定居下来。这些泥泞的仓库沿着冰川古

老的防线一字排开，从俄罗斯一直延伸至法兰西岛，形成一条连续的锁链。同时，人们使用石斧或金属制成的斧头，或放火焚烧林木在大片森林中开辟空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在此扎根立足：人们建立村落、种植作物、驯养动物、摆杆步犁和上套牛车。此外，丰富的矿产还促进了早期冶金业的发展。当“佩带金属项圈”的铁匠于公元前2000年初通过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从东方来到中欧时，冶金技术已得到应用。难道一切条件的汇总还不能令各种金属——铜、铅、金，很快还有铁——带给欧洲翻天覆地的变化吗？这里有着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矿产，森林更是取之不尽的燃料源泉。

基于这些原因，人们在莱茵河、多瑙河、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聚居生活。西方的历史并非完全起源于此，却是基于人的聚集而开始的。人们时刻准备迁移，仿佛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重磅炸弹，而且可能重复爆炸两、三次。如果将这幅画面中表现得转瞬即逝的方面加以纠正，它也并非是抽象的。印欧人入侵持续长达数百年。这段历史常常是在消磨中缓慢度过。

印欧人和克尔特人入侵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世纪），发生了中欧原始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新印欧民族的到来，它似乎由多个民族组成，而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相互融合，交换财物，甚至展开对话，并且一开始便都具备共同特征，考古学家们据此对他们一辨可知：即他们都使用焚化术。这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新生事物——欧洲已经出现过焚化尸体的做法——但就其广泛性和与早先文明彻底不同的价值而言，却堪称开创之举。人们发现了多处“骨灰场”，以及大面积“墓葬式”墓地，坟墓中并排摆放着盛放逝者骨灰的骨灰瓮。

面对这一潮流，土葬抵制、退缩，随后在许多地方只得让位。这些使用焚化术的民族征服了中欧，又来到意大利——这大概就是翁布里亚人和维拉诺维安（Villanoviens）人（意大利史前居民）；他们击退了利古里亚人（这一早已废弃不用的词语指的是更为早期的侵略者，或许是前印欧人）；占领法国东部，抵达罗纳河谷，接着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来到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地区。在北方，他们踏上诸多英国周边岛屿。使用焚化术的外来者或许都是印欧人，遇到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便与其融合相处。而民族间的混杂融合预示着焚化术终将没落。

这样一个纷乱不断，动荡不止的欧洲时代依然处于青铜时代。然而，公元前9世纪，铁器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历史的演变进程。是加速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意见一致。第一个铁器时代对应的是所谓的哈尔施塔特文明（名称源自蒂罗尔一疗养地之名，或许并非高明的选择）；然而此时的铁器只是出现却几乎并未发挥任何作用。直至公元前6世纪之后，随着第二个铁器时代，即一直持续到罗马征服时期的所谓的拉泰纳（根据纳沙泰尔北部一疗养地命名）文明的到来，铁器的使用才得以推广。也正是在拉泰纳时代，伴随着克里特侵略如火如荼地展开，重磅炸弹真正地爆炸了。

关于使用骨灰场的民族的扩张与克里特的推进，参看两张地图（见附图）能够大大地简化问题，并可预料出一些尚待确定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公正明了地展现出两次相互呼应，相互补充的大规模血腥征战——这也是最为主要的。从波西米亚到高卢的欧洲成为强有力的核心地带，其脉搏振动影响着遥远的地中海那些由于自然环境——阳光和葡萄——和历史差别而与北欧各国截然不同的国家。一场决定性的对话就此展开。

或许无需等到拉泰纳时代甚至更早的哈尔施塔特时代，最初的对话便已展开。当亚该亚人于公元前2000年初停靠巴尔干半岛时，用于制造和输送人员的强大机器已经成型。然而，公元前1000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地中海文明感受到来自动荡不安的邻国不同民族的强大力量。他们的名字各不相同：克里特人、高卢人、加拉茨人，在地中海文明当中，关于这些奇特、勇敢、爱说大话、高个子、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的人种的描述比比皆是。人潮涌动，他们乘坐“小船抵达，挤挨着穿越广阔的大陆”，亨利·于贝尔昨天曾看到的景象我们今天已不再可见。安德烈·瓦拉尼亚克曾这样描述：“前克里特人和克里特人的入侵是通过全体居民的迁移完成的，如同恺撒的高卢战争初期，赫尔维蒂亚人大批迁徙的景象。”

人的分量，提升了克里特侵略的价值。在侵略者到来之时，慌乱的人群需要安抚，使用武力将其制服。在我们的历史书中，他们处处摆出一副被征服者的可怜相。而其中众多的农民和灵巧的手工业者安居乐业，生存下来。我们怀疑是否应该谈及克里特人惨痛的挫败，他们“同希腊人带给地中海文明一样带给欧洲文明”，却被罗马铲除。胜利、失败，这些词用在一些驻扎定居下来，随后丧失地盘，今天仍可辨认出的存活下来的人群身上，又意味着什么？一切文明只有依靠持久不断的人才供应才可生存。生物决定论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罗马都发挥了作用；它们赋予“侵

略”的纷繁杂乱之外另一个深层的含义。

克里特人享有较高的物质文明，而社会文明却徘徊在较低水平。在哈尔施塔特文明时期，一些权势将财富聚敛在防备森严的宽敞房屋当中而形成一种宫廷文明。拉泰纳文明带有“民主化”的标记，或更确切地说，是纷乱的贵族阶级共和国到来的迹象。在克里特，强大的部落并存，而城市发展缓慢。曾描述了希萨尔滨波因人的波利比奥指明他们散布于乡村，没有城市（ateikhistoi），即便有城市，也没有围墙。那么，除了基本的社会细胞将消失在地中海极具城市化特征的贵族组织之外，还会发生什么呢？

克里特人迁移探源

需要综观历史来解释克里特人大规模迁移的起源。克里特人应是逃离人口过剩的地区。在那里，自公元前1000年起，阿尔卑斯山北部的气候已变得与现在几乎一样。日益加剧的寒冷迫使人口再次密集居住，或许还驱赶了一部分哈尔施塔特文明时期的使用焚化术的人们。更可确定的是，这似乎还引发了一串连锁运动，由东部地区踢出了开场球。公元前9世纪定居南部俄罗斯的希梅里人是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此定居并搅乱了特里波利耶文化时期的农民生活的半游牧印欧人的后裔。接下来，斯泰基人骑兵在公元前9世纪一直推进到喀尔巴阡山，扰乱了希梅里人，“这恰好与第一次铁器文明的初期相对应”，即哈尔施塔特文明。几个世纪之后，斯泰基人又成批重返“斯基泰王国”本部的大草原。此次回归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初，恰逢拉泰纳文明时期，日耳曼人大举推进，克里特人驾着战车到达高卢的时期：香槟地区的高卢首领以战车随葬，与亚美尼亚的首领们的做法遥相呼应。而这种转眼成为过去的武器长期流传，以至于当朱尔·恺撒在英国发现自己使用的战车时也大为吃惊。

结论：印欧人前仆后继的浪潮，被我们称做侵略的人口爆炸，首先于公元前约2000年出现在高加索和匈牙利间的黑海海域；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始于匈牙利和波希米亚；最后一次则是公元前600年以后，克里特人从外－莱茵河和高卢开始的探险。爆炸的中心就这样缓慢地自东向西逐步转移。但这难道不是同一段历史的重复吗？[①]

---

① 关于这些“迁移”，今可参见P. 布伦与C. 莫尔当（合著）的《莱茵河—瑞士—法国群落及焚化场概念》，讷穆尔，1988。（P. R.）

钢铁冶炼

我们勾勒出这模糊的几个世纪（公元前12～前8世纪）的景象，还未曾提到钢铁冶炼。它源自高加索或者说西利西亚则更为恰当。事实上，碳钢冶炼（硬铁的制造，加入碳使铁变成钢）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只是赫梯帝国的专利。如果说海上民族，特别是腓力斯人，已经拥有铁制的武器和工具，这或许也得益于他们与赫梯人或西利西亚人之间的联系。因此，或许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赫梯帝国的分裂促进了铁匠以及常被视为魔鬼般神奇的铸铁工艺在世界各地分散和传播。这些民族不是都拥有铁匠之神，一些灰暗的人物形象吗？然而铁器的铸造工艺开天辟地，其传播与发展过程自然也极其缓慢。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新旧结构的更迭过渡将是漫无止境的。

在美索不达米亚，事物的发展通常较之于其他地方速度更快，而铁器价格暴跌这一促进铁器的使用进一步推广的有利因素却几乎待到公元前10世纪才迟迟出现；而在埃及，新金属的广泛使用还需再等到公元前600年以前！矿产丰富的中欧长期摇摆不定：直至公元前6世纪，青铜才得以在武器和工具的制造中进一步发挥其特性。

铁器“革命”极其艰难的渗透过程恰恰遵循了这一时期排斥一切超速度的规则。那么，何为所指呢？即一种金属取代另一种金属。阿尔马格罗·巴施（1960）认定“铁器在文明的演变之中未曾引起与铜器及其合金的冶炼所引发的同等深刻的转变”，他的观点不无道理。铁器传播速度之缓慢使得对于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性唯物主义产生了某些怀疑性评论。不，铁器无法立即在战争中得到普及；不，铁质武器也并非诞生于瞬间。一个决定性细节推迟了这一进程，即焊接技术这一重要发明。根据神话传说，这项技术诞生于爱琴海的科斯岛。我们所知的第一块焊接制品便是发现于图特安哈门坟墓之中的约公元前1350年的铁枕。而焊铸工艺很长时间一直非同寻常，以至于一个铁焊三角架一直被作为稀有物品保存在德尔菲的财宝当中直至古罗马时代。再想想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时期，阿喀琉斯竟然将一个铁球以重金交换用于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

同样，铁器也未能迅速改变工具，却在此后改善农业收成上大有作为，这一点确定无疑。但是始于何时？闭着眼睛将它说成公元前8～前7世纪亚述小麦价格下跌的原因可需要冒一定风险。小麦的价格取决于诸多

其他因素，安全、进口的可能性，还有季节！……里斯·卡彭特一定会说：公元前8世纪，那可是雨季回归的日子。

字母文字

同样，字母文字也是这黯淡无光的几个世纪中的一场革命。文字在青铜时代已出现在整个近东地区：埃及的象形文字，古代亚洲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以及米诺斯文化时期希腊使用的线形文字B。这些已经简化的文字依然难以掌握，需要艺术人才。誊写者们组成了一个文人学者的社会阶层，决心维护其职业的特权与骄傲，严守行业机密，甚至连困难也不放过。这种负担沉重的奢侈行当在迈锡尼结束之后便从希腊突然消失并未让人感到吃惊。一种更为简便的技术更加容易地在印欧的蛮族当中立足扎根。

然而，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末且在我们眼中同所谓的腓尼基线形文字一样大放异彩的，正是这种简单且革命性的出色技术。它的22个字母均为辅音字母，并且正如我们所知，是组成闪族语言的基本构架。当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效仿腓尼基字母表时，缺少的正是元音字母符号以使其语言更加明白易懂。因此他们为一部分希腊语中没有的闪族语言的辅音字母中加入元音用法。有了辅音和元音的字母表从此变得完整。这也同时表明一段漫长历史就此终结。

在广义上的叙利亚，特别是乌加里特和比勃洛斯，语言的简化革命很早以前铺展开来。公元前2000年期间，各种交易，各种语言，以及各种民族在这两座如此活跃的城市当中汇聚一堂。而商人们没有誊写者昂贵的尖刀，他们需要一种快速的誊写方式来书写合同、发票、账单和信件。这种快速的书写方式——商人们合理的创造——取代了国家繁缛的文字。其中最早的尝试——拉斯沙姆拉的文件资料中的乌加里特式（Ugaritique）——要属使用楔形文字字母组成30个字母的字母表。我们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记在一块书板上的识字读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古老的识字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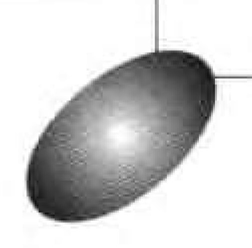
线形字母表于公元前15～前10世纪在迦南各国同步发展。一些人认为可认定其源自于公元前2000年在西奈半岛的埃及绿松石矿场工作的闪米特工人们使用的文字——一半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另一半为字母文字。在此意义上，它运用了如下的原理：使用元音与辅音组合的音节符号来说明某一单纯的辅音，于是该符号便可确定某一个字母。其思路与在电

话中拼读让·迪朗先生姓名的方式相似：Desire（喜欢）的 D，Ursule 的 U，以此类推。闪米特人运用此种方式选择并命名字母表中的各个字母：符号 Beth——意思为房子——表明字母表中的 B（B 即 Beth!），希腊字母 Bêta 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经过极其缓慢的过程，这种文字最终演变为盛行于公元前 1000 年时的腓尼基文字：因其简单，无论是使用毛笔在皮质、羊皮纸或纸莎草纸的纸卷上；还是使用尖头工具在铅板，或涂在小木板——一种易于擦拭并可反复涂抹蜡的“石板”——上的蜡质胶片上，均可快速书写。迄今所知最早的样品是约公元前 10 世纪刻在比勃洛斯国王阿依莱姆的石棺（古老的）上的铭文。公元前 10 世纪的希伯来语铭文已一成不变地复制了这种文字。希腊人或许正是于公元前 8 世纪在阿尔米纳学会了使用字母表，这座城市早期由优卑亚的希腊人在奥龙特斯河河口建立，后演变为腓尼基城市。同一时期，临近的弗里吉亚人难道没有吸纳由腓尼基语派生的字母文字？戈尔季翁的铭文说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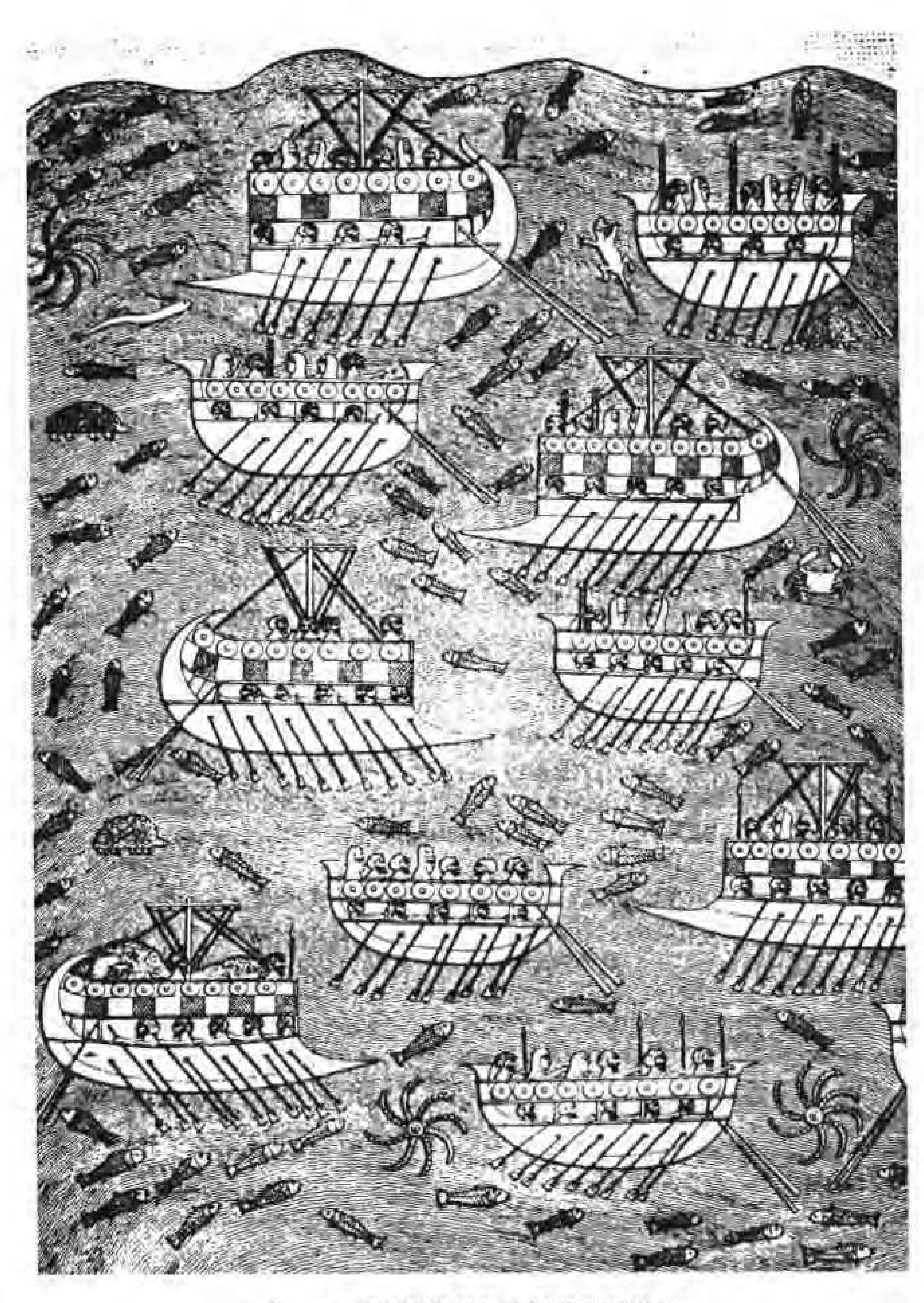
自公元前 8 世纪末期起，在那不勒斯附近的伊斯基亚岛上发现了一块刻有诗文铭文的希腊断石，是埃特鲁斯坎人最终采纳的卡尔基斯字母（卡尔基斯，即埃维亚首都）。因此，优卑亚殖民地库姆可能在这方面充当了意大利的老师。然而在这些缓慢的演变过程中一切都并不简单，在阿尔贝尼亚河的马西利亚纳约公元前 700 年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富有的坟墓中发现了一块象牙板，上面刻有 26 个腓尼基字母。这与在亚述尼米兹找到的同类的腓尼基石板十分相似，而且在其周围的其他物品中还发现了一个圣体盒和一把梳子，都是由一位商人从提尔带来的。我们在其中还发现了一种要求在商业信函中使用的字母编码，不管怎样，它证明腓尼基字母表及其吸收的希腊字母曾被埃特鲁斯坎人采纳。

总之，字母表在任何地方的传播都是缓慢而复杂的。与铁器或青铜冶炼的传播速度一样慢，几乎也不比农业更快，更比不过钱币或钱币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又有谁敢拒绝为第一个字母文字冠以“革命”之名呢？



第二部





Eperon 的战船与腓尼基的圆形运输船

根据尼尼微辛那赫里布国王（公元前 704 – 前 681）宫殿中的浮雕绘制而成。

经历了公元前1100～前700年间黯然无光的数百年后，地中海从此沐浴在历史的光芒之中。历史似乎简单了许多，它主要围绕三个分外重要的舞台展开，场面蔚为壮观：

——西地中海被西方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希腊人）殖民地化，这群西方人创造了地中海第一个活力充沛的统一体；

——在经历了海上风波之后，希腊文明前进的脚步在东方世界征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的残酷征战之中悄然停滞；

——最后是罗马的命运，其成功之处便在于真正的地中海最终形成。

对于这些为人熟知、经典的或许也难以理顺的历史场景（编入目录的事件何其多，提出的论点何其多），我们从大海这个极其特殊的视角展开观察。大致而言，这里发生了三次大规模变迁：伴随着地中海的殖民地化（地中海当时被称为大西洋：Ponant），地中海向西扩展；接下来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公认的胜利，又向东部拉平；最后凭借罗马而趋于平衡。然而，连续数百年自东向西控制整个地中海，其任务堪称艰巨，一个罗马难负重任。

有了这种十分简单的看法并不能为我们免除其他难题。古代历史迷失在几千年的漫漫旅途当中，同时也唤醒了强烈的热情。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提到过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拥护者、克里特和希腊的热衷者、东方的迷恋者，以及西方的捍卫者。但我不愿为维护埃特鲁斯坎人而置公正于不顾，更不必为了希腊人而牺牲他们；不愿追随诸多知名的历史学家对腓尼基人大肆批判，甚至斥责迦太基人使用儿童祭祀神明；不愿总为希腊人而着迷——可是！我同样不想试图重提黑格尔斥责罗马人只是历史上的一篇散文，仿佛这篇散文毫无华美之处；想要不偏不倚，兼顾左右。总能做得到吗？或者这合乎愿望吗？这些互相矛盾的热情是照亮历史的火光，是我们所听到的，也是我们再次了解的那段历史。怎样才能在这一过程中不必忍受痛苦或狂热迷恋，哪怕是与公平的原则背道而驰呢？

第六章　公元前10～前6世纪：美洲大陆殖民地化或发现美洲大陆

殖民地化，这个词含义模糊。在海岸边的浅水处下锚，订立合同，然后重新扬帆远航，这是一种情况；安扎驻留则是另一种情况。并且正是根据这第二种方式——通常在第一种方式之后很久——我们保留了殖民地化这个名称。

总体而言，公元前10～前6世纪，如果将好客海被占（首先是被爱奥尼亚的希腊人占领）忽略不记，殖民地化触及的便是地中海的中部与西部地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对这片难于到达更难以控制的遥远的西部地区的争夺为这里带来了源自东方的高级文明。然而，埃特鲁斯坎人的情况理应排除在外，因为关于他们与东方的联系无论是年代还是地理方面的起源和发展，我们都所知甚微。

而对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而言，没有任何模糊之处：第一批来自利凡得海域；第二批来自爱琴海和希腊中部的一座沿海城市科林斯[①]，他们凭借先进的文明，遵循和依据殖民化的传统规则：国力弱小便会招致强国的打击和教训。在此种情况下，力量即文明，座座相连的城市、帆船的技术、铸铁的技艺、广泛的交流以及强大的市场。古老的殖民者来自于近东，正像很久以后——15～16世纪海上大发现之后——大批殖民者来自强大的欧洲。他们在边远的海岸安营扎寨，接下来设立城市，并未与可同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印加人或莫卧尔王朝的文明相提并论的先进文明发生碰撞。

① 科林斯并非惟一一座与此相关的城市。其他城市也建立了殖民地：卡尔基斯、迈拉加、斯巴达、科罗丰、帕罗斯、米利都、福西亚，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参见本书有关章节。（P. R.）

航海探险者遇到的直接麻烦当然不是编写纪念性的碑文。腓尼基人初次登上撒丁岛可追溯到公元前 10 世纪甚至更早，因为我们很自然地便会想到在建立殖民地甚至单纯的季节性驻地之前，探险旅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从一个锚地到另一个锚地，船只便是流动的驻地。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甚至可以在必要时回到一些传统的或许已太过久远的关于腓尼基“建立”的日期上：公元前 1100 年的卡贝斯（加的斯）；按照普林尼的说法，还有比摩洛哥更早的利克苏斯；稍晚些的乌提卡；迦太基，其名字的含义为崭新的城市，公元前 814 ~ 前 813 年。然而，在利克苏斯深入的挖掘中未曾发现任何公元前 6、7 世纪前在摩加多尔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的痕迹。自公元前 10 世纪起，考古学家 B. 纳扎尔（1957）在西班牙发现了早期航行时的一些痕迹。皮埃尔·辛塔斯则强调（1949），自公元前 2000 年初起，来自塞浦路斯的海员从迦太基附近的萨拉木博海滩经过时留下了浅淡的痕迹。

总而言之，萨巴蒂诺·莫斯卡蒂（1966）主要依据海上民族插曲时期惟有腓尼基这支力量奇迹般地得以立足这一事实得出的解释性假设，但对于这一假设尚无正式的证据。公元前 11、10 世纪及公元前 9 世纪这三个世纪将迈锡尼的衰落与希腊向西第一次扩张行动区分开来。作者认为，“腓尼基扩张渗入这历史的空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想象在希腊航行放慢脚步时，腓尼基人参照历史上众多单纯的海上探险之先例，毫不费力地开发了遥远——空白的——海域；进而，自公元前 8 世纪起，面对希腊人的竞争，他们则需牢牢占据广阔系统上的关键点。在单纯的贸易开拓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化起步了。

这一假设有悖于许多已知的情理之中的解释。由此，是否应该从自东向西渐次探询腓尼基人的发现和建筑并相继跳过北非一线这一自称符合逻辑的原则出发呢？这样乌提卡和迦太基必定早于卡贝斯和利克苏斯——这又把我们带进短缩的编年表。然而，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持有相反看法，即认为腓尼基人首先定居在西方，——西班牙黄金和大西洋贸易往来的源头；接着，他们体会到巩固中途停靠站的必要。这便像真实冗长的编年表，最为重要的列在前面的内容。惟有考古学能够结束这场争论。让我们等待吧！

被抛向大海的腓尼基

在将这段漫长的历史画卷铺展开来之前，应该看看腓尼基本身，看看它那极度贫瘠的国土。从高山到海洋，从南部的阿科到北部的阿拉多斯，

形成了一段大致 12～15 公里宽的滚边，由小型港口、短窄的山谷、丘陵、冲刷沟壑以及微不足道的海边岛屿装点成花边状格局。城市间陆上交流稀疏，所幸的是大海填补了空白。

每一座岛屿都渴望拥有独立的空间。在选择了一些海角或岛屿作为基地之后，它们对山峦重叠的后方国家不予理睬。由于受到冲积地形的影响今已系于陆地的提尔就曾建于一座狭窄的岛屿之上。在那里，城市的主要设施一应俱全：防御设施无比坚固，惟有日后亚历山大强大的兵力才能最终与之抗衡；两座港口，即位于北部的天然港，将城市与西顿相连，位于南部的人工港，专门用于同埃及开展贸易往来；除此之外，甚至在汪洋之中，在咸咸的海水包围之间，也有喷涌的水源，可供方便地汲取饮用水。其余的一切，就要由航海者带人了。腓尼基人执着地寻找着这样理想的城市地理环境，将殖民地驻地设在他们偏爱的岬角或岛屿之上。

在黎巴嫩控制的海岸，这种奇特的高速城市化便是很早以前承袭了迦南的传统。那些被希腊人称作 Phinikes（腓尼基人），红人（或许因为他们著名的紫色织物而得此名），后又被称作腓尼基人的人们是很久以前便定居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海岸的迦南闪族人的直系后裔。传统的腓尼基是迦南的一部分，即经历了海上民族风暴而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

因此，所有这些城市都深深扎根于遥远的过去。比勒洛斯自公元前 3000 年以前与尼罗河三角洲（Delta）开展贸易往来。接下来的 1000 年初期，埃及主要作为重要顾客，因备受欣赏、甚至被模仿而发挥着主导影响，却还不是政治主人，仍停留在客人的水平。公元前 17 世纪，迦南各城市甚至摆脱了危险的喜克索斯人。然而，喜克索斯人还是间接地危害到他们的自由。事实上，自公元前 1580 年起，新埃及帝国在将侵略者逐出三角洲（Delta）的同时，便开始需要倚靠一些亚洲坚固的支撑点以确保自身的平静。美吉多战役（1525）之后，埃及控制了迦南各城市。的确，这种控制很快便在更大程度上徒有虚名而名不副实。此外，尽管拉美西斯三世的军队努力守卫迦南诸多港口，但当海上民族动荡来临之际，在公元前 1200 年之后埃及已几乎无法维持其权威。迦南将恢复自由。这也正是西顿对海岸的其他城池施加某种霸权的时期。直至约公元前 1000 年，提尔这座傲慢而被以西结[①]歌颂的城市将西顿取代。在此期间，比勒洛斯沦落为二流城

① 以西结，古代以色列光知和祭司。——译者注

市。而在经济普遍衰退的过程当中，腓尼基却依然“备受荫护”。

然而，这些享受命运优待的迦南人手中仅剩一块狭窄的土地。在南方，非利士人并未与其真正交锋便夺取了南部的海滨地带，因为这里的乡村居民和铁匠常常将城市建于内陆地区。在北方，叙利亚—赫梯人和阿拉美人阻止其进入奥龙特斯河决定性河口——北方叙利亚的海滨地区。腓尼基的影响同样逐步渗入，例如在阿尔米纳，以及更靠北方使用腓尼基语的卡拉泰佩。在东方，希波来人控制了迦南的腹背国家，而海上城市未曾过分在意这些极为普通且通常掌握在半游牧民族手中的土地。当所罗门以忠诚的劳作作为交换将加利利的几座城市交给提尔国王希兰时，希兰国王要求前往参观，并在看过之后表示拒绝。他宁愿勒令所罗门每年进贡小麦和油。

这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型国家，由于山脉环抱，邻国阻隔且满足于自身微薄的土地、几片麦田、精心栽培的葡萄园、几片森林和牧场而与外界隔绝。人口过剩的城市需从国外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以弥补自身的不平衡。

必要的工业

迫于需要，腓尼基城市都有自己的工业。每座城市都拥有一个由手工匠、织布工、铁匠、金银匠和船舶制造工组成的活跃的社会阶层。各行各业的专家有时纷纷前往国外，正如今天工业时代的工程师一样。

腓尼基“工业”样样出类拔萃。他们的羊毛织物享有盛名；贝壳提取物，骨螺（murex trunculus）或染料骨螺（murex brandaris）也毫不逊色，从玫瑰色到紫色再到紫罗兰色别的染料色泽分明。然而这种主体工业均远离城市，因为须将软体动物的躯体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腐烂，腐烂坑中恶臭弥漫。无论是在腓尼基本国还是在西方的殖民地，大量骨螺的躯壳表明染料作坊的数目极为可观。首先需要了解，织布工精湛的手艺还创造出珍贵的编织毯——其技术仍在戈布兰挂毯工厂中使用，以及荷马常常提及的许多彩色布匹。彩色小木匣上描绘的被获胜的图特安哈门蹂躏的“亚洲人”或麦地那庙宇中上釉瓦片上拉美西斯三世的囚徒们穿着在身的正是五颜六色的服装。

腓尼基人为出口之目的还大力发展了其他传统艺术。在尼米兹（亚述）、撒马利亚、豪尔萨巴德、阿尔斯兰塔西，以及萨摩斯、希腊和埃特鲁里亚，我们均发现了大量经过雕刻、镂空并镶有金子和彩石的象牙板，时间大致为公元前9～前7世纪。自从R. D. 巴尔内特的挖掘之后，我们认

为大多数的象牙制品均出自于奥龙特斯河上哈马特的腓尼基作坊；一部分可能来自更靠北方的叙利亚中心；个别为亚述甚至伊朗（济韦）的当地工艺，却是从被自愿或被迫引进的腓尼基手工匠那里获得了灵感。[①] 其风格直接从青铜时代的“国际性风格”中派生而来，同时受到来自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赫梯和亚述等迥异风格的影响。

至于在亚述、塞浦路斯、希腊、克里特或意大利埃特鲁利亚难以计数的坟墓中发现的金质或银质高脚酒杯，也是同样的灵感的延续：考古学上认为它源于公元前 7 世纪，与公元前 2000 年时期的高脚杯极易混淆：两者均使用相同的压花技术和从东方民族的各种图片中吸收而来的规则图案。这是一种腓尼基特产：“西顿的水酒双耳爵”，当一件珍贵的物品被送予墨涅拉俄斯或以重金交换用于帕特洛克罗斯死后的安葬仪式时，荷马提到的总是这一件。

腓尼基的生产中有一新奇之处：酒杯、不计其数形状各异的珍珠、护身符、耳坠和项链、细颈香水瓶和色彩斑斓的小花瓶，在整个地中海地区成千上万被售出。而在这其中，却尚无任何腓尼基的技术发明：酒杯的生产——最初只是无托架的陶制彩釉工艺品，因此只是不透明的酒杯——自公元前 2000 年前起，同时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独立地发展起来。尽管原料和五颜六色的产品各不相同，使用的技术却极为相似。吹玻璃工艺此时且直至希腊—罗马时代尚不为人知。铸模技术，甚至整块结实玻璃镂空处理的技术都有机会得到应用。最常用的是将黏沙芯儿挤压成精细的布匹状，插在铜杆上，浸入正在融化的玻璃中。于是它便被包裹上一层釉质。在这层还十分柔软的釉质层中，再插入一些彩色玻璃棒（这便形成许多埃及或腓尼基花瓶上迷人的线条或花彩装饰），然后进行整体打磨，通常将成品在一张桌子上滚动，然后固定手柄或饰物。经冷却之后，只需拨去沙芯儿和包裹物。

腓尼基人和塞浦路斯岛人效仿埃及的玻璃制品。然而，自公元前 7 世纪起，腓尼基城市，后来便是布匿人城市将其转变为一种真正的产业，并增添了透明酒杯工艺（在埃及出现得较晚，始于图特安哈门时代）。

此外，腓尼基人并不同埃及人在后者自行生产小摆设工艺品，即陶制品领域进行竞争——足以见得商人们的小心谨慎。除了自己的玻璃珠，他

---

① 如今生产中心更加多样化。参见 J. 温特《伊拉克》中 43，1981，pp. 101 - 130。（P. R.）

们仅满足于出售不计其数的护身符（猫或鳄鱼女神，贝斯神或太阳神的眼睛）和埃及很久以前从爱琴海进口的圣甲虫像，我们在迦太基早期的坟墓中发现了许多。[①]

同时，腓尼基人还在塞浦路斯（至少自公元前10世纪起在此定居）留下了别具一格的彩绘陶瓷制品的特产，这是由幻想派的东方诗意演变而来的迈锡尼遗产。与埃特鲁里亚人不同，他们将希腊人的陶瓷制品经地中海出售，却从未效仿此种工艺，而是固守着黎巴嫩海岸打磨、合成，制作炫目红色陶器的传统。犹太人城市于公元前10世纪效仿这一工艺，制作出被称作"萨玛利亚（Samarie）"华美的水罐与深红色高脚杯。腓尼基最为常见的工艺造型——我们在迦太基也同样发现了许多梨形水罐——被使用多种材料进行模仿：玻璃、青铜、银，甚至象牙。而腓尼基人对于彩陶工艺一直十分陌生。

海上商业要求

若没有商业活动，工业将毫无意义。船只云集的腓尼基港口用于大规模的贸易往来，从红海、印度洋直到直布罗陀海峡以外的大西洋。整个地中海被纳人这个远程贸易体系当中。

自东方出发，大致有三条路线通往西地中海。一条路线紧贴北部海岸、希腊及其岛屿，直至科尔西尔（科孚）。从那里，轻便帆船顺风而下，不到一天便可穿越奥特朗托海峡，后经意大利海岸，可直抵墨西拿海峡。第一支希腊船队便是通过这条海上隧道抵达克里特和迈锡尼的船队曾经到达的海域。更远一些的第勒尼安海成为希腊帆船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当然航行并非一帆风顺。

南方线路从埃及直到利比亚和现在的北非，沿非洲海岸一路铺展。漫长的沿海航行的终点是赫丘利神柱海峡。旅途当中，腓尼基人或在友好国家设立驿站，如在尼罗河三角洲（Delta）各城市；或安扎海外驻地，如在克兰尼海岸或真正的北非海岸。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沿海岛屿：如撒丁岛上的诺拉，瓜达尔基河河口对面的加的斯，西西里岛上的莫特兹，巴格拉达斯河（今迈杰尔达河）出口处的乌提卡；摩洛哥的摩加多尔；或易于防卫的地峡，如夹在两个相临的环礁湖间的比尔萨山丘上的迦太基。迦

① 就像在西方所有的腓尼基地点一样。（P. R.）

太基，阿皮安[①]称之为“下锚的船只”。

第三条路线从海洋中间经过，以一连串岛屿为依托，即塞浦路斯、克里特、马耳他、西西里、撒丁岛以及巴利阿里群岛。在2000年以后的腓力二世和奥地利唐璜（Don Juan）时期，它依然是一条快速、直接的航海路线：西班牙船队从西西里来到巴利阿里群岛，或从巴利阿里群岛到西西里岛均取道此路线，而且在东方海域中，从西西里到克里特、塞浦路斯，再到叙利亚，该路线构成利凡得海域著名的贸易中轴线。该路线显然也表明人们放弃了沿海航行而转向远洋航行。

腓尼基船只是否也继而取道这条夹于中间远离海岸的路线呢？大有可能，因为腓尼基人及其后的迦太基人在该路线所有标示方向的岛屿上均留下了在此停留或经过的痕迹。同样，也因为事实证明腓尼基人享有非凡的先锋者的美誉：“智者，啊！提尔，像水手一样站在船上……在大海上[是我们强调的]，由划桨者引领。”（以西结，27）根据斯特邦和阿拉多的说法，腓尼基人难道不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根据小熊座（而不是大熊座）准确辨认北方的方法吗？他们甚至在夜间航行，不必紧贴海岸，令同一时代所有只敢在白天航行的海员所无法企及。此外，他们还绘制航海地图，编制距离和风向记录，汉农沿黑非海岸航行的详尽报告还公开悬挂在一座寺庙当中。[②]

至于南、北两条路线的东部，或许（如果以土耳其人于16世纪主宰着两条路线时的表现进行判断）对于帆船或划桨船只而言，北线更为安全可靠。因其依凭陆地庇护而免遭北半球狂风的侵袭。南线亦可通行，且在西部海域常常较之北线更为可取。事实上，该线路途经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间宽广的空白地带，且福西亚人及其后的马赛人只有使用重型船只才得以克服种种实际困难。至于中间路线，这是一条（相对）快速、宽阔而自由的路线：穿梭于岛屿之间的船只迷失在茫茫大海的荒寂之中。谁又能将他们寻找回来？腓尼基人及后来的迦太基人顽强地坚守着从塞浦路斯到巴利阿里群岛间的各座岛屿，保存着不可替代的西西里岛，并控制着“西西里—巴利阿里群岛间的桥梁”的做法不无深刻道理。罗马一经夺取西西里岛，迦太基的海上力量便宣告结束。

因此，腓尼基的繁荣基于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圣经中有一段文字，如

① 阿皮安（约公元9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② 参见J. 德桑热著《关于地中海人在非洲活动的研究》，罗马，1978。（P. R.）

果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理解，便是讲述了所罗门王装配的一艘船只混入腓尼基海军，利用三年时间抵达遥远的西班牙和塔特苏斯并返回的故事。这几乎可谓塞维利亚与西班牙第一个美洲驻地间往返的中转站！

塔特苏斯探险，如同美洲探险一样，必须依靠富有的城市：资金雄厚，能够熬过漫长的难关；利润丰厚，足以度过艰难时日。无论何种情况，奇迹离不开白色金属（加上产自北方进入安达卢西亚的锡矿）。西班牙银币的流通应该异常活跃，因为在埃及，银子和金子的比价起初为 1 比 2，最终长至 1 比 13！此时埃及市场上银币过剩，如同 16 世纪时淹没在美洲的白色金属之中的欧洲。金属"征服"似乎还由西班牙传入撒丁岛[①]这个同样于早期遭到殖民地化，且最早开采银矿的岛屿。而巴尔巴吉亚地区的铜矿直至公元前 8 世纪才开始使用，其产品在当地广泛应用。迪奥多勒·德西西勒毫不犹豫地将腓尼基人的力量源泉归结于来自撒丁岛和西班牙的银子的贸易。

沥青创造的奇迹

在逐步开拓海洋的初期，腓尼基远洋航行的奇迹首先是对于人类创造性和勇气的考验。然而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腓尼基人拥有大量的沥青，这难道只是已在死海开发了很长时间信手可得的那种沥青？"我打算完全相信"，P. 坎塔斯写道，"他们在海上获取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对船体进行黏缝时使用沥青。"事实上，水上路线与防水的欠缺是早期航海的两大天敌。在这个久远的时代，船只被拉上陆地，晚间停放在海湾的沙地上等待天明，或停靠港口使整个船体保持干燥以便进行检修或油漆水下船体。沥青这种天然柏油无疑被腓尼基航海者用于这一目的。

在迦太基，沥青难道不是被建筑师们普遍使用吗？高大房屋黏土墙壁的外侧常常浇上柏油，普伊纳就曾提到过他们的"柏油屋顶"。这就对公元前 146 年那场可怕的火灾做出了解释。如果没有沥青这种优质的燃料，罗马人永远无法将城市烧得片瓦不留，今天的挖掘者在埋藏了布匿人的迦太基的灰烬中还发现了"残留的小块沥青"。

---

① 我们今天不能将撒丁岛矿产的最早开发归结于腓尼基人。关于这一点，参见米歇尔·格拉的《第勒尼安海的古代贸易》，BEFAR，258，1985。（P. R.）

重现生机的迦太基和腓尼基

与地中海遥远西方的联系在提尔和卡贝斯之间形成一根由于过长而十分脆弱的天线。很长时间凭借迦太基这一中转站而得以维持。直到公元前7世纪，体系系统出现混乱，原因在于几个方面。

首先，腓尼基人遇到的不再是最初胜利时地中海的一片空白[1]，而是来自埃特鲁斯坎人（通过了）和接下来是希腊人的竞争。其次，腓尼基屈从于亚述人的暴力（他们自公元前709年便夺取了塞浦路斯）。阿拉多斯、比勃洛斯、西顿和提尔进行了长时间的抵抗，而这一切随着埃及遭亚述人占领（前671）而转化为悲剧。从那时起，腓尼基城市的“国王”们被迫迂回抵抗：表面屈服，暗中策反，发动暴动，却无功而返。“阿拉多斯国王亚基穆卢在大海中心［阿拉多斯占据了一座岛屿］未曾屈服于我祖先的国王们”，亚述巴尼拔国王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我将它玩弄于股掌之间。他的女儿，带着丰厚的嫁资，被他亲自送到尼尼微来做我的妃子，并向我低头认输。”同时，他还进献了一批贡品，“紫色和紫罗兰色的染色羊毛绒线、鱼，还有鸟”。“提尔的巴力”也必须送来他的一个女儿甚至儿子，亚述巴尼拔国王将他们退还回来。公元前574年，当亚述帝国已被推翻近40载，人人可以自由地呼吸时，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人降服了提尔。

这些发生在最高执政官取代国王的城市当中的战争和动荡以及商贸往来的中断，并未转眼之间便将腓尼基及其船只从世界地图上通通抹去。与之相反，这却促使迦太基成为主宰力量。因为该国并没有为获自由而打破现代意义上殖民地的隶属关系。正是对提尔麦勒卡特神忠贞不贰的崇拜以及商业集团间的关系将其与宗主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城市及其管理者商业贵族开始寻求独立之前，这些联系自身已得到扩大。腓尼基生活的中心转移到比提尔位置更为有利的迦太基，几乎恰好处于两半地中海精确的契合点，且能够躲避外在压力。腓尼基文明在此延续，既相似又不同，与后来欧洲文明在美洲的情形如出一辙。

距离、文化差异以及城市起源多样化共同造成了这样的差别。皮埃尔·坎塔斯甚至认为迦太基是由“来自海上”的多种民族和腓尼基人本身共同建立的。我们对于迦太基的两个原始墓地（公元前7世纪）的佐证给

[1] 事实上，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和埃维亚人就把西方从地中海中划割出来。（P. R.）

予的关注是否过多，一个是位于居民聚居点东北部的达尔梅什墓葬者（腓尼基人）专用墓地，另一个则是朱诺山丘上的焚化者（希腊人?）专用墓地。皮埃尔·坎塔斯由此得出结论：在建设殖民地的漫长时期，有一支混杂的移民队伍在向西进发。不幸的是对于这一切尚无法确定。但不管怎样，人群中以腓尼基人居多。他们做出表率，并强制使用其语言。

迦太基这座“美国式”发展的新兴城市是各类文集钟爱的主题。“美国式”，的确，特别是它那具体、平实、紧凑，重视稳重坚实胜过精致考究的文明更是如此。强大的迦太基吸引着众多来自各地的水手、艺术家和雇佣军。欢迎一切文化潮流的迦太基生就国际化的本性。700 年间，它极大地影响着地中海非洲地区，而非洲血统也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这里并融入其中。但开拓殖民地的同时，迦太基也不幸遭到殖民地化。因为，正是努米底亚人及其骑兵的背叛最终在扎马战役（前 202）的战场上将迦太基灭除。但结论也不要下得太早！

非洲部分

迦太基与腓尼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陷入封闭的内地，这一点不容忽视。

或许，迦太基也是凭借与提尔人同等的胆量在海上生存，并以海为生的。提尔人奉尼科法老之命，自红海出发，于约公元前 600 年完成了沿非洲海岸的航行。同样，约公元前 450 年，一些寻找锡矿的迦太基船只在希米尔科的带领下，沿欧洲大西洋海岸向北航行直至大不列颠群岛（卡西特里得群岛）。25 年之后，则是向南航行寻找金粉，这一次是汉农沿大西洋的非洲海岸一路南下，直至现在的加蓬和喀麦隆。

如果不是沿着北非海岸一路航行和那些不得已而靠港的中途港，新兴城市应该也能够像腓尼基那样，对其身后的贫穷大陆不予理睬。从这些中途停靠港中诞生出一批城镇，接着是较大的城市（如今天阿尔及利亚海岸的科洛、季杰利、阿尔及尔、谢尔谢勒、古拉亚、提奈斯……），这些城市逐渐转向内陆，试图依凭内陆更好地生存。最后，公元前 5 世纪不利的环境迫使迦太基本身向小非洲（Afrique Mineur）退缩，并在周围的平原上组织起高效的农业生产，下文再述。

因此，他们与当地人生活结合得日益密切。在腓尼基人来到之时才刚刚走出石器时代的北非几乎从主宰者那里得到了一切：各种果树（橄榄、

葡萄、无花果、扁桃、石榴，水果被出口到意大利），种植方法，葡萄酒酿造方法，以及大量手工艺技术。迦太基将成为该地区的施教者，且影响渗透深入。在圣·奥古斯丁时期，当罗马帝国瓦解时——那已经是在很多世纪以后，他们的同胞非洲农民们仍然使用布匿语，并自称迦南人："Unde interrogati rustici nostri quid sint, punice respondentes: Chanani…（意思为：如果询问农民，你们来自哪里？他们会用布匿语回答：迦太基）"。不为人知或者说不被理解的天才历史学家 E. F. 戈蒂埃认为布匿人的渗透，这种"东方化"在北非和西班牙两块大陆均留下了涂抹不去的痕迹。当公元 7 和 8 世纪阿拉伯人发动入侵时，这种古老的千丝万缕的关联还发挥了促进作用。但专家们反对这一大胆的见解，在短暂的时间段中找不到任何证据。这一点毫无疑问。而文明史中有诸多事件被不可思议地延迟：在我们的地球上有时也会收到来自于早已消失的遥远星辰的光芒。

这一解释更加表明作为东方一部分的迦太基的确未曾遭受印欧人影响。其地理位置使其免受来自北部海岸的一切入侵。如果说有人员和文化财产的流通，那也是自东向西通过海路，或从尼罗河岸边开始途经撒哈拉沙漠中的小路进行的。迦太基人一身西式着装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是合乎逻辑的：衣袖宽大的长袍，旅行长外套，头顶无边圆帽。E. F. 戈蒂埃从中看到今天的非斯帽、阿拉伯人无袖长衣甚至呢斗篷的原型。布匿石碑上的右手，张开的手掌做出祝福的手势（另一只借鉴自东方），不正是"法蒂玛之手（main de Fatma）"，一种大众护身符，且在今天的北非常常画在屋门上的标记吗？古老迦太基的大部分日常生活情形萦绕着同一片土地上今天的生活气息。在斯米拉特，对布匿穷苦乡村坟墓的挖掘（1941）反映出与现今农村生活同样的格局："一间房屋，几个食物罐，一个盛水的双耳尖底瓮和一张睡觉用的编织席。"（G. 和 C. 皮卡尔）

物物交换与货币

地处东、西地中海结合点的迦太基毫不费力便成功利用了分割两边的巨大的经济和文化差距。西部不开化且不发达；迦太基用尽一切廉价的资源，包括矿产，例如卡西特里得群岛和西班牙西北部的锡矿；安达卢西亚和撒丁岛的铅、铜特别是银矿；黑非洲的金粉，商队（马队，还没有单峰驼）一直将这些黄金运至小非洲（Afrique Mineur）；以及随处，甚至在茫茫大海上都可以抓到的奴隶。

这些交易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迦太基商人将自己与他人生产的产品，或经红海从印度运来的香料和毒品带到西方，换成银锭再卖到东方。这说明本意上的货币在迦太基出现得较晚，在布匿西西里不会早于公元前5世纪，而在迦太基则要等到公元前4世纪，且当时还是用于购买海外雇佣军。是否应和莫斯卡蒂·萨巴蒂诺一样大为吃惊呢？不，因为那只能是无知透顶的表现。西顿和提尔都拥有自己的货币。似乎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即迦太基并不需要货币。大致情况与中国相似，但要视情况而定：虽然在此领域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很早便掌握了货币，甚至纸币），却迟迟不曾使用！它难道不是同迦太基一样，因为同周边日本、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进行着断断续续的经济往来，是易于控制且依靠物物交换得以维持吗？

但这并不是说面对种种经济竞争，缺少货币终归不是一种劣势。如果说自公元前5世纪起希腊经济已明显“攀升”，而迦太基的市场却被竞争对手的小摆设所征服，这些地区使用货币的优势便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如果不是惟一的也是最好的解释。此外，迦太基迟迟没有使用货币也使其丧失了银行和信用证这些很早就出现在希腊的城市中的事物所能带来的利润，这一点更是确定无疑。和巨富波斯（流通大流克）一样，迦太基也储备了大量的贵重金属，如金、银，甚至铜，但未曾将其加工成货币进行流通。

同样，矿产如此丰富的迦太基冶金业却发展缓慢，当一些作者情有可原为之惊奇不已时，我们能否以迦太基在劳动力方面的劣势加以解释呢？只要想，就可以。然而，忙于神奇的往来航行的迦太基同样选择了商业活动。在历史上的竞争当中，最初的优胜者终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如若故步自封便会失去一切。因此，希腊商品于公元前5世纪占据迦太基城，在我看来似乎更多地在于迦太基游戏的正常规律使然，而非希腊决定性的贸易霸主地位。自公元前7世纪起，迦太基进口科林斯的陶瓷制品，埃特鲁斯坎人的黑色黏土（bucchero）花瓶以及大量的埃及物品。布匿的贸易正是在科林斯、埃特鲁里亚和埃及表现得最为活跃。如同威尼斯于公元15世纪时进口再出口南德生产的产品而不会蒙受损失。身为海上车夫的荷兰人在17世纪时的做法与此相同，在此地购买，异地出售，还在东印度群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原始的物物交换。迦太基人自身也充当运输者与中介人，一手买进，一手卖出。

这是否意味着中介者势必脆弱得无药可救呢？并非如此，因为迦太基懂得如何把守其主宰的地位，特别是在西班牙的“垄断”矿产大国的位置（迦太基人禁止埃特鲁斯坎人、希腊人和罗马人踏上半岛的一大部分有用土地）。它同样懂得如何守住主要的海上中转停靠站，高档工业（其织布业与腓尼基齐名，还有象牙制品和家具）以及最为普通的贸易，特别是小麦的大宗交易和实力较强的咸鱼加工业。它懂得如何合理设置渔场与盐田，特别是在多鱼的海域对面，以及加的斯和西班牙—葡萄牙大西洋海岸一系列的小港口。当罗马的盐渍工业在此立足时，只是继承了这一遗产。

然而，迦太基的强大也并非无可挑剔。归根结蒂，庞大的城市无论是其生活还是艺术都未能抵制令整个地中海或多或少希腊化的大规模的文化渗透。吸纳主导风格（过去是埃及风格）是腓尼基的一贯传统。古希腊形式的影响在腓尼基海岸和迦太基同样呈现出来，在墓葬石碑和建筑风格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而所有的迦太基殖民地都紧随其后，如西西里，撒丁岛，非洲海岸和西班牙。希腊对于西班牙—迦太基雕刻的影响，例如公元前4世纪甚至前5世纪末时的情况，对于区分希腊人对布匿世界的文化影响和经济影响有重要意义。迦太基毫不犹豫地引入了希腊城市规划的做法，如带有中央庭院的希腊式房屋、装饰花瓶、各种水泥、石棺，当然还有神明（得墨忒耳和少女立像，约公元前396年），但也有毕达哥拉斯的学说思想和他的一部分支持者……汉尼拔将军之父汉勒坎在征服西班牙时便是从亚历山大大帝的例子中受到了启发。汉尼拔将军自身也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甚至使用覆盖五颜六色布匹的大象以及对罗马士兵的惧怕也都是来自于古代希腊。

面对种种环境

以地中海为生的迦太基注定对整个大海的活动及其环境十分敏感。迦太基城的历史也步步跟随着地中海生活的节奏。

公元前7～前6世纪，希腊人遍及各地。约公元前600年，福西亚人建立马萨里亚；他们在加泰罗尼亚的安普里亚斯，或者还有南部的马纳克（马拉加）定居下来：腓尼基人的矿产优势受到威胁，甚至转移他所。但不管怎样，在埃特鲁斯坎人和迦太基人的联盟舰队对希腊人发动海战（前540～前535）之后，当福西亚人被驱逐出科西嘉岛的阿拉利亚时，迦太基又重掌大权却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然而，战斗并未结束。而这一次将是布

匿人占据优势。

公元前 525 年，波斯占领埃及，同时能够支配法老装配的强大的腓尼基舰队。然而，大流士于公元前 490 年在马拉松被击败；薛西斯于公元前 480 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败。这第二次挫败也是腓尼基战船的彻底失败。同年，迦太基军队和舰队在西西里岛的希梅拉遭到粉碎，而几年之后，希腊人在库姆对面摧毁了迦太基盟军埃特鲁斯坎人的舰队（公元前 474 年）。自此，布匿人的悲剧开始了，政治、宗教、经济危机纷纷登场。马戈王国被推翻，贵族夺取政权。城市保护女神坦尼特——相当于雅典的帕拉斯——成为第一神明。面对重重经济困难，迦太基顽强应对：它限制进口，提倡简朴，加强同非洲及卡西特里得群岛的联系，特别是向北非缩进，征服了周边辽阔土地，大力发展养殖农场及树木栽培园。而当地的居民利比亚人则被驱逐出这一领地，继续种植大麦和小麦。

漫长的一个世纪的撤退使得迦太基能够充分利用雅典在远征锡拉库萨（前 415～前 409）遭受失败之后的衰落。它立即对西西里的希腊人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重创城市，俘虏民众，从而建立了奴隶手工业，这甚至还大大改变了城市经济。亚历山大征服的警报（前 334～前 323）再次令其长达数年笼罩在恐惧之中：为自身的生存而担忧。过于庞大的帝国顷刻间土崩瓦解才令其恢复了平静，对于东方分裂帝国它毫不惧怕：距离给予它一定的保护。再者，东方能否脱离西方而生存呢？托勒密在亚历山大衰败之后夺取了西地中海（以及腓尼基），并采纳了腓尼基的度量体系，很快便恢复了一切优势。

终于，在迦太基的附近，随着罗马，致命的威胁愈发清晰，接着在公元前 146 年终于成为现实。可怕的结局！有谁不曾在其心中——每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都有心灵，为老加图（Caton）摧毁迦太基（*Delenda est Carthage*），以及西庇阿下令进行惨无人道的破坏而感到痛苦呢？见解独到的声音被迫保持沉默。

观察城市

迦太基的毁灭并非普通的毁灭。以至于关于迦太基的生活及其社会风貌，考古学都难有建树。对此，我们有一些零散片段的间接性了解。

亚里士多德出于好奇的探询为我们提供了布匿政体的结构图。曾经由国王统治的迦太基采纳了贵族政府。经全民公选从大户家族中每年选出两

名最高执政官（最接近词源的词义为法官），以及参议院议员和对有效政府负责的各种委员会：这是一种尚未定型的威尼斯做法，104 人的议会与 10 人议会同样令人生畏。有多少将军被奉命钉于十字架上！

我们能够想象城市的模样只是位于比尔萨山丘之上（现为圣－路易山丘，外加朱诺山丘和奥德翁平原），拥有寺庙、牺牲场（*tophet*）、狭窄的街道和高层房屋，几乎和所有的腓尼基城市相差无几（阿皮延提到城市集会广场与比尔萨卫城之间的六层房屋），蓄水池和被称做千只双耳尖底瓮的引水渠，其华美的拱穹尽管经过大力翻修，但依然是迦太基惟一遗留的真实建筑。然而，近期的挖掘在罗马城市（建在迦太基的废墟之上）地下 3～4 米处发现了古希腊时代布匿城市的一片城区。证明迦太基当时已拥有笔直的街道，并不十分狭窄，且由阶梯相连，此外还有一套与西西里城市中的极为类似的排水系统。房屋是千篇一律几间房间简单地合为一体。

在萨拉木博的海滩上有两座港口：一座呈矩形，有众多商船停靠其间并与其保持联系；另一座则呈环行，战船常被拉上岸边置于兵工厂的拱顶之下进行晾晒。军港中心的一座岛屿则是指挥战舰的海军上将的本部。

陆地上两重或三重的巨大围墙环绕着迦太基建于比尔萨山丘之上的强大城市及其聚集在港口四周人口稠密的城区。在从港口到比尔萨的中途有一处公共广场，会让人想起古希腊式的广场。在北方，迈加拉市郊散布着花园、葡萄园和贵族的别墅。从山丘之上向下俯视，向北极目远眺便是艾尔亚奈盐沼，向南则是突尼斯湖。城市人口众多，约为 10 万。在一些执掌政权的富人周围，聚集着艺术家、手工劳动者、奴隶、海员，有时还有海外雇佣军士兵组成的平民阶层——总体上是容易产生动荡的人群。骚乱常常给予迦太基来自内部的打击。

城市周围是怡人的乡村。富人们显然对耕种有方的土地、美丽的花园、嫁接的树木和精选的动物偏爱有加。我们间接得到了名为马贡的一名迦太基农学家的部分著作片段，其中尽述了上千种种植葡萄并令其抵抗炎热的方法，以及如何酿造优质美酒、栽培杏树、将石榴放在黏土中保鲜以待出口、不同牛种的品质研究，等等。他还针对农村地产主补充了一条颇有意义的忠告："获得土地者须卖掉房产，以防他偏爱城市居所而舍弃田间屋舍。"也就是说，公元前 3 世纪时的迦太基人同 15～16 世纪的托斯卡纳一样，大肆购买田地。

在坦尼特的影响下

在对迦太基遗址大规模的挖掘中发现了数以千万或被掩埋或被焚化的尸体以及在坟墓中作为陪伴的随葬品。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短石柱和墓碑以单一的方式按照使用频率的高低和引用的次序一一罗列神明的名字，我们甚至能够通过数学加权的方法得出迦太基最受崇拜的神明！

仅凭这些想要到达一种宗教的核心还远远不够。这种宗教的奇特之处令罗马人为之恐惧（这种恐惧并非只是伪装），而我们既不了解其神化内容，也不懂得其神学含义，甚至对它的结构与“世界观”也不得而知。我们能否完全了解这种派生出迦太基宗教的腓尼基宗教呢？根据已知的一些细节或许能够成功。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一些乌加里特的文章以及一些迦南文字记录或圣经的传说带来意想不到的光明，情况却并非如此。

每一座腓尼基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神明，有些神明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城市当中。而腓尼基诸神的名称则需费一番力气才可区分开来。厄勒、巴力、阿多尼斯、麦勒卡特可以说都是常见的名字：厄勒的意思是上帝；巴力和阿多尼斯是领主；麦勒卡特则是一城之王。因此，“提尔国国王”麦勒卡特会被轻而易举地称作巴力麦勒卡特！各路神明的名称并不明确，也无法根据名称轻易辨别出所司神职。

大致而言，腓尼基万神殿由三神组合操控，而三位神明的名字则因城市而异，其中包括众神之王、象征旺盛生育能力的母神以及一位年轻的神明，每年经历从出生到死亡，再获重生的命运，就像季节轮回植物的生长。在西顿，三神一体是由巴力、阿斯塔特和埃斯代姆（希腊人将他们与拉丁人的阿斯克勒庇俄斯和埃斯克拉庇俄斯相提并论）组合而成的；而在比勃洛斯，三神组合为厄勒、巴丽（巴力的女性）和阿多尼斯。我们了解那段神话，希腊传说中曾再次引用。阿多尼斯也是自黎巴嫩山脉倾流而下的河流的名称。它从城市近旁流过，山中的源头处还建有一座神庙。每年，当夹杂着尘土的狂风到达时，河水便会突然变红如同人体的血液。在比勃洛斯，这便是为阿多尼斯哀悼的时节……而在提尔，似乎被宰杀作为祭品后又重生的年轻神明的职能几乎和麦勒卡特一样，即城市的“巴力”。难道没有一个复活节以表示对他的敬意吗？

每座城市或许都赋予自己的神明某种神话以解释世界、创造以及人类的命运。例如在一些乌加里特的文章当中，莫特的出现同时代表着死亡、

夏季吃人的酷热以及正在成熟的谷子。每年，莫特必须被处死以使自然和人类得以生存。显然不同的神明具备不同的职能：巴力·勒巴农是黎巴嫩山脉之神；巴力·夏明是天主；瑞舍夫是火与光明之神；而达贡是古老的小麦之神；舒少尔，火的发明之神……

这种宗教深入到闪族人想象力那十分古老的世界当中，它接近土地、山脉和流水；其残酷而简单的仪式是那种游牧民族此后在露天庆祝的场面。圣林、城市四周的高地同样也是圣殿。当然还有许多隐藏的庙宇。祭坛十分简单：很少或没有神人同型的表现形式，一根柱子，一根圆柱，一块圣石便可以象征神明。对于一种罗马时期在卡贝斯依然进行的腓尼基古老的宗教服务，西利乌斯·伊塔科库斯在《塞维利亚》（*Sevillan*）中进行了描述：在一座看不出任何崇拜色彩空空荡荡的神庙中，有一群光着脚，剃光了头，身披亚麻的教士和万年不灭的火苗。

迦太基的宗教生活在起源上或多或少沿袭了提尔的模式。统治之神为巴力·哈蒙；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斯塔特或伊什塔尔姐妹母神很快成为坦尼特，这个在别处还不为人所知（或不必知）的名字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年轻的神明，日轮或植物生长之神，有时是提尔之神麦勒卡特，有时是康复之神埃斯代姆，易与阿波罗和阿斯克勒庇俄斯混淆，就像此后麦勒卡特和赫拉克勒斯极易混淆一样。两种崇拜之间激烈的竞争并未以其中一种被排除而告终。麦勒卡特成为巴尔希勒大家庭的上帝，波米尔卡尔和哈米尔卡尔这些常用名就是模仿神的名字。比尔萨卫城内迦太基最为华美的埃斯代姆神庙于公元前 146 年将成为守城将士们最后守卫的城堡。

除这些主要的神明外，还出现了数十个腓尼基、埃及或希腊的其他神明。迦太基的万神殿似乎同后来的埃特鲁斯坎人的万神殿一样开放。后来，在遭遇不幸和面对同化的时代，巴力·哈蒙毫不费力便转变为科罗诺斯或萨图恩，而坦尼特则变为赫拉或朱诺。

迦太基宗教最大的特征在于对坦尼特精神革命性的崇拜咄咄逼人的攀升。自公元前 5 世纪起，女神统治一切，摆脱了古老的巴力·哈蒙神。迦太基生活在“坦尼特”的影响之下，而这种影响也只存在于西方[①]：三角形上方一个圆盘，两者之间有一水平线。所有这些恰好表现出一个人的剪影，特别是当水平线在尽头翘起时，更像抬起的双臂。其他与坦尼特相结

① 如今我们并不能十分肯定：在 Sarepta 有些明显的事例。（P. R.）

合的象征来自于东方，特别是"瓶子"与张开的手掌，新月形和日轮结合在一起，这或许代表着巴力。对于今天对我们而言仍然如谜一般的神话无疑有着数不尽的映衬。

然而，不止这些谜团，迦太基宗教无法摆脱的负担也造成问题，如此一种根深蒂固来自史前史的深层、可怕的又是主导性的宗教。以人作为祭品——这一点曾多次遭到拉丁人指责——不是惟一的事实：萨拉木博的牺牲场（tophet）发送了成千上万的装满儿童骨骸的陶器。想要免祸消灾时，迦太基便要杀死最有名望的公民的儿子进献神明。这是为锡拉库斯服务的阿加托克勒将战争带到迦太基本土时的情况。一些知名的公民因购买儿童以代替自己儿子进献而犯下亵渎圣物罪，便会举行进献一百个儿童的赎罪祭献。宗教狂热时甚至会用300个……战争的囚徒也会用作祭祀品，有时被成千上万地宰杀。

这些无辜者的鲜血会不会玷污迦太基的名字呢？事实上，所有的原始宗教中都存在这样的做法。迦太基在这一点上沿袭了比勒洛斯的迦南人或以色列的闪米特人：亚伯拉罕难道没有预备好用以撒作为祭品吗？但令人吃惊的是迦太基经济生活突飞猛进而宗教生活却倒退了许多个世纪，甚至其自身的"革命"——公元前5世纪对坦尼特崇拜的革命——也丝毫没有从这种非人道和丧失怜悯的做法中解救出来。这与希腊式的开放使人适应外界世界的做法反差十分明显。一名历史学家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种遵循"资本主义"思想的紧张的商业生活同落后的宗教观念相结合。马克斯·韦伯会对此作何感想？

二　埃特鲁斯坎人：未解之谜

早期意大利的主要创立者埃特鲁斯坎人是一群与众不同的殖民者。不过他们真的是殖民者吗？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却隔着层层谜团。尽管知识不断增长，但现在也无法说明，不过终有一天谜底会昭然于世。

需要探究的语言

第一个谜在于埃特鲁斯坎语言本身，它不属印欧语系，能够读出——因为它使用希腊字母——却不明含义。或许以后碰巧找到一篇双语铭文问

题便会迎刃而解？可这还需要铭文的文章恰到好处，因为1964年曾出现过类似的巧合，却于事无补。

在埃特鲁斯坎卡埃尔城（今天的Cerveteri）的港口皮尔吉曾发现了三个金薄片，上有三篇铭文，其中一篇为布匿语，与其他两篇中一篇埃特鲁斯坎语的铭文内容一致。而布匿语文章本身就难以译解。铭文记述的是公元前500年卡埃尔国王为阿斯塔特神庙撰写的一篇题辞，印证了众人皆知的迦太基与埃特鲁斯坎人的亲密无间，以及后者极易接受外来神明。这里的阿斯塔特类似于埃特鲁斯坎万神殿中的乌尼女神（朱诺）。然而，在语言方面，对两篇简短铭文进行对照却未能得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

目前，埃特鲁斯坎语的译解要由其自身入手，通过所谓的组合法，或像阿贝尔·格雷尼埃所说的"不如说假想法"比较已有的断简残篇。然而，埃特鲁斯坎语词汇逐年扩充：*clan*（fils：儿子），*sec*（fille：女儿），*puia*（femme：妻子），*ati*（mère：母亲），*lupu*、*lupuce*（il est mort：他死了），*svalce*（il a vécu：消失），*avil*（année：年）。从*zil*，意思为统治，派生出*zile*或*zilath*（magistrat：行政官员）；*purth*，城市的第一*zilath*，相当于罗马的*praetor*（首席执政官）；*lucumon*意思为城邦的国王……已经认知的大约200个词汇并不能解决大问题。但我们或许还能够破译成功，而历史学家们却无法做出更大突破。

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埃特鲁斯坎文章（主要是葬礼铭文）都过于简短，包含的历史信息又十分有限，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并不足以将历史上第一个托斯卡纳大区完整地重现。截至目前我们所知的惟一的长篇文章（藏于萨格勒布博物馆）写在亚历山大发现的一具希腊—罗马时期的埃及木乃伊身上缠绕的12条绷带上面。全篇共计1500字。那或许是一种宗教历法，然而耗尽一切努力依然无法译读。同时还有两篇百余字的铭文，分别为"卡普阿瓦片"和"佩鲁贾短石柱"。总而言之，这些已经破译出的文章在宗教仪式和宗教信仰方面只是带给我们丝丝缕缕的光明。

埃特鲁斯坎人的起源

埃特鲁斯坎人来自何方？又在何时来到意大利？关于地点和时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不得而知。每一个不肯放弃的历史学家都变成了律师，甚至侦探。明智之举便是置身于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外，但是聪明却并不好玩。

此外，有三、四个事实不在讨论之列：

（1）埃特鲁斯坎的语言、宗教及其社会生活方式与东方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

（2）根据坟墓财产的真实情况，公元前7世纪初以前埃特鲁斯坎人灿烂的文明是无法识破的；

（3）然而，由于希腊人自公元前750年起在那不勒斯港湾定居下来，很难想象他们在来自海上和南方的埃特鲁斯坎人之前来到：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埃特鲁斯坎人怎么会未被希腊人俘获？

（4）两个时间限定能够确定埃特鲁斯坎人抵达的时间：上限十分久远，公元前约12世纪；下限则较晚，约公元前6世纪。[①]

现在令我们烦恼的是对于现有论题，讨论开展的时间已经太长，以至于争论双方不愿终止争论。而且主要的两个论题——西方论及所谓的本地生成论——努力联系在一起，而契合点却丝毫不能解决含糊一片的问题。

今天，没有人对埃特鲁斯坎人源自东方这一除迪奥多勒·德西西勒外，前人已经认可的事实提出严肃的质疑。1886年，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南的利姆诺斯岛上的卡米尼亚，发现了两篇公元前6世纪的葬礼铭文，使用一种并非希腊语的民族语言书写（该岛直至公元前510年才被雅典人征服）。根据雷蒙·布洛克的说法，两篇铭文中一些“单词，甚至短语的词尾及构成”正是托斯卡纳文章中的用法。雅克·厄尔贡说，如果这不是埃特鲁斯坎语，“至少是我们在意大利之外看到的与埃特鲁斯坎语最为相似的语言”。总之是两种类似的语言。另一方面，在与卡米尼亚相距不远的一处公元前8或公元前7世纪的大型墓地中也发现了许多物品，与埃特鲁里亚坟墓中的均有几分相似。出奇美丽且独特的埃特鲁斯坎珠宝与吕底亚的珠宝有着共同之处。

最后，我们所了解的埃特鲁斯坎宗教也带有东方色彩。因此在占卜艺术领域，无论是解释奇迹还是探询受害者的内脏，埃特鲁斯坎人在意大利一直被尊奉为大师。1877年，在皮亚琴察发现的一个铜肝便是一种模型，上面画有40多个格子，分别对应天空的不同区域和执掌不同区域的神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赫梯的挖掘中也发现了泥土烧制的类似模型。还有其他相似之处也值得一提，但由于只能通过公元前7世纪东方化艺术经地中

① 认为形成埃特鲁斯坎民族的观点取代了一个民族到来的观点；参见D.布里凯尔著《埃特鲁斯坎人》，巴黎，1993；《埃特鲁斯坎人与欧洲》的目录，巴黎，1992。（P. R.）

海和希腊带来的影响加以说明而使说服力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为何不回到希罗多德（I，94）著名的文章中来呢？根据他的说法，埃特鲁斯坎人是吕底亚移民，公元前13世纪迫于长期的饥荒而背井离乡。小亚细亚小麦匮乏，这正好让我们想起约公元前1200年海上民族动荡生活的开端和赫梯国王的满腹怨气。希罗多德还这样描述道：这些移民“下到士美那，自己制造船只，满载所有财物，动身寻找生存的家园；他们途经许多海岸直到有一天来到了翁布里亚，并在那里建立城市且定居至今”。这篇文章以如此古怪的方式描述了我们认为千真万确的海上民族冒险的凄惨景象，以至于我们需要补充如下：在无休止的人口迁移过程中，埃特鲁斯坎人甚至努力踏上富足的埃及土地。法老声称和其他入侵者一起被逐出三角洲的正是这些埃特鲁斯坎人（*Tursha*）。从这个名字到希腊人赋予他们的名字第勒尼安人（*Tyrrhènes* 或 *Tyrsènes*），到罗马人冠于他们的名字蒂西人或埃特鲁西人（*Tusci*）或（*Etrusci*），这一过程似乎十分简单。然而，在早早出发之后，他们是如何又是何时来到了第勒尼安海岸边，并由此得名的呢？他们是否曾在其他地方驻留？无人知晓。

由此，上限日期的支持者们面临着一个极大的难题，因为如果说埃特鲁斯坎人是在公元前12世纪出发的，而其第一批宏大的坟墓却是在5个世纪以后，约公元前650年才正式亮相。这一日期是否立不住脚呢？埃特鲁斯坎人能否像A. 皮加尼奥尔设想的那样，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迫于希梅里人的暴力而非饥荒离开小亚细亚的呢？这是可能的，但不要先入为主地排除还存在更早期的人口迁移。建于公元前8世纪的迦太基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当中目睹了逃往该国的提尔避难者。这说明公元前7世纪时意大利半岛的生活并未猛然中断以说明外来文明突然渗入并迅速达到巅峰且转眼便覆盖整个平原并建立了托斯卡纳。

不管怎样，让我们将移民的时间暂且搁置，相信埃特鲁斯坎人的东方起源将第一批“托斯卡纳人”依附于古老的东方文明，这一文明与“古意大利文明”融合在一起，而后者本身就偏爱古风。在我们看来，公元前7世纪时如此明显的东方文化影响独自带给埃特鲁里亚其宗教、语言及文明的特征，并由此在意大利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本地生成论。埃特鲁斯坎人或许是在很久以前伴随着公元前2000年压倒一切的东方文明的潮流来到了意大利。接下来，轮到他们遭到维拉诺维安人（Villanoviens，意大利史前居民）征服。地中海深

厚的文明层就这样被覆盖了数个世纪，淹没其中但并未消失殆尽。直至受到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光芒四射的影响且恢复整体繁荣时，被埋没的民族才于公元前8世纪末重获生机。这部小说是否较前一部更加接近事实呢？不要妄作保证。并不是这样的设想不可能，正好相反；而且这一论题偏重于接受东方起源论，并从意大利历史的根底中探询埃特鲁斯坎人的探险，惟有这样才能获得有意义的解释。因为埃特鲁斯坎人很久以前从东方经海路来到此地时，充其量是一小拨探险海盗（就像中世纪时的威金人），作为贵族地主老爷停留在这片土地上。

但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近期的挖掘已在深度上超过了维拉诺维安(villanovien)而达到了此前文明的水平，即亚平宁山脉文明（该文明似乎是以意大利半岛的山脉为轴心不断发展的）。如此一来，我们进入了一个广阔但黯淡的世界，那里看不到任何东方的奇迹。

最终依然难以做出决定。出于谨慎，我们至多可以说：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古老文明忽然于公元前7世纪闪现光芒；各种金属，铜、锡、托斯卡纳的铁为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更有甚者，希腊城市纷纷向它靠近，以自身的光芒为其增色。埃特鲁里亚依然并继续用不知疲倦的欣喜迎接这种将她“殖民化”的文明。甚至埃特鲁斯坎艺术中最为独特的墓室绘画可能也受其影响。帕埃斯图姆发现的被称作“潜水者之墓”的彩绘石棺似乎只是颇有成果的挖掘的开端[①]，将引发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些希腊绘画是埃特鲁斯坎壁画的现代版。的确，在承认希腊对埃特鲁斯坎的影响时，希腊与东方之间又出现了问题。经史密斯先生分析的在东方发现的几块残片使他认为存在一种一直到亚述人为止几乎未中断过的东方壁画传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或塞浦路斯的城市明天是否会为我们保留帕埃斯图姆那样的惊喜呢？

第一个托斯卡纳

埃特鲁里亚，广义上首先是托斯卡纳，它从阿尔诺河到底格里斯河，从亚平宁山脉到第勒尼安海，都生活着埃特鲁斯坎人。托斯卡纳侵占了今天的翁布里亚和拉丁姆。在它的西边直到海边绵延着低缓、多石又多沼泽的平原，即锡耶河沼泽地，比萨沼泽地，还有多沙的河流以及多刺的小灌

① 这些挖掘进展顺利，A. 蓬唐多尔夫和 A. 鲁弗雷发表《帕埃斯图姆绘画墓室》，摩德纳，1992。(P. B.)

木林；在东部地区，随着不断靠近蓝色的亚平宁山脉，会看到白雪皑皑的景象，山丘国家和狭窄的平原。著名的“幸福的埃特鲁里亚”（Etruria Felix）就位于此地。那里丰硕的果实和众多的葡萄园，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田园风光。小普林尼无比惬意的乡间小屋（Tifernum Tiberinum）就安置在此。

相互之间较为独立的二十几座城市形成了埃特鲁里亚持久的力量。按照传说，它们当中的12座加入了联邦——十二城（dodecapole）——但无法列出准确的名单。其中最古老的，土地狭窄的卡埃尔和塔尔奎尼亚都位于南部地区。首批出现的城市与大海相距不远，但也并非位于海边，它们与一些港口相连，如皮尔吉就曾是卡埃尔的出海口，甚至一度还是罗马的出口。所有的城市都建在高地，即“地脊”之上，以便确保城市的防卫（自公元前6～前5世纪起城市周围都建有围墙）。但这些地方的地下会有平原疫气，可能引发疟疾横行。临近平原的灌溉以及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如果说作为印证这一规律的特例，波普洛尼亚地处海上，那是因为厄尔巴岛的生铁源源不断卸在这座黑烟滚滚的工业城市的港湾。

此后，当埃特鲁里亚走向衰落时，它又退回到开发东部平原的农作物，种植葡萄和橄榄的境地，而那里的乡村地主贵族阶级仍然十分富有。这种滑落将一切引向阿雷佐，那里的卢库蒙人（Lucumons）是梅塞纳斯的祖先，凭借其农业和工业财富成为大西庇阿时期埃特鲁里亚的中心。其他城市的发展就不那么顺利了，其中包括种植亚麻、生产船帆的顽强的塔尔奎尼亚。

托斯卡纳之外的埃特鲁里亚

对于建立神秘殖民地的殖民主义，埃特鲁里亚已大大超出这一界限并同时向南、北的邻近地区开发殖民地。[1]

在南方，埃特鲁斯坎人很早便已踏上了巨富的坎帕尼亚平原，而希腊人此前也曾来到这里。在希腊的库姆附近，埃特鲁里亚卡普阿的发展蒸蒸日上。但同所有的希腊城市一样，卡普阿必须防御邻近的山地居民，即奥斯基人和萨莫特人，才能维持生存。这股持久的威胁力量终于在公元前5

① 事实上，维拉诺维安（villanovienne）文化已于公元前8世纪在坎帕尼亚得到证实。（P. R.）

世纪的一天征服了下游的所有城市。而在此之前，卡普阿曾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颇具成果的考古挖掘印证了这一点。无疑效仿希腊人的城市区域划分也在此地大行其道。统一的平原没有像老城拥挤的埃特鲁里亚，或丘陵林立的原始罗马那样受到种种制约。

卡普阿形成“一座桥头堡”，在南方城市与“大都会”埃特鲁里亚之间，应该建有高效的联系。此外，台伯河的最佳通道在蒂贝里纳（Tiberine）岛对面古老的苏尔皮西斯（Sulpicius）桥一处。我们知道尽管有那些传说中善意的谎言，罗马当时被埃特鲁斯坎人占领，重建并改型；这些严格的教化为这座城市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在他们的宗教、机构、游戏、城市化以及生活的外部背景当中——执政官之前的侍从官以及这些高级行政官员的象牙椅、膳食、音乐——罗马人总是带有埃特鲁里亚的痕迹。

在北方，埃特鲁里亚的扩张自公元前8世纪起跨越了亚平宁山脉，在公元前6世纪时范围继续扩大。[①] 障碍并非轻而易举便可逾越。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令人称赞的高速公路尽现旅行的美景，让人忘却困难！只有通过山间的深谷才能穿越山脉，而这么多的山谷要一个个攀越。就这样从台伯河或阿尔诺河到雷诺河山谷可直抵博洛尼亚、波河三角洲和亚得里亚海。

专家们谈论波河平原上的埃特鲁里亚帝国，类似于埃特鲁里亚的“十二城（dodecapole）”已有一段时间了。他们更加谨慎了：在曼图尔、米兰或在阿迪杰河上亚得里亚，一切都说明从未有过政治操纵，或简单的经济、文化交换。无论如何，马佐波多（在那儿的挖掘显示曾有一座古城，名字还不得而知）、博洛尼亚（当时的费尔西纳，今利波伦亚）和雷诺河河口的斯皮纳，都带有托斯卡纳人及其艺术的明显印记。马佐波多城被分割成许多小格子，在方圆百余公顷的土地上竖立着它的住宅楼（165米长，35、40、68米宽）、铺展着管道系统和高高的散水坡。但是，地域广阔，居住区、商店或作坊却是平淡无奇。始于公元前5世纪的斯皮纳仿佛今天的威尼斯，城市浸泡在水中，有一条笔直的大型水渠和一些辅助的水渠，正是一个格子分布图的样板。和埃特鲁里亚一样，斯皮纳也曾是希腊城市，这或许解释了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陶瓷制品进口在埃特鲁里亚逐渐减少的时候，在斯皮纳却不断增加。也是基于这一点，埃特鲁里亚为获得中部欧洲的琥珀与铜，其贸易范围已达到阿尔卑斯山一带。

---

① 坎帕尼亚的情况对波河平原同样适用。——译者注

埃特鲁里亚的衰落

埃特鲁里亚力量的巅峰时期或许恰恰就是其战舰（与迦太基战舰结成联盟）在科西嘉岛的阿拉利亚战胜福西亚舰队的时候（前540～前535）。一时间，希腊人被赶出第勒尼安海，这里从此成为“埃特鲁斯坎之湖”。但是，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半个世纪。

公元前474年，锡拉库萨的希伦在库姆赢得了对于埃特鲁里亚海军决定性的胜利。很快，卡普阿惨遭遗弃：它只得同奥斯基人合作，它也正是这样做的。埃特鲁斯坎人也将最终撤出罗马，关于具体的时间，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507年，在走向共和国的革命期间，或是公元前504年，波尔塞纳人入侵结束，克鲁西奥姆（丘西）王重新占领罗马之时。对于这两个日期，还存在争议。罗马革命不是同其他埃特鲁斯坎城市的革命一样，也推翻了国王吗？或许罗马是在晚一些的时候，即锡拉库萨人在取得库姆一战的巨大胜利之后，对埃特鲁斯坎海岸甚至其位于亚德里亚海的港口进行大肆破坏时，才恢复其自由的。

埃特鲁里亚虽然日渐衰落，却并未被这些反反复复的打击彻底击垮。它历经了200多年才一步一步走向消亡。凯尔特人越过亚平宁山脉抢占领地，并于公元前360年夺取了费尔西纳（博洛尼亚）。最终，与意大利各民族为敌的罗马向埃特鲁里亚发动了一场消耗战，这是一种内战，由于佯装的和解而中断。维爱于公元前396年被攻下，而沃尔西尼和法雷里则分别于公元前265年和240年被相继占领。严格地讲，最后这个日期也标明了埃特鲁里亚最终被降服的时间，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埃特鲁斯坎各城市仍然延续着从前的生活：同样的抱负，同样的行政制度和贵族政治，还有像农权一样依附于封建采地的农民，以及遭受非人待遇的矿工们。而罗马文明和拉丁语却在此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罗马勉为其难所从事的事业——意大利半岛的统一是征服我们的大海（Mare Nostrum）的序曲——，埃特鲁里亚应该能够完成。在政治策略方面，其不幸就在于树敌过多，同时又被分割成许多急于独立的城市：在沃尔西尼领地上举行的埃特鲁斯坎城市年会是宗教性质的议会，而不是政治机构。埃特鲁里亚忍受了曾为希腊城邦带来灾祸的同样的厄运之苦。

但是和这些希腊城邦一样，埃特鲁里亚也通过某种方式度过了难关：托斯卡纳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始终独树一帜。我们在奥尔维耶托、塔尔奎尼

亚和佛罗伦萨的街道上从这个男人或那个女人那里又看出埃特鲁斯坎坟墓中的那种线条突出且幸福洋溢的面庞，是否有些过分呢？我的一个爱好艺术的朋友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时声称："他们不是托斯卡纳人，而是埃特鲁斯坎人。"这与雅克·厄尔贡通过梅塞纳斯表现的埃特鲁斯坎人的肖像相符，梅塞纳斯是阿雷佐古老卢库蒙人（lucumons）后裔，"奥古斯都内务大臣"，贺拉斯和维吉尔的保护者。他的漫不经心、灵敏睿智，自由自在和对巴洛克风格的钟爱；他对音乐的狂热和对粗俗荣誉的蔑视；还有他对人类的理解和固执地调和；将所有的恩泽奉献给在罗马的光荣中隐藏但并未丢失的古老的托斯卡纳文明，而把黑色的阴影留在一边，这是什么样的尝试？

时刻监视的神明

如果我们从处于生活中心的宗教中来了解埃特鲁里亚，了解那许多出现得晚又不够充分的信息源泉之外的其他情况，或许我们对埃特鲁里亚之谜会少一些失望。这是一本书的宗教，或一些书的宗教，但是这些书我们没有。我们掌握的只是一些片段，一些罗马时代的评论，无法最终为我们勾勒这个世界的"框架结构"。

来自于古老东方的宗教在埃特鲁里亚活力旺盛。万圣祠神明众多（皮亚琴察青铜肝脏上的44个小格子不够安放所有神明）而且几乎对外来神明——意大利或希腊的，有时还有腓尼基的诸神，也毫无歧视。

意大利神以"经过变形但还可以辨认出"的拉丁语名字侵入，制造了很多麻烦：乌尼（Uni）来自于朱诺；内桑斯（Nethuns），尼普顿；马里斯，马尔斯；萨特，萨图恩。与此不同的是埃特鲁斯坎女神默尔瓦（Menrva），或许将其名字给了拉丁女神密涅瓦（Minerve）。由于希腊神明众多，那些人物和神话、不可思议的探险错综复杂，情节离奇，和埃特鲁斯坎诸神融为一体。埃特鲁里亚至高无上的神明提尼亚，由一根权杖象征，并司掌雷电，只能从宙斯神的特征和变形当中看出。默尔瓦当然诞生于宙斯的大脑。埃特鲁斯坎的赫尔默斯神有他自己的埃特鲁斯坎名字——图尔姆斯，但他"身着赫尔默斯神的短披风和阔边浅圆帽，手持海尔梅斯的神杖"。至于赫拉克勒斯，他单纯而简单地被敬为司掌战争、游历和冒险的神明，同时还成为战胜地狱的象征。

这些混为一谈的，一连串的希腊语或意大利语的名字，这些组成拉丁

万神殿的形象（提尼亚也和乌尼、默尔瓦共同组成三神组的主体，类似于朱庇特神殿的三神一体）——就是它们掩盖了埃特鲁斯坎宗教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想进一步了解沃尔图穆努斯这位重要的青春之神，它随着季节变换装束，罗马传说中声称他为罗马的事业而放弃了埃特鲁斯坎的事业。可是，他来自何方？无论如何有一种迹象不容置疑地表明那是东方：埃特鲁斯坎宗教是一种高雅的宗教，与罗马宗教或希腊宗教截然不同。其圣书传述由山林水泽仙女维戈亚或某一天在塔尔奎尼亚劳作者的耕地中诞生且具有老者睿智的孩子塔热教导的话语。

然而，直到后来，长期以来口头传说的埃特鲁斯坎人技能才被记录成书，这些书大大吸引了西塞罗现代罗马人：关于研究牺牲品内脏的艺术的 *libri haruspicini*（预言者之书），介绍雷电的 *libri fulgurales*（雷电之书），以及一种关于亡者之旅的埃及文课本 *libri rituales*（宗教礼仪书）和 *libri acheruntici*（地狱之书）。即整整一套具有守护力量的魔法体系，以猜测但不超出神明令人生畏的意愿；通过探询牺牲者的内脏解释奇迹，特别是变化多端的雷电，根据它在这片或那片天空的出现，以及出现的次数多少等等来预测未来。该体系得出一些同时对每个人的生活或国家的存亡颇有价值的规律。

埃特鲁斯坎人被这些恐惧和责任所累，依照前人的说法是最容易“被打垮的”，也是所有人中最具宗教特征的。但是这是以罗马宗教或希腊宗教作为参照。也许我们应该简单地说他们没有走出东方宗教充满魔力、充满恐惧和形式主义的圈子。埃特鲁斯坎宗教为其信徒留下很少的安宁，似乎它不通往任何伦理或报应，但并不是说没有惩罚，关于这一点，我们过后再述。但是这难道不也是许多东方宗教的情形吗？

亡者能言吗？

一些埃特鲁斯坎城市中狭窄的街道和没有水泥的巨石围墙，一切都已消失或几乎消失。但成百上千的坟墓却奇怪地作着证明。

维拉诺维安（villanovienne）时期最早的坟墓只是简单的洞里面埋葬着装有死者骨灰的锥体形（或为房屋形状）的骨灰瓮。随着埋葬在各地的盛行，出现了长型坑。接下来，自公元前 7 世纪起，富人们开始在火山凝灰岩上挖凿居室型坟墓。在卡埃尔古城遗址附近习惯修筑的城墙之外，三个（方圆 350 公顷）墓地令死人之城在面积上超过了活人的领地。而且卡埃尔的情况并非特例。许多坟墓随着时间的流逝遭到洗劫或占用。不久以

前，为了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考古工作者展开了一些巧妙的调查：在坟头上安置一台潜望镜可以在一些藏有珍宝的坟墓中提前看到内部，特别是其中的壁画。这是尽可能给予保障的一个好办法，然而，挖掘工作进展缓慢。实在遗憾！

从公元前8～前5世纪，这些坟墓提供了对埃特鲁里亚本身和国际艺术起转变化的最好证明。我们在那里找到的物品是地中海艺术贸易的缩影：埃及瓷制花瓶、护身符和象牙制品，腓尼基镀金银制高脚酒杯和玻璃制品，数不胜数的科林斯和原始科林斯、爱奥尼亚、阿提喀、拉科尼亚陶瓷制品，来自各地的细颈香水瓶……地中海风格整体的演变，从东方化时期到希腊化时期，从希腊仿古的微笑到严厉而传统的风格，从黑色花瓶到红色花瓶——透过埃特鲁斯坎丰富的物品能够看出追随潮流变化的过程：武器、镜子、三脚支架、青铜祭器筐，使用黑色黏土效仿金属制成的花瓶，是对希腊陶瓷制品的模仿，还有金银制品、雕塑、建筑，特别是庙宇。埃特鲁斯坎艺术最辉煌的时期始于公元前7～前6世纪初期直至约公元前475年。这一时期，珠宝最为美丽，显现东方品位，雕塑精美，维爱（公元前6世纪末）壮丽的烧土塑像装饰了阿波罗庙宇的屋脊，最后还有最为迷人（这个词很合适）的墓葬绘画。

的确，在塔尔奎尼亚参观这些死人的房子，从一个走到另一个，每次都发现托斯卡纳春天的色彩和阳光，仿佛洋溢着快乐的朝圣。埃特鲁斯坎人相信物质意义上的存在。人们即使进了坟墓还会生存下去，在一间或几间房子里，有自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起的长座、石头雕筑的檐壁。所有的装潢都是用来表明房间属于私人，在死人的周围营造出活人多彩的世界。

让我们以塔尔奎尼亚被称作狮穴（Leopards）的坟墓为例，它既不是最漂亮的，规模也不是最大，但却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墓地之一。一条楼梯通向一间方形的地下墓室。入口对面的几张床上躺着三对夫妇，正由一些仆人伺候着边吃边聊。在两侧的隔板边，侍者和乐师在花丛中向客厅（triclinium）行进。宾客上方的三角楣上两只面面相对的狮子代表坟墓的名字，其魅力并不在于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如果我们注意一下被称作客厅（triclinium）的坟墓中非凡舞者的细致且精准的画面，或在此之前50年被称作“母狮墓”的坟墓中一对半身赤裸的舞者伴着狂乱的节奏非同一般的动作，那粗犷的轮廓，沉重的动作，毫不饶恕的双手让人一眼便可认出。此外，大手笔泼洒的色彩，生硬地混合在一起的蓝色、红色、绿色、黑

色，在舞动空水罐的侍从和宾客之间任意涂抹的图画游戏，金黄头发面色红润的妇女，满头乌发的年轻男子，所有一切都是快乐的、自发的、而且活生生的。

主题中没有任何形式主义。每座坟墓的主题都不尽相同。被葬者被生前带给他们快乐的事物包围着。阔绰的宴席代表着安葬仪式，还有在世时的种种享受：音乐，田径运动，侍者的殷勤服侍，狂乱的舞蹈，岸边漂亮的船只，全身赤裸的潜水人从一块红蓝相间的礁石上纵身跃起，融入五颜六色的海鸟之间，还有步兵、俊美的马匹和跑步者灵巧的腿，以及植物、动物和鱼的装点。所有这一切自由运用色彩并将其随意组合。我们可以观察同一个主题，以埃及的方式进行处理，埃特鲁斯坎坟墓中“狩猎和钓鱼”的绘画：鱼群活跃的水面上，一条渔船，船上渔夫正在收网；上方狩猎者向着群鸟聚集的地方张开投石器。这诚然是同一个主题，但却是另一个世界，欢快、带着幽默感和滑稽气息，和我们在一些埃特鲁斯坎漫画式的雕塑中看到的一样。在所有埃特鲁里亚的古老坟墓中，下到地狱都是对生的赞歌，无论埃特鲁斯坎人对使他们苦恼的上帝是怎样的信仰，怎样的惧怕。

一切在公元前 4 世纪甚至更早一些的时候奇怪地发生了变化。首先是风格，突然间变得严肃，有时还很拘谨。从传统的希腊神话中借鉴主题，有时还有美丽的细节，例如在奥格尔（Ogre）坟墓中有维利亚神著名的肖像。同时，日常生活可亲的图景被抹去了，而占据画面的魔鬼并不是埃特鲁斯坎万神殿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形象。它们是图舒尔沙（Tuchulcha）猛禽的嘴、长长的耳朵和头顶上逼人的两条蛇；夏伦（只有希腊语的名字），更加凶险，长着蓝青色皮肉正在腐烂的可怕面孔、鹰嘴鼻、马耳、手持木槌带着魔鬼的快乐猛击死期已到的人们。这些不祥的形象是埃特鲁斯坎大众信仰古老背景的组成部分，但这是它们第一次出现在坟墓的墙壁上。它们在死者从生到死的可怕过渡中折磨他们，那是在找到地狱中永恒的平静和快乐前的一段时间，并以希腊的方式表现地狱（也是一个新事物），那里哈德斯和珀尔塞福涅主持着地狱中的宴会桌。

这些黯淡的图景随着公元前 4 世纪的到来而增加了，那时埃特鲁斯坎人物质生活的好运气受到打击，托斯卡纳的夜幕降临了。

三　希腊殖民地

与腓尼基殖民及伊特鲁里亚历史一样，希腊的扩张有着同样的问题和

含糊不清的记载。尽管我们掌握的材料很充裕，但就有关迦太基形成的具体年代和动机，还是发现了不少疑问而且无法找到答案。大量的史料和论证描绘出了希腊早期殖民的完美过程。

在我们之前认识的这段过程似乎并不怎么复杂。随着一座座相隔不远的城市在地中海沿岸相继拔地而起，在克里米亚半岛至西班牙之间形成了一个由各种大小城镇组成的城市网络，而且每座小城镇都以一座母城邦作为依托。除了个别例外情况，每个希腊殖民地都是经事先筹划的远足考察之后产生的，多数情况下还受到德尔斐城神使的指点。远征队一般由大都市指派的某发起人（oikistès）率领；在希腊诸神的保护下，该发起人负责确立新城镇的选址，指挥土地丈量及地块分配，并把大都市的政体配接到新城来。此后他便成了该城市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给后人留下了个英雄的美名。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那充满壮丽传奇和生活着众多王侯及半仙之人的遥远的时代。每次出征时，移民们都在他们的行囊里带上在大都市家中点燃的火种。

远征故事中自然会有其他人物，如土著人。他们有的对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搏斗，有的乖乖地当了顺民，有的还在赞叹之余把其国王的女儿许配给了远征队的头领。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一位叫普罗蒂斯的马萨里亚（即当今的马赛）远征队头领就娶了当地塞格布里热人酋长的女儿为妻。斯巴达人法朗特是在战胜了亚普日（Iapyges）蛮族后才建立了塔兰托市。在出征前，德尔斐城神使不正唆使他要敢为“亚普日人的罪人”吗？公元前631年，以利比亚游牧人为向导，锡拉岛人巴托斯远征到地中海的彼岸，在因“天上穿洞”而没完没了地下雨的地方创建了昔兰尼，从而在荒芜的非洲海岸上开辟了一个奇迹中的奇迹。土著人也常常成为远征故事中的笑柄。如居住在米利都腹地的卡里亚人之所以被视为“蛮族”，是因为他们把希腊语说得一塌糊涂——事实证明他们毕竟说希腊语。当然，就像欧洲将出现“善良野蛮人”一样，当时也有“善良蛮族”，例如在好客海的北岸，“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通常很欢迎爱奥尼亚人，以及他们带来的美酒和精致器皿”。

希罗多德、保萨尼阿斯[①]等其他古希腊名人曾讲述过上百个类似的故事，而且一个赛一个生动。人们当然没有必要过于轻信这些故事。传统的

① 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保萨尼阿斯（公元前？～前470），斯巴达将领。——译者注

希腊移民史记载与史实多数是吻合的，可是自从考古学介入此研究后，其整理出的证据，尤其是挖掘出的陶瓷碎片，便推翻了某些城镇原来的始建年代。当然，由于这些年代记载是环环相扣的，每做出一个修正无疑会对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无绝对把握的希腊移民的整体年表带来连锁反应。再说考古学也仍须进一步破译和明确有关文物的密码。设想过 1000 或 2000 年后，在没有任何文字资料支持的情况下，考古学将试图一步一步地复原被抹杀了的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的历史，那么法国人占领阿尔及尔的史实完全有可能会变得像迈锡尼人攻克诺萨斯城或多利安人建立塔兰托的年代一样难以考证！

研究古希腊历史的关键，在于认识到这是自希腊走出其中古时代的烂泥潭后，第一次向文明进军。这是决定希腊未来一切的关键之举。

待考证的早期殖民

世界通史把希腊殖民大体区分为两类，即公元前 775 ~ 前 675 年间的早期农业殖民和公元前 675 ~ 前 600 年间的商业殖民。将其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希腊移民并不确切始于公元前 776 或 775 年（后者恰好为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之年），况且农业殖民与商业殖民也并不像水和油一样决然分离。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将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前夕所发生的一切探寻个究竟。

类似的探索只能通过众多或长或短的莫测之路，将人们引向种种导致希腊民众离开他们各自家园的历史原因。

在广义上的意大利，到处都可以找到迈锡尼人留下的痕迹。但是根据我们至今掌握的材料，迈锡尼人只有从塔兰托及其内地崛起时才形成了真正意义的移民趋势。在塔兰托这块不同寻常的土地上，甚至还能寻觅到某种具有殖民时代希腊特色的迈锡尼传统的延续。[①] 公元前 8 世纪希腊在意大利的移民并非一点儿记载也没有。早在马赛建立之前（即公元前 600 年），罗得岛的不少远征船只就已经抵达地中海最西端的高卢和西班牙海岸。这也许就是公元前 7 世纪末在罗讷河出口处相继建立罗得—罗萨斯，阿加特—阿德及罗达努西亚等城镇的原因所在。[②] 但在这方面我们掌握的资料甚少。

---

① 如今，与其说在塔兰托仍保留着某种殖民时代希腊特色的迈锡尼传统的延续，倒不如说这种传统已经基本不复存在。（P. R.）

② 专家们认为当时远征至该地域的罗得岛船只数量不会很多，且船主的身份不明。（P. R.）

小亚细亚的爱琴海沿岸在接纳希腊移民上的经历不仅相似，而且更加错综复杂。迈锡尼商人及商行也在该海岸线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在罗得岛，科斯岛及其他周围岛屿，以及在吉里吉和卡利亚，人们可能都说希腊语；到了青铜时代的末期，米利都还设有一个迈锡尼机构。然而随着公元前7世纪的到来，小亚细亚及别的地中海区域均被黑暗所笼罩。后来不少希腊难民也来到了爱琴海东岸。随之便形成了一些小规模的城镇：士麦那大约在千年之际建设成型，米利都建成的年代也许要早一些。早期的士麦那围着一堵城墙，用专家的话说该城墙"既高大又结实"——这同时也说明士麦那受到了外来的威胁，但被围在城墙里的却是些极其原始、呈"曲线状"的房屋。一直到公元前7世纪中叶，这一切才发生了变化，而且是急剧的变化。爱奥尼亚所属的"十二"座城镇中规模最大的要数弗凯亚和米利都，它们无论在近期还是在远期的移民中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们便成为了希腊势力范围中最引人注目的城市。

这些殖民城镇尽管在初期规模不大，但却分布广泛，因为从克里特岛至北斯波拉泽斯群岛的整个爱琴海沿岸及其岛屿均被希腊人所控制。此后不久，希腊人甚至还移居到了自萨洛尼卡湾至赫勒斯旁海湾一带的、荒芜的北方海岸。从此，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便开始缓慢地、但却无保留地影响整个爱琴海地区。于是，代表希腊半岛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文明的"几何"造型风格便在爱琴海诸岛屿以及小亚细亚沿岸留下了众多的烙印。早在公元前8世纪，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就落成在基克拉泽斯群岛中央的提洛岛上，并在后来像一座灯塔一样辐射周围的海域。

希腊与地中海东岸地区

严格地说来，希腊在亚洲的定居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因为亚洲与希腊本土几乎一样古老，只是由于多利安人的到来而再次获得了新生；也因为它的城镇并不是由来自爱琴海彼岸大都市的移民们所"建造"，而是与希腊半岛及其岛屿上的城市同时自然发展成型的。爱琴海两岸当时都聚居着同样的民族，即以多利安人、爱奥尼亚人和伊奥利亚人为主，再加上少量的亚加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奥尼亚（拥有十二个城市的爱奥尼亚）逐渐演变成了小亚细亚的代称，而且它还以其特有的文明、风俗及艺术有别于希腊半岛。再晚些时候，"爱奥尼亚"柱式建筑又不同于在爱琴海彼岸创造的多利安柱式建筑。

事实上，这片希腊在亚洲的殖民地只有在与亚洲内地发生交往后才真正昌盛起来。然而这种往来形成得非常晚，而且当沿岸与内地的交往初现端倪并朝叙利亚方向发展时，创办了阿尔—米纳城（Al-Mina）的一些新型商业机构的是爱维亚岛及爱琴海诸岛上居住的爱奥尼亚人而不是亚洲的希腊移民。爱奥尼亚本身很可能与这种早期的经商形式以及由此导致的艺术和思想东方化毫无关联。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早期艺术和思想演变的征兆于公元前725年出现于科林斯，其具体反映在原始科林斯陶瓷制品上。而希腊在亚洲的殖民地只是到了公元前7世纪的中叶才摆脱了几何造型的约束。

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历史学家只能挑选一个他有权知道全部真相的地域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就选择与叙利亚联结之前的小亚细亚爱琴海南部海岸，因为作为本地的经济支柱，罗得岛和塞浦路斯是迈锡尼财富的藏匿之地，也因为塔尔苏斯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与罗得岛和基克拉泽斯群岛有过来往，更因为地处欧朗提斯河出口的阿尔—米纳城曾是新赫梯人叙利亚的商行。而对这个于1935年才被考古学家们发现的新赫梯人的叙利亚，我们至今尚未能确认其起源年代，也许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初期。总之它的历史地位是至关重要的。阿尔—米纳城的确算得上是希腊向叙利亚、巴勒斯坦、新赫梯人和阿拉米人国家，以及向亚述，乌拉尔图和大陆近东所有沙漠旅行队开放的第一个重大口岸。由于阿尔—米纳城里聚居着大量的腓尼基人，因此无怪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看成是希腊与东方相互沟通和希腊人学习腓尼基语言的城市，以及希腊艺术东方化——当然首先受到冲击的便是它的几何造型风格——的起源地。

另外阿尔—米纳还有着其榜样的价值。地中海漫长的海岸上分布着许许多多的国家，按当时的水平来看，它们或处在原始状态，或比较发达，或很发达，有的文明水平高，有的文明水平低。然而经商往往只有在条件悬殊的区域才更加有利可图，就像只有在高压和低压差异明显时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强烈电流一样。阿尔—米纳城显然是一个高点和一个商业顶峰，它被置放在一条把尚处在落后状态的希腊与许多曾经发达过但仍未失去——如果它们已经失去了部分财富的话——其先进性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路径上。瑙克拉提斯是晚些时候出现的又一个高峰，普萨美提克一世[①]曾将这座当年在尼罗河三角洲上的“上海”授予了一些希腊裔爱奥尼亚商人。

① 普萨美提克一世（公元前664～前610年），古埃及法老，曾创立塞易斯王朝。——译者注

瑙克拉提斯始建于公元前 600 年之前，大约在 630 年。确实，这时正是所有希腊本上或殖民城市——无论是新城还是老城——处在紧张状态的时代。

为土地还是为经商？

不言而喻，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现实。在其国民大批迁移的年代，希腊还是一个农业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且它的自然条件的确很差，因为它拥有太少的可耕地，当然就更谈不上高质量的土地了。人口一旦增长，希腊人就不得不实行国内移民，但遗憾的是国内消化人口膨胀的弹性业已减退：一方面拓荒者们的镐头每每落在布满碎石和老树根的土地上，另一方面全面退化的耕地只能回报以微薄的收成。无论是反复地耕翻还是用镢头打碎土块，也无法使希腊贫瘠的土壤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当时人们也顾不得这种开垦会破坏土地的依附力，从而导致疏松土壤被雨水冲刷、流失。整个古希腊都饱受此顽疾的困扰，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变化。

渐渐地，土地问题就自行转化成为了社会问题。因为贫困农民的人数众多而祖上留下的土地遗产又少得可怜，就势必导致他们去拼命争夺地主手中为数不多的土地的耕作权，由此他们便成为了 *hectémores*——即每年大约得向地主上交 5/6 收成的佃农。久而久之，他们便欠下了累累债务，以至最终不得不退还那“奴役性的土地”。公元前 8 世纪时，希腊到处都是逃匿躲债的农民，如荷马的诗篇里就充斥着类似的流浪汉。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奥德[①]就曾描写束缚于贫瘠土地上的希腊农民如何艰辛，以及如何饱受邻里、家庭及“王爷”——即城里的主人——冷眼和责难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只有宙斯的公道能拯救农民。否则就剩下逃匿了。当然除非他们心甘情愿沦为“鹰爪下夜莺”。希腊立法机构也意识到要改善这种社会现象，梭伦[②]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但是随后地少人多的问题又改头换面继续其恶性循环。

要想通过国内移民摆脱此困境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希腊当时面临的远不止这一个问题：城市人口膨胀、从事手工业的人过多及佣工苦不堪言的生存条件——就像瑞士山民和文艺复兴时法国雇佣的德国士兵一样艰

① 赫西奥德（约公元前 8 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稍晚于荷马。——译者注

② 梭伦（公元前 638～前 559 年），古雅典政治家和诗人。他同情平民的处境，公元前 594 年任执政官时曾立法实行政治、经济改革，从而打击了贵族的势力和暂缓了下层平民的不满。——译者注

难，等等。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甚至出现了希腊士兵在埃及和波斯王国被出售的情况。

到后来，农民的逃匿甚至可以演变成某种腓尼基式的铤而走险。这种假设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个航海业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时代，农民很愿意改行当水手，而这只需弄一条船就行了。赫西奥德有个兄弟叫佩尔塞，也是个农民。一年入冬，当“凌厉的寒风开始肆虐时”，他便这样告诉兄弟：“不要划船下海，而应该去种地。把船拖上岸来，在它的四周围上石块……然后拔掉船板上的塞子好让宙斯的雨水不将它腐烂。把帆缆索具拿回家放好，把帆翼叠放好，把船舵放在灶台之上。你记住要等到来年适于航海的季节再下海。”

总之，贫困化的进程促使许多人走向了遥远的异乡海岸。如果说在希腊的早期移民中，维奥蒂亚、阿提克及斯巴达（塔兰托例外）并没有首当其冲，那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尚具有本地移民的潜力，因为它们那儿还有可开垦的土地，或因为它们还能靠自己耕种的小麦填饱肚子——斯巴达则食用它所征服的邻国美塞尼亚进贡的小麦。小亚细亚的移民城市——或者也包括迈加拉——之所以于公元前6世纪开发好客海并在那儿设立了许多商行，也无非是为了获得南斯基泰一带人口稀少国家的小麦。中古时代热那亚远征好客海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但小麦是需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得到的。那时人们用于交换小麦的通常是葡萄酒、食用油——均为农作物产品，及其他制成品。然而如果没有专营小麦的商人的介入，凡是有一定规模的小麦、陶瓷器皿及金属制品的交易都是难以达成的。因此自从希腊人移居外国起，就出现了商人和贸易运作，甚至还出现了以经商为动机的移民。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哈尔基斯的希腊人于公元前770年曾试图在那不勒斯海湾之外的伊斯基亚尔建立农业机构的原因所在？一旦经过如此长途跋涉之后，远征的原有目的往往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了。也许是出于偶然，希腊人于公元前8世纪在墨西拿海峡之外安置的第一个了望站其实就是一个通向伊特鲁里亚海及其金属矿产的前沿阵地。而哈尔基斯人总是担心没有足够的金属……吕底亚和埃及的黄金，西班牙的白合金以及黄铜无疑也都是希腊或其他国家的早期殖民者远征所考虑的因素之一。

总体印象

希腊在公元前8～前6世纪间的向外扩张能否被视为一个历史整体呢？

也许分布在漫长的地中海沿岸上的众多城镇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世界。交通的不方便，以及局部往来的加强有可能会把某个城市局部地挤到了总体沟通体系之外。尽管意见不同，这种沟通体系毕竟还是存在的。而这正是我们力图重现的"模式"的关键。

在本书所附的地图上，读者可以注意到希腊移民的一些主要出发点：哈尔基斯，埃雷特里亚，迈加拉，科林斯（咱们暂且不提米利都和弗凯亚），这些都是古希腊早期的活动中心。古希腊有一条贯穿其领土的发展轴线。它起自尤里普斯海峡——哈尔基斯城就坐落在此海峡边上，并一直通到萨罗尼克海湾和科林斯地峡。早在公元前7世纪，犹如狭窄天然墙体的科林斯地峡里就曾修筑了一条车辙式（有空隙的轨道）通道，在上面铺上滚木后便可以由旱地把船只从萨罗尼克海湾一直运送到科林斯海湾。科林斯海湾有两个港口，莱沙永（Lechaion）和克基拉（Kenchrai），是轴线的终点并直接面对西方。在这次由少数人参加的、逐渐完成的希腊移民中，雅典和阿提克并没有真正介入。

从其结果来看，希腊此次扩张主要涉及三类区域，或者也可以说主要经历了三种遭遇：

（1）轻而易举型，因为海岸上空空如也或基本上没有防御部署，总之未遭遇抵抗，但这并不妨碍移民行动取得规模和成果；

（2）重点行动，这主要指对意大利南部（大希腊圈）及西西里岛沿岸的占领，因为这儿已有种植场和农田；

（3）铤而走险型，这主要指对地中海遥远西海岸的征服，因为这是一种要么大获全胜，要么一败涂地的行动。这些远征获得的最辉煌成果中有公元前600年马赛的建立。

昔兰尼加和好客海

在那些基本没有防御部署或干脆对希腊移民友好款待的海岸中，有昔兰尼加，因为来自爱琴海北部的希腊人到那儿就直接登岸了；还有另一个海岸就是在赫勒斯旁海峡[①]之外、由米利都通过阿比多斯控制的好客海沿岸。博斯普鲁斯海峡两端分别是拜占庭城和卡尔西登城，迈加拉哨兵就面对面地把守在海峡的两岸。自公元前650年起，米利都几乎是在那暴风雨

① 今达达尼尔海峡。——译者注

频繁、而且总是“笼罩在迷雾和乌云中”的黑海（人们当时婉转地把此海称为“好客海”）周边设立商行的惟一城市。因此米利都人从那儿得到了诸如木材、咸鱼干、铁矿、琥珀、食盐、皮毛、牛马、劳力、小麦等宝贵的商品。当米利都衰败后，雅典人便取而代之占据了这片物产丰富的海域。

意大利和西西里岛

在地中海的中间地带，希腊移民的规模就非同一般了。如果说希腊人曾经把这片内海改造成他们独自享有的湖泊的话，那么这一段海域无疑会是他们向整个地中海扩张的起点。

由于巴尔干半岛沿海的风是自南向北吹，因此给希腊人向意大利以及西西里岛的进军带来了方便。由科孚岛的方位启程离开巴尔干半岛，大约一天的海上航程便可以把希腊人带到海峡对面的意大利海岸。到了那儿后，海风的风向便改成了自北向南吹。这风携带着希腊船队，沿着如同镶嵌在地球上的海河一样平静的意大利领海驶向塔兰托海湾，然后又来到卡拉布里亚沿海。从那儿墨西拿海峡的另一端望去，便可隐隐地看到了西西里岛的轮廓——其实墨西拿海峡并未真正把西西里岛与大陆割断。

希腊人于是便占领了从塔兰托海湾到西西里岛沿海的整整一条呈带状海岸线。值得提及的是希腊人没有继续向北而亚得里亚海方向扩张。科林斯人先从埃雷特里亚人手中夺下了科孚岛（克基拉岛）这个战略要地，然后又占领了阿波洛尼亚和埃庇丹努斯（都拉斯），这两个被伊庇鲁斯山脉挡住寒流的港湾。但科林斯人从未试图抵达亚得里亚海的北部（弗凯亚人曾例外地闯人此地，我们后面会讲到）。亚得里亚海的东部沿岸有许多小岛，而西岸则是大片低洼、河流纵横的平原。希腊众城市表面看上去凌乱且无条理的努力首先旨在寻找通往西方的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希腊移民在需要的时候选择某个好歹能与当地人——如亚普日人、奥斯克人、西库尔人及西坎人——和睦相处的地方止住他们的脚步。

不顾一切地走向西方，这就是考古学家和传说对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移民过程的概括。当然有关希腊人西征的史实远不止这些。希腊人早期对意大利的占领范围不仅仅限于塔兰托、梅塔蓬图（Métaponte）、锡巴里斯和叙拉古，而是超越了塔兰托至叙拉古一线乃至墨西拿海峡，于公元前

770年就抵达了皮特古斯（今伊斯基亚岛）。一进入意大利，哈尔基斯人和埃维亚岛人就以赛跑的速度奔向最遥远的地点。然后通过占领卡普里（Capri）、旁达特里亚（Pandateria）和蓬蒂亚（Pontia）等几个海岛，及通过于公元前740年建立重要城市古姆斯（Cumes）巩固了这些前沿阵地（传说中古姆斯始建于公元前1052年，而实际上它并没有这样久远）。继第一批移民城镇在希腊人的匆匆西进中草草落成后，纳克索斯（Naxos，前757年）、赞克尔（Zancle，前750年）和雷焦（Rhegion，前740年）也陆续建成。赞克尔与赫吉永城实际上起着控制墨西拿海峡、叙拉古（于前733年由科林斯人建立）、塔兰托（前708年）等其他地区的作用。这简直就是腓尼基人远征西班牙故事的翻版！

由于所到之地要么渺无人烟，要么只是受到对手不堪一击的抵抗，所以一切似乎在一开始就已经尘埃落定。其实希腊人真正的对手只是到后来晚些时候才奋起与其争夺某些重要地盘。如伊特鲁里亚人于公元前6世纪加强了他们在坎帕尼亚地盘的防守，由此造成希腊人无法继续向前推进，辽阔的第勒尼安海也因此向希腊人封闭，直到很久以后才允许向他们开放。由于普匿人牢牢地控制着帕诺尔莫斯—莫特耶（Panormos-Motyé）线以西的西西里岛区域（近在咫尺的迦太基又如何会放弃这个“码头”呢？），于是便产生了对地区分而制之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公元前750～前650年间，希腊人和普匿人共同占据了西西里岛，普匿人在西端，希腊人在东端。希腊人的最大胜利就是率先占领了波涛汹涌的墨西拿海峡。但遗憾的是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伊特鲁里亚人仍控制着第勒尼安海，而普匿人则凭借着对狭窄和多山的西西里岛西部的占领而控制着“从岛屿”通往西班牙的海路瓶颈。总而言之，希腊人曾寻找通往西方和金属矿产的道路，但遗憾的是并未能完全如愿。

这种情况并没有阻碍希腊移民城市的繁荣，其原因无疑是由于这些城市拥有广阔和肥沃的土地。瓦罗[①]称在意大利的希腊移民城市里农作物可种一收百。当然人们不一定非要相信他的说法。然而正如狄奥多罗斯[②]所说，丰盛的小麦、食油和葡萄酒是锡巴里斯人迅速致富的源泉和移民城市名声大噪的原因所在。

意大利希腊移民城市的富裕主要体现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但首先体

① 瓦罗（公元前116～前27年），古罗马作家、学者。——译者注

② 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译者注

现在商业上。因为地处地中海“中心”位置，这些城市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典型的中间商人的角色。希梅尔和塞利农特之所以能铸造出西西里岛最早的希腊钱币（希梅尔市的铸币时间约在公元前570～前560年间），是因为它们最先接触到西班牙的白合金，而这些白合金有的是通过马赛（由弗凯亚人于公元前600年建立）中转而来，有的则是通过白银的大供应商迦太基人转手交易而抵达了西西里岛的希腊移民城市。

在其发展的初期，地中海西部的希腊移民城市大多以手工业者、商人及承运商云集的大都市为依托。因为大都市的工业制品当时就是一种可以通过存入西方而得到升值的货币。米利都的细花布有可能是通过山间陆路从塔兰托海湾运送到第勒尼安海沿岸的伊特鲁里亚的。锡巴里斯人后来正是靠骡子驮着商品到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希腊移民城市拉奥斯（Laos）贩卖而发了财。意大利的山路尽管地处海拔仅1000多米的山间，但却很难行走，因此只能通过它运送些负重轻和贵重商品，如布匹等。

关于如何用货船贩运负重大的陶瓷制品，考古学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可靠、而且近乎详尽的资料。为满足宴席的需要，陶瓷器皿的长距离海上贩运从未间断过。这些器皿中有坛子，有双耳尖底瓮，有双耳爵，有高脚酒杯，有兽头状酒杯，有三耳瓶，甚至还有普通的餐具等。海运器皿中十有八九为陶瓷制品，而且其式样也因产地和生产时间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出土的文物及其碎片使考古工作者们有可能推定它们所处的年代，甚至弄清它们出自哪些瓷窑及画家之手。考古工作者还可以根据物品的质量和花样指出其贩运路径乃至数量的变化。

在对赞克尔和赫吉永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我们继乔治·瓦莱（1958年）之后对那个时代陶瓷生产及交易情况提出以下总体看法：从公元前625～前570年，科林斯的陶瓷交易量大幅度增加；从公元前570～前525年，爱奥尼亚的黑色琉璃陶瓷（特别是产自弗凯亚和米利都的）受到青睐；从公元前550年起，轮到阿提喀的陶瓷制品占销售上风。由此看来当时的陶瓷生产经历了三个时代，即科林斯时代、爱奥尼亚时代及阿提喀时代。自陶瓷发展的初期起，就确立了一种新型的、以移民城市为对象的交易方式，如同现代欧洲早期所经历的一样。很明显，科林斯销往西部的“餐具”多为成批生产，主要用以换回小麦，然后由它将小麦销往希腊本土各地。由于科林斯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地处以它命名的地峡交叉路口，它因此便成为了以移民城市为对象的陶瓷制品交易的惟一受益者。可

是随着爱奥尼亚以及阿提喀（后者在公元前 494 年的商业危机及在波斯人征服爱奥尼亚之前就已经在陶瓷生产和交易上崭露头角了）先后加入竞争行列，这种区域性贸易便为全球性贸易所取代。

如果能用“积累”一词来形容以上提到的早期贸易的话，便不难看出这种并不轻松的古老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具有了某种商业“资本主义”的色彩。1911 年，人们在塔兰托找到了西方铸造古老货币的最重要发现：出土了 600 多枚古钱币，以及“6 公斤未来得及用以铸币的白银。这些白银有的呈片状，有的呈粗糙、破残、断损及无法辨认的块状，有的呈棍状或条状，还有的像是白银器皿或坛子的碎片”。这些钱币和白银看样子是于公元前 480 年左右埋人地下的，因为这正好是希梅拉和萨拉米纳遭遇战乱的年头。多么完美的佐证！完美得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如今有人怀疑 1911 年的古钱币发现者有意用从别处弄来东西充数夸大了其发现的数量。[①]

遥远的西方与马赛

公元前 7 世纪末和 6 世纪上半叶，希腊移民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西部海域经历了他们最大的风险。

在这里没有必要继续对米歇尔·克莱尔克在他那部有关马赛的历史著作——该书把马赛的建成年代推至了公元 5 世纪——的史实根据作进一步的争论。因为于 1967 年在马赛股市区进行的考古挖掘毕竟并没有推翻他的结论。这次考古挖掘使我们了解到许多有关拉琪栋港口（它比马赛如今的老港口还要大）的情况，如停泊船只的石码头，供应淡水的水厂及老城的城墙等。[②]

马萨里亚于公元前 600 年建于商家汇集的罗讷河出口，这儿同时也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此选址足以说明弗凯亚人当时的胆量。这个弗凯亚人城市的规模仅次于爱奥尼亚第一大城市米利都，它从公元前 7 世纪末到公元前 549 年被波斯人攻占之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此时在地中海这幅庞大的版图上，所有的重要或容易通达的位置均已被占据。作为最后一

---

① 有关希腊移民，可参阅《希腊人和西方》（巴黎，1995）及 J.-L. 朗博雷的《西方的希腊人》和《古老年代》（巴黎，1996）。（P. R.）

② 关于马赛历史，可阅《希腊人的马赛和高卢》及《马萨里亚人研究》（普罗旺斯艾克斯，1992）。（P. R.）

批抵达地中海西部的移民，弗凯亚人决意要比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移民城市的创建者们走得更远，也就是说要超过克基拉岛，埃庇丹努斯，赞克尔，赫吉永及库姆斯。为此他们手中掌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快船。据修昔底德[1]说，像爱奥尼亚的其他民族一样，弗凯亚人都是些好水手；他们设想用一种由五名桨手划进的长条形船只——而不是通常借用风帆之力行驶的圆形船只——来运载西行的货物。而那时希腊人及其他地中海人只有在打仗时才启用这种船。也许这种船与公元5世纪时威尼斯出现的、同时以风帆和桨手作为动力的船只有相似之处？不管怎么说，弗凯亚人的这种又尖又快的货船比普通船只更便于自卫。可以想象在经商的同时，他们也可能会伺机利用这种船从事海盗行径。

弗凯亚人就这样抵达了亚得里亚海的北部并占领了亚得里亚城。他们原本可以走向近在咫尺的“德国地峡”。后来之所以放弃北进而选择了通往法国的山路，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这条很快就被希腊商人们探明的罗讷河之路，而是为了能朝大西洋方向挺进。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弗凯亚人、亚洲的希腊人、萨摩斯岛人及罗得岛人西征的最终目的地并不是马萨里亚。按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弗凯亚人曾“发现了亚得里亚海，伊特鲁里亚，伊比利亚和塔特苏斯”。也就是说在他的记述里只字未提到马赛。这也许是因为较之从大西洋沿海的安达卢西亚运回的锡，让弗凯亚人——像其他希腊移民一样——更感兴趣的是西班牙的白银和黄铜。根据这种看法，马伊纳凯（Mainaké）和赫莫罗斯科皮翁（Hemeroscopion）似乎应该建在马萨里亚之前。可遗憾的是前者根本不为人所知，而后者在考古学家的眼里则是一座并不很古老的城市。

马赛应该渐渐地站稳了脚跟，并在随后获得了其自治权。此自治源于弗凯亚于公元前549年被波斯人占领及由此导致的衰落。弗凯亚的大多数居民也因此纷纷流落他乡。就此开始了弗凯亚人的倒霉年代，因为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船队均禁止出逃的弗凯亚人到阿拉里亚去定居。西班牙南部也被布匿人有条不紊和彻底地收复[2]，但这并不排除弗凯亚人曾有谋算西班牙白银的企图。

---

①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40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公元前424年曾出任雅典将军。——译者注

② 这一观点今天再也无人认同。因为在巴尔基德人之前，迦太基人并不活跃。（P. R.）

强弱不均的统治势力

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全面复兴促进了人口的分流和商品贸易，并使腓尼基人，迦太基人，伊特鲁里亚人和希腊人成为了受益者。这一例子说明适度的繁荣有可能带来各种生财机遇。

到了公元前600年，局势和贸易似乎都加快了其发展步伐。在地中海这个足迹遍布和被瓜分的世界里，希腊的殖民体制已经达到某种无法超越的完善，希腊分别由米利都朝好客海方向及由弗凯亚朝地中海西部的扩张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公元前630年左右，埃及法老将瑙克拉提斯城授予了希腊商人；公元前600年前后，弗凯亚人在他们西征的尽头建立了马赛城。

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瑙克拉提斯城就像是那个年代的上海，即一个为亚洲希腊人开放的租借地。那儿有米利都人和埃因人，但更多的是来自希俄斯、罗得岛、蒂诺岛、弗凯亚、克拉佐曼纳、哈利卡那苏斯及米蒂尼亚的希腊人。希腊人那时是否就已经明白地中海只属于那些有能力自东向西横穿它的人？只属于那些能跨越其南北两岸——从瑙克拉提斯到马赛——做生意的人？谁控制了地中海的首尾就等于拥有了其统治权，这么看来亚洲的希腊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希腊贸易统治的中心。

但它并不是地中海的中心，因为地中海并不专属于任何人。事实上地中海当时被三股势力所瓜分，它们有时相互合作，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对峙，甚至是武力对峙。

最弱小和最不起眼的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势力。伊特鲁里亚人甚至在阿拉里亚打了胜仗之后也没有趁机把自己的生意扩张至整个地中海。他们只满足于停留在东西方的交汇点和享受已有的财富，但他们当时还不是东西方之间往来的联络人。总而言之，第一场灾难——即公元前747年遭遇的古姆斯的海战失利——便给了他们以致命的打击。

腓尼基人的势力要强盛得多。腓尼基和迦太基曾四处树敌，可是，当先后被亚述人和那布绰多诺辇人（Nabuchodonosor）战败后，腓尼基人的船队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在塞易斯王朝众法老的帮助下得以重整旗鼓。公元前525年，他们投靠了波斯人……同样，迦太基人也在希梅尔失利（公元前480年）后得以重新恢复元气。如此种种。总之，任何力量似乎也战胜不了腓尼基那弯曲的身躯。

我们千万不要被无处不在的希腊文化所迷惑，因为地中海毕竟不是一个“希腊湖”。公元前 525 年，埃及被波斯人占领，冈比西斯国王因此终止了希腊人在瑙克拉提斯的贸易。公元前 494 年，希腊的总发动机爱奥尼亚被波斯征服。随后又发生了米堤亚战争（即希波战争），马拉松战役（公元前 490 年），萨拉米纳战役（公元前 480 年）以及雅典令人激奋和骄傲的年代。[①] 与历史学家们反复宣称的恰好相反，最终赢得希波战争的并不是雅典人，雅典于公元前 404 年再度沦陷的真正原因与其说是被伯罗奔尼撒人所战败，倒不如说是被波斯人的金子所攻克。此外，希腊人对其工业大量及无休止的投入不正说明它面临着某种困难的处境和有待于克服的障碍吗？希腊工匠和艺人移居伊特鲁里亚与希腊雇工向近东流亡又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呢？工业的投入诚然为希腊文明向迦太基和迦太基人控制的西班牙的传播造成了不可抵挡之势，但是在经商方面，希腊人的劲敌布匿人无可争辩地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因为除了西班牙的白合金外，他们还获得了非洲的金子。

诸强一直分割着地中海，它既不完整属于任何一股势力也不赋予任何人以特权。我们此时离罗马帝国的统一凯旋尚非常遥远。

① 雅典于公元前 480 年被波斯人占领，第二年希腊人即夺回雅典并重新修筑更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公元前 404 年雅典再度沦陷。——译者注

第七章　希腊奇迹

让我们以下面两个人的一场虚构对话作为本章的开场吧。对“永恒的希腊”的说法这两个人中的一人持肯定态度，另一人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一人相信希腊的永恒，另一人则根本不信。

他们中一人说：“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回到希腊昔日的光辉？”靠得太近瞻仰这种光辉是会晃眼的。再说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事物时都应该与其拉开一定的时空，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昔日的好学生，我也许会被欧里庇得斯或索福克勒斯[①]的一出剧目而感动，但他们对我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所处的是与如今决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与维拉莫维茨[②]的看法一样，我认为“谈谈希腊伟人就足够了，只有在关于希腊的问题上才以希腊的逻辑思维”；或如同海德格尔[③]在绞尽脑汁、费时良久才把巴门尼德[④]的一段诗句翻译出来之后所说的：“对于古希腊词汇的含义，我们更应该让它们自己来道出。”任何想把当今西方与古希腊文明混为一谈的企图都只能是某种吉罗杜[⑤]式的戏剧游戏。古希腊人的严谨就像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没有必要试图强行闯入其中，否则就会碰得个粉身碎骨的。

另一个人对古希腊的爱是无保留的，在沉醉于古希腊之中的同时，他并不感到与现实时代有什么隔阂。因此他反驳说：“任何历史都具有其现实性。”可以如此解释路易·热尔奈这句精彩的论断：古希腊始终是有生命力的，古希腊人是一部分尽管年代轮转但思维却变化不大的基础人类的

---

①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年）均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译者注

② 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1848～1931），德国古典学者和教师。著有多部关于希腊悲剧作家荷马的《伊利亚特》和赫西奥德等的研究专著。——译者注

③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④ 巴门尼德（公元前6～前5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译者注

⑤ 吉罗杜（1882～1944），法国作家。其作品宣扬个人主义，强调“自我分析”，充满了宿命论思想；追求新奇的形式，用荒诞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译者注

代言者。古希腊式思维流传至今，并像那些通过尤利西斯的自我牺牲而重返生命的死魂灵一样得以再生。人们在强大的爱奥尼亚人时代的米利都可以找到它；在苏格拉底[①]提到的雅典中可以找到它；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及随后因阿基米德[②]而大放异彩的叙拉古可以找到它；人们还可以在罗马寻觅到它的踪迹，因为尽管罗马帝国于公元前146年可笑地把希腊降格为其附属省份，征服者们却成为了精神上的被征服者。再往后，希腊式思维将相继成为拜占庭城——第二个罗马——温室中的一朵奇葩，及在罗凌佐·美第奇和皮科[③]时代的佛罗伦萨变成了一朵怒放的鲜花。总而言之，古希腊式思维不断地给自己赋予新的生命。正如路易·热尔奈所说："哲理思维的框架首先形成于希腊，而且像众所周知的那样，那时的主要哲学论点至今仍未发生大的变化。"如果上述归纳仍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以下当今英国某历史学家对此的见解便是再明了不过了："哲学只需沿着爱奥尼亚哲学家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往前走……"

不过，真正把我们与希腊式思维连结起来的是在脑子里固有的学识、理智和自尊。余下的事情靠的是我们的激情和幻想。为什么会存在对"希腊奇迹"的眷恋？对我们西方人来说，它是否出于一切现代文明和人群对选择各自起源和虚构理想祖先的需要呢？看来除此之外，再也不会有别的答案了。

一 "城邦"云集的希腊

我们在此所说的希腊首先是远古（公元前8～前6世纪之间）和古代（公元前5～前4世纪之间）的希腊，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溯的是有关希腊城邦时期的那段特殊历史。这一特殊性自然不排除存在着某些相似的情况，而且首先是相似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享有自治权。因此远古和古代的希腊实际上是被分割成众多小规模的政治单元。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② 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生于叙拉古，古希腊学者。他发现了杠杆定律和阿基米德定律，设计了多种机械和建筑物。罗马进犯叙拉古时，他用机械技术帮助防御。叙拉古陷落时被害。——译者注

③ 罗凌佐·美第奇（1449～1492），佛罗伦萨僭主。皮科（1436～1494），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哲学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译者注

无论在任何地方，只有不存在领土国家——自其出现至今，领土国家从来就像是些永远填不满肚子的饿鬼——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自治的城邦。因此，公元15世纪时，如果不是因国力全面衰败而导致以日耳曼罗马教会帝国和英诺森三世为首的各政治势力落入历史的陷阱，绝不可想象会有自治的意大利城市的诞生之日。我认为希腊城邦也是公元前7世纪在希腊国势衰败的背景下出现的产物，因为城邦诞生于多利安人进犯后的黑暗时期。城邦的兴起导致了锡迈尼政权的倒台，并由此宣告了一个由大领主和权力无上的司书组成的奢侈型国家——一个贪婪国家，就像公元第二个千年中的许多国家一样——的土崩瓦解。

但是这些在暴风雨中诞生的城市身躯尚很脆弱，而且在吃人妖魔的威胁之下显得是那样的束手无策。对于文艺复兴的城邦来说，吃人妖魔即法国的小个子国王查理八世——尽管如此称呼他不太合适，他于1494年9月翻越阿尔卑斯山而远逃他乡。对于希腊城邦而言，吃人妖魔本应是阳光长期高照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该王朝当时疆域辽阔，可却慢慢地萎缩了。后来希腊城邦的妖魔成为了马其顿蛮族。至少后者说的是希腊语。

地理概念

希腊即为城邦——具有国家功能的城市——的组合。也许在一些边远、孤立的地区——如伊庇鲁斯、阿卡迪亚及埃托利亚——或靠希腊北部的落后区域里，市民生活仍长期处于无序状态。但总的来说，凡是有希腊人居住的地方，城市就会表现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的狭隘、随意性及不可替代的管理模式。将好端端的整体国家分解为众多政治单元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对于希腊人来说，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

希腊国土的块状分布，平原面积的狭小（不足总面积的20%），以及这些天然块状国土数量之多事先就给各种小板块政治单元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奥布雷·戴·塞林库尔（《希罗多德的世界》——1966年版——的作者）的眼里，古希腊其实是个岛屿之国，在这些岛屿中当然既有四面环海的真正岛屿，也有人为划分的“陆地岛屿”。每一个希腊城邦都拥有自己狭窄的圈地，圈地里有若干片农田，有两三块养马的草地，有葡萄园，有小橄榄树丛，有几座放牧山羊或绵羊的秃岭，有一片凹凸不平的海岸，有一个围在城墙中的港口城市——当然这一切本身又被孤立于毗邻国家及海洋之中。因此，希腊是个岛屿之国……

由于希腊城邦的地域狭小，往往一个变故就足以给其原有的平衡带来冲击。如开采一个金矿或银矿就能使远海的锡弗诺斯岛一夜间繁荣起来；一个生产高质量大理石的大型采石场——其蕴藏量大得让人觉得怎么开采也减少不了大理石场的面积——使帕罗斯富有起来；几艘经常出没于哈尔基斯、埃雷特里亚、迈加拉和埃因的轮船使这些岛屿变得远近闻名和令人垂涎；雅典对外出口陶瓷器皿和食油标志着该城邦在庇西特拉图[①]——他被称为“雅典最精明的政治家”和“最倾向于共和派的僭主”，总之是某种意义上的开明独裁者的先驱——时代的第一次飞速发展。

一切事情都是相对而言的。古希腊当然也有若干个幅员庞大的城邦。如斯巴达（面积达 8400 平方公里）就是首屈一指的大型邦国，而且这还不包括被它征服的油橄榄生产国拉科尼亚和邻国美塞尼亚。用武力强制占领的美塞尼亚是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因为在斯巴达殖民者的残酷剥削下，那儿随时都有爆发起义的可能。当时斯巴达有别于希腊其他邦国的最突出特点——当然不是惟一的特点，就是它面对广阔的领地面茫然不知所措。当然也别太夸张了，因为斯巴达那时的面积还不如当今法国的两个中等省份大，再说它有相当的面积是无法开垦利用的山地且冬季总被大雪覆盖。雅典是又一个“巨型”城邦，它的幅员不超过 2400 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卢森堡大公国的面积。雅典所属的阿提喀由四个平原组成，它们的面积均不大。每个雅典人都有可能多次从埃莱夫西斯出发到马拉松，或从北边靠埃夫里普海峡的奥罗珀斯（Oropos）一直走到苏尼翁角——即阿提喀的最南端。此地海岸边上有一座波塞冬神庙，据我们所知柏拉图[②]很喜欢在那儿对他的学生们发表高论。当苏格拉底在菲顿[③]的陪同下沿伊利索斯（Illissos）河（夏天河里只剩下一条细流，他们于是脱掉草鞋，光脚淌着浅浅的河水乘凉）逆流而上时，他们有可能因交谈的投机而未注意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过了雅典平原，正在绕过伊米托斯山朝梅索吉亚平原（Mésogée）走去。当雅典西端的普尼克斯（Pnyx）山顶上升起通知召开人民议会的黑烟时，城邦农民便拄起手杖，徒步走向邻近的雅典城去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由此可见城邦内各条通往雅典的路径都不很长。

---

① 庇西特拉图（公元前 600～前 528 年），古雅典僭主。——译者注
② 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③ 菲顿（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译者注

希腊城邦的规模通常都是这样地人性化，即其面积均在步行可覆盖的范围。它们的居民人数大多在5000人以下。当然，如果附近再有一些稳定、富足和不惹是生非的乡村的话，它们便有可能过上幸福和平安的日子了。斯巴达正是在这种优越条件下一再扩展。底比斯城则要等到伊巴密浓达和派洛皮德[①]的出现——尽管它拥有强健的骑兵和重武装步兵——才迎来了它短暂的辉煌时代，而它迟迟未向外扩张的原因正是由于其科帕伊斯湖（Copaïs）周边的彼俄提亚平原过于肥沃了。由于处处顺心如意，生活在彼俄提亚乡野的人们便总是满足于充当希腊的变革的观望者和局外人。这就是东方时尚很晚才出现在底比斯及古老的几何造型风格在那儿长时间延续的原因所在。总之，底比斯孕育着某种与前阿提喀的双耳尖底瓮和双耳爵所表现的文化格格不入的乡土气息。事实上，只是那些先天条件不足的城邦才把眼光转向外界并随时准备走出家门。将来某一天，它们甚至不得不漂洋过海，像威尼斯一样长年以海为伴，和与自己作对的人争长论短，甚至不惜远足至世界的尽头……不幸（或有幸）的是，类似不安现状的希腊城市并不在少数。

造就城市的经济因素

在人们的想象中，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希腊大概相似于古色雷斯或古伊庇鲁斯之类的粗野国家。也就是说那儿有与世隔绝的村落，有延续部落生活方式的群体，还有把土地、人及生杀大权掌握在手中，并且往往还享受宗教特权的领主。那时的希腊有点儿像保萨尼阿斯时代的阿卡迪亚，即犹如一座真正的古迹博物馆；或像尤利西斯故事中的伊萨基岛，那岛上有农民出身的国王，有一些爱虚张声势、但同样出身于农民的领主，还有默不作声地面对着领主的村民。那时自然还没有城市。因为自迈锡尼统治遭受灭顶之灾后，旧的城市上层建筑也已经随之消亡，几乎没有例外。

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及具备许多有利条件，城市才能像枯草发芽一样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逐渐从乡村和领主的躯壳间破土而出。实际上，真正导致城市诞生的是一场持续长久，产生原因及发展过程都错综复杂的经

①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10－前362年），底比斯政治家、军事战术家和领袖。他在打破斯巴达的军事优势和永久地改变希腊各城邦间的力量均势方面起过重要作用。派洛皮德（公元前？－前364年），底比斯的政治家和将军，曾使底比斯一度称霸希腊。——译者注

济、社会、精神和信仰危机。希腊城邦是一种特别的城市类型，它在亚洲的希腊殖民地发展得似乎比较快，然后才向希腊本土及其他殖民地扩展。鉴于希腊疆域辽阔，发展条件明显参差不齐——大希腊圈的范围虽然要大得多，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希腊，进一步说明它的地理概念，并附之以随和的定义，显然只能对了解希腊城市的形成起着有限的作用。同样，看上去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也只能从某个侧面——当然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说明奇怪的古希腊城市现象。

古希腊首先面临的是人口的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的是要扩大耕地面积，同时要使刚刚在协调及合并村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有能力容纳那些在乡村失去立足之地的人群及养活所有未到海外铤而走险的人口。此外劳动分工产生了工匠这一行当。公元前 8 世纪之后，由于炼铁业的发展，各种产业也纷纷在最贫困城区的边缘落了户。总而言之，殖民加快了希腊的全面发展，商业创造了各种奇迹——或者至少创造了许多新机遇。

将小麦从海外运抵希腊大陆各港口也许是当时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这些小麦有的产自大希腊圈殖民地和西西里岛，人们将其运到科林斯港然后再陆续分配往希腊内地；也有产自好客海地区，经米利都商人跨海贩运往雅典经销的。更早一些时候还有来自埃及的小麦。这些外国的廉价小麦带来了一场意义明确的革命。之所以说是一场革命，是因为进口小麦缩小了被当今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一产业的开发——当然这方面的开发从来都是无利可图的。由于有“大肚子商船”把小麦直接运抵泽阿（Zea）码头（即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口的一个专门用于粮食交易的停泊场），雅典人自从庇西特拉图时代起就开始在阿提喀平原上改种更为合算的葡萄和油橄榄，并同时发展各种产业——其过程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提及的。公元 13 世纪，荷兰正是因为大量消费来自波罗的海的小麦和黑麦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小麦贩运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改变了希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正如路易·热尔奈所说，连当时的“封建”领主也摇身变成了关心海外市场行情的绅士农场主。

书写文字和货币是促进当时社会变革的另外两个重要“加速器”。

希腊人采用拼写字母的举措把已经被遗忘的文字重新引入到了生活中。这种人人都可以学会的文字不再只是发号施令的工具，而是一种交流的促进器，一种发布产品信息和摆脱神圣化束缚的手段。文字带来的变化

是天翻地覆的，因为它把原来神秘的法则变成了尽人皆知的东西。文学也从此开始在生活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货币出现以前，人们就感觉到了对它的需要。因为历史上曾有过多种“原始货币”。如在《伊里亚特》[①]（第6章236行）中，狄俄墨得斯[②]的盔甲值100头牛；一个“能胜任各种劳作的女人”可顶4头牛（第23章705行）……金锭曾作为货币使用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烤肉用的长铁扦（obeloi）似乎也曾派以同样用途，至于与牛皮的色泽相似的铜片是否曾作为原始货币，我们就没有太大把握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货币（天然金银合金铸成的币块）是于公元前685年左右首次出现在吕底亚，这个克雷泽人富裕的王国；到了公元前625年左右（这个日期尚待商榷），埃因铸造了希腊最早的货币，随之爱琴海和腓尼基的所有城市也开始效仿铸造货币。公元前592年，据说雅典执政官梭伦曾把与埃因本金作为兑换货币的雅典德拉克马贬值了33%。如果这一说法的确成立的话，那么操纵银根的行为早在货币产生之时——或再稍晚些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据专家们称，真正的货币经济只是到公元前4世纪前及希腊化时代的辉煌阶段才产生。因此在公元前8世纪或7世纪时，货币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

然而，此时整个爱琴海地区已经变得相当热闹。曾经与东方世界隔绝的希腊重新与叙利亚海岸城市——尤其是阿尔—米纳——恢复了往来。来自这些国家的奢侈制品使一直保持着朴素风尚的希腊顿时大开眼界。希腊于是从腓尼基等其他地区进口了一整套“时尚”，其中不仅有普通物品，有象牙制品，有青铜制品，还有彩陶制品等。这些新颖的装饰品打破了几何风格的呆板。同时由希腊运抵爱琴海彼岸的有希腊新款服装，有希腊的早期科学知识，有迷信说教，也许还有雏形期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在爱琴海的周围，到处都是崛起的希腊城邦。它们既独立又相互敌对，但在本质上却是非常相似的。

城市与城邦

希腊城邦非常奇特，它们不同于中世纪崛起的西方城邦。中世纪的城邦与国家分离；它们各自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在城墙里住着一些可以享受

① 《伊里亚特》是关于特洛伊战争的一部史诗。传统认为它出自荷马之手。——译者注

② 狄俄墨得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战争80艘战船的统帅和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译者注

特殊政治和经济待遇的公民。与此相反，希腊城邦"虽然与某个城市唇齿相依……但却又不能与城市混为一谈"。所有生活在城市周边领土——其范围比城市本身要大——上的居民均属"城邦居民"。城市只是城邦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城市给全体居民提供了经商的场所（agora），发生战争时它是一座避难的城堡，另外它还供奉着保护城邦的神庙。从政治角度上看，城邦是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体。就连科林斯，这个通往地峡之路的卫士，这个商业和工业城市，也像"希腊其他城邦一样……拥有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经济。因为居民享有土地的份额是城邦公民定义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了土地就难以想象会有城邦存在的可能"（E. 维勒）。

在伯罗奔尼撒残酷战争初期（此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每当春天银莲花初放时，斯巴达人就密密麻麻地通过埃莱夫西斯山口，涌入并占领阿提喀的大片土地。伯里克利[1]在其作战部署中认为，在斯巴达人如此频繁入侵的情况下要保卫阿提喀领土是不可能的。于是农民们便提前放弃了他们的房屋和耕地，让入侵者去占领那片空无一人的国土。由于无事可做，撤退到雅典城里的难民便爬到裴拉吉康（Pēlargicon）城墙上遥望在远处调兵遣将的敌军。城墙一直延伸到海边的比雷埃夫斯港，圈在围墙里的雅典城就像是一座安全的海岛；在这个特别时期，全体城邦居民都聚集在雅典城里，从而形成了城邦和城市暂时的功能混淆。

贵族阶层的解体

希腊城邦的两重性——乡村和城市的组合——可帮助人们弄清城邦形成的大致轮廓。它形成的初期是在多利安人入侵之后。那时雅典人重新过起了农民的生活。过去他们也曾经是农民，但那段经历给他们留下的记忆大多是宗教庆典。因为冬季是大自然和人类的休闲时期，所以节日一个接一个；庆典期间有盛宴，有舞会，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游行，有欢乐的火把聚会，有宗教祭祀等一系列祭奠土地的古老仪式。在多利安人占领之后或更早些时候，施行家长或部落式统治的氏族政体充其量也只能容忍这样的农民生活。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小型的原始群体，它自耕自食，生性好斗，

[1]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古雅典政治家。曾主张扩大雅典海上势力和提高平民阶层的权力。公元前444年后任首席将军，成为雅典国历时15年的实际统治者。——译者注。

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在这种没有正式法规的社会里，族间仇杀和以命偿命就像荣誉的准则一样十分时髦。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奢望，自己的传说以及为自己和祖先的功勋感到骄傲的首领。他们都是英雄的后代，也就是说至少算得上个半仙之体。总之，这一动人的神话更加印证了当地部族之渊源久远。

在古希腊历史早期，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其组成人数相对较多，如阿提喀有“富翁”、“精英”、“出身高贵者”和元老等）因其扮演的圣职角色，其丰厚的产业和其众多的牛羊而享有很高的威望。围绕在贵族阶层周围的是不计其数的受保护人、包工工人和处在半奴隶境况中的村民。部族的族长有可能会联合其他部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集若干地区为一整体的大氏族。于是，当不断增长的贸易需要得到国家机器的规范时，贵族们便成为了国家早期机构的核心。他们随之便成为城市的第一批进驻者，当然城市也很快地就变成了他们控制乡村的理想阵地。从城里，他们可以监视并不遥远的土地和农民。

通常新成立的城邦均有个国王，可是雅典的王权（basileia）却在其成立不久后被独立大业主们——人称“小国王”——所解除。不正是他们登着战车保卫了城邦？不也正是他们在使自己的利益得到认可的同时，抽空料理了城邦的公众事物？不还是他们掌握着一切圣职的权力？余下的居民和市民（démos）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王权的迅速肢解很有利于贵族们。雅典国王的权力最终由9名行政官或执政官所瓜分。他们分别是负责主持祭奠的国王执政官，名年执政官（即以其名为年号的首席行政官），负责领兵打仗的军司令官，以及6名负责审判的立法官。这个由贵族组成的政府最后建立了一个常设的重要机构，这就是原法官们坐台主持的刑事法庭。

像任何朝代一样，统治必然会激起不满。首先是来自农民的不满，因为贵族对土地的所有权使他们渐渐地沦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奴隶。也有来自城邦新成员的不满。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新成员的队伍不断扩大。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发家不久的中产阶级（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另一部分是城市无产阶级——其中包括雇工、贫苦的工匠、外国侨民及奴隶。各种各样的人都汇集在了城邦里。他们即使没有亲身参与雅典发生的一场货真价实的阶级斗争，至少也亲身经历了那儿一系列社会的紧张和不安。经过一段停滞后，这种危机在整个希腊又一次掀起了强力反弹。当然，政

治权力的肢解并不能阻止强有力的文化统一运动在希腊兴起。

在希腊城邦里不断地发生的冲突中，最可怕的要数全体市民与贵族阶层之间的对峙。确实，刚刚诞生的城邦只有在解放农民和打破“精英”们在宗教、司法及政治上的特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站稳脚跟。这当然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需要在宗教领域做出许多让步。因为城邦不仅仅是一个新型的政治或地理的政府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和偶像的集合体，一个反映集体意愿、而不是受部族秘密和专断的影响制约的宗教社团。部族当然没有像埃莱夫西斯在晚些时候所发生的著名事件一样，在短时间内突然消亡。在雅典这个人们眼里最革命的城市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但在此我们仅以艾特布塔德斯家族（Eteoboutades）为例：它保留了派送雅典娜保护神女祭司和波塞冬、厄瑞克透斯[①]祭司的优先权。于是，尽管城邦经历了种种变迁，贵族家庭的史迹和威望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雅典正是靠这种元老们的领主文明养育了自己，并且从中汲取了显而易见的自豪感。“希腊人的伦理观其实是一种贵族的伦理观”（路易·热尔奈）。某种带有波兰贵族共和国色彩的东西提前出现在了雅典。

惶惑不安的时代

毋庸置疑，将大量城邦居民的问题列入其议事日程是政府推行的一场重大革命。这是一场在紧张、不安的环境中，但也是在激情中推进的革命。

这种激情即某种对城邦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萌芽。城邦拥有自己一片幅员有限、但可以接受的领土，一幢共同享用的聚会大厅，一个自己的广场，除此之外它还颁布了一条家喻户晓的法律及一再主张公民的相互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城邦自然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朱利安·邦达[②]喜欢讲述法国人一心一意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的故事。那么又有谁来给我们讲述一个希腊人立志要建立适宜于人类生存的有限政治社会的故事呢？希腊人对自己那片面积窄小的邦国的酷爱几乎到了病态、超越理智的地步。在表达这方面的感受时，希腊人使用的常常是一些类似于爱欲（himeros）的语言。如：只要伯里克利一声召唤，所有“心爱的萨拉米纳”

① 波塞冬为希腊宗教中的海神，厄瑞克透斯为传说中的雅典王。——译者注

② 邦达（1867～1956），法国小说家、哲学家和评论界反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译者注

和"紫罗兰环绕"的雅典的"恋人们"都会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来保卫它。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祖国的热爱曾达到此种压倒一切和非爱即仇的极限。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一样，希腊城邦也有被放逐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放逐出教会的人！而一旦背负上流亡者的身份，则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无恶不作，如背叛、凶杀、说谎，乃至为波斯人效力——多么令人恶心的行径！

希腊城邦的动荡其实不仅仅限于政治层面。狄俄尼索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崇拜之风的强烈反弹像中世纪鞭笞派教徒之瘟疫一样首先席卷了乡村，既而吞没了所有的城市。另外让希腊城邦居民痛苦的是对集体负罪感和渎圣罪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全城蔓延，以至于一个人的罪过很快地演变成为众人的精神负担。阿尔克迈翁家族的成员——这个与克利斯梯尼[①]和伯里克利有非同一般关系的雅典贵族家族——曾因参与杀害躲藏在卫城祭坛附近的篡权者基伦[②]的同谋人而被三次放逐。一直到公元前大约590年时，一位名叫埃庇米尼得斯的克里特岛人来到雅典后，这个城市才算恢复了往昔的宁静。埃庇米尼得斯以涤罪预言家的身份出现，自称具有安抚诸神的本领。为洗涤雅典市民的罪孽，他宰杀了数头白色和黑色的母羊，据说一起殉葬的还有"两名自愿为此献身的人"。因为生了病就需要求助于医生、魔术师、预言家，以及作为社会仲裁人的僭主和贤人（例如来库古[③]、梭伦和克利斯梯尼），要不然就得求助于那些利用民众幼稚的江湖骗子。来自阿格里真托城的恩培多克勒就属于这后一类人。这位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90年的哲人公然"宣称自己为神，而且还穿红戴花在人们面前"施展各种巫术，召唤亡灵复活……据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庇西特拉图有可能曾利用一场诡诈的表演而二度获得雅典的统治权。某一天，他由一辆二轮马车引路走在街道上，车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出众，全身戎装的女人：她就是雅典娜本人。奇怪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了这个奇迹。

这段时期——有人称之为前苏格拉底时期——也是哲人辈出的时代。

① 克利斯梯尔（公元前6世纪），雅典政治家，约于公元前508～前507年间执政。——译者注

② 基伦（公元前7世纪），雅典贵族。约于前630年结伙占据雅典卫城，企图夺取政权，失败后逃亡。——译者注

③ 来库古（约公元前8世纪），古斯巴达传说中的立法者。——译者注

“贤人”时代产生于鲜为人知的英雄时代之后。古希腊共有7大贤人，传统认为他们分别是米利都的泰勒斯，雅典的梭伦，科林斯的僭主佩里安德，林都斯的克利奥布拉斯，普里恩奈的拜阿斯，密提利那的庇达卡斯及斯巴达号称为“拉西第梦（即斯巴达）智慧的代表”的开伦。但在此7人之外，还有许多人物也载人了贤人的名册里。据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的统计，古希腊大大小小的贤人共有22名。他们中有一人叫谢内底迈森，因为知道他的人很少，所以他也被称为“无名贤士”（huomo qualunque），因其正直和谦虚而被列人名册之中。有关历史记载无疑非常模糊，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物的确曾存在过，只不过后来以民间格言智慧代言人的方式融化在了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传奇之中。类似的格言有：你是否了解自己——世上无多余之物——为他人担保即意味着自己的破产——管你应该管的事情……总而言之，在那惶惑不安的时代，这些格言对那些忧心忡忡的人们无疑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持。

重武装步兵与桨手

希腊远古时代的战争，即由雅典元老骑着战马或登着战车指挥的战争。重武装步兵大约是于公元前7世纪投入战争的。重武装步兵们身上穿着铜质护胸甲，左手举着盾牌，头上戴着头盔，腿上裹着护胫铠甲（也叫胫甲），右手擎着剑尖长矛。他们与战友肩并肩地排成密不透风的方阵向敌人挺进。这种方阵通常由若干排手挽手的士兵组成，他们手中的盾牌一个紧挨着一个，就像有护身甲壳动物身上的层层鳞片。队伍前进时必须步伐整齐。在锡吉容器（Chigi，大约生产于公元前640年）上，人们可以看见在重武装步兵队列的一旁，有一个吹双管笛的乐手：他用音乐的节拍使整个方阵踩着统一的步点向前迈进。这种步调一致的队列是通过在体育学校的操场上训练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走在第一排的步兵来说，不再倡导在特殊战斗中所应具备的个人英雄精神，而是强调技术和沉着。那时的战争是某种含有规则要求——甚至含有游戏性质——的竞赛，因为对峙双方有时竟一致同意选择某个封闭的场地进行决斗。哈尔基斯人和埃雷特里亚人当时就是这样在埃维亚岛交战。而且似乎自从埃维亚岛之战后（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重武装步兵的战术便为希腊各城邦所效仿。在斯巴达，年轻的士兵被分为两方在埃夫罗塔河的某个岛屿上进行方阵演练，其结果是由赢方将输方推进了河水里。

在经历了以骑兵为主的领主战争后，重武装步兵的出现显然是一次革命性的创举，无论在希腊还是在公元前 6 世纪的中国均是如此。甚至到了公元 15 世纪勇敢者查理[①]时代的瑞士州战场上也不例外。重武装步兵从城郊的农民中招募，一旦放下武器后他们就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城邦居民。重武装步兵还引发了一次社会和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其形态和方式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变化而已（如在斯巴达，重武装步兵成为了平等派系的职业军队)。在希腊各地，军队顺理成章地以各种理由渗透到政治社会之中，而且还向其强加自己的各种要求。如雅典的农民——即小块地产（klēros）的所有者——就要求城邦尊重他们的权利，要求城邦保护他们，解除因拖欠大地主的债务而造成的从属关系。在着手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的过程中，雅典国政府出台了一些新的管理法规。梭伦的最大成就就在于他制定了解负令（Seisachteia），该法令的颁布使农民摆脱了债务负担。

于是便产生了城邦士兵。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曾对希腊和波斯士兵的心态做过比较：一方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另一方则在皮鞭的督促下走向战场。可是希腊的农民士兵把自己乡下人的偏见也带到了诸如雅典这样的城市里。在这些农民眼里，只有种地（当然也包括因土地丰产和冬季休耕带来的无所事事）才是无愧于男人的工作。对其他职业他们都不屑一顾：工匠、矿工、商贩及水手等均是下等人。然而，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崛起，许多外国人、奴隶及没有土地的农民便承担起了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口大量需求的低贱劳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因此发了财，余下的终身贫困者就是梭伦划分的第四等人：雇工。但是，就连这些人也未能成为战争的局外人，他们于公元前 5 世纪也最终获得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如列席人民议会)。

当在第二次希腊—米提亚战争（即波希战争——译者）爆发的前夕，雅典城邦已发展成为了一个海上强国，此时雇工的重要性就显现了出来。当时靠新发现的拉夫卫翁矿场开采的白合金，雅典建造了 200 艘三层划桨战船。这些战船冬季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坎塔罗斯（Cantharos）军用码头，但每年开春就得招募一大批桨手来开动它们。三层划桨战船的船头呈一个尖角，一般在海战中只用作抛射体撞向敌船的船舷。“像帆船一样，这种战船有许多缺陷。比如它不能抢风航行，只能沿侧顺风航向前进。它

① 勇敢者查理（1433－1477），法国勃艮第公爵，曾参加反对法国路易十一国王的战争联盟，并收复了一些城市和领土，但最终被路易十一国王支持的瑞士军队所打败。——译者注

的船帆只作为辅助力量使用，在战场上一般只有在溃逃时才把船帆扬起"。三层划桨战船只有靠强大的人力发动机的驱动才能用作战争工具。

在白天，该战船的桨手们只能挤在船舱里，只有当人夜船停泊在岸边时他们才能回到陆地上躺下睡觉。当这种战船的桨手是一项非常苦的差事，以至于在若干世纪后它慢慢地成为了苦役犯人的专职。然而到了公元16世纪的安德列·多里亚①和奥地利唐璜②时代，因为贫困潦倒的人数非常之多，所以出现了许多自愿充当船役桨手者（意大利语称之为buonavoglie）。到了伯里克利执政时期，干此差事倒不是全然出于贫困，而是因为希腊桨手们不仅享有自由，而且还能得到报酬。后来伯罗奔尼撒人之所以能战胜雅典船队，是因为波斯人以重金供养了他们的海军。其实靠分得的战利品及海上抢劫的赃物——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较大，桨手们也有发财的机会。然后他们靠这种收人购置土地和奴隶，并以此为基础去享受在雅典生存的自尊。

总之，把农民和雇工——某种程度上的贱民——引人了政治生活之中的分别是方阵和船桨。雅典之所以做出此种让步，也许是因为穷人参政的趋势已不可阻挡。然而，科林斯却反对这种大众参政的革新，它对其内部矛盾的激化采取的是另一种解决办法。鉴于它与斯巴达保持着的良好的关系，科林斯等于在自己的门前安置了一名宪兵。只要发出一个警报或一个手势，宪兵就会出现在眼前。而雅典选择的则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与奴隶制

在此有必要对民主政治这个词的古代含义做些解释。梭伦和克利斯梯尼分别于公元前595年及前509年进行的政治改革限制了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而把雅典人民议会——即设立在普努斯山上的城邦居民议会——的权力摆在了首位。在雅典陪审法庭，城邦居民也有权作为诉讼案件的审判官。除了真正掌握军权的古雅典十将军会的成员必然当选外，其余法官均以抓阄儿方式确定。总之，凡履行法官职责、列席人民议会会议（从公元前4世纪起）及在法院或露天剧场占有席位的城邦居民均能领到相应的

① 安德列·多里亚（1466~1560），热那亚政治家，雇佣军首领，当时最杰出的海军将领。——译者注

② 奥地利唐璜（1545~1578），西班牙君王。曾率领基督教船队征战格拉纳达、荷兰等海域。——译者注

津贴。这就是当时的“工资”制度。可以说，所有享受公民权的城邦居民都是政府官员，而且在理论上均享有无限的权力。

但是，凡事总是会有个“度”。如雅典人民议会对每项决议必须向500人议会（Boulè）咨询，这个议会中有50个常设席位，它们每隔35天进行一次轮换。在这个议会里，大家族的威望有相当大的影响：伯里克利的祖先就是阿尔克迈翁家族的人。一直到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的民主政治才有了自己真正的领袖，克里昂[①]就是民主派首领的第一人。

可是在那个时代，“民主政治”也有其缺陷。理论上，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幻的，所有城邦居民均可以享受最起码的平等。但是只有阿提喀的一部分居民才有资格成为享受公民权的城邦居民（在公元前431年左右，在31.5万名雅典居民中，只有17.2万人——除去家庭成员，实际上是4万人——享有此权利）。可以说，民主政治其实是本地居民控制大批外来人（居住在雅典的外国侨民）和奴隶的特权。在随后到来的若干个世纪里，非雅典本地人口的数量就越来越庞大了。除此之外，雅典还依仗其势力肆无忌惮地压榨爱琴海沿岸和提洛同盟[②]的盟国。如它把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沦为了自己的从属国，另一部分则成了自己的进贡国。雅典还开发远端市场，如通过对陶瓷、布匹、食油等产品的出口换回它生活所必需的小麦。

总之，雅典确实曾经利用自己的强大来欺压盟国。以上事实足以推翻博尔赫斯[③]有关“雅典曾经是天堂之雏形”的说法。人间天堂——哪怕是雏形——从来就没有向平民大众开放过。

城邦，政府的框架

城邦的环境影响着其居民的生活，制约着他们的思想、行为及艺术的发展。这种“按模复制”的作用甚至也波及到了哲学和宗教领域。比如城邦的自然范围及其起源和平衡都是哲人们根据城邦政权的需要和它的特殊

① 克里昂（公元前？～前422年），古雅典统帅，民主派首领。公元前425年曾率舰队往南希腊打败斯巴达军队。公元前422年任将军，同年在与斯巴达军的激战中阵亡。——译者注

② 提洛同盟，即以雅典为首的古希腊部分城邦于公元前478年结成的同盟，其宗旨是共同反对波斯的侵略。因同盟会址设在爱琴海上的提洛岛，故名。——译者注

③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曾在日内瓦文学院获学士学位。其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译者注

指令而设计出来的。

随着那些像昔日的祭司—国王一样神圣不可冒犯，而且把自己与某种高深莫测和超自然的势力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族的日渐衰落，城邦的管理者们便取而代之成为了尽人皆知的崇拜对象。像多利安统治者当年强制施行的火葬制度一举涤荡希腊人对其先人们的崇拜一样，原有的神圣以及它所涵盖的秘密此时已经被一古脑儿抛至社会的边缘。自从以广场为中心（而不是像原来一样以圣都卫城为中心）的雅典城邦成立之后，宗教信仰就变成了一件有些不合体的肥大外衣。城邦不再像埃及和巴比伦一样拥有自己的神职人员，任何一名希腊人都可以临时充当祭司之职，而且这种机会往往非止一次。这种状况给了城邦的执政者们的施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举行各种节庆活动，或像疏导行人过马路一样把一些看上去水火不相容的宗教信仰从形式上拼凑在一起。于是便有了以膜拜雅典娜为内容的，从埃莱夫西斯沿着战车车辙形成的圣道一直走向雅典卫城帕台农神庙的雅典娜女神节的游行仪式。通过这种纪念宙斯的女儿——城市的保护之神——的活动，埃莱夫西斯人的神秘崇拜便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独立性，从此变成了全体希腊人共享的信仰。酒神节则成为融合宗教信仰和城邦生活的戏剧表演的场合，它还起着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的作用。埃斯库勒斯[①]、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也正是在这一时代把一些荷马风格的著名戏剧形象搬上了舞台，奉献了一幕幕为民众所喜闻乐见——这是演出成功的先决条件——的剧目。

然而，在这种环境下，有些敏感的人们也不免会试图在那些明显用于聚拢人心的信仰及其俗套的仪式之外寻找某种更为真诚的信仰生活。于是，某些带有净礼仪式、许诺拯救生灵及宣扬灵魂再生和永生的神秘信仰便施展起了它们那强烈的诱惑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毕达哥拉斯当时的叛逆做法也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大约于公元前525年左右，毕达哥拉斯逃亡到了意大利的克罗托内（在那个还没有文字时代里，这是一个类似于当今日内瓦的中立城市），并使正义者的信念逐渐盛行于当地。对他来说世上最重要的不是城邦的昌盛，而是心灵的净化。他为达此目的而推行的某些做法很快就引起了公愤：毕达哥拉斯教派的信徒们实行禁欲和禁食，以及开始模仿崇拜俄耳普斯的神秘教理和仪式。这些做法受到了雅典

① 像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样，埃斯库勒斯（Eschyle，公元前525～前456年）也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译者注

城邦民众的一致谴责，人们将其与背叛公民道德、擅离职守及那些诸如当今因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逃脱兵役相似的行为——尽管此比喻有些夸张——相提并论。在如此背景下，还有谁会相信毕达哥拉斯教派在公元前6世纪所从事的、尚未显示出其实用意义的“科学”及有关金子储藏数量和数学关系的探索呢？晚些时候，在遭受公元前404年希波战争失败的雅典，苏格拉底也曾被自己的祖国指责为作恶多端的罪人。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如此不公平待遇，很可能是因为他曾是反对民主政治的亚西比德和克里蒂亚斯[①]的朋友？或是因为他继承了崇拜俄耳普斯和毕达哥拉斯神秘教派的思想？再要不然就是因为他是个人完美主义——这一点也许能说明“苏格拉底的真正秘密”——的支持者（而这种做法本身恰恰构成了对城邦集体参政形式的犯罪）？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希腊艺术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尽管它曾因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而令世人瞩目——由于摆脱了模仿异国艺术的框框和为有钱人服务的制约，它曾被称誉为不受束缚的艺术形式，古希腊艺术最终还是成了为国家机器效力的工具。伯里克利统治的时代是一个政府行为的时代，因为雅典的所有工地、雕塑家、石匠和工头们都在为雅典娜而忙碌。当然后来谁也不会抱怨由此给雅典留下的帕台农神庙。但是大凡受政府支配的艺术都是已遭受内伤的艺术：它随时准备要受到框框和规则的约束，从而永远失去自由之身；它很快将成为重蹈覆辙和乏味的复制品。根据古典主义艺术和浪漫主义艺术互为交替的规律，古希腊艺术注定将在古希腊艺术的巴罗克风格中，以及在其特有的矫揉造作和可悲的华而不实中销声匿迹。

是必然的结果？还是伯里克利的责任？

是希波战争（公元前499年爆发了爱奥尼亚的起义，一直到公元前450年才恢复和平）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决定了古希腊的命运。这两次战争其实可以沿着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和布拉底人组成的重武装步兵本应在马拉松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公元前480年萨拉米纳岛与大陆之间的海战中希腊船队本不应取得胜利，公元前415年雅典人本来可以不心血来潮地向西西里岛发起那场荒

①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前404年），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克里蒂亚斯（公元前450～前404年），苏格拉底的弟子，古希腊著名作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唐的远征。我们甚至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设想雅典邦国最终打败了叙拉古。但历史如果总是按人们的主观意志向前发展，希腊的前途不就提前确定下来了吗？

可事实上在那众所周知的疯狂年代里，希腊却被遗憾地切分成了众多独立的城市。而且这些城市疯狂的行为正是导致它们最终灭亡的原因所在。如此各据一方的邦国又怎么可能会长期保持互敬互让及和平共处呢？这也是奥布雷·戴·塞林库尔在一部生动和有说服力的论著的结尾提出的看法。这样要求这些城邦是否也太苛求它们了？以奥布雷·戴·塞林库尔的观点，这段历史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希腊城邦之间的相互厮杀：如克罗托内摧毁了锡巴里斯，雅典降伏了埃因和迈加拉。更有甚者，在与爱琴海沿岸的诸独立邦国签订了盟约之后，雅典竟于公元前454年把盟国的珍宝运回了自己的领土——此前这些珍宝一直存放在提洛岛（阿波罗圣殿所在地）上。尽管雅典此前就已经开始盛气凌人，但对雅典幻想的彻底破灭还是发生在公元前454年其霸道行径之后，因为此后盟国（summachoi）便沦为了它的附属国（upèkoi）。这的确是雅典的背信弃义之举。

根据以上确凿的史实，我们有理由指责伯里克利犯了决策上的错误吗？因为他漫长的政治生涯正是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公元前429年他去世的时候才告结束。诚然，奥林匹斯之神当初既未发明广义上的帝国主义，也未缔造雅典帝国主义。在伯里克利之前建造了雅典进攻型海军的地米斯托克利[①]无疑也应承担重大的责任。然而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却往往是那些更有名望的被告人。因此，所有史书上记载的关于伯里克利的长处——譬如他的才智，他的超凡脱俗，他的高雅和口才，他出类拔萃的朋友圈及他罕见的廉洁等，都只能作为把他推向这起迟到诉讼的追加理由。不可否认的是伯里克利曾有过谋取雅典霸权的企图。按他的好友安那克萨哥拉[②]的说法，既然驾驭天下靠的是智者——即伯里克利及其同僚们，那么雅典就应该成为驾驭希腊城邦这个不完善群体的智者。要想实现这一理想，不发动针对固守蒙昧政策的斯巴达、针对盛气凌人的科林斯及针对怨声载道

①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524～前460年），古希腊政治家和海军战略家，雅典海上强权的缔造者。——译者注

② 安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前428年），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因创立宇宙论并发现日、月食的真正原因而闻名。——译者注

的盟邦的战争显然是不可能的。伯里克利事先预计到了这场战争的必然性并亲眼目睹了它的到来。这是一场放弃土地而争夺海洋的战争。确实，这场预谋在先的战争既没能最终拯救希腊，当然也谈不上胜利。但这难道就足以成为人们指控其策划者的理由吗?

为了不使这场辩论没完没了地拖延下去，让我们来听听由法庭指定的两位史学家兼律师是怎么说的吧。勒内·格鲁塞——他当然不是一个富基埃—坦维尔[1]似的人物——认为，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与亲雅典的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2]达成默契从而维持希腊的和平，但他却与此惟一的机会失之交臂，果断地选择了决裂。阿尔弗雷德·韦伯（1935）——他过于拘泥于某种德国的历史文献中——则认为，伯里克利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绝顶高明的判断：只要拥有了海上优势，就等于掌握了胜利的主动权。可遗憾的是雅典人民并未理解其宏伟的策略!

我们的观点也许会令这两位律师大失所望。与普通人一样，伟人也终将要被命运所席卷，而且一旦成为历史，伟人们的罪名也就随之被洗清。在此前提下还认为伟人们掌握着历史的命运则不成为了幻想？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只要具备一丝诚意和足够的大度，那场肢解希腊的冲突本应能够避免。然而事实上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不足以促成希腊的统一。对伯里克利战争行为的最通行解释是：由于雅典所处的历史背景——伯里克利只是其继承者而不是责任人，它在希腊这块不牢固的棋盘上所占的分量过于偏大；也由于雅典城邦当时占有商品汇集地的天时地利，因为好客海的粮食和咸鱼源源不断地运抵其港口。而这些廉价的食品正是导致形成城区膨胀、工业发展及早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这种资本主义需要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也不免受到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的冲击。

古希腊城邦的悲剧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悲剧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任何一座意大利城市——无论是佛罗伦萨、是威尼斯、是热那亚还是米兰——都未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大业。公元前 404 年，雅典终于向来山得[3]敞开了城门。然而，无论是获得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的斯巴达还是

---

① 富基埃-坦维尔（1746-1795），法国大革命时期律师，在恐怖统治时期任革命法庭检察官。——译者注

② 阿希达穆斯，欧里庞提德世袭的五个斯巴达国王之名。——译者注

③ 来山得（公元前？-前 395 年），古斯巴达统帅，率领斯巴达舰队连败雅典海军。公元前 404 年攻占雅典迫其投降，从而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译者注

伊巴密浓达短暂统治下的底比斯均未能促成希腊的统一。希腊城邦之间的混战最后以柏柏尔人和马其顿人的到来而告终。这一结局在很早以前就注定了。

二　亚历山大大帝的过失

在看到此章的标题时，请大家别想象它将是一篇对这位亚洲征服者的功过是非进行品头论足的博学之谈。在亚历山大“转瞬即逝”的冒险生涯中，东方的惊天动地过多地掩盖了西方的明争暗斗。依我们看，亚历山大大帝的过失就在于他过低地估计了西方的能量。他只顾一古脑儿地奔向那垂涎已久的辉煌了。

古希腊文化的衰落

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实际上也是希腊文明本身得到发扬光大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色雷斯、蓬特王国、博斯普鲁斯王国、希比尼亚等一些与希腊北疆接壤的国家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马其顿这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国家——它冬季大雪覆盖，春季洪水泛滥，国民的主体是放荡不羁的农民和擅长骑术、能征惯战的领主——在历史前进的赛跑中跑在了最前面。这一结果其实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时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就像公元15世纪意大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形成了一个气旋区，即一个使周围空气向中间汇集的真空。

马其顿的腓力二世（约公元前383～前336年）充分地利用了希腊城市之间的纠纷，并于公元前338年在凯罗尼亚（Chéronée）战场[①]上一举将它们战败。但还有什么必要重提这段众所周知的历史及由此引发对狄摩尼西[②]和雅典的评价的又一轮争议呢？其实雅典也没有什么可过多抱怨的：由于它拥有一支令马其顿征服者垂涎的舰队——它将在远征小亚细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未受到蹂躏。腓力二世因公元前336年被刺杀身亡而未能将此梦想变为现实。当时年仅20岁的亚历山大勇敢地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用很短时间征服了伊庇鲁斯人和荡平了底比斯之后，亚历山大大

① 腓力二世统治下的马其顿于公元前338年在凯罗尼亚（古希腊城邦，位于今希腊中部彼俄提亚境内）打败了雅典和底比斯联军。——译者注

② 狄摩尼西（公元前384～前322年），古雅典政治家，公认的古希腊最伟大的演说家。他力主反对马其顿腓力二世及其儿子亚历山大大帝。——译者注

帝便联合泛希腊同盟的军队，于公元前 334 年跨越了赫勒斯旁海峡。

在同一年的春天，曾建立在自西班牙沿海到爱琴海和好客海一带的古希腊势力范围既未处在一蹶不振、也未濒临灭顶之灾的境地——但它们已经与当地文化混杂在一起并因此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困扰这些地区的危机依然如故。在它们中间，危机最深重的还要数希腊本土。

隔着地中海，迦太基人和希腊人之间的战事仍在继续。他们时打、时和，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自公元前 341 年起控制了坎帕尼亚财富和自公元前 338 年起占领了拉丁姆的罗马成为了当时的新忧患，因为它就像是一群吞食着意大利人民的“狼”。可是希腊各城邦并未真正注意到这一潜在的危险。

希腊在自己的东部还面临着另一桩冲突，那就是与庞大的波斯王朝之间的持久战争。波斯国王当时拥有着东起小亚细亚、西至埃及的大片地中海水域。哪怕是保守地看，埃及也是波斯王朝当时最富有的占领地。因为早在尼科[①]执政时期，那儿就拥有了红海与尼罗河之间的“苏伊士运河”。于是，幅员辽阔的波斯王朝——即便是在风雨无阻的情况下，从萨迪斯到苏萨也至少要走上三个多月——便继续朝印度洋方向扩张，并把在那儿掠取的珍稀商品运回到地中海来交易。在阿尔塔薛西斯[②]三世（公元前358～前 337 年）的“民族主义”强硬政府执政时期，甚至出现了希腊与波斯之间贸易的逆差，也就是说从波斯购回的部分产品及小麦必须以白银结算。

由于对长期对峙的厌倦，在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形成了某种互有戒心的和平共处。被波斯人征用的希腊和腓尼基船只一般来说都遵守双方的临时协定，只在限定的海域内航行。与此同时波斯人招募希腊雇佣兵也成为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相安无事的形势本来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如果允许对“历史”策略进行事后推理的话，我们将会认同在公元前 334 年左右，摆在希腊人面前的起码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把自己多余的人力物力一古脑儿地抛向东部的小亚细亚，发动一场新的、规模空前的、旨在打击庞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特洛伊战争；其二是古希腊文化起源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集中起来对付迦太基、意大利民族及罗马。后一种选择显然是个下策，因为相比之下，东方文明无疑是更具有诱惑力的猎物。西方尽管有布匿人和希腊人的成就，但给人的幻想却远不及东方。让

① 尼科（Néchao）为古埃及统治者之一，约于公元前 609～前 594 年执政。他积极推行埃及向外扩张政策，鼓励振兴本国经济并启用了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运河。——译者注

② 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之名。——译者注

我们想象有这么一篇提前设定罗马时代的“希腊散文”，幻想地中海曾由东至西被征服，并由此成为了希腊人的领海；而不是像历史事实所演绎的那样，它最终由西至东被征服，并从而成为了罗马人的领海。

皮洛士是否具有代表性？

鉴于希腊人的如意打算没能最终实现，许多人便对于尔利·翁·哈塞尔在《地中海悲剧》（1940 年）一书中的说法产生了共鸣。此书叙述的主要是在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公元前 323 年）的一至两代人之后，皮洛士[①]所经历的非凡冒险生涯。

公元前 280 年，这位伊庇鲁斯国王曾应召前去增援塔兰托。其实，在亲率“由三万将士和三十头大象组成的军队”在塔兰托登陆前，皮洛士就已经有了一段传奇般的冒险经历：幼年时他曾作为人质被扣押在亚历山大城，长大成人后他与一位埃及公主成婚并成为了科基拉岛（即科孚岛，曾一度归属于马其顿帝国）的统治者。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个雇佣兵头领，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利益投靠别的主子。公元前 280 年夏季，皮洛士军中的大象阵在赫拉克里亚大败罗马军团；次年，他用同样的阵势好歹取得了奥斯库伦战役的胜利；公元前 278 年他率军队登陆西西里岛——这也许正是他梦寐以求主宰者的土地，并从迦太基人的围困中解救了叙拉古；公元前 277 年他进驻阿格里真托，但遗憾的是厌战情绪此时已笼罩希腊人控制的西西里岛；公元前 276 年的秋季，皮洛士又回到了意大利；公元前 275 年，他在贝内文托被罗马军队大败；同年他离开了意大利半岛并于公元前 272 年意外地死于阿尔戈斯城。

与亚历山大大帝在半世纪之前的神奇征战史相比，皮洛士的意大利冒险充其量只能是茫茫沙漠中的一粒沙子。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皮洛士的经历也可以作为对前者迟到的仲裁。因为皮洛士在意大利的溃败即意味着在与地中海为中心的罗马之较量中，古希腊的失败，而且造成这次失败的直接原因正是马其顿“非正常”的成功（这只是我们的独家观点）。自从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开始，希腊就把自己的重心倒向了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中海东南部地区。希腊最后一次向地中海西部移民发生于公元前 338 年，据说这次移民达 6 万人之多，帮助恢复叙拉古自主权的提莫莱

① 波洛士（公元前 319 ~ 前 272 年），古希腊伊庇鲁斯国王。——译者注

昂[1]是其积极的倡导者。传说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曾计划攻打迦太基，这一担心使迦太基人若干年内不敢轻举妄动。但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在巴比伦寿终正寝，他的王朝也随之崩溃。

“如果亚历山大当时把征战的矛头由亚洲转向西方，意大利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对于翁·哈塞尔提出的这个问题，人们通常可以以历史不能重塑为由加以搪塞。然而，不妨做如下设想：如果由于亚历山大的西征，叙拉古一举变成希腊内海——即一个既征服罗马也征服迦太基的希腊王朝——的大城市，古希腊文化也因此不必经过罗马这道中间环节和屏障而直接流传至今，我们西方人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这是一场尚未发起就已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无论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从那个时代起，任何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强权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东西地中海的接合点上。

大流士王朝[2]被赶出内海

迄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亚历山大大帝究竟是如何征服波斯王朝的。疑点最大的地方恰恰就在于亚历山大的成功来得如此容易。通常人们将此归结于马其顿和泛希腊盟军形成的军事优势，但与波斯王朝无能为力和腐败之类的论点一样，此说法很难令人口服心服。

那时的波斯王朝已经拥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对于如此规模的政府机构来说，一个世纪只能算得上是其寿命中的一瞬间。尽管内乱频频，这个东方巨人当时看上去还是相当强大的。它的道路四通八达，管理水平就那个时代而言也应该算得上是上乘的。在信仰方面，波斯王朝已经具备了后来伊斯兰教的宽容。万名希腊雇佣军的大撤退[3]也根本不能说明波斯王朝已处于不堪一击的地步。这些由小居鲁士[4]招募来向自己的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再次发难的希腊雇佣军其实已经赢得了库那克萨战役（公元前

---

① 提莫莱昂（公元前?～前337年），古希腊政治家和将军。——译者注

② 大流士（公元前558～前330年），古波斯帝国国王名称。属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一世发动了希波战争。大流士三世被亚历山大大帝屡次战败，后被下属杀害，遂宣告波斯帝国的灭亡。——译者注

③ 指库那克萨战役失利及小居鲁士去世后，万名波斯王朝雇佣的希腊军人的大溃逃。——译者注

④ 小居鲁士（公元前423～前401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二世的次子。前404年父亲去世时刺杀兄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未遂，后经母后的干预才得以特赦。前401年重新集结军队妄图推翻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执政。——译者注

401 年）的胜利，但却因小居鲁士的不幸阵亡转胜为败。在经得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的应允下，希腊雇佣军只得朝好客海方向撤退；它在路上遭到了波斯人的阻击，只因色诺芬[1]的机智才侥幸躲过此劫，并最终得以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登船逃命。这一段插曲不仅反映了波斯王朝的内部纠纷和一群勇敢者的壮举，但同时也暴露了希腊的贫穷——似乎正是因为贫穷才迫使它把自己多余的人口和令伊索克拉底[2]担忧的流浪汉输出到富足和有能力雇佣他们的波斯。在色诺芬的《远征记》——“精彩的战争纪实”——中，万名希腊雇佣军的经历以撤退而告结束。

波斯统治者在希腊推行金钱诱惑政策既不说明它强大，也不说明它的衰弱。正是靠此手段，波斯人最终于公元前 404 年间接地打败了雅典，并利用他们与斯巴达的联盟炮制了安达尔基达斯[3]和平协议（前 386 年），从而取得了对小亚细亚希腊殖民城市的控制权。

随后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为此我们要明确两个史实。其中一个是不断被提及而且分量很重的史实，另一个史实尽管早就被提出但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第一个史实指的是亚历山大曾在其出道初期向波斯王朝发起的那一连串进攻：他于公元前 334 年取得了格拉尼卡斯河战役的胜利，公元前 333 年打赢了伊苏斯战役并经长时间围困和用筑坝水淹的办法攻克了提尔。此后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了埃及。在这一系列速决的战役中，马其顿的胜利之师始终沿着地中海的海滨前进。也就是说像一把锋利的砍刀一样，它把庞大的波斯王朝与地中海的联系拦腰切断，还堵死所有波斯通往地中海的道路。这次“外科手术”的标志是马其顿军队在遭遇顽强的抵抗之后攻克了提尔及加沙，并把它们的城池和臣民一并彻底毁灭。失去了舰队的波斯王朝从此就变成了瞎子。于公元前 331 年完成了将波斯与地中海隔绝的军事行动后，亚历山大大帝便率大军向东挺进，直扑波斯王朝的心脏。然后马其顿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之外的高加梅拉战役（也称为阿贝拉战役）中

---

① 色诺芬（公元前 430～前 355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作家。前 401 年随小居鲁士招募的希腊雇佣军与波斯王朝作战，失败后逃亡。前 396 年弃雅典投奔斯巴达，遂被母邦放逐。——译者注

②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 436～前 388 年），古雅典演说家、修辞学家和教师。他呼吁马其顿与希腊各城邦友好，共同对抗波斯王朝。——译者注

③ 安达尔基达斯（公元前？～前 367 年），斯巴达将军，与波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签订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和平协议。——译者注

一举决定了波斯王朝的命运。不管随后进行的对大流士国王的追捕、战争收关、平定伊朗东部省份的骚乱、向印度河的进军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军队往返大调动等行动是多么艰险和壮烈，波斯帝国实质上从公元前331年起就已经成为了丧家之犬。

马其顿骑兵

第二个史实是于1930年由E.－F.戈蒂埃提及的。他认为亚历山大军队（当然也包括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参谋部，以及他身边那一大群战友、酒友和放荡之友）的优势其实就在于它的骑兵。一直到那个时代，希腊的重武装步兵从未得到训练有素的骑兵的保护。而波斯人除了拥有大批优良的战马和骑士外，还从自己的敌人那儿招募了许多步兵以防范希腊的侵犯。在公元前334年与马其顿人打的那一场序幕之战中，波斯军队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名字叫门农的希腊人，而且其士兵也大多由招募的希腊雇佣军所组成。

马其顿一方的制胜之术与其说是那既令人生畏、又令人担忧的强大的步兵方阵，倒不如说是它那支来自马其顿牧场而且与马其顿贵族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骑兵部队。战马无疑是对付波斯帝国密集步兵的理想武器。晚些时候到了克拉苏、安托尼和图拉真时代[1]，正是因为不具备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骑兵，罗马帝国才对伊朗的安息人无可奈何。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8世纪巴尔干人之所以能收复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土地，正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奥地利骑兵的有力支持。这一支较晚才建立起来的部队是欧根亲王[2]制胜的重要武器。

波斯人无疑也拥有自己的骑兵，而且还是一支不错的骑兵。因为波斯的贵族们也同样是马上贵族。但马其顿骑兵部队不同之处是后者有护胸甲的保护——骑兵手中的武器是长矛和大刀，而且还进行了严格的编队。铁的纪律是马其顿骑兵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及阿尔贝战役中获胜的关键。

像当初它攻占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地区的国家一样，波斯帝国很快就被击溃。它在一场闪电战之后突然窒息，就像某些身体强壮的人会瞬间

① 克拉苏（公元前140～前91年），古罗马法学家和政治家。马克·安托尼（公元前83～30年）恺撒的摄政官，恺撒于公元前44年被刺杀后成为罗马帝国的首领。图拉真（公元53～117年），第一位出生于意大利以外的罗马皇帝。——译者注

② 欧根亲王（1663～1736），奥地利元帅和政治家。1687年率奥地利军队攻打土耳其人，大获全胜并因此扬名。——译者注

猝死一样。类似的情况还将发生在穆斯林人、蒙古人及土耳其人发起的征战中。战马或骆驼的速度每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0 年，既不贫穷也不堕落的法国就曾在一夜间被可怕的德国装甲部队击溃。历史上类似“不公正的结局”不胜枚举。

维系长久的殖民地

亚历山大大帝死亡（公元前 323 年 6 月）后，他的王朝即随之分崩离析。提到马其顿、塞琉西人统治的叙利亚及拉吉德人统治的埃及等区域的历史——它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到恢复其和平与对其开发的那一天为止，那就说来话长了。

除了它们的政治历史，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史实，那就是我们称之为希腊在中东的殖民史——因为找不到更恰当的界定词，这种殖民化具体表现为从人口到文化的优势地位。如果把罗马帝国接替希腊人统治中东的时间也算上，这段殖民历史持续了大约 10 个世纪，一直到公元 7 世纪穆斯林打败罗马人为止。乍一看去，穆斯林的胜利也像当年英年有为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王朝一样，显得那样地令人不可思议。

10 个世纪相当于“确立法国几乎全部历史所需的”时间。然而，“在这 10 个世纪后的某一天，随着阿拉伯人战刀的落下，一切均在一夜间突然崩溃……而且一去不再复返；希腊人的语言和思想，西方的官员等都在瞬间化为灰烬；在这一局部，千年的历史似乎从未发生过。一千年的时间仍不足以让西方人在东方这片沃土上埋下自己的一丁点儿根基。语言和社会环境只不过是墙上的装饰贴面，或是不牢靠的面具。所有这些像雨后春笋般从尼罗河畔到兴都库什山脉崛起的希腊移民城市……种种对艺术和思想的表面或真实的影响，难道在一夜间都被风刮走了吗?”

也许一切确实都被风刮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根据对欧洲在伊斯兰土地上推行殖民运动的经历总结认为，任何一个征服者的文明都不可能在原拥有古老文化的国家里得到发扬光大。因为那儿总有某种不透水的“隔板”阻碍着思想意识的同化。也因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所能对外开放的只能是祖先的遗产。

本节之所以题为“亚历山大的过失”，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长期未被人们真正认识的问题。如果古希腊当时把自己的精力和力量都投向西方及其相对不那么古老的土地，它是否就可以遏制罗马帝国的萌生呢?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希腊于公元前146年被降伏

让我们来看看若干世纪后发生的事情吧。公元前148年，马其顿沦为了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两年之后，由于科林斯发生骚乱及亚加亚人一再惹是生非，罗马帝国开始向希腊大举进兵，科林斯随之被夷为平地，希腊也因此沦为了罗马的附属省。斯巴达、雅典和德尔斐是三个惟独有幸授予盟邦之称的希腊城市。

这些城市的沦陷只不过是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系列行动的一个环节：叙拉古于公元前212年在罗马将军马塞卢斯率领的军队前俯首称臣；公元前209年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斯一举占领了塔兰托。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国家的最后里程碑是于公元前63年和公元前31年分别吞并了叙利亚和埃及。

在以上大规模军事扩张之后，古希腊在整个地中海的原有势力范围均被并人了罗马帝国的版图。于是，在往后若干个世纪里，地中海变成了罗马帝国保持强盛和供给生活资源的基地。在地中海的每个地域，陆续有从意大利派遣来的人。他们在那儿定居，从事管理、统治，封杀旧城邦的自由和喧闹，打击老王国的傲气的使命。于是，在优越的生活条件中，在潜在的危险中及在“难以忍受和单调的罗马式安宁中”，一切都被平息，甚至被麻痹。但随着希腊移民源源不断地向罗马迁居，世界的首都在逐渐希腊化。战败者在进行报复。

三 希腊的科学和思维（公元前8～前2世纪）

下文将把重点放在科学上，科学是通向未来的道路，由希腊人早期开辟并轰动一时。可是，科学只是全部思维的一部分；（在广义上）思维超越了科学，包容着科学，而且又转过来，定位于人们通常称之为文明的这个整体之中。一切都倚赖于思维，并且从同一运动消失于思维之中。

然而，正是这个紧密的关系才产生了问题。这个紧密性隐藏在知识的海洋，隐藏在从不仅仅涉及一个领域的浩瀚的文献之中。我们掌握了希腊文学史（A. 和 M. 克鲁瓦泽①的希腊文学史尚需商榷）；哲学史（每代人都重新

① 阿尔弗雷德·克鲁瓦塞（A. Croiset，1845～1923年）和莫里斯·克鲁瓦塞（M. Croiset，1846～1935年）为兄弟俩，均为法国著名的古希腊研究者。——译者注

撰写他们的哲学史)；艺术史，以今天的精湛插图成为视觉奇观；杰出的宗教史。我们甚至有日常生活史。总之，我们只缺少一部整体的书，也许不可能这样设想，因为我们甚至还不能有可以做这件事的想法和打算。

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有一天真的风趣地对我们说，与柏拉图的片刻交谈使他向柏拉图学到的希腊思维比陈列在我们图书馆里那么多的插图本书籍还多得多。的确！为了一次如实的调查研究，要进行上百次的会见。要在600年前后的米利都[①]那儿呆上一年，在550年前后的萨摩斯[②]那儿呆上一年，如此继续下去，在时间和空间里不断地奔波……我可以说我更喜欢在探索中，到航行的出发点去，到更早于希罗多德、苏格拉底、菲迪亚斯[③]，乃至米利都的泰勒斯[④]之前的出发点。这可能有点由情趣所致：可以说这不是我喜欢的古典艺术的伟大构图。然而这也是由于策略所致。肯定地说，希腊最难理解的问题就是起源问题，即所有的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

起源与历史分期

分辨历史时期，历史学家求助于必要的，但却令人烦恼的智慧，牢牢地抓住“一种脚手架”，分解难题，静心筹划。我借用班雅曼·法林顿(1967年)的最新说法，希腊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前600~前400年，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世界的和科学的科学观形成”；从公元前400~前320年，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⑤]同时代，哲学得到充分发展；最后，从公元前320~前120年，在托勒密[⑥]的赞助下，各科学分支在埃及庞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城都建立了各自的“当代的基地”：这是百科全书时代，概论时代，《教程》时代——犹如经常发生的，总结的时代是不可避免的停顿的预兆。

---

① 米利都(Milet)：古希腊城市，今在土耳其瑟凯市南。前8世纪成为小亚细亚希腊最大的都城，以其哲学学园闻名于世。——译者注

② 萨摩斯(Samos)：爱琴海中距小亚细亚大陆最近的希腊岛屿，哲学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出生于此。——译者注

③ 菲迪亚斯(Phidias，活动时期约前490~前430年)：古希腊雅典雕塑家。——译者注

④ 泰勒斯(Thalès，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580年)，哲学家，因其水为万物本质的宇宙论和对日蚀的预测而知名。——译者注

⑤ 亚里士多德(Aristote，前384~前322年)：古希腊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译者注

⑥ 托勒密(Ptolémées，活动时期在公元前2世纪)：著名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译者注

这种分期法值得讨论，例如班雅曼·法林顿选定的年代划分界限（尤其是第一阶段，我宁愿说公元前800年，不说公元前600年）可能得前后稍作移动，但它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简明易懂的辩证法，历史时期相互交替，从中可以发觉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我心目中，本质是刚刚起始的青年时代。

公元前800～前400年，大体上是城邦大发展，艺术大发展，几何式、东方式和古典式相继出现的时期，伟大的雕塑，建筑，确定自公元前6世纪同时出现的多利安和爱奥尼亚柱式，随后，考林辛柱式。这一时期还是伟大的文学时代。在这4个世纪内，一切都在萌发，随后开花结果。在文学舞台上，史诗开始起步。先是荷马[①]，随后是赫西奥德[②]：最初，在品达罗斯[③]（公元前518～前438年）释放出光辉之前，抒情诗，像点刻画，表现得并不好，但我们伴随着第比斯[④]的高雅诗篇，德尔斐[⑤]充满激情的宗教诗篇一起来到了第5世纪，紧接着，在皮西斯特拉特[⑥]（公元前560～前527年）仍然辉煌的时代，从雅典开始，从宗教节日本身诞生了悲剧和喜剧。

这个传承顺序是许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常规程序。在法国文学，一切几乎都是从《罗兰之歌》[⑦]开始，戏剧想必出自神秘剧和耶稣受难剧。

可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什么？正是这种变化，有意无意地向所有的作家提出了如何判断希腊思维和艺术的价值问题。今天，尼采[⑧]（Nietzsche）断言希腊的没落已经随着欧里庇得斯开始，进而还有苏格拉底时，不是也像在1871年一样可能引起纷纷议论吗？希腊的顶峰与悲剧的诞

---

① 荷马（Homère）：指创作古希腊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一个或几个诗人，但缺乏有关荷马本人的真实材料。——译者注

② 赫西奥德（Hésiode，创作时期为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最早的史诗诗人之一。——译者注

③ 品达罗斯（Pindare，前518/前522～约前438年）：古希腊诗人，所写颂诗是前5世纪古希腊合唱抒情诗的高峰。——译者注

④ 第比斯（Thèbes）：古希腊地名，大部分古希腊悲剧故事的发生地，现名锡韦，位于雅典西北部。——译者注

⑤ 德尔斐（Delphe）：古希腊最重要的阿波罗神殿所在地。——译者注

⑥ 皮西斯特拉特（Pisistrate，约前600～前527年）：古希腊的雅典王（?），曾促进农业和贸易的发展，组织民间节日，建立图书馆，收集荷马时代的图书。——译者注

⑦《罗兰之歌》：法国英雄史诗的代表作，属于11世纪末的作品，1837年被重新发掘出来。——译者注

⑧ 尼采（Nietzsche，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现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译者注

生不期而遇，狄奥尼索斯①和阿波罗②就是在悲剧中相互和解的："美的阿波罗精神"（"l'esprit apollinien du beau"）是明确的道德意识，是"表象世界"（du "monde de l'apparence"）在美学和理性方面的表述，而狄奥尼索斯精神（l'esprit dionysiaque）是醉酒，神秘的狂喜，没有明确道德意识和主观性的酒神节音乐，酒神节合唱。但是这一情况为时不久。最终，"酒和死亡混淆于一体的神在阿波罗面前却步，这是理性的胜利，理论和讲究实践的功利主义〔科学的表述〕的胜利，也是它们的同代、民主的胜利"，同样是希腊文明"衰老的征兆"的胜利，在尼采看来，这展现了现代西方令人痛苦的景象。

上述语言已经老化，但是希腊思想特别在其青年时期是伟大的观点，可能一点也不老。奥布雷·德色林古尔说："我所记述的这一切旨在抛弃广泛流传的古希腊文明鼎盛时期与'伯里克利世纪'（'Siècle de Péricles'）相吻合的观念。这一时期，如果它曾经辉煌过的话，我反面认为它最突出的是对很多事情的分期，而这些事情是这个卓越的民族历史中最可宝贵的特征。"这个观点，我欣然同意。因此，我在时间流逝中做出选择：不要太超越希罗多德，这位非常伟大的历史学之父，也是几何学和人种学之父；尽管他具有超凡的天赋，他却忽视了眼下的科学史学家修昔底德；无论如何要把医学科学之父科斯的希波克拉底③（公元前 460? ~前 377 年?），甚至把这些巡回演说家中的第一位诡辩家阿夫季拉的普罗塔哥拉④与有天赋的希腊青年时期（虽是年表）联系在一起，他们传授所谓的管理艺术，柏拉图可能不太喜欢这些，而我们可能从他们身上满意地看到了第一批社会学家，他们是那么古怪吗；最后，我们终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停下来，休息一下。有人鼓动我们照着公众那样亵渎，可我们说，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前，游戏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

---

① 狄奥尼索斯（Dionysos）：又称巴古科斯，在希腊宗教中他是丰产与植物的自然神，特别以酒与狂欢之神著称。——译者注

② 阿波罗（Apollon）：希腊神话中具有多种职能和意义的神，在希腊所有的神中被崇奉得最广泛，也最有影响。——译者注

③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 de Cos，活动时期约公元前 460 年）：古希腊几何学家，早于欧几里得近 100 年汇编了第一部几何原理的著作。科斯（Cos）：希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的第三大岛，希波克拉底生于此地。——译者注

④ 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 d'Abdere，约前 485 ~ 前 410 年）：古希腊思想家和数学家，希腊第一个最有名的辩论学家。阿夫季拉：古希腊色雷斯沿海的城镇，普罗塔哥拉生于此地。——译者注

东方的遗产

亚洲的希腊，是前6世纪希腊科学发祥地，它连接着辛梅里安人[1]和西徐亚人[2]入侵后迅速重新繁荣起来的小亚细亚、新赫梯人[3]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过海可到达的埃及、亚述，后者是非常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咄咄逼人但充满活力的新形态。米利都的泰勒斯，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传的，说他是一个腓尼基人的儿子，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旅行，学会了几何学和天文学。

上述细节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如果今天才确信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除它们之外，还有近东色彩斑斓的文化，在当时就已经具备了坚实的科学成果的话。埃及的土地丈量（每年洪水过后重新丈量一次）和建立在严格按照规定观测星球基础上的巴比伦天文学，使代数和几何学得以长足进步。现在我们不妨消遣一下，向我们的读者提几个埃及人当时解决了的基本问题，虽然他们用的方法不同于我们。什么数加上该数的1/7等于19？答案：16 + 1/2 + 1/4（译者质疑此处，下同）。证明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的边长等于这个圆的半径。一根绳子按3:4:5的比例分成三段，它们可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说到π值，如果他们先定为3，等于圆周长与内接正六边形周长两者合在一起，他们最后想必得到一个相当满意的近似值3.1604，误差在6%（?）以上。巴比伦人还解决了面积问题：设600个任意单位的平面，如果长和宽之差的平方乘以9，等于长边的平方，问长和宽各是多少？答案：长30，宽20。此外，不能肯定，您本人是否发现了巴比伦人或埃及人缓慢的推理历程。确实，上述示例展示的聪明才智远不如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所具有的知识和思考来的重要。

除这个早期的数学外，还应该加上巴比伦的某项化学，埃及的某项医学，美索不达米亚的某项天文学，在古代巴比伦庙宇顶层星象台历经数百年观测的丰富资料。这些文献很多都为泰勒斯所用，使他得以预测到前585年5月28日在小亚细亚有幸可以看到的日食。

---

① 辛梅里安人（cimmérienne）：古代居住在高加索和亚速海以北的一个民族，前6世纪消失。——译者注

② 西徐亚人（scythes）：又称斯基泰人，前9世纪生活在阿尔泰山以东地区，前4世纪萨尔马特人入侵，西徐亚王国被推翻。——译者注

③ 新赫梯人（néo-hittite）：赫梯人是公元前2千纪初在安纳托利亚出现的古印欧语系民族。公元前1400～前1200年为赫梯人新王国（或帝国）时代。——译者注

总而言之，希腊奇迹的出现，有认真的准备和起飞的基础。希腊科学乃是从简单的发展取得的。它需要构想出新的思维方法，新的探询和阐明世界的自主权和选择解释的权利。希腊奇迹——接纳假设范畴——与希腊社会广泛的非神圣活动结合。但是，像每当涉及思维手段一样，这种变化——经常出现意见纷杂的情况——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以事先已经明确、有意识的方式取得的。

很显然，科学的产生还与社会、与技术有关。埃及社会是大帝国的社会，青铜时期的社会。希腊科学是城邦和铁器时期的科学。

爱奥尼亚[1]的变化

希腊科学的第一个革新行动发生在米利都（它比以弗所[2]早得多，但以弗所将看到非凡的赫拉克利特[3]诞生）。公元前6世纪以来，城市几乎拥有百十个货摊设置在额辛桥河畔；城市在意大利具有一个庞大的驿站锡巴里斯[4]，转运加工品；在埃及，城市还出现在诺卡第[5]大路关口处。由此，在公元前6世纪初，出现了一座大型的商业城市，古希腊社会最大的城市之一。然而，科学始终是愉悦的女儿，而愉悦与享有特权的阶级分不开，大城市造就了如此的享受社会，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6]、阿那克西米尼[7]等伟人们也不例外。

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些伟人的著作很不了解，因而想给他们中的一人定位时，便牵涉到他们所有的人。他们的共同关注点不是对宇宙的解释本

① 爱奥尼亚（l'onie）：一译伊奥尼亚，小亚细亚中部沿海地区，公元前6～前5世纪一批希腊哲学家在此形成一学派称为伊奥尼亚哲学派，其中包括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等。——译者注

② 以弗所（Ephèse）：古希腊爱奥尼亚城市，故址在今土耳其西部伊兹密尔省塞尔柱村附近。——译者注

③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 d'Ephèse，约前540～前480年）：哲学家，以其宇宙论闻名于世。——译者注

④ 锡巴里斯（Sybaris）：意大利南部塔兰湾古希腊城市。——译者注

⑤ 诺卡第（Naucratis）：古埃及的希腊商城。——译者注

⑥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公元前610～前546/545）：据说他曾是米利都的泰勒斯的弟子，常被称为天文学奠基人，发展宇宙论或有关世界系统哲学观点的第一位思想家。——译者注

⑦ 阿那克西米尼（Anaximène，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545年）：希腊自然哲学家，米利都三位思想家之一，另两位是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传统认为他们三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哲学家。——译者注

身吗？这个问题从整个文明开始起步时就遇到了。文明应该回答或像它所能回答的那样了结这个问题。埃及、巴比伦用最大的努力奇迹般地给予了解释。他们两者始终在那儿补充论证。爱奥尼亚的“实证主义”摆脱掉他们的论证，从自然界搜寻，把被认为其本身在运动的因素，即有生命力的物质引入论证。泰勒斯认为，万物均来自一个本原：水。巴比伦人不是已经说过吗，马尔杜克[1]从广阔无垠的原始水中获得淤泥和土壤。“然而，泰勒斯设想宇宙是通过自然过程由水组成时，却忘记了马尔杜克”。

我们很了解阿那克西曼德的解释：四元素，土、火、水、气（不是经常说的那个空气的气）一个制约着另一个。万物周围的火使一部分水蒸发，土发出光芒，并呈火轮形状……有人说，通过炼铁炉或窑炉可以看到世界。

事实上，阿那克西曼德把物质的宇宙比作几何形。四种元素，不管它们怎样相互冲突，怎样变化，最后彼此要取得平衡关系、“威力相等”。万物皆来自无限的、不确定的物质，即 l'apeiron（无限），先已存在的物质，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且脱离了对立体：影和光、冷与热、干与湿、密和疏、水、气、火……这些元素结合起来，便产生了有生命的物体、植物、动物、人，根据自然规律的要求，任何因素对其他因素都没有支配作用，没有“王朝”或“君主专制”。医生兼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家阿尔克迈翁[2]在公元前 5 世纪初重复了这个变成老生常谈的想象：“身体如同 l'isonomia tôn dunameôn（权贵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是能力的平衡……相反，疾病是一个元素对其他元素‘君主专制’的结果。”（让·皮·韦尔南[3]）

简而言之，这种观念是不再划分等级的宇宙观念，在宇宙中，谁都不能完全制服对方。在对抗相互制约的世界，活灵活现地展现出 la polis（城市）社会的和政治的天下：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而是法律上平等的人，治理天下。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要把已形成的、并应理想化维系城邦政治领域安定平衡的规则推广到宇宙中去。世界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因为人类

---

① 马尔杜克（Mardouk）：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人士崇奉的神灵，是巴比伦城的主神和巴比伦国的国神。——译者注

② 阿尔克迈翁（Alcméon，活动时期在公元前 6 世纪）：希腊哲学家和生理学家，据文献记载，他是第一个为研究目的而解剖尸体的人。——译者注

③ 让·皮·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法国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宗教和神话专家。——译者注

的世界已经变化，并且从日常领域转移、反映到宇宙领域。因此，有了韦尔南的这句最重要的话："亚里士多德确定人是政治动物时，强调指出希腊理性与当今理性的分离。如果现代人在其眼里是政治人，这是因为理性本身在其核心是政治的。"

毫无疑问，在韦尔南的话里丝毫没有提到，当今科学的"实验理性"，该"实验理性"建立在可以认识自然规律的系统观察之上。爱奥尼亚的这门物理学，虽然是理论和非经验真理性的，但却是走向现代科学的第一步。一方面，这是因为它探求一种理性的解释，并试图采用已经有理性的数学语言。如果阿那克西曼德体系立足的大地处于宇宙中心自然平衡状态，那就不需要（如泰勒斯所断言的由水，或如阿那克西米尼解释的由气垫）来支撑，因为它位于中心，被各种相等的力量从四面八方吸引着。

另一方面，从不再只有神明才能解释宇宙时开始，多样化的假想世界便被开放了：人类得以自由探询、想象；再没停止过探询、想象。安那克萨哥拉[①]除他本身的贡献外，在雅典（从公元前460年），他曾是米利都思想的介绍者，他认为，研究公元前468～前467年坠落在伊哥斯波塔米[②]的巨大陨石，发现了天体是土质的实证，而且人们在保萨尼阿斯[③]时代还会好奇地观察到。

在探索起源方面，人们多想更好地了解技术经验：炼铁炉、窑炉、商船、汇兑店（？）在米利都"新"城的明显作用啊！总之，让我们想象一下面对第一幅地中海全图的情景吧，那是米利都的埃卡代？为航海者看见和理解而竖起来的，约公元前500年，他成功地通过了海格立斯擎天柱。[④] 所有的能工巧匠都被召集到希腊科学的发祥地。他们的礼物就是：奇特的贡献，数学、技术经验、某些宗教框框的消除和对普及的兴趣。

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

从此以后，所有的希腊思想家无不试图对世界做出解释，答案一个接

① 安那克萨哥拉（Anaxagore de Clazomènes）：希腊自然哲学家，因创立宇宙论并发现日、月食的真正原因而闻名。——译者注

② 伊哥斯波塔米（Aigos Potamos）：今土耳其西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一役于公元前405年在此地进行。——译者注

③ 保萨尼阿斯（Pausanias，？～约公元前470/前465年）：斯巴达将领。——译者注

④ 海格立斯擎天柱（Colonnesd'Hercule）：指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两座山。——译者注

着一个，而且一个学派反驳另一个学派，一个城市反驳另一个城市。对此予以说明往往是很困难的。谁能自以为懂得了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这位诗人、预言家、哲学家呢，谁能配得上他这个“晦涩”绰号呢？苏格拉底曾说过，为了在这座布局难以辨认的建筑中转一转，必须成为“提洛岛[1]潜水员”，具有他那著名的灵活性！说到底，我们只有几句或多或少得到公认的只言片语，它们极为精彩，经常出现在“(使人想起）巴斯卡尔[2]思想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短句里”。而人们可以从这些哲学家和古代评论家的片段和注释中无休止地提出关于赫拉克利特思想是否真实的问题，甚至提出关于赫拉克利特思想表述的这句韵文问题。赫拉克利特是物理学家、神秘主义者（熟悉古代崇拜俄耳甫斯神秘教理和仪式，或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仪式）、逻辑学家或自然主义哲学家？对于他这个人，各种解释都有支持者。

然而可以肯定，赫拉克利特按照米利都方式寻找对自然的解释。对他来说，火是使万物变化的特别因素，是“引导宇宙的闪电”：“火因土的灭亡而得到生命，气因火的灭亡而得到生命；水因气的灭亡而存在，土因水的灭亡而存在。”“一切都在流动”，一个因素无休止地转变成另一因素，因而“整体的变化是一种斗争”，而且“世界是……紧张与松弛相间的张力和谐体，如同竖琴与弓箭一般”。“伟大的赫拉克利特”，对尼采来说，将是“灵感深度”的象征，这是一种预言，人们会感到惊奇吗？

可是，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都服从于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通过这规律“外界环境具备了”理性。“现在只存在惟一的一个智慧：承认思想通过一切指引各种事物”，深入到“宇宙本质”的理性可以治愈这个宇宙的疾病，甚至人类的疾病。规律具有支配能力、可以理解人类理性的观点，以及智者应该寻求控制自然的观点，不正好是我们现在设想的那种科学的观点吗？不是说明，“对万物来说均匀构成的世界不是由哪个上帝和哪个人创造的；而且世界过去一直存在，现在也存在着，将来永远存在，永久燃烧着的火适时点燃，适时熄灭吗？”

科学的曲折道路

爱奥尼亚从公元前530年开始停止了繁荣昌盛和独立，但刚刚熄灭的

---

① 提洛岛（Delos）：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中最小的岛屿之一。——译者注

② 巴斯卡尔（Pascal，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笃信宗教的哲学家、散文大师、近代概率论的奠基者。——译者注

火在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城市又重新燃烧起来。当时在那儿活跃着毕达哥拉斯[①]和爱利亚人[②]的双重企图，这是空想主义反对爱奥尼亚实证主义的反应。

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582年，约于公元前532年离开萨摩斯。他逃避过波斯人，来到可洛托那[③]，在那儿他成了一个宗教教派的创始人，转向净礼和禁欲。他对世界的解释——因为他有自己的解释——在当时奇特地开始了毕达哥拉斯在最抽象的科学，即数学方面的经历。

数，对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来说，实际上就是对世界的解释，如同火对赫拉克利特而言。在我们的精神之外有一个自我存在，公元前4世纪有一位注释家说，“所有能自知者均具有一个它既不能自解，也不能自知的数”。这句玄虚的话把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们推向了对数的性质的研究：吉数或凶数；三角数，平方数；10这个数的奇迹在于，它是前四个数之和：1 + 2 + 3 + 4 = 10……从这个游戏，他们发现了（算术、几何、调和的）比例；在几何学，“他们叫1点，2线，3面，4体，根据必要的点数，确定点、线、面、体”……这些想法甚至使他们计算太阳和地球的运行轨道，解释太阳和地球在其表面运动之外的真实运动，关心声学和音乐，证明地球是球体。他们最著名的成果，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就是毕达哥拉斯提出的定理，即在所有的直角三角形中，直角两边的平方和等于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

可是，有一天，数学学子们惊奇地发现了几个无理数。一个数与另一个数的比，没有公因数，没有可用整数或分数表示的商数时，该数则是无理数。例如：圆周与直径之比是一个无理数。同样，等腰直角三角形表现为不幸的无理数。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样的等腰直角三角形里，两个直角边各为1，斜边将是$\sqrt{2}$。这个简单的答案——我们的答案——在那遥远的年代是考虑不到的，但他们很容易地证明了斜边小于2（两个直角边之和），大于1，因此，不能有一个整数表示。不久，用分数表示，这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予以证明。结果是，在任何一个矢量上，小数点后面的数

---

① 毕达哥拉斯（Pythagore，公元前约580～约前500年）：哲学家、数学家和毕达哥拉斯教团创始人。——译者注

② 埃莱阿（éléates）：取名于希腊人聚居的意大利南部埃莱阿城，今斯塔比亚，指古希腊最著名的哲学派别之一，鼎盛时期约在公元前5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色诺芬、帕门尼得和芝诺等。——译者注

③ 可洛托那（Crotone）：意大利南部城市，在此创建有伦理—政治学园。——译者注

不是无限的，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们所想的那样：除整数之外，分数和无理数占据的地位是无穷尽的。

可是那时候，把世界还原成几个数，如果这几个数是无穷数，那就不再是简单想象的问题了。一位历史学家断言："从毕达哥拉斯学说产生的数学，类似澳洲土著用的一种武器飞去来器，反转回来跟自己过不去。"

从那以后不久出现了反潮流，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在埃莱阿（或维利亚）的卢卡尼亚[①]海滨，提出对毕达哥拉斯数的否定。巴门尼德[②]（公元前约530年生）从他这方面，对存在，即永恒的普遍真理提出问题，这不同于反对意见（非存在），这是简单的表象游戏。巴门尼德把"杂多"的存在，就是说，把爱奥尼亚人和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们的解释，放在表象方面。从此开始，有许多争论。就在埃莱阿的芝诺[③]不顾一切地维护他的导师时，提出了他那非常著名的悖论：阿基利[④]不能追赶上跑在他前面的乌龟；箭飞出去，就不飞了，等等。解释这些想象是否荒谬可能需要稍长一点时间。这些想象会成为合理的或几乎合理的，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反击毕达哥拉斯信徒们的观点的话，他们的观点关系到让荒谬光彩夺目问题。亚里士多德说，这种荒谬推理勾画出逻辑学、辩证法，由此还使曲折的科学之路看到它的轮廓。

这次口头的诡辩盛会之后，人们带着阿格里真托的恩培多克勒[⑤]（公元前500～前430年）的经验得以继续返回到具体事物中去，恩培多克勒的经验阐明了空气的作用、空气产生的压力、在元素中以空气取代蒸汽的必要性。或者，带着德谟克利特[⑥]的推理返回到具体事物中去，德谟克利特是谈论不可见的纤细颗粒，即"原子"，更确切地说"不可分的"物质的第一人。大量的原子（取代大量的数）构成了充满活力的世

---

① 卢卡尼亚（Lucanie）：古代意大利南部桑尼特人的一个部落卢卡尼人的领地。——译者注

② 巴门尼德（Parménide）：希腊哲学家，创立前苏格拉底希腊主要思想流派之一的埃莱阿学派。——译者注

③ 埃莱阿的芝诺（Zénon d'éÉlée，约公元前495～约前430年）：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以悖论著名。——译者注

④ 阿基利（Achille）：希腊英雄，密耳弥冬的国王。——译者注

⑤ 阿格里真托的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 d'Agrigente）：希腊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宗教教师和生理学家。阿格里真托，意大利地名，靠近西西里岛南岸。——译者注

⑥ 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公元前460～前370年）：希腊哲学家，他在宇宙原子论的发展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译者注

界结构。在现代原子物理学和化学的启示下，幻想有时绕过言辞直取胜利。

伯里克利世纪的科学

在公元前4世纪，不管怎么说，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间的争议初露端倪时，科学问题还没有尖锐地提出来。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猎取的野味，就是这只胆怯的野鸡，受到压抑的心灵在人类的这片土地上仅仅是一瞬间。科学对他们来说只作为思考手段，通往永恒的、脱离肉体的思想之路。人们知道，没有一人能进柏拉图科学院，如果他不是几何学学者的话。一天，有人问柏拉图："上帝在做什么?"他回答说："上帝在不停地搞几何化。"应用科学还是见鬼去吧！在高里吉亚[①]篇中，柏拉图讲过军事工程师的功绩，说道："然而你藐视他和他的艺术，你可能只侮辱性地叫他工程师，而且你既不会愿意把你的儿子给他的女儿，你本人也不会娶他的女儿。"塔兰托的阿契塔[②]所制木制的鸽子飞起来时，柏拉图却气哼哼地说："他腐蚀了几何学……使几何学丧失了尊严，像逼迫奴隶那样使几何学从非物质的纯心智的事物堕落成有形体的、有敏感性的物体；采用要求手工加工的低贱材料，为奴隶干的手艺效力。"小事，但像他说得那样明白无误！

希腊科学与手工艺造物精神分道扬镳正值希腊社会最近一次转折之际。米歇尔·罗斯托夫采夫[③]评论说，"古代和古典时期的希腊艺术从未忽视手艺的表现"。所以，陶瓷制品提供了一系列反映当时物质生活的景象，可是，由于出现了"机械的"、变成令人鄙视的场面，艺术将改变其方向。色诺芬说："这叫机械艺术，它带有社会烙印，这正是在我们城邦里所鄙视的。"

雅典舆论不宽恕科学探索还有其他理由。天文学家和学者很容易向舆论表露出来他们是不信宗教的人，不信教，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使传统上奉为神圣的上天和星辰失去神圣性。普罗塔哥拉被放逐，被投人监牢的

① 高里吉亚（Gorgias，公元前487～前380年）：古希腊诡辩家。——译者注

② 塔兰托的阿契塔（Archytas de Tarente，活动时期在公元前400～前350年）：希腊科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主要数学家，有时被称为数学力学的奠基人。塔兰托，意大利地名。——译者注

③ 米歇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el Rostovezeff，1870～1952）：俄国考古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古希腊和罗马史权威，尤其精通罗马经济及社会问题。——译者注

安那克萨哥拉只是在伯里克利本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走出牢笼，然而他离开了肯定不是思想自由的京城雅典。甚至苏格拉底认为，提出关于星球的运行轨道、行星的运动及其原因等问题是徒劳无益的。毫无疑问，柏拉图不是极力地为天文学研究创造好名声做出贡献了吗，可是，那只是在他转而赞成他的弟子们提出的假想，即观察到行星运动时，如果行星的运动看来是杂乱无序的，那只是表面而已。行星的实际的、完全有规律的运动，如同星宿的运动一样，服从一个神圣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判处一位天文学家呢，他抛弃了爱奥尼亚人不合时宜的自然主义解释，而且，如普卢塔克[①]所说“自然规律”重新“隶属于神圣原则的权力”时，这位天文学家重新看到他的清白。因此，柏拉图致天文学的崇高信函是尖锐的。这些信笺继续把爱奥尼亚开创的研究与自然的、可以解释世界结构的理由区分开来。人们看到，希腊社会脱离神圣化既不彻底，也不迅速。

公元前5世纪的科学仍然利用了在科学本身而非外部世界发挥出来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力量。柏拉图学说对思想作用与感知作用的区别，作为认识的方法，对科学的未来来说，该是最重要的。同样，数学抽象概念的敏感性使柏拉图哲学重新回到纯科学。然而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在哲学最有创造性的时期，返回经验论和实验论的科学没有以某种方式关闭先前开拓的道路。

斯塔吉茹斯的亚里士多德

在一定意义上，是亚里士多德为后代拯救了很大一部分古代的科学力量。这位斯塔吉茹斯人（出生在马其顿沿岸的斯塔吉茹斯）是一位医生之子，这位医生很早就使亚里士多德接触到医疗训练。然后，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开始学习毕达哥拉斯数学和他的导师柏拉图的哲学，进而广泛地发展了柏拉图天文学几乎带有神学观点的一面。可是，亚里士多德最后转向了数学，与人类学生物学重修旧好。这一奇特的成长过程解释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俗易懂的著作，倡导者的著作何以能在几个世纪内，先是伊斯兰，随后是西方大量地吸收。医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天文学、自然科学、政治心理学、伦理学，人类的全部知识皆囊括在内。在动物学，

① 普卢塔克（Plutarque，约46～119年后）：在罗马帝国时期生于希腊，对16～19世纪初的欧洲影响最大的古典作家之一。——译者注

亚里士多德甚至是一位开创者，在他的两部著作《机械学》和《气象学》中，他转向操作技巧。确实，这些著作有可能是假托。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是明显地脱离了空想主义和柏拉图的诗歌。重点不再放在部分敬神的心灵上，而是放在人、有思维能力与人势不两立的动物，甚至放在生理学的基础、心灵活动、想象、记忆、情感上。观点不再是与物质载体分离的自我存在。

总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是第一个作为严谨的系统，作为“虽未经数学计算的高级理论”出现的。这是伪造的理论，肯定无疑。亚里士多德本人坚持区分自然运动和强制运动。他说，有永恒的自然运动，如天球的旋转。在宇宙范围内占有位置的每一事物，自然运动使它回归到原位置，如果我把它抛出，他就向地球中心跑去，但停留在地面上；比空气轻的蒸汽自然上升，等等。至于非自然的强制运动，它需要有牵引或推动。多么精彩的解释，差不多每天的活动无不符合这一解释：抛出一块石子造成运动物体的异常，没有驱动力它还能继续运行吗？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解释说，外部环境的反作用造成偏移，并在旋转过程中推动运动物体脱离原先的运行轨道。高依雷[①]说，这是“天才的解释”，虽然它是虚假的，因为它挽救了体系；不过，在历史的灾难之后，从这个体系诞生了伽利略之前的科学思想。惰性原理在提出之前等待了几个世纪。

亚历山大里亚的辉煌

亚历山大[②]的远征意味着古希腊领域奇迹般地扩大。土地丈量人员、几何学家、工程师、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利用了这突如其来的广泛领域的开放机会：巴比伦和埃及的资源是他们都可以直接采用的。希腊科学可以从中学到的有关星宿距离、岁差、远方国度的地理知识是很多的。是否要随着马松（S. F. Mason，1956 年）一起认为，亚历山大的远征把希腊的科学推向实践，如同拿破仑征服时代法国科学转向那样呢？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32 年创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于公元前 323 年成为

① 高依雷（Alexandre Koyré，1882 ~ 1964 年）：俄裔法国哲学家，以其科学思想史研究成果闻名。——译者注

② 亚历山大（Alexandre，公元前 356 ~ 前 323 年）：史称亚历山大里亚大帝，公元前 334 年东侵，前 332 年进入埃及后，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建城，名为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e）。——译者注

独立的埃及京城。在托勒密一世（救星）① （在位至公元前 285 年） 及其子托勒密二世（公元前 282 ~ 前 246 年） 时代，获得埃及强大生命力的首府不久便成了地中海人口最多、最富有、种族最混杂的城市。新的法老们，渴望声誉，愿作文学和科学之友，很快就表露出是世界各国学者的资助者。他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创建了我们将称之为科学研究的场所。博物馆（缪斯神庙） 和图书馆的创办时间现在不能确切肯定。但是可以肯定它向学者们提供了巨大的资财：无数的藏书、解剖室、植物园和动物园、观象台，还有探索手段和生活手段。博物馆是一种提供营养的学府。当时，谁不想到亚历山大里亚旅游一番呢？这有点儿像公元 18 世纪，欧洲的哪个有知识的人能不知道巴黎呢。

亚里士多德之后，雅典还闻名了很久，因为有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吕克昂②学园的继承者们（泰奥弗拉斯托斯③从公元前 322 ~ 前 287 年主持吕克昂学园，然后让位给斯特拉顿④，后者在先前已迁居亚历山大里亚）；有伊壁鸠鲁⑤；有斯多葛主义创始者季蒂昂的芝诺⑥ （约公元前 335 年生于季蒂昂，约前 264 年死于雅典）；有最古老的怀疑论者埃利斯的皮朗⑦，他于约公元前 336 年来到雅典，约公元前 290 年在雅典去世。还应该注意到罗得岛⑧的光辉（至约公元前 166 年），及随后的小亚细亚帕加马市⑨的光辉。但是最后，古希腊的最重要的知识已移居到亚历山大里

① 托勒密一世（救星）（Ptolémée Ier Sôter，公元前 367/前 366/前 364 年 ~ 前 283/前 282 年）：亚历山大的朋友和将军，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死后，于前 305 ~ 前 304 年间称王，前 304 年得到“救星” 的神圣称号。托勒密二世（Ptolémée II Philadelphe，公元前 308 ~ 前 246 年），托勒密一世之子。——译者注

② 吕克昂（Lycée），位于雅典郊外的体育馆名。公元前 335 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此开设学校，讲授哲学。——译者注

③ 泰奥弗拉斯托斯（Théophraste，约公元前 372 ~ 约前 287 年），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受亚里士多德委任为逍遥派学园主持人。——译者注

④ 斯特拉顿（Straton，公元前 ？ ~ 约前 270 年）：继泰奥弗拉斯托斯之后，成为逍遥派（正统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领袖。——译者注

⑤ 伊壁鸠鲁（épicure，公元前 341 ~ 前 270 年），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⑥ 季蒂昂的芝诺（Zénon Citium，约前 335 ~ 约前 263 年）：希腊思想家，斯多葛主义创始者。——译者注

⑦ 皮朗（Pyrrhon d'élis，约前 360 ~ 前 272 年）：希腊哲学家，一般认为他是怀疑论创始人。——译者注

⑧ 罗得岛（Rhodes）：希腊岛屿，公元前 290 年市民为纪念抵抗德米特里一世入侵（前 305 年）成功，建立了著名的罗得大铜像（高 30 米），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译者注

⑨ 帕加马（Pergame）：古代希腊城市，现为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镇。——译者注

亚新的国际城。

奇迹，在于亚历山大里亚的辉煌在两个世纪内始终保持高超的水平。两个世纪如此朝气蓬勃的精神文化生活，不可能用几行字予以总结。因为科学思想摆脱了惯用的综合方式，而倾向于特定科学的专门化。人们不再谈论哲学或哲人，而谈论数学家：欧几里得[1]（约公元前300），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他只路经亚历山大里亚，如果他去过的话；阿波罗尼奥斯[2]（约公元前200年）；语法学家如狄奥尼修斯、色雷科斯（约公元前290年）；原子学家如同一时代的希罗菲卢斯[3]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4]；天文学家如阿利斯塔克[5]（公元310～前230）、厄拉多塞[6]和喜帕恰斯[7]（约前125年）。

专门科学的大发展是与知识的巨大进步相一致的。经过缓慢的成熟过程之后，长期的智力酝酿冲击到各个领域。欧几里得《原理》试图系统地介绍数学。阿基米德（在表现人类的胆量方面，他说出“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托起来”）开创了用两个多边形近似测量圆周的方法，两个多边形，一个外切，一个在圆里内切（随着多边形边数的不断增加，多边形的周长随着加长，并接近圆周）；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他们还加速了微积分学的发展。阿波罗尼奥斯研究圆锥形。由于有阿基米德，还有阿波罗尼奥斯，产生了机械学，阿利斯塔克测量或尽力测量了地球与月亮、与太阳之间的相对距离，而厄拉多塞测量地球的子午线。喜帕恰斯能够预言日月食。希罗菲卢斯，约公元前300年，区分了动脉与静脉。伊西斯特拉鉴定出淋巴管。这些成就中最惊人的当属阿利斯塔克：据阿基米德记载，阿

---

① 欧几里得（Euclide，活动时期约前300年）：古代最杰出的数学家，以《几何原理》而闻名于世。——译者注

②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 de Perga，约前262～前190年）：古希腊数学家。——译者注

③ 希罗菲卢斯（Hérophile，约前335～前280年）：又译赫罗菲卢斯，亚历山大的医师。——译者注

④ 埃拉西斯特拉图斯（érasistrate，活动时期约前250年）：希腊的解剖学家，医师，有的称他为生理学的创始者。——译者注

⑤ 阿利斯塔克（Aristarque，前310～前23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认为地球有自转和绕日公转的第一人。

⑥ 厄拉多塞（ératosthène，前273～前192年）：又译埃拉托斯特尼，希腊科学作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诗人。——译者注

⑦ 喜帕恰斯（Hipparque，公元前？～前127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天文观测家和有才能的数学家。——译者注

利斯塔克确认：地球自转需一天时间，围绕太阳转一圈需一年时间。根据普卢塔克提供的证据，他遭受过许多次凌辱并险些儿被判处对宗教的亵渎。很可能有两个具体情节是确切的，而且相互有联系：事实上，地球日心说将被抛弃，因为它与当时的宗教观念是相抵触的。

"斯巴达克斯[①]的报复"

不管亚历山大里亚的科学功绩多么卓著，然而它却在短时间内就停止了运行。很久以来人们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在罗马社会的前途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传统的答复有待商榷。

让我们发封信询问一下原子弹之父 R. 奥本海默[②]吧。他答复说："如果我们想到古希腊的文化和古希腊以及随后的罗马时期，似乎很奇怪，科学革命没在当时产生。"所谓科学革命，请你们在全面的意义上，理解为在 2000 年之后，于 18 世纪末要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这样的革命因素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了吗？

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一位天才的工程师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③]，公元前约 100 年他已不在人世。他是百项计策、多种复杂的机械装置、可以随意将水倒出或不倒出的虹吸瓶、齿轮装置、齿轮、蜗杆、用微型锅炉产生的蒸汽压力转动的转盘……的发明者。他还发明了一台真正的经纬仪，名为"折光度"经纬仪的使用者如果在军事生活中用它测定过地方形位，他一定会有趣地发现测定工作非常简单。

当时没有应用科学的种种诺言和希望？水蒸气，甚至用于玩具，我们有权赋予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是，德尼斯·帕潘[④]（公元 1681 年）最终发明的高压锅本身也没有引起一个多世纪后定名的工业革命。技术发明不足以引起一场技术革命。我也不相信一种"内在的解释对亚历山大里亚的工程师们都无济于事"。路易·鲁吉耶（1969 年）说过，希罗"是古代

① 斯巴达克斯（spartacus，公元前？～公元前 71 年）：原为色雷斯人，是抗击罗马的"角斗士战争"的领袖。——译者注

② 奥本海默（Oppenheimer，J. Robert，1904～1967 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制造第一批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工作负责人。——译者注

③ 希罗（Héron d'Alexandrie，活动时期前 62 年前后）：又名赫伦。希腊几何学家和发明家。——译者注

④ 帕潘（Denis Papin，1647～约 1712 年）：法国出生的物理学家，首次提出由汽缸和活塞组成的蒸汽机的设想。——译者注

的沃康松[1]，不是詹姆斯·瓦特[2]"。可是沃康松不仅仅专心于自动机装置：他改进了纺织技术。人们还很严肃地提出，亚历山大里亚的"资助者"过去对工程师的要求，不是改进军事机械（他们似乎没有尽力取得巨大的成就），而是为虚假的奇迹提供方便，以打击希腊—埃及崇拜萨拉匹斯[3]的信徒：宗教受操纵，科学受操纵，一位历史学家如是说。这是可能的。这足以解释在罗马世纪这种技术停滞不前吗？

历史学家往往提出另一种解释，与哲学家和工艺学家竞相反复讲述。所有的技术革命都提前判定为被奴隶制扼杀，奴隶制的病魔不断地扩展到整个古代社会。在公元前 3 世纪，由于有大有产者，雅典成为潜伏着众多工场和（从农村到城市）奴隶的城市。从公元前 166 年，提洛（圣岛的奇特命运）变成了整个东方巨大的奴隶市场。路易·鲁吉耶还写道，"如果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不打算制造一台蒸汽机减轻人们的辛劳，那是因为当时有奴隶制"。而这将成为"斯巴达克斯的报复"。

无人否认，一个社会可能忽视发展并采用（甚至它熟悉的）技术，因为它不需要发展和采用。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奴隶制思想本身是否就是对应予谴责的动物人的辛劳漠不关心呢？英国的，随后是欧洲的工业革命在数十年内带来工人条件的明显恶化。因此，我们怀疑，工业革命曾规定要关心"减轻人们的辛劳"。可能相反，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特定的集团来说，帮助一台机器的工人们更多地生产，而劳动强度不很大，也不很艰苦，已成为"费钱"的事。

当然，我们的同情心是今天的同情心，怎么未能凭借往日的道德发现"斯巴达克斯的报复"之乐呢？奴隶制可能不只是一种罪过，而更是指责人类停滞不前的过错。那么为什么在古代未发动的工业革命不发生在 17 世纪，德尼斯·帕潘时代呢？或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特别是各种科学条件似乎已具备的伦巴第呢？那个时代的社会已经不再是奴隶制的了。用 W. 罗斯托夫的话来说工业革命在 1780 年的英国将要"起步"时，它在经济和民主持续发展之前，已经有过长期的经历。在其他各项因素中，毫无疑

---

[1] 沃康松（Jacques Vaucanson，1709－1782 年）：法国发明家，他极富创造力，他发明的自动机装置对现代工业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2]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 年）：英国发明家，高效率瓦特蒸汽机的发明者。——译者注

[3] 萨拉匹斯（Sarapis 或 Serapis）：埃及－希腊宗教所奉祀的神。——译者注

问，经济起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是回顾过吗，公元前约 100 年它缺少机遇。

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希腊文明

我们在上文先讲了科学的基本道路。可是，古希腊文明其他方面使我们感兴趣的还有许多题目，哪怕是罗马将仿效晚期的希腊，结合其本身生活使之得以延续。

在雅典，那几个世纪，当然不是彻底的黑夜。同样敏锐、精巧的精神，同样人性化的运动，同样壮观的环境，在比雷埃夫斯[1]港的同样活动，它们始终在发挥着作用。雅典作为大学城，看到年轻的富有者跑来居住。雅典也是哲学思想当仁不让的首府。柏拉图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创办的吕克昂学校始终“学生”不断。泰奥弗拉斯托斯和斯特拉顿继亚里士多德之后主持吕克昂学校。有谁没看出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特征呢？随着芝诺、伊壁鸠鲁、皮朗，出现了新的、强大的哲学潮流。

相反，逐渐失去光辉的，则是古典悲剧及其合唱与诗歌。流动的剧团大概继续在欧洲的和亚洲的希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演出欧里庇得斯的剧目。然而悲剧终止了创新。在剧场里幸存下来的只有喜剧，它吸收日常生活的场景，面目一新。米南德[2]忠于雅典，拒绝接受托勒密九世[3]使人得意的邀请，他是有名望的大师。长期以来，人们只能从（普劳图斯[4]和泰伦提乌斯[5]）译成拉丁文的片段了解他的作品。然而，自 1959 年以来，有了一部完整的剧本《迪斯科路斯》。该剧以滑稽的方式，将一个性情粗暴的、已成为恨世者的农民搬上舞台。

可是，由于亚历山大东征，希腊无限扩大。雅典不再是希腊世界的中心。帕加马、罗得、塔尔苏斯、安蒂奥克[6]，尤其亚历山大里亚同样成了

---

① 比雷埃夫斯（Le Perée）：希腊港口和城市名。——译者注

② 米南德（公元前约 342～前约 292 年）：雅典剧作家，古代评论家认为他是希腊新喜剧的最重要诗人。——译者注

③ 托勒密九世（公元前 116～前 110 年、前 109～107 年、前 88～前 80 年在位）：马其顿人埃及国王。——译者注

④ 普劳图斯（约前 254～前 178 年）：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与泰伦提乌斯齐名。——译者注

⑤ 泰伦提乌斯（前 186/185～前 161 年）：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译者注

⑥ 塔尔苏斯（Tarse）：今土耳其伊切尔省的古代城市。安蒂奥克（Antioche）：今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省会。——译者注

胜利者的对手。的确，与雅典往日辉煌同时结束的是城邦文明的优势，为聚集在梯形剧场里的全体市民创作的“露天”民间文学的优势。从今以后王宫控制了精神生活，还有图书馆及其博学者，自愿组织的对外封闭的文艺社团，学派数目已经增加、专心从事研究的学派领域，甚至有一个解释经济飞跃发展的“布尔乔亚阶层”。就是说，希腊是一个结构多元化复杂的世界。

然而，希腊思想在各处都要面对它还不理解的外部世界。它要承担帝国的使命，对外必须显示出团结一致。因此，一种共同的语言－希腊普通话（la koinè），试图取代所有的方言。这种共同语言主要来源于阿提喀方言，但又不完全是阿提喀方言。共同语言是教师的语言，几乎是散文的独特手段。

其他变化：随着公众自由的结束辩论消失了。这是必然的，因为不再有要用言谈的诡辩和力量来说服的听众了。几乎任凭人们理直气壮地编歌谣讽刺自己的老师，体味文字消遣的乐趣。消遣文字存在于博学、历史学，或开创罗马风格的虚构叙事，或者，存在于通常是影射或夸张讽刺的小短剧，这些都是古希腊雅典的滑稽剧。锡拉库萨的埃隆达斯[①]的作品是很著名的。他的作品写成简练的韵文，生动活泼地描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个奴隶贩子讲述他是如何失算的；一位母亲请求学校的老师教训她的儿子；一个拉皮条的忙着搞交易；鞋匠夸耀他自己的店铺。不用说，没什么剧情。一切全在于对话的艺术和风趣。

消遣还有打油诗、牧歌、忒奥克里托斯[②]的爱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00年可能生于锡拉库萨[③]，住在科斯，此后在亚历山大里亚），他的诗篇流散到人迹所到的城镇、迷人的乡村和吹笛的牧羊人。牧羊人本身也是诗人，他们问在科斯岛的农村遇到的忒奥克里托斯：“同行，你要去哪儿？在这正午，蜥蜴都在干燥的石墙上睡觉；美丽的云雀，坟墓的好友，也停止了嬉戏。”消遣最终还寻求冷僻的词，由熟悉内情的人保存的晦涩的讽喻，支配着亚历山大里亚诗坛的文体独创性。

艺术它也反映出希腊不为人知、浪漫或巴洛克风格，钟爱新奇。在亚

---

① 埃隆达斯（Syracusain Hérondas，?）：古希腊诗人。——译者注

② 忒奥克里托斯（Théocrite，约前310～前250年）：古希腊诗人，牧歌的创始人。——译者注

③ 锡拉库萨（Syracuse）：又译叙拉古，今意大利西西里岛锡拉库萨省的省会。——译者注

历山大里亚，如同在罗得岛或帕加马，正探求新的表现形式，它们或决心采用自然主义——否定学院式的美和单纯美——或浮华的悲怆，造成我们的巴洛克风格过分夸张；或虚情假意或矫揉造作的感恩戴德。伟大的希腊绘画，人们只会通过评论感叹，它在古典时代末期，约公元前 300 年已经转向西锡安[①]派和雕塑家利西波斯[②]，这可能成为潮流之源。可是，绘画继续享有比雕塑还要大得多的声望，绘画探求之路也像亚历山大里亚诗歌风格形成的经历那样虔诚而做作。人们可能想了解这种趋势的本源：那你就在木板或石板上画一画有立体感的饭菜之类的吧。可以想象出那就是庞培城毁灭的美术品的根源。

在庞培，绘画和镶嵌艺术是受到富人府第青睐的装饰品。在传统的宗教建筑旁，开发私宅建筑。传统的宗教建筑吸取了爱奥尼亚和多利安两个来源（多利安柔和、轻巧）。私宅建筑，在提洛已提到，这些宽敞的住宅表明，它们都有廊柱庭院、大理石雕像、浴池和精美的镶嵌画、彩绘的灰墁。城市规划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就作为一种有意识进行的艺术开展起来，而且古希腊城市规划就是应米利都的希波达姆[③]，这位比雷埃夫斯的古典建筑学家要求进行的。然而，迅速发展的大城市，即亚历山大里亚、安蒂奥克或帕加马，有助于确定既符合美学观点又具有功能性的城市规划规则。

古希腊世界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文明给我们 20 世纪的人们留下的印象是，那是建立在被征服、被奴役的人民肩上的文明，一种处在不稳定平衡状态的文明。一些东方人今天达到他们师法的文明水平，这是明显的成功。非洲人同样将达到罗马文明的水平，或昨天已达到法兰西文明的水平。但是，这些征服不能掩盖在底层还保存着战败者的语言，阿拉米语取得了很大成功。更进一步说，宗教生活维护了它的原始状态。它甚至侵犯了希腊宗教信仰，城邦神宗教消失后，希腊人的信仰对东方教派和习俗比任何时候都开放。巨大的阻力可能由此而来，久而久之将耗尽胜者文明在几百年内所做的努力。

---

① 西锡安（Sicyone）：又译塞锡安，今希腊锡吉安，位于伯罗奔尼撒北部。——译者注

② 利西波斯（Lysippe，活动时期在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雕塑家。——译者注

③ 希波达姆（Hippodamos，公元前 5 世纪中叶）：希腊建筑学家，以对称方式设计城市的第一人。——译者注

第八章　罗马成为更完整的地中海

从上面看，罗马的统治是简单化的强权；从近处看，人、现状、细节，却复杂得多。

我们尤其不要以为，庞大的帝国真像它本身那样。确实，地中海是一个机体，它试图把它沿岸各国联合起来。但终究不是海洋编织了网袋，活生生地自缚其间。

这个胜利已获得，智慧对罗马来说，可能只在于坚持孤独的地中海、它的水面和周边国家非常脆弱的表面关系？因此，还在于待在太阳身旁、靠近橄榄园、葡萄园？然而，恰恰相反，罗马却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格马尼库斯·恺撒[①]征服高卢；格马尼库斯面对日耳曼一望无际的森林，而未来的欧洲同他一起为看到他的军团退却而悲叹；阿格里科拉[②]完成对大不列颠的征服（77～84），他的女婿塔西佗[③]撰述他的战绩；图拉真[④]得到“达契亚人[⑤]的黄金”，在幼发拉底河，面对安息人[⑥]的神秘亚洲，该轮到他再次发现罗马的先天不足。

罗马各行省社会安宁，不久便积累成各自的优势，它们对罗马的策略以及在罗马国境上发生的悲剧相当陌生。古罗马皇帝的禁军厮杀，边防要塞士卒们熟悉的悲惨警报声，这一切与平静的外省有何干系。遥远的距离

① 格马尼库斯·恺撒（Germanicus Cesar，前15～公元19年）：罗马战功卓著的名将，曾任执政官。——译者注

② 阿格里科拉（Agricola，Cnaeus Julius，40～93年）：罗马将军，以征服不列颠知名。——译者注

③ 塔西佗（C. Tacite，约56～约120年）：罗马帝国高级官员，以其历史著作《历史》、《编年史》、《日耳曼尼亚》、《阿格里科拉传》等闻名。——译者注

④ 图拉真（Trajin，约53～117年）：罗马皇帝（98～117年在位）。——译者注

⑤ 达契亚人（Les Daces）：古民族名，所在地为达契亚，图拉真于101年攻占此地并建行省，今在罗马尼亚。——译者注

⑥ 安息人（Les Parthes）：伊朗北部古民族名，前3世纪建国。——译者注

使它们确信是其舒适安宁的靠山。然而，只因为受罗马束缚的地中海继续生活度日，它的心脏仍然跳动，各项文化活动才得以运转，并试图混入观念和信仰，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它们的遗迹今天仍然历历在目。罗马帝国是一个到处都有交易的场所；这个庞大的共鸣器每个声音都扩散到宇宙的四面八方；"积累"终有一天成为遗产。

古代世界的罗马化，它的军事征服同时也是文化征服——这是罗马史带给世界范围的基本主题。在此，罗马使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它的成功围绕着"我们的海"，制定出世界和帝国生活规则的时期。

一　罗马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不能轻率地说。它意味着明确的征服意愿，为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它一定要取得惊人的、长久的成功。热罗姆·卡尔科皮诺[①]在其非常成功的著作《罗马帝国主义时期》卷首的几行中提出，帝国主义一词用于罗马，仅在其古代的几个世纪。谈不上或雅典或马其顿有相同的帝国主义方式，因为它们的生命都是那么短暂。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崩溃；亚历山大帝国，在一夜之间冒出来，征服者一死，全国四分五裂。相反，人们倒可以谈论谈论波斯帝国主义。在帕默斯顿[②]，这个傲慢而过时的《我是罗马公民》人物之前以及之后，英帝国主义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同意这一界定，在第一次，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4年）之前，可能不曾有过帝国主义这词完整意义上的罗马帝国主义。在一系列长期征服之后（被征服的地方不小于整个意大利！但不像过去计算过的那样），第二次布匿战争标志着决定性的转折。就在布匿战争之后，罗马露出真面目，它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意大利的第一个统一体

就罗马统治的最初命运而言，这个长期默默无闻的城市没有任何迹象

---

① 热罗姆·卡尔科皮诺（Jérôme Carcopino，1881～1970年）：法国历史学家，古罗马专家。——译者注

② 帕默斯顿（勋爵，Palmerston，1784～1865年）：英国（三任）外交大臣和（两任）首相。——译者注

表明它会崛起称雄。与拉丁姆①的其他城市毫无区别：如阿勒贝·拉·隆格，据说，它曾是罗马的宗主国；或阿尔代亚、普雷内斯特、拉努维乌姆②、提布尔（今蒂沃利），坐落于异常富饶的土地上；或拉维尼乌姆（今普拉蒂卡），罗马传说认为埃涅阿斯③扑灭特洛伊大火后建立此城。在此（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古代祭坛上）“人们崇拜带来特洛伊的珀那忒斯诸神④以及火和住宅女神维斯太⑤，对这些神的祭祀源于希腊，如同祭祀狄俄斯库里兄弟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⑥”。

那么让我们把早期的城市放在一边吧，尽管猜想在今日的罗马曾有无边无际的房屋和愉快的生活以及圣山上的原始村镇，是历史学家少有的乐事。这些有几百个牧羊人的村庄实际上是在蒙昧时期发现的，当时怎么没激动地把它们辨认出来呢？埃特鲁斯坎人⑦创建或重建，想控制特韦尔城（古代拉丁姆的边境城市）扼守着的台伯河⑧通道，于是城市初具规模。罗马传说中的最后三位国王⑨是外来的埃特鲁斯坎人：老塔奎尼乌斯、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和塔奎尼乌斯（高傲者）。

---

① 拉丁姆（Le Latium）：意大利中西部的古代地区。——译者注

② 阿勒贝·拉·隆格（Albe la Longue）：古代拉丁姆城市。阿尔代亚（Ardea）：古代市镇，今罗马城南37公里。普雷内斯特（Préneste）：今巴勒斯特里纳（Palestrina），罗马城东部。拉努维乌姆（Lanuvium）：今普拉蒂卡。提布尔（Tibur）：今蒂沃利（Tivoli），位于意大利拉齐奥大区。拉维尼乌姆（Lavinium）：古代拉丁姆的村镇，位于罗马城南约30公里，即今普拉蒂卡·迪·马雷（Pratica di maze）。——译者注

③ 埃奈（énée）：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特洛伊（Troie）：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古代城市。——译者注

④ 珀那忒斯诸神（Dieux Pénates）：古罗马和其他拉丁系各族所信奉的住宅保佑神。——译者注

⑤ 维斯太（Vesta）：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灶神。——译者注

⑥ 狄俄斯库里兄弟卡斯托耳与波吕丢刻斯（Dioscures Castor et Pollux）：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孪生神灵，在天空中称为双子星座北河二与北河三。他们的父母为希腊宗教所信奉的主神宙斯和勒达。——译者注

⑦ 埃特鲁斯坎人（les Étrusques）：公元前8世纪出现在意大利的民族。——译者注

⑧ 台伯河（le Tibre）：发源于意大利亚平宁半岛的河流，流经罗马。——译者注

⑨ 传说中的三位国王：老塔奎尼乌斯（Tarquin l'Ancien，前616～前578年在位）：即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传说中的罗马第五代国王，某些学者认为确有其人。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Servus Tullius，前578～前535年）：传说中的罗马第六代国王。据说，他是将罗马居民根据其财产划分为不同的市民阶级的第一人。塔奎尼乌斯（高傲者）（Tarquin le Superbe，前534～前510年在位）：传说中的罗马第七代国王，某些学者认为确有其人。据说，他是国王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的女婿，在害死国王后，建立独裁政权。——译者注

根据传说，罗马于公元前509年起义反抗托斯卡纳人[①]。这次起义创建了罗马共和国，可能晚一些，约公元前470年，确定了元老院和大贵族家族、即所谓“望族”组成的执政官政府。这一事件的意义尚不能确定。一位历史学家，雅克·厄尔贡怀疑，有过罗马的5世纪吗？传说的历史中好心的谎言颂扬，短距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由很少数军队进行的毫无特色的战争。罗马在那几个黑暗的世纪，通过拉丁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latine），与拉丁姆的其他城市结合起来，每个好季节带来的单调争斗只是为了得到一眼泉水井、某块有争议的耕地、被抢走或被夺回来的牲畜。

约公元前390～前387年发生高卢人侵，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这次激烈的战争刚刚开始，在阿利亚河[②]败北的罗马军团却未能拯救他们的城市被布雷努斯的塞农人[③]夺取。然而，卡皮托利[④]抵抗，战胜者撤出，生活在拉丁同盟的单调交往中又恢复正常。重要的时期当然是公元前338年，在罗马的威胁下，同盟解体：拉丁城市被制服，可以自由制定法令的罗马，在70年内将成为意大利的主宰，这次以公元前272年夺得塔兰托[⑤]告终，还有，公元前270年夺得另一个希腊城市雷焦[⑥]。在此期间，驯服埃特鲁利亚[⑦]，夺取沃勒西尼是在公元前265年。

大概在这场令人惊恐的浪潮到来之初，在公元前343年应该提出罗马与坎帕尼亚[⑧]，特别是与庞大的卡普亚市[⑨]联合问题。由于这项联合，拉丁姆遭受挫折。卡普亚成为山区和农村移民接待点，为罗马提供了大批喜欢冒险的人，这一作用不可忽视。而在冈帕尼安居，就是遇到希腊人，与大海结合，受益于交易（货币最初的冲击证明了这一点）。更加肯定的是与萨谟奈人[⑩]，与亚平宁野蛮文化的相互撞击，一个多世纪以来，亚平宁的

① 托斯卡纳人（le Toscan）：居住在意大利中部的民族。——译者注

② 阿利亚河（l'Allia）：古代意大利的河流。——译者注

③ 塞农人（Sénons）：古高卢民族。布雷努斯（Brennus）：前5世纪，此词在克尔特语意为“首领”。后用此词称谓前390年夺取罗马的古高卢首领。——译者注

④ 卡皮托利（le Capitol）：罗马七座山丘之一，位于罗马老城西部。——译者注

⑤ 塔兰托（Tarente）：今位于意大利东部塔兰托湾的城市。——译者注

⑥ 雷焦（Rhegion）：意大利南部城市，位于墨西拿海峡，面对西西里岛。——译者注

⑦ 埃特鲁利亚（l'Etrurie）：古代地区名，今意大利托斯卡纳（Toscane）。——译者注

⑧ 坎帕尼亚（la Cappanie）：意大利地区名，位于罗马南部。——译者注

⑨ 卡普亚（Capoue）：坎帕尼亚地区的城市。——译者注

⑩ 萨谟奈人（les Samnites）：古代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山区的民族。——译者注

野蛮文化已经使下游的富饶地区忧虑不安。

罗马为此将受到长期考验，可是也会得到它的第一次众所周知的成功。罗马同意反对上游国家，不是迫使下游地区接受它把它们从反复无常的威胁中解救出来吗？罗马终于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使战斗又多次活跃起来：即前 343 ~ 前 341；前 326 ~ 前 304 年；前 298 ~ 前 290 年。这些山地战完全受制于伏兵、给养不能及时到达、迟到的联络、不合时宜的撤退。罗马军团体验到在富尔齐・戈蒂诺[1]受到的侮辱（前 321 年）。可是，罗马很早就善于使用流动的部队，组织山区封锁，有点像昨天在摩洛哥警戒布来德西巴的“叛离者据点”。总之，这是一场同迂回部队周旋的消耗战。约前 320 年占领阿普利亚不仅给罗马增添了最后一片亚平宁大平原，而且为冬季来临，大批部队从阿布卢齐高原到萨谟奈地区腹地的调动提供了周旋之地。

这是巨大的成功，但缓慢地激起反对罗马者的希望。最终，萨谟奈人、高卢人和埃特鲁斯克人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然而罗马军团（前 295 年）在翁布里亚的桑蒂努姆粉碎了这一联合。战争在当时似乎结束，实际上，埃特鲁利亚被降伏，波河平原受到侵袭，亚德里亚海沿岸被占领。现在轮到希腊城市可能不久将被迫归顺，如果塔兰托不安排一出精彩的皮洛士[2]插曲的话。插曲结束，城市降伏（前 272 年）。罗马于稍后不久（前 270 年），便占领了位于墨西拿海峡、面对西西里岛的雷焦城。

意大利——该地理名词最初系指当今的卡拉布里亚，随后扩展到意大利中部——不久系指整个半岛，名词也有帝国主义含义。

罗马为什么成功？

在征服过程中，罗马得益于它所处的中心位置，确保它内部联系便捷。从罗马修筑的大道将增强这一优势：古罗马的监察官阿皮乌斯・克罗迪乌斯于公元前 313 年开辟阿庇亚大道，通到卡普阿，稍后，到达布林迪西；连接亚得里亚的萨拉里亚大道和弗拉米尼亚大道；卡西亚大道将埃特鲁利亚分割开……

---

① 富尔齐・戈蒂诺：位于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富尔齐，今斯特雷托。戈蒂诺，今蒙泰萨齐奥。——译者注

② 皮洛士（Pyrrhos）：伊庇鲁斯国王，曾不惜惨重牺牲取得对马其顿和罗马的军事胜利。“皮洛士胜利”一语从此成为代价惨重的代名词。——译者注

可能由于它比较脆弱，罗马还曾巧妙地安排战败民族。它尽力使自己有耐性和一定的善良。对血统和语言接近它的民族，最终向他们完全开放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图斯库卢姆[①]可能是第一个接受有传说色彩的独裁者卡米耶[②]颁发的该称号的城市。对血统和语言不太接近它的民族，往往给予拉丁法律的一种半公民资格。同时在老城遗址，或截至当时尚未进行城市规划的地方，创建罗马移民地（当时已居住罗马公民），或拉丁移民地，赋予后者一定的自治权，但是权限小于前者。其他法规，同盟者即所谓"合伙人"的法规，有的同盟者从平等条约得到实惠，有的从不平等条约得到实惠。

正派的政治，我说过，有点勉强。所谓"诚信"难道不是事后创造的神话？罗马肯定小心翼翼地遵守条约文本，并使其具有道义和充分理由。然而，伪善从不缺乏计谋，它分化对手后，便专心寻找与合作者所签文件的差异之处。

中心的地理位置、机灵的政策，还有军事手段，往往并不意味着成就大事。在上述历次战争中经受锤炼的军团是获取胜利的工具。首批五个"公仆"等级的公民带着古希腊重武装步兵的重型装备、头盔、铠甲、圆盾，投人战斗；其他等级的公民使用较轻的装备、戴胸甲顶替铠甲，持长盾。最穷的人，装备差，从维依奥[③]战争（得胜于约前 396 年）以来，开始领取军饷。罗马步兵模仿萨谟奈人的投枪，使之成为古罗马的重标枪：带木柄的长型薄铁器。可以说，社会上已习惯动用军团士兵：最轻装备者，不恰当地被称为投枪手（hastati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投枪），他们组成部队的前几列；主体在第二线；第三线 les triarii，是重步兵的预备队伍。号令比希腊的灵活。罗马士兵不是肩并肩地战斗，而是一段间隔把他与临近的战士分开，相继的各行组成梅花形，后退的队列比较容易填补到后续行列。纪律是严格的，虽然他不是职业部队。每个夜晚，士兵组成防止突然袭击的营地。骑兵部队人数较少，一般由同盟方提供。

罗马最后一张重要的王牌是：在远方牵制古希腊帝王，亚历山大继承

---

① 图斯库卢姆（Tusculum）：拉丁姆的意大利人古代城市，位于罗马南部 15 英里处，1191 年毁于战争。——译者注

② 卡米耶（Camille，活动时期前 5～前 4 世纪）：独裁者，将高卢人驱逐出罗马的统帅。——译者注

③ 维依奥（Veies）：埃特鲁利亚的古城，位于罗马西北 30 公里处。——译者注

者的冲突；迦太基人[1]和希腊人在西西里的盲目对抗，好像世界上只有他们自己。罗马利用这些疏漏，制造珀罗普斯[2]的织锦，即夺得意大利。而最终，罗马强大了，自己有信心，而对希腊人和布匿人，面对西西里和地中海，其巨大的岛屿是关键。

罗马对抗迦太基：控制海洋的战争

三次布匿战争（前 264 ~ 前 241 年；前 218 ~ 前 202 年；前 148 ~ 146 年），这是在罗马与迦太基之间进行的百年之战。控制地中海立即成了一场对抗的赌注，敌对双方不死一方不会善罢甘休。

罗马占领雷焦时（前 270 年），迦太基人便在雷焦对面的墨西拿驻防。两个政治巨人——一边是统一的意大利，从波河平原到塔兰托海湾；另一边是北非，从昔兰尼加[3]到紧靠西班牙南部的今日摩洛哥——他们从狭窄的海岸两侧相互瞩目。当然这是名副其实的对手，甚至可能像先前的条约证明的那样相互沟通。但是几乎不可能把它们的争斗描写成海上强国的争斗，因为迦太基，在罗马军团笨重的士兵而前只是一个小虫儿而已。迦太基与罗马同样是筑路架桥，或从事农业的专家。而罗马，早在前 264 年，就关心海上运输。它依靠大希腊的城市，沿岸海上货运活跃。

对于海军来说，它的常规装备，三层桨战船或五列桨战船、三层或五层桨长船，迅速造成。前 260 年。冲突爆发之初，罗马有一支 100 艘五列桨战船和 30 艘三层桨战船，另加几艘其他船的舰队下水，全部在 60 天完成；前 254 年，又有 220 艘在 3 个月内下水。我们不能保证在地面上这是令人震惊的迅速，但造船确实很快，甚至对保养来说也太快了——在希腊已经如此——，因为这些船是短期使用，往往只是一个战役的时间。战争开始，有人说，意大利战船是仿造落在罗马人手中的迦太基五列桨战船。这是可能的：五列桨战船是自亚历山大进攻之前驻防在塞浦路斯和腓尼基的庞然大物。在西部希腊的所有城市中只有锡拉库萨建造过五列桨战船。但最终成为模仿它的游戏。木材供应对罗马来说不成任何问题：亚平宁半

① 迦太基人（Carthaginois）：迦太基（Carthage）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今位于突尼斯市郊区，罗马人称之为“布匿”，其居民为布匿人。——译者注

② 珀罗普斯（Pénélope）：传说中迈锡尼的珀罗普斯王朝的创立者。典故“珀罗普斯的织锦”（la toile de Pénélope）意味永远做不完的事。——译者注

③ 昔兰尼加（Cyrenaïque）：利比亚古城名。——译者注

岛还有许多森林。从布鲁蒂乌姆的塞拉山，塔兰托海湾的希腊人运来他们需要的木料。对罗马和奥斯蒂亚来说，木料沿台伯河漂浮下来。从这点看，迦太基经常运撒丁岛木料是不利的。

这些大船建造容易，却昂贵，因为只能在夏季风平浪静时，在意大利、西西里、马耳他、利帕里、埃加迪、非洲沿岸……之间短距离的航行。而且总是让船超载，承载的人员、水手、桨手、士兵——一条船多达400人，据波利比奥斯[①]所言。总之，这场战争是极其昂贵的：平等条件下开始的战争只能转变成消耗战。

公元前264年，罗马已不费劲地占领城市主人命名的墨西拿。马麦丁人[②]，令人惊讶的雇佣兵，已背叛迦太基驻军。之后，锡拉库萨的希伦[③]被迫和解，罗马人开始包围西部各城镇：前262~261年冬季期间，希腊阿格里真托被攻克；前254年，几乎10年之后，轮到迦太基帕诺默斯陷落：万余名居民沦为奴隶。在海上，前260年，一支罗马舰队败在势均力敌的利帕里人手下，但是，执政官C. 杜依·内波斯统帅的第二支舰队，由于罗马战舰向敌舰抛出四爪锚和舷梯，在米勒斯的广阔海域大胜。迦太基船优秀的指挥官发现其优势所在，被迫靠岸，把海战变成士兵的格斗，总之，变成地面战（这想必成为几个世纪内帆桨战船相遇的规则）。从此，罗马感到更加强有力地对抗迦太基舰船，甚至在非洲海岸（前256年），一支远征部队曾登陆提卜角。他们在突尼斯过冬，但来年被粉碎。不幸的长官便是执政官雷古卢斯[④]。

形势没有立即扭转向有利于迦太基方面。然而，城市在天才的首领哈米尔卡尔·巴尔卡[⑤]的手上，他在西西里死守两座驻防坚不可摧的大山：

---

① 波利比奥斯（Polube，约前200~约前118年）：又译波利比阿，希腊人，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译者注

② 马麦丁人（les Mamertins）：马麦丁一名出自萨贝利人的战神马麦斯。马麦丁人系指意大利坎帕尼亚出身的一帮雇佣兵。最初受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雇佣。后背离顾主，占领西拉殖民地墨西拿（有名梅萨纳）。当锡拉库萨（叙拉古）人封锁墨西拿时马麦丁人向迦太基求救，但后又反言，接受罗马的军援，迦太基与罗马的武装相遇，爆发了第一次布匿战争。——译者注

③ 希伦（Hieron de Syracuse，约前270~前216/前215年在位）：叙拉古僭主，即希伦二世。——译者注

④ 雷古卢斯（Regulus，活动时期前3世纪）：罗马将军和政治家，两度当执政官。前255年，在与迦太基人作战中被生俘。——译者注

⑤ 哈米尔卡尔·巴尔卡（Hamilcar Barca）：汉尼拔的父亲，迦太基将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最后几年指挥西西里岛的迦太基军队。——译者注

巴勒莫附近的厄尔克特山和特拉巴尼附近的埃里克斯山。他的部队频繁突然袭击，战舰多次成功出击。这些小规模的战斗使局势变得不利于罗马。罗马共和国不是已经损失700艘战船，而暴风雨危害到海盗船和布匿人的舰队了吗？于是，迦太基人决定重拳出击，庞大的舰队下水。然而，罗马和希腊人于前241年，在西西里岛西端埃加迪群岛海域，以惊人之力一举粉碎了迦太基舰队。

在迦太基，失败导致汉农[①]与求和派掌权。罗马便迫使他们接受苛刻的媾和条件。西西里岛被放弃给罗马，罗马随即利用迦太基内部的极端困难，令其交出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迦太基被削弱，且忙于应对利比亚的暴动，以及叛乱的雇佣兵（大批迟到的士兵所致）发动的不可调和的战事，迦太基迫不得已接受罗马条件，只获得在意大利招兵和装载小麦船的权利。

然而，西西里失败，粉碎雇佣兵叛乱之后，哈米尔卡尔·巴尔卡率其残部于前237年来到西班牙。由此开始了傲慢豪华的巴尔卡家族对西班牙的征服。这次作战旨在控制瓜达尔基维尔河流域，进而控制卡斯图罗高原，与地中海连接（即稍后的奥古斯塔大道的行程）；固守利凡得[②]，在此，哈米尔卡尔的岳父哈斯特鲁巴[③]创建新迦太基—卡塔赫纳。在罗马的要求下，迦太基人必须保证，在前226或前225年，不越过埃布罗河因而未接触到经马赛驻扎在今卡塔卢尼亚沿海地带的部队。尽管如此，从瓜达尔基维尔河和卡塔卢尼亚沿海地带两条主线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确保迦太基直接拥有西班牙的贵金属矿藏，并可参与开采。卡塔赫纳铸币在以后每年日交纳银锭达300法国古斤。甚至在迦太基，漂亮的硬币，带有马、象精美动物图案，是富足时期的证明。

可是，在前231年，哈米尔卡尔在会见当地人时被杀；10年后，哈斯特鲁巴被刺杀。他的外孙、哈米尔卡尔之子，汉尼拔[④]被军队拥立为统帅，

---

① 汉农（Hannon，活动时期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为迦太基贵族的亲罗马派首领。——译者注

② 利凡得（le Levant）：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地中海东部诸国的通称。用于小亚细亚沿海地带和叙利亚，有时也包括希腊和埃及之间所有沿海地区。——译者注

③ 哈斯特鲁巴（Hasdrubal，公元前？～前221年）：迦太基将领，协助哈米尔卡尔在伊比利亚半岛征服当地的部族，建立新迦太基城——卡塔赫纳（Nouvelle-Carthage，Carthagène）。——译者注

④ 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182）：迦太基人，26岁被任命为军队统帅，一生与罗马共和国为敌。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译者注

开始了神奇的生涯。

事实上，无论罗马，还是迦太基，均未解除武装。每一方始终窥伺、畏惧另一方。罗马在撒丁岛和科西嘉岛遇到严重困难，当地的山民像萨谟奈人一样粗野。罗马在意大利北部遇到的困难还更严重，在那儿，罗马一度犹豫之后，于前225年干预高卢人。6年后，罗马建立波莱尚斯和克雷莫纳拉丁殖民地，但其基础脆弱：殖民地本身纵容波希米亚人暴乱。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并未因此而放松备战。

谁出第一拳？是汉拔尼，他强占萨贡塔[1]，公元前218年4月越过埃布罗河的罗马舰队不是集结在利利巴厄姆（古西西里城市），事先占据马耳他，抢先登陆非洲海滩吗？前218年9月，汉拔尼已越过阿尔卑斯山（无人知晓通过什么具体路线），正率领不足3万的步兵进入波河平原；前218年12月，他取胜泰辛河；前217年1月在下雪的一天，他在特雷比亚河成为得利者；6月23日，在埃特鲁利亚的特拉西梅诺湖附近消灭罗马人；虽被罗马独裁官费边·马克西姆斯[2]困扰，他却乘机于前216年8月2日在坎尼[3]获其一生中最伟大的胜利。然而由于难以理解的原因（没有足够的兵力，没有当代的器械）他未能进军罗马，却耽搁在“委身”“第二个罗马”卡普亚的安乐之中。随后几年仍然预期得到数次战功（从前213年~前209年，掌握塔兰托），但是，被束缚在意大利南部，未得到迦太基的足够支援。前207年，汉拔尼兄弟哈斯特鲁巴[4]从西班牙带给他物资援助，在梅陶罗河[5]战败，确定了他的命运。

从那时起，汉拔尼逃亡到布鲁蒂乌姆（上卡拉布里亚），在此坚持整整几年时间，他被罗马军团围困，如同其父昔日在埃里克斯山坡一般。在那几年间，罗马给予决定性打击：卡塔赫纳于前209年被攻克，西庇阿[6]

---

① 萨贡塔（Sagonte）：古代地名为塔拉戈纳（taragonaise），位于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译者注

② 费边·马克西姆斯（Fabius Maximus Cunctator, Quintus,? ~前203年）：罗马统帅、政治家，他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提出的推延战术，后称为“费边主义”，即缓步前进或谨慎小心的代名词。——译者注

③ 坎尼（Cannes）：今法国戛纳。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坎尼战役被军事历史学家当作运用双重包围战术取得胜利的一个古典范例。——译者注

④ 哈斯特鲁巴（Hasdrubal,? ~前207年）：迦太基将领，哈米尔卡尔次子。——译者注

⑤ 梅陶罗河（le Métaure）：位于意大利中部，流入亚得里亚海，梅陶罗河战役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转折点。——译者注

⑥ 西庇阿（Scipion，前185/前184~前129年）：又译斯齐比奥，罗马名将。——译者注

在非洲登陆，汉尼拔被召回国，扎马战役（前 202 年）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来的定局。

历史学家的一桩公案

在公元前 148 年，在迦太基毁灭后两年结束的冲突，第三次重新爆发，它提出太多的问题，以致引起最激烈的争论。为这桩公案，希腊给我们提供了一位最重要的、史学界的，也是最优秀的证人：波利比奥斯[1]。波利比奥斯于前 210 年或前 205 年生于阿卡狄亚的迈加洛波利斯，扎马战役时（前 202 年），他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但是，在前 146 年，他跟随他的朋友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参加摧毁迦太基战役。波利比奥斯这位迈加洛波利斯有影响的政治家之子，他奇特的生命曲线是，在其青春时代，已经站在"最后一个希腊人"菲洛皮门[2]一边为古希腊的自由而积极参加反抗罗马的活动。因此，前 167 年，波利比奥斯最终同几千名彼得那[3]战役后流亡到意大利的亚该亚人人质来到罗马。但是这个流亡者被罗马的大都市气派所慑服，在罗马生活整整 16 年，期间，他经常出人西庇阿府第，成为西庇阿的莫逆好友。

波利比奥斯的《通史》记叙前 264 年以来的事件，从第一次布诺战争开始（当然写得像引言）到前 146 年迦太基毁灭。比记叙更加珍贵的是作者非常熟悉情况，极端聪明，关心全局，他的希腊人的经验使他反思罗马扩张现象。他认为，罗马的得胜如同命中注定，它来自于自然规律。如果不反对这样说，那么，为什么古希腊的命运没有与自然规律结缘呢？波利比奥斯尽力说服他的同胞和西庇阿一家，后者是一个荣耀世家的继承者，他们当时已接受希腊文化及其教训。

波利比奥斯著作的核心是理性地对待罗马的帝国命运。对西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觉察到帝国主义和非正义战争的危害，更确切地说他们在争论这场长期冲突的责任问题，罗马在冲突后已不同于以前。如果前 218 年的关系破裂是汉尼拔造成的，那迦太基应该承担战争罪吗？罗马帝国主义

① 波利比奥斯（Polybe，约前 200～约前 118 年）：又译波利比阿，希腊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以《通史》40 卷确立其不朽名声。——译者注

② 菲洛皮门（Philopoemen，约前 252～前 182 年）：亚该亚联盟的将军。——译者注

③ 彼得那（Pydna）：马其顿古城，位于塞萨洛尼克湾，彼得那战役（前 168 年）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战胜马其顿的决定性战役。——译者注

只是对迦太基帝国主义的一种答复吗？我们同意波利比奥斯，认为汉尼拔攻打萨贡托（位于他与罗马签订的条约大致制止他进入的地区），可能是在有意发动战争。然而巴尔西德人（ les Barcides ）终归不是迦太基；另一方而，在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前，就有煽风点火者和好战分子，尽管罗马的政策是谨慎从事。里利贝舰队不是只为自卫而集结吗？如果他们控制海洋先于汉尼拔的攻击，那场罪恶可能不会落在罗马头上吗？最后，战争没在前218年开始，战争是在继续。而罗马人，前264年占领墨西拿时，那确确实实的是占领，虽然他们与迦太基有前306年签订的友好条约。简言之，事先在世界地图上过分地描绘出一场冲突的单方面责任归结于这个或那个敌对行为是认真的吗？

我们说，罗马和迦太基只能相互约束，互相冲突，互相猜疑。巴尔西德人——他们似乎犹豫过——如果罗马予以同意，他们可以承诺仍然作西班牙的温和主宰。对汉尼拔来说，战争是一种冒险的、是几乎没有希望的解决办法。他的家族在西班牙，15年内，如此迅速地组成一支有五六万人的军队，这是一个奇迹。可是，罗马掌握比他多一倍的兵力。把这支部队从陆路投人遥远的意大利，这简直是发疯：甚至在到达之前，将丧失一半。渡过特雷比亚河之后，汉尼拔的士兵想必重新走上山路，以避开敌人的警觉，有时困难地穿行亚平宁，多行走30公里以上。

汉尼拔曾寄希望于遭受虐待的意大利奋起反抗罗马。在对克尔特人上，汉尼拔是对的，但在对伊特鲁立亚人、萨谟奈人，尤其希腊人上，他几乎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最终宁愿把罗马人当作他们的死敌。确实曾经有过塔兰托和锡拉库萨分裂以及汉尼拔的伟大计划，打算依靠腓力五世的马其顿，但是腓力五世[①]的军队甚至未夺得亚得里亚海。

汉尼拔这位迦太基人的惟一机遇就是罗马统帅比较缺乏经验。罗马统帅不熟悉汉尼拔运用的古希腊战争艺术，他只能通过一种“心理调整”，亦步亦趋地遵循陈旧过时的经验，这可能是他重整旗鼓的秘密。因此，罗马逐步地制定出它自己的“现代”战争形式，这不是单纯地模仿古希腊战争艺术，因为罗马的“现代”战争形式具有比雇佣兵精彩表演更深刻的基础，雇佣兵的表演毕竟不是汉尼拔的表演。战争不同于古希腊的这种体育，败者迅速承认失败，不再坚持。

① 腓力五世（前238～前179年）：马其顿国王（前221～前179年）。他曾企图把马其顿的势力扩展到整个希腊，结果反为罗马所败。——译者注

公元前146年的悲惨事件

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被掠夺殆尽，甚至包括非洲（其疆土直至努米底亚国[①]）、其白银（50年内偿付50000塔兰[②]）、其舰队——迦太基似乎受到致命打击。然而，迦太基又从头开始，发展丰富的文化、葡萄种植、橄榄种植。迦太基的农业开发引起意大利大业主的不安，当时迦太基的振兴能力激起罗马的各种不安："迦太基应该被摧毁（delenda）?"

迦太基和努米底亚国王马西尼萨[③]间的一场战争，为罗马远征提供了借口。罗马远征遭遇到严酷的抵抗，但是迦太基屈服于西庇阿·埃米利乌斯的军团士兵脚下；迦太基被烧毁，被夷为平地，不幸的种子被播撒在废墟上。25年之后，凯尤斯·格拉古[④]开始重振被诅咒的城邦，城邦只在恺撒和奥古斯都时代恢复过力量和活力。然而罗马的这个迦太基，阿非利加省首府，不可与往日令人惊讶的布匿宗主国同日而语。

近东，长期追逐的猎物

自公元前200年，扎马战役之后，人们可以预见到罗马可能侵袭地中海的东方国家，这些国家从属于海洋，早已被出卖给统治者。东部所有的大城市都是沿海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罗得岛，它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商业和金融中心（白银在此地非常便宜，如这儿的贷款利息为8%，而在亚历山大则为24%）；安条克[⑤]，濒临地中海的商旅城市，它使塞琉西皇帝坚定地倒向西方；帕加马[⑥]与拜占庭[⑦]?共同守卫海峡；还有科林斯[⑧]，

① 努米底亚国（le pays numide）：北非古国名，今指阿尔及利亚北部。——译者注

② 塔兰（letalent）：古希腊的重量及货币单位。——译者注

③ 马西尼萨（Massinissa，约公元前240～前148年）：北非努米底亚国王。——译者注

④ 凯尤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公元前154～前121年）：通过农业法对罗马社会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译者注

⑤ 安条克（Antioche）：又译安提阿，塞琉古一世（约公元前358～前281年）建立。在今土耳其伊斯帕尔塔省亚尔瓦齐附近。——译者注

⑥ 帕加马（Pergame）：古希腊城市，距爱琴海16英里，位于今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镇。

⑦ 拜占庭（Byzance）：希腊非常古老的城市，公元4世纪改为君士坦丁堡。——译者注

⑧ 科林斯（Corinthe）：又译哥林多，希腊古城，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雅典西部80公里。——译者注

以及不久后再现的雅典……然而，迦太基被打败以来，地中海属于惟一的一个面向西方的大城市。

想必要发生的是，地中海的东、西方融合，它们本来是两个独立的、彼此闭塞的世界。确实，这种融合，可以说罗马帝国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事变，但是这些事变未满足人们从表面看来合乎逻辑的运动中所期待的。如果事情进展困难，它可能在事后表现得那么不“自然”吗？罗马政治的第一个粗暴行为，随着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开始，于公元前200年发生；以后几次，在前61年（征服叙利亚）和前31年（埃及稍后，更确切地说，推迟降格为罗马行省）。从公元前200年到前31年，从阿非利加人西庇阿到奥古斯都，年代间隔几乎两个世纪。

如此缓慢，会影响到其他方面，肯定关系到罗马遭到的困难，关系到最终成为地中海的经济中心。整体生活的联系没有立即围绕在罗马的周围。罗马政治于公元前167年将提洛岛改变为有大批奴隶和小麦买卖的自由市场，与罗得岛对抗，意大利商人从公元前125年，更确切说，从前100年才成批地出现在提洛岛。那布勒斯附近的布特奥利港经营利凡特贸易，在公元2世纪才繁荣起来。直到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三世[1]于公元前133年将其王国赠送给罗马（于前129年并入亚细亚省），古罗马的税吏才蜂拥而至。那么，我们不要过早地肯定这是有益于罗马的地中海统一体吧。我们不要夸大下面这些细节的影响：公元前210年一批小麦从埃及运抵罗马；约公元前170年从北非到爱琴海；公元2世纪初，航线延长，通过地中海东部海域，满足了意大利买主对扩大奴隶买卖的需要。

总之，像海克尔海姆（F. M. Heichelheim）指出的那样，价格浮动、信贷流通、金融行情、社会本身的败坏，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蔓延，从罗马直到安息帝国[2]或大夏[3]，但只是趋向而已。分化的形势甚至在相邻的地区已显现出来：在安条克三世的叙利亚发生的事不是托勒密三世的埃及极度腐败的重现。如果整体形势严重影响到地中海的经济，我们担保那不会早于公元前170、前150或前130年。

---

① 阿塔罗斯三世（Attale，约公元前170～前133年）：帕加马国王（公元前138～前133年在位），根据其遗嘱，把帕加马赠送给罗马，动机不明。——译者注

② 安息帝国（le royaume parthe）：存在于公元前247～前224年。安息（Parthie或Parthiène）大致位于今伊朗呼罗珊地区。——译者注

③ 大夏（la Bactriane）：古代国名，位于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之间。——译者注

东方，失败的责任人

约公元前200年，古希腊世界既不是摇摇欲坠的房屋，也不是卡尔斯泰德（U. Kahrstedt）所说的光彩夺目之物。古希腊手中的东方在当时可能已具有最好的机构，专制主义与“智慧”混合，城市比较独立，广阔的帝国领土的优势，它享有最活跃的货币流通体系，最大量的积累财富，最高的生活水平，最稠密的人口——这是很可能的，但是，它已处于希望之乡[1]的边缘，就是说，处于可能达到工业水平，宣布终止奴隶制度的资本主义边缘，这完全值得怀疑。而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认为某种工业革命的流产，责任在罗马的“野蛮”，即使当时它过分地摧毁、抢劫、实施酷刑。

叙利亚、埃及、马其顿三个强国分割亚历山大的遗产立即成为连年战乱，日常交往中断，闻所未闻的强暴，最糟糕的是，内战的强暴。在3世纪之初，在埃及的巨大影响，为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罗得岛、米利都、以弗所的繁荣之间的平衡，以及本都—黑海沿岸地区钱庄的商业复兴，确实从北到南形成一个活跃的轴线。而夹在三个大国之间的二流国家，则利用大国彼此的对抗，求得发展；因此，才有了帕加马、比希尼亚[2]、蓬塔、亚美尼亚、大夏等王国；因此，才有了像罗得岛和克里特或西利西亚这样迷人的城市和城市群，兴旺的海盗行径在此栖息。然而，3世纪结束时，埃及的权势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外部，因第二次布匿战争危机，可能推迟了白合金向东方的运送，使埃及丢失了意大利、西西里，甚至迦太基的广阔市场。在内部，因为公元前217年，埃及在拉菲亚（Raphia）战胜叙利亚，埃及将这次胜利归功于“埃及的”，请听好，不是希腊的，自卫队。突然，内部骚乱（民族主义的、殖民的或种族的）折磨着在近东政治活动中只是一个病人的埃及。这次衰弱出现的真空推动了马其顿菲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3]的好战政策，在匆忙和残酷的战争气氛中，进一步发展。

罗马的暴行

当时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罗马紧急暴行的原因。罗马利用在其对

① 希望之乡（la Terre Promise）：系指基督教《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者注

② 比希尼亚（Bithynie）：古希腊的行政区之一，公元前3世纪形成一个王国，靠近位于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译者注

③ 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前242－前187）：塞琉西王国国王。——译者注

面，在近东，只有马其顿和叙利亚这两个脆弱而动荡的大国的位置，立即消除它们显现出来的潜在危险。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00～前197年）的起因并不清楚，因为当时罗马刚刚结束它与迦太基的冲突。我们怀疑，元老院只是害怕菲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签订的协议，或者，帕加马、罗得岛和雅典的使团满足于说服元老院把在远方的军队投入可以避免的冲突之中，既然马其顿竭尽全力不撕毁公元前205年把它与罗马连接在一起的条约。事情从罗马看得很清楚，被抗击迦太基的斗争激发的帝国主义在稳步发展。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的伟大角色们，如一个叫P. 苏皮丘斯·加鲁斯的人，另一个叫M. 瓦莱琉斯·列维努斯的人，他们不是想要重新服役的个别人物。一种军事"职业性"已经定型：利益的诱惑，病态性的追求荣耀，过剩的军事装备带来的问题等都在起作用。任何战争都有动员问题，面罗马正有士兵，它不知道让他们做什么。

军团，受到令人羡慕的指挥，已习惯于"现代"战争，它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因为东方国家轻视教训，不改革其军队：这可能是文明国家在比它更野蛮的对手方面落后一、两场战争的命运。在库诺斯克法莱[1]，菲力五世的军队几乎一败涂地成为笑柄；马其顿立即回缩到其最初的国界内，并忍受附加的屈辱：弗拉米尼努斯[2]在伊斯特摩斯运动会上宣布希腊独立（前196年），使希腊获得自由和极小的争端。公元前194年军团放弃巴尔干。在那么多的掠夺、敲诈、杀戮之后，谁还敢反抗？然而，公元前190年，在帕加马人和罗得岛人鼓励下，西庇阿人在锡皮卢斯的马格内西亚[3]战胜人数比自己多很多的安条克三世的军队，把这位卓越的野心勃勃的"太阳王"赶到托罗斯山后。

甚至是轻面易举，那是在二十来年之后，公元前167年，攻打佩尔修斯[4]时，菲力五世的继承人，保罗斯·埃米尔，坎尼战役的败将之子，在彼得那战役[5]表现出罗马的绝对优势，他的胜利向罗马展示出空前的财富，

① 库诺斯克法莱（Cynoscéphales）：位于希腊沃洛斯以西7公里，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最后决战之地。

② 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us，约前227～前174年）：罗马将军、政治家，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的统帅。——译者注

③ 锡皮卢斯的马格内西亚（Magnesie du Sipyle）：系今马尼萨，位于土耳其西部。——译者注

④ 佩尔修斯（约前212～约前165年）：马其顿末代国王。——译者注

⑤ 彼得那战役（la bataille de Pydna）：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马战胜马其顿的决定性战役。——译者注

令人厌恶的掠夺成果。这一次，马其顿君主政体和马其顿从人间一笔勾销。

形势逆转

闪电战争和掠夺只可能由于经济生活的某种愉悦而为。被打倒在地的败将该恢复元气，使争斗和掠夺得以重演。这就是公元前2世纪前1/3时期发生的事：形势相当有利，战争创伤和财政亏空得到整治，战争赔款，不管多么沉重，却已付清。甚至埃及，疯狂的贬值，从10到1，并采用铜币制，这付猛药过后，生活恢复正常。

尽管如此，在公元前170年以后，形势逆转；小麦价格暴涨，生活水平降到谷底，社会动乱像传染病四处蔓延，并感染到远方得胜的罗马和意大利。政治可能是这些连锁动荡的责任人，这是事实。但是，经济反应也有作用。战争变得很残酷。马其顿被征服，沦为罗马的行省；罗马组建宪兵（前148年）。轮到希腊起义，它被残酷地打败，并以科林斯作榜样，无缘无故或几乎无缘无故地被夷为平地，同年，迦太基陷入火海。希腊同样沦为罗马行省（前146年），阿塔罗斯去世时（前133年），他将其王国遗赠给罗马，成为亚细亚省（前129年）。

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到处是内战，“同盟者的”或人民对人民的，它们彼此呼应，相互帮助，似乎你源于我，我源于你：在西班牙，凯尔特伊比里亚[①]反抗，于公元前154年爆发，在公元前133年围攻努曼西亚暴行之后才告结束；在北非，反对朱古达[②]的战争于公元前109年爆发，甚至在罗马都引起反响；公元前102和前101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③]迁徙到普罗旺斯，直至意大利北部；公元前91年，意大利暴乱——“同盟者的”战争——将罗马置于毁灭的境地。最终，在京城内，疯狂的对手们为了权力只断断续续的暂停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怎能获得、维持地中海世界。

---

① 凯尔特伊比里亚（Celtibères）：今西班牙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自公元前3世纪起，由伊比里亚人和凯尔特人混血的部落所占据，公元前195年归顺罗马。——译者注

② 朱古达（Jugurtha，约公元前160～前104年）：努米底亚国王（Numadie，前118～前105年在位），努米底亚为罗马时代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北部分地区的名称，包括迦太基、毛里塔尼亚以及今阿尔及利亚部分地区。——译者注

③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les Cimbres et les Teutons）：日尔曼部落，因人口过多和海水对陆地的侵蚀，辛布里人被迫从丹麦向南迁徙，后条顿人加入。——译者注

利用使罗马四分五裂的争端，同盟者的战争达到高潮，随后是苏拉[①]在公元前88年胜利的第一步，这促使他的军队挺进到罗马——本都国王米特拉达梯一连几年都是在东方各国支持下，对罗马进行报复的倡导者。公元前88年，应他的号召，一场全面战争，"本都的"反抗爆发了；它像闪电划过亚细亚省；各个城市向它打开门户，屠杀罗马人（据说，总数8万人）。随后，逐步赢得胜利，浪潮席卷爱琴海。提洛岛的罗马人被杀。马其顿的一支入侵的军队夺得色萨利；希腊中部，雅典本身起义。

停止战斗为时已晚。经过长期围困占领雅典，标志苏拉开始镇压（公元前87～前83年）。然而，其他的忧虑妨碍着苏拉继续进军：对世界的控制要归属于罗马，苏拉急急忙忙地与本都国王签订草率的达尔达努斯和约（前83年）。因此，东方各国持续不安定。甚至卢库卢斯[②]在非常艰苦的征战中也没得到安宁。庞培[③]顺利进军时，未经太多的战事，安宁才迟迟到来。公元前63年，本都老国王命令他的一个雇佣兵将自己杀死。两年后，叙利亚成为罗马行省。

可是，过去一再证明的罗马运气事实上并不是由经济形势的上升带来的。

罗马的荣耀得以恢复，不正是经济形势的好转带来的吗？因为或许从苏拉时代开始——可以肯定是在恺撒时代之前，罗马经济已经得到恢复。倘若罗马的内讧不曾如此惨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东方则心悦诚服了。

从城市到帝国，从提比略·格拉古（公元前133年）到奥古斯都（公元前31年）

罗马的内讧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以公元前31年奥古斯都的胜利告终。史学家们凭着渊博的学识，经过不断探讨，对这一幕情节跌宕起伏的历史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这一幕却出奇的单调乏味，因为人性的卑劣在这里总是占上风。在权力角逐的过程中，所有人的双手都不干净、沾满了

① 苏拉（公元前137～前78年）：罗马将军、独裁官。——译者注

② 卢库卢斯（Lucullus，约前117年～前58/56年）：罗马大将，曾参加苏拉向罗马进军。公元前69年，攻占亚美尼亚首都时，军队三次哗变，被迫交出兵权。——译者注

③ 庞培（Pompée，公元前106～前48）：罗马共和国后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将军之一。——译者注

鲜血。无论他们有多么不同，所有人最终都变得相差无几。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格拉古兄弟——首先是提比略，然后是盖约——这些高尚的人果真出污泥而不染？他们梦想着在罗马实行变革，重建小产业主阶级。但是，在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面前，在独揽大权、统治元老院和分配行政官员职务的“权贵”（nobilitas）面前，他们并没有活多长时间。这两位声名显赫的兄弟引以为自豪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护民官并未拯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他们在公元前133年和公元前123年双双被杀身亡。

而马略——公元前157年出生于阿尔皮诺姆附近——则是一个新贵族（homonovus）。公元前107年，民众派——骑士支持的罗马平民阶层——将他推上了执政官之位（这是他首次担任该职务）。在对朱古达的战争中，他脱颖而出：他将上司梅特卢斯撇在一边，独自彻底击败了努米底亚国王（公元前105年）。如果说马略以及他始终不渝（他死于公元前86年）支持的长期斗争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不是出于历史的逻辑，更不是因为马略的才干——他作为士兵是勇敢的，但作为政治家却是平庸的，或者迫于人民暴动的压力。罗马人民是以国家的施舍为生的有闲平民阶层，根本没有能力建立民主制度。

事实上，老化的罗马社会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基础。领导阶级——即由世袭贵族和平民组成的“权贵”阶层——继续执政。而在罗马周围和意大利各地，为数众多的小产业主却消失了：他们一会儿是农民，一会儿是士兵。城市平民阶层的一部分就是这一瓦解过程的结果。行政官员的职权是为“权贵”们准备的，他们充斥着元老院，分配其他的行政官员之职，并拥有庞大的领地以及大量奴隶，特别是在富庶的坎帕尼亚地区。在“权贵”阶级旁边，一个由金融骑士和税务人员组成的“中产阶级”构成了威胁，并随着金钱的新使用权而增大。总之，病态的社会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削弱了政权和制度。

最能说明问题的重大事件，莫过于军队的变化，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变成了职业军队，兵员来自穷人、无产者（capite censi）和最底层（infra classem）的人。这些人迅速控制了局势，将头领们推上权力的宝座，而头领们对我们称之为真正政治信念的东西却相当淡漠。在公元前100年，马略的部队打垮了民众派。罪状是：民众派重新推行了格拉古兄弟的农业法，并在罗马城内引起剧烈动荡。

苏拉也是一位军人，公元前82年在东方的推举下接管了他所在的部

队。他获得胜利以后，接着便是独断专行，最后走向独裁。这是不是东方式的君主政体呢？不是。苏拉在公元前 79 年退位；而一切又重新开始：厮杀在庞培和恺撒之间，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进行。恺撒也没有建立君主政体；公元前 44 年 3 月 15 日，他被谋反者刺杀身亡。屋大维对安东尼的血腥战斗结束以后，君主政体才建立起来。

事实上，这次纷争导致了东西方的潜在对抗，犹如一切又从头开始，东方奇迹般地重新获得了失去的权势。是现实还是虚幻呢？未来的奥古斯都——屋大维——代表恺撒的一统思想，代表将近乎完美的西方和仍需补充完善的东方连成一体的良苦用心——东方离幼发拉底河边境太近了。一旦条件许可，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都梦想着一个有利于他们的统一的东方。公元前 33 年，这一梦想在亚克兴顷刻间破灭了；在远未定型的若干世纪中，难道是这样的梦想推动了拜占庭帝国的崛起吗？一些历史学家持这一观点。这或许正是奥古斯都式宣传的真义所在，因为“埃及”插曲不失时机地推动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有力政权的建立。倘若安东尼胜出，他是否也会建立罗马帝国呢？

奥古斯都的功绩在于，在继承恺撒遗产的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改造，将明目张胆的做法掩盖起来。这位谨小慎微的继承者——首任皇帝，整个地中海的主人和奴隶（不仅仅是维吉尔和梅塞纳斯[①]的朋友）——将他的前任视为救世主：和平（他的座右铭是“处处和平”）、对人的尊重、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峥嵘岁月所带来的最重要的馈赠。特别是最后若干年更是达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二 超越地中海

有一天，罗马帝国主义自行停止了。从这个角度看，哈德良时代（公元 117～138 年）是关键时期。正是在那时，罗马帝国疆界的庞大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但与地中海相比差距甚远，而地中海则是帝国的基本特征：“我们的海”周围的土地。

在南部和东部，帝国受到了空旷沙漠的庇护：那就是撒哈拉沙漠和叙利亚沙漠。危险只存在于叙利亚沙漠的另一侧；在那里，安息王朝建立

① 梅塞纳斯：前 69 年～前 8 年，奥古斯都的大臣，尊重艺术。——译者注

了，然后是萨珊王朝——后者使伊朗这颗波斯帝国从未死亡的心脏重新跳动起来。而安息人在很长时间里就像远方的胡蜂，只在蜂巢受到攻击时才变得疯狂起来。然而，帝国的敌人并不封锁通往罗马的丝绸、毒品和香料之路，因为罗马有红海作为出海口，通过红海，它可以享受印度洋季风的便利。在欧洲北部，罗马感到了威胁。它拥有巴尔干半岛、意大利、西班牙，但为了确保这些大陆的安全，它试图夺取它们的边缘地带，即黑海、远方的好客海、多瑙河、莱茵河——并在这些厚重的土地上探险。在那里，往往人口稀少，一切都改变了：人、天空、庄稼、植物、河流和海洋。

这种不懈的追求是否有必要呢？当帝国最终放弃这样做的时候，是由于气馁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习惯了只索取伸手可及、比较现实的东西？在当时，这样的人口规模（至少5000万人）不可为不巨大，他们分布的空间不可为不广（因为在那里，距离难以控制）；在趋于封闭、不太结实的外壳里，他们或许生活得并不安全。而远离地中海，就是削弱自己：补给线拉长，还要面对空旷的沙漠或辽阔的海洋，以及像日耳曼这样半空旷的原始地带。而掌管这么多的边境哨卡，仅此一项就是很累人的大工程，需要反复去做。5000万人口，工作、农耕、冶炼、织布、航海、驾驭役畜，这对于军人职业是无休止的竞争。不招收蛮族辅助部队、巴尔米拉弓箭手或棕发日耳曼士兵如何戍边？

辛布里人和条顿人

在帝国建立之前，当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入侵的警报拉响时，这个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这是公元5世纪日耳曼诸部族进犯之前，威胁地中海聚居地规模最大的入侵。

大约公元前120年，一股人流离开日德兰半岛——北部是辛布里人，南部是条顿人——人流中有男人、妇女、小孩。在缓慢流动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其他部族这些活生生的障碍，冲击它们或者顺便肢解它们，并带走几块。为了寻找土地，10年以后他们来到今摩拉维亚以南的多瑙河一带；然后，他们沿着阿尔卑斯山继续前进，冲击罗马人，于公元前109年出现在汝拉省[1] 4年以后，他们到达图卢兹地区。辛布里人取道西班牙，

① 汝拉省：法国东部省份。——译者注

而后返回，在比利时重新和条顿人会合。于是，双方决定进军意大利。条顿人在奥朗日打了个胜仗，最后取道普罗旺斯省；辛布里人则取道赫尔维蒂亚①和勃伦纳山口。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地区——在汉尼拔远征结束一个世纪以后，这个地区仍然显得弱不禁风。而“普罗旺斯”在公元前120年才刚刚建立行省（Provincia），当时不过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

马略率军穿越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Aquae Sextiae）去迎战条顿大军。罗马只交给他几个缺乏作战经验的军团。条顿人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他们向东挺进，直奔“希望之乡”（Terre Promise）。6天里，他们嘻嘻哈哈、大摇大摆地从罗马人的军营前面走过，扬言“要去拜会罗马人的老婆，并肆无忌惮地问罗马人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转交给她们”。马略追上这群乌合之众，冲击他们，杀掉男人、妇女和小孩，并俘虏了3万之众。这一数字虽然可能有些夸大其词，却仍能说明入侵者数量之大。第二年，即公元前101年7月3日，马略在韦尔切利找到了辛布里人——他们穿过勃伦纳山口以后，自东向西席卷了意大利北部地区，而不是取道罗马。这一次胜仗使得意大利市场上充斥着等待出售的奴隶。

这次探险并非只给高卢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大门被强行攻破的意大利意识到了来自北欧地区的巨大威胁。“辛布里人颤栗”这一恐怖传说将在罗马世代留传。

恺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9～前50年

在动荡剧烈的日耳曼世界面前，高卢就像一个目标或者一个送上门的猎物。相对富庶的高卢大概有1200万人口（甚至1500万），乡村土地肥沃，森林浓密，城市发展，百业兴旺（毛纺、鞋业、冶金等），各部族——实际上是陆地上的大部落——你争我夺，共生共存。结果造成政治上普遍软弱，其后果不堪设想。

罗马担心的是，这样一个高卢会引来日耳曼世界的剩余人口而又无法抵御，然后将这部分人甩给地中海，正如古代疯狂的凯尔特人时代所发生的那样。而在罗马人眼里，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野蛮罢了。出于意大利的安全考虑，高卢这口饭锅必须长期就近

① 赫尔维蒂亚：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瑞士。——译者注

控制，而长发高卢（相对于未来纳博讷行省的“长袍高卢”而言）的占领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更何况意大利商人垂涎了高卢这个市场，并加强了在高卢的商品销售。　“大约公元前100年，在夏多梅扬(Ghateaumeillant)——即今天的谢尔省[①]，甚至还要往西——都能见到意大利式的双耳尖底酒瓮”。声名远扬的征服者们的勃勃雄心完成了剩下的一切。

公元前59年4月，在“三头”执政（庞培、恺撒、克拉苏）的策划下，元老院授予恺撒一项特殊任命：统辖伊利里亚和山南高卢，外加山外高卢。在元老院元老们的心目中，任命他原则上是否是为了确保阿尔卑斯山的安全——这一堵墙虽大，但已裂缝百出，并受到北欧部族活动的威胁?对于胆敢来犯者，长发高卢是否会成为一个可怕甚至致命的陷阱呢?真是个如意算盘！从公元前58年春天起，赫尔维蒂人向西运动，为恺撒提供了可乘之机。赫尔维蒂人厌倦了日耳曼人的骚扰，想到高卢寻找避难所。“恺撒避开了阿尔卑斯山的守军，取道罗讷河。于是，高卢成了战场。”行省总督还必须在高卢部族的冲突和不安中推行他的政策，以迷惑赫尔维蒂人，达到更加出其不意的效果，并以此为借口向北部地区推进。事实上，一切都将从这里演绎出来，期望中的事件引发出另一事件，同样经过事先策划。恺撒在比布拉克特击退了赫尔维蒂人，同年，他将阿里奥维斯特的斯维比人赶出了阿尔萨斯。于是，他以保护高卢为名，在高卢驻扎下来。[②]

难道仅仅是儒勒·恺撒的野心造成了这场悲剧吗？无疑，在这次探险活动中，他发现了获取荣耀和权力的机遇以及重塑辉煌——因“疯狂而蛊惑人心”的开销而受损——的手段。聪明绝顶、心明如镜只会使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但是由于政治软弱、组织松散，高卢早就受制于他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高卢不被罗马人征服，也会被日耳曼人征服，那就意味着一群又一群的人接二连三地来到这里，首先是赫尔维蒂人，紧接着是斯维比人，而后又会是谁呢？几乎可以肯定，辛布里和条顿噩梦的重演必然会招致罗马的干预。然后，又是一场征服？总之，恺撒本人受制于某种命运，而这种命运，他肯定无法抗拒。征服高卢是为了能使之有效而一

① 谢尔省：法国中部省份，省会布尔日。——译者注

② 关于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古迪诺（C. Goudineau）持批评立场，见《恺撒和高卢》，巴黎，1990年。(P. R.)

劳永逸地居于罗马和可怕的日耳曼之间。

在沉重岁月里，穿越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时——罗马军团急行军都无法克服其间的距离，在种种变故和犹豫不决中所发生的事件，恺撒征战图描绘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这里无法通过恺撒发回罗马的捷报了解详情——在这座他魂牵梦萦的城市里，有“忠实追随者”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为他效力。

公元前58～前54年间的一系列征服战经过周密部署，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一道血痕深深地留在了高卢人的身上和高卢的土地上。公元前58年，赫尔维蒂人在比布拉克特被击溃，斯维比人在米卢斯战败。公元前57年，罗马军团重创比利时诸部族，一直推进到埃斯科河和默兹河。公元前56年，罗马军队穿过阿尔莫利卡[①]低矮的森林，重创维内蒂人，战胜了他们那些坚不可摧的战船。同年，位于行省西侧的阿基坦被占领。于是，切断高卢和莱茵河以及不列颠的圆圈形成了：伤口已经开启，无法治愈。要使伤口保持灼热的印记，恺撒只需两次穿越英吉利海峡（公元前55年和前54年），两次穿越莱茵河（公元前55年和前53年）。

有人说，这些远征是过度行为。事实上，恺撒考虑得更多的不是日耳曼或英伦岛，而是高卢，必须使高卢习惯于罗马的存在，将它置于罗马的统治之下。然而，公元前54、53和52年以及公元前51年，备受奴役的高卢从内部爆炸开来。起义从中央高原开始，当时征服者还只是在高原周围转悠，未能进人：那是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悲壮时刻，亚眠的罗马军团撤退到桑斯，在戈高维亚战败。接着，局势发生了逆转：公元前52年9月底，被围困在阿莱西亚的高卢人投降。此前，他们通过一种可怖的巫术看到罗马军队在他们四周竖起土墙、栅栏、战争机器、一排排的木桩。这样几件简单的东西却展示了何等的技术优越性啊！而这种优越性正是纪律严明的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征服地中海是罗马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如果说这一点确定无疑的话，那么征服高卢、让大群生灵俯首听命则是第二件大事。高卢的人口可能是整个意大利的三倍，而罗马往往要靠这一群效忠于它的人生活。

格马尼库斯的悲剧

然而，足以确保罗马世界安宁的高卢能保护自己吗？恺撒被在莱茵河

① 阿尔莫利卡：布列塔尼的旧称。——译者注

彼岸轻松取得的两次胜利冲昏了头脑，对此深信不疑。他两次攻占一片敌人故意放弃的空地，对日耳曼“令人生畏的沃土”浑然不知。

奥古斯都临终前的计划就是受到了这一过失的启发：将帝国疆界推移到易北河和伏尔塔瓦河一线，直到东、西日耳曼的结合部为止；只要保住多瑙河，这一条边境线就可以一直延伸到黑海。首先整治的是多瑙河中游和下游地区的边界。接着，公元前 12 年，奥古斯都的继子德鲁苏斯从海路和陆路，在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发起了旨在征服西日耳曼的战争。公元前 7 年，他的兄弟提比略完成了征服。不过，16 年以后，即公元 9 年，谢如斯克人揭竿而起，瓦鲁斯军团在条顿堡林山被阿米尼乌斯击败。

这是空前的悲剧，影响深远，可以说是影响极大，如果考虑到在这一事件中，一切都与军团士兵过不去这个事实：盟军叛变、大雨倾盆、辎重过沉、士兵陷入沼泽地等。恺撒·格马尼库斯是德鲁苏斯的儿子，被奥古斯都的继任者提比略收为养子。他很快扭转了局势，重铸罗马的辉煌，掩埋了瓦鲁斯战友的遗骸，并向他们致敬。然而，公元 19 年，提比略召回了冒险王子，“频频发函提醒他回来庆祝意料之中的胜仗；相当成功，相当冒险”（塔西佗语）。于是，提比略强制推行他的“褊狭政策”。日耳曼人被击退了，而绝望的格马尼库斯在胜利后被派往东方，不久便在当地死去了（可能是被谋杀的）。

就这样，2000 多公里近乎定型的帝国疆界被莱茵河和多瑙河固定下来。后来，由于在德库玛特地区这一重要结合部组织有方，罗马承认制造了一个宿敌。罗马将日耳曼搂在了怀里。

图拉真、达契亚人和幼发拉底河

继奥古斯都的理性智慧和提比略的不安和多疑之后，图拉真需要许多勇气、单纯、热情和强烈的伟大意识才能投身于为他带来荣耀和死亡的超人的征服事业。当图拉真继内尔瓦之后在公元 98 年登基时，他已度过了漫长的戎马生涯。这个西班牙人于公元 52 年出生在意大利加（Italica），他是第一个被授予皇帝之尊的外省人。而他给帝国带来了无可置疑的辉煌，使帝国重现青春活力。

图拉真巩固了莱茵河边境，创造了城市（如克桑滕和奈梅亨），在敏感的德库玛特地区开辟道路，这些活动成了必不可少的日常事务，边境线犹如船体不断得到维修和保养。而他对达契亚及其国王德塞巴尔

(101 年～107 年在位）的干预更富有开创性。吞并达契亚[1]，将它变成帝国行省，使多瑙河拥有一个先进的码头，从而加强了它的防务。罗马将在那里建立永久殖民地，主要在东方征召殖民者；"新大陆"有待扎根和续存，而拉丁语则是它的通用语言。还有一个好处是，达契亚拥有贵金属矿，而"达契亚人的黄金"则为帝国的大工程提供了资金。其中，图拉真集会广场最为著名。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 114～117 年针对安息人的战役。幼发拉底河拐角处、美索不达米亚以及远处的伊朗是罗马帝国的薄弱地带。克拉苏在卡尔思的悲剧、安东尼的失败（古格里耶莫·费雷罗 Guglielmo Ferrero 认为，这是"一次从俄罗斯的撤退"）都是以往的天灾人祸。然而，安息帝国内部四分五裂，边境一带冲突不断，乍一看，不像是什么可怕的对手。

公元 114 年，图拉真登陆安塔基亚，到达亚美尼亚。115 年，他凭借这一桥头堡，将军团推进到美索不达米亚，并占领了大部分地区。次年，他夺取了底格里斯河上的克泰西封（Ctésiphon）和幼发拉底河上的塞琉西亚，然后向南推进到波斯湾。安息国王肖斯罗埃斯逃跑以后，图拉真挑选了一位继任人，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但是，他刚刚离开，各地就发生了零星暴乱。只有人口稀少的希腊部族欢迎胜利者，伊朗人的态度不冷不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则顽强抵抗。肖斯罗埃斯又一次出现在克泰西封一带……图拉真泄气了，只好重新返回。117 年 8 月，他死于西利西亚的塞利农特。

这次探险以失败告终。在那里，与其说罗马遭到了自然或命运的对抗，倒不如说是它智慧有限，或经验不足。为了统治亚细亚，罗马缺乏曾经帮助亚历山大征服印度河的工具——骑兵。安提奥科斯三世也是在马背上完成远征的（202～205 年）[2]，他也一直打到遥远的印度河沿岸。图拉真仅仅满足于绕过亚美尼亚的群山出其不意地攻占美索不达米亚：这是西班牙或萨谟奈[3]农民的雕虫小技。

总之，面对日耳曼和幼发拉底河，罗马都没有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

---

① 达契亚：今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一带。

② 雅典将军、作家色诺芬（公元前 430～前 355）著有《远征记（Anabase）》一书。——译者注

③ 萨谟奈：意大利古地区。——译者注

华：在日耳曼的战争或许要求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而要真正跨越幼发拉底河屏障，只有依靠马匹的奔跑来克服空间的巨大限制。自哈德良（117～138 年）的早期行为起，后果就已经变得不可避免：这位图拉真的后继者在他统治最好的年景视察并巩固了边境线；一开始，他就将图拉真开创的行省推向幼发拉底河彼岸。针对这项明智决策的反应是公元 118 年的阴谋——这场阴谋以处决图拉真的将军科内琉斯·帕尔玛和卢西乌斯·奇图斯告终。于是，一切帝国主义扩张均告完结。帝国疆域得以最终确定。从此，罗马蜷缩在微型中国长城后面，不再蚕食土地。

从很大程度上讲，扩张活动是自动停止的，好像突然没了胃口。如果说“乐观主义和尚武精神死于图拉真时代”（J.-L. 洛吉耶语），我们不要归咎于哈德良。这一政体曾经对帝国很适宜，因为帝国曾经长期存在，并沉浸在所谓的例行事务、散文、千篇一律，以及无与伦比的和平与善举中。不过，假如一切都站得住脚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难道这仅仅是因为罗马防御系统中的土木石块坚硬无比，道路畅通无阻，在五花八门的征兵及其社会机动灵活性中自行成长的军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生龙活虎、组织严密吗？即使在罗马，一旦计算出安全的代价并用禁军中的步兵支付，帝国仍然有 30 多个军团分布在配备防御工事的漫长边境线上，可能有 3 万人——一个既庞大又微不足道的数字。那么，帝国的坚不可摧同样仅仅是因为哈德良的“绥靖”政策或安东尼“虔诚大帝”的“安于现状”政策在边境另一侧遭遇人文科学的时代默契吗？

事实上，后来，当辽阔的草原地区再次躁动起来的时候——自 162 年起，来自亚细亚腹地的冲击将安息人推向西部地区，自 168 年起将日耳曼人也逼向西部，面对人潮涌动，罗马行省的边境线立刻显得软弱无力。帝国的主动权被剥夺长达几个世纪，给围绕、紧逼帝国的基础人文科学带来了好处。对罗马来说，防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为一个人员问题，人员素质问题，智商问题：同时出现 10 个、20 个、100 个问题，而所有问题都没有切实的解决方案；抑或需要奇迹发生，需要超常人物，需要像戴克里先（公元 245～313 年）[①] 那样的救星。

但是，救星们未能完成任务。从此以后，悲剧天空成为帝国命运的背景：内外交困、遍体鳞伤、苦不堪言，但又不愿意就这样死去。

---

① 戴克里先——罗马皇帝，（245～313）284～305 年在位，创立“四帝共治”制度。——译者注

三 大人物：地中海文明

罗马所向披靡，地中海则还是那个地中海。尽管地域和年代造成了巨大差异，地中海一切可想象的色彩依然存在，因为在地中海这一古代瑰宝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消失以后永远不再浮现。但同时，由于若干世纪的和平促进了交流，“我们的海”（Mare Nostrum）逐渐形成了某种统一的色调和生活。这一仍在建设过程中的文明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任何人的大人物。

潮流与反潮流

这样一种文明首先是胜利者的语言、拉丁宗教、罗马的“生活方式”。罗马军团所到之处，它们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当地人的生活，如北非——一直到塞维鲁（193～211年在位）时代晚期，被图拉真疯狂征服的达契亚，高卢——直到公元一世纪，这期间发生的不幸令人费解：“马尔斯[①]在纳博讷省打败墨丘利[②]，将他赶到阿基坦，而墨丘利将马尔斯赶到东面，并在德库玛特军事区战胜了他。”

然而，由于信仰坚定和拒绝就范，也引发了反潮流行动。在叙利亚，前希腊文化重新获得尊崇；在高卢，德落伊教避开罗马的严密监视得到蓬勃发展。密特拉神[③]崇拜在兵营里广泛流传以后，征服了意大利和罗马；圣·保罗在雅典刑事法庭上捍卫他的事业——对这些强烈渗透，又能说什么呢！拒绝就范的主要表现是：东方保持了古老的语言，而希腊语不断和拉丁语抗争并战胜了它。这就是地中海巨大的文化战场上最主要的不平衡。

共同体文明更容易渗人物质生活的各个角落。山南高卢的风帽（poenula）扣在了罗马和寒冷国家的头上；意大利葡萄酒对高卢人颇具吸引力，而高卢的宽腿长裤（braie）和织品则翻山越岭出口到意大利；希腊式大衣（pallium）只不过是一大块单肩披挂、缠在腰间的毛织布，却成了许多罗马人特别是哲人的服装；至少，提比略流放到罗得岛以后对此爱不释手。同样，厨师们相互交换菜谱和佐料，园艺师则交换种子、插枝和接

① 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译者注
② 罗马神话中的商神。——译者注
③ 波斯神话中的光明之神。——译者注

枝。长期以来，地中海曾经为这类交往提供了便利，但是帝国的无限权威确立之后，壁垒消除了，一切得以加速进行。

格局趋向均一

在一篇简短生动的文章中，吕西安·费布弗尔（Lucien Febvre）曾设想(1940年）“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见到当今地中海农民时深感惊讶的情景。老普林尼[①]生活的时代（23～79年）要晚若干世纪，让他感到惊讶或许要更难一些。

不过，他既不知道原产于澳大利亚的桉树，也不了解美洲大陆的馈赠(在发现该大陆之后)：大椒、茄子、西红柿、喜好四处蔓延的仙人掌、玉米、烟草以及各种各样的观赏植物。然而，只要稍加思考他就会知道，植物和精巧的接芽只希望“旅行”，而地中海曾经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地区。一切都途经地中海，通常是自东向西。普林尼是这样描述的：“在卢库卢斯打败米特拉达梯（公元前73年）以前，意大利没有樱桃树。米特拉达梯最先将樱桃树从本都带到意大利，在120年间，樱桃树漂洋过海，一直传播到布列塔尼。”在普林尼时代，桃树和杏树刚刚传播到意大利：桃树可能源自中国，途经小亚细亚；杏树源自突厥斯坦。胡桃和扁桃从东方引入的时间也早不了多少。榅桲无疑要古老一些，来自克里特。栗树是小亚细亚的馈赠，时间要晚很多：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不知道有此物。

在这些“旅行家”中，最古老的有随处可见的小麦（以及其他谷类作物)，弯曲的葡萄和生长期长、结果缓慢的橄榄树；它们一直都留恋地中海风光，人们很难想象它们会移情别恋。橄榄树源自阿拉伯和小亚细亚，被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带到西部地区，由罗马人传播开来。普林尼写道：“今天，它（橄榄树）已经翻越阿尔卑斯山，抵达高卢和西班牙的中心地带”，换句话说，它经过长途跋涉，越过了安家落户的最佳地点。人们甚至曾经在英国尝试种植橄榄树！

自从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热衷于“朗布鲁斯克”的那一天起，葡萄园也一度随处可见，不论是多雨、多风还是霜冻地区。“朗布鲁斯克”是一种野生葡萄，果实微甜，原产地可能在外高加索山脉。农民的辛勤劳动，饮酒爱好者们的口味，土质的神奇变化以及小气候游戏在地中海造就了数百

① 老普林尼：罗马作家，著有《博物志》。——译者注

种葡萄。种植方式多种多样：搭葡萄架、像爬行植物一样任凭在地上生长或缠绕在树上、攀缘小榆树乃至高大的杨树（坎帕尼亚）。除了一长串名酒的名称，普林尼不停地列举葡萄的种类及其种植方式。他同样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各样的小麦，它们的比重，它们提供的面粉，还有大麦、燕麦、黑麦、蚕豆、鹰嘴豆对人和动物的价值。

油、葡萄酒、粮食和豆类作物，这就是完整或几乎完整的地中海人的日常食谱。假如我们再想象一下畜群——意大利南部夏季在山中放牧的羊群川流不息，将塔兰托变成了羊毛包裹的城市，假如我们在这幅复原画中胡乱放上黄杨、金字塔形的柏树——普路托[①]的丧葬树——和果实有毒的紫杉（“很少有绿色的、纤弱的、忧郁的”），我们就可以和普林尼一道设想出地中海平原和丘陵地带的古典风光。为什么不呢？像他那样，舍弃埃及或阿拉伯的各种香料，而钟爱坎帕尼亚橄榄花和野玫瑰醉人的芳香。

对这样的地理状况加以解释是非常必要的：罗马社会依靠农业经济生存，它遵循的原则将延续许多世纪，直到不久前的工业革命。经济行业分工的结果是，将生产粮食的重活留给了贫困地区，将葡萄、橄榄和养殖的好处交给了富人，因此有了先进经济体（如意大利）和落后经济体（如北非或潘诺尼亚）之分。后者比前者发展要均衡些，在经济萧条时期所受的影响要小些。于是，当在某某地区，繁荣倾向于这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时，所谓的“发达”和“欠发达”的界线就显现出来：只有当工业、资本主义、人口数量等因素真正推波助澜时，当自由竞争机制真正确立的时候，这条界线才真正形成。

城市和技术

城市乃罗马帝国的特点：有老城市——像希腊城邦那样，它们为罗马树立了城市化的样板，并日臻完善，也有新城市，主要在西方兴起，往往远离地中海。这些城市是按照罗马帝国的形象建造的，都是将一系列文化遗产照搬到远方的方式，总是千篇一律。在仍未开化的诸部族中，它们记录了渴望发扬光大和互相融合的文明的发展历程。为什么这些城市如此相似，不论何时何地，总是遵循同一个模式，这就是原因之一：在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哪些城市比军事和商业城邦更具有“罗马风

①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冥王。——译者注

格”呢?

无论哪座罗马城市都依靠坚固的石头路生存,这些路是为役畜和负责辎重(impedimenta)的士兵们修建的。每一座城市都冷不丁突然出现在道路的尽头,四周是乡村,犹如大海中的孤岛。简陋的小屋、脏兮兮的客栈、嘈杂或臭烘烘的手工店铺、马车停车库以及驿站,这样的郊区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司空见惯,在坎帕尼亚的庞贝和努米底亚的提姆加德则没有。而且,在罗马的道路上没有马车,没有驿站(除非传递皇家邮件),城市工业还没有泛滥到附近乡村。手工业位于市内,有时集中在同一条街道上:面包师、剃须匠、织布工、咖啡餐馆服务员……在庞贝,咖啡餐馆是各式各样的“快餐馆……在那里,人们匆匆忙忙地站着吃东西……房间按小时出租”。在市内的某个面包店前面,我们这些参观者不会有身处异乡的感觉:工具和手势一直流传至今。如今,在每一个村庄里,依然能见到古罗马式的铁匠铺,里面有火炉、鼓风机、钳子(用来夹取烧红的铁)、铁砧等。在罗马雕刻或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中,缩绒工用的桶或呢绒剪毛工的技艺如出一辙。

在起重器具(起重架或起重机)、采石工艺、用来加工圆柱的车床面前,站在仿佛当今时代建造的砖墙面前,也有同感。不过,焙烧砖在希腊的全面流行,则要等到公元前 3 世纪;在罗马,则还要晚两个世纪。这是一种昂贵的材料,一定生活水平的标志。

混凝土技术这一伟大创新,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 2 世纪。起初,混凝土(opus caementicium)只不过是沙子、石灰和碎石的混合物;后来,白榴火山灰(从波左利附近开采来的火山灰,可制作上好的水混凝土)或砖块碎末取代了石灰:这就是众多皇家建筑典型的淡红色砂浆。这种混凝土在模板中浇注凝结而成,操作简便(哪怕是在水下);凭借这种材料,罗马人快速并以较少的费用修建了全新风格的大型建筑,拱穹规模在当时史无前例。去掉模板,铺上一层石头、大理石、马赛克、灰墁乃至砖块,就足以使这种已经“批量生产”的材料大放异彩。在无数城市建筑中,混凝土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些市政建筑的布局千篇一律。在用大石板铺就的长方形集会广场旁边,矗立着卡皮托利三神组——朱庇特、朱诺、密涅瓦——神庙,地方元老院(元老院议员是市议员,二人执政官是市执政官)、有柱子或没有柱子的长方形大会堂——这是审判场所,也是散步者的避雨场所,假如他们

不躲到集会广场四周的柱廊下面的话。无论何时，集会广场都是一个市场（即使旁边还有一个市场），大批卖水果、蔬菜、家禽和羊羔的农夫定期来到这里。其他建筑总能见到，诸如剧院、圆形剧场、竞技场、公共厕所、公共浴室等。这些建筑占地奇大。据说，在帝国时代，它们是“罗马城邦的咖啡馆和俱乐部”。人人都泡在那里消磨一天的时光。最后，还有凯旋门、为用水量大的城市供水所必备的管道、纪念门、图书馆：所有罗马城市中的构件就是这些，平面布局几乎一成不变。

只有几个例外情况：大莱普提斯的集会广场位于城外；阿尔勒将柱廊建在集会广场的下方，犹如一排支柱；提姆加德将卡皮托利神庙建在了城墙外……这些例外是由于城市的扩张或选址地形的不便造成的，并不破坏不知疲倦地抄袭预定布局这一定式。新城市往往是由士兵和当地劳动力（数量大，但手艺一般）建造的。我们得走马观花地瞧一瞧，加快步伐。以未来的集会广场为中心，南北向划一条线（cardo），东西向再划一条线（decumanus）；这两条线在集会广场垂直交叉，构成方形城市的中轴线。在吕泰斯，左岸开放型小城市的集会广场位于今天的苏弗洛（Soufflot）街的地底下，南北线是圣雅克街，在克鲁尼（Cluny）博物馆和法兰西学院的位置曾经修建了几座公共浴室，在今天称之为吕泰斯罗马圆形剧场的地方是一座半圆形剧场……

当然，这些构件是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才集中到罗马城市的综合模式中的。集会广场是希腊城邦广场的复制品，柱廊也同样如此。剧院起初是希腊式的，尽管罗马对它进行了大幅度修改。长方形大会堂也是希腊式的：老加图修建了罗马第一座长方形大会堂，叫作巴西里卡·波西亚（Basilica Porcia）。从一开始，神庙也通过埃特鲁里亚神殿这一途径大量借鉴了希腊艺术。圆形剧场（角斗士的斗兽表演在此举行）可能起源于坎帕尼亚。公共浴室也借鉴了南意大利的前罗马风格。

总之，罗马吸收了很多东西——但这并不有损于它的地位。如果说它大方地接纳，它也慷慨地施与。这就是经久不衰的文明的命运，从希腊开始。

城市和帝国

就这样，罗马成为一个城市联合会的领袖。联合会中的每个城市都管理着各自的事务，罗马则负责管理全局事务。

这些城市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2～3世纪，接着便进入了困难时期。按照费迪南·洛特的悲观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这些城市的人口不够多。在君士坦丁堡时代以前，帝国的大型定居点只有罗马和亚历山大（可能还有安塔基亚）。由于大城市很少，二流城市往往大放异彩。提姆加德是惟一方圆好几罗马里[①]的城市，而人口最多也不过1.5万人。如果说城市的作用是政治中心和农村的市场的话，那么城乡联系并不是封闭的环状结构。换句话说，城市的手工业并未反馈到乡村，而在后来的中世纪，正是这一现象促使欧洲经济走出低谷。应该归咎于由奴隶或“殖民者”——已经成为依附采邑（glèbe）的小农场主——创办的大庄园及其手工作坊吗？是因为没有对已知能源加以系统利用吗？还是因为外部环境恶劣？——经济停滞以及后来的衰退主要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结构性原因造成的。

不管怎样，城市的命运和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这种想法没有什么不对：长期以来，帝国确保了城市的繁荣。它在大范围内实现了经济统一，或至少可以相互渗透；它推动了某种金融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频繁，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发展有限，但是已经拥有一定的资本，而这一切都是从希腊世界继承来的：商会、交易所（罗马的集会广场），银行家和商人（mercatores）比肩而立，从事信贷业务，如支票（proscriptio）、转账（permutatio）等。但是，在最后几个世纪帝国衰微之前，这些现代版本多少有点歪曲了经济形象，因为国家这个致命而无孔不入的阴影迅速笼罩了整个经济。

罗马接纳并收集希腊文明

作为政权和财富的中心，罗马毫不费力地从各种思想和艺术潮流中汲取营养；而这远在亚克兴和奥古斯都胜出之前，更确切地说，是从最早一批希腊人来到胜利之城开始的：有前来谋求职位的商人、手工艺者、知识分子，政治流放犯乃至奴隶，他们都比他们的主人高明。罗马的希腊化早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希腊语逐渐成为有教养人士的第二门语言，一如启蒙时期法语在欧洲的地位。两者的区别在于希腊语占据主导地位长达若干世纪，而不是一个世纪！

---

① 罗马里：1罗马里=1 472.5米。——译者注

诚然，希腊人的课程如此高深，学生无法超过老师的情况也是有的，甚至无法达到老师的水准。可惜的是，在科学方面就是这样；在这方面，罗马只能停留在希腊的水平上。在哲学方面也差不多如此，哲学是希腊思想的骄傲。罗马逐渐吸收了希腊的哲学教程，但并非毫无抵触。罗马官方甚至屡次驱逐哲学家。但是，在若干大家族的庇护下，哲学家们最终将产生于亚历山大死后（公元前323年）动荡年代里的某些希腊思想介绍到罗马。然而，如果说在罗马，伊壁鸠鲁学说启发了卢克莱修（公元前99～前55年），斯多葛主义必定大行其道并在马可·奥里略时代达到巅峰的话，那么我们能称之为富有独创性的拉丁哲学吗？哲学史家们一致否认这一点，并疯狂地抄袭西塞罗或塞内加的作品。

希腊艺术只是通过埃特鲁里亚或坎帕尼亚间接影响了罗马，在二世纪这是真正的发现：那是在攻占西西里诸城市，东方战役和将希腊沦为罗马行省的决定性战役（公元前146年）之后。于是，凭着财富和奢侈品，希腊一下子改变了罗马的生活艺术；当时，世袭贵族家庭接触到的只有希腊哲学。希腊或东方的艺术家蜂拥而至，为孤陋寡闻的富有客户提供服务。尽管这些客户对艺术不甚了了[①]，但他们喜欢附庸风雅，收集各种艺术品来装点房屋和别墅。处于孩提时代的罗马文明如饥似渴地将所有东西都一股脑儿地吞了下去：帕加马的伟大历史乐曲、亚历山大的矫揉造作或蓬头垢面的巴洛克艺术、平淡无奇的新阿提喀文风，乃至希腊旧古典主义的极品。大批真迹和（在雅典为西方批量生产的）赝品涌人意大利，在旧货商店里堆积如山。西塞罗向他的富豪朋友阿提库斯索要“浅浮雕，装饰他在图斯库鲁姆的别墅”。阿提库斯从雅典给庞培发回一批雕像，用于装点他修建（公元前55年）的第一座罗马石制剧院。若干年以后，在奥古斯都时代初期重建阿波罗神庙时，就采用了希腊化模式，面堆积如山的著名雕像和绘画作品全部都是希腊风格，神庙因此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博物馆。1907年，在突尼斯沿海发现一艘沉船（马赫迪耶沉船），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沉没的。船上的货物很能说明问题：60根柱子（可能是新柱子）、一批雕像、浮雕以及大理石和青铜雕刻，其中不乏货真价实的珍品。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亚平宁半岛上工作的意大利或希腊工匠们仿制的

---

① 详见《共和制末期元首制初期罗马的装饰艺术》，罗马，1981年。（P. R.）

模型。正是在那里，罗马艺术强烈地表现出独创性的一面：偏爱真实细节、写实肖像、风景画、静物——燎原之火大概来源于东方。

罗马的独创性

然而，没有一个文明能够仅仅依靠拾人牙慧生存。当罗马成为（随时准备传播的）希腊文明之都时，当它兴致勃勃地模仿的时候，罗马社会传统已经根深蒂固。令加图失望的是，罗马摒弃了一切传统；即便如此，一些古老的趣味依然引领着它，迫使它做出某些选择。当罗马对希腊的崇拜不再掺杂自卑感的时候，这些选择的意义迟早会体现出来。

还有一些迫不得已的原因。亚克兴之后，必须改造、修建、雷厉风行、不断地完工、开工。罗马目睹了越来越多的人口潮水般涌入，而罗马的城市规模和希腊城邦不可同日而语（亚历山大除外）。城市规划问题越来越突出。如果说罗马在建筑领域率先表现出个性，这一点毫不奇怪。

苏拉、庞培、恺撒、奥古斯都亲自动手干了起来。阿格里帕重新修建了城市管道设施；奥古斯都新建了三四条引水渠，他在埃斯奎利尼给恺撒的集会广场增修了一个新广场，有一道墙将广场与苏布尔（Suburre）区隔开。滑稽剧演员、角斗士、无赖和穷困潦倒的人都居住在埃斯奎利尼山冈。就这样，奥古斯都将城市的官方部分和贫民窟分离开来。前者以大理石铺地（这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在公元前2世纪尚属新生事物；卡腊腊的采石场因此得到开发利用），后者是用木头和柴泥按照老式样修建的，火灾不断。无数其他建筑接二连三地拔地而起：集会广场、长方形大会堂、公共浴室、剧院、竞技场、神庙、宫殿，乃至外形美观的高大房屋。

罗马建筑吸收、融合了一切已知的手段和构件。在罗马，多利安柱、伊奥尼亚柱、科林斯柱都经过了改良：经过简化并添加柱脚以后，多利安柱变成了"托斯卡纳柱"；"综合柱"添加了科林斯叶板和伊奥尼亚涡纹。然而，罗马建筑的强项在于工程师们的实用技术。由于混凝土的推广应用，精美的桥梁和引水渠出现了，拱门、穹顶、筒形拱顶、棱肋拱顶犹如雨后春笋；实用技术使建筑师摆脱了圆柱或支柱的束缚，使室内空间大增，而这正是用户所要求的。罗马的宏伟风格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由韦斯巴芗动工修建、图密善（韦斯巴芗之子）完工的科洛塞姆圆形竞技场（Colisée）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该竞技场创造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记录：长径188米，短径156米，周长527米；外墙高达48米，可添加一层木板；巨大的椭圆形竞技表演区长径为80米，短径为54米，可容纳5万~8万观众。高达30多米的尼禄（太阳神）巨型雕塑（Colosse）矗立一旁。竞技场由此得名。巨型雕塑已经不复存在，而竞技场（另一座巨型建筑）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在帝国疆域内，庞大的圆形竞技场不胜枚举——西班牙的意大利加（Ifalica）：长径156米，短径154米；（法国的）奥坦：长径154米，短径130米；普瓦提埃：长径138米，短径115米；利摩日：长径137米，短径113米；阿尔勒：长径136米，短径108米；图尔：长径135米，短径120米；波尔多：长径132米，短径105米；尼姆：长径131米，短径100米……

在绘画和雕刻方面，罗马艺术逐渐摆脱了希腊模式。由于希腊艺术家多如牛毛，当地风格无法迅速脱颖而出。如果将目光转向罗马以外的地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事实上，有一种民间艺术——比昂希·邦迪内利（R. Bianchi Bandinelli）称之为“平民艺术”——并非发端于罗马，而是南意大利；它在罗马的独创性方面将发挥作用。这种艺术浓重、写实，接近事物和生命；倘若一定要作比较的话，它类似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卢瓦尔河艺术。一种表现大胆的艺术逐渐获得了应有地位，可以说差不多是对外来影响的反击。但这一切是缓慢而有节制地发生的。

就这样，一种综合艺术诞生了。这是第一种“罗马”风格的艺术，如图密蒂乌斯（公元前115~前70年）祭坛的雕刻就是一个较早成熟的例子。这种艺术将希腊化风格的神话表现形式和更趋写实的场景结合在一起。不过，罗马的官方艺术长期保持了外来风格的烙印。不要忘了，梵蒂冈博物馆保存的罗得岛艺术家们的雕刻作品“拉奥孔”，罗马人对它大加赞赏，最早这样做的是老普林尼。有趣的是，在奥古斯都肖像（Porta Prima）中，奥古斯都的头和护胸甲都被安在波利克里托斯[①]“持矛者”（Doryphore）的希腊式身体上。阿拉帕西[②]的护墙板大部分乃至全部都是希

---

① 波利克里托斯（Polyclète）：希腊雕塑家，擅长人体雕塑。——译者注

② 阿拉帕西：Ara Pacis，公元前13年下令修建的和平祭坛，位于战神广场，工程历时4年。

腊艺术家的作品。

典型的罗马艺术风格体现在私人肖像艺术中。人们往往将它归因于罗马的埃特鲁里亚传统，而真实主义确实赋予了古老埃特鲁里亚的俑或青铜塑像以生命力。但是，可以更加肯定的是，它附属于罗马为先祖塑像（jus imaginis）的传统，这是世袭贵族的特权。波利比奥斯详细记录了“权贵”阶层的丧葬仪式，以及蜡面具（imago）的作用——按照祖先崇拜的传统，大家族保留着每一位逝去先辈的面具。“当一位声名显赫的亲人过世的时候，在葬礼上人们手持面具排成一长列；接着，身材和外表酷似死者的人将面具戴在脸上，他们身穿白袍、红袍或镶金长袍，分别依死者的身份而定（如果死者生前曾经当过执政官、监察官或者打了胜仗）。”这些易碎的蜡制面具是按照死者的脸型浇铸而成的，后来被形象逼真的石刻或青铜半身像所取代。希腊化的影响有时会增添自命不凡的色彩，但是罗马的肖像作品（雕刻或绘画）继承了非常古老的传统，极富表现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朴实的风格。总之，在奥古斯都时代，肖像艺术简洁的美和官方艺术（深受模仿之风的影响）的精湛技艺形成了鲜明对照。

皇家艺术不再是“文化借鉴，而是经过消化吸收以后演变成了一种新文化”。要实现这一过程还需要时间。比昂希·邦迪内利将激情浪漫的图拉真时代（大致是尼禄到马可·奥里略这一阶段）和奥古斯都时代作了对比。在这个时代，外来知识和罗马自身的成就首次相互融合，互相平衡。帕加马大大提前地预示了图拉真纪念柱的雕刻；但是，长达 200 米的装饰画卷透露出一种崭新的风格、精神和主题。环绕纪念柱的装饰浮雕是一个冗长的历史性描述：它记录了公元 101～102 年和公元 106～107 年间图拉真打败达契亚人的两大战役。场面生动、写实，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它将战争和不计其数的死者一道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值得尊敬的敌手也在刀枪下丧命。还有一个新颖之处是：招认（不过这是招认吗？）所犯的暴行，伟大探险中的小人物出场了：有士兵、车夫、架桥兵……无名英雄首次获得了荣誉。

从奥古斯都到马可·奥里略：文学声誉

艺术通常喜欢旅行，它步履轻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被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一分为二的欧洲只有一种艺

术，那就是巴洛克艺术！文学是不跨越国界的，注定更富有独创性。

在奥古斯都之前，罗马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学。罗马文学似乎突然放射出夺目的光彩。但是，皮埃尔·格里马尔（Pierre Grimal）写道：仔细一看，“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学成熟阶段”应从先前的危机阶段算起。尽管如此，奥古斯都，尤其是梅塞纳斯，出于政治原因或个人偏好，改变了他们那个时代文学的进程：梅塞纳斯本人就是一位诗人，深受神秘学说和细腻文风的熏陶；而在奥古斯都身上，追求知识的激情是无可否认的。另外，对于新制度所代表的一切——内战结束、安全、对罗马“美德”恢复了信心——难道没有同感吗？在那些岁月里，罗马涌动着一股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精神革命之潮——尽管这个词有些过时——某种（mutatis mutandis）在巅峰时期类似于法国文艺复兴（就贝莱或龙萨[①]而言）的东西。面对希腊化的东方——既惹人注目又令人担忧，在卡图卢斯（公元前87～前54年）时代，仍是新诗派青年诗人的楷模——西方、罗马、意大利的传统价值观自动被激发出来。而公众舆论的巧妙配合也帮了不少忙：罗马拥有物质霸权，它渴望获得其他荣耀。

和其他希腊化时代的君主一样，奥古斯都是一位“救世君王”。也许他还想以罗马某种宗教般的威严感和使命感的名义与伯里克利和雅典分庭抗礼？正是这种情感——而不是梅塞纳斯的影响——将他的个性赋予维吉尔、李维、贺拉斯乃至普罗佩提乌斯（Properce）的作品。维吉尔一直都是“恺撒的拥护者”，自然而然地追随青年奥古斯都。因此，当他在公元前29年开始创作《埃涅阿斯纪》时，他并非趋炎附势，而是正值生命中的辉煌之时。该作品他写了10年时间但并未完成，因为他认为作品不够完美：他要求在他去世后将作品毁掉，但未能如愿以偿。从此以后，罗马拥有了“荷马史诗般”的颂歌以及用来纪念它和奥古斯都荣耀的建筑。作为埃涅阿斯本人和维纳斯的后代，奥古斯都命中注定将主宰帝国的命运。罗马不久将拥有一部自己的历史，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完美无缺的爱国主义所付出的超过了人们的索取：尽管他的作品试图对源头给予适当的批评，但仍是伟大罗马的赞歌。然而，在帝国的学校里，教育长期坚定不移看重的是萨卢斯特（公元前85～前35年）枯燥而犀利的文风，他的《朱古达战争》和《喀提林的阴谋》，而不是这些华

① 贝莱或龙萨均为法国七星诗社诗人，后者为该社创办人。——译者注

丽的辞藻。

当然，其他作家的观点并非如此鲜明。和卡图卢斯或提布卢斯一样，普罗佩提乌斯主要歌颂他对群蒂雅（Cynthie）的热情。然而，在他临终的时候，他的哀歌体诗涉及罗马古老的传说；塔尔珀伊亚和尤立安家族（Gensjulia）的特洛伊祖先出现了，年轻的罗马妇女比群蒂雅更加尊崇奥古斯都推行的风俗改革。贺拉斯同样小心谨慎。他的出生（一名被释奴的儿子）使他感到难为情，他的过去更使他感到难堪：公元前 42 年，在马其顿，他曾经在布鲁图和卡西乌斯的共和派军队里服役。再者，他喜欢不受约束，喜欢蒂沃利附近的萨比纳庄园，并躲避当局的谄媚或报偿。不过，他也接受了一些官方订单；公元前 17 年，他给"百年纪念大会"的世纪颂歌填词。他享年 57 岁，当时梅塞纳斯刚刚去世（公元前 8 年）几星期，人们将他埋葬在其朋友的身旁。

其他人对当局完全保持沉默。提布卢斯和奥维德（公元前 43 ~ 公元 17 年）就是这样。前者乃纯哀诗诗人，后者有意识地重新创作新诗派亚历山大体的诗歌。奥维德的诗歌奔放不羁，幽默而煽情，备受罗马交际花和纨绔子弟们的青睐，后来奥维德被奥古斯都流放。在遥远黑海旁边梅西亚的托米斯，他创作了《悲歌》和《本都来书》。最后，他在那里去世。

在文学方面采纳比昂希·邦迪内利的艺术见解并重视图拉真时代，这一点很难做到。和奥古斯都时代的辉煌人物相比，应当更加重视后世的人物：昆体良、卢卡、佩尔修斯（Perse）、马提雅尔——不可思议！还有塔西佗、塞内加、佩特罗尼乌斯——这几个还说得过去。然而，杰出评论家爱弥尔·路德维希却这样认为，"罗马人伟大的一切因素在共和时期就产生了"。倘若回到西塞罗、泰伦提乌斯或贺拉斯憎恶的普劳图斯，事情也同样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按照各自的好恶来评判历史！

从康茂德（公元 180 ~ 192 年）到塞维鲁（公元 193 ~ 211 年）

在马可·奥里略去世之前，艰难时刻已经有明显的兆头，它们突出了这位哲学皇帝好战的漫长统治。所不同的是，外部安全、内部和平、各省之间和睦相处。罗马陷入经济衰退和金融混乱以后，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了。东方获得了自由，东方的宗教及其思维方式给罗马传统带来了强烈的

冲击。奥古斯都和安东尼设想的元首制这一谨慎做法已经过时了。办公室人员膨胀，皇权滑向“东方集权的习惯做法”：在残忍的疯狂中，康茂德企图让人们将他尊奉为赫丘利神。他是“自诩为世界之王和神明信徒”的第一位皇帝。非洲人塞维鲁——可能是迦太基人——谴责了这一变革。

安东尼王朝末期的艺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变化是突如其来的，尽管表现笨拙。那就是，壁画突然消失了，几乎彻底消失了。图拉真纪念柱上的浅浮雕和马可·奥里略的纪念柱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设计统一，事件按年代的顺序得到演绎，这一点很明显；而后者，则叙事凌乱，显然是由不同的艺术家完成的，对马科曼尼人、达契亚人、科第人、夸迪人的战斗充满了奇迹：雷电交加、天降甘霖为军团士兵止渴、滔滔洪水将敌人淹没……这一艺术表现手法意在制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不是单纯的再现，因而通俗易懂。在同时代的庞贝和别的地方，在某种挥洒自如的绘画艺术中，艺术史家阿默德奥·马尤里有趣地发现了广告招贴画画家的技法。

另一个例外情况是，外省艺术重新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在大莱普提斯，塞维鲁的凯旋门已经显露出拜占庭艺术的痕迹。在巴尔米拉和杜拉，一种边缘艺术，即希腊—美索不达米亚艺术出现了；它偏爱抽象的表现手法，是对原始主义的回归。这只是一些浮光掠影的看法，它们之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只是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不可避免的未来。如果说在已经拉丁化的整个艺术中出现有利于表现地区特点的例外情况，那么这一整体艺术仍然相当强大，并随着形势的变化重新出现。加列努斯（253～268年）时代就是这样，他是伯罗丁的好友。戴克里先时代亦如此，他在罗马修建了一批公共浴室，在斯普里特建造了一座宫殿。总之，全都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歪曲，但是我们和上一中世纪的拜占庭或野蛮化的欧洲依然相去甚远。

法学成就

罗马继续创造城市，使城市膨胀，将它们变成都城：特里尔、米兰、萨洛尼卡、尼肯米底亚。文学之花继续绽放。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亚绵·马塞林（320～390年）和李维难分伯仲，波尔多的奥索纳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基督教文学非常重要；在困难时期教育明显得到加强，这也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尤其是罗马法学取得了卓越成就。后世可以见证这一

点。

假如我们打开当今那些令人赞叹的罗马法教程，去查询诸如认可、义务、契约和产权这一类简单词汇的意义，假如我们试图探究法学如何与一个社会千姿百态的历史相伴相随，与之相适应，与自身的要求相适应，那么我们就会在各种艰难的解释中迷失方向。在《远古典章制度》（1967年）一书中，让·戈德梅根据社会—法学这一辩证关系，研究了罗马生活的演变过程，先后是罗马共和国、罗马上帝国，罗马下帝国，关键的是罗马下帝国。在《狄奥多西法典》（438 年）或《查士丁尼法典》（529 年），以及后来颁布的《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中，罗马法是一个经过长期酝酿的词汇，是前人成果的叠加。罗马法是日复一日、缓慢确立的，依据的是法学家编撰的习惯法、元老院法令、法官签发的命令、皇家“法令”、判例、法理等。

法学家的角色是充当法律顾问和律师，这一点是这一复杂事业中的最独特之处。罗马的智慧和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发挥，这一点再确定不过了。没有维护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法律规章，罗马就不可能适应帝国（意大利、行省、各个城市）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学的分量不断增加。能够承受这一分量的伟大法学家很久以后才出现：萨比努斯和普罗古卢斯是提比略时代的，盖尤斯是哈德良或马可·奥里略时代的（1816 年，尼布尔在维罗纳的一本隐迹纸本里发现了他的《法学总论 Institutiones》），另一位著名法学家庞博尼乌斯和他同时代。而法律教育则出现在下帝国时代的罗马、君士坦丁堡、贝鲁特。在 5 世纪，贝鲁特发挥了巨大作用：贝鲁特学校拯救了后来使查士丁尼复兴得以实现的一切。

就这样，罗马的法学财富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最后时刻，甚至还要往后。让·戈德梅写道：假如“从政治力量的角度考察罗马法律法规的遗存现象，帝国的毁灭或衰微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无疑，罗马不会彻底灭亡。罗马遗风将充斥西方。

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基督教的闯入

在罗马的衰微、灭亡这些古老的话题方面，争论将可能永无休止。奄奄一息的帝国并未在其主人的争斗和荒唐中灭亡。不再有金子，不再有白银，经济在货币范围内衰退，但是生活一直在继续。不再有纪律严明的军队，边境线纷纷崩溃，蛮族深人到罗马疆域的腹地。而总是有一些士兵时

刻准备着为罗马献出生命：在莱茵河上与米兰对峙，在多瑙河或幼发拉底河上抗击萨珊王朝的波斯人——这些可怕的新敌人出现在公元227年之后。甚至连建筑工地也不停工：罗马的巨大城墙是由奥勒利安皇帝于272年修建的。自324年起，君士坦丁将都城建在君士坦丁堡，于330年落成。让我们记住这一象征性事件：那个巨大的火炬照亮了未来诸世纪。

当然，这座城市不是仓促修建的，而是第二个罗马；由于皇帝皈依了天主教，使得这一举措更加显得意义深远。从此，地中海世界和帝国的命运步人通往拜占庭帝国长命百岁的轨道。君士坦丁在采取这些举措时很可能未曾想到这一点，这也是他事先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选择新都肯定不是为了逃避罗马的多神教环境。自戴克里先和四帝共治以来，皇帝们根本没有时间在罗马逗留。在新都内，君士坦丁得以靠近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扇不断遭受蛮族攻击、摇摇欲坠的大门。

然而，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君士坦丁堡的未来。在那里，我们这些西方人有了自己的位置，仿佛事先就已经标明。谁会对基督教脱颖而出这一巨变无动于衷呢？事实上，基督教最终获得胜利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劫难。自二世纪起，基督教卷进了酝酿已久的革命洪流，而这不只是精神革命。

162年和168年间，即马可·奥里略（161～180年）元首制初期，外部形势急转直下。帝国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宗教危机陡然出现了。无论宽宏的多神教（成千上万的神明并存）在罗马社会多么富有生命力，无论皇帝崇拜（可以说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形式）多么强烈，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多神教既没有使老百姓感到满意，也没有让精英们感到满意。于是，精英们向哲学寻求出路，老百姓则寻找能给人实实在在慰藉的、易于接近的神灵。不过，难道这种慰藉是对来世信仰的超越吗？“在二世纪，土葬比火葬盛行，而在此之前，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一点并非毫无意义。“土葬给死者保留了生前的形态。这一做法与普遍流行的来生信仰、灵魂得到永恒救赎以及身体可能复活的信念并非毫不相关”（E. 阿尔贝提尼 Albertini）。

在这里，一切都得以连贯。尽管差别社会学和差别地理学表明，由于阶级和地区的差异，答案多种多样，但是提出的问题却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被同样的焦虑所困扰。希腊哲学在罗马的复兴意义重大。那些古怪的犬儒派哲人（德美奇奥斯、俄诺马奥斯）希望成为宙斯的使者，于是四处流动，宣传他们的主张。新柏拉图主义取代了伊壁鸠鲁

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伯罗丁（205～270年）。伯罗丁是希腊人，在埃及出生，在罗马定居时已经40岁。他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学说出发点是柏拉图，但他以同样的神秘主义狂热试图调和各种五花八门的思潮。

更加混乱的运动昭示了这一深层危机。于是，特异功能者和奇迹制造者纷纷以提亚纳的阿波罗尼奥斯的形象出现。阿波罗尼奥斯在97年前后死于罗马，但是他的生平和奇闻佚事为菲洛斯特拉托斯（卒于275年前后）的小说提供了素材。小说主人公宣扬太阳崇拜，制造奇迹，终止瘟疫，治病救人。这部小说的成功是一次测试。对凡人施加影响，这样很好；对神灵施加影响，无疑更好。不过，通神术就是这样自诩的，江湖骗子和有宗教幻象者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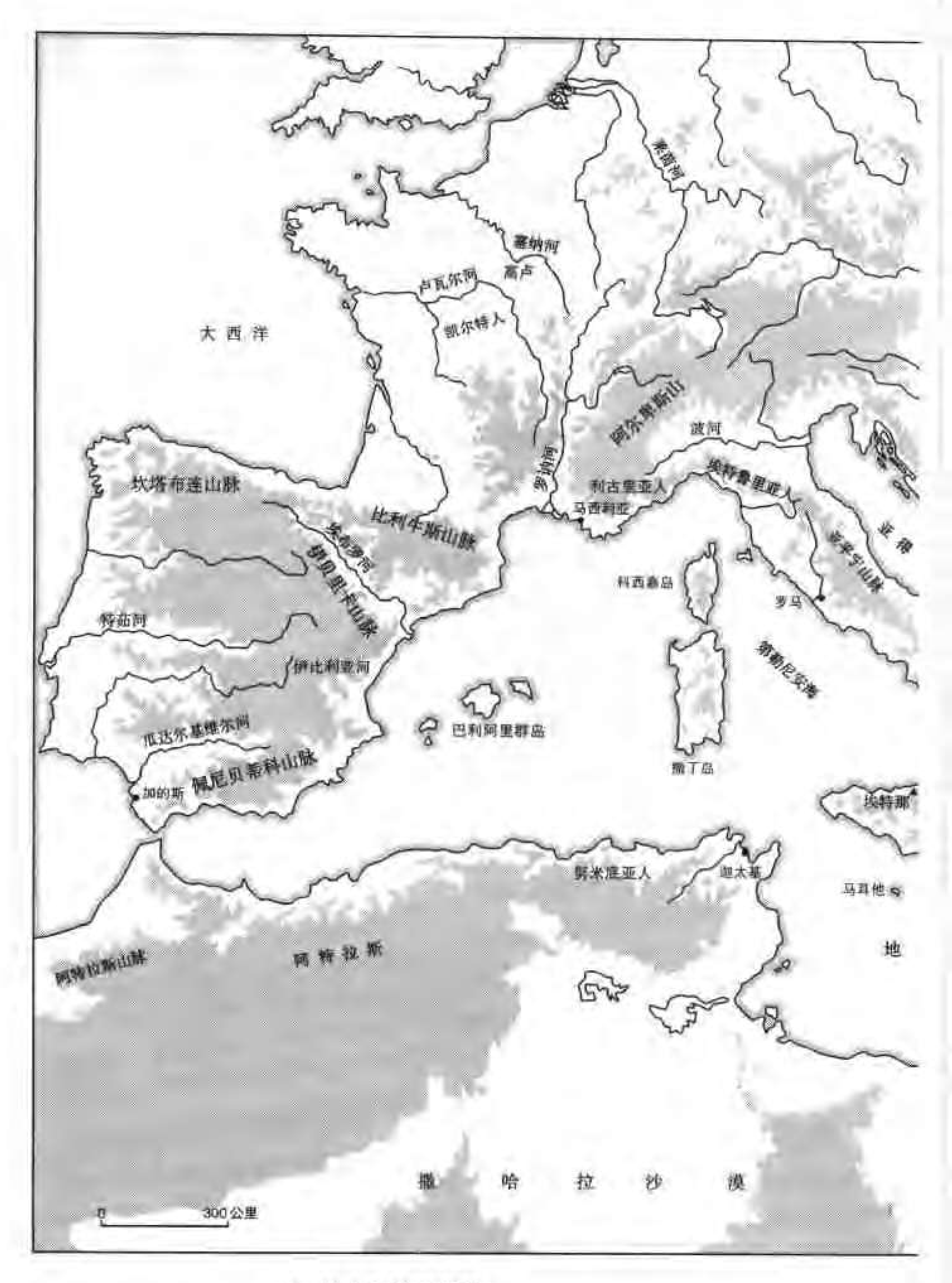
东方崇拜在西方声誉日长的现象就是在这种氛围下产生的：伊希斯、库柏勒、阿提斯、密特拉神崇拜，基督教信仰迅速占领了各自的地盘。在这次扩张中，穿行于帝国各地的士兵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东方的商人小，后者是犹太人或叙利亚人，随处可见。但是，在这类角逐中，皇帝及其近臣的影响巨大。倘若没有某些皇帝的强烈愿望，库柏勒神、密特拉神及其血腥洗礼不可能扩张到如此程度。

长期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同样如此。倘若没有君士坦丁的决定，它的命运又会怎样呢？费迪南·洛特写道："试想，假如法兰西国王情愿皈依信徒不多、以虔诚的热情反对'宗教狂热'的新教，毁掉或废弃王国中最受崇拜的神社，圣·丹尼斯修道院、兰斯大教堂、圣·夏佩尔教堂的圣化仪式——荆冠加冕，我们将无法想象出四世纪皇帝们的荒唐之举。"

然而，如果不与罗马政治、罗马社会乃至罗马文明和解，基督教就成不了国教。罗马的地中海文明由基督教青年负责。结果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基础性、结构性妥协。远古文明正是以这样的面孔和信息流传至今的。①

① 本书时间跨度很大，没有做出总的结论。乍一看有些惊讶：原因是在整个专集中（见"编者前言"），本书是第一卷，直接和第二卷相衔接。第二卷讨论的是拜占庭帝国，由另一个人撰写。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他的结论显然应当和第二卷的引言相一致。于是，专集放弃后，结论也就悬而未决了。——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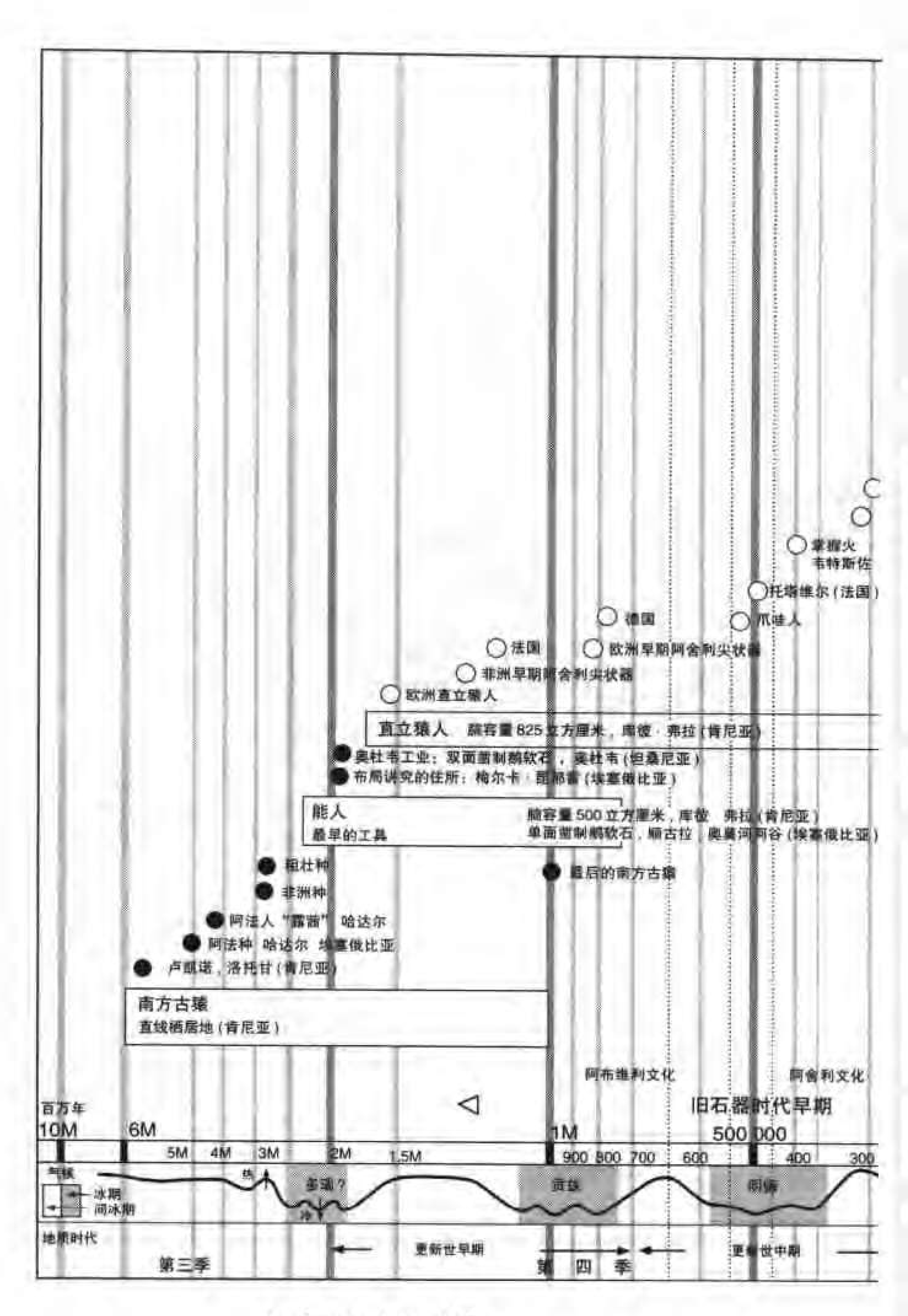
地　图　集


大西洋
莱茵河
塞纳河
高卢
卢瓦尔河
凯尔特人
阿尔卑斯山
波河
罗讷河
利古里亚人
马西利亚
埃特鲁里亚人
亚平宁山脉
罗马
科西嘉岛
第勒尼安海
坎塔布连山脉
比利牛斯山脉
埃布罗河
伊贝里卡山脉
塔霍河
伊比利亚河
瓜达尔基维尔河
佩尼贝蒂科山脉
加的斯
巴利阿里群岛
撒丁岛
埃特那
努米底亚人
迦太基
马耳他
阿特拉斯山脉
阿特拉斯
撒哈拉沙漠
0
300公里

1. 地中海地理环境



斯基泰人
高加索山脉
好客海
多瑙河
本都山脉
拜占廷
色雷斯
哈利斯河
赫梯人
色萨利
安纳托利亚
弗里吉亚人
爱琴海
吕底亚
门德雷斯河
维苏威
品都斯山脉
科孚
伊奥尼亚群岛
雅典
伯罗奔尼撒半岛
基克拉迪群岛
罗得岛
伊奥尼亚海
科林斯
西西里岛
塞浦路斯
西顿
提尔
克里特岛
耶路撒冷
中
海
昔兰尼
瑙克拉提斯
利比亚人
埃及
孟菲斯
西奈半岛
昔兰尼加
法尤姆
尼罗河
红海
利比亚沙漠



掌握火
韦特斯佐
托塔维尔（法国）
德国
爪哇人
法国
欧洲早期阿舍利尖状器
非洲早期阿舍利尖状器
欧洲直立猿人
直立猿人 脑容量825立方厘米，库彼·弗拉（肯尼亚）
奥杜韦工业：双面琢制鹅软石，奥杜韦（坦桑尼亚）
布局讲究的住所：梅尔卡·孔图雷（埃塞俄比亚）
能人
最早的工具
脑容量500立方厘米，库彼·弗拉（肯尼亚）
单面琢制鹅软石，顺古拉，奥莫河河谷（埃塞俄比亚）
粗壮种
非洲种
最后的南方古猿
阿法人"露茜"哈达尔
阿法种 哈达尔 埃塞俄比亚
卢凯诺，洛托甘（肯尼亚）
南方古猿
直线栖居地（肯尼亚）
阿布维利文化
阿舍利文化
旧石器时代早期
百万年
10M
6M
1M
500 000
5M
4M
3M
2M
1.5M
900
800
700
600
400
300
气候
热
多瑙？
冷
贡兹
冰期
间冰期
民德
地质时代
第三季
更新世早期
第四季
更新世中期

2. 史前各时期年代表

微[illegible]石器
拉斯科
阿尔塔米拉（西班牙）
封·德·高姆（法国）
形象艺术
克罗马农人（法国）

现代智人

圣塞泽尔和费拉西（法国）
的尼安德特人头骨
摩洛多瓦恶劣环境中的早期设施
尼安德特人（德国）

智人
早期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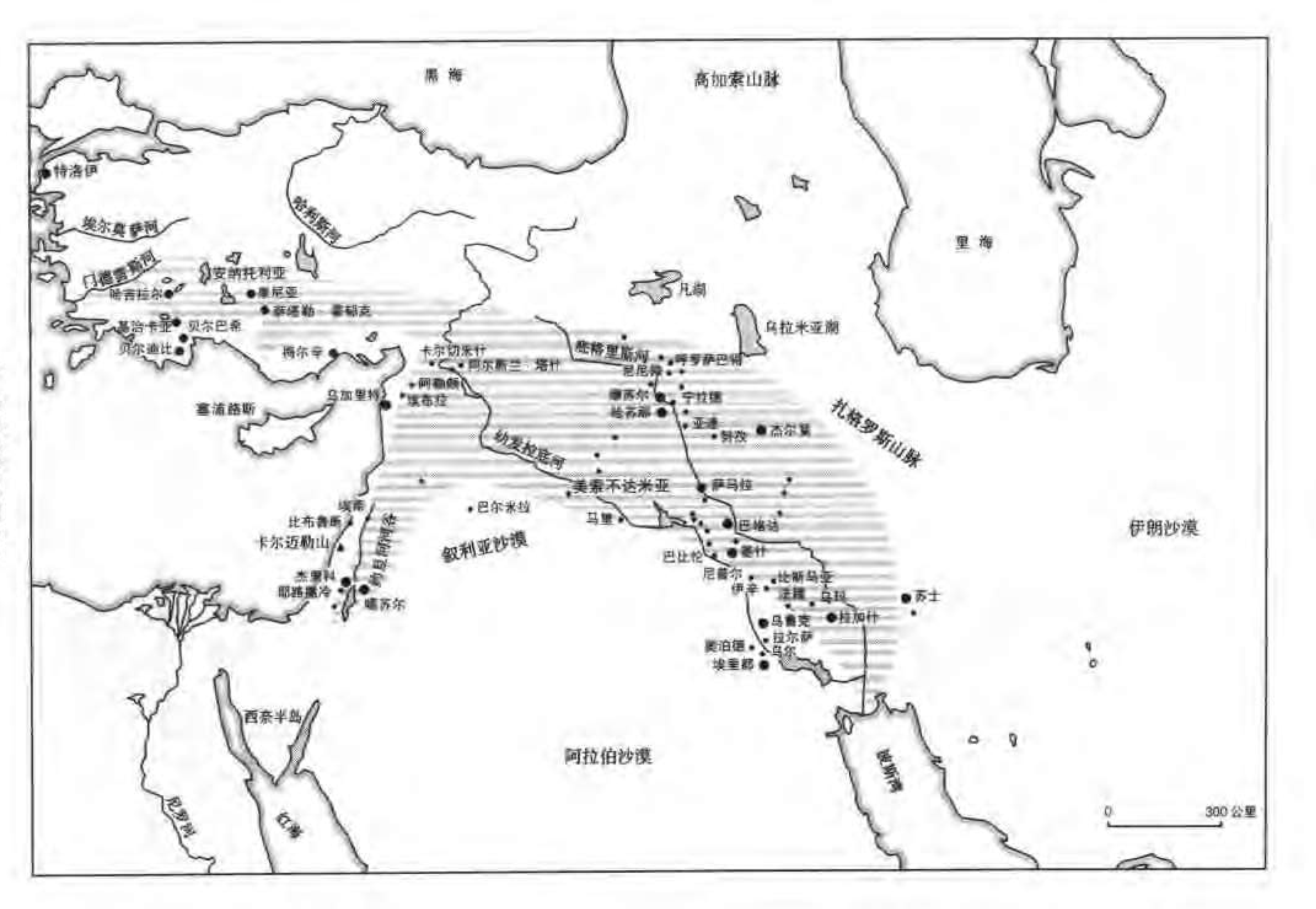
热罗纳（西班牙）

窝棚
阿舍利棚（尼斯）

斯万斯孔博（英国），佩特罗拉纳（希腊），
斯泰因海姆（德国）的前－尼安德特人化石
斯万斯孔博 佩特罗拉纳 斯泰因海姆
）北京人（北京）
锌猫 托[illegible]尔巴（西班牙）
尼斯（法国）
洛斯（匈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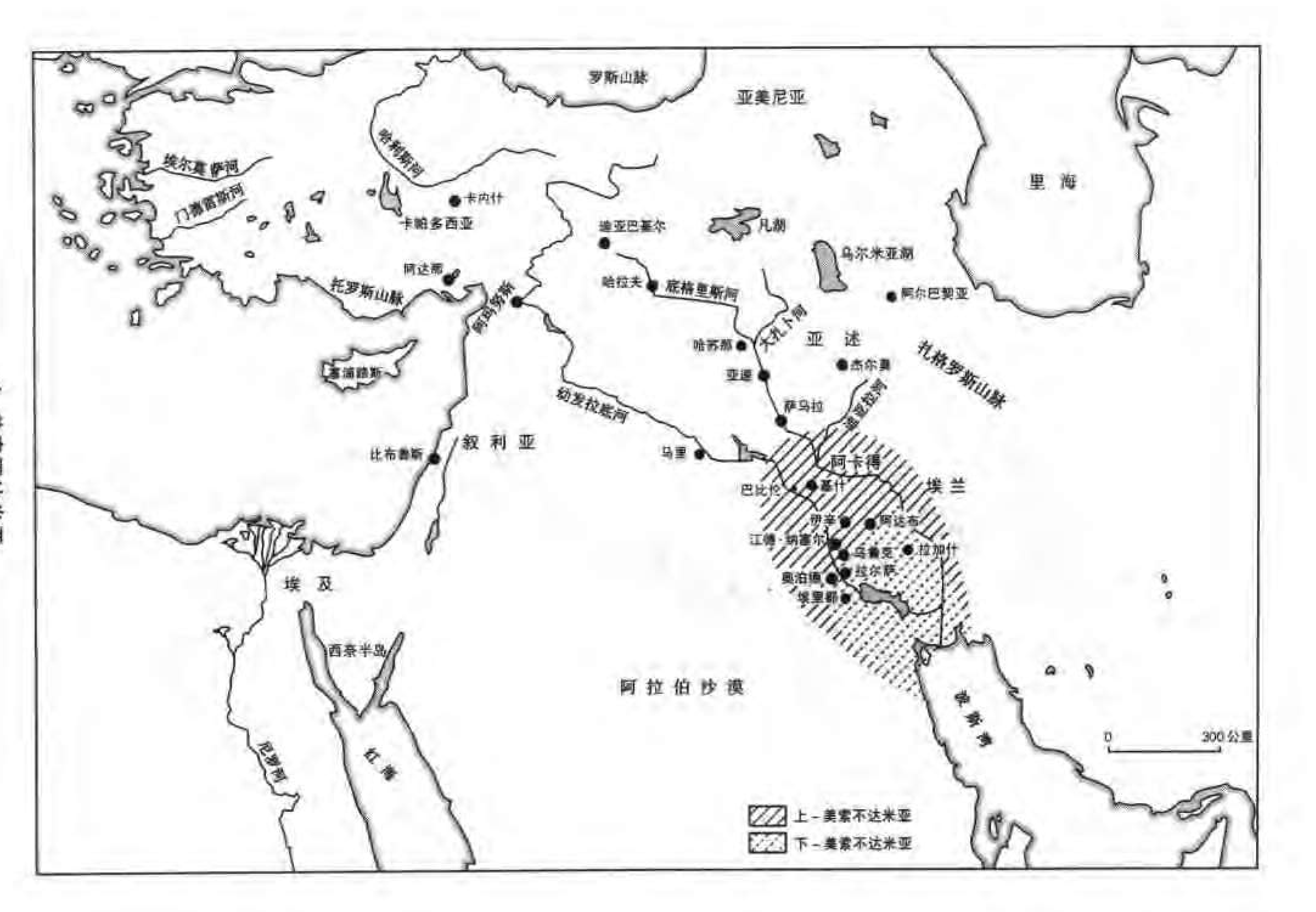
佩里戈尔文化
格拉维特文化 马格德林文化
莫斯特文化 沙泰勒佩龙文化 奥瑞纳文化 梭鲁特文化
中期 晚期 中石器时代
200 000 100 000 50 000 20 000 10 000
150 000 80 000 60 000 40 000 30 000 15 000
里斯 维 尔 姆
更新世晚期 第 四 季 全新世

资料来源：摘自《人类史》（皮埃尔·维达尔－纳凯、雅克·贝尔坦著），HACHETTE 出版社，1－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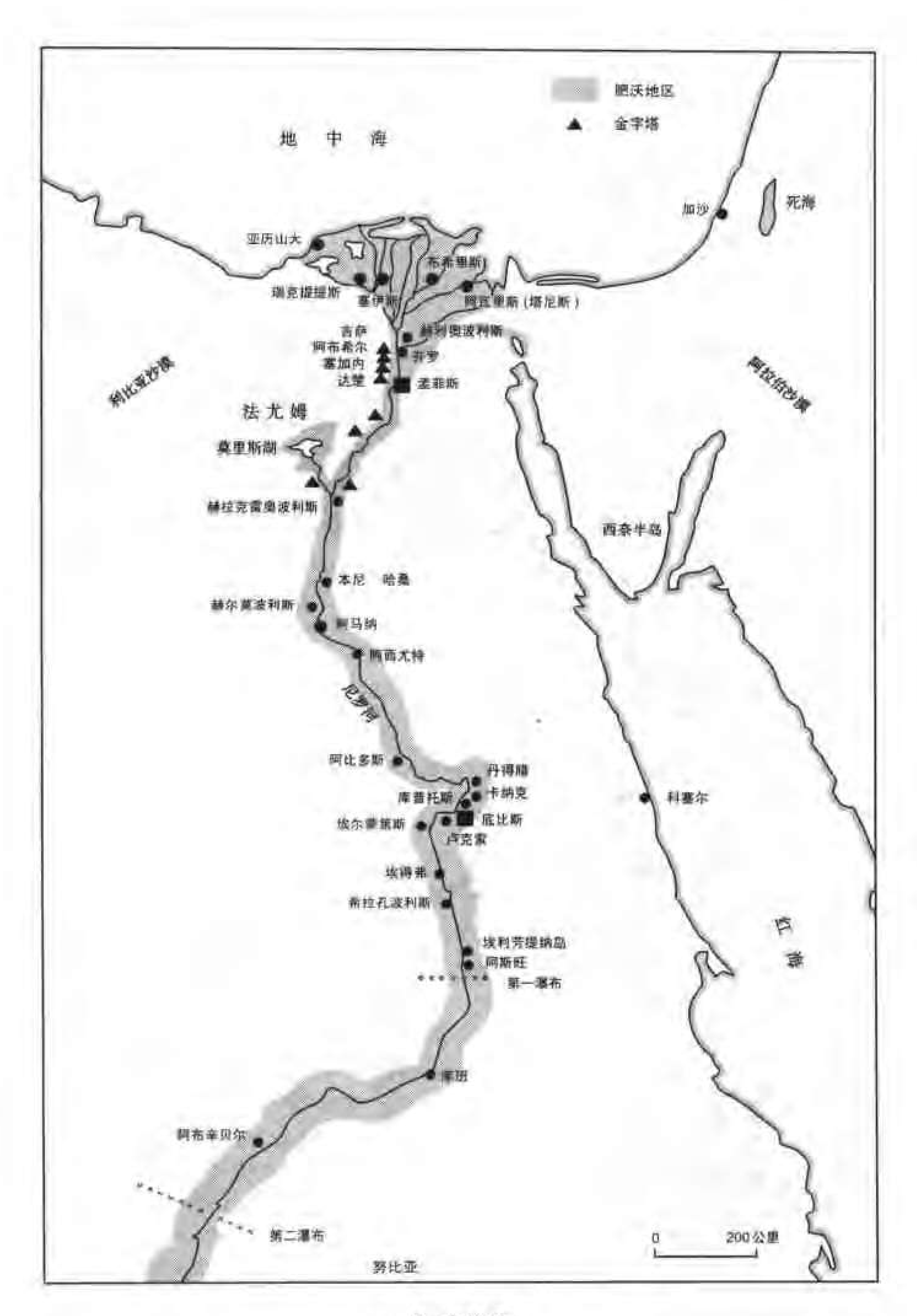


黑海
高加索山脉
里海
特洛伊
埃尔莫萨河
哈利斯河
门德雷斯河
安纳托利亚
哈吉拉尔
恰塔勒·霍裕克
贝尔巴希
贝尔迪比
梅尔辛
卡尔切米什
阿尔斯兰·塔什
阿勒颇
乌加里特
埃布拉
塞浦路斯
凡湖
乌拉米亚湖
底格里斯河
尼尼微
宁拉德
亚述
杰尔莫
扎格罗斯山脉
幼发拉底河
美索不达米亚
萨马拉
巴尔米拉
马里
巴格达
基什
巴比伦
尼普尔
伊辛
乌玛
拉加什
苏士
乌鲁克
拉尔萨
乌尔
埃里都
比布鲁斯
卡尔迈勒山
杰里科
叙利亚沙漠
伊朗沙漠
西奈半岛
阿拉伯沙漠
红海
尼罗河
波斯湾
0
300 公里

3. “富饶的克瓦桑”


罗斯山脉
亚美尼亚
里海
哈利斯河
门德雷斯河
卡内什
卡帕多西亚
迪亚巴基尔
凡湖
乌尔米亚湖
阿达那
哈拉夫
底格里斯河
阿尔巴契亚
托罗斯山脉
大扎卜河
哈苏那
亚述
杰尔莫
扎格罗斯山脉
亚述
萨马拉
迪亚拉河
塞浦路斯
幼发拉底河
叙利亚
比布鲁斯
马里
阿卡德
巴比伦
基什
埃兰
伊辛
阿达布
江德·纳塞尔
乌鲁克
拉加什
奥伯德
拉尔萨
埃里都
埃及
西奈半岛
阿拉伯沙漠
波斯湾
尼罗河
红海
0
300公里
上－美索不达米亚
下－美索不达米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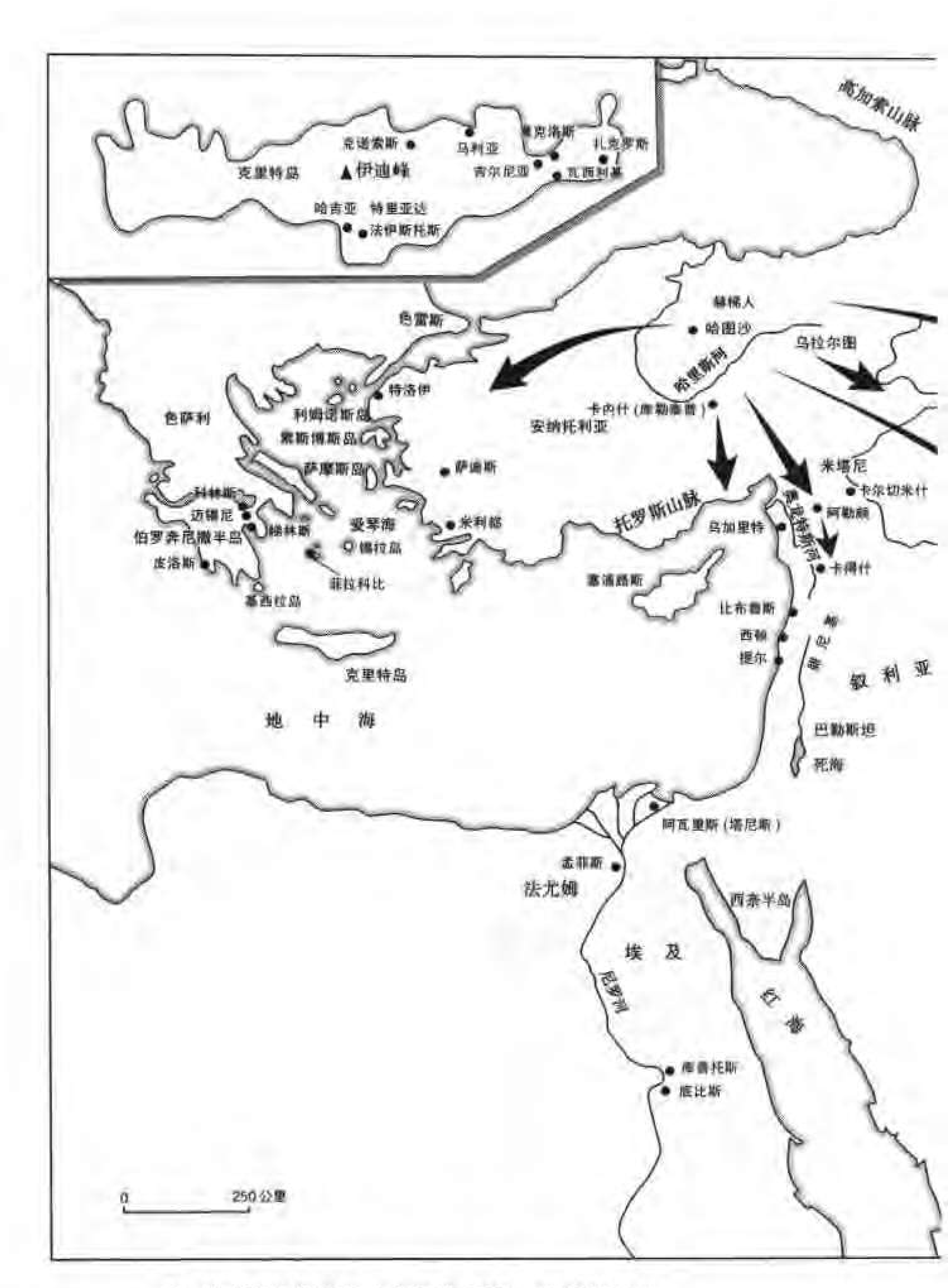
4. 美索不达米亚


肥沃地区
金字塔
地 中 海
加沙
死海
亚历山大
布希里斯
塞伊斯
赫利奥波利斯
吉萨
阿布希尔
开罗
孟菲斯
利比亚沙漠
阿拉伯沙漠
法 尤 姆
莫里斯湖
赫拉克雷奥波利斯
西奈半岛
本尼 哈桑
赫尔莫波利斯
阿马纳
阿西尤特
尼罗河
阿比多斯
丹得腊
卡纳克
库普托斯
底比斯
卢克索
科塞尔
埃得弗
希拉孔波利斯
埃利芳提纳岛
阿斯旺
第一瀑布
红 海
阿布辛贝尔
第二瀑布
0
200公里
努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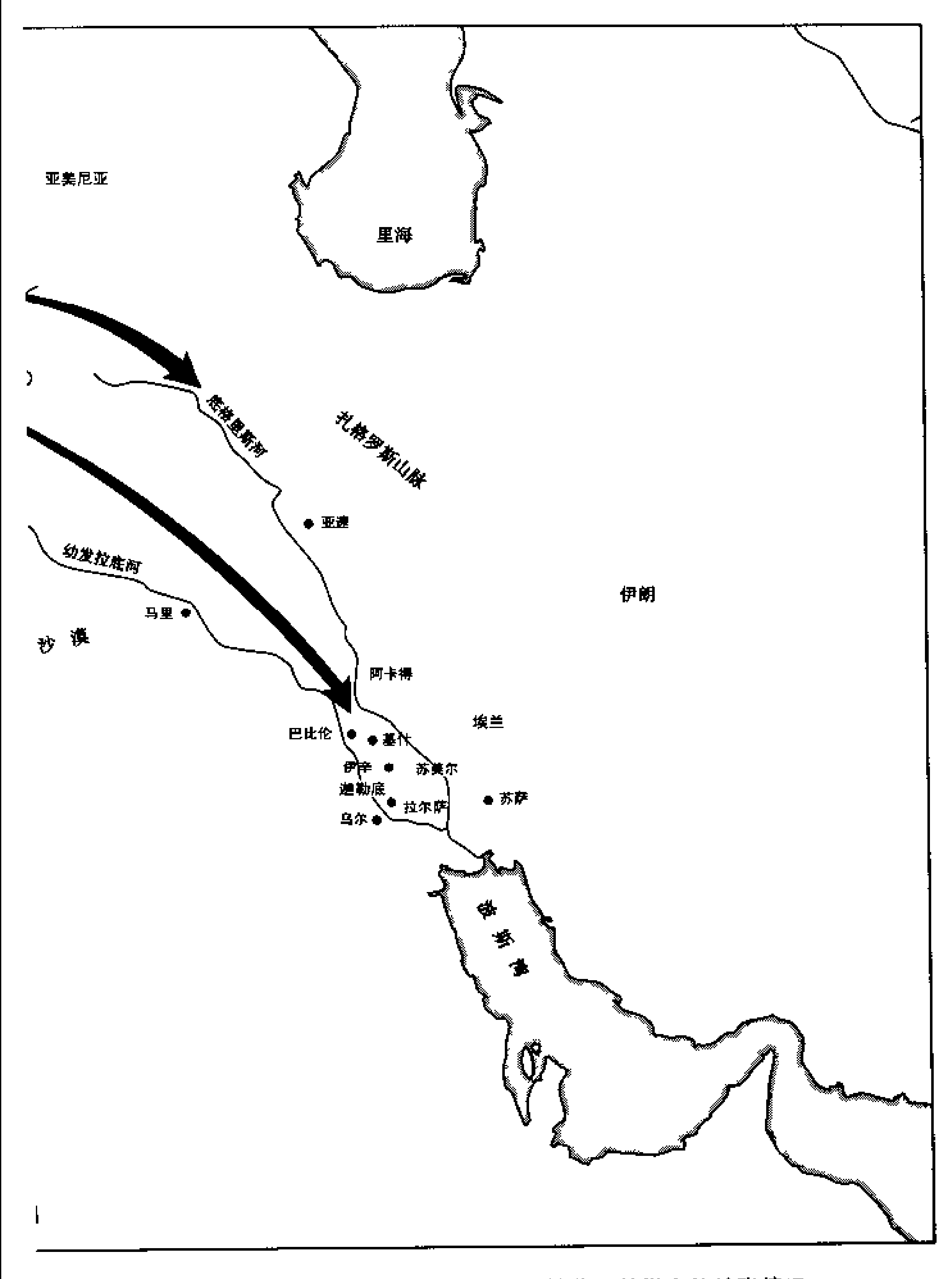
5. 古埃及


托罗斯山脉
卡拉泰普
米塔尼
阿拉尼亚
阿尔米那
卡西乌斯山脉
乌加里特
哈马
塞浦路斯
梭罗伊
萨拉米那
伊达利翁
帕弗斯
基提翁
库里翁
阿马东特
阿拉多斯
希米拉
比布鲁斯
黎巴嫩山脉
安提-黎巴嫩山脉
西顿
提尔
阿克
多尔
卡尔迈勒山脉
巴勒斯坦
雅法
耶路撒冷
死海
塞伊斯
佩鲁斯
埃及
孟菲斯
尼罗河
红海
腓尼基
腓尼基城市
0
1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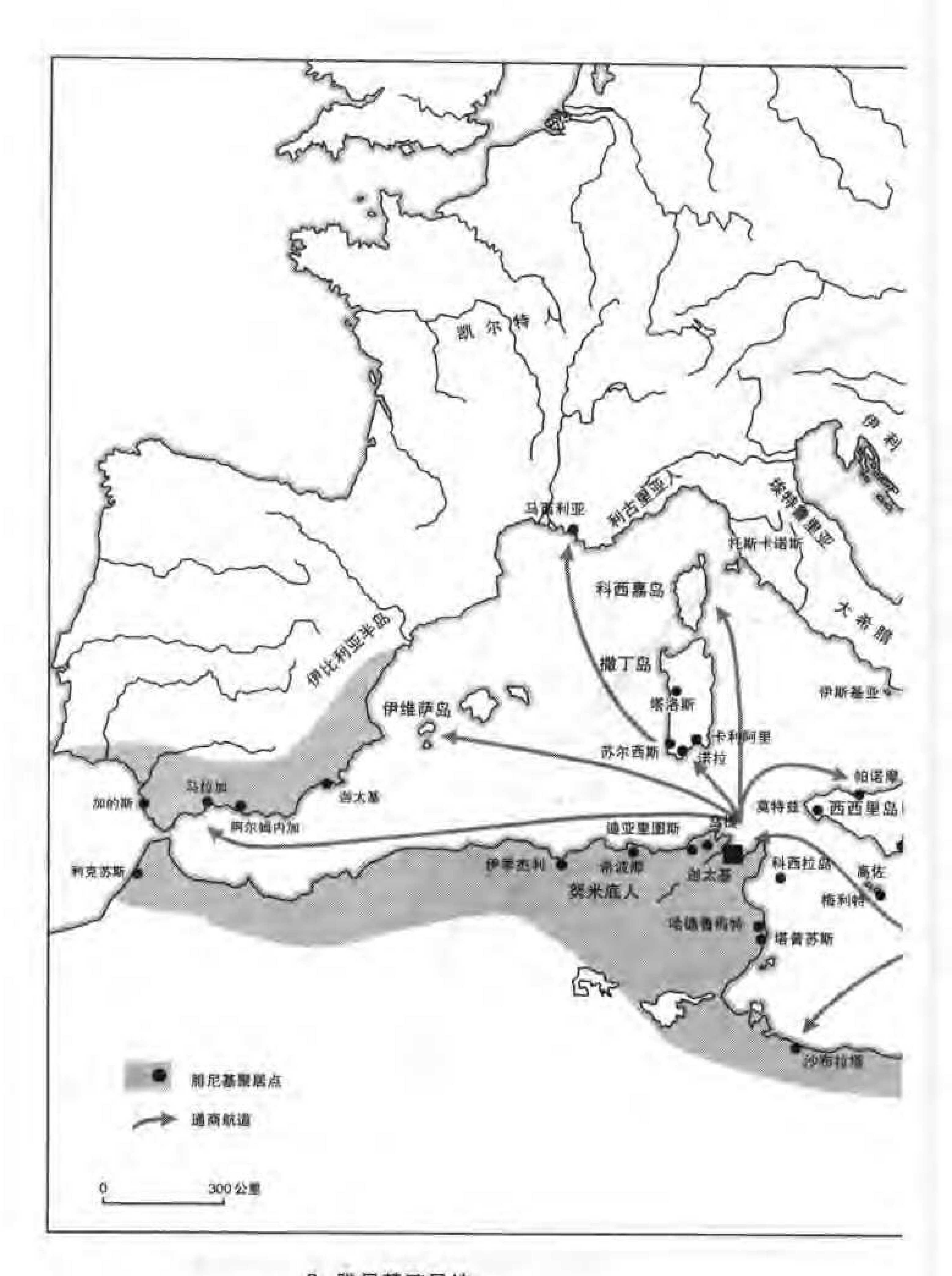
6. 腓尼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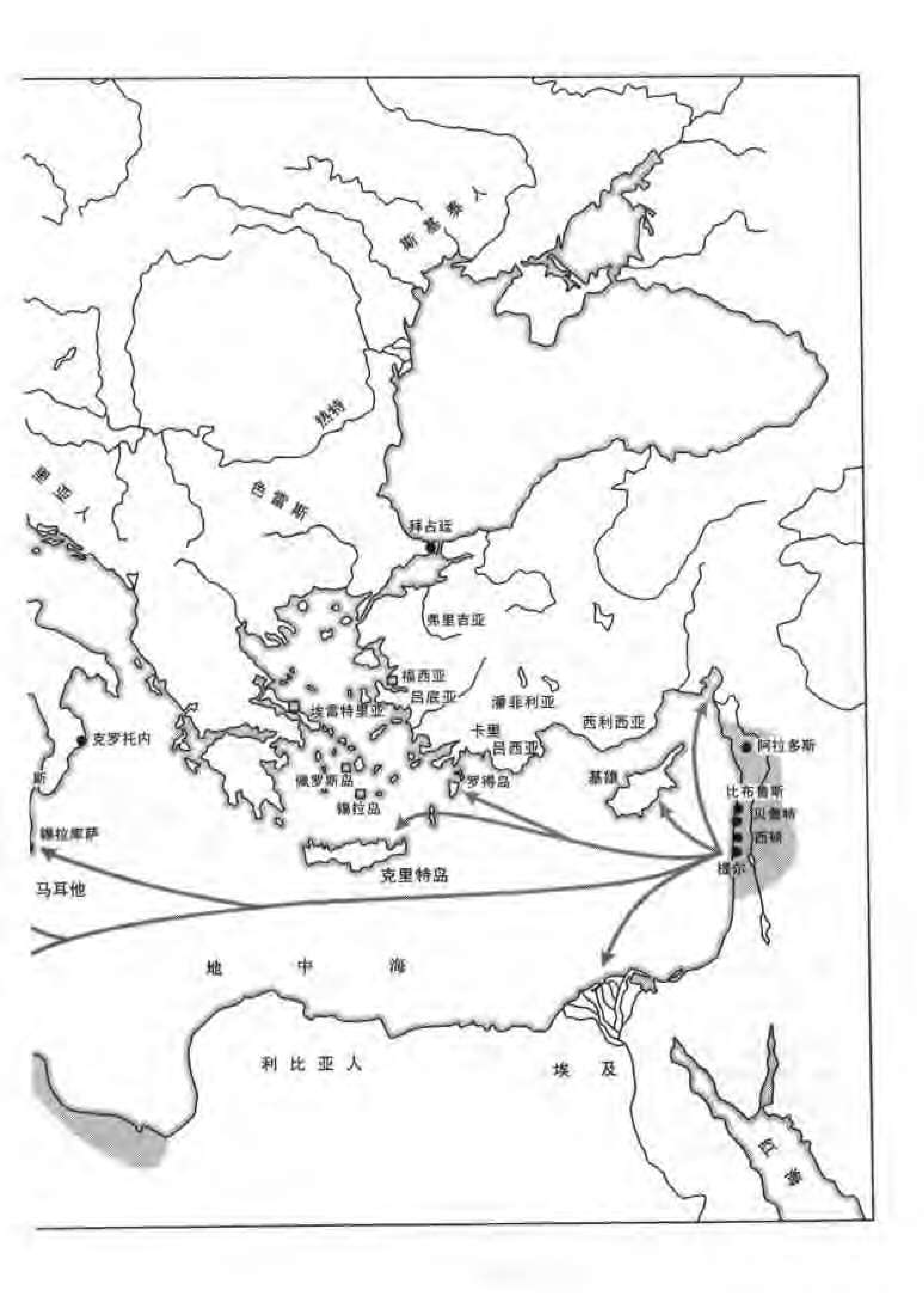
7. 地中海东部地区（公元前2500－前12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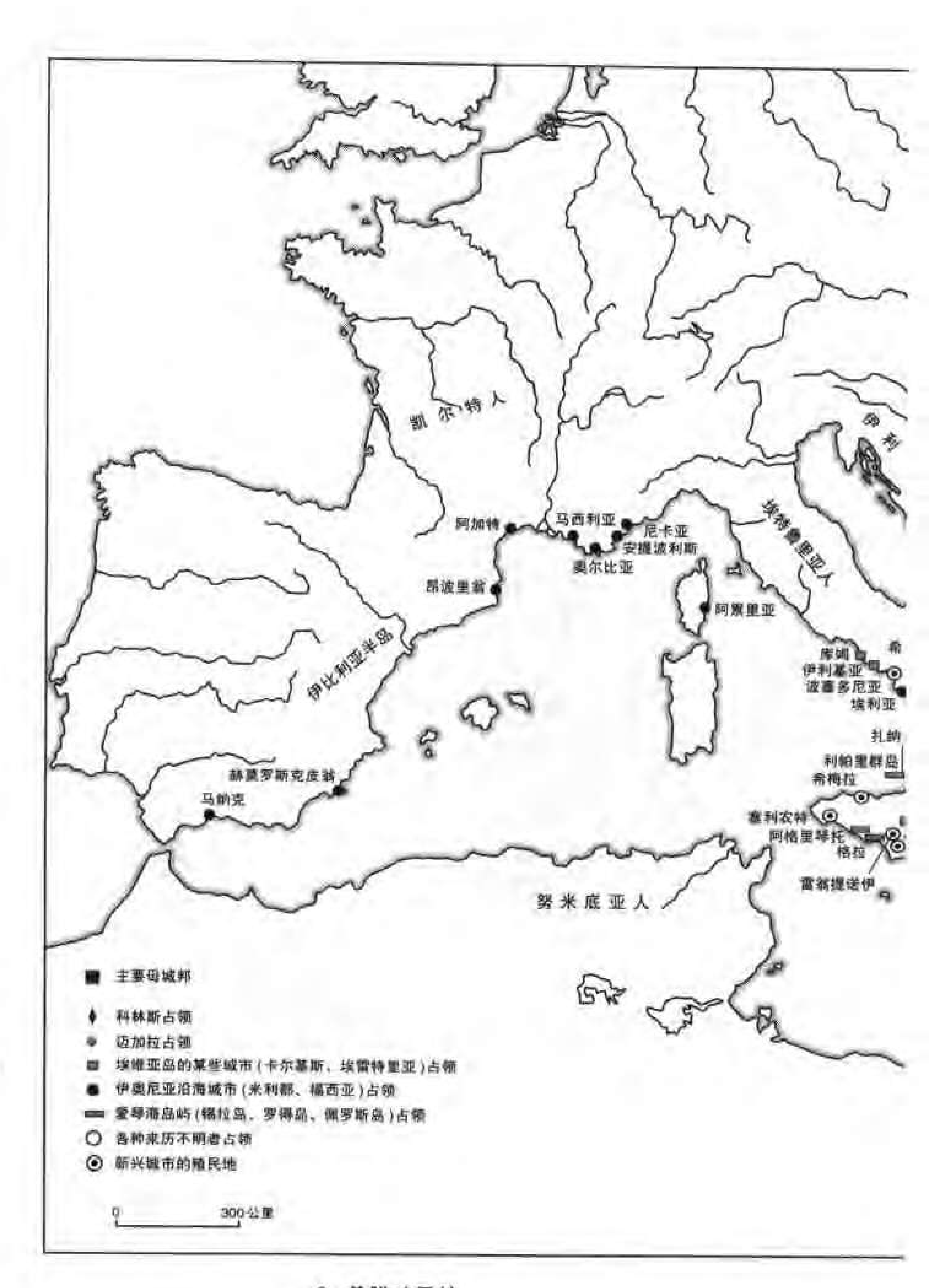


本图展示了克里特的繁荣和赫梯人的扩张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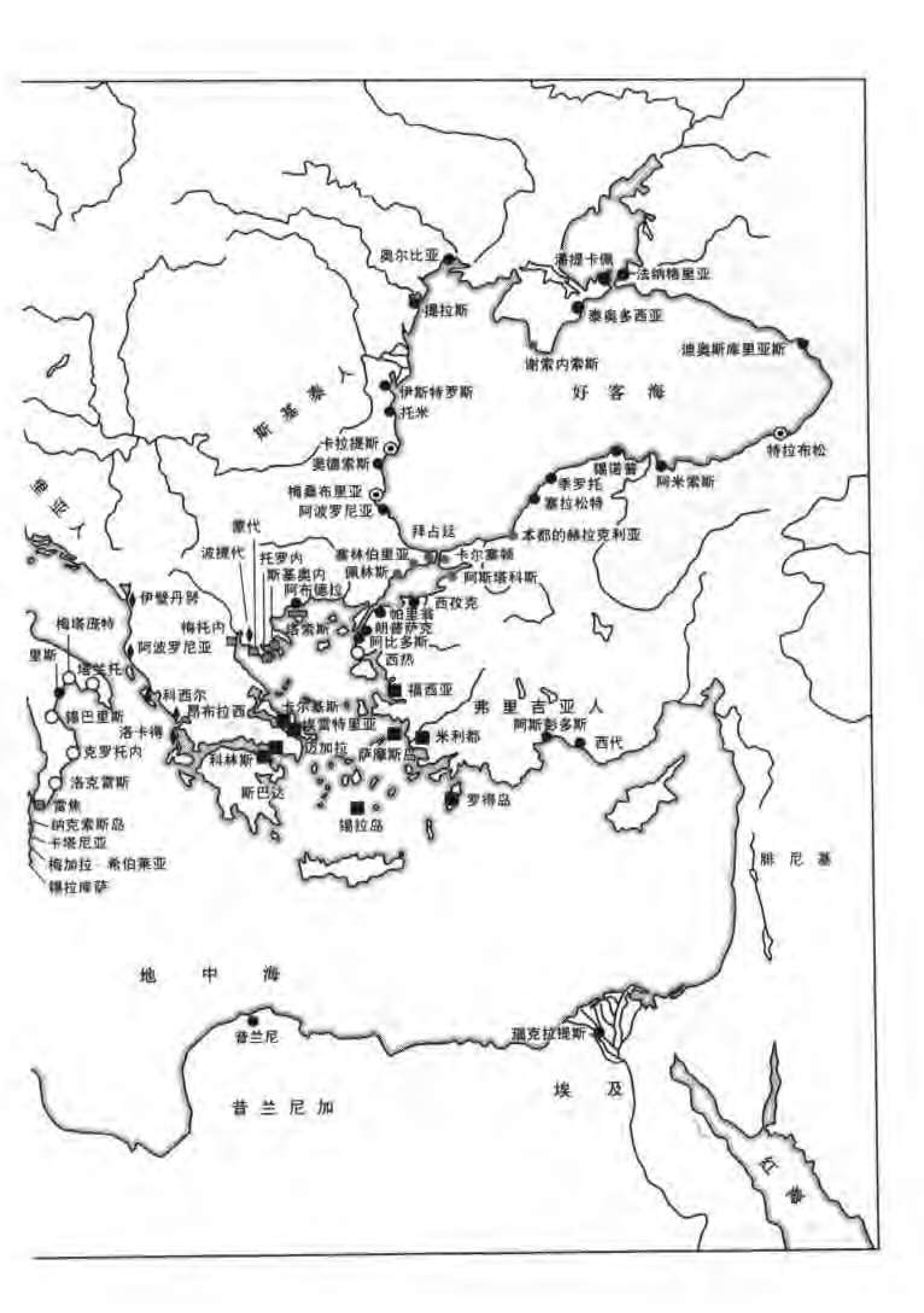

凯尔特人
马西利亚
利古里亚人
托斯卡诺斯
科西嘉岛
大希腊
撒丁岛
伊斯基亚
伊比利亚半岛
伊维萨岛
塔洛斯
卡利阿里
苏尔西斯
诺拉
帕诺摩
西西里岛
马拉加
加的斯
迦太基
阿尔梅内加
迪亚里图斯
利克苏斯
迦太基
科西拉岛
高佐
梅利特
努米底人
哈德鲁梅特
塔普苏斯
沙布拉塔
腓尼基聚居点
通商航道
0
3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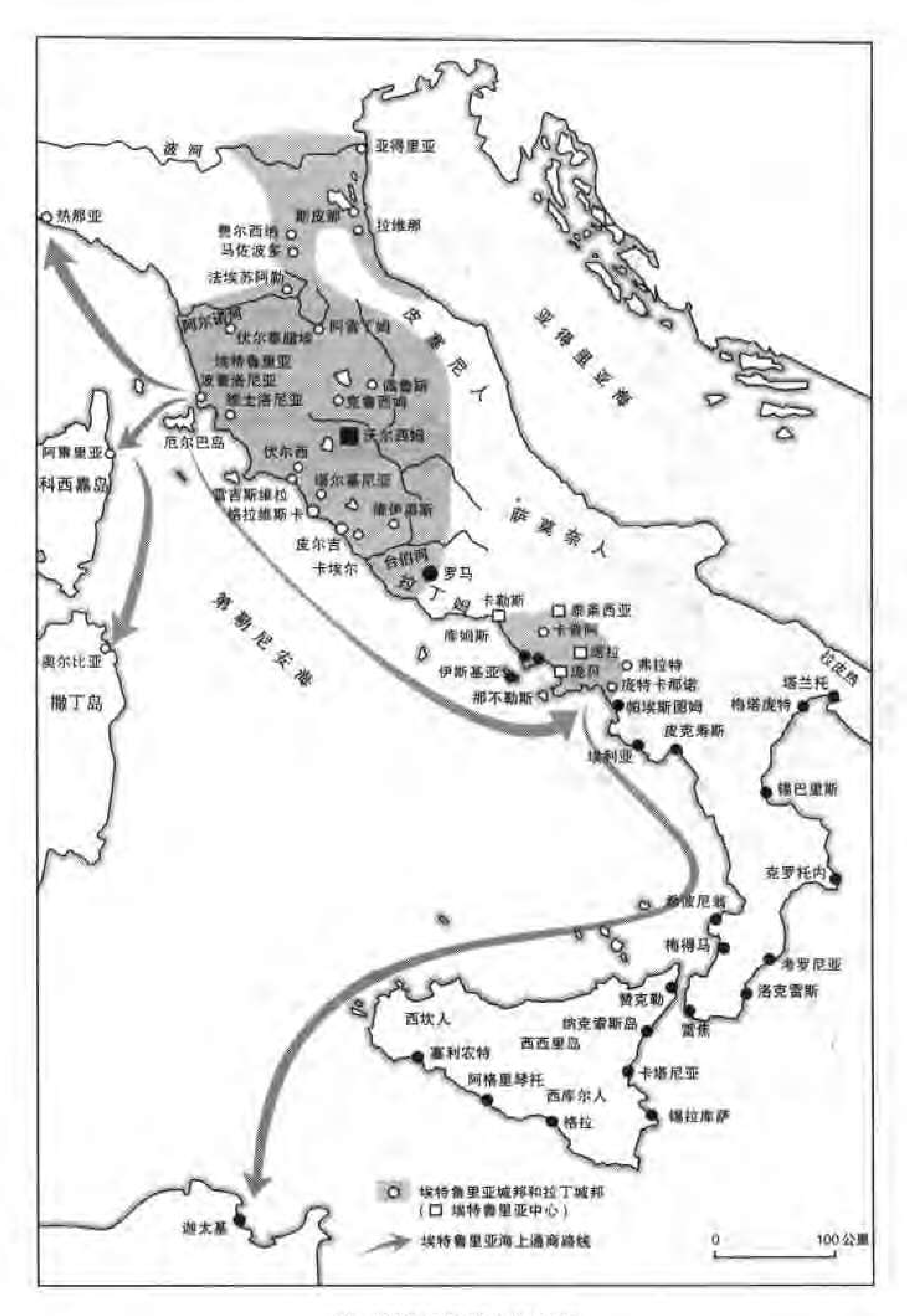
8. 腓尼基殖民地


斯基泰人
热特
色雷斯
拜占廷
弗里吉亚
福西亚
吕底亚
埃雷特里亚
潘非利亚
卡里
吕西亚
西利西亚
阿拉多斯
比布鲁斯
贝鲁特
西顿
罗得岛
锡拉岛
克罗托内
锡拉库萨
马耳他
克里特岛
地中海
利比亚人
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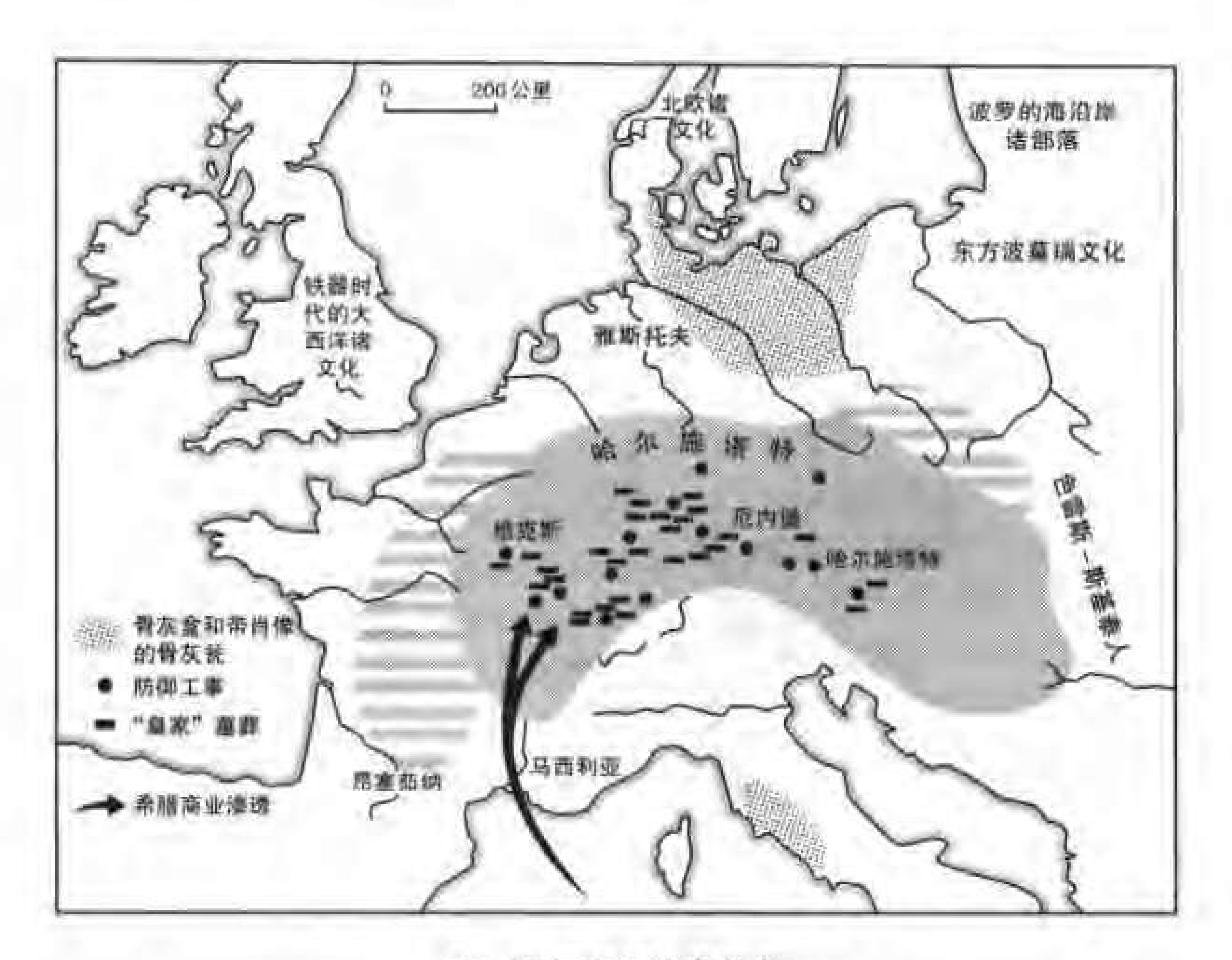

凯尔特人
伊比利亚半岛
阿加特
马西利亚
尼卡亚
安提波利斯
奥尔比亚
昂波里翁
阿莱里亚
埃特鲁里亚人
伊利
库迈
伊利基亚
波塞多尼亚
埃利亚
希
扎纳
利帕里群岛
希梅拉
塞利农特
阿格里琴托
格拉
雷翁提诺伊
赫墨罗斯克皮翁
马纳克
努米底亚人
主要母城邦
科林斯占领
迈加拉占领
埃维亚岛的某些城市（卡尔基斯、埃雷特里亚）占领
伊奥尼亚沿海城市（米利都、福西亚）占领
爱琴海岛屿（锡拉岛、罗得岛、佩罗斯岛）占领
各种来历不明者占领
新兴城市的殖民地
0
300公里

9. 希腊殖民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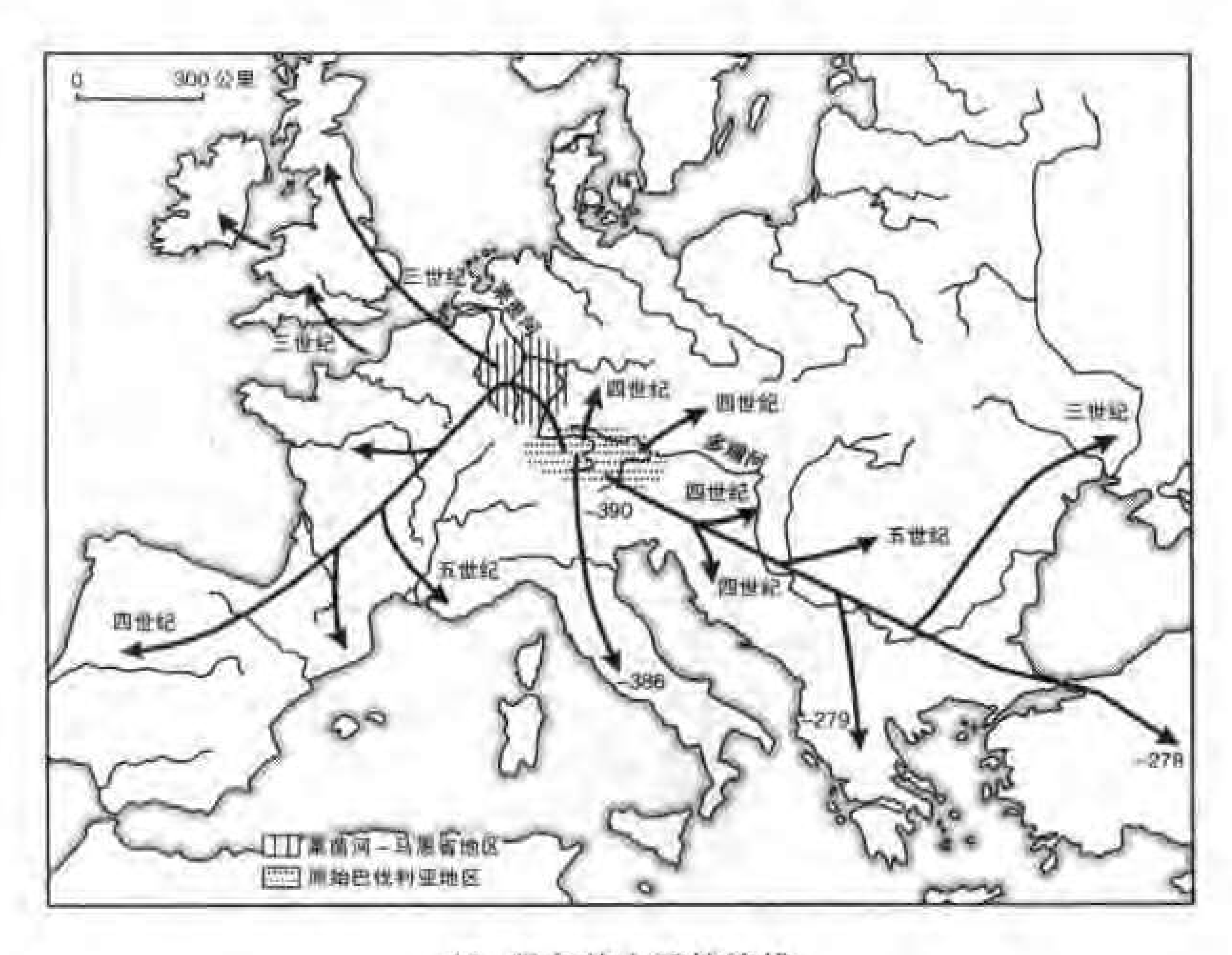

奥尔比亚
潘提卡佩
法纳格里亚
提拉斯
泰奥多西亚
迪奥斯库里亚斯
谢索内索斯
伊斯特罗斯
托米
好客海
斯基泰人
卡拉提斯
奥德索斯
特拉布松
锡诺普
阿米索斯
梅桑布里亚
阿波罗尼亚
季罗托
塞拉松特
蒙代
拜占廷
本都的赫拉克利亚
波提代
托罗内
塞林伯里亚
卡尔塞顿
斯基奥内
佩林斯
阿斯塔科斯
阿布德拉
伊鲁丹努
西茨克
梅塔庞特
帕里翁
梅托内
洛索斯
朗普萨克
阿波罗尼亚
阿比多斯
里斯
塔兰托
西热
福西亚
科西尔
昂布拉西
卡尔基斯
弗里吉亚人
锡巴里斯
埃雷特里亚
阿斯彭多斯
洛卡德
米利都
西代
克罗托内
迈加拉
萨摩斯岛
科林斯
洛克雷斯
斯巴达
罗得岛
雷焦
锡拉岛
纳克索斯岛
卡塔尼亚
腓尼基
梅加拉·希伯莱亚
锡拉库萨
地中海
昔兰尼
瑙克拉提斯
昔兰尼加
埃及
红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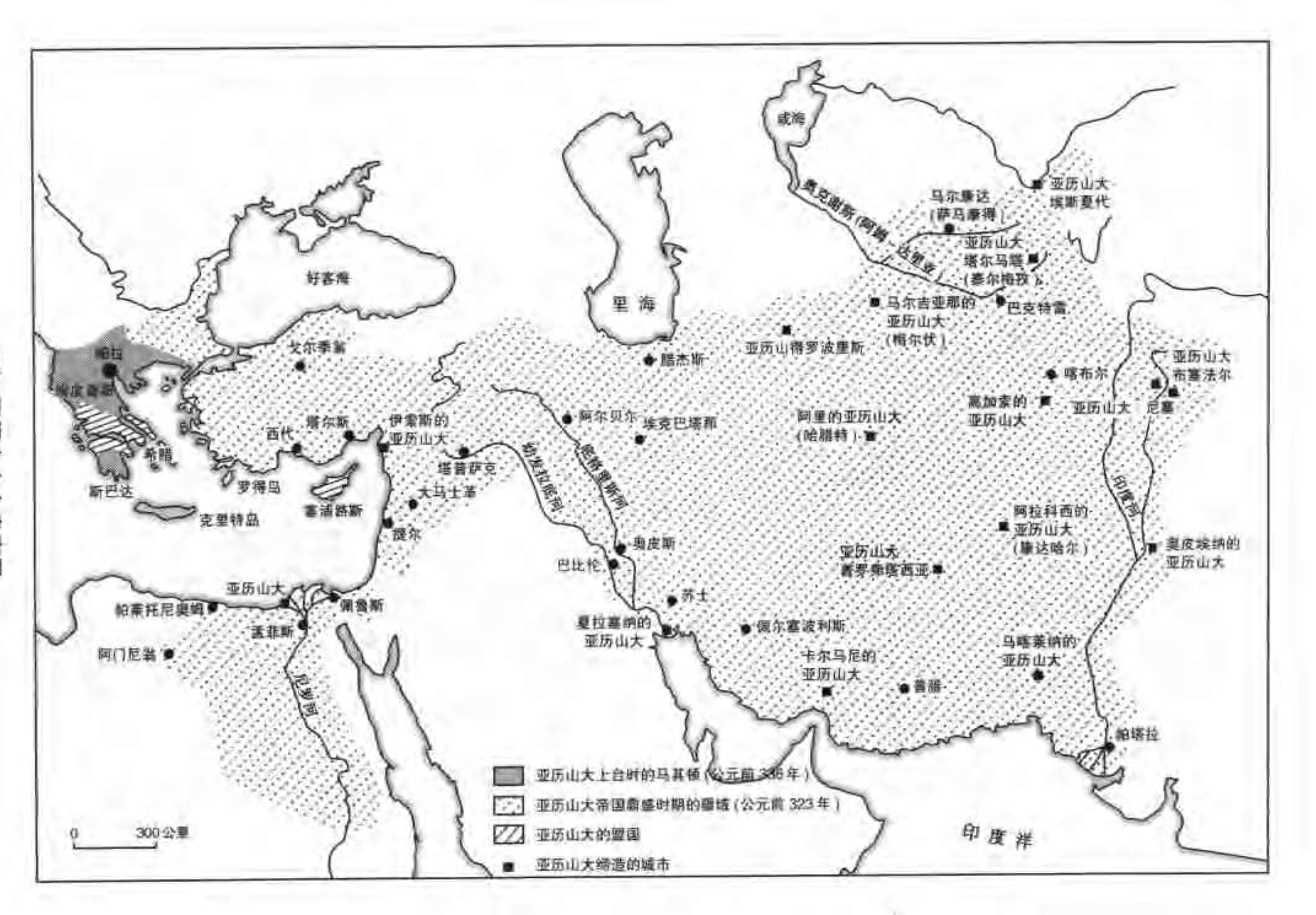
10. 埃特鲁里亚人的足迹



11. 骨灰瓮文化诸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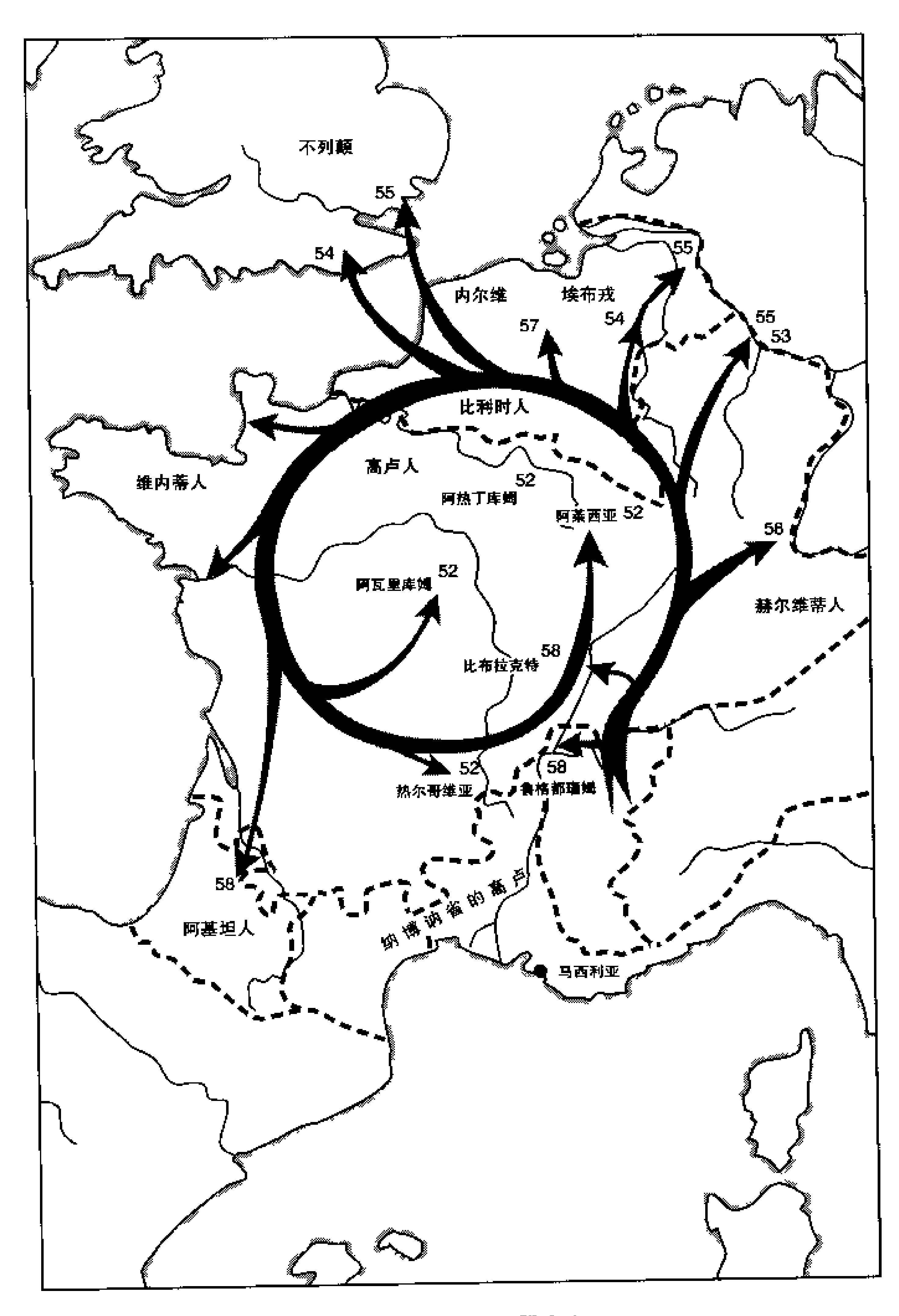


12. 凯尔特人迁徙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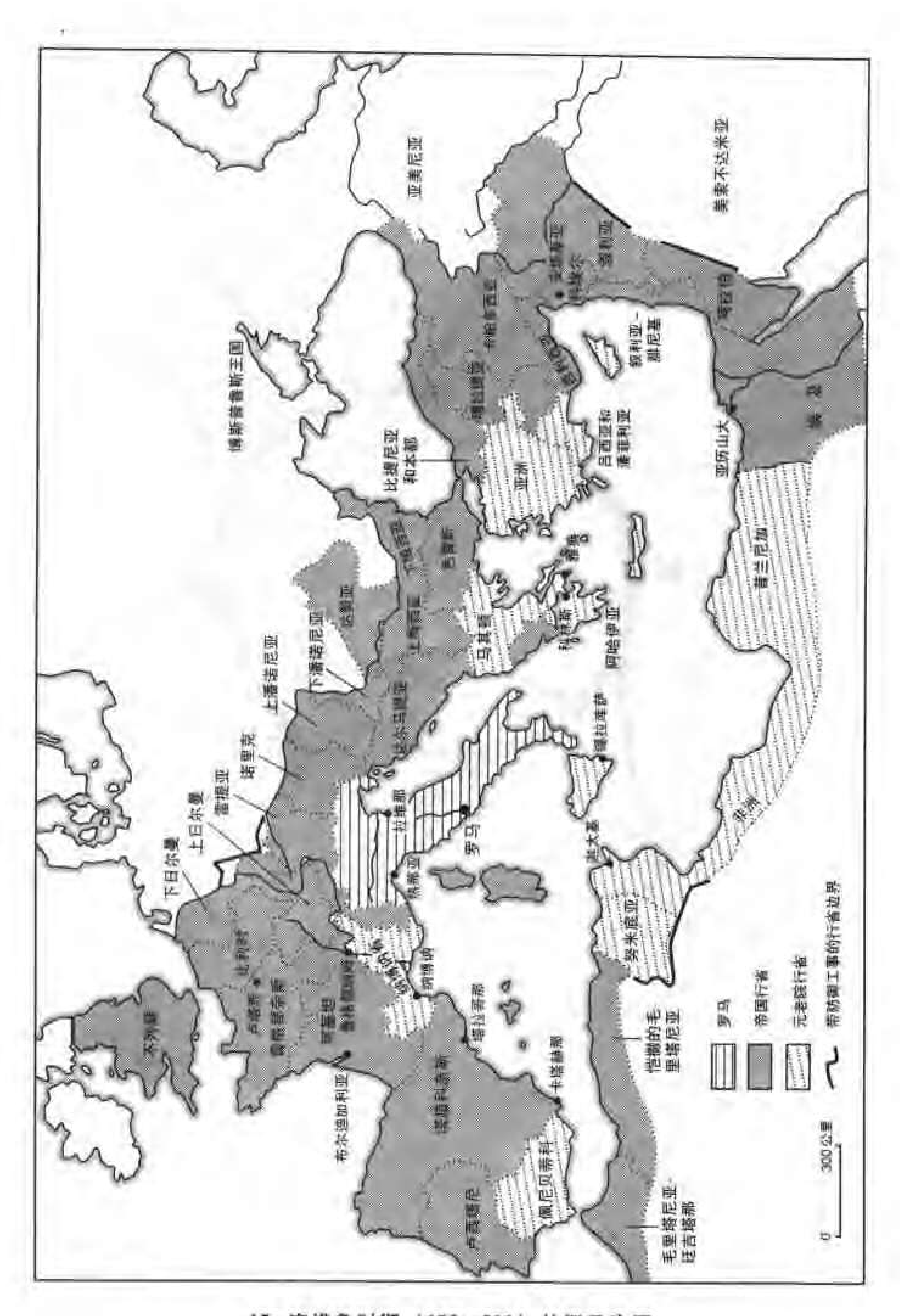


好客海
里 海
咸海
印 度 洋
戈尔狄翁
西代
塔尔斯
伊索斯的
亚历山大
塔普萨克
大马士革
提尔
斯巴达
罗得岛
塞浦路斯
克里特岛
亚历山大
帕莱托尼奥姆
佩鲁斯
孟菲斯
阿门尼翁
尼罗河
阿尔贝尔
埃克巴塔那
巴比伦
苏士
夏拉塞纳的
亚历山大
佩尔塞波利斯
卡尔马尼的
亚历山大
普膳
亚历山大
赫罗希娅西亚
阿里的亚历山大
(哈腊特)
亚历山得罗波里斯
马尔吉亚那的
亚历山大
(梅尔伏)
巴克特雷
亚历山大
塔尔马兹
马尔康达
(萨马康得)
亚历山大
埃斯夏代
喀布尔
高加索的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
布塞法尔
尼塞
印度河
阿拉科西的
亚历山大
(康达哈尔)
奥皮埃纳的
亚历山大
马喀塞纳的
亚历山大
帕塔拉
亚历山大上台时的马其顿(公元前 336 年)
亚历山大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域(公元前 323 年)
亚历山大的盟国
亚历山大缔造的城市
0
300公里

13. 亚历山大大帝帝国


不列颠
55
54
内尔维
埃布戎
57
54
55
55
53
比利时人
高卢人
维内蒂人
52
阿热丁库姆
阿莱西亚 52
58
阿瓦里库姆 52
赫尔维蒂人
比布拉克特 58
52
热尔哥维亚
58
鲁格都努姆
58
阿基坦人
纳博讷省的高卢
马西利亚

14. 儒勒·恺撒征服高卢



15. 塞维鲁时期（193－211）的罗马帝国

译名对照表

Abbeville 阿布维利（法国）
Abdère 阿布德拉（希腊殖民地，色雷斯）
Abraham 亚伯拉罕（圣经族长）
Abruzzes, massif des 阿布鲁齐高原（意大利）
Abydos 阿比多斯（埃及）
Acco 阿科（腓尼基）
Achaïe 阿哈伊亚（希腊）
Achéens, les 亚该亚人（印欧人）
Achéménides, les 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
Achille 阿基利（希腊英雄）
Actium 亚克兴（希）
Adab 阿达布（美索不达米亚）
Adad 阿达（美索不达米亚神）
Adhaïm 阿德哈因（美索不达米亚）
Adige 阿迪杰河（意）
Adonis 阿多尼斯（希腊神）
Adria 亚得里亚（意）
Adriatique 亚得里亚海
Aetokremnos 埃托克仑诺斯（塞浦路斯）
Afanasievo 阿法那希沃（新石器文明）
Africa 非洲省（非洲罗马行省）
Afrique 非洲
Afrique du Nord 北部非洲
Afrique Noire 黑非洲
Agathé 阿加特（今阿格德，法国）

Alin (Per) 佩尔·阿兰
Aliseda 阿利色达（西班牙）
Alishar 阿利夏尔（安纳托利亚）
Allia, fleuve 阿利亚河（意）
Allemagne 德国
Almagro Basch (Martin) 阿尔马格罗·巴什（马丁）
Almeria 阿尔梅里亚（西班牙）
Al-Mina 阿尔米纳（腓尼基）
Alpes, massif des 阿尔卑斯高原
Alsace 阿尔萨斯
Altamira, grottes d' 阿尔塔米拉洞群
Amanus, massif montagneux 阿马努斯高原（多山，小亚细亚）
Amari 阿马里
Amarna ou Tell el- Amarna 阿马纳或特尔·艾尔阿马纳（埃及）
Amazonie 亚马逊地区
Amenhotep 阿蒙霍泰普
Aménophis Ier 阿美诺菲斯一世（法老）
Aménophis III 阿美诺菲斯三世（法老）
Aménophis IV 阿美诺菲斯四世（法老）（见 Akhenaton）
Amérindiens, les 美洲印第安人
Amérique 美洲
Amérique du Nord 北美洲
Amers, lacs 亚梅尔湖（埃及）
Amiens 亚眠（法）
Amménémès Ier 阿美内梅斯一世（法老）
Ammien Marcellin 亚绵·马塞林（拉丁史学家）
Amnissos 亚姆尼索斯（克里特）
Amon Râ 阿蒙·瑞（埃及神）
Amorites, les 阿莫里特人（闪米特游牧民族）
Amosis 阿莫西斯（法老）
Ampurias 安普里亚斯（西班牙）
Amuq 阿木克（安纳托利亚）

Anatolie 安纳托利亚
Anaxagore 安那克萨哥拉（希腊哲学家和学者）
Anaximandre 阿那克西曼德（希腊哲学家和学者）
Anaximène 阿那克西米尼（希腊哲学家）
Ancône 安科纳（意）
Andalousie 安达卢西亚（西）
Andronovo 安得罗诺沃（新石器文明）
Angleterre 英国
Anou 阿努（苏美尔神）
Antalcidas 安塔尔希达斯（斯巴达将军）
Antarctique, océan 南冰洋
Antequera 安特阔拉（西）
Anti-Liban（chaîne montagneuse）安提黎巴嫩山脉（小亚细亚）
Antilles（archipel）安的列斯群岛（大西洋）
Antioche 安条克（土耳其）
Antiochos III 安提奥科斯三世（塞琉西王朝国王）
Anti-Taurus（chaîne montagneuse）安提托罗斯山脉（安纳托利亚）
Antoine（Marcus Antonius）安东尼（罗马将军和政治家）
Antonin le Pieux（Titus Aurelius Fulvius Antonins Pius）安托南“虔诚大帝”（罗马皇帝）
Antonins, les 安托南皇帝
Anubis 安努毕斯（埃及神）
Apennin ou Apennins（chaîne montagneuse）亚平宁山脉（意）
Apollon 阿波罗（希腊神）
Apollonia 阿波洛尼亚（伊利里亚）
Apollonios de Perga 佩尔加的阿波罗尼奥斯（希腊数学家）
Apollonios de Tyane 提亚那的阿波洛尼奥斯（哲学家）
Appien 阿皮亚（希腊史学家）
Apulie 阿普利（今意大利普耶）
Aquitaine 阿基坦（法）
Arabes, les 阿拉伯人（阿拉伯）
Arabique, chaîne/péninsule 阿拉比克山/半岛

Arados 阿拉多斯（腓尼基）
Araméens, les 阿拉美人（美索不达米亚的闪米特民族）
Aratos 阿拉托斯（希腊学者）
Arbèles 阿尔贝尔（亚述王国）
Arcadie 阿卡迪亚（希）
Archidamos II 阿基达莫斯二世（斯巴达国王）
Archimède 阿基米德（希腊学者）
Archytas de Tarente 塔兰托的阿契塔（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
Arcy-sur-Cure 阿尔西（法）
Ardea 阿尔代（意）
Arezzo 阿雷佐（意）
Argolide 阿尔戈利得（希）
Argos 阿尔戈斯（希）
Arioviste 阿里奥维斯特（苏埃孚部落的日耳曼首领）
Aristarque de Samos 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希腊天文学家）
Aristophane 阿里斯托芬（希腊喜剧作家）
Aristote 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
Arkhanes 阿尔克汉那（克里特）
Arles 阿尔勒
Arménie 亚美尼亚
Arminius 阿尔米纽斯（阿米尼乌斯人日耳曼首领）
Armorique 阿尔莫利卡（法国）
Arno, fleuve 阿尔诺河（意大利）
Arpachiya 阿尔巴契亚（美索不达米亚）
Arpinum 阿尔皮诺姆（意）
Arsacides, les 安息人（尚武，巴特王朝）
Arslan Tash 阿尔斯兰·塔西（亚述）
Artaxerxès III 阿尔塔克塞尔克塞斯三世（波斯国王）
Asclépios 阿斯克勒庇俄斯（希腊药神）
Asculum 阿思库洛姆（意大利）
Asie 亚洲
Asie Mineure 小亚细亚

Baal 巴利（东方诸神的统称）
Baal Hamon 巴勒·哈蒙（迦太基神）
Baal Lebanon 巴勒·勒巴农（腓尼基神）
Baal Shamin 巴勒·夏明（腓尼基神）
Babylone 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
Babylonie 巴比伦尼（美索不达米亚）
Babyloniens, les 巴比伦人
Bactriane 大夏（中亚）
Bagradas, fleuve 巴格拉达斯河（今迈杰尔达河，北非）
Bahreïn, îles 巴林群岛（波斯湾）
Bailloud (G.) 巴雨
Balaat 巴拉特（东方女神）
Balawat 巴拉瓦特（亚述）
Baléares 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
Balkans 巴尔干半岛
Balout (L.) 巴鲁
Baltique, mer 波罗的海
Barbagia 巴尔巴吉亚（西班牙）
Barberousse 巴尔巴罗萨（阿尔及尔摄政王）
Barcides, les 巴尔希德（迦太基家族）
Bari 巴里（意）
Barnett (R. D.) 巴尔内特
Barumini 巴如迷你（撒丁岛）
Battos 巴托斯（昔兰尼创立者）
Baume-Latrone 伯姆－拉特罗那（法）
Beauregard 博勒加尔（法）
Bédouins, les 贝都因人（阿拉伯游牧部落）
Belbasi 贝尔巴希（安纳托利亚）
Beldibi 贝尔迪比（安纳托利亚）
Belgique 比利时
Bellay, Joachim du, 贝莱（法国诗人）
Benda, Julien 帮达

Bretagne 布列塔尼（法）
Breuil（abbé）布洛耶（修道院院长）
Brindisi 布林迪西（意）
Briquel（D.）布里凯勒
Britanniques，îles 不列颠群岛
Brun（P.）布兰
Bruttium 布鲁提奥姆（今意大利卡拉布尔）
Brutus 布鲁图（古罗马政治家）
Byblos 比勃洛斯（腓尼基）
Byrsa 比尔萨（迦太基）
Byzance 拜占庭（希腊殖民地，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又见 Constantinople，Istanbul
Byzantin，Empire 拜占庭帝国

Cadix 加的斯 见 Gadès
Caecilius Metellus 卡西琉斯·梅特鲁斯（古罗马执政官）
Caere 卡埃尔（今意大利切维特里 Cerveteri）
Cagliari 卡利阿里（撒丁岛）
Calabre 见 Bruttium
Camarès，céramique ou style 卡马雷斯（克里特陶瓷风格）
Cambyse II 康比斯二世（波斯国王）
Cameroun 喀麦隆
Camille 卡米耶（古罗马将军）
Campanie 坎帕尼亚地区（意）
Canaan 迦南（腓尼基）
Cananéens，les 迦南人
Canaries，les 加那利群岛（大西洋）
Candie 见 Crète
Cannes 坎尼（意）
Canton 广东（中国）
Cantons Suisses 瑞士各州
Capocorp Vell 卡波科维尔（西）

Capoue 卡普亚（意）

Cappadoce 卡帕多西亚（土耳其）

Caprées 卡普雷（今意大利卡普里）

Carchemish 卡尔切米什（叙利亚）

Carcopino，Jérôme 卡尔科皮诺，热罗姆

Carie 卡里（小亚细亚的希腊一地区）

Cariens，les 卡里人

Carmel，mont 卡尔迈勒山（以色列）

Carpates，les（massif montagneux）喀尔巴阡山（中欧高原，多山）

Carpenter 卡彭特（里斯）

Carrare 卡腊腊（意）

Carrhes 卡尔思（美索不达米亚）

Carthage 迦太基（突尼斯）

Carthaginois，les 迦太基人（又见 Puniques，les）

Carthagène 卡塔黑纳（西）

Caspienne，mer 里海

Cassitérides，îles 卡西特里得群岛（不列颠群岛别称）

Cassius（Caius Cassius Longinus）（古罗马将军）

Castille 卡斯蒂利亚（西）

Castor 卡斯托耳（希神）

Castulo 卡斯吐罗（西）

Catal Höyük 萨塔勒·霍郁克（安纳托利亚）

Catalogne 加泰罗尼亚地区（西）

Caton l'Ancien 加图（大）（古罗马政治家）

Catulle 卡图卢斯（拉丁诗人）

Caucase，chaîne de montagnes 高加索山脉（小亚细亚）

Cellini（Benvenuto）切利尼

Celtes，les 凯尔特人（印欧民族）

Celtibères，les（凯尔特人和伊贝尔人混血民族）

Céphalonie 凯法利尼亚（爱奥尼亚海中岛屿）

Ceram（C. W.）车朗

Cerveteri 见 Caere

César, Jules (Caius Julius Caesar) 儒勒·恺撒
Chalcédoine, ville 卡尔塞顿城（小亚细亚）
Chalcis 卡尔基斯（希腊）
Chalcidiens, les 卡尔基斯
Chaldée 迦勒底（美索不达米亚）
Champagne 香槟（地区）(法)
Chancelade 香瑟拉得（法）
Charente 夏朗特（法）
Charles VIII 查理八世（法国国王）
Charles le Téméraire "威猛王" 查理（勃艮第公爵）
Charun 夏伦
Chateaumeillant 夏多梅扬（法）
Cheik el Gournah 谢克艾尔古那（埃及）
Chélif, fleuve 谢利夫河（阿尔及利亚）
Cher, fleuve 谢尔河（法）
Cherchell 谢尔谢勒（阿尔及利亚）
Chéronée 凯罗尼亚（希腊）
Chérusques, les 谢如斯克人（日耳曼民族）
Chicago 芝加哥
Childe, Gordon 戈登·柴尔德
Chilon 希龙（古希腊智者之一）
Chine 中国
Chioggia 乔尔乔亚（意）
Chios, île 开俄斯岛（爱琴海希腊岛屿）
Chiusi 丘西 见 Clusium
Chosroès 肖斯罗埃斯 [?] (帕尔特国王)
Chusor 舒少尔（腓尼基神）
Chypre, île 塞浦路斯岛
Cicéron (Marcus Tullius Cicero) 西塞罗（古罗马政治家和雄辩家）
Cilicie 西利西亚地区（小亚细亚）
Cimbres, les 辛布里人（日耳曼民族）
Cimmériens, les 希梅里安人（来自俄国的半游牧民族）

Coscia 科西嘉
Cottiens, les 科第人（阿尔卑斯地区日耳曼民族）
Crassus 克拉苏 见 Licinius Crassus Dives
Crémone 克雷莫纳（意）
Crésus 克罗伊斯（吕底亚国王）
Crète ou Candie, île 克里特岛
Crétois, les 克里特人
Crimée 克里米亚（乌克兰）
Critias 克里提亚斯（雅典政治家）
Croissant fertile 肥沃的克瓦桑（小亚细亚）
Croiset（A. et M.）克鲁瓦塞（A. 和 M.）
Cro-Magnon 克罗马农人
Crotone 克罗托那（意）
Ctésiphon（美索不达米亚）
Cuenca 古昂卡（西）
Cumes 古姆斯（意）
Cunaxa 库那克萨（波斯帝国）
Cybèle 库柏勒（弗里杰亚女神）
Cyclades（archipel）基克拉迪群岛（爱琴海）
Cyclopes, les 库克罗普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Cylon 希龙（希腊国务活动家）
Cynocéphales 库诺斯克法莱（帖撒利亚）
Cyrénaique 昔兰尼加（利比亚）
Cyrène 昔兰尼（利比亚）
Cyrus le Jeune 小居鲁士（波斯王子）
Cythère, île 基西拉岛（爱奥尼亚海上岛屿）

Daces, les 达契亚人
Dacie 达契亚地区（古罗马时代的罗马尼亚）
Dagon 达贡（腓尼基神）
Damas 大马士革
Dananiyim ou Danaoi, les 达纳尼因人或达纳埃人（西利西亚的迈锡尼民族）

DORIENS, les 多里安人（印欧人）
Doura 杜拉（叙利亚）
Drépanon, voir Trapani. 德雷帕农，见特拉帕尼
DRUSUS（Nero Claudius）德鲁苏斯·尼库斯（罗马将军）
DUILIUS NEPO（Caius）杜伊利乌斯（罗马执政官）
DüRER 丢勒（德国画家，雕刻家）
DÜSSAUD（R.）迪索
Dzoungarie 准噶尔（中国西部）

EBERHARD 埃伯哈德（伊莎贝尔，俄罗斯旅行家、作家）
EBIH-IL 埃比伊勒（马里总督）
Ebre, fleuve 埃布罗河（西班牙河流）
Ecosse 苏格兰（大不列颠）
Egates 厄加特（西西里岛附近群岛）
Egée（mer）爱琴海
Egéens, les 爱琴海地区居民（爱琴海岛屿前希腊时期的居民）
Egine 埃伊纳岛（阿提卡附近的希腊岛屿）
EGINETES, les 埃伊纳岛居民
Egypte, EGYPTIENS, les 埃及，埃及人
EL 厄勒（腓尼基神）
Elam 埃兰（伊朗）
Elbe 易北河（第勒尼安海岛屿）
Elée 埃利亚（意大利）
El Obeid 埃勒奥贝德（美索不达米亚）
Eléphantine, île d' 埃利芳提纳（埃及岛屿）
Eleusis 埃莱夫西斯（古希腊城市）
Elis 埃利斯（希腊）
EMPEDOCLE 恩培多克勒（希腊哲学家，立法者）
ENEE 埃涅阿斯（传说中的特洛伊王子）
ENKI 恩基（美索不达米亚神）
ENLIL 恩利勒（美索不达米亚神）
Eoliennes, voir Lipari（îles）埃奥利群岛（见利帕里群岛）

EVANS (J. D.) 埃文斯
EXECHIAS 埃克塞什亚（盆饰画家，希腊陶瓷工匠）
Eynan 埃伊南（巴勒斯坦）
EZECHIEL 以西节（《圣经·旧约》中的四大先知之一）

FABIUS MAXIMUS 费边·马克西姆斯（罗马政治家）
Faleries 法雷里（意大利）
FARRINGTON (Benjamin) 法兰格通（邦雅曼）
FAUSTINE 福斯蒂娜（罗马皇后）
Fayoum 法约姆（埃及）
FEBVRE (Lucien) 费布弗尔（吕西安）
Felsina 费尔西纳（今意大利波伦亚）
FERRERO (Guglielmo) 费雷罗（古格里耶莫）
FLAMINIUS 弗拉米尼努斯（罗马将领）
Florence 佛罗伦萨（意大利）
Font-de-Gaume 枫－德－哥姆洞穴（法国）
France 法国
FUSTEL DE COULANGES 弗斯特尔·德·库朗日

Gabès 加贝斯湾（突尼斯东岸港市）
Gabon 加蓬
Gadès 卡贝斯（今卡的斯，西班牙）
Gaius 盖尤斯（罗马法学家）
Galates (les, autre nom pour les Gaulois) 加拉茨人（高卢人又一称谓）
GALBA 加尔巴（罗马将军）
Galilée 加利利（巴勒斯坦北部地区）
GALILEE 伽利略（意大利天文学家）
GALLIEN 加列努斯（罗马国王）
Gard 加尔河（法国）
Gascogne 加斯科涅湾
GAUDEMET (Jean) 戈德梅（让）
Gaugamèles 高加米拉（亚述）

Grand Zab, fleuve 大扎布河（底格里斯河支流）
Grande-Bretagne 英国
Grande-Grèce 大希腊
Granique 格拉尼卡斯河（小亚细亚）
GRAS (Michel) 格拉（米歇尔）
Grèce, GRECS, les 希腊，希腊人
GRECO 格列柯（希腊裔西班牙画家）
GRIMAL (Pierre) 格里马尔（皮埃尔）
Grimaldi 格里马尔迪家族（法国）
Groenland 格陵兰
GROUSSET (René) 格鲁塞（勒内）
Guadalquivir, fleuve 瓜达尔基维尔河（西班牙河流）
GUANCHES, les 关切人（加那利群岛，大西洋居民）
GUDEA 居德阿（拉格什国王）
GUILAINE (Jean) 吉莱纳（让）
GYPTIS (femme de Protis) 吉普提斯（普罗提斯之妻）

Hacilar 哈吉拉尔（安纳托利亚）
HADES 哈德斯（希冥王神）
HADRIEN 哈德良（罗王）
Haghia Triada 哈格亚特里亚达（克里特）
Hagiar Kim 哈吉亚克姆（马耳他）
Halaf 哈雷夫（美索不达米亚）
Halicarnasse 哈利卡纳苏斯（亚洲希腊城市）
Hallstatt, civilisation d' 哈尔施塔特文明
Halpa 哈尔帕（叙利亚）
Hal Saflieni 哈尔萨弗里耶尼（马耳他）
Hal Tarxien 哈尔塔克西亚（马耳他）
Halys, voir Kizil Irmak 哈利斯河，见克泽尔厄尔马克河
Hamat 哈马特（腓尼基）
Hambourg 汉堡（德国）
HAMILCAR BARCA 哈米尔卡尔·巴尔卡（迦太基人首领）

HERODOTE 埃罗多特（希腊历史学家）
HERON D'ALEXANDRIE 希罗亚历山大（希腊学者及数学家）
HERONDAS 埃隆达斯（希腊诗人）
HEROPHILE 希罗菲卢斯（希腊学者）
HESIODE 赫西奥德（希腊诗人）
HEURGON（Jacques）厄尔贡（雅克）
Hiérakonpolis 希拉孔波利斯（埃及）
HIERON Ier希伦一世（锡拉库萨独裁者）
HIERON IIer希伦二世（锡拉库萨国王）
Himère 希梅拉（西西里岛）
HIMILCON 希米尔科（迦太基航海家）
Hindu Kuch, massif montagneux 兴都库什（中亚高原区）
HIPPARQUE 喜帕恰斯（希腊天文学家）
HIPPOCRATE DE COS 希波克拉底·德科斯（希腊人）
HIPPODAMOS DE MILET 希波达姆·德米莱（希腊建筑学家）
HIRAM 希兰（提尔国王）
Hittite (Empire) ou Hatti, HITTITES, les 赫梯（帝国）或哈梯，赫梯人
Hollande, HOLLANDAIS, les 荷兰，荷兰人
HOMERE 荷马（希腊诗人）
Hongrie 匈牙利
HOOD（Sinclair）胡德
HORACE 贺拉斯（拉丁诗人）
HORUS 何露斯（古埃及太阳神）
HOTTENTOTS, les 霍屯督人（非洲游牧民族）
HOURRITES, les 胡里特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亚洲人）
HROZNYI（Bedrich）赫罗兹尼（贝德里什）
HUBERT（Henri）于贝尔（亨利）
Huleh, lac 于勒（巴勒斯坦湖泊）
HUNS, les 匈奴人（北亚游牧民族）
HUOT（Jean-Louis）于奥（让-路易）
HYKSOS, les 喜克索斯人（埃及闪米特人）
Hymette, mont 伊米托斯山（希腊山峰）

Istanbul, voir aussi Byzance, Constantinople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另见拜占廷，君士坦丁堡
Istrie 伊斯特拉半岛（南斯拉夫）
Italica 古意大利遗址（西班牙）
Italie 意大利
Ithaque 伊萨基（希腊）

Jaén 哈恩（西班牙）
Japon 日本
Jarmo 杰尔莫（美索不达米亚）
Jéricho 杰里科（巴勒斯坦）
Jérusalem 耶路撒冷（巴勒斯坦）
JOUKOVSKY（M. S.）约科夫斯基
Jourdain, fleuve 约旦河（以色列河流）
JUAN D'AUTRICHE 奥地利胡安（西班牙王子）
Juda, royaume 犹大王国
JUGURTHA 朱古达（努米底亚国王）
Juif, Etat 犹太国
JUIFS, les 犹太人
JUNON 朱诺（罗马女神）
JUPITER 朱庇特（罗马神）
Jura 汝拉山脉（法国）
Jutland 日德兰（丹麦）

Kabylie 卡比利亚（北非）
Kahoun 卡汉（埃及）
KAHRSTEDT（U.）卡赫斯泰特
Kalymos 卡里莫斯（希腊）
Kaminia 卡米尼亚（希腊利姆诺斯岛）
Kanesh ou Kültepe 卡内什或灰山（安纳托利亚）
Kanli Kastelli 坎勒·卡斯泰利（希腊）
Kapovaia 考波什堡（俄罗斯）

Lacara 拉卡拉河（西班牙）
Laconie 拉科尼亚（希腊）
Lacydon 拉锡东（临近马赛）
LAEVINUS（M. Valerius）瓦勒里乌斯
Lagash 拉加什（美索不达米亚）
LAGIDES, les 拉吉得人（托勒密王朝）
La Gravette 拉·格拉维特（法国）
LAMBOLEY（J.-L.）朗博莱
La Madeleine 拉马德莱纳（法国）
Lampédouse, île 兰佩杜萨岛（意大利）
Lanuvium 拉努维乌姆（意大利）
Laos 拉奥斯
Lapithos 拉皮索斯
Larissa 拉里萨（色萨利）
Larsa 拉尔萨（美索不达米亚）
Lascaux 拉斯科（法国）
La Serreta 拉塞罗塔山（西班牙）
Latium 拉丁姆（意大利）
Latomies 拉托米（锡拉库萨，西西里）
Laugerie 洛热里
LAUGIER（J.-L.）洛吉耶
Laurion, montagne 拉夫里翁（希腊山脉）
La Valette 瓦莱塔（马耳他）
Lavinium 拉维尼乌姆（意大利）
Le Caire 开罗（埃及）
Lecce 莱切（意大利）
Lechaion 莱沙永（希腊科林斯港口）
Lemnos, île 利姆诺斯岛（希腊岛屿）
Lépante 勒班陀（希腊）
Leptis Magna 大莱普提斯（突尼斯）
Lerne 莱尔内（希腊）
Lesbos, voir Mytilène 莱斯沃斯，见米蒂利尼

Levallois 勒瓦娄哇（法国）
Levant 利凡得（西班牙地区）
Levanzo, île 莱万佐（意大利岛屿）
LEVI-STRAUSS（Claude）莱维－斯特劳斯（克洛德）
Liban, montagne 黎巴嫩（小亚细亚山脉）
LIBBY（William F.）利比（威廉）
Libye, LIBYENS, les 利比亚，利比亚人
Libyque（chaîne）利比克（山脉）
LICINIUS CRASSUS DIVES 李锡尼（罗马政治家）
LIGURES, les 利古里亚人（地中海西部居民）
Lilybée 利利比（西西里岛）
Limoges 利摩日（法国）
Li Muri 利穆里（撒丁岛）
Lindos 林佐斯（罗得岛）
Lion, golfe du 利翁湾（地中海西部）
Lipari ou Eoliennes 利帕里或爱奥利安群岛（第勒尼安海意大利群岛）
Lixus 利克苏斯（摩洛哥）
Llobregat 略夫雷加特河（西班牙）
Lluchmayor 柳奇马约尔（西班牙）
Lombardie 伦巴弟区（意大利）
Los Millares 洛斯米拉（西班牙）
LOT（Ferdinand）洛特（费迪南）
LOTOPHAGES, les 食莲者（神话居民）
LOUWITES, les 鲁维特人（小亚细亚居民）
LUCAIN 卢卡（拉丁诗人）
Lucanie 卢卡尼亚（意大利）
LUCE（J. V.）吕斯
Lucera 卢切拉（意大利）
LUCIUS QUIETUS 卢西乌斯（罗马将领）
LUCRECE 卢克莱修（拉丁诗人）
LUCULLUS 卢库卢斯（罗马将领）
LUDWIG（Emil）路德维希

LULI 卢利（提尔和西顿国王）
Lutèce 吕泰斯（巴黎旧称）
Luxembourg 卢森堡（大公爵）
LYCIENS, les 吕西亚人（小亚细亚居民）
LYCURGES 利库尔戈斯（斯巴达传说中的立法者）
Lydie 吕底亚（小亚细亚王国）
LYSANDRE 来山得（斯巴达将军）
LYSIPPE 利西波斯（希腊雕塑家）

Macédoine 马其顿
Mâcon 马孔（法国）
Madagascar 马达加斯加
Maghreb 马格里布
Magnésie du Sipyle 马格内西亚（锡皮卢斯山地区）
MAGON 马贡（迦太基农学家）
MAGONIDES, les 马戈（迦太基家族）
Mahdia 马赫迪耶（突尼斯）
Maïkop 迈科普（高加索）
MAILLOL (Aristide) 马约尔（阿里斯蒂德）
Mainaké (auj. Malaga) 马伊纳凯（今马拉加，西班牙）
MAIURI (Amedeo) 马尤里（阿默德奥）
Majorque, île 马霍卡（巴利阿里群岛）
Malaga, voir aussi Mainaké 马拉加（西班牙），又见 Mainaké
Malée, cap 马莱阿角（伯罗奔撒半岛）
Mallia 马利亚（克里特）
Malte, île 马耳他岛
MAMERTINS, les 马麦丁人
Manche (mer) 芒什海
Mandchourie 满洲（中国）
Mantoue 蔓图亚（意大利）
Marathon 马拉松（希腊）
MARC AURELE 马克·奥雷尔（罗马皇帝）

MELLAART (James) 梅拉尔特(亚姆)
Mélos *ou* Milo, île 米洛斯或米洛(基克拉泽群岛岛屿之一)
MELQART 麦勒卡特(提尔神)
MEMNON 门农(希腊将军)
Memphis 孟菲斯(埃及)
MENANDRE 米南德(希腊诗人)
MENELAS 墨涅拉俄斯(斯巴达神话国王)
MENES-NARMER 美尼斯(埃及神话国王)
MENRVA 默尔瓦(埃特鲁利亚女神)
Menton 芒通(法国)
MERCURE 墨丘利(罗马神)
Merida 梅里达(西班牙)
Mersin 梅尔辛(安纳托利亚)
Mésie 梅西(环绕黑海的欧洲地区)
Mésogée 梅索吉亚(希腊)
Mésopotamie, MESOPOTAMIENS, les 美索不达米亚，美索不达米亚人
Messara 莫萨拉(克里特岛)
Messénie 麦西尼亚(伯罗奔尼撒半岛)
Messine 墨西拿(西西里岛)
Métaponte 梅塔蓬图(意大利)
Métaure, fleuve 梅陶罗河(意大利)
METELLUS, voir CAECILIUS METELLUS 梅特卢斯，见卡西琉斯·梅特鲁斯
Meuse, fleuve 默兹河(法国)
MEYER (Edouard) 梅耶(爱德华)
Mgarr 穆加尔(马耳他)
Milan 米兰(马耳他)
Milazzo, voir Myles 米拉佐
Milet, MILESIENS, les 米利都，米利都人
MINERVE 密涅瓦(罗马女神)
Minorque, île 梅诺卡(巴利阿里群岛岛屿)
MINOS 米诺斯(克里特神话国王)[?]
Mirabello, golfe de 米拉贝洛湾(克里特)

MITHRA 密特拉神（伊朗神）
MITHRIDATE VI EUPATOR, dit le Grand 米特拉达梯六世
Mitidja 米提贾平原（阿尔及利亚）
Mittani, MITTANIENS, les 米坦尼（小亚细亚），米坦尼人
Mnaidra 梅耐德拉
Mochlos 莫什罗斯
Modène 摩德纳（意大利）
Mogador 摩加多尔（摩洛哥）
MOGHOL 大莫戈勒（一印度王朝领主）
Moldau 莫尔道河（中欧河流）
Moldavie 摩尔达维亚（罗马尼亚）
Monastiraki 莫纳斯蒂拉基（克里特）
Mongolie 蒙古国（中亚）
Moravie 摩拉维亚（中欧）
MORDANT（C.）莫尔当
Morena 莫雷纳山（西班牙）
MORENZ（S.）莫伦茨
Morte（mer）死海
MOSCATI（Sabatino）莫斯卡蒂（萨巴蒂诺）
Moselle, fleuve 莫泽尔河
MOTH 莫特（美索不达米亚神）
Motyé 莫特耶（西西里）
Moyen-Orient 中东
Mulhouse 米卢斯（法国）
Mussian 米西亚（美索不达米亚）
Mycènes, MYCENIENS, les 迈锡尼（希腊）
Mykérinos 麦凯林努斯（法老）
Myles ou Milazzo 米拉佐（意大利）
Myson de Chené 米松·德谢内（古希腊智者）
Mytilène 米蒂利尼（莱斯沃斯主要城市）

Nabuchodonosor Ⅱ 尼布甲尼撒二世（巴比伦国王）

Nabuchodonosor 那布绰多诺掌人
Nahal Mishmar, grotte de 纳哈尔米什玛尔岩洞（安纳托利亚）
Naples 那不勒斯（意大利）
Narbonnaise 那博呐（高卢）
Narmer 那尔迈，见 Ménès – Narmer
Naucratis 瑙克拉提斯（埃及）
Naxos 纳克索斯（西西里）
Nazar (B.) 纳扎尔
Néchao 尼科（法老）
Néguev, désert du 内盖夫沙漠（以色列）
Nemours 讷穆尔（法国）
Neptune 尼普顿（海神，罗马神话）
Néron 尼禄（古罗马皇帝）
Nerva 内尔瓦（古罗马皇帝）
Nethuns 内桑斯（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神）
Neuchâtel 纳沙泰尔（瑞士）
Neumagen 诺伊马根（高卢）
Nicomédie 尼肯米底亚（小亚细亚）
Niebuhr (B. Georges) 尼布尔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Niger, fleuve 尼日尔河（非洲）
Nil, fleuve 尼罗河（埃及）
Nimègue 奈梅亨（荷兰）
Nîmes 尼姆（法国）
Nimrud 尼米兹（亚述）
Ninive 尼尼微（美索不达米亚）
Nippur 尼普尔（美索不达米亚）
Noire, mer 黑海
Nora 诺拉（撒丁岛），见 Pula
Nord, mer du 北海
Nougier (L.-R.) 努吉尔
Nubie 努比亚

Numance 努曼提亚（西班牙）

Octave (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 屋大维（古罗马帝国皇帝，其姓为奥古斯都）
Odessa 敖德萨（乌克兰）
OEnomaos 俄诺马奥斯（古希腊哲学家）
Olympe, mont 奥林波斯山（希腊）
Oman 阿曼（阿拉伯半岛）
Ombrie 翁布里亚（意大利）
Ombriens, les 翁布里亚人
Ophir 俄斐（东方古代地区，位置尚未确定）
Oppenheimer (Robert) 奥本海默
Orange 奥朗日（法国）
Oronte, fleuve 奥龙特斯河（小亚细亚）
Oropos 奥罗珀斯（希腊）
Orvieto 奥尔维耶托（意大利）
Osiris 俄赛里斯（埃及神）
Osques, les 奥斯基人（意大利古民族）
Otrante 奥特朗托（意大利）
Ouenamon 乌埃纳蒙（埃及祭司）
Oural (chaîne montagneuse) 乌拉尔山脉（俄罗斯）
Ourmia, lac de 乌尔米耶湖（伊朗）
Ovide 奥维德（古拉丁姆诗人）
Ozieri 奥芝里（撒丁岛）

Pacifique, océan 太平洋
Paestum 帕埃斯图姆（意大利）
Palaikastro 帕莱奥卡斯特龙（克里特岛）
Palerme ou Panormos 巴勒莫（西西里）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llas 帕拉斯（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称号）
Palmerston (H.) 帕默斯顿

Palmyre 巴尔米拉（叙利亚古城）
Pandateria, île 潘达特里亚岛（第勒尼安海）
Pannonie 潘诺尼亚（中欧）
Panormos 帕诺尔莫斯，见 Palerme
Pantelleria 潘泰莱里亚岛（意大利）
Papin (Denis) 帕潘
Paris 巴黎（法国）
Parisien, Bassin 巴黎盆地（法国）
Parménide 巴门尼德（古希腊哲学家）
Parnasse, mont 帕尔纳索斯山（希腊）
Paros, île 帕罗斯（基克拉泽斯群岛）
Parthes, les 安息人（伊朗）
Pascal (B laise) 巴斯卡尔
Patrica 帕特里卡，见 Lavinium
Patrocle 帕特洛克罗斯（荷马笔下的英雄）
Paul (saint) 圣保罗
Paul Emile 保罗·埃米尔（古罗马执政官）
Pausanias 保萨尼阿斯（古希腊作家）
Pélasges, les 佩拉斯吉人（前希腊民族）
Pélopidas 派洛皮德（底比斯将军）
Péloponnèse 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
Perga (Pamphylie) 佩尔吉（潘菲利亚）
Pergame 帕加马（小亚细亚）
Pergaméniens, les 帕加马人
Périandre 佩里安德（科林斯的僭主）
Périclès 伯里克利（雅典政治家）
Périgord 佩里戈尔（法国）
Pérou 秘鲁
Pérouse 佩鲁贾（意大利）
Perse, Empire 波斯帝国
Perses, les 波斯人
Persée 珀尔修斯（赫西奥德之兄）

Persée 珀尔修斯（马其顿国王）
Perséphone 珀尔塞福涅（希腊女神）
Persépolis 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国）
Persique, golfe 波斯湾
Pétrone 佩特罗尼乌斯（古拉丁姆作家）
Peuples de la Mer, les 海上民族
Phaistos 费斯托斯（克里特岛）
Phalante 法兰特（斯巴达人，塔兰托的缔造者）
Phédon 菲敦（古希腊哲学家）
Phénicie 腓尼基
Phéniciens, les 腓尼基人
Phidias 菲迪亚斯（古希腊雕塑家）
Philippe Ⅱ 腓利二世（马其顿国王）
Philippe Ⅴ 腓利五世（马其顿国王）
Philistins, les 非利士人（海上民族之一）
Philopoemen 菲洛皮门（古希腊政治家）
Philostrate 菲洛斯特拉托斯（古希腊作家）
Phocée 福西亚（古希腊城市，小亚细亚）
Phocéens, les 福西亚人
Phrygie 弗里吉亚（小亚细亚地区）
Phrygiens, les 弗里吉亚人
Phylakopi 菲拉科比（米洛斯岛屿）
Pic de la Mirandole (Jean) 皮科·多拉·米兰多拉
Piganiol (A.) 皮加尼奥尔
Pimenteli 皮门特利（撒丁岛）
Pindare 品达罗斯（希腊诗人）
Pinde (massif montagneux) 品都斯山脉（希腊）
Pirée, Le 比雷埃夫斯（希腊）
Pirenne (Henri) 皮雷纳
Pise 比萨（意大利）
Pisistrate 皮西斯特拉图（雅典僭主）
Pithécusses ou Ischia, île 伊斯基亚岛（意大利）

Pittacos 皮塔科斯（米蒂利尼的僭主）
Plaisance 皮亚琴察（意大利）
Planhol（Xavier de）普兰赫尔
Platon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
P laute 普劳图斯（古拉丁姆诗人）
Pline l' Ancien 普林尼（老）（古拉丁姆自然学家及作家）
Pline le Jeune 普林尼（小）（古拉丁姆作家）
Plotin 伯罗丁（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
Plutarque 普卢塔克（古希腊作家）
Pluton 普鲁同（冥王，罗马神话）
Pnyx 普尼克斯（雅典山岗）
Pô，fleuve 波河（意大利）
Podolie 波多利亚（乌克兰）
Poitiers 普瓦提埃（法国）
Pollux 波吕丢刻斯（希腊神话英雄）
Pologne 波兰
Polybe 波利比奥斯（古希腊历史学家）
Polyclète 波利克里托斯（古希腊雕塑家及建筑家）
Pompée（Cneius Pompeius Magnus）庞培（罗马共和国将军、政治家）
Pompéi 庞贝（意大利）
Pomponius 庞博尼乌斯（古罗马法学家）
Pont，royaume du 本都（小亚细亚古代王国）
Pont－Euxin 好客海，见 Noire（mer）
Pontia，île 蓬提亚岛（第勒尼安海）
Pontins 蓬蒂内沼泽（意大利）
Populonia 波普洛尼亚（意大利）
Porsenna 波尔塞纳（埃特鲁里亚国王）
Portugal 葡萄牙
Poséidon 波塞冬（海神，希腊神话）
Posener（G.）波瑟内
Poulasati，les 普拉萨蒂人（海上民族之一）
Pouzzoles 波左利（意大利）

Préneste 普雷内斯特（意大利）
Priam 普里阿摩斯（特洛伊国王）
Priène 普里恩（小亚细亚）
Proche-Orient 中东
Proculus 普罗古卢斯（古罗马法学家）
Properce 普罗佩提乌斯（古拉丁姆诗人）
Protagoras d'Abdère 普罗塔哥拉（古希腊诡辩学家）
Protis 普罗蒂斯（马赛的缔造者）
Provence 普罗旺斯（法国）
Przyluski（Jean）普芝鲁斯基
Psammétique Ier 普萨美提克一世（埃及国王）
Pseira 普色拉（克里特岛）
Ptah 普塔（埃及神）
Ptolémée Ier, Sôter 托勒密一世（法老）
Ptolémée II Philadelphe 托勒密二世（法老）
Ptolémée III 托勒密三世（法老）
Pula 普拉（撒丁岛）
Puniques, les 布匿人（迦太基人别称）
Puteoli 普特奥里（意大利）
Pydna 彼得那（马其顿）
Pylos 皮洛斯（希腊）
Pyrénées（chaîne montagneuse）比利斯山脉（西法交界）
Pyrgi 皮尔吉（埃特鲁里亚）
Pyrrhon d'Elis 皮朗（古希腊哲学家）
Pyrrhos II 皮洛士二世（伊比鲁斯国王）
Pythagore 毕达哥拉斯（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

Qadesh 卡迭石（叙利亚）
Quades, les 夸迪人（日耳曼民族）
Quintilien 昆体良（又昆体利安）（古罗马修辞学家）

Ra 瑞（太阳神，埃及神话）

Raguse 拉古扎（克罗地亚）
Ramse Ⅱ 拉美西斯二世（法老）
Ramse Ⅲ 拉美西斯三世（法老）
Raphia 拉菲亚（叙利亚）
Ras Shamra 拉斯沙姆拉，见 Ugarit
Regulus（Marcus Atilius）雷古卢斯（古罗马将军、执政官）
Reims 兰斯（法国）
Rekmiré 赖克米拉（埃及大臣）
Reno，fleuve 雷诺河（意大利）
Reschef 瑞舍夫（叙利亚神）
Rhadamante 拉达曼提斯（阴间判官之一，希腊神话）
Rhegion 雷焦（意大利）
Rhin，fleuve 莱茵河（日耳曼）
Rhodanousia 罗达努西亚（法国）
Rhodé ou Rosas 罗萨斯（西班牙）
Rhodes 罗得岛
Rhodiens，les 罗得岛人
Rhône，fleuve 罗呐河（流经瑞士、法国）
Rif（massif montagneux）里夫山脉（摩洛哥）
Rio de Oro 里奥－德奥罗（撒哈拉沙漠）
Romain，Empire 罗马帝国
Romanelli 罗曼里（意大利）
Rome 罗马
Romains，les 罗马人
Ronsard（Pierre de）龙萨（法国诗人）
Roquepertuse 罗克佩尔图斯（法国）
Rosas 罗萨斯，见 Rhodé
Rostovzeff（Michel）罗斯托夫采夫
Rostow（W.）罗斯托
Rouffignac 鲁菲尼亚克（法国）
Rouge，mer 红海
Rougier（Louis）鲁吉耶

Sargon Ⅱ 萨尔贡二世（亚述国王）
Sarmates, les 萨尔马特人（伊朗游牧民族）
Saronique, golfe 萨罗尼科斯湾（希腊）
Sassanides, les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
Satre 萨特（古埃特鲁里亚的主神之一）
Saturne 萨图恩（农神，罗马神话）
Schaeffer (Claude A.) 舍费尔
Schliemann (Heinrich) 谢里曼
Scipion l' Africain 大西庇阿（古罗马将军、政治家）
Scipion Emilien 西庇阿（古罗马执政官、政治家）
Scipions, les 西庇阿家族（属古罗马科涅利亚氏族）
Scythes, les 西徐亚人（亦称斯基泰人，祖籍伊朗的半游牧民族）
Scythie 西徐亚（南俄罗斯）
Sebkha er Riana 艾尔亚奈盐沼（土耳其）
Seeland, île 西兰岛（丹麦）
Seele (Keith) 希尔（凯斯）
Ségobriges, les 塞戈布里日人（高卢民族）
Ségovie 塞哥维亚（西班牙）
Séleucide, Empire 塞琉西古国（小亚细亚）
Séleucides, les 塞琉西王朝（希腊化时代统治小亚细亚的王朝）
Séleucie 塞琉西亚（希腊化时代底格里斯河畔的城市）
Selincourt (Aubrey de) 塞兰古尔
Sélinonte 塞利农特（西里西亚）
Sélinonte 塞利农特（西西里）
Sémites, les 闪米特人（小亚细亚民族）
Sénégal, fleuve 塞内加尔河（非洲）
Sénèque 塞内加（古拉丁姆哲学家）
Sennachérib 辛那赫里布（亚述国王）
Sennefer 塞内佛（埃及人）
Sénons, les 塞农人（高卢民族）
Sens 桑斯（法国）
Sentinum 桑第诺姆（意大利）

Septime Sévère 塞维鲁（罗马皇帝）
Sérapis 萨拉匹斯（希腊、埃及冥神）
Servius Tullius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罗马国王）
Sésostris Ⅱ 辛努塞尔特二世（法老）
Seth 塞托（埃及神）
Sevan, lac de 塞凡湖（亚美尼亚）
Shamash 沙玛什（美索不达米亚神）
Shanghai 上海
Siam 泰国
Sibérie 西伯利亚
Sicanes, les 西坎人（西西里土著居民）
Sicile 西西里
Sicules, les 西库尔人（西西里土著居民）
Sicyone 西锡安（希腊）
Sidon 西顿（腓尼基）
Sienne 锡耶河（意大利）
Sila, massif de la 锡拉高地（意大利）
Skira（Albert）斯基拉
Silius Italicus 西利乌斯·伊塔科库斯（古拉丁姆作家）
Sinaï, mont 西奈山（埃及）
Sinouhé 西努希（埃及公元前 20 世纪一部小说的男主人公）
Smirat 斯米拉特（突尼斯）
Smith（W. S.）史密斯
Smyrne 士每那（安纳托利亚）
Socrate 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Solon 梭伦（雅典政治家、古希腊智者）
Solutré 梭鲁特雷（法国）
Somalie 索马里
Sophocle 索福克勒斯（古希腊诗人）
Sounion, cap 苏尼翁角（希腊）
Sous, fleuve 苏斯河（北非）
Spalato ou Split 斯普里特（克罗地亚）

Spartacus 斯巴达克斯（古罗马奴隶起义首领）
Sparte 斯巴达（希腊）
Spartiates, les 斯巴达人
Spina 斯皮纳（意大利）
Sporades, îles 斯波拉泽斯群岛（爱琴海）
Stagire 斯塔伊拉（希腊）
Stekelis（M.）斯泰克利斯
Stonehenge 圆形石林，巨石阵（大不列颠）
Strabon 斯特拉博（古希腊地理学家）
Straton 斯特拉顿（古希腊物理学家）
Stromboli 斯特龙博利（埃奥利安岛）
Styrie 施泰尔马克（奥地利州名）
Suèves, les 斯维比人（日耳曼民族）
Suez 苏伊士（埃及）
Sumer 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
Sumèriens, les 苏美尔人
Suppiluliuma Ⅱ 苏皮卢利乌马斯二世（赫梯国王）
Suse 苏萨（埃兰城市）
Susiane 苏古安那（埃兰地区）
Sutéens, les 苏提人（闪米特部落）
Sybaris 锡巴里斯（意大利）
Sybarites, les 锡巴里斯人
Sylla（Lucius Cornelius Sulla）苏拉（古罗马将军、政治家）
Syracuse 锡拉库萨（西西里）
Syracusains, les 锡拉库萨人
Syrie 叙利亚
Syriens, les 叙利亚人
Syros 锡罗斯岛（基克拉泽斯群岛）

Tacite（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塔西佗（古拉丁姆历史学家）
Tagès 塔热（埃特鲁里亚的传奇儿童）
Takla-Makan 塔克拉玛干（中亚）

Tanit 坦尼特（布匿女神）
Tarente 塔兰托（意大利）
Tarpeia 塔尔珀伊亚（古罗马供奉女灶神的贞女）
Tarquin l' Ancien 塔奎尼乌斯（老）（古罗马国王）
Tarquin le Superbe 塔奎尼乌斯（高傲者）（古罗马国王）
Tarquinia 塔尔奎尼亚（埃特鲁里亚）
Tarse 塔尔苏斯（安那托利亚）
Tartessos 塔特苏斯（西班牙）
Taurus（chaîne montagneuse）托罗斯山脉（安纳托利亚）
Teixidor（Javier）泰克西多
Teleilat Ghassul 特莱拉·加苏勒（色萨利）
Télémaque 忒勒玛科斯（奥德修斯之子）
Tell el-Amarna 泰勒阿马尔纳，一译特勒埃尔—阿马尔纳（见 Amarna ）
Tène，La 拉泰纳（瑞士）
Ténès 提奈斯（阿尔及利亚）
Tépé Hissar 泰佩希萨尔（伊朗）
Terence 泰伦提乌斯（古拉丁姆诗人）
Teruel 特鲁埃尔（西班牙）
Tessin，fleuve 提契诺河（流经瑞士、意大利）
Teutoburger Wald 条顿堡林山（日耳曼）
Teutons，les 条顿人（日耳曼民族）
Thalès de Milet 米利都的泰勒斯（古希腊学者）
Thèbes 底比斯（埃及）
Thèbes 第比斯（希腊）
Thémistocle 地米斯托克利（雅典政治家）
Théocrite 忒奥克里托斯（古希腊诗人）
Théophraste 泰奥弗拉斯托斯（古希腊哲学家）
Théra 锡拉（今桑托林，爱琴海岛屿）
Thermaïque，golfe 塞尔迈湾（今塞萨洛尼基湾，希腊）
Thessalie 色萨利（希腊）
Thot 透特（埃及神）
Thrace 色雷斯（东南欧地区）

Thucydide 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
Tiamat 提阿马（巴比伦神话人物）
Tibere（Tiberius Claudius Nero）提比略（古罗马皇帝）
Tibre，fleuve 台伯河（意大利）
Tibulle 提布卢斯（古拉丁姆诗人）
Tibur ou Tivoli 蒂沃利（意大利）
Tiglat Pileser Ier 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美索不达米亚国王）
Tigre，fleuve 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
Timgad 提姆加德（阿尔及利亚）
Timoléon 提莫莱昂（古希腊政治家）
Tinia 提尼亚（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神）
Tinos，ile 蒂诺斯岛（基克拉泽斯群岛）
Tinset，lac 廷塞特湖（埃及）
Tirynthe 梯林斯（希腊）
Tite-Live 李维（古拉丁姆历史学家）
Tivoli 蒂沃利，见 Tibur
Tolède 托莱多（西班牙）
Tomes 托梅斯（梅西，黑海）
Toscane 托斯卡纳（意大利）
Toulouse 图卢兹（法国）
Tours 图尔（法国）
Toutankhamon 图特安哈门（法老）
Toutmosis Ⅲ图特摩斯三世（法老）
Trajan 图拉真（古罗马皇帝）
Transalpine 山外高卢（高卢）
Transcaucasie 外高加索（高加索）
Transylvanie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
Trapani ou Drèpanon 特拉帕尼（西西里）
Trasimene，lac 特拉西梅诺湖（意大利）
Trébie 特雷比亚河（意大利）
Treuil 特雷耶
Trèves 特里尔（日耳曼）

Tripoli 的黎波里（叙利亚）
Tripolyé, culture de 特里波利耶文化（俄罗斯）
Troie 特洛伊（安纳托利亚）
Tuchulcha 图舒尔沙（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神）
Tunis 突尼斯（突尼斯）
Tunisie 突尼斯
Turcs, les 突厥人
Turkestan 突厥斯坦
Turms 图尔姆斯（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神）
Turquie 土耳其
Tusculum 图斯库卢姆（意大利）
Tyr 提尔（腓尼基）
Tyriens, les 提尔人
Tyrol 蒂罗尔（奥地利）
Tyrrhéniene, mer 第勒尼安海

Ugarit ou Ras Shamra 乌加里特（叙利亚）
Ugento 乌真托（意大利）
Ukraine 乌克兰
Ulysse 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
Uni 乌尼（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女神）
Ur 吾珥（美索不达米亚）
Urartu 乌拉图尔（小亚细亚）
Uruk 乌鲁克（美索不达米亚）
Usatovo 乌萨托沃（乌克兰）
Utique 乌提（突尼斯）

Valachie 瓦拉几亚（罗马尼亚）
Valence 瓦伦西亚（西班牙）
Vallet（Georges）瓦莱
Van, lac de 凡湖（安纳托利亚）
Van Effenterre（Henri）范埃芬特尔

Varagnac (André) 瓦拉尼亚克
Varron 瓦罗 (古拉丁姆作家)
Varus (Publius Quintilius) 瓦鲁斯 (古罗马将军)
Vatican 梵蒂冈 (罗马)
Vaucanson (Jacques de) 沃康松
Vegoia 维戈亚 (埃特鲁里亚仙女)
Véies 维依奥 (埃特鲁利亚)
Velia 埃利亚, 见 Eiée
Vélia 维利亚 (古埃特鲁里亚地区崇奉的神)
Vénètes, les 维内蒂人 (威尼斯居民)
Venise 威尼斯 (意大利)
Ventris (Michael) 文特里斯
Vénus 维纳斯 (古罗马女神)
Verceil 韦尔切利 (意大利)
Vercingétorix 韦辛格托里克斯 (高卢人的首领)
Vernant (J. -P.) 韦尔南
Vérone 维罗纳 (意大利)
Vespasien 韦斯巴芗 (古罗马皇帝)
Vesta 维斯太 (古罗马女神)
Vésuve, volcan 维苏威火山 (意大利)
Vieyra 维耶拉 (毛里求斯)
Vikings, les 威金人 (斯堪的纳维亚的战士、航海者)
Villanoviens, les (维拉诺维安人, 意大利史前居民)
Vindhya, monts 温迪亚山脉 (印度)
Vintimille 文蒂米利亚 (意大利)
Virgile 维吉尔 (古拉丁姆诗人)
Vita-Finzi (Claudio) 维塔芬芝
Volsinies 沃尔西尼
Voltumnus 沃尔图穆努斯 (古埃特鲁里亚地区信奉的神)

Ward (W. A.) 沃德
Watt (James) 瓦特